拉康研讨班 · 第十三期

精神分析的对象

L'objet de la psychanalyse

1965—1966

雅克 · 拉康 著
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 译

中文阅读版
2026-10-30

版本说明

本册收录第十三期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对象》（L'objet de la psychanalyse，1965—1966）共23课的现有中文译文，依据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本地源文件整理。版本日期：2026-10-30。

保留正文、正文图示和段下注释；移除建言、独立阅读笔记及其入口。相关知识卡链接保留在对应段落下，联网后可打开在线卡片。电子书正文、图示与公式可离线阅读。

译文覆盖已完成，翻译校订与注释仍在进行。本册为版本快照；后续修订以项目在线版为准。

作者：Jacques Lacan（雅克·拉康）
中文译文及编辑：拉康中文开放翻译计划贡献者
在线阅读：KotobaRin 言林
项目来源：Lacan Chinese Translation Project

文本来源与对照版本

项目整理和翻译的研讨班原始文本主要来自 Staferla。翻译校订与注释以法语文本见证为主，并按册次和疑难段落参照下列主要版本：

- **法语底本**：Staferla：L'objet de la psychanalyse；本项目整理、分段与法中对齐所用的主要法语原始文本
- **英语书目参照**：Cormac Gallagher, The Object of Psychoanalysis；Lacan in Ireland 研讨班英译页面；本次用于核对册次、课年和英文题名；未据此逐段改写

这些版本用于核对疑难句、术语、引文和异文，不取代法语底本；并非每一册或每一段都使用全部版本，具体取舍以段下注释为准。

联系与交流

预约精神分析工作可以添加 分析师工作微信：Yanlin_Char

翻译项目交流qq群：700300644

分析师bilibili账号 言林_Char

项目贡献者创作的中文译文、译注等采用 CC BY 4.0。法文原始材料与第三方图像不因收录而自动纳入此授权。范围以项目 NOTICE 为准。本册仅作内容筛选、链接转换和排版，未改写译文。

目录

第1课 · 1965年12月1日 6
第2课 · 1965年12月8日 42
第3课 · 1965年12月15日 70
第4课 · 1965年12月22日 113
第5课 · 1966年1月5日 171
第6课 · 1966年1月12日 204
第7课 · 1966年1月19日 233
第8课 · 1966年1月26日 263
第9课 · 1966年2月2日 299
第10课 · 1966年2月9日 327
第11课 · 1966年2月23日 345
第12课 · 1966年3月23日 378
第13课 · 1966年3月30日 401
第14课 · 1966年4月20日 440
第15课 · 1966年4月27日 461
第16课 · 1966年5月4日 497
第17课 · 1966年5月11日 529
第18课 · 1966年5月18日 566
第19课 · 1966年5月25日 606
第20课 · 1966年6月1日 632

第21课 · 1966年6月8日 661
第22课 · 1966年6月15日 687
第23课 · 1966年6月22日 717

第1课 · 1965年12月1日

女士们，先生们；还有高等师范学院院长先生：今天，在这座我不过是客人的学院里，您欣然莅临，使我深感荣幸。

精神分析中主体的地位——我们是否可以说，去年已经为它奠定了基础？

我们最终确立了一种结构，用来说明精神分析家在自己的实践中辨认出的裂分（Spaltung）状态。

精神分析以一种近乎日常的方式辨认出这项裂分。它被承认为基础，因为仅仅承认无意识就足以说明它；而它不断显现，又可以说把精神分析家淹没其中。

然而，要知道他的实践究竟是怎么回事，或者仅仅要依照他所能触及的东西来引导这项实践，对他来说，仅仅把这项分裂当作一个经验事实还不够；即使经验事实已经采取了悖论的形式，也仍然不够。这里需要某种还原：它有时要经过漫长过程才能完成，却在一门科学诞生之际总是具有决定性。

正是这项还原构成了这门科学本有的对象。认识论试图在每一个案例中、或在所有案例中界定这项还原，但至少在我们看来，它远未完成自己的任务。因为据我所知，它并没有借助对象的定义，充分说明那场决定性的突变：这场突变经由物理学奠定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

而现代意义从此取得了绝对意义的位置。下列方面发生的根本风格变化，足以证明这一位置：

- 科学进步的节奏；
- 科学介入我们世界时那种疾驰般的形式；
- 以及一连串连锁反应，它们标志着我们可以称作科学能量扩张的东西。

在这一切的根部，我们作为主体的位置发生了一项改变。它在双重意义上都是根本性的：它开启了这项位置，而科学又不断强化它。科瓦雷在这里是我们的向导；大家知道，他仍未得到应有的认识。

所以，我刚才并没有跨出把精神分析创立为一门科学的那一步。不过，你们或许注意到，去年我把主体的某一时刻当作引线；我认为，这一时刻是科学的本质相关项。它在历史上得到了界定，而我们也许必须知道，它能否在经验中严格重演：这就是由笛卡尔开启、名为我思（cogito）的时刻。

相关知识卡 拉康《科学与真理》

这一相关项作为一个时刻，是拒斥一切知识所必须穿过的狭道；它声称给主体留下某种在存在中的锚定。我们认为，正是这一锚定在定义上构成了科学的主体——这里要在“窄门”的意义上理解“狭道”。

这根引线并没有徒然引导我们，因为它使我们在去年末把经验到的主体分裂表述为知识与真理之间的分裂。我们还给它配上一项拓扑模型

——莫比乌斯带；这个模型让人听出：这两个项彼此接合时形成的分裂，不应来自它们在起源上的区分。

谁若借助我关于弗洛伊德的教学可能给阅读技术带来的启发，重新读一读弗洛伊德把 Spaltung［分裂］一词遗赠给我们的那篇文章[注1]——死亡正是在那里令他搁笔——，再上溯到 1927 年的《恋物癖》[注2]和 1924 年的《神经症与精神病中的现实丧失》[注3]，谁就可以判断：弗洛伊德之所以重整学说，并把重音放到地形学方向上，是否正是出于阐明一个严格说来属于结构的维度。因为唯有这些项之间的关系，以及这项关系在经验中的辩证性重取，才为他的推进提供支点。

> [注1]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防御过程中的自我裂分》（1938），载《结果、观念与问题》第二卷，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8。德文题名：Die Ichspaltung im Abwehrvorgang。

> [注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恋物癖》（1927），载《性生活》，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9。德文题名：Fetischismus。

> [注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神经症与精神病中的现实丧失》（1924），载《神经症、精神病与倒错》，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99。德文题名：Der Realitätsverlust bei Neurose und Psychose。

自我裂分（Ichspaltung）、也就是自我的裂分——他的手正停在这里——丝毫没有预设把某种装置实体化[注4]；恰恰是主体被它指示为有待阐明的项。

> [注4] 原注：“Enter：嫁接（greffer）。”原文所列词形含混，照录并译出释义。

这样一来，如果不再把心理现实包括在内，现实原则就失去了始终附着于它的全部歧义。

这一原则唯一可以界定的功能，就是通向科学的主体。

只须想到这一点，那些因为显得过于明白而被我们禁止去想的思考，便会立刻展开自己的场域。例如，下面的事情是不可思的：

- 作为实践的精神分析；
- 以及作为发现的无意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竟会在科学诞生以前占据自己的位置。这里的科学取绝对意义，也就是刚才指出的意义；它诞生于十七世纪——那个被称作“天才的世纪”的时代。这个意义无疑没有抹去此前以同一名称建立起来的东西；但它不是从那里发现自身的古老形态，而是把那根线索牵引到自己一边，从而更清楚地显示自己同其他一切的差异。

有一点是确定的：如果主体确实处在这项差异的层面，那么一切人文主义的参照都会在那里变得多余，因为这项差异正是对人文主义的截断。

这样说时，我们所瞄准的并不是精神分析与弗洛伊德的发现中那项偶然事件：仿佛只是因为病人以科学之名、以十九世纪末科学赋予其侍从——哪怕等级较低的侍从——的威望来到他这里，弗洛伊德才凭借发现无意识而成功奠定了精神分析。

我们所说的是：同种种关于弗洛伊德与当时科学主义决裂的编织相反，恰恰是这项科学主义本身……

如果愿意，可以用它对布吕克理想的效忠来标示这项科学主义；这些理想又来自一项盟约：亥姆霍兹和杜布瓦-雷蒙曾立誓，要把生理学以及被包括在其中的思维功能，纳入在他们那个时代已近完成的热力学

以数学方式规定的术语之中。正是这项科学主义引导弗洛伊德开辟了那条永远以他命名的道路——他的著作向我们证明了这一点。

我们说，这条道路从未脱离这项所谓科学主义的理想；它所带有的印记不是偶然的，而始终是它的本质。尽管它曾容许种种偏离，它仍从这道印记中保有自己的信誉；这正因为弗洛伊德反对那些偏离，而且总是立即以稳妥的判断和毫不动摇的严谨加以反对。

最好的见证，就是他同自己最有声望的追随者——也就是荣格——决裂：荣格一滑向某种东西，弗洛伊德便同他决裂。那种东西的功能，只能界定为试图在那里恢复一个具有多重"深处"的主体——我要强调，这个词是复数。也就是说，这个主体由一种同知识的关系构成；这项所谓"原型式"的关系，不再被还原为现代科学所允许的那一项，并把其他一切关系排除在外。现代科学所允许的关系，无非就是我们去年界定为点状而消逝的关系：这项同知识的关系，从其历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时刻保留了我思之名。

正因为这个无可怀疑、在弗洛伊德全部工作中显而易见的起源，正因为弗洛伊德作为一个学派之首留给我们的教训，马克思主义才在这里没有着力点。据我所知，也没有哪位马克思主义者坚持以弗洛伊德在历史上的归属为名，对他的思想——弗洛伊德的思想——提出质疑。

我们具体指的是他属于二元君主国的社会：弗洛伊德在精神上厌恶资本主义秩序，却仍被限制在犹太式的边界内；正是这项资本主义秩序制约了他的政治不可知论……

你们当中谁能为我们写一篇配得上拉梅内[注5]的《论政治事务中的冷漠》？我还要补充：弗洛伊德属于资产阶级伦理；他一生的尊严令我

们肃然起敬，而这份敬意又发挥了抑制作用，使他的著作无法在误解与混乱以外，真正成为当今仅存的真理之人的汇合点：

> [注5] 罗贝尔·费利西泰·德·拉梅内：《论宗教事务中的冷漠》，巴黎：Tournachon-Molin，1817—1823。

- 革命的鼓动者；
- 以自己的风格在语言上留下印记的作家——我知道自己想到的是谁——；以及那种更新存在的思想，我们已经有了它的先驱。

你们可以感觉到，我急于摆脱这么多谨慎铺垫；这些铺垫只是为了把精神分析家带回他们最无可争议的确信。

然而，我仍必须再走一遍这些铺垫，哪怕代价是显得有些沉重。

说我们在精神分析中对其进行操作的主体只能是科学的主体，这听起来可能是一个悖论。

相关知识卡 拉康《科学与真理》

然而，界线恰恰必须划在这里；否则一切都会混在一起，一种不诚实便由此开始。在其他地方，人们把它称作“客观”；可它其实是缺少勇气，也是没有辨认出那个出了岔子的对象。

我们始终必须对自己作为主体的位置负责；随便人们在哪里把这叫作恐怖主义吧……

我有权微笑，因为在一个学说公开成为交易对象的环境里，我不会害怕说出自己的想法而冒犯任何人：在所有错误中，出于善意的错误最不可宽恕。

精神分析家的位置不留任何逃路，因为它排除了“美丽心灵”的温情。这样说又是一个悖论——也许仍是同一个悖论。

无论如何，我提出：任何进一步把主体化身出来的尝试——甚至是当前理论不断重犯旧罪的诱惑——都是迷途；它总会大量生出错误，并因而是有过错的。例如，把主体化身于“人”；而在那里，人又被还原为孩子：

- 因为这个人会在那里成为原始人，从而歪曲初级过程的一切；
- 同样，孩子会在那里扮演欠发达者，从而遮蔽童年之中真正具有原初性质的事情的真理。

总之，如果人们没有在理论上牢牢坚持我们刚才表述的原则——在那里只有一个主体被作为主体接纳，也就是能够使精神分析成为科学的那个主体——，那么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注6]揭露为古老主义幻觉的东西，在精神分析中便不可避免。

> [注6]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巴黎—海牙：Mouton，1947；Walter De Gruyter，2002。

这已经足以说明：我们认为，精神分析在这里不享有任何特权。

不存在所谓“人的科学”；这句话应当用“小钱也要省”那句话的同一种口吻来听。

不存在“人的科学”，因为科学的“人”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有科学的主体。

大家知道，我一向厌恶“人文科学”这个名称；在我看来，它恰恰就是奴役的召唤。

而且，这个术语本来就是错的。且把心理学放在一边……

心理学已经发现了让自己存活下去的办法：向技术官僚体系提供种种服务；甚至——康吉莱姆教授[注7]一篇轰动性文章以真正斯威夫特式的幽默这样收尾，我不知道他今天是否在场——沿着滑梯从先贤祠一路滑到警察总署。心理学也正是在科学创造者的选拔、招募、研究和维持这一层面上，会撞上自身用途的暗礁。

> [注7] 乔治·康吉莱姆：《什么是心理学？》，1956 年 12 月 18 日讲演，载《分析手册》，1966 年第 1—2 期。

……至于这一类别中的其他一切科学，我们很容易看出，它们并没有构成一门人类学。

考察一下列维-布留尔或皮亚杰便可知道：他们所谓“前逻辑心态”、所谓“自我中心式思维或话语”等概念，只以被假定的心态、被推测的思维和科学的主体的实际话语为参照——我们说的不是“科学家”。因此，人们太容易发现：

- 心智上的限度——这当然存在；
- 思想上的薄弱——这可以推测；
- 以及“科学家”那多少有点费劲的实际话语——这同“科学的主体”根本不是一回事——，都给他们那些无疑并非全无客观性的建构压上了重量。不过，这些建构之所以同科学相关，只因为它们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巫师的东西，对巫术也所言甚少；如果说它们告诉了

> 我们什么，那也只是关于二者留下的痕迹。而且，这些痕迹究竟属于巫师还是巫术仍无从断定，因为留下痕迹的不是列维-布留尔。

另一个案例——皮亚杰——的结算更为严厉：他没有告诉我们任何关于孩子的东西，对孩子的发展也所言甚少，因为其中缺失了本质。至于他的孩子在回答构成测试系列的陈述时展示的逻辑，除了为测试目的而主持这些陈述之形成的逻辑，也就是科学家的逻辑以外，并没有别的东西；我不否认，逻辑学家在这里仍有其价值。

在另一些真正有效的科学中——即使它们的名称仍需重审——，我们看到，禁止自己落入“古老主义幻觉”并不妨碍它们富有成果；我们可以把这项幻觉概括为把主体心理学化。

博弈论——更恰当地说，应当叫“策略论”——就是一个例子：它利用了一个主体完全可以计算的性质；这个主体被严格还原为一项能指组合矩阵的公式。

语言学的情况更为微妙，因为它必须把陈述与言说行为之间的差异纳入自身；这一次，这项差异确实是作为言说者的主体本身产生的作用，而不是科学的主体。因此，语言学会把中心放在另一种东西上，也就是能指的整套配置；它必须保证能指相对于种种意指效应占据优先地位。

种种二律背反也正是在这一侧出现，其程度随构成这个对象时采取的立场有多极端而变化。可以说，人们对语言效应的阐明走得极远，以至能够构造一种诗学；它既不欠诗人精神的参照什么，也不欠诗人的化身什么。语言学理论相对于科学主体的不同折射指标，则显现在逻辑一侧。

词汇、句法语素和句子句法各自的折射指标并不相同；雅各布森、叶尔姆斯列夫和乔姆斯基之间的理论差异由此而来。逻辑在这里发挥着主体脐点的作用；而这项逻辑根本不是纯粹的“逻辑”，它连着某种语法的偶然性。语法形式化若要成功建立，实际上就必须绕开这项逻辑；然而，这一绕行动作又铭写在形式化的建立之中。

我们稍后会指出现代逻辑处在什么位置——这是第三个例子。正如去年所见，它无可争议地是一项尝试的严格规定的后果：这项尝试要缝合科学的主体。哥德尔最后一项定理表明，它在这里失败了。这意味着，有关主体仍是科学的相关项，却是一个二律背反式的相关项；因为科学显然是由缝合这一主体的努力没有出路这一事实来界定的。

请在这里把握结构主义那道不容错过的标记。它在自己征服的每一门“人文科学”中，引入一种非常特殊的主体形态；除了拓扑学指标，我们找不到这一主体的其他指标。姑且把莫比乌斯带那个生成性记号——我们称作内八字的记号——放在这里。可以说，主体处在其对象的内部排除之中。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著作对这种结构主义表现出的效忠，此刻只有停留在外围，才能被记入我们的论题。不过，有一点很清楚：作者越能援引化学中已经显露的某种重新取得，就越能凸显原始人在世界中引入的自然分类所具有的范围……

尤其是在动植物知识方面；他强调，这种知识超过了我们。这里所谓重新取得，是一种关于味觉和嗅觉性质的物理学，也就是把知觉价值同某种分子构造联系起来；我们通过组合分析、换言之通过能指的数学抵达了这种分子构造——迄今为止，每一门科学都是如此。

因此，知识在这里确实沿着正确的界线同主体分离；这条界线没有对主体“发展”不足作任何假设——况且，人们也很难证明这种不足。

还不止如此！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

在从《亲属关系的基本结构》中提取出潜在的组合系统以后，他告诉我们：某位“信息提供者”——借用民族学家的术语——完全能够亲自画出列维-斯特劳斯式图表。他这样说，岂不也正是从中提取出有关组合系统的主体？这个主体在图表上除了以 ego［自我］这一标记得到指称以外，没有别的存在。

列维-斯特劳斯展示了构成神话素的装置何等有力：它可以分析生成神话的变换；在这个阶段，这些变换似乎建立于一种由其可逆性加以简化的共时性之中。不过，他并不声称把“神话者”的本性交给我们。他在这里只知道：即使自己的信息提供者有能力写出《生食与熟食》——姑且撇开在书上留下印记的天才——，要写出它，他也不能不把下列东西一并留在衣帽间，也就是人类博物馆：

- 一定数量的操作性器具，换言之，仪式器具；它们确认了他作为神话者的主体存在；

- 与这项寄存同时被排除到结构场域之外的，还有在另一种语法中会被称作他的“同意”的东西，也就是纽曼枢机的《同意的语法》[注8]。这部著作并非毫无力量，尽管它是为了可憎目的而锻造的；以后我也许还要再提到它。

[注8] 约翰·亨利·纽曼：《同意的语法》，巴黎：Desclée de Brouwer，1986。

因此，神话生成的对象既不连着任何发展，也不连着负有责任的主体的停滞。它所相关的不是这个主体，而是科学的主体；信息提供者越接近把自身的在场还原为科学主体的在场，对它所作的记录就会越正确。

我只认为，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会对在收集材料时引入一种受精神分析启发的提问方式有所保留，例如持续收集梦，以及这会维系的全部转移关系。

为什么？如果我向他断言：我们的实践远没有改变科学的主体——他只能、也只愿认识这个主体——；在原则上，它所作的任何介入，无不趋向让主体以令人满意的方式实现自身，而且恰恰就在他感兴趣的场域中。那又如何？

这是否意味着，一个未被饱和、却可以计算的主体，会依照古典认识论的形式，成为那个归摄性的对象，统摄人们所谓“推测科学”的科学总体——我自己曾用这个名称来反对“人文科学”一词？

我越发不认为这种说法恰当，因为这一主体本身就属于构成整个科学的情势。

从推测可以接受精确计算——例如概率计算——、而精确性又只能奠基于一种把公理同符号组合律分开的形式主义那一刻起，“精确科学”与“推测科学”之间的对立便再也站不住脚。

然而，归根到底，问题在于说明一项形式主义的准备为何会出现；它并不是奇迹般突然冒出的，而是随着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危机不断更新

——自从在我看来，人们在那里沿着某条正路前行以来。仅仅满足于观察形式主义或多或少取得成功，当然是不够的。

让我们重申：自从科学诞生以来，科学对象的地位中就有某种东西，在我们看来始终没有得到阐明。

还要提醒你们：诚然，现在提出精神分析的对象问题，就是重新接过我们来到这座讲坛时引入的问题——精神分析究竟处在科学之内还是科学之外。但我们同样指出，如果科学本身之中的对象问题不随之发生改变，这个问题无疑就不可能得到解决。

相关知识卡 精神分析的对象：对象 (a) 与主体分裂

精神分析的对象——我先亮出底牌，你们也已经看见它随之而来——无非就是我已经推进过的、对象(a) 在精神分析中发挥的功能。那么，关于对象(a) 的知识，会不会就是精神分析的科学？

相关知识卡 精神分析的对象：对象 (a) 与主体分裂

恰恰必须避开这一公式，因为这个对象(a) 应当被置入主体的分裂之中；正是通过这项分裂，精神分析场域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得到结构化——今天我们正是从这里重新出发。

相关知识卡 精神分析的对象：对象 (a) 与主体分裂

也正因此，首先必须凸显……

一项应当同“精神分析是不是科学、它的场域是否科学”这一问题区分开的事实：确切地说，精神分析的实践所牵涉的主体，只有科学的主体。

你们可以容许我用“精神分析中主体的敞开”这一意象来引出某种东西，但必须把它还原到这个程度，才能把握主体在那里从真理中接受了什么。你们可以感觉到，这项进路包含一条曲折道路——你们看见我不得不沿它前行——，而这条道路带有驯服的性质。

这个对象(a) 并不安分；或者更应当说，它会不会令你们不得安宁？至少，那些同它打交道最多的人——精神分析家——不会安宁；那么，我的言说会试图特别把他们固定下来。

确实如此！我今天同你们约定相会的点，就是去年把你们留在那里的点：主体在真理与知识之间的分裂。对精神分析家来说，这是一个熟悉的点；弗洛伊德[注9]用下面这项召唤把他们邀请到这里：

> [注9]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新论》（1932）第 31 讲，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84。德文原文见 Neue Folge der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 die Psychoanalyse：“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 Es ist Kulturarbeit etwa wie die Trockenlegung der Zuydersee.”（“凡它曾在之处，我应当到那里去。这是一项文化工作，正如围垦须德海。”）

> “Wo es war, soll Ich werden.”我要再次重译它，并在这里进一步加重它的重音：
>
> “它曾在之处，我应在那里作为主体到来。”

不过，我要从反面把握这一点，向他们显示它的陌生性；在这里，这倒是要把他们带回它的正面：

那个始终从某种幽暗存在中等待着我的东西，

怎么会凭借一道笔画总体化自身，而这道笔画只有把它同我能够知道的东西分得更加清楚，才能画出？

双重铭写的问题不只在理论中提出。它曾使我的学生拉普朗什和勒克莱尔[注10]陷入困惑；他们本来可以从自己接近这个问题时发生的分裂中读出问题的答案。

> [注10] 让·拉普朗什、塞尔日·勒克莱尔：《无意识：一项精神分析研究》，1960 年博纳瓦尔第六届研讨会，载《无意识》，巴黎：Desclée de Brouwer，1966。

无论如何，这项答案不属于格式塔类型，也不应到那只在树中显出拿破仑头像的盘子[注11]上寻找。

> [注11] 大革命时期栽种的“自由树”，在法兰西第一帝国时期被称作“拿破仑树”。

答案很简单：由真理的印版印下的铭写，与由知识的印版印下的铭写，并不是咬住羊皮纸的同一面。

这些铭写彼此混合的问题，只须在拓扑学中解决：有一种曲面就在手边，其正面与反面处处都能彼此接合。然而，这项拓扑学对分析的把握远不止提供一幅直观图式；可以说，它把分析围拢在分析自身的存在中。

因此，如果人们把分析挪到别处，它就只能成为一堆拼图碎片，而且无论如何必须被带回这一基础。正因此，重申下面这件事并非徒劳：当我们经受写下“我思故我在”这一句话的考验时，应当这样阅读它——思想只有系结在言说中才奠定存在，而言说中的每一项操作都会触及语言的本质。

如果海德格尔[注12]曾在某处为了自己的目的向我们提供“cogito sum［我思，我在］”，就必须注意到，他把这个句子代数化了。我们因而有权凸显它的余项：“cogito ergo［我思，因此］”。这里显出：任何东西要得到言说，都必须支撑于原因。

[注12] 马丁·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一部，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64（Bœhms、Waelhens 译）；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86（Vezin、Lauxerois、Roëls 译）；另见埃马纽埃尔·马蒂诺的法译本，非卖品。

而弗洛伊德公式中的 Soll Ich、也就是“我应当”，所遮盖的正是这个原因；它把公式的意义倒转过来，由此迸发出一个悖论：有一道命令催促我承担自己的因果性。

然而，我不是我自己的原因；这并不是因为我是受造物——造物主也同样如此。关于这一点，我请你们参看奥古斯丁[注13]及其《论三位一体》序言。斯宾诺莎的“自身之因”可以借用上帝之名，但它是另一物。我们暂且停在这两个字上，只让它们标出：它同样是不同于大全的“物”；而这个上帝如此成为他者，也并不因此就是泛神论的上帝。

[注13] 圣奥古斯丁：《论三位一体》，巴黎：Vrin，2000。

笛卡尔在若干拉丁文本中凸显这个 ego，甚至使它的功能显得多余——这是一项释义学课题，我留给在场能够以专家身份研究它的人。我们必须在这个 ego 中找到一个点：它在那里仍然是自己声称的那个存在，也就是依赖宗教之上帝的存在。Ergo［因此］在这里发生了奇特的跌落：ego 同这个上帝休戚相关。

奇怪的是，笛卡尔沿着保护 ego 免受欺骗者上帝侵害的道路前行；结果获胜的却是他的伙伴，因为他把上帝保护到这样一种程度：把上帝

推向一项过分的特权——上帝唯有成为永恒真理的创造者，才能担保这些真理。

这里被掩盖的 ego 与上帝之间命运的共同体，正是笛卡尔同时代人安格鲁斯·西莱修斯在神秘主义呼祷中撕心裂肺地说出的共同体；它还迫使他的呼祷采取双行诗的形式。

在追随我的人当中，谁若能记起我曾怎样以《基路伯行者》[注14]中的这些短祷为支点，会很有益处。当年，我正沿着弗洛伊德《论自恋：一篇导论》[注15]的道路、依照它的方式推进；那也是我评论施雷伯庭长[注16]的一年，而我就在那条道路上重新拾起这些短祷。因为人可以在这个接合处跛行——那是美的步态——，但必须跛得准确。

> [注14] 安格鲁斯·西莱修斯：Cherubinischer Wandersmann，法译名《基路伯行者》，Michalon，2007。

> [注15]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Zur Einführung des Narzißmus（1914），《论自恋：一篇导论》，载《全集》第十二卷，法国大学出版社，2005。

> [注16] 雅克·拉康：《研讨班》第三卷《精神病》（1955—1956），巴黎：瑟伊出版社，1981。

首先必须告诉自己：两边在这里并不能嵌合起来。

所以，请容许我暂时离开这一点，重新从自己曾有过的一次大胆举动出发。我只会通过回忆来重复它，否则便会把它重复两次；在恰当意义上，它也许可以叫作 bis repetita［再次重复之物］——这个说法并不表示简单的重复。

这里涉及《弗洛伊德之物》[注17]。这篇讲话的文本是一篇第二次讲话的文本，因为它第一次被宣读，正是在我重复它的那一次——愿这番坚持以其平凡性，使你们感到重复造成的时间逆步。

> [注17] 雅克·拉康：《文集》，巴黎：瑟伊出版社，1966，第 401 页；或 Points 丛书第 5 册、第一卷，第 398 页。

它第一次被宣读，是在维也纳；我的传记作者会在那里标出，我第一次遇见了不得不称作“精神分析世界最卑下的底层”的东西，尤其遇见一个人物：他的文化与责任水准，只够得上人们对一个保镖的要求。不过，这对我无关紧要；我的话向空中说去，因为我希望在弗洛伊德诞辰百年之际，让自己的声音作为致敬被人听见。

这并不是为了把那里标成一个被遗弃的位置，而是为了指出我的话语现在围住的另一个位置：弗洛伊德开辟的道路，除了我重新接过的那项意义以外，没有别的意义——无意识是语言。如今已经成为共识的东西，当时对我来说已经成立；大家知道这一点。

于是，我也许带着几分游戏意味，回应圣茹斯特[注18]的挑战。他把自己不过是“终将归于尘土的东西”而“这尘土正在对你们说话”的告白高举向天，并把它镶嵌在议会公众之中。我由此得到一个灵感：我看到一幅寓言形象在弗洛伊德的道路上奇异地活跃起来；“从井中走出的女人”[注19]身披裸体，而这裸体正因一层新皮肤颤动。我便要把声音借给她。

> [注18] 圣茹斯特于热月九日在议会前说：“我蔑视构成我、并正在对你们说话的尘土。人们可以迫害它，让这尘土死去！但我挑战任何人来夺走我在时代与诸天之中赋予自己的独立生命。”

> [注19] 参见爱德华·德巴-蓬桑 1898 年画作《真理从井中走出》，昂布瓦斯博物馆藏。



这是一段拟人言说[注20]；我不在这里念给你们听。它在下面几个字中抵达顶点："我，真理，我说话……"[注21]随后，拟人言说继续展开。

> [注20] 拟人言说（prosopopée）是一种修辞格：演说者或作者让无生命之物、动物、不在场者或死者说话并行动。

> [注21] 雅克·拉康：《弗洛伊德之物》，载《文集》，第 401 页；或第一卷，第 398 页。

请想一想那件不可命名之物：它能够说出这些话，从而直抵语言的存在；要把这些话听成它们应有的发音方式，就必须在恐怖中听。

可是，每个人只能把自己所能放入的东西放进这项揭示。不妨把文本结尾处那种受到压低、却并不因此少一分可笑的戏剧性节奏算作它的功绩。你们可以在《精神病学演进》1956 年该年度第一期中找到这篇题为《弗洛伊德之物》的文本〔《精神病学演进》，1956 年 1—3 月，第 225—252 页〕。

当我重复宣读这篇讲话——现有文本再现的正是这次宣读——时，听众的反应颇为冷淡；我不认为这应当归因于他们体验到的那种恐怖。即使听众愿意体会这篇讲话在他们看来所具有的奉献价值，他们在这一点上的耳聋仍显得颇为特别。

倒不是"物"——标题中的"物"——震惊了这群听众；至少，它没有像震惊我当时某些一同掌舵的伙伴那样震惊他们……

我说的是同在一艘木筏上掌舵的伙伴。十年间，我通过他们耐心地同雅斯贝尔斯式"理解"以及残缺不全的人格主义姘居，为遇难同伴换取自恋口粮；我费尽力气，才让我们所有人免遭"心灵对心灵"的自由主义柏油涂抹。有人一字不差地对我说："'物'这个词不好听！"

难道不是这场关于“心理学统一性”最精致端点的冒险，干脆把这件事给我们糟蹋了吗〔原文如此〕？当然，那里绝没有人想到把什么东西物化。呸！还能信谁？同志，难道我们不以为自己处在“进步的先锋”吗？

人看不见自己的本来面目；戴着哲学面具去接近自己时，就更看不见了。不过，先放下这些……为了在真正重要的地方——我当时的听众那里——衡量这场误解，我要取用一项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浮现的说法。它预设的热情甚至可能令人感动。有人传话说——这个说法至今仍在流传——：“他为什么不说关于真的真话？”

这证明，我的寓言及其中的拟人言说全都何等徒劳。

借出我的声音来承载“我，真理，我说话……”这几个无法忍受的字，已经越过一般寓言。它很简单地说出了关于真理所能说的一切——关于唯一真理所能说的一切；也就是我长期反复说的东西：不存在元语言。这项断言足以给全部逻辑实证主义定位：没有任何语言能够说出关于真的真话，因为真理以自己说话这一事实为根基，而且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也正因此，说出“关于真的真话”的无意识，具有像语言一样的结构；也正因此，当我这样教导时，我说出了关于弗洛伊德的真话——弗洛伊德懂得让真理以无意识之名说话。

这种“关于真的真话”的欠缺，使元语言因其假象与逻辑而构成的一切跌落成为必要；这里恰恰就是 Urverdrängung、即原初压抑的位置，它把其他一切压抑吸引到自身。至于其他修辞效应……要辨认它们，我们手中只有科学的主体。

正因此，为了处理这些效应，我们会采用其他手段。

但至关重要的是，这些手段不能把这一主体扩大。它们所带来的益处，无疑触及对主体隐藏之物。

可是，没有别的“关于真的真话”可以遮盖这个活生生的点；只有专名——弗洛伊德的名字，或我的名字——，要不就是那些贝尔坎式保姆故事。人们用这些故事把一份从此不可抹去的见证贬得低微：那就是一项真理。所有人的命运，都是拒绝其中的恐怖；当恐怖无法拒绝时——也就是当人成为精神分析家时——，不如说是把它碾碎在那块磨盘下面。我曾借用磨盘的隐喻，为的是借另一张嘴提醒人们：需要时，石头也知道怎样呼喊[注22]。

> [注22] 参见《路加福音》19:37—40：“他们若沉默，石头就要呼喊。”

也许，人们会由此认为我有理由没有被那个关于我的问题打动：“他为什么不说……？”问话者的工作，是替一家真理机构坐办公室，因此他的天真颇为可疑。于是，我放弃了他在我的机构中履行的职务；这家机构不需要唱诗班歌手在里面梦想圣器室……当我们必须处理认识驱力时，难道应当说，我们必须认识科学知识以外的其他知识？

我们还要再次回到真正的问题：是否必须承认，我们在精神分析中得放弃“每一项真理都有一项知识同它对应”这一点？这里正是我们依赖科学降临的断裂点。要把真理与知识接合起来，我们手中只剩科学的主体。

而且，这一主体仍然准许我们这样做。我要更深入地说明它如何准许，同时让我的“物”自行同“本体”解释清楚；在我看来，这件事很快就

能结束：因为一项说话的真理，同一个从“纯粹理性”有记忆以来一直闭口不言的本体，没有多少共同之处。

这个提醒并非无关紧要，因为我们在这一点上要使用的媒介——你们刚才已经看见我把它带进来——就是原因：它不是逻辑的范畴性原因，而是通过言说造成全部效应的原因。

作为原因的真理——精神分析家们，你们会拒绝承担这个问题吗？你们的事业正是从这里升起。

如果说有一类实践者假定真理本身会行动，那难道不是你们吗？不要怀疑这一点！

无论如何，正因为这一点在科学中受到遮蔽，你们才会在那种发挥希望作用的东西中保有一个受到惊人保护的位置；这种希望处在一份游荡的意识里，而思想革命又以集体形式伴随它。列宁曾写道：

> “马克思的理论之所以无所不能，是因为它是真实的。”[注23]他的这句话把自己打开的巨大问题留空：姑且假定唯物主义的真理在它其实合而为一的两副面孔——辩证法与历史——之下保持沉默，那么，为什么把它变成理论，会增强它的力量？

[注23] 列宁：《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马克思的学说无所不能，因为它正确。它完备而严密，给予人们一种完整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同一切迷信、一切反动势力以及一切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都不相容。它是人类在十九世纪创造的最优秀成果——德国哲学、英国政治经济学与法国社会主义——的正当继承者。下面，我们将简要论述马克思主义的这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

以“无产阶级意识”和“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行动”来回答，在我们看来并不足够。

不过，一种权力分立至少已经在这里显露：一边是作为原因的真理，另一边是投入运用的知识。

一门受《资本论》启发的经济科学，并不必然引导人们把它当作革命力量来使用；历史似乎还要求预谓式辩证法以外的其他助力。

除了今天不展开的这个特殊点以外，仔细观察便会发现：科学没有记忆。科学一旦建立，就会忘记自己诞生时经历的种种变故；换言之，它遗忘了真理的一个维度，而精神分析恰恰在这里高度运用这个维度。

我必须说得更准确些。大家知道，物理理论或数学理论每次经历危机以后，都会以所谓“广义理论”的形式或名称解决危机；这个名称绝不应被理解为单纯转向一般。大家知道，这种理论往往会把先前结构中被它推广的东西保留在原有层级上。

所以，我们所说、所瞄准的并不是这件事，而是戏剧——每一场危机都以一出主体性戏剧为代价。

这出戏剧属于科学家；它有自己的牺牲者，而没有任何东西表明，他们的命运铭写在俄狄浦斯神话中。

无论如何，这个问题很少得到研究。

尤利乌斯·罗伯特·冯·迈尔[注24]、康托尔……这些戏剧有时直至疯狂，我不会为它们列一份排行榜；若真列下去，很快还会有在世者的名字写入其中。我认为，精神分析中正在发生的戏剧具有典范意义。

> [注24] 尤利乌斯·罗伯特·冯·迈尔，德国物理学家，1845 年表述了热力学第一定律。

我要提出：这出戏剧若不把俄狄浦斯本身置于问题之中，就不可能把自身包括在俄狄浦斯之内。

你们看见这里勾勒出的纲领；它还远没有得到完成，甚至在我看来，更像是被堵住了。

我会谨慎地投入其中。今天，我请你们先在这种进路反射出的光亮中辨认自己。

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这些光投向精神分析场域以外、同样诉诸真理的其他场域：巫术与宗教。它们是这一秩序中区别于科学的两种位置；区别之大，使人们能够相对于科学给它们定位：

- 巫术被当作虚假的科学或较低级的科学；
- 宗教则被当作越过科学的界限，甚至在真理上同科学冲突。

必须说，对科学的主体来说，二者都只是影子；但对我们所面对的受苦主体来说，并非如此。

啊！人们会在这里说：“他终于说到这里了！这个受苦主体不正是我们从中取得特权的主体吗？你们那些理智化又给了你们什么权利处置他？”

为了回应我在这里遇到的东西，我会从一位不久前荣获学院全部荣誉的哲学家[注25]说起。他写道：“痛苦的真理，就是痛苦本身。”

> [注25] 米歇尔·亨利：《显现的本质》，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63。

今天，我把这项说法留在它所探索的领域中……

以后我会回来说明：现象学怎样成为反真理的托词，并说明反真理的地位。此刻，我只借用这句话向你们精神分析家提出一个问题：你们所做的事情，究竟有没有这样一种意义——断言神经症痛苦的真理，就是以真理为原因？是，还是不是？

现在，我要谈巫术。我从一种观点出发：它没有给我的科学立场留下任何含糊，却满足于一项结构主义定义。

这项定义假定：能指本身对能指作出回应。自然中的能指受到咒语能指的召唤，并以隐喻方式被调动。物作为会说话的东西，对我们的厉声请求作出回应。正因此，我刚才从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的研究中援引的自然分类秩序，在其结构定义中让我们瞥见一座对应之桥；借助这座桥，有效操作能够以它当初得到构想的同一种方式被设想。

然而，这仍是一项忽略主体的还原。人人都知道，让主体——让行使萨满术的主体——进入特定状态，在巫术中至关重要。

请注意，活生生、有血有肉的萨满本身就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同操作相关的主体，必须在这项身体支撑中同自己重合。科学的主体所排除的，正是这种重合方式。科学的主体只能精确辨认操作中与它相关的结构项。

自然中有待调动的东西——雷霆与雨水、天象与奇迹——确实都以能指的形态出现。

这里的一切都必须依照构成语言结构的二律背反关系加以排列。因此，我们必须追问索求在这里产生的效应，检验我们自己的图式为索求与欲望界定的关系，能否在其中重新找到。

精神分析家只有沿着这条道路继续描述，并采取一种不粗暴诉诸类比的进路，才有资格声称自己能够就巫术发表意见。“巫术总是性巫术”这项观察在这里自有价值，却不足以授予他这种资格。我要以两点作结，请你们仔细听：

- 巫术是作为原因的真理采取动力因面貌时的形态。
- 知识在巫术中的特征，不仅是对科学的主体保持遮蔽；它还在操作传统和实际行动中把自己作为知识隐藏起来。这是巫术的一项条件。

关于我现在要谈的宗教，这里仍只是同样简略地指出同一种结构进路。这幅素描会以结构特征之间的对立为基础。

我们能否期待宗教在科学之中取得一种稍微更坦率的地位？

因为近来有些古怪哲学家，用最软弱的方式界定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从根本上说，他们认为二者在同一个世界中展开，而宗教因而在那里占据包容一切的位置。

在这个微妙问题上，有些人会提醒我们保持分析的中立性；而我们要让下面这条原则占据优先地位：同所有人做朋友，并不足以保护人必须从中进行操作的位置。

在宗教中，主体——这里指宗教主体——对前面那项博弈，即作为原因的真理所作的运用，被纳入一项完全不同的操作。从科学的主体出发进行分析，必然会使我们熟悉的强迫性神经症机制显现出来。弗洛伊德以一道闪光看见了这些机制，这道闪光赋予它们超出一切传统批评的范围。声称以这些机制衡量宗教，并无不妥。

如果人们不能从下面这样的观察出发：

启示所发挥的功能，可以译作对作为原因的真理的一项否定，也就是：它否认那项使主体能够认为自己参与其中的根基——那么，人们就几乎不可能给所谓“宗教史”规定任何界限，换言之，赋予它任何严谨性。

不妨这样说：宗教者把原因的责任留给上帝，却也由此切断了自己通往真理的道路。因此，他被带向把自身欲望的原因交给上帝；这恰恰就是祭献的对象。他的索求服从于一位被假定有欲望、因而必须加以取悦的上帝；爱的游戏由此进入。

宗教者由此把真理安置在一种罪责地位上；结果便是对知识的怀疑。在那些于理性问题上表现得越占优势的教父那里，这项怀疑越是明显。

真理在那里被推向所谓“末世论”目的；也就是说，它只作为目的因出现，因为它被关联到世界末日的一场审判。科学对目的性的一切使用都会由此沾上一股蒙昧主义气味。

我顺便指出过：关于主体同作为原因的真理之间的关系具有怎样的结构，我们可以从教父文献，乃至早期大公会议的裁决中学到许多东西。组织神学思想的理性主义，绝不是庸俗想象中的幻想之事。如果这里存在幻想，那也取这个词最严格的意义：建立一个遮盖真理的实在。

基督教真理不得不经过一个无法维持的表述——上帝是三，也是“一”——，这件事在我们看来完全可以接受科学处理。

教会权力很能适应某种令思想气馁的状态。不过，在强调这类奥秘的绝路以前，健康的做法是让思想面对并衡量把奥秘表述出来的必要性。问题必须在教义绊倒于异端的层面上提出；在我看来，和子句问题[注26]可以用拓扑学术语处理。

> [注26] 589 年，第三次托莱多大公会议在《尼西亚信经》中加入 filioque［和子］条款：“Credo in Spiritum Sanctum qui ex patre filioque procedit”（“我信圣灵，由父及子而出”），表达圣灵由父和子而出的教义。

结构性的把握在这里必须居于首位；也只有它才能让人准确评价种种意象的功能。

奥古斯丁的《论三位一体》在这里具备一部理论著作的一切特征；我们可以把它当作模型。

否则，我会建议自己的学生去经受一番——让我们消遣一下——同一幅十六世纪壁毯的相遇：他们一进入法国国家家具馆[注27]，它就会强行进入他们的凝视；它还会在那里展开一两个月，等着他们。

> [注27] 《创世》，展览“欧洲的十六世纪”中的壁毯；巴黎法国国家家具馆，展期为 1965 年 10 月至 1966 年 1 月。展览图录由法国国家博物馆联合会于 1965 年在巴黎出版。

画面中的三个位格具有绝对同一的形态，在清新的“创世”岸边彼此交谈，显得无比自如——这种景象实在令人焦虑。



当这样一台精密机器面对正值罪之盛放时刻的亚当与夏娃夫妇时，它所蕴藏的东西，很适合拿来给一种人际关系想象当练习；这种想象在实践中从未超出二元关系。

不过，我的听众应当先用奥古斯丁武装自己……



这样看来，我仿佛只界定了犹太传统宗教的种种特征。这些特征无疑足以向我们证明它们的意义；而我至今仍为不得不放弃把父之名的功能[注28]连到《圣经》研究而感到遗憾。

> [注28] 拉康：《父之名》，1963 年 11 月 20 日，巴黎：瑟伊出版社，2005。这是该期中断的研讨班唯一一次课程。

不过，关键仍在于界定主体同真理之间的关系。

我想可以这样说：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把佛教理解为一种普遍化主体的宗教，也就是认为它包含对作为原因的真理所作的、可以无限变

化的分隔化。正是在这个限度内，他讨好了那项乌托邦：希望看到佛教同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统治协调一致。也许，这过于轻视科学主体的要求，也过于信任一种“物质超越论”学说会在理论中出现。

至于科学，我今天还不能说出在我看来它同作为原因的真理之间具有怎样的关系结构，因为我们今年的推进应当为此作出贡献。

我会从一项奇怪观察接近它：我们的科学具有惊人的丰产性；我们必须追问，这项丰产性同科学赖以维持自身的那项面貌有何关系——对于作为原因的真理，科学什么也不愿知道。

你们可以认出 Verwerfung［拒斥］的公式。在这里，它会加入一个封闭系列：同 Verdrängung［压抑］和 Verneinung［否定］并列；我想，你们刚才已经分别在巫术和宗教中认出了后两者的功能。

诚然，我们曾经谈过 Verwerfung 同精神病的关系，尤其谈过对父之名的 Verwerfung；这表面上同这项结构定位的尝试相冲突。

然而：

- 如果人们看到：假如精神分析受命代表这一功能，那么一场成功的偏执狂同样会显得是科学的闭合；
- 另一方面，如果人们承认，精神分析在本质上正是把父之名引入、重新引入科学考察的东西……那么表面上仍没有任何进展，因为我们似乎重新遇见了同一条绝路；但人们会感觉到，我们正从这条绝路本身取得进展，并且可以看见，仿佛在这里形成阻碍的交叉结构会在某处解开。

也许，精神分析诞生的戏剧当前抵达的点，以及其中那项通过玩弄有意识的诡计来隐藏自身的诡计，都应当在这里得到考虑；因为并不是我引入了“成功的偏执狂”[注29]这一形式。

> [注29] 参见弗洛伊德 1910 年 10 月致费伦齐的信：“我在偏执狂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载《精神分析的滋味》所引材料。

诚然，我还必须指出：科学中作为原因的真理所产生的作用，应当以形式因的面貌来辨认；但指出这一点，是为了阐明精神分析反而凸显它的质料因面貌。

相关知识卡 拉康《科学与真理》

这恰恰是精神分析在科学中的独创性。这项质料因，严格说来就是我在那里界定的能指所采取的作用形式。精神分析把能指界定为：它首先作为同自身意指相分离的东西行动。

相关知识卡 拉康《科学与真理》

当交媾构形越出主体生物成熟的边界而出现并留下印记时，它画出的是一种形态、一种字面特征；但它不可能成为实际表明性伙伴在场的符号，也就是说，不可能成为后者的生物符号。请记起我们区分能指与符号的公式[注30]。

> [注30] 参见拉康《文集》，第 875 页。

这也足以顺便说明：在精神分析中，历史是不同于发展的一项维度；试图把历史还原为发展是一种错乱。历史只在同发展错拍时才继续展开。如果作为科学的历史想要摆脱那种天意式历史进程观始终存在的控制，也许可以从这一点中获益。

总之，我们在这里重新找到去年表述的能指主体：它在同另一个能指的关系中由能指运载；必须把它同生物个体和一切可以作为理解主体而归摄的心理演化严格区分。

用最简洁的话说，这就是我在理论中赋予语言的功能。

在我看来，它可以同在这里留下一个空位的历史唯物主义相比较。

也许，对象(a) 理论同样会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们将会看到：就知识与真理的主体而言，要正确整合原因的功能，这项对象(a) 理论不可或缺。

你们刚才或许已经在这里列举的真理折射的四种方式中，认出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中同样的数目，以及一种名称标定上的类比。这不是偶然，因为亚里士多德物理学带有一种逻辑主义印记；这种逻辑主义仍保留着原初语法主义的滋味与智慧。

“Τοσαῦτα γὰρ τὸν ἀριθμὸν τὸ διὰ τί περιείληφεν”[注31]——他这样问道。

> [注31] 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二卷第七章第一节：“Ὅτι δὲ ἔστιν αἴτια, καὶ ὅτι τοσαῦτα τὸν ἀριθμὸν ὅσα φαμέν, δῆλον· τοσαῦτα γὰρ τὸν ἀριθμὸν τὸ διὰ τί περιείληφεν·”——“原因确实存在，而且原因的数目正如我们所确立的那样，这是显明的；因为对‘为什么’的探求，恰好涵盖这么多类问题。”

对我们来说，原因是否仍然必须恰好以同样数目发生聚合，才能有效？

这项探索不只是为了给你们一个优雅支点，让你们把握那些本身逃出你们管辖范围的场域——也就是巫术、宗教，乃至科学；它更是为了

提醒你们：作为精神分析科学的主体，你们必须抵抗每一种同作为原因的真理发生关系的方式对你们发出的诱引。

不过，这并不是你们最初会理解的意思。巫术对我们构成的诱惑，仅仅在于：你们可能把巫术的特征投射到自己面对的主体身上，把他心理学化，也就是误认他。

所谓“巫术思维”总被说成是别人的思维；但它并不是一枚可以让你们钉在他者身上的污名。

在最寻常的限度内，它在你们的邻人那里同在你们自己那里一样有效；最微小的命令传递，都以它为原则。总而言之，诉诸巫术思维什么也没有解释；有待解释的是它的效力。

至于宗教，它更应当给我们提供一个反面模型：不要照它那样建立一种社会等级制度，在其中保存同作为原因的真理之间某种关系的传统。每当同作为原因的真理的关系来到社会领域，天主教会的仿制品就会重现；某个国际精神分析协会以自己强加给交流的条件，把这种仿制变得格外荒诞。

事实上，我还需要说吗？在科学中，同巫术和宗教相反，知识会得到传达。

不过必须强调：这不只是因为传达已经成为惯例；赋予这项知识的逻辑形式本身，就把交流方式包括在内，而这项交流方式会缝合该知识所牵涉的主体。

这就是精神分析中的交流提出的首要问题：精神分析在科学价值上的第一道障碍，是同作为原因的真理在其质料面貌上的关系，在其工作圈子里始终受到忽视。

我是否应当在结尾回到今天的出发点——主体的分裂？这个点是一个结。

让我们回忆弗洛伊德在哪里打开这个结：在母亲欠缺阴茎之处，阳具的本性向主体显露。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主体在这里面对现实发生分裂：一方面，他看见一道深渊在那里裂开，并会用一种恐怖症筑垒抵御它；另一方面，他又以一片表面遮盖它，并在这片表面上竖起恋物，也就是维持阴茎的存在，尽管这个存在已经发生移置。

- 一边，他从“没有阴茎”中抽出“没有……”，把它放进括号，再将它转移到“没有知识”上；

后者正是神经症那“一步—犹疑”[注]。

> [注] 法语 pas 既是否定式中的“没有 / 不”，也可指“一步”；pas-hésitation 把“没有知识”中的否定词改造成神经症迟疑的一步。

- 另一边，让我们在主体竖起的这根日晷针中辨认他的效力：它时刻向主体标出真理之点，同时揭示阳具本身无非就是它在主体中所指出的那个欠缺之点。

这根指针也向我们指出今年要走的道路：也就是你们自己因为作为精神分析家被这项欠缺所唤起、却又从中退缩的地方。

第2课 · 1965年12月8日

上一次，你们从我这里听到了一堂不同于其他课程的课，因为它碰巧是全文写好的。它之所以全文写好，是为了尽快交付一种叫作“油印”的印刷，好让你们能够拿到它，作为理解我教学的参照。

有些人对此表示了几分遗憾，姑且说是失望。这件事值得停下来谈谈。为了加一点幽默，我会说，这种失望的表达方式大致围绕下面一点——我稍微夸张些：据说，人们更喜欢亲临一种“搏斗”，也就是——我几乎不敢说——观看我的思想“诞生”。

你们真以为，当我站在这里同某种根本不完全是它的东西扭打时，我的思想才诞生吗？

当然，我同所有人一样，是用自己的言说来说明自己。可这恰恰证明，我的思想是在别处形成的。

况且，你们也许已经听出，我自己的我思……

这并不表示它同笛卡尔的我思有任何矛盾……它倒更像是：“我思，故我不再存在。”

可是，正如你们清楚看到的，我并没有停止存在；这证明，我比别人更没有理由相信自己的思想。尽管如此，我们面对的确实就是它。这并不会使我同它特别指向的人——也就是精神分析家——之间的关系更加容易。

刚才那些观察特别来自他们那一边；我再说一遍，我提起它们时带着一丝幽默。这个事实也确实证明——事情一再得到确认——，正是在他们那一边，人们更偏爱这场展示中我所谓的表演节目一面。

这不会使关系更容易……

也必须从这个角度理解：我为什么认为，自己上次报告中有必要数次提到我同精神分析家关系的某一时期；例如，我为什么谈到自己称作

《弗洛伊德之物》的东西，以及其他类似要点。这并不是我听人说的那种对过去的徒劳回顾。

对分析家来说，这种说法很奇怪；因为严格说来，这段过去本来就是历史的一部分。上一次，我试图明确说明历史对我们来说是什么，以及我们为它带来的根本贡献：我们展示了断裂、创伤，以及某种在能指时间中得到特殊规定的东西。上一次，我尤其断言言说具有怎样的功能；如果我不尝试以某种方式，把自己的言说产生的效应——我所记录、观察到的效应，特别是它在所指向的人那里产生的后果——包括在自己的教学中，那就真正彻底误认了我赋予言说的功能。

正因此，今年我们围绕一个根本要点向前推进时，不可能不凸显出某种东西；它应当给出一把钥匙，说明我的教学是否、以及如何抵达它必须产生作用的地方。

我们可以称作这项教学的阶段、甚至直言其名叫作它的困难的东西，同我围绕主体所能说出并推进的东西之间，必定存在一种紧密关系；因为主体在真理与知识之间发生分裂。

不过，上一次我并没有把那篇讲话命名为“真理与知识之间的彬彬有礼的辩论”。我谈的是科学的主体，而不是知识。某种东西正潜藏在这里；我也曾说，其中有一处跛脚，换言之，两边不能以完全恰当、轻松的方式接合。

也正因此，那堂课、那篇报告的真正标题是“科学的主体”。但既然它必须拿去出售，一件可出售对象的法则，就是标签必须覆盖我所谓的商品；而其中显然一方面涉及科学，另一方面涉及真理……

条件是你们把这个“与”放进它应得的括号；也就是说，这个词的意义根本不是单义的，它同样可以包括我刚才谈到的不对称与奇数性……所以，这篇报告会以《科学（与）真理》为题；或者，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叫《科学，真理》。

这篇报告留下的空白，同它包含的内容一样重要。它列举了作为原因的真理的不同阶段与不同时刻；你们会看到，“动力因”与“目的因”这两个阶段已经出现，而我把“质料因与形式因”之间的关系博弈，谨慎地悬置在从此确实要称作“精神分析与科学之间的辩论”的东西中。今天，我们必须开始接近的正是这件事。

在接受我教学的人所进行的实践中，我可以从这项教学产生的效应里观察到某种倾向、某种斜坡。奇怪的是，它来自我试图赋予“主体”一词的那种异常严格的形式，结果却通向一种异常松弛；从外部并依照通常用法，人们大可以把这种松弛称作“主观主义”。

也就是说，每个人轮流依照某种我也说不清的“最新潮流”……

例如，稍微落后于潮流也可能成为一种时髦……会在自己采取的分析活动位置中，依次把下列各组概念当作参照：

- 存在与拥有；
- 欲望与索求——我并没有按照自己提出它们的先后顺序来说；
- 乃至最终的知识与真理。

这就是一种逃避形式……

可以说，我希望它只是神话式的、近似的，希望自己在这里标出并指出的只是一种倾向……但这确实是对我试图取得的东西最彻底的逃避形式之一。因为，我把主体功能表述为切割——

这项切割也许在最初的选择中留有某种未定性，但它一旦作出，便具有绝对的决定作用——如果问题不是要使分析家的位置以某种方式适应那个名为主体的根本切割，这一表述又会有什么意义？

唯独在这里，分析家的位置同这项切割彼此同一，因而是严格的。当然，这个位置无法维持！

第一个这样说的人不是我，而是对此毫不怀疑的弗洛伊德。也正因此，分析家为了占据自己的位置，反而不占据它。严格说来，这件事无从补救；但人们必须知道它，而知道也许就是绕过它的一种方式。

这里显出 Wirklichkeit［现实效力］与 Realität［现实性］之间的差异。前者是我同精神分析家关系的可能实现——只要他让我留在自己所在

的位置，让我在那里尝试收紧某类公式；后者则处在彼岸，它作为不可能者，决定了我们共同的失败。

正因此，并非每一次失败都必然是负面标志——精神分析思想最匍匐的层面曾这样教导，人们至今仍这样相信。失败恰恰可能是一道断裂的标志；同现实最紧密的关系铭刻在那里。

这就说明并证明了——我很快用两句话说完——为什么我必须把一半的星期三课程关闭起来。这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今年我决定亲自挑选受邀参加这些课程的人？

理由很简单：在研究这种 Wirklichkeit［现实效力］时，有一面已经勾勒出来——直接交换的一面，言说如同“传球”的一面。只有在某些挑选条件下、在不同参与者类型之间保持一定配比，它才能实现：一类人必须把我的言说用于分析实践；另一类人则向我证明，人完全可以依照我的言说全部的连贯与严谨，一路追随到它所抵达之处。

不言而喻——我们本来就应当预料到——，如果分析实践配得上 πρᾶξις（praxis）这个名称，它就会嵌入一种结构；即使在它当前的实际运用以外，这项结构仍然有效。〔亚里士多德区分：

- **理论科学**：ἐπιστήμη（θεωρητικός：观察、沉思），如数学、物理学等；其目的在于真理，在于认识支配事物的原因。这些科学不以功利为目的，构成思想的终极目标。

- **行动科学**：πρᾶξις，指真正的行动，其目的内在于行动者自身，例如实现自身、追求“善”。“……πρᾶξις 是严格意义上的行动。要在本义上构成行动，一项活动的目的确实必须在它自身之中；这样一

来，行动者在施行自己的行动时，会直接从所做之事中获益。例如，在道德活动中，行动者通过赋予自身‘形式’，生产出一种自己同时加以运用的价值。”

〔让-皮埃尔·韦尔南：《古希腊劳动的心理学面貌》，载《思想》第66期（1956），第80—84页。〕

- **生产科学**：ποίησις（τέχνη）；这里的行动并不完善，因为它从属于行动者以外的目的，作品——ἔργον——变成外在于他的东西。“在极限上，手工业劳动表现为纯粹例行程序：它运用经验配方，使材料符合一种模型，而模型的性质则由使用者的指示或命令从外部告知。工匠的 ποίησις 服从他人，趋向一个超出自身的目的，怎么可能被体验为真正的行动行为？为了把它同真正的活动、同 πρᾶξις 区分，亚里士多德把它称作单纯运动：κίνησις。这种运动包含一种不完善：它追逐一个位于自身以外的目的，因而自身不具有 ἐνέργεια——实现活动。”〔韦尔南，同上。〕

所以，必须建立一种交换的可能性；例如，我们可以在这个层面研究若干术语，它们会在共同认识层面开辟并便利某些本质术语的使用，而这些术语属于我们实践中名为理论的部分。又例如，可以有某项研究——我并不是说……我没有任何预设议程——向我们展示斯多亚派已经能够接近多少属于我们的真理。例如，他们恰好：

- 一方面在逻辑层面给我们带来若干本质参照；它们对我们的意义，在于同逻辑的最新用法共享一根枝干；

- 另一方面还带来这项逻辑所牵涉的身体性内容——它将在我今年的课程中显现；对分析家而言，这并不新鲜，只是他并不这样表述。

因为，仅仅记得我们在分析中谈论身体意象还不够。什么意象？一幅漂浮的意象、一只气球或皮囊，人们可以抓住，也可以抓不住？身体意象之所以在分析中发挥作用，恰恰只因为它以部分形式起作用，也就是被包含、被切割在逻辑切割之中。

那么，知道下面这件事也许很有意思：对斯多亚派来说，上帝、〔……〕、人的灵魂，以及世界中的一切，包括性质规定——除去几个例外点以外的一切，而画出这些例外的地图会颇有意义——全都是身体性的。

这些逻辑学家认为一切皆为身体。我并不是说，没有其他更好的研究可以优先于这一项。我们也可以研究：为什么亚里士多德彻底错过了“质料因”问题，为什么归根到底，质料在他那里根本不是原因，因为它只是一个纯然被动的要素。

无论从哪里着手，只要拥有一项像我们这样的实践，就总会重新碰到那些活生生的要点。

不过，这项选择必须共同作出，因为它是一项非常特别的选择；我不能让下面这种说法传播开来——按照人们喜爱标签的习惯，它一定会传播——：我正在向你们宣讲一种斯多亚派精神分析。

所以，我们会努力通过共同选择，为有效工作把这些事情调试清楚。我认为，最好的制度是让工作产出某种成果，并能把它传达给全体——传达给那些仍会赏光、并且我希望仍会勤于参加每月头两个星期三课程的所有人。

这些说明到此结束；它们同使之在我的话语中浮现的要点——关于原因的某个问题，以及应当怎样理解质料——并非没有关系。现在，我再接回下面一点：

- 如果我的教学具有一种意义；
- 如果它同自己凸显的结构主义保持一致；
- 如果它能够年复一年地继续并建立起来……那么，在我看来，认为它从下面一点中获得助力是相当正常的：结构主义表述若要奠定自身……

请那些还能记得的人回忆一下，我用整整一年耐心搭建的第一幅图式；请回忆这幅第一图式，回忆语言结构与言说场域的决定性功能之间那种网络式关系[注1]……例如，如果这种网络结构具有一项优势，恰恰就是它属于一个拓扑学世界——姑且撇开“世界”这个词，我只是为了让你们立刻听懂而使用它。也就是说，其中的连接不会丢失，因为底面可以变形、柔韧并富有弹性。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即便最抵触的人也完全明白所涉为何。因此，整体度量比例发生变化时，建筑不会坍塌，也不会撕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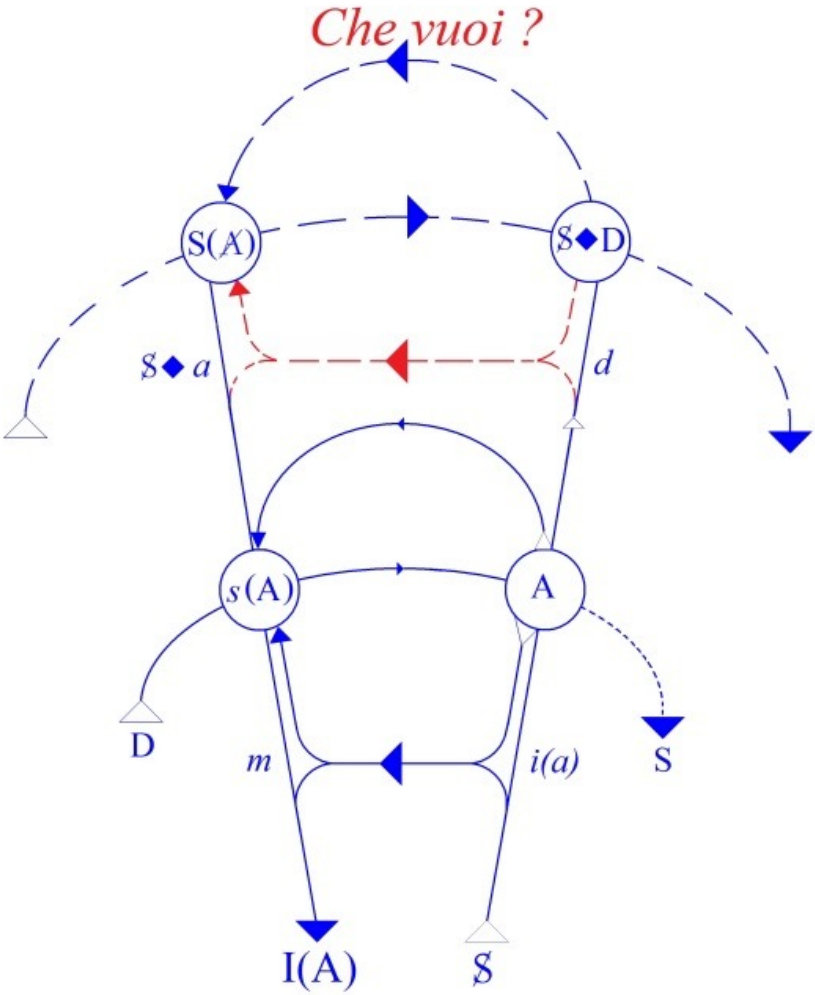
> [注1]　参见雅克·拉康：《言说与语言在精神分析中的功能与场域》，载《文集》，第 237 页；以及 1957—1958 年研讨班《无意识的形成》，巴黎：瑟伊出版社，1998。

当我引入新术语，并且像刚才提到的那样，在存在与拥有以后又谈到欲望与索求时，问题在于看清结构把这四个项怎样彼此接上。在我看来，这并非真正不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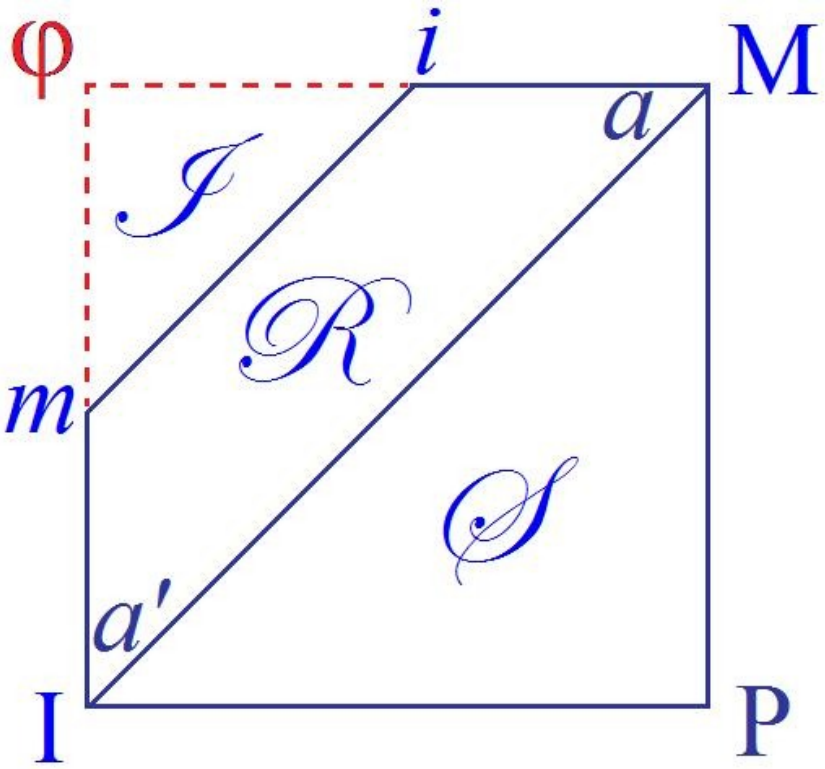
右边画着四幅这类结构网络，给你们作提醒。首先，就在你们眼前：

- 一个孔洞，它标示我今天要谈的东西。
- 随后是图式——两层的图式以及言说功能；

言说行为与陈述在其中得到区分。



在它右边，是某种方形碎片：



那是一片场域。有些人——人数并没有那么少，尽管我从来听不到任何反馈——读过我的文章；他们会在《论任何可能的精神病治疗的一个先决问题》[注2]开头认出它。

> [注2] 参见《文集》，第 553 页；或第二卷，第 31 页。

早在四年前，我就在黑板上给精神分析听众画过所谓射影平面的拓扑图式，也就是我在当时教学中以 cross-cap［交叉帽］一词引入的东西；那恰好是我讲授认同研讨班[注3]的一年。非常令人震惊的是：从未有人想到去发现，莫比乌斯带早已铭写在那里、等待着你们——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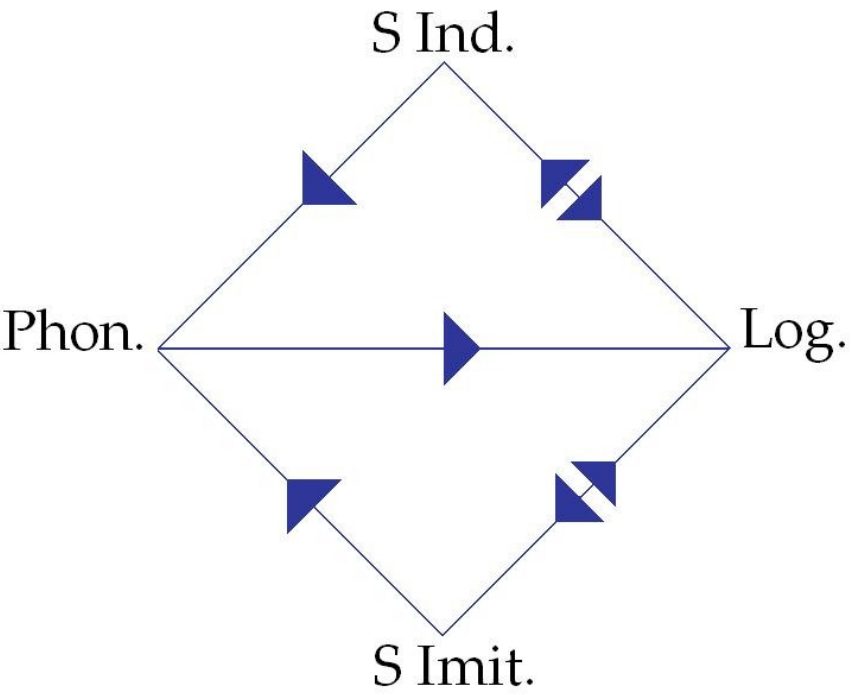
比乌斯带可以从射影平面中切出，并留下一项余数；我们很快会说那是什么。诚然，不能责怪任何人没有猜出这一点；可是，我写下的字母 M-I-m-i，可不是为了拼出“咪咪”才放在那里的。

> [注3] 指 1962 年 5 月 23 日的课程。

这些字母也许本可以引起一点怀疑：我赋予莫比乌斯带的正是这项映射功能；借助它，我要让你们把握构成主体功能的切割究竟是什么。

最下方还有一幅新的小图式。我顺便指出它，供那些今天愿意把它记下来的人思考。严格说来，它有助于把握我称作能指、并一直让它发挥作用的东西，同今年尤其需要考察的东西之间的关系：能指不仅在语言中发挥作用。我已经告诉你们，不存在元语言；由此意味着，那种不言而喻地把自己呈现为元语言的东西——逻辑——究竟是什么？逻辑不正是一次元语言的尝试吗？逻辑只是元语言的一项跌落；只有把它作为这种跌落来考察，人们才能构想、把握并揭示逻辑。

所以，在下面这幅图式中：



- 左端有我写作“phon.”、也就是音素的东西——能指中严格属于音素的要素。

- 构成它的某种东西，在下方和上方两极都以指示符号的形式出现。去年我已经向你们展示“指示”一词的核心功能如何运作，因此现在可以推进这个说法。它的典型就是转换词（shifter）。从根本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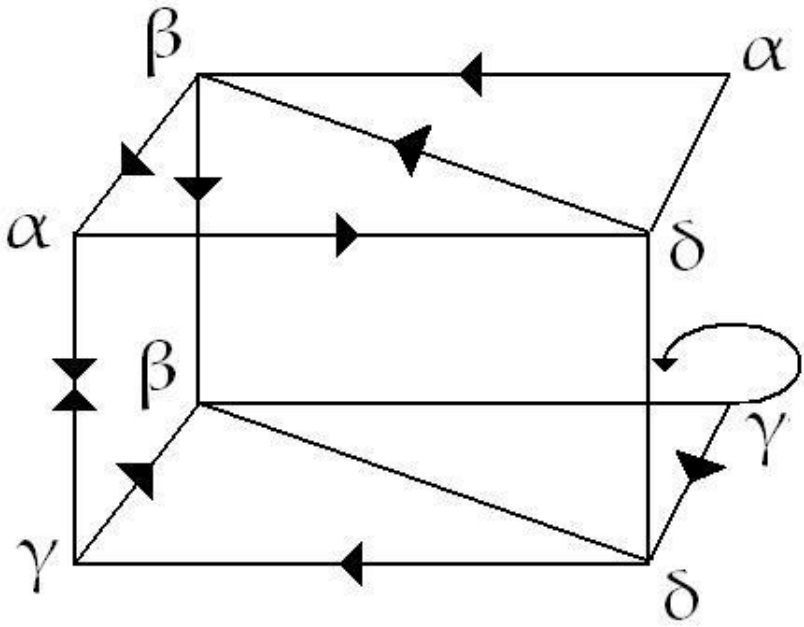
说，受到指示的总是或多或少属于主体的孔洞，属于言说行为主体的孔洞[注4]。

> [注4] 参见 1964—1965 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关键问题》，1965 年 3 月 3 日与 5 月 5 日课程。

- 下缘则是符号——不过，这个术语也许会令你们惊讶；我只有在阐明抵达这一点时，才能以它全部的粗粝直接引入它，因为这样它才不会支配并席卷一切：这就是模仿符号。

- 这些东西共同参与构成音素；而音素又把你们送向逻辑组合这一极点——它应当在右侧水平线末端得到把握。

这一逻辑结果同指示项及词汇项之间的关系——从这里出发，我完全可以承认后者包含模仿要素——，就是作为科学构成要素的逻辑所面对的全部问题。这丝毫没有改变不存在元语言这一事实。



上面的小图式是为了提醒你们：《被窃的信》一文开头有若干关于能指链的连接形式[注5]。我们马上要推进的内容也许会使它们稍微清楚一点——但我不能说，迄今为止它们发挥了多大的启明作用。然后呢？

> [注5] 参见《文集》，第 48—50 页；或 1954—1955 年研讨班《自我》，1955 年 4 月 26 日课程。

问题在于从主体出发，也就是从科学的主体出发。我们认为自己能够在笛卡尔的这项经验中标出它：它是一个消逝点的记号。我们同样能在弗雷格的逻辑努力中标出它；如果要为“1”提供纯粹的逻辑基础，他

会向我们指出“1”必须在哪里出现——严格说来，就是在零对象的层面[注6]。

> [注6] 参见 1964—1965 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关键问题》，1965 年 1 月 20 日与 3 月 3 日课程；戈特洛布·弗雷格：《算术基础》，巴黎：瑟伊出版社，1970。

去年这两项提醒，难道还不足以让下面这件事显得惊人，并显示我遇到的是怎样一种倾听吗？竟然有人——而且还是其中最优秀者之一——对我在上次报告中加给科学的主体的重音表示惊讶。

这些观察并不徒劳。研究某些耳聋——况且只是暂时的耳聋——时，我们恰恰因为是弗洛伊德式的，绝不会满足于“盲点化”这个术语；出于最充分的理由，对我们而言，孔洞不可能位于知觉之中。

严格说来，这是一桩蠢事；但人们又在上面建起许多东西：好几年间，整个英国精神病学只谈“负性幻觉”。其实，结构完全不同。只须阅读弗洛伊德专门为此写作的文章《恋物癖》（1927），就能看到在所谓倒错主体中，Spaltung［裂分］——现实本身的分裂——究竟是什么。

也正因此，标出这类观察与这类意外很有意义。毕竟，我有幸面对它们——这在我亲爱而已故的朋友莫里斯·梅洛-庞蒂看来似乎并非幸事；他倒以为，每逢我当时在圣安娜医院发言的那天下午，我都在收集自己听众的种种困惑。相反，我认为，这对他们和对我都有许多好处。

那么，现在让我们重新从孔洞出发。很久、很久以前，我就赋予孔洞一种根本功能，用来说明象征秩序如何运作。

还需要我提醒你们某次在鲁瓦约蒙举行的会议、大会、聚会——随你们怎么叫吗？我在那里提交了《治疗的方向》[注7]及其后续内容……“其权力原则”。讲话既已印出，我必须换一张唱片；于是，我只向他们谈“芥末罐”。有个记者不知从哪道门混了进来，听得目瞪口呆。我从午餐时再次得到确认的一项经验事实出发：芥末罐总是空的。

[注7] 参见《文集》，第 585 页；或第二卷，第 62 页。

从来没有这样的例子：人打开一只芥末罐，发现里面装着芥末。这只芥末罐就是最典型的象征创造；所有人早已知道这一点。如果没有会说话的存在，世界中也许会有凹坑、水洼、洼地，以及能够容纳东西的事物；但不会有容器。

我们若以为它毫无缘由地成为文明最早、也是最重要的遗迹之一，就错了。陶器，随后是青铜容器——我们发现了数量何等惊人的这类东西！

只剩下这些东西这件事，怎么也该扯一扯我们的耳朵，何况还有许多别的事情！不过，仅仅扯耳朵还不足以让耳朵听见……它还必须相信。

显然，在此以前还有别的东西……最早的历史遗址有一个漂亮的丹麦名字[注8]，可我不会念：那是一堆废弃物。那么，这里就有了对象 (a)！

[注8] Kjökkenmödding［贝丘］：由中石器及新石器时代人群长期食用软体动物形成的贝壳堆积，其中通常还伴有各种器物，有时伴有木炭；见于波罗的海沿岸、苏格兰、法国、葡萄牙等地。

而容器不是对象(a)。很久以来，人们一直用容器表达某种东西。表达什么？

这是一堂神学课吗？你们知道，伟大的工匠上帝——教理问答告诉我们："正如造罐需要一位陶工，同样……"

可惜我们没有更好地利用这句话！因为它所说的根本不是它试图让我们相信的东西。它告诉了我们什么？

"Deus creavit mundum［上帝创造世界］……"后面则是"ex nihilo［从无中］"〔参见《创世记》："Mundum, ex nihilo creavit Deus［上帝从无中创造了世界］。"〕这是什么意思？

意思是：容器围绕孔洞被制作出来；本质之处正是孔洞。

正因为孔洞具有本质地位，犹太教关于上帝从无中创造世界的陈述，严格说来才是……

- 科瓦雷[注9]曾这样思考、教导并写下来——为科学对象开辟道路的东西。

> [注9]　亚历山大·科瓦雷：《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88。

人们会纠缠于、黏附在一切性质上——无论是力、冲量、颜色，还是你们愿意提出的任何东西，一直到知觉；总而言之，就黏在那截粉笔上。两千年来，苏格拉底的后代——也就是拉尼奥和阿兰之流——像苍蝇黏在捕蝇纸上一样黏在那里，围绕表象思辨。

那么，这个表象呢？好吧，我们必须终于看见，它怎样也就是现实。

哲学与科学正是凭借这件事彼此牢牢沿切线分开。那么呢？

我想自己能够立刻告诉你们：就在你们从一个点出发——把那截粉笔视为欠缺的东西——的那一刻，而且只从那一刻起，粉笔才成为科学对象。我现在就会努力让你们感到这一点。

不过，我不愿错过机会，要立即顺便标明“质料因”是什么意思。

如果你们是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会告诉你们，质料就是芥末，也就是填满空洞的东西[注10]。

> [注10] 参见亚里士多德《物理学》第二卷第三章 194b 及《形而上学》。

亚里士多德对空间的构想本来已经找准了方向，却仍远离那种极其滑溜的广延；而在数学—物理科学的推进中，广延正是一个必须不断重新提出的真正问题。

他非常清楚地看到，处所能够让人形成一种不会无限铺展的空间观，从而不必面对那个虚假的无限问题。然而，他开局虽好，把处所界定为最后的容纳者——最后者就是不动者——，可到头来，因为他是希腊人，没有读过《圣经》，便无法承认各对象之间存在真空；于是，他把芥末罐填满了。

正因此，人们在这个位置上停留了若干世纪！

这是否意味着，“质料因”就是罐子——它同一切言说创造一样，无可争议地属于神圣创造；而《创世记》文本所说的东西是否严格归结于此？

当然不是！这就是我刚才想顺便标出的观察。我已经告诉你们：在墓葬中、在所谓原始文化占据的每一个地方，我们都能找到成堆的罐子。

埋下这些罐子的人有一个非常明确的意图：不让未来的收藏家把它们当花盆送给女朋友；也就是单纯为了保存这些罐子。他们会在罐子中央打一个孔洞。这向你们证明，“质料因”确实应当到孔洞一侧去寻找。

这里有某种东西造成了某种结果——容器上的一个孔洞；这就是模型。

如果取科学阐明的顶点——它同时是拱顶石和本质铰钉——，会得到什么？会得到所谓能量学。能量学并不像某位作者以为的那样，可以作为我“精神分析结构理论”的补充而同它对立。他想象，能量学无疑就是“推动”事物的东西——这就是哲学家的文化！

关于能量学，例如，你们可以去读一位怎么也算得上权威的人——费曼……

请相信我，我并没有等到他获得诺贝尔奖才翻开他的书……那是一部名为《费曼物理学讲义》的两卷本教材[注11]。对有时间的人，我实在无法推荐更好的读物，因为这是一套为期两年、非常详尽的课程。完全可以用一定数量的课程涵盖最高层次的整个物理学领域，而它们最终总共不过重一公斤半。

> [注11] 理查德·菲利普斯·费曼、罗伯特·莱顿、马修·桑兹：《费曼物理学讲义》，Addison-Wesley，1963，两卷；法译本《费曼物理学课程》，巴黎：Dunod，1999，“力学”第一、二卷。

在第三章还是第四章——我记不清了——，他让读者或听众——我也不知道该称哪一种——明白了能量学是什么。

所以，并不是我为了服务自己的论题才发明这件事。我拿到书时读过它——也就是一年半以前——，后来又想起来了。请查阅第四章“能量守恒”的第一节。

为了让那些被假定对物理学一无所知的听众理解能量学——因为在此以前，他们只接受过无能之辈的教导——，他想出的最好办法是什么？他假定有个小浑蛋，叫“淘气丹尼斯”，也就是“危险分子丹尼斯”。有人给他二十八块小积木；不过，因为他是个蛮横的小子，积木由铂制成，无法毁坏、切开或变形。问题在于弄清妈妈每一次会怎样做：她保持应有的谨慎——也就是不像美国人那样——走进孩子房间，却有时只找到二十三块，有时找到二十二块。

显然，这些积木总能重新找到：

- 或者掉在花园地上，因为它们被扔出了窗外；
- 或者通过某只盒子的重量差异发现——盒子当然不会打开；
- 又或者，浴缸水位略有升高；浴缸水太脏，看不见底，因此正是这点水位上升让人知道积木去了哪里。

我没有时间把整段文字念给你们听；它精彩极了。作者指出，人总能借助一系列运算，重新得到同一个恒定积木数。这些运算会把若干要素相加，例如把水面高度除以浴缸宽度，再把这个奇怪的商加到另一种东西上，比如剩余积木的总数——我希望你们跟得上，没有人愁眉

苦脸。顺便告诉你们，这就是每一条科学公式都包括的做法：人们不只相加，还相减、相除，以各种方式运算。拿什么运算？拿数。正是借助数，人们才能相加——否则就没有任何科学可能——，而且通常把抹布同餐巾、梨同韭葱加在一起，不是吗？

可是，当孩子刚开始学习时，人们教给他们什么？——我希望现在不再如此，但也不能确定——恰恰为了给他们解释，人们告诉他们相反的话：抹布不能同餐巾相加，梨不能同韭葱相加。结果，他们自然从此同数学彻底绝缘。让我们回到费曼；这个插曲只会让你们迷路。

费曼最后说——例子的结论就在这里——：最终出现的数字总是恒定的，即二十八块。那么，他说，能量学就是这个。

只不过，根本没有什么积木。这意味着，保证能量守恒这一根本原则的恒定数字……

我不只说它“根本”；只要它的基础发生一丝颤动，就足以让每个物理学家陷入绝对恐慌……这项原则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得到保存。

因此，它必然会得到保存，因为人们会不惜一切代价保存它；这就是科学思维的条件本身。但“恒量”、总能重新找到同一个数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因为一切都在这里。问题无非是一个数字。

它意味着：某种本身以欠缺形态存在的东西——并没有积木——，必须在别处、在另一种欠缺形态中重新找到。

科学对象是对象作为欠缺时的通道、响应、代谢，如果你们愿意，也可以说是它的转喻——但要小心。

从这里出发，许多事情都会变得清楚。让我们回到去年能够凸显的“1”的功能。

关于对象，“1”第一次出现的场景，难道不正是“穴居人”回到家中的场景吗？——只为取悦那些仍喜欢这类图像的人——他家里存着一点粮食，或者很多粮食，为什么不呢？他回来说：“少了一个。”这就是一元特征的起源：一个孔洞。

当然，事情可以推进得更远，而且我们绝不会错过这个机会。请注意，这已经证明我们的“穴居人”抵达了数学的最前沿：他懂得集合论；他说“少了一个”时已经作出标记，他的集合也已经形成。

真正有意思的点，显然在于发挥指称作用的“1”。这里需要指涉对象，而斯多亚派会帮上我们。

这里的指称显然是什么？是他的言说，也就是向我们打开孔洞的真理——问题是：为什么是“1”？

因为这个“1”所指示的，始终是作为欠缺的对象。

据说，科学对象的特征在于它总能得到量化；这项特征的丰产性又在哪里？难道仅仅因为一项实在令人难以置信的先入立场，我们从对象的一切性质中只挑出“量”，随后才把度量应用到它上面——而这样一来，度量本身究竟从何而来，又成了问题。当然是从天上来！人人都知道，数……

至少，如果我没有记错，克罗内克是这样说的……“整数是上帝的礼物”[注12]。数学家有权发表这样幽默的意见。

> [注12] 利奥波德·克罗内克：“上帝创造了整数，其余一切都是人的制造。”

但问题不在这里。正是因为人们黏在“量是对象的一项性质，人对它进行度量”这个观念上，才会失去线索，失去构成科学对象的秘密。对象是由某种始终属于另一物的东西[注13]来度量的，而且是在作为欠缺的对象所具有的诸多维度中度量——这些维度可以是多重的。

> [注13] 参见下一期研讨班《幻想的逻辑》中对象(a)同“1”的关系，以及幻想的功能。

这件事如此不易感知，以至我们必须发现：人在这里获得的真正经验是，数本身根本不是一套度量装置。毕达哥拉斯式灵感刚出现不久，证明便已经给出：人们发现，数无法度量它自己容许人们构造的东西；它甚至拿不出一个数，以任何可通约方式表达正方形的对角线——而正方形若没有数，本来就不会存在。

我在这里提起这一点，只因为它具有一项意义：如果数对我们来说应当被构想为欠缺的功能，那么我刚才围绕不可通约对角线作出的简单观察，就向我们指示，从这里出发会有何等丰富的内容向我们敞开。因为可以说，数为我们提供了欠缺的多重语域。

我要为没有特别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说明：所谓无理数，至少从戴德金[注14]以来仍应被视为一个实数。它不是由某种可以无限逼近的东西

构成的数；它之所以能够嵌入实数系列，恰恰要通过一个函数的介入，而这项函数被命名为“切割”并非偶然。

> [注14] 理查德·戴德金：《数是什么，有什么用？》，载斯蒂芬·霍金编《上帝创造了数》，Dunod，2006，第 935 页。

这同你们写出 0.33333……时一个不断后退的终点毫无关系；后者是完全可通约的数，即“1”的三分之一。至于对角线，希腊人以来我们便知道它为什么严格不可通约：它的数字没有任何一位能够一直预先算到最终尽头。这里唯一的意义，是让你们设想：也许，数会为我们提供某种非常有用的东西，以构造我们面对的问题，也就是欠缺功能。

于是，我们面对下面这个位置：

- 主体只有把自己界定为切割，才能发挥作用；
- 对象则界定为一项欠缺。

我谈的是科学对象，换言之，就是一个孔洞。

事情已经推进到这种程度：我想，我已经让你们感到，归根到底，只有孔洞能够充当真正同我们相关的东西，也就是“质料因”的功能。我们必须在这些项之间收紧某个结。

今天，因为内容没有预先写好，我无法像希望的那样把论述推进得那么远；而且，我也不能指望在八天内从容完成必要的人员挑选。因此，本月第三个星期三，我会破例继续举行你们全都受邀参加的同一种公开研讨班。

为了给接下来的问题断句并定点，我会提出这样一项对立：精神分析的对象(a) 同我刚才试图让你们呈现于眼前的科学对象之间，应当构想怎样的关系？只谈孔洞还不够；不过，至少对反应最敏锐的人来说，我想答案已经在我们的地平线上得到指示——这个说法正合适。

欠缺的功能……

注意，我没有说欠缺的观念！我们知道，这项观念怎样一把抓住柏拉图的脚踝，使他始终无法挣脱。……我们看见欠缺的功能出现，并因对象(a) 的坠落而发生必要的逸失。我今天带来的、下次还会带回来的这些图，就是为了让你们亲手触及这一点。

要让一项切割规定下面两个场域，需要怎样的结构：

- 一方面，是作为科学主体而成为必要的主体场域；
- 另一方面，是某种对象形态从中起源的孔洞场域；唯一值得保留的对象形态，就是所谓科学对象。

而我上次给这种原因留下了问号；作为这样的原因，它也许……

- 是否正如表面所见，仅仅是法则的形式？
- 或者，科学那张显然属于唯物主义、并使科学恰好可以如此命名的面孔，究竟附着在哪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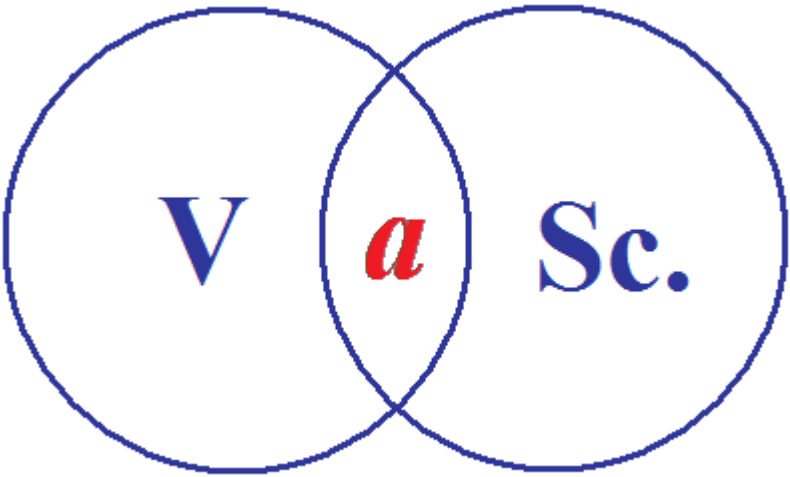
问题的转折点正潜藏在这个欠缺功能之结中。那么，在这个本身属于裂隙的点上，我们会找到什么？去年谈到弗雷格式“1”的发生时，我们

已经看到：为了“拯救真理”，它必须运作。“拯救真理”的意思，就是“对真理什么也不愿知道”。

还有另一种位置，即“享用真理”。好吧，这就是认识驱力，是作为享乐的知识；它会在科学接近对象时带来不透明性。这就是二律背反的另一项。我们必须在这两项之间把握科学的主体究竟是什么；我打算从这里重新接过它，并带你们走得更远。

请听清楚：为了谈这项根本功能，我还没有让对象(a) 的任何内容显现出来。不过，你们应该已经感觉到，这里涉及的正是我没有重新画出的同一幅图式：当时我向你们描绘异化功能本身，用的是两个圆的图式。请记住那个例子：“要钱还是要命？要自由还是要死？”

我曾向你们说明，异化图式就是这个：一项并不是真正选择的选择，因为人在其中总会失去某种东西，或者失去全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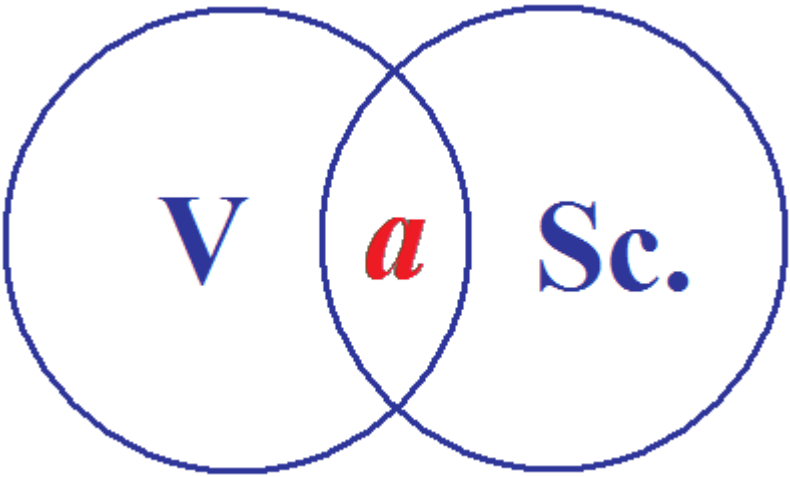
- 你们享用真理；可是，既然你们对此一无所知，究竟是谁在享用？
- 或者，你们拥有的不是知识，而是科学；于是，那个作为交集对象的对象(a) 从你们手中逸失。

孔洞就在这里：你们拥有的是被截去一部分的知识。

这就是我今天要停下来的点。

第3课 · 1965年12月15日

今天，我不会吝惜图形和切割。为了严谨，我特意把一幅图画在黑板左上方；它对应我上次作出的提醒，也就是我在这里第一年结束时给出的异化图式。不妨说，异化在于一项并非选择的选择；面对两个项，它迫使我们接受：“要么两者一同消失，要么只留下一个残缺者。”



我曾说，享用真理就是爱知驱力真正瞄准的东西；而在其中，一切知识与真理本身同时逸失并消逝。

“拯救真理”，并为此“对真理什么也不愿知道”——这就是科学的根本位置，也正因此它才是科学；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知识，而对象(a) 那个

欠缺的孔洞展露在知识中央。这里借助欧拉惯例来标示它，把它表现为真理与知识的交集场域。

显然，对于这些欧拉圆在严格逻辑上的用法，我提出过不止一项异议；它们在这里的用法也多少是隐喻性的。必须采取这些预防。不要以为我认为真有一个真理场域和一个知识场域。“场域”一词具有精确意义，我们今天也许有机会重新谈到它。因此，这里的欧拉圆用法必须有所保留。

我特意指出这一点，因为不同于刚才作出的保留，你们今天会看见我依靠若干形式……但说“若干形式”，还没有说出它们是什么：

- “切割”更接近一些；
- “能指”才是所涉之物；
- “书写”——为什么不呢？

那么——我要向前推进——请你们注意，它们的决定性范围必须在完全不同于“意指”的意义上理解。意指是这里欧拉意义上的圆所代表的东西；归根到底，这类圆是为了向我们展示，一种外延式与内涵式概念化怎样被包括在某物之中。今天我带来的这些图形中央，向你们展示的却是另一种东西。

也就是一位佛教僧人画下的东西。他的名字已经由我以日语音译写在黑板上，因为他是日本人：慈云尊者（Jiun Sonja）[注1]。

> [注1] 参见 Lacanchine：《精神分析的对象》1965 年 12 月 15 日课程，注1。

正如今天在场的一位忠实朋友好意告诉我的，慈云尊者生活于 1714 至 1804 年。十五岁进入佛教“修会”——如果容许我这样说——以后，你们看，他在那里一直待到高龄。他著述宏富；我就不向你们细说那些至今仍带着他印记的原创性奠基工作了。

只举一件事，就能让你们想象他的活动规模：目前被视为基础著作的一套梵语学习手册，如果不全出于他的手笔，至少也源自他；它足有一千卷之多。

这足以说明，他不是一个懒人。

不过，你们在这里看见的，典型地是一道痕迹；可以说，它在某项冥想的顶点形成，并且至少在表面上，同某些练习——更确切地说，同那条名为禅（ZEN）的道路上依次发生的那些相遇——所产生的东西并非没有关系。

我甚至不愿轻率地在这里提出“禅”这个名称；因为面对这群听众，其中一部分人究竟会怎样听取我的话，对我来说太不可靠。如果我毫无预防地引用某种东西……

它当然不是秘密，满街都是，四处都能听人谈起——也就是禅——这就可能近乎辜负信任。说实话，对于堆积在这个名目下的全部蠢话，我怎么劝你们提防都不为过。

不过，它们也不会比堆积在精神分析本身名下的蠢话更多。

无论如何，我不得不说，这个图形是一笔画出的。我们当然未必能够评价这一笔特有的力度；不过，对训练有素的眼睛来说，它相当惊人。



对我重要的正是这一笔；我会把你们的注意力固定在它上面，用它来支撑今天要在我们已经开辟的道路上推进的内容。

毫无疑问，它在这里占据着自身固有的位置——也就是我界定为能指的位置。

它“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沿着它排列的文字内容足以保证这一点。这些文字应当作为它本来就是的汉字来阅读：



〔简体字与拼音如下〕

几 jī　三 sān

人 rén　千 qiān

知 zhī　年 nián

代 dài

这里写的是汉字；我不会用日语，而会用汉语给你们念：

三千年代　几人知

Sān qiān nián dài, jī rén zhī.

意思是：“三千年后，几人会知道？”

知道什么？知道是谁画了这个圆。这个人究竟是谁？我刚才认为有必要先向你们指出他的跨度：从科学最极端、最金字塔尖的一端，一直延伸到一种修习方式；我们在这里不能不考虑这种修习，把它作为他留给我们这道描画的背景。

“三千年后，几人会知道？”——知道这个画出的圆所处层面上的东西？

我冒昧地用自己的书法作了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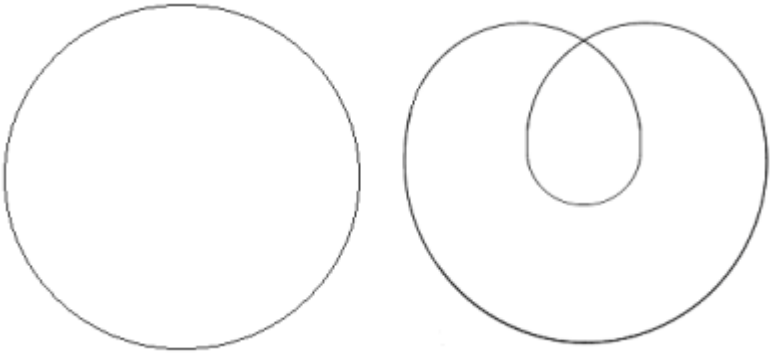
〔简体字与拼音如下〕人 rén 三 sān 知 zhī 千 qiān 也 yě 年 nián 前 qián

“不待三千年，人便会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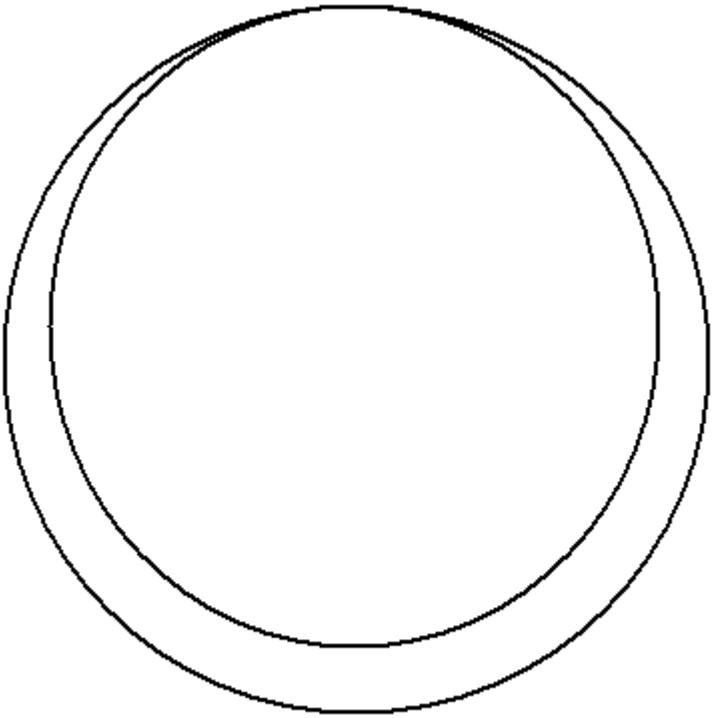
三千年前 人知也 sān qiān nián qián rén zhī yě

远在三千年以前——毕竟，这可以从今天开始——，人便会知道。

也许，人们会记得，这道痕迹的意义值得这样铭写下来。



尽管表面上不同，它们在拓扑学上是同一个东西。假定这里是圆的，假定我称作圆的东西是一只圆盘。我亲手画出的这个图形同样是一只圆盘，尽管它采取两个叶瓣相互覆盖的形态；曲面仍连为一体，只受一条边界限定。通过连续变形，这条边界可以展开，使其中一边覆盖另一边。它们在拓扑学上的同胚关系显而易见。



那么，我以不同方式画出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现在必须把你们的注意力吸引到这一点上？

一条被我称作圆、而不是圆盘的线，会把“它限定了什么”这个问题悬置起来。就平面上画出的东西来看，它限定的也许是里面之物，也许同样是外面之物。

事实上，正是在这里，我们必须考察书写功能中可能具有原初性质的东西。

让我们暂时离开眼前的图形。我向你们提出它，当然更是作为一项 experimentum mentis［思想实验］、一项心智练习，而不是要求你们凭直觉赞同。因为我若把你们带入拓扑学场域，是为了使你们获得某种心智的柔韧，让你们围绕这些图形作心智练习。这些图形无疑并非完全无法以某种方式凭直觉把握；但至少对成见较少的人来说，你们只须尝试跟上我，跟上我通过画出若干切割，试图在其中让你们发生离心的效应。

你们马上就会看到：面对这些为你们分层排列、而且极其简单的东西——我今天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仍会颇费力气。这会让你们发现，下面这些构造之所以……并非毫无缘由：

我已经把它们全部引入过，甚至使用和滥用过不少次；但今天仍需把有关它们的东西集合起来……所谓克莱因瓶、射影平面、环面等图形，相对于我们直觉通常采用的坐标结构，占据着如此令人迷失的位置，以至人确实必须练习、用心钻研，才能轻松地在其中找到方向。

正因此，我不得不通过某些相当粗线条的对立来解释这些事情；它们会漏掉当代表述所具有的一部分严谨性，例如现代拓扑学著作中这些图形所在章节的表述。我必须向在座的数学家们道歉。

不过，我也不必过度道歉，因为所谓拓扑学场域的“直觉困难”，已经从这些事情严格意义上的数学表述中彻底消除。

凭借在自身前提、原初公理和提出的法则中都非常可靠的组合公式，这些困难在数学表述中甚至不会压上片刻重量。可是，事物本身曾难以澄清、难以最终取得逻辑—数学地位；这项困难仍保有某种价值。仅仅说其中残留着直觉主义的不纯成分，就把它打发掉，未免太容

易；仿佛一切只因为人们长期让某种连着三维空间经验的视角妨碍自己，后来才终于能够从这些经验给定出发，对它们加以变换、搭建和构筑，形成一种广义组合系统。

人们满足于这种批评与这种参照；但我认为，他们在这里错过了某种东西。

让我们只取一项如今在我们看来最粗浅、最初等的真正历史难题：负数。今天还有谁会为负数的存在感到烦恼？

我们面对负数时具有的这份安心——况且，它没有遮盖任何好东西——至少仍很有用，因为它让我们不必提出无谓问题。不过，人们对负数感到安心不过是一个世纪以内的事。

我不久前还同一位极有学问的数学家交谈；他对数学家史了如指掌：即便在笛卡尔时代，负数这种低于零的量仍让他们烦恼。

他们无法安心：数会增长，也会减少；可一旦向下越过界限、越过最深的底部，它会去哪里？毕竟，如果他们用这类术语思考问题，为此烦恼也完全正当。

我只举这个简单例子……你们当然知道，我很容易举出其他例子：无理数，所谓虚数，著名的 $\sqrt{-1}$。数学家在这里也略为轻易地忘记了：大约五六个世纪以来，这个虚数曾经是什么。

你们知道，它在一个简单的二次方程中以落在可构想范围以外的根出现。从那时一直到十九世纪初——这有好几个世纪——，人们始终不

知道在概念上怎样处置虚数。如今，从复数的基础出发，事情已经得到保证……

数系经过扩展，终于赋予了它自身的地位……但数学家很容易——太容易了！——不去注意：当然，“虚”这个名字仍附着于它，可它同其他任何数一样是一个合格的数；我刚才引入的“数集”观念足以涵盖它，而它一点也不比其他数更“虚”。

好吧，我要在这一点上提出一项异议。我刚才以数集之名提到的某些结构，在逐渐受到掌握时曾形成停顿点和断句点；我认为，构成这些点的障碍不应归到直觉名下，不应归到这样一层遮幕或闭合名下：仿佛组合系统中所涉之物的某个支撑无法得到可视化。

相反，我认为我们被带向了某种更加原始的东西；它无非就是我们试图把握为结构的东西，即主体由能指构成的过程。这些不同的数表达形式之所以会再现不同的断句时刻——我说的是在时间上再现——，而且我们甚至不能确定，这项再现所涉的是不是同一圈过程；必须到那里看一看。

换言之，构成主体的欠缺也许具有彼此不同的结构形式；负数所表达的也许不是同一项欠缺。说到负数，康德[注2]把它引入哲学场域的方式，今天重新读来确实令人无比沮丧。康德曾尝试这项引入，也许已经是一项巨大功绩；结果却是一场难以置信的泥沼。因此，负数所支撑的也许不是主体结构性欠缺的同一时刻——我说的是“支撑”，不

是“象征”：这里的符号同它所造成的东西彼此同一，也就是主体的欠缺。我还会回到这里。

> [注2]　伊曼努尔·康德：《试论把负量概念引入哲学》（1763），巴黎：Vrin，2000。

在欠缺层面，必须引入欠缺的主体性维度。令我惊讶的是，没有人在弗洛伊德《恋物癖》[注3]一文中注意到动词 vermessen 的用法；它在文中出现三次，每一次都指主体意义上的欠缺，也就是主体把自己的事情弄砸的意义。

> [注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Fetischismus，《恋物癖》，前引书。

这样，我们便被带向了这项欠缺功能；它连着一项名为切割的原初之物，并处在书写规定语言场域的那一点上。我之所以特意写下“言说的功能与语言的场域”，是因为“功能”对应“言说”，“场域”对应“语言”。场域具有完全精确的数学定义。

有个人[注4]在一篇文章的第一部分提出了这个问题；文章似乎本周刚刚发表——无论如何，我是本周收到这一期刊的。他同我的某些听众关系非常密切，并以一种敏锐、尖刻而生气勃勃的方式，引入书写在语言中的功能问题；这使他的文章真正具有开创性意义。

> [注4]　雅克·德里达：《文字以前的书写》，载《论文字学》第一、二部分，《批评》第 223 期（1965 年 12 月）及第 224 期（1966 年 1 月）。

我必须说，他以一种决定性的、不可反驳的方式指出：把书写当作一种工具，用来服务某种本来会在言说中存在、生活的东西，就是彻底误认书写的真正功能。书写必须在别处得到辨认，而这件事内在于语言本身的结构。我自己已经充分指出这一点；哪怕只看我在认同层面

赋予一元特征功能的优先地位，我也无须再特别强调自己同意他的观点。

参加过我早期研讨班[注5]的人——如果他们仍记得我在那里说过的任何东西——也许会记得，我曾赋予下面这件事很大价值：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发现了一种表面上如此过时、如此不可解释的东西……

> [注5] 参见 1961—1962 年研讨班《认同》，1961 年 12 月 20 日课程末尾。

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注6]在前王朝时期的陶片上发现了若干记号。它们远远早于腓尼基字母的建立，却恰恰就是后来被声称具有表音性质的那些字母记号；显然，它们当时是制造者的标记。

> [注6] 弗林德斯·皮特里爵士：《字母的形成》，伦敦：麦克米伦，1912。

我曾由此强调：即使涉及所谓表音文字，我们也至少必须承认，记号来自某个地方，而肯定不是出于标记、编码音素的需要。人人都知道，即使在表音文字中，它们也根本没有编码任何东西。相反，它们极其出色地表达了我们置于音位对立中心的那项根本关系，因为音位对立不同于语音对立。

同我提到的那篇文章提出问题时所达到的精确程度相比，这些都是粗略内容，我会说，它们完全落后了。况且，指出参考资料总是非常危险：必须知道把它指出给谁。

当然，读那篇文章的人会看见，其中某些对立——例如所指与能指之间的对立——受到质疑，甚至一路质疑到这一点；他们也许会在根本没有分歧的地方看见分歧。

另一方面——谁知道呢？——这也许会促使他们在某篇文章之前或之后阅读另一篇文章。“一个能指指向另一个能指”这个始终根本的参照中，总有某种极其微妙的东西。

书写与出版并不是一回事。毫无疑问，即使我在说话时，我也在书写。

“那你为什么不出版更多东西？”正因为我刚才说的事情：出版总发生在某个地方。

书写同对象(a) 有着如此紧密的关系；二者偶然而出人意料的结合，会使一切未经安排的书写结合都显出垃圾桶的面貌。

相信我，在我偶尔清晨回家的时刻，我对垃圾桶及其常客拥有丰富经验。那些夜行存在从中捡起一些用途完全无法理解的东西；没有什么比这更迷人。我长久以来一直奇怪：这种如此重要的用具，为什么如此轻易地保留了一位行政长官的姓名；况且，人们已经用他的名字命名一条街，这本来就足以纪念他。我认为，poubelle［垃圾桶］一词之所以如此准确地同这种用具并置，正是因为它同 poubellication［垃圾化出版］有亲缘关系。

回到中国人这里。你们知道——我不知道这是否真实，但它很有启发性——，在中国，写过一个汉字的纸绝不会被扔进垃圾桶。据说，有些虔诚的老人因为没有别的事情可做，会把这些纸收集起来，放到一座专用小祭坛上焚烧。这是真的。即使不真，也很美！

对我试图界定的这类外在性活门，作出明确划界至关重要；它涉及垃圾桶功能同书写之间的关系。这并不意味着排除一切等级。不妨说，

在我们拥有的期刊中，有些垃圾桶比另一些更为体面。不过，仔细来看，同附近其他街区的垃圾桶相比，我并没有在里尔街的垃圾桶上看到明显优势。

那么，让我们重新接过孔洞。人人都知道，禅修无论如何同一项空无的主体性实现有某种关系——尽管人们不太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任何人、任何普通观看者看见这个图形时，都会认为其中仿佛有某个顶点时刻；它必然同人要取得、并被认为已经取得的心智空无有关：一个独特时刻，在等待之后突然到来，有时通过一个词、一句话、一声呼祷，乃至一句粗话、一个轻蔑手势、屁股上的一脚实现……显然，这类滑稽动作或小丑表演只有相对于漫长的主体性准备才有意义。

不过，在我们已经抵达的地方，如果确有空无，如果这个圆对我们来说应被看作以其穿孔价值界定自身，如果它适合用来表现我们通过种种汇聚方式接近的对象(a)——也就是对象(a) 作为坠落之物，同主体以分裂形式出现并得到结构化相连——，那么问题恰恰在这里提出：主体在我们的场域中究竟是什么？

这个孔洞、这项坠落、这项 πτῶσις（ptôsis）究竟是什么？这里我使用的是一个斯多亚派术语。它只同 κατηγόρημα（katēgorēma［谓项］）相对照，而且涉及 λεκτόν（lekton［可说之物］）这个同样神秘的术语；因此，它给注释者造成了确实根本无法解决的困难。让我们带着全部保留，以最粗略而肯定不准确的方式，把 λεκτόν 译作“意指”——不完整的意指，换言之，思想的碎片。

这种“思想碎片”的一种可能性，就是 δόξα（doxa［意见］）、εὐδόκειν（eudokein［认为适当］）。

当然，注释者受到体系不连贯性的约束，把它译作主体、逻辑主体时，并没有完全错过这项关系。既然斯多亚派学说在这里涉及逻辑，他们并没有错。

不过，我们能够在那里循着痕迹认出某种随着主体构成而坠落的东西；我认为，如果不让这一点给我们增添确信，我们就错了。

那么，我们会满足于这个孔洞吗？“实在中的一个孔洞，就是主体。”这未免太容易了一点。

我们在这里仍处于隐喻层面。然而，只须稍微停留片刻，就能在那里找到一项宝贵指示，尤其是我们经验完全指明的一件事；它可以叫作欧拉圆功能的倒转。我们仍会处在属性赋予操作的场域中，并重新接上通向弗洛伊德所谓 Bejahung［肯定］的必经道路；唯有这项肯定首先发生，Verneinung［否定］才变得可构想。

存在一项 Bejahung，而 Bejahung 是一项属性判断。它不预先裁定存在，也不说“关于真的真话”。

它让真实之物开始出发，也就是让某种东西得到发展：ποῖος（poios），某种性质规定、何所是——这两者况且并不完全相同。精神分析经验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例子；对我们今天的对象来说，它位居首要：这就是阳具。在经验的某一层面——严格说来，就是小汉斯病例所分析的经验——，阳具是弗洛伊德所谓“有生命存在”的属性。如果没有更好的称呼，暂且保留这个说法。

不过请注意：如果这是真的，就意味着万物有灵论语域中发展的一切，都从某个属性出发。这个属性只有被放到中心、从外部构造场域

时才发挥作用；而从它坠落、也就是“阳具是所有有生命存在的属性”不再可能为真的那一刻起，它才开始富有成果。我再说一遍，我提出这幅图式只是一个插入语。

顺便说一句，如果我的话语通过打开括号、悬置并闭合括号，随后又往往颇为笨拙地重新接起而展开，请你们再次从中辨认出书写的结构。

那么，事情是否就到这里？我们试图进行的穷尽，是否会限于这类粗略提醒？当然不会！因为，当我们把问题推进到这个位置时，问题并不是要知道能指怎样给实在胡乱涂色！任何一张平面地图都可以用四种颜色涂完，而且已经足够……

尽管在当前日期，这项定理仍像以往一样得到验证，却仍未得到证明……但这并不是我们今天感兴趣的事情。

问题不在于作为实在中孔洞的能指，而在于规定主体分裂的能指。

什么能够把它的结构交给我们？任何空无、任何对象(a) 的坠落、任何原初焦虑，都无法说明它；我会尝试通过拓扑学考察让你们感到这一点。

我之所以这样推进，是因为有一个极其惊人的事实：从有人开始涂写以来——天知道这有多久，即使有人以为书写是新近发明——，从来没有任何属于主体、并因而属于知识秩序的东西，不能始终铭写在一张纸上。

在我看来，这项经验事实比我们拥有、可能拥有或自以为拥有的三维经验更为根本。因为我们已经学会让这三个维度发生一点动摇；它们只须动摇一点，就会动摇很多。反过来，也许人始终在一张纸上书写，而不需要用立方体替换纸张：这一点至今没有动摇。因此，这里必定存在某种东西；但我并不是说，应当由此断定实在只有二维。

我确实认为，先验感性论的基础必须重新处理。即使只是作为检验，针对主体运用一种二维拓扑学，也至少已经具有下面这项令人安心的优势……

如果我们仍然无比坚定地相信自己的三个维度——事实上，我们确有充分理由依恋这三个维度，因为我们就在其中呼吸……它至少具有一项令人安心的优势：向我们解释，为什么同主体有关的东西属于不可能者的范畴；也解释了为什么经由主体来到我们这里的一切实在内容，首先都铭写在不可能者、已经实现的不可能者的语域中。

主体性切割的纸样从中裁出的那个实在，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实在；每当我们真正试图收紧实在究竟是什么时，就会在我们语言的某种反面重新找到它：实在始终是不可能者。

所以，让我们重新拿起这张纸。这张纸是什么，我们并不知道；但我们知道切割是什么，也知道画出这项切割的人悬挂在切割的效应上。“三千年后，几人会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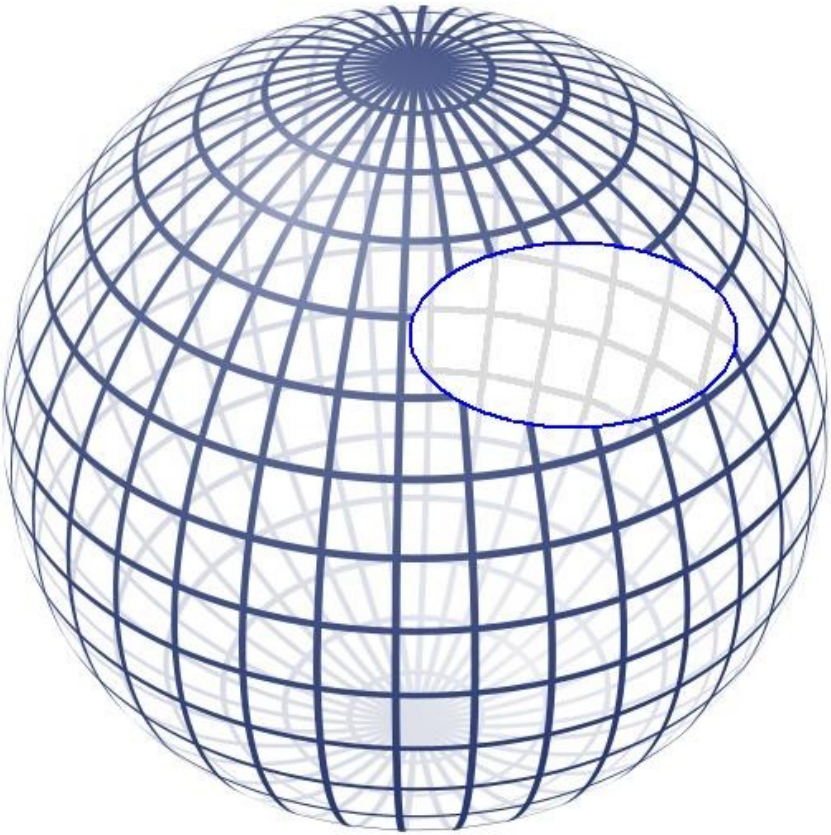
我们必须知道，一张纸——拓扑学所谓的“曲面”——必须满足怎样的条件，才能让我们在上面打出的孔洞成为原因，也就是改变某种东西。

请注意，为了把握孔洞究竟是什么，我们不会再去假定另一个孔洞；这一个已经够了。如果这个孔洞的效应，是令一块坠落物、一片碎片掉下来……那么，留下的东西必须不再相同。因为如果它仍然相同，这恰恰就是所谓一个普通的洞，或一剑砍进水里而毫无结果。

好吧，如果我们信赖最容易接近、最熟悉、最根本的直观支撑——当然，我无意贬低它的历史意义与实际重要性——，也就是球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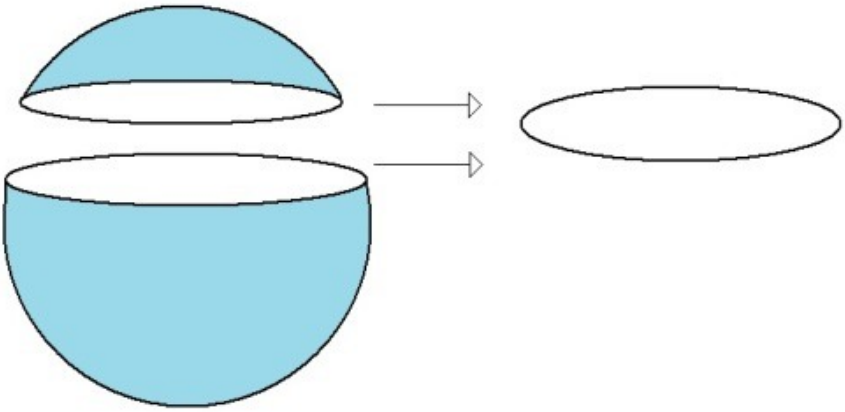
我在这里请求数学家原谅：这里我诉诸直觉，因为我们只有一片在其中切割的曲面；我不需要诉诸某种恰好浸入三维空间的东西……我请你们想象一个球面，只是为了让你们思考：圆周围留下的东西没有另一条边界。

在目前情况下，你们只能把它直观设想成一个球面——一个带孔的球面。





如果思考一下带孔球面是什么，就会发现，它同你们刚才让其掉落的盖子完全相同。球面具有同一种结构。



这项根本描画中的坠落，唯一的效应，就是让刚被切除的东西在同一位置重新出现。对于我们关心的主体，它完全不能让我们构想任何结构性内容。

我必须继续向前，因此只会很快提一句：布劳威尔先生……

他是现代数学发展中的重要人物……曾以拓扑方式证明一项定理。在拓扑学中，唯有这项定理向我们提供“中心”观念的真正基础，也就是一种拓扑同胚：任何两个带有边界的图形，都可以通过边界变形而被证明彼此同胚。

换言之，取一个正方形；它在拓扑学上同这个圆是同一个东西，因为你们只须向正方形内部吹气——如果可以这样表达——，它就会鼓成一个圆。反过来，你们拿锤子敲这个圆——一个二维的圆，因此锤击也是二维的——，它就会变成正方形。

已经得到证明：无论这项变换怎样进行，它至少会留下一个不动点，或者……

更巧妙、也更难立即看出的说法——尽管前一个说法已经不容易——是：留下奇数个不动点。我不会在这里展开。只想告诉你们，在曲面的这个结构层面，可以说，结构是同心的，即使我们从外部经过。直观地说，要感知在这条边界层面彼此接合的东西，涉及的是一种同心结构。

很久以前我就说过——如今我更想这样说，但终究不会说——，帕斯卡是一位非常糟糕的形而上学家。那个“两个无限的世界”、那段几乎从我们出生起就不断烦扰我们的文学文字，在我看来是能够想象到的

最陈腐之物。另一句反亚里士多德式的 τὸπος（topos［套语 / 处所］）——“中心无处不在，圆周无处可寻”——在我看来也最为离题；除非我可以轻易从中推导出帕斯卡的全部焦虑理论。

要这样做会更加容易，因为如果我相信一位数学文献的大读者向我提出的文体观察，他曾请我参看德扎尔格的文本——德扎尔格的文体远胜于帕斯卡——，从而看出德扎尔格的参照对帕斯卡可能具有何等重要的意义；这一点我们从别处也确知无疑，而它会改变帕斯卡著作的全部意义。

无论如何，很清楚，在这种同心球面结构上，如果圆可以无处不在，那么中心肯定无处可寻。换言之，任何人都一眼可见：球面表面没有中心。

帕斯卡直觉的不连贯就在这里。

现在，问题在于知道，是否可能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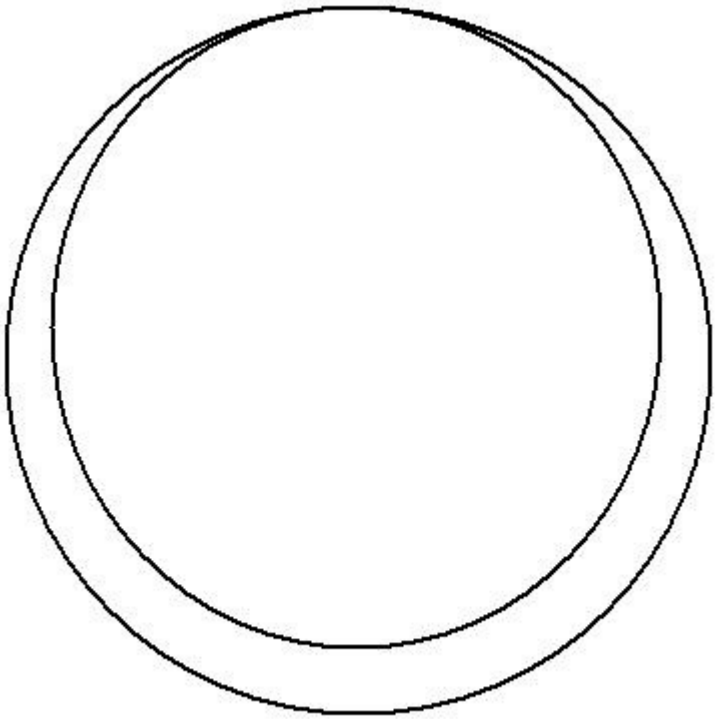
为了不用图像而也许用观念向你们解释，并让你们对我正把你们引向何处形成一个观念……在我非常有意称作“圆”、而不是圆周的东西以外，是否可能存在某种东西？这里的“圆”表示你们在几何学中通常称作圆周的东西；通常所谓的圆，我会像刚才那样称作圆盘或碎片。

外部必须存在什么，才能构造主体？

换言之，要让那项造成对象(a) 坠落的切割显出……

某种此前完全闭合、因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显现的东西……要使主体的构成所要求的内容显现出来，也就是使主体显现为根本上分裂的，必须怎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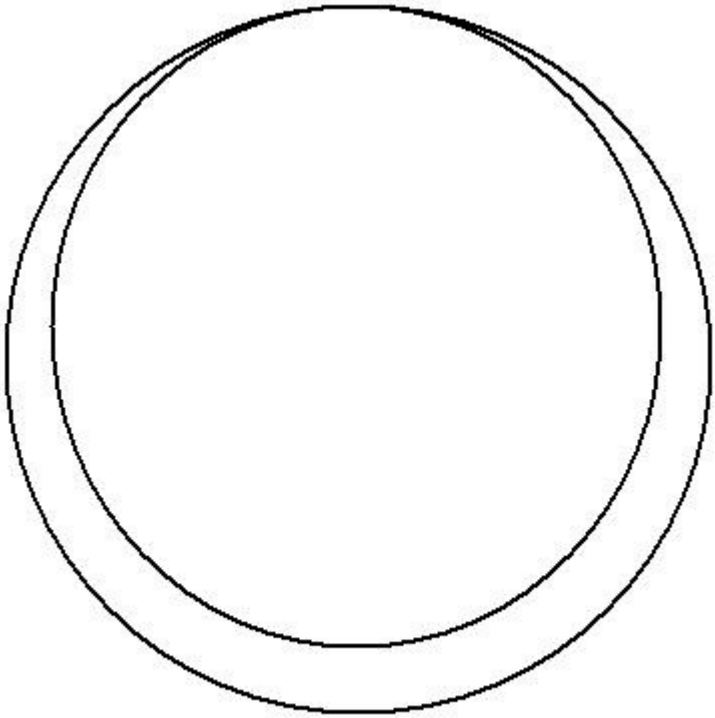
这很容易显现，只须看一看这个圆在我重新画出的图形中怎样布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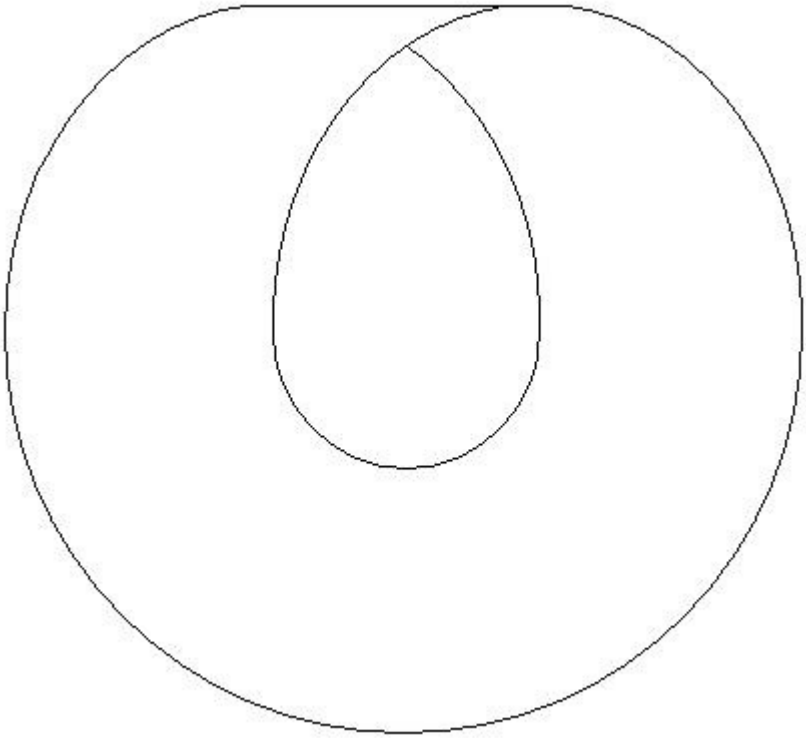
如果你们把这道描画构想为空——正如我教你们把另一道描画读作空——，它就非常简单地变成……

我想，这应该一目了然；我此前已经向你们谈过足够多的莫比乌斯带，你们应当能够认出它……它就是支架、骨架，让你们看见一条莫比乌斯带得到支撑，并且能够立即受到直观把握。

你们在这里看见它：



→



可以说，用一道线把它的两条边各自接合起来。你们会看见它翻转，并在反面层面同最初的正面缝合。

莫比乌斯带有许多性质。其中有一项最重要、最关键的性质，我想，前几年已经向你们充分展示；我甚至亲自在这里拿剪刀证明过：莫比乌斯带没有任何表面，它是一条纯粹的边。

莫比乌斯带这片曲面不仅只有一条边；如果我沿中线把它再次切开，就不再有莫比乌斯带，因为我的切割线、切分的性质才建立了莫比乌斯带。

你们可以从莫比乌斯带上取下任意多的小片；只要带子还剩下任何东西，就始终会有一条莫比乌斯带——但那始终不会是你们手里拿着的那条带子。

莫比乌斯带是一种这样的曲面：画在它中间的切割本身，就是莫比乌斯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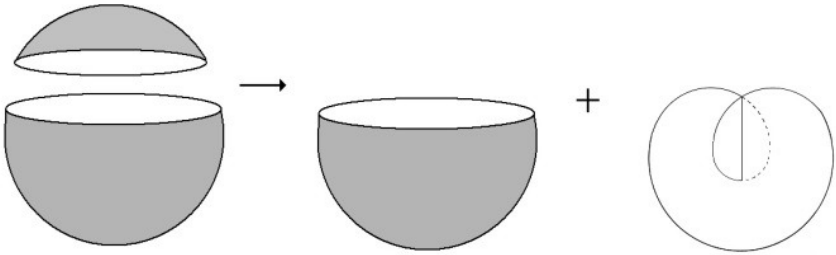
莫比乌斯带在本质上就是切割本身。正是在这一点上，莫比乌斯带能够成为我们的结构支撑，用来说明主体怎样构成为可分的主体。

我现在要推进一种说法，并提醒你们：在严格拓扑学层面，它并不准确。然而，这不会妨碍我们；因为我面对的选择，是要么以不准确的方式向你们解释某种东西，要么完全不解释。

这就是一个可以触及的例子，展示了我们恰恰以之为基础的主体性绝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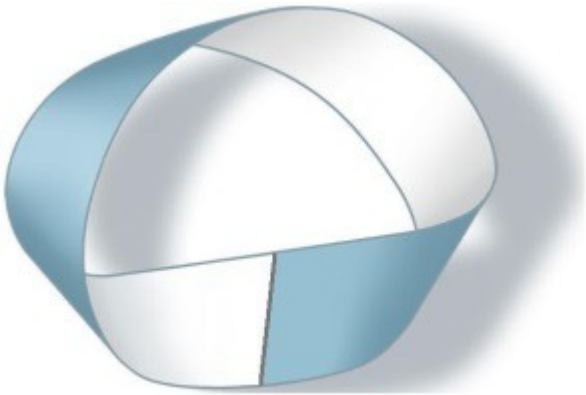
那么——我要向前推进——我已经充分警告你们：按照严格的拓扑学学说，下面的说法并不准确。

你们可以注意我的莫比乌斯带；我指的是在这个对象(a) 支架上画出的莫比乌斯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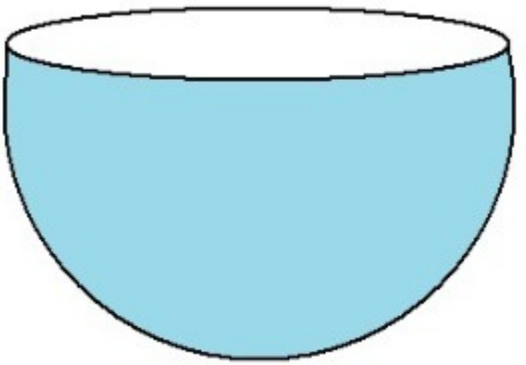


我已经告诉你们，这个支架正是一片球面碎片；它同刚才围绕慈云尊者之孔洞向你们证明的东西毫无区别。要让它能够充当莫比乌斯带的支架，莫比乌斯带在同它焊接时，必然会彻底改变自身作为碎片或小片的性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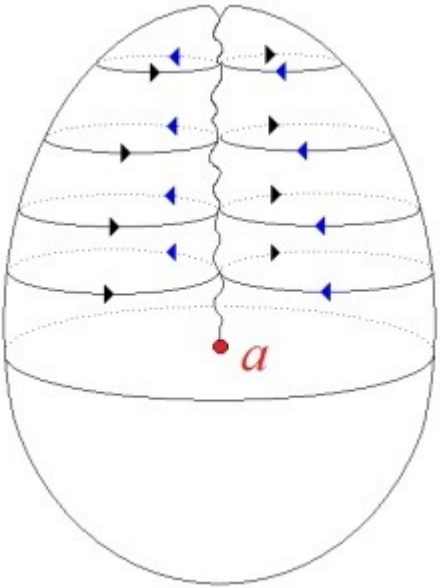
这里涉及的是一项文本、织物、一块布料的连贯组织，涉及某种这样的东西：一项切割的痕迹经过其中以后，会显出两个彼此不同、相互异质的要素；其中一个是莫比乌斯带……



……另一个则是同任何其他球面碎片等价的这片碎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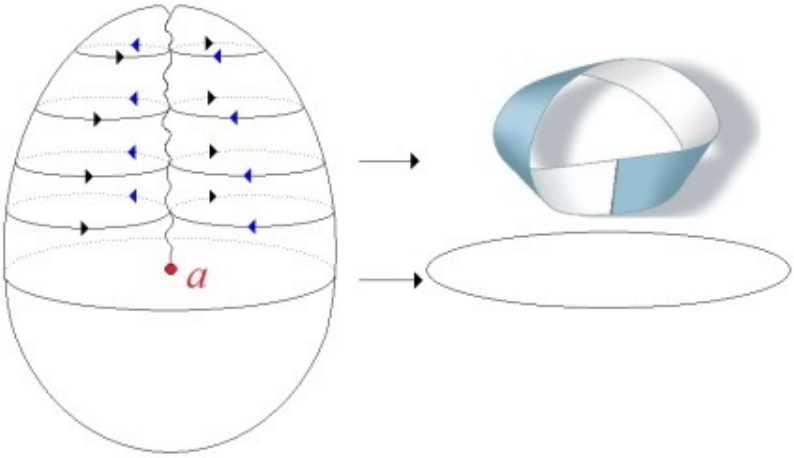


请在想象中让这条莫比乌斯带成形。如果整个东西浸入三维空间，它必然会抵达这条线——我的不准确就在这里。但这个不准确不足以排除下面的问题：某种东西在三维中由一次再次交叉、一次交截加以指示；由此最终得到的完整图形，就是通常所谓“戴着交叉帽的球面”或cross-cap［交叉帽］。这里用红色画出的就是它：



也就是你们可以想象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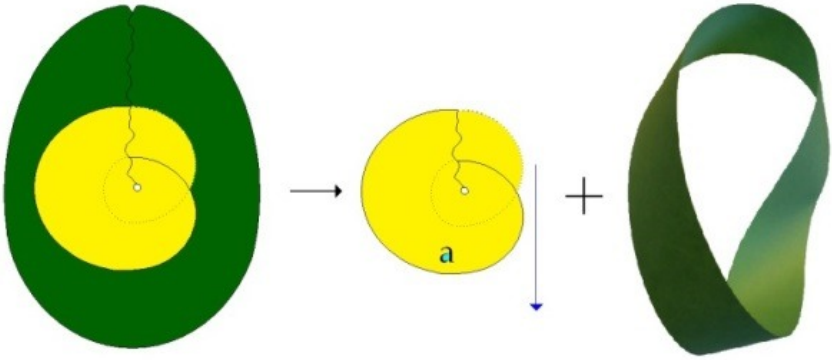
当然，这个想象仍不准确，而且把它浸入第三维……在下方、在这个底部、这个交叉结构和再次交叉的层面，它具有如下截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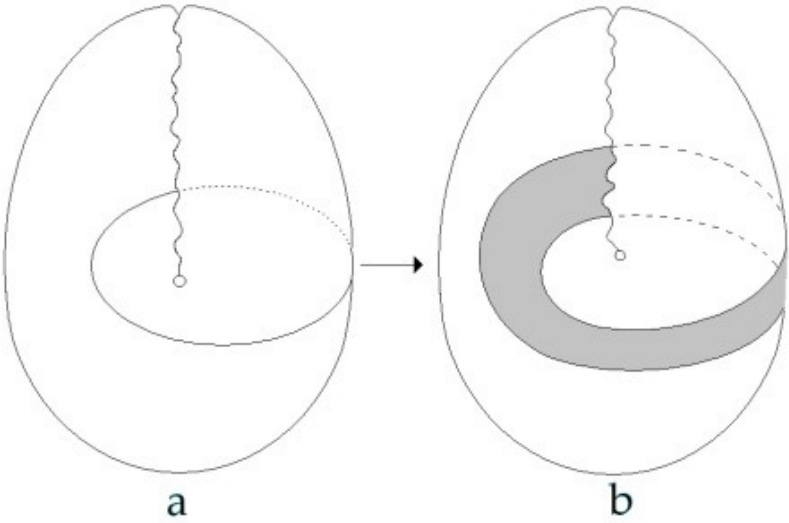
任何经过这道示意为再次交叉之痕迹的切割——任何穿过这个交叉处的闭合切割——都会立即消散　cross-cap、即交叉帽或射影平面的整个结构。

在球面上，无论你们沿表面画出怎样的切割或闭合边界，球面都不会离开自身根本的同心结构；这里则不同，切割会引入一项本质变化，也就是：

- 一条莫比乌斯带出现；
- 另一方面，还出现这片碎片或小片：



可是，我刚才告诉你们，这里画成黑色的线〔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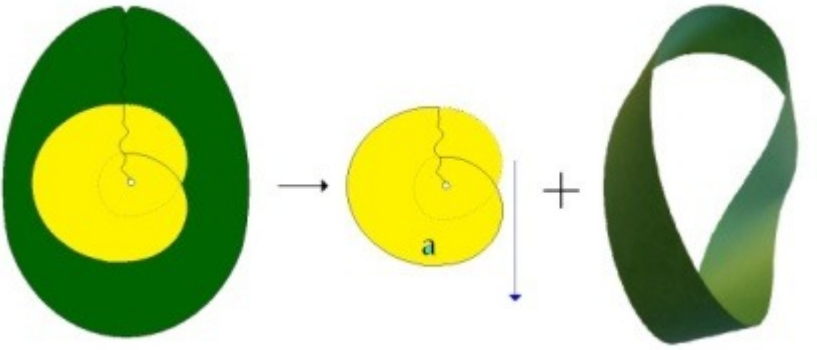


它是一条简单线、一条闭合边界，同慈云尊者图中的线属于同一类型——我刚才说，它把整个曲面还原成这片小片。那么，谜底在哪里？我想你们还记得我刚才说过的东西：切割本身就是一条莫比乌斯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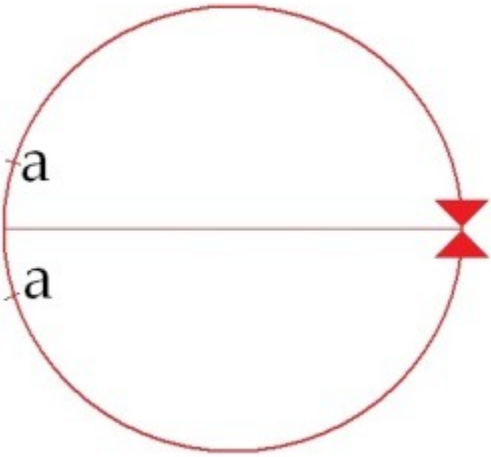
你们可以从我在同一图形旁边画出的第二道线〔b〕看见这一点。整个图形被示意成某种皮囊，我试图借它让你们直观把握射影平面。可以说，如果你们把这里以黑线画出的切割形成的边缘撑开，就会得到一处形如莫比乌斯带的裂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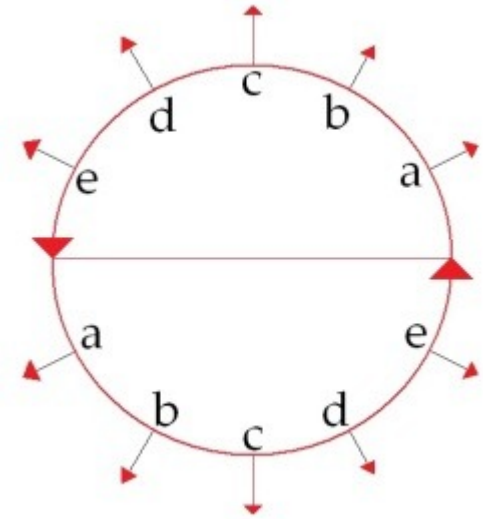
切割本身具有那片名为莫比乌斯带的曲面的结构。你们在这里看见它由剪刀的双线表现；你们同样可以实际剪开，从而把射影平面——或我所说的交叉帽——的整个图形切成两部分：

- 一方面是一条莫比乌斯带〔b〕……这里假定它单独被切了出来；
- 另一方面是一项余数〔a〕；它发挥着孔洞在原初形态下的同一种功能，也就是人在球面上得到的孔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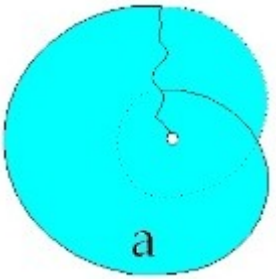
这一点必须作为根本内容来考察。你们还必须看见它的另一幅图：采用示意性更强、拓扑学上更加严格的形式。我已经把它的补充部分画在黑板上，我想你们可以看见：





第一种孔洞：球面式　第二种孔洞：莫比乌斯式

第一种孔洞——我称作同心孔洞的球面孔洞——以某种方式得到缝合。拓扑学向我们揭示：同第一片碎片的功能相连的这种中心形态，根本没有那么同心：



因为，要闭合球面上的孔洞，一道简单切口已经够用；它把两片拉近，就像裁缝替你们作任何普通的缝补一样。

从相反方向来看，由莫比乌斯带建立的切割则蕴含一种次序；我们的第三维其实就在这里。这也证明，我们刚才为了让你们感到这些图形的重量，而引入一个虚假的第三维，是有理由的。

这个次序维度，换言之，是某种时间基底的代表；它意味着，要形成这个孔洞……

我正在向你们解释其拓扑性质的第二种孔洞……必须有一种次序，也就是对径次序。“对径”表面上属于空间，依照中线建立；中线给你们提供一项图示支撑，而我们恰恰在其中读出：这种切割正是我们期待的切割，因为它只有在同时不得不分割自身的条件下才能实现。

换言之，如果你们不用直觉与视觉，而试着用心智来构想这里所涉及的结构，那么从你们想到这个圆上的 a 点同其对径相反的 a 点彼此同一的那一刻起……

这正是德扎尔格在一个完全不同的背景——度量几何——中引入的东西的定义，也就是射影平面的定义。天知道，德扎尔格亲自写下它时，怎样强调过这种构想何等悖谬、骇人而令人发疯。这确实证明，数学家完全能够亲自构想自己的越界点和跨越点；每当他们建立某个结构范畴时，这些点就会出现。

况且，即使他们忘记，总会有同行提醒他们，说人们根本听不懂他们的话——这每次都会发生，德扎尔格的遭遇尤其如此[注7]：里昂的墙上贴满了相互辱骂的檄文，而争论的正是你们看见的这些引人入胜的事情。好时光，奇妙的时代！……两个 a 是同一个〔……〕。这意味着什么？即使我们把这里视作孔洞，两条边的接合也只能通过分割孔洞、在接合运动中从孔洞中穿过而实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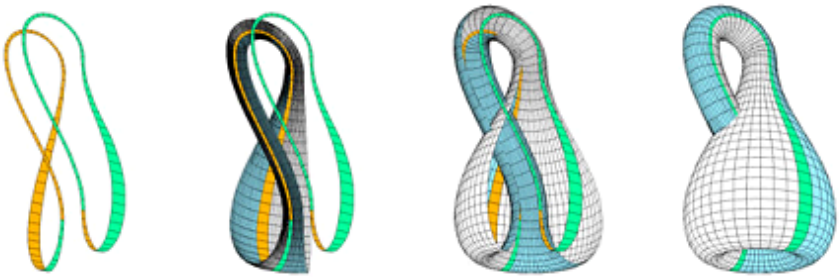
> [注7] 吉拉尔·德扎尔格（1591—1661）。参见《德佩尔农先生的脓肿，由他的一位朋友刺破》，Gallica 所藏第一卷与第二卷。

所以，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主体由切割规定时所采取的模型：主体必然在结构本身中呈现为分裂的主体。当然，今天我无法把你们带到自己

希望抵达的更远位置。你们只须知道，我们还会参照另外两种拓扑结构，分别是：

- 克莱因瓶。正如我已经展示过的，它由两条莫比乌斯带缝合在一起构成。你们会看到，仅凭简单相加，完全不足以让我们从中推导出它的性质。

相关知识卡 克莱因瓶的拓扑性质



- 另一方面则是环面，它又是另一种结构。

从这些有关 S 的初步定义出发，我们可以构想，克莱因瓶与环面这另外两种结构能够怎样帮助我们建立若干根本关系。借助这些关系，我们将以前所未有的严谨度进行定位；普通语言从来无法取得这种严谨，因为它最终会把主体存在物化——这正是问题真正的结与钥匙。

每当我们谈论某种名为主体的东西，就会把它变成一个“一”；可是，真正有待构想的恰恰是：主体之名意味着，缺少那个用来指称主体的“一”。

什么替代了它？什么前来“发挥”这个“一”的功能？

当然是多种东西。

但是，如果看不见极为不同的多种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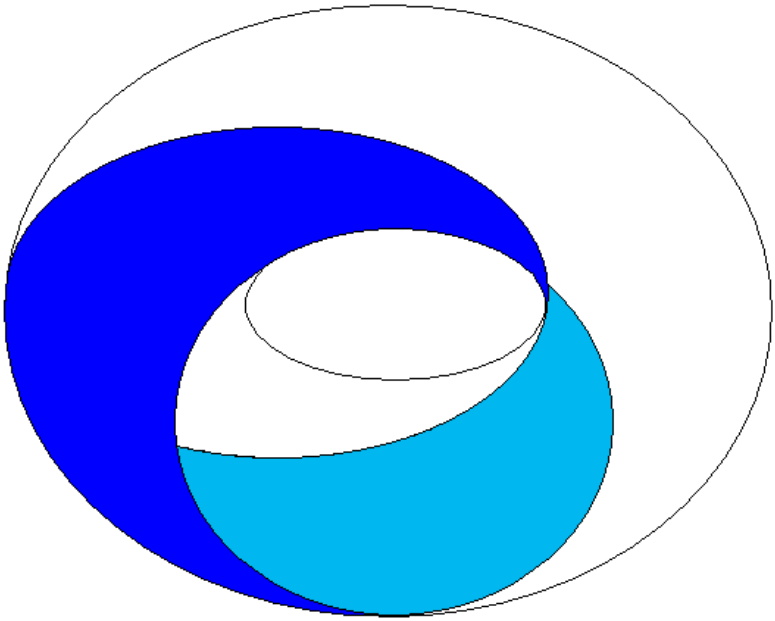
- 例如，一边是对象(a)；
- 另一边是专名……它们发挥着同一种功能，那么很显然，人就无法理解：
- 它们彼此有何区分——因为人一旦发现它们发挥同一种功能，就会以为它们是同一种东西；
- 也无法理解它们发挥同一种功能这项事实本身。

问题在于知道，这个 S、这个作为分裂者的主体究竟位于哪里、在哪里得到表述。

首先是环面。这个图形具有如此突出的示范性，以至早在我讲授《认同》研讨班（1961—1962）的那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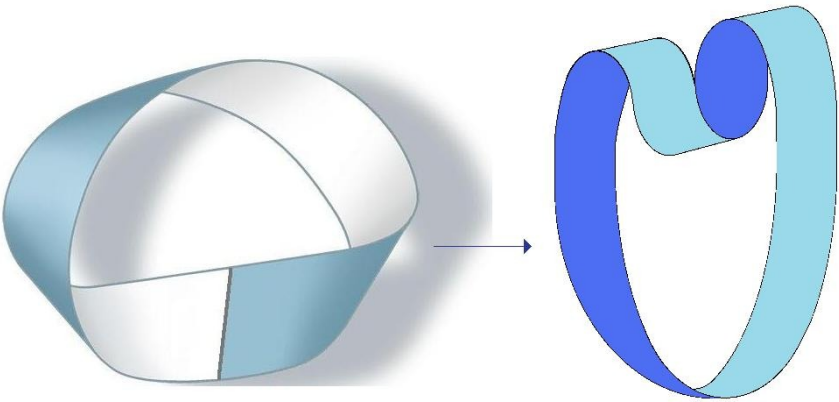
除了那一年新近来到的几双耳朵以外，没有人听我正在说什么；他们有其他事情操心……我已经在《认同》研讨班中展示：环面怎样具有示范价值，使索求功能与严格说来欲望的功能，在弗洛伊德发现的层面——也就是在神经症者与无意识的层面——以一种能够在结构上确立为学说的方式彼此系结。你们会看见它怎样发挥示范作用。

可以从主体那里构造出来的一切，在结构上都完全连着一种变换可能：从环面结构过渡到莫比乌斯带结构——不是主体那条真正的莫比乌斯带，而是遭到切分的莫比乌斯带：



它一旦沿中间切开，就不再是莫比乌斯带，而成为一个拥有两面——正面与反面——的东西。它以一种古怪方式缠绕自身，却又……

正如我今天带来模型，让你们能够以可感方式看见它。





……它可以贴合到通常所谓环、而在这里其实是环面的东西上。

这项结构连接让我们能够格外清楚而明显地表述某些关系；要界定主体、索求和欲望彼此之间的关系，这些关系必定是根本性的。

同样，只有在克莱因瓶层面，才能界定这样一种原初关系：从言说与真理维度开始在语言中发挥作用的那一刻起，它便得到建立。

相关知识卡 克莱因瓶的拓扑性质

借助克莱因瓶，我们可以说明主体同大他者场所之间的不对称接合。

相关知识卡 克莱因瓶的拓扑性质

我就以这些简单指示把你们留在这里；我们约在一月第一个星期三再见。

至于本月第四个星期三，我恳请在场每一个以任何方式关心我在这里试图推进之工作的人，愿意……

无论我最后怎样处理他填写的信息表，也就是无论我是否邀请他参加第四个星期三的课程……都请他认为，自己得到或没有得到邀请，并不是因为他的功绩或过失。

他们得到或没有得到邀请，所依据的理由同柏拉图[注8]为政治功能所作的界定一样；这项界定同政治毫无关系，倒更应该被理解为织工的功能。

> [注8] 柏拉图：《政治家篇》，279c。

如果那一天为了织出某种纹理，我需要一些这种颜色的线和另一些另一种颜色的线，请让我自己挑选线〔原文如此〕。

今年，我会把每月第四个星期三当作实验，采用这种方式；我的全部听众都应当把这件事在某种意义上交给我裁量。听众越忠实，越真正关心我所说的东西，就越应该如此。

所以，下一个第四个星期三，请你们让我邀请自己认为适合的人；这样，当天要发挥作用的主题——给定的讨论与对话主题——才能在最佳条件下展开，也就是同我明确挑选的对话者一起展开。

没有参加那个星期三课程的人，完全不必因此介意。

第4课 · 1965年12月22日

格林 孔泰 梅尔曼

[开场部分缺失]

安德烈·格林

谈论精神分析的对象，立刻就会提出一个问题。它促使我们追问：

- 我们是否要在谈论一门科学之对象的意义上讨论精神分析的对象，即科学进展所指向的东西；
- 还是要谈论精神分析所构想的对象之地位。

令人意外之处，将在于表明这两种意义彼此紧密关联、相互依存。

利特雷指出：

- 在“主体”这一词条下，法兰西学院说：“自然物体是物理学的主体。”
- 而在“对象”这一词条下，它又说：“自然物体是物理学的对象。”

我们绝不会从中识别出一种自相矛盾、或太容易被化约的重复。

我们也不会挥舞着这个例子，加入那些人的合唱，把传统思想所应负责的一切理论困境都归咎于主体与对象的分离。

一开始便碰到主体与对象彼此相系的命运，既不是断言它们的混同，也不是断言它们的独立；而是预料我们将不得不面对下列对峙：

- 同一与差异，
- 结合与分离，
- 缝合与切割。

于是我们将不得不追问：精神分析的对象——我现在说的是它所指向的东西——是否可以满足于这种成对的限定，而许多最先进的当代学科正把自己局限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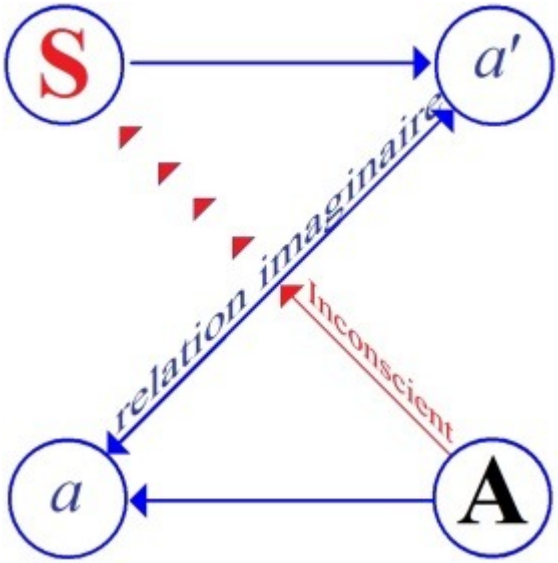
I 雅克·拉康的对象：简要回顾

考察对象(a)在雅克·拉康理论中的作用，对我们而言将是一举两得。

这将使我们——至少这是我们的计划——一方面在它自身的概念框架中明确其内容，另一方面标出这一思想、并且无疑也是全部精神分析思想，与现代结构主义相契合的限度。

A) (a)：主体通向大他者的中介

(a)——我还没有说对象(a)——早在拉康最早的图式[2]中就已出现；拉康在这里从《镜像阶段》（1936—1949）所提出的理论化出发。



这时，(a)可以从它同(a')的关系来理解；后者将同后来的i(a)——即镜像——有最密切的关系，并充当把主体同大他者联结起来的不可或缺的中介要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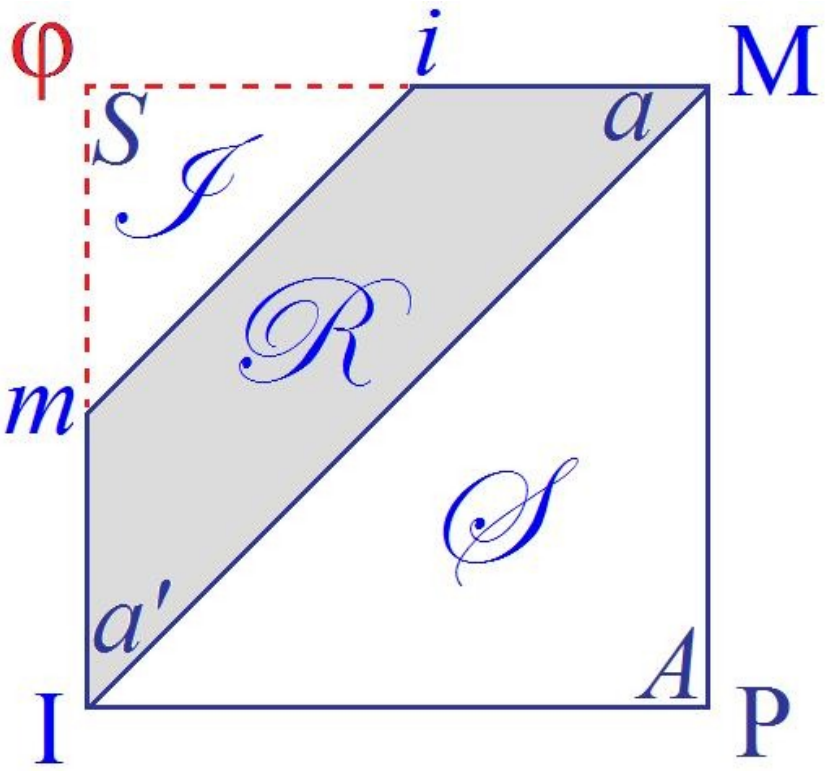
显然，镜像阶段这一情境，与其作为一个阶段来断定其年代，不如作为一种结构化情境来指认；而要理解它，就必须明确，这里所涉及的不是心理学——无论是普莱尔还是瓦隆的心理学——而是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赋予由母亲所生的孩子一种压在他整个发展过程之上的意指：也就是说，他是母亲所缺失的阴茎的替代物[原文如此]；他只有在那个母亲所缺之处占据位置，才取得主体地位，而他又依赖于这位母亲。

这一替代物是母亲与父亲之间交换的场所与纽带；父亲虽有阴茎，却不能因此创造它，正因为他已经有它。(a) – i(a)的关系将复写我们刚才描述的关系。

B) (a)：主体通向自我理想的中介

接着出现的是被称为图式R的四边形[3]。



这里再次对置着两套张力：欲望系统（i M）与认同系统（m I）。

(a)被写在i　M这条线上；这条线从主体S走向原初对象M——母亲，并通过想象性小他者的诸种形象而构成。

相反，(a')被写在从主体出发、经由自我的镜像形式而走向自我理想的线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四边形如何由Z形[图式L]派生而来：它把那些在第一个图式里只能通过迂回路径抵达的点连接起来。

这里可以指出，在想象界的场域中，主体的两个方向或者朝向对象，或者朝向理想。

我们知道，在弗洛伊德思想中，这一取向紧密依赖于自恋。

于是应当注意：来到父之名位置的大他者，仅仅位于象征界的场域，并处于主体——这里与阳具相同——的对极；主体只能经由我们刚才描述的两条道路，即对象性道路或自恋性道路抵达大他者，而绝不可能直接抵达。

实在界的场域包含在m I与i M这两对张力之中，而我们已经明确了它们的意指。

但是，只有在象征界的场域中，结构化这一过程所不可或缺的第三项才会出现[4]。

C) (a)：欲望的对象

事实上，拉康设定了一个理想自我的存在，它是自我早期认同于某些对象的形式；这些对象既充当爱的对象，又充当认同的对象，但其条件是：它们从一个使欠缺显现出来的系列中被扯下、切出、截取。拉

康说：正在说话的我，把你认同于你自身所缺的对象。于是，(a)与A之间的关系就被更清楚地表明了。

如果A只有由父之名支撑才获得其全部意指——必须说明，父之名既不是一个名字，也不是一位神——那么，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要经过母亲这一隘口；并且只有当主体与母性对象之间的切割不可挽回地把主体同该对象分开时，才能抵达A。

或者说，当原初对象所受的欠缺在阉割经验中显露出来时，才能抵达A。

弗洛伊德设定的一系列阉割——断奶、括约肌训练、严格意义上的阉割——使这一经验在重复与回返中成为具有意指作用并起结构化作用的经验。

因此，对象(a)将是从这些经验中坠落之物——用拉康的话说，它从其作为大他者场域中的指数的位置[5]坠落——但正是为了取得欲望对象的地位。为这种取得所付的代价，是把欲望主体排除在对欲望对象的言说和命名之外。对象曾被安置在大他者场域，这一点如今使我们能够理解这种对象的中介功能：与其说它处在主体与大他者之间，不如说它作用于二者的关系之中。

我的欲望进入大他者；它在那里自亘古以来就以“我所是的对象”这一形式被等待，而这个对象把我逐出我的主体性，因为它概括了这主体性所依附的一切能指[6]。

我们知道，幻想使这一关系公式得以确立，因为幻想在抹去主体痕迹的同时又把主体揭示出来。幻想作为主体的构成性结构——主体以凹

痕的方式印在其中，迷惑作用由此发生——开启了对象(a)同理想自我的关系。

D) (a)：恋物

这一表述指出了拉康的理论化同其他作者的理论化之间全部的距离。概括地说，其他作者主要强调对象品质的积极面向，而拉康则突出否定性的进路。

一个清楚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面对阳具母亲的形象，后弗洛伊德派作者会说，她之所以令人恐怖，是因为她具有阳具；因为阳具可以是加害工具、毁灭性武器等等。

弗洛伊德则说，美杜莎头像产生的惊骇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那些充当她头发的爬虫，蛇有多少条，就把阉割否认多少次；而借由这一翻转，阉割又以倍增的方式向那个想把它取消的人重现。

拉康更愿意沿着后面这条道路走。他后来会长篇返回的恋物癖案例，是这种反身模式的寓言。恋物对象将成为被阉割之性器的见证与面纱——也就是大他者场域中欠缺的见证与面纱。

E) (a)：欠缺的对象、欲望的原因

在谈到关于《会饮》的研讨班[7]时，对象(a)的转喻性与隐喻性结构格外有力地显现出来：雅克·拉康在柏拉图文本中标出了阿伽尔玛的特殊位置；在阿尔西比亚德的演说里，他这样描绘苏格拉底：“他酷似雕塑作坊里竖着的西勒诺斯像，艺术家把它们刻成手持芦笛或长笛的模样；从中间打开它们，就会看见里面装着诸神的小像。”

我们在这里同时面对身体的碎片、身体的一部分及其象征化；而这一点必须按字面来理解，即以神像小雕像的形式来理解。

恰恰因为这一对象(a)将作为欠缺的对象涌现，它才会在双重层面上展开：既揭示大他者的欠缺，又揭示欠缺在意指过程中出现的方式。

大他者所缺的，正是无法被构想之物。这里以“不出现之物”的形式引入的（−φ），就是不可形象化的无；与阉割这一不可思之物的相遇正依此而排列。其裂隙在能指化过程中由知识的幻象所填补。

我再引一段：“(a)象征着这样一种东西：它作为已经失落之物，在能指的领域中又从能指化里失落。抵抗这一损失的，是被指明的主体。

知识过程一旦介入，一旦‘它被知道’，就会有某种东西失落。”

正是这种以欠缺的对象形式出现的东西，规定了我们的报告将围绕什么旋转，即(a)不可镜像化的性质。仿佛被划杠的主体取得了i(a)的功能——拉康如此表述——又仿佛主体把欠缺不可能被镜像化这一点短路掉，因而认同于知识，来到促使知识被提升的那一损失的位置，以至覆盖这损失，直至遗忘它的存在。

从欠缺的这种显现开始，由大他者的欲望所产生的剩余功能便开始运作；这一功能表现为从划杠大他者的横杠上脱落的残余，而它在主体中的同源项则使主体同知识发生关联。

拉康在这里再次作出一个逻辑层面的区分：归零并不消除仍然拥有之物，而这恰恰使剩余显现。剩余功能就是从压在主体身上的威胁中获

救之物："欲望是在一个问题的道路上建构起来的：不成为。"对象(a)是欲望的原因。

F) (a)：劳动的产物

虽然拉康没有明说，但我们可以认为，进展—退行这一维度可以构成一个与结合—分离、缝合—切割诸平面相关联的平面。

知识层面产生的各种发展，必须从其否定性透视中来把握：它们把我们送回误认的层面，而它们正是在能指化过程的进程中在那里组织起来……

这一过程不断趋向于取消对象的损失，或使之归零……它又把我们送回围绕这一损失而被意指的东西，送回这一劳动所留下的痕迹；其中，对象(a)将是最可靠的标记，是指向主体的真理之指标。

弗洛伊德在晚期著作中强调，分析家的"建构"所指向的是历史真理。

索求的渠道构成抵达这一真理的导线。

它的功能不只是充当向导，还要勾画出这条真理道路本身的路线图。

这番回顾只保留了下文展开所不可或缺的最低限度内容；它使我们能够提出若干问题：

1）鉴于对象(a)同表象的关系，我们应当追问表象与能指链之间有何关系。被表象出来的欠缺，同作为串接的言语是否有某种关系？

2）转向弗洛伊德时，是否应当只把能指的地位赋予表象代表（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那么，情感又如何？

3）在弗洛伊德著作中，关于表象是否有一点未曾在拉康那里得到回应：即不同表象类型之间的区分（例如词表象与物表象）？这一点或许会使我们进一步作出区分，从而突出弗洛伊德式串接的独特性质。

4）如果知识是在对象失落之后来到真理位置的东西，那么是否应当通过这项损失的痕迹及抹除这些痕迹的尝试，把二者联系起来？

这些问题将使我们不再主要把对象(a)视为部分对象的载体，而更多把它视为一只留下踪迹之手所走过的路径——铭写、字母、a。

II 能指的缝合、其表象与对象(a)

现在我转向报告的另一条轴线，即(a)同切割及缝合的关系；我将参考雅克-阿兰·米勒的报告，他从弗雷格的著作出发，对能指的逻辑作了理论化[8]。

这是为了准确定位数0的位置，因为它将影响(a)的命运。

按照如下原则：为了保全真理，每个事物都与自身同一；而0是被指派给“不与自身同一”这一概念的数，所以没有任何对象落在这一概念之下。

但是，米勒在谈到弗雷格时说：“为了排除一切对实在的指涉，有必要在概念层面唤起一个不与自身同一的对象——随后又把它逐出真理的维度。写在数的位置上的0完成了对这一对象的排除。至于那个由归摄勾勒出来、而对象在其中缺席的位置，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写在那里；

若必须在那里划出一个0，也只是为了以此标示一处空白，使欠缺可见。”

因此，这里一方面有对不与自身同一之对象的唤起与排除，另一方面有被归摄对象所在位置上的这一空白、这一洞。

单位这一概念由同一性概念——即被归摄对象的概念——所给出。

但1的位置，不再作为单位而是作为数1的位置，就其首位性、就其原初性而言仍有问题——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米勒指出，把数0算作什么都不算并不合法；于是逻辑要求我们把第一对象的角色赋予数0。

其结果是：数0这一概念与数0对象——就它是一个对象而言——相同一，并将其归摄。

归根结底，原初性不能在单位的标志下建立，而只能从使1成为可能的那个数——数0——开始建立。因此，为了理解数0的暧昧性，必须把它所包含的双重层面展开：

- 不与自身同一这一概念的层面；
- 对象的层面：它是“一”的母型，是使数1得以被指派的对象。

于是，双重操作显露出来：

- 唤起并省略不与自身同一之物，在被归摄对象的层面留下一处空白，使数0成为可能；
- 引入作为数的0，也就是说，把它作为能指之名和对象引入。

这一情形之所以对我们格外重要，是因为它规定了串接的结构。主体不仅正因把能指链构成为串接结构中的主体，而把自己排除在场景和能指链之外；而且，这些对象中的第一个同时作为概念与对象运作：它没有被表象，却被命名为一元对象；它也是关于不与自身同一的概念、威胁真理的概念，尤其因为它处在局外，或处在“我”之外。

对我们来说，这一威胁真理的概念源自同真理的相遇，因为它不仅把真理同其显现——与自身同一——分开，还用使真理否定化的空白或痕迹指明其位置。

若只把它看作一种单纯的缺席关系，那是不够的。还必须在这里圈定它同真理之欠缺的关系。我们之所以对这场同“由米勒所读的弗雷格”的对质感兴趣，是为了把主体同能指联结起来。

主体认同于那种支配着每一次操作的重复；串接正通过这些操作打结，每个碎片都被它之前和之后的碎片所接住。与此同时、在同一运动中，主体一次次发现自己被逐出如此构成的场景——也被逐出这条链。可是，如果这一操作在每一步都排除主体，归零却并不消除对我们而言仍然存留的“拥有”，条件是我们懂得在(a)的形式之下认出它。

相关知识卡 雅克-阿兰・米勒《缝合》与零—一序列

串接的效应与拉康对能指的定义汇合：

> “能指是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一个主体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拉康的主体定义：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 ・ 雅克-阿兰・米勒《缝合》与零—一序列

由此，主体与对象(α)在其缝合和切割关系中的关联便得到照明。米勒说：“如果数列作为零的转喻始于零的隐喻；如果作为数列之一项的0，就其作为数而言，只是那种缺席（绝对之零）的缝合性替身，而这缺席在链条之下传递，循着表象与排除交替的运动前行，那么，有什么能阻止我们在零与数列的关系得到复原之后，从中认出主体同能指链所维持的关系之最基本衔接？”

相关知识卡 拉康的主体定义：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 · 雅克-阿兰·米勒《缝合》与零—一序列

我暂且搁置主体借零的效应同大他者发生关系的问题[9]，而着手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缝合问题，另一个是表象问题。

A) 缝合问题

勒克莱尔反对米勒由此推导出的缝合。问题仍然存在：究竟有没有缝合？

精神分析家面对真理的位置，难道不恰恰由这种无须缝合的特权所规定吗？

既然有串接，怎能否认其中没有缝合？

我愿以弗洛伊德那个经常遭到遗忘的、关于阉割后果的论证为证。

如果阉割是可能的，如果威胁得以执行，它不仅剥夺主体手淫的快感，而且带来一个令其极度恐惧的含义：从此以后，被阉割的主体将永远不可能同母亲结合。

如果把这里的阉割看作整个能指系统因一切串接可能性断裂而崩塌，就可以解释弗洛伊德为何把它比作一场损失不可估量的灾难。

无论如何，阴茎在这里充当切割与缝合的中介。

它怎样才能被缝合起来？

雅克-阿兰·米勒——我刚才说过——展示了数0的上升、它以1的形式越过横杠，以及当n过渡到作为n + 1的n'时它的消隐。不过，强调"无意识概念"的逻辑具有内在于其形成的要求，也并非没有道理。

让我们随勒克莱尔在这里引用弗洛伊德："粪便""孩子""阴茎"就这样组成一个统一体、一个无意识概念——请容许我这样说——也就是一个能够从自己的身体分离出去的"小东西"这一概念（第七节）。

这里，用一种三项操作过程取代了二元式对立——也就是语言学提供给我们的对立……

无论是音系学中的对立——其关系总以对抗性的对子来设定——还是一切信息理论作为基础的对立……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三项操作过程：n、+、n'，其中一项刚一显现便随即消隐。

我们在这里找到了一种范式，它可以为我们指明所指可能如何被切分。

事实上，语言学家在涉及所指的切分时显得极为窘迫，而对能指的切分在他们看来似乎没有任何困难。例如，若我相信马丁内的话，我读到："至于'语义的'这个词，即使它已经获得我们所关心的含义，它毕竟源自一个词根；这个词根唤起的并非某种心理现实，而是意指过

程，而后者牵涉能指与所指的结合……无论如何，一个义素不可能是别的东西，只能是一个双面的单位[10]。”

这里的窘迫源于：任何对所指的直接指涉都会摧毁结构主义的进路，因为经由能指抵达所指，创造了一条间接、相对且相关地把握它所必需的迂回道路。

此外，尤其重要的是，相关特征的定位使我们陷入困惑。归根结底，这里缺少坚实支撑的是身体的结构。音系学中那些相关特征之所以能够被确信为稳固，难道最终不正是依靠发声器官的运作吗？它当然受神经控制，而这解释了语言学家对控制论的迷恋。

精神分析家是这里唯一在意义自身的层面倾听意义的人：也就是说，在尊重同一种间接指涉要求的同时，他认为切分将在所指层面发生，而正是这种切分将蕴含对能指的切分，后者使所指变得可理解。

这里显出了一个必须澄清的暧昧：语言学的能指观念，与拉康所构想的精神分析式表述之间的暧昧。但它们谈的是同一个东西吗？

你们无疑已经在这一双面单位中认出了拉康关于莫比乌斯带的理论化[11]。

可是，我们难道不能认为，在不同部分对象组成的这一转喻系列中，所指的切分由阳具来代表吗？恰恰因为阳具在其不同的部分对象中以（−φ）的形式出现，而这些对象的历时相继关系你们已很熟悉：口腔对象、肛门对象、阳具对象等等；这些术语只依性感带标示它们的位置，同时还给更复杂的形式留下空间。

这或许可以调和如下两种体系之间的选择：一种是严格的二元体系，它把我们送回那些不允许第三项中介的选项；另一种是因果性以网络方式展开的网状体系，它使一切对立式运作消失。归根结底，这种网状结构的最小形式看来就是三角结构，其中第三项是消隐的。

我认为，这正是米勒的评论所阐明的操作。

这可以使我们想到在俄狄浦斯中所面对的各种关系形式：性别差异这一对立，以阳具为支撑，实际上被置入一个三角体系；它只能经由两两关系来把握，而阳具构成交换的尺度和原因。

索绪尔的功绩，是把价值置于作为系统的语言之原则上，并在此处勾勒了同政治经济学的比较。但他把价值这样分离出来之后，并没有再向前走，也没有提出什么对说话主体具有价值的问题。

于是，缝合在这里完成，同时让作为原因的价值隐约显出，却没有向我们说出关于它的任何东西。

我们正是在这里遇到雅克·拉康所展开的原因功能。

如果在弗雷格那里，与自身同一使从物到对象的过渡成为可能，我们难道不能设想，刚才所展示的东西可以作为对象与原因的关系来运作吗？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对象是能够把物与原因这两项联系起来的能指关系。

这里或许有一个例子，属于弗洛伊德那篇如今受到质疑的、论原始词语反义意义的文章所讨论的类型；因为我们知道，物（chose）与原因

（cause）有共同词根，而中介在这里经由对象发生。总之，我们将见证如下过渡：

- 从“未规定之物”到“存在或起作用之物的状态”；
- 从“事实上存在之物”到“属于理由、根据或动机秩序之物”，而中介则是对象，因为对象的定义是：“呈现于视觉或作用于感官之物”[12]。

B) 表象问题

于是，这里提出了我们的第二个问题，即表象问题。

我原本觉得，米勒几乎没有给弗雷格所使用的全部表象指涉留下位置。不过，在上面引用的段落中，他保留了表象与排除交替运动这一观念。

聚集、归摄的功能，同一种把事物集合起来的力量这一观念不可分；这种力量以一次切割为代价——即把聚集的力量同所呈现之物切开——而进行再现。正是切割使表象成为可能。

而数0在这里作为没有任何表象落在其下的对象出现。正是通过切割这一操作，主体得以到来、得以完成；我会说，它是在对象的背上、以对象为代价完成的。

仿佛我们可以说：既然对象(a)的缝合仍在，那么（主体的）切割又有什么关系？这正是欲望对对象的牺牲所实现的，姑且这样说吧。只要欲望在对象失落之后仍然存续、仍然绵延，对象的失落又有什么关系？

这里还仿佛存在一种“对象已死，欲望（大他者的欲望）万岁”的秩序。万一欲望本身趋于欠缺，索求就成为保证欲望一再复活之物；它经由对象(a)得到表述。

没有任何原因支撑的索求——原因的效应是那个洞；若没有这个洞，剩余便会同索求混同——波洛涅斯不正是这样看待那个疯子、弄臣、爱上自己女儿的疯子哈姆雷特吗？这位死去父亲的迟疑复仇者，在一场“悲剧性的误认”之后，又将杀死另一个父亲，即其欲望对象的父亲（波洛涅斯）：

“我已找到了哈姆雷特疯狂的真正原因。

我会长话短说。您高贵的儿子疯了；

我说他疯了，因为若要定义真正的疯狂，

除了说它就是疯狂，还能是什么？”

又在后面：

“让我们找出这一结果的原因，

或者不如说，这一缺陷的原因，

因为这一有缺陷的结果由原因而来。

事情就这样留下，而剩余则这样——细想吧。”

III (a)与i(a)的关系，以及表象与镜像化的问题

拉康有力地强调，对象(a)不可被镜像化；诉诸镜像，所得既不是对象的形象，也不是表象的形象。拉康在关于《认同》的研讨班（1962）中说，那是另一个对象，而不是同一个对象。

它被纳入一种关系的框架，在其中起作用的是自恋辩证法；这辩证法的界限是阳具，而阳具在其中以欠缺的形式运作。我们刚才已经看到数0所代表的那个不可形象化的对象。

那么，在弗洛伊德那里情形如何？

如果只从自恋辩证法的角度考察问题，我认为就会把指向驱力对象的表象问题短路掉。弗洛伊德把驱力对象称为极其可替代、可互换的；这或许可以被看作对无法逃离内部刺激的一种补偿——我会说，这是一种介于限制交换与一般化交换之间的程序。一个驱力对象必须作为被交换项参与这种交换，因此在替代中，并非任何对象都能胜任。

这里向我们提出两个问题：

- 第一个是驱力代表与情感之间的区分；
- 第二个是表象方式的差异性分布。

A) 驱力代表与情感之间的区分问题

我们知道，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代表与情感之间的区分带有推测性。驱力经常同代表混同，反之亦然。

但是我们知道，到其著作晚期，一种越来越鲜明的区分被建立起来；我建议考虑的正是这一点：情感取得能指的地位。

证据是，从1924年起，Verleugnung[？]这一术语——有人提议把它译作拒认——的用法越来越明确。它将在《恋物癖》（1927）一文中得到最精确的表述，而拉康频繁参照这篇文章；随后还有《自我的裂分》（1938）以及《精神分析纲要》（1939）第八章。

于是弗洛伊德的论点变成：知觉受Verleugnung（拒认）作用，而情感受Verdrängung（压抑）作用。在接受—拒绝这一二择中，既可能是整体运作，也可能只涉及其中一项（知觉或情感）；这种可能性，是某些冲突性组织得以被差异化缝合的条件。

正是在这里，正是从这一区分出发，弗洛伊德看到了拉康所强调的自我裂分——Entzweiung。

而如果弗洛伊德创造了一个与压抑等值、具有同样语义价值的术语——拒认——那么大概就必须得出结论：如果只有一个能指能遭受这种命运，那是因为情感也进入同一范畴[13]。

我甚至认为，根据上文补充能指的定义或许会有所助益：能指将是这样一种东西——若不进入一个转换系统，它就会消隐；为了存续，它必须在这个系统里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一个主体，而另一个能指则受到压抑或拒认之横杠的作用。这条横杠迫使能指在其同真理的关系中从存在地位坠落；又正是通过这一坠落，它才在其复活中取得或达到能指的等级。

强调这两种意指方式的相关性会颇有意义，因为每一种都包含两种机制。人们在情感中只看见释放，然而它——弗洛伊德谈焦虑时这样说——是信号（对我们而言即能指）；人们在代表中只看见能指，然而

它（在弗洛伊德理论中）是某种生产方式的生成，也就是释放的生成（由这种释放之不可能性所生成）。

在《自我与本我》中，弗洛伊德重新提出了代表与情感之间差异的问题；这一问题已经在《无意识》一文中被艰难地提出。情感的限定性特征，是它不能进入任何组合。

它受到压抑，但它作为能指的特异性在于直接被表达，不经过前意识的联结纽带。

拉康在关于《焦虑》的研讨班中澄清并证明了什么触发焦虑，以及有焦虑时它如何运作。

但我怀疑，他是否充分说明了焦虑是什么——我是就焦虑在理论中具有的地位而言。

我认为，把情感视为一种独特的语义形式，置于作为代表的初级语义素[14]之旁，是有意义的；情感将在一个次级位置上运作，使它能够取得次级语义素的地位，其性质不同于代表，并以这种差异复写 Entzweiung。

这两种能指层面的悬殊，将使不与自身同一得到复写。与通行意见相反，十分奇特的是，弗洛伊德把语言视为将内部过程转化为知觉的东西；并不像我们可能以为的那样，把语言看作从知觉层面扯离出来、属于思想秩序的东西。

在情感这里，我们面对的是这样一种效应：被感知的痕迹遭到抹除，又以释放的形式恢复。

那么代表又如何？这里的术语考量并非无用。人们长期争论应当把“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称为表象性代表、表象的代表，还是表象的替身，并非没有缘故。

我们知道，它进入组合。暧昧正从这里开始。

它并不作为一个与自身同一的同质单位进入其中。弗洛伊德在自己领域中的洞见，是从一开始就作出那个排他性的区分——你们在记忆中已有这一点——即知觉与记忆之间的区分。

让我们回想他赋予回忆的作用：如果可以这样说，它是在大他者位置上的记忆；它把痕迹留在自己这一边，却又在当下现实中被体验时失去其记忆性质。

B) 表象方式的差异性分布问题

这里还有另一种我们关心的差异化，即词表象与物表象的区分，而这一区分并非偶然。我之所以重提这项已知内容，只是为了进一步断言：如果弗洛伊德那里有一种能指理论，它就不可能避开经由被感知之物的道路。

这一点在话语的组织中很明显。被分析者的叙述、梦的二次加工、当下或复苏的幻想、形象，在我们各次会谈的文本中反复为此作证。问题在于，这一切是否真的都属于被感知之物的秩序。

这一表象代表表明，其地位不能被归结为知觉的地位。让我们再次注意：这里从来谈的都不是呈现，而是再表象。被感知之物只代表迷惑点，即拉康所说的镜像化那种聚焦努力。

能够作为0运作的东西属于主体的秩序；但将上升并占据1之位置的，在这里是对象(a)，条件是从这一差异性分布来考察它，而不与自身同一正是在这分布的悬殊中显现。

经济观点在这里得到说明：它并不只在定量评估各种过程时才起作用，也能在这种差异性分布中被识别。压在话语上的阻拦效应，不仅迫使话语进入组合，也迫使能指改变层面、材料及表象方式。

这些变异旨在突出不与自身同一：不仅体现在能指的再度涌现中，也体现在它的转喻性变形中。隐喻渗入转喻式的衔接内部。

弗洛伊德对置两个系统绝非没有缘故：在其中一个层面运作的是知觉同一性，在另一个层面运作的是思想同一性。二者都因同真理有关，才属于我们的概念。

但困扰与迷惑之处在于：知觉能够把自己呈现为同一性的场域，而同一性在其中运作的层面却不是被感知之物的层面。

这种同一性消除了由欠缺所支撑的差异，并在被感知之物中得到物质化；同样，思想秩序中的思想同一性，也只有在对象失落之后才变得有效。

拉康对负性幻觉研究作出严厉批评，我认为他并不完全正确。至多只能遗憾这些研究的定位不够精确。

如果负性幻觉就是0的这种上升，并且绝对不属于表象，那么它就属于表象代表的秩序。它的价值在于为消隐这一概念提供支撑；我们知道，继琼斯之后，这一概念在拉康那里发挥过如此重要的作用。

还必须记住拉康在琼斯关于女性性欲的著作中指出的二择——它的效力大概更广：要么对象，要么欲望。因此，负性幻觉将给出一种主体结构的模型，因为它蕴含对对象的哀悼，以及一个经否定化、从而能够欲望的主体之到来。

我们难道不能在这里回想：主体最初的表象方式、最初的i(a)，恰恰是一种与负性幻觉同源的表象之产物——艺术家那只负形的手，出现在勾勒其形状的绘画轮廓之中。于是可以看到幻想如何就位，因为拉康赋予幻想的功能正是使快感适合于欲望。

因此，这里出现了一种主体涌现的形式：它可以逃脱消隐之中能指力量的湮灭，因为负性幻觉得以产生，却是作为被镜像化的欠缺而产生。在我看来，它是弗洛伊德意义上的自恋性认同的奠基性关系；这种认同被构想为同原初对象之哀悼的关系。

它是切割与缝合的相遇点。现在很清楚，这一过程也正是把欲望奠立为大他者欲望的过程，因为哀悼已经介入主体与大他者、主体与对象的关系之间。

如果(a)在所有这些形式之间运作——可以说，它在穿行这些层面时摆脱了被感知之物的迷惑——那正是因为它不是作为被感知之物，而是作为主体的路径、话语的回路而存在。

我将举《奥赛罗》中的一个例子。在《奥赛罗》中，手帕可以作为(a)出现。事实上，我们在那里见证了被感知之物试图施加迷惑的努力；真相是，重要的与其说是手帕，不如说是它所走的回路：从把它交给奥赛罗母亲的女巫——或从父亲交给她；《奥赛罗》中两种说法都有——一直落到妓女比安卡的床上，最终向奥赛罗揭示他的欲望：“我的

母亲是个妓女。”这件事必须借助知识来证明，因为奥赛罗像每个嫉妒者一样，寻求的与其说是真理，不如说是供认。

那么，他进入婚房、即将杀死苔丝狄蒙娜，把新婚之夜变成哀悼之夜时的那段独白，不正应当如此来理解吗？

“这是原因，这是原因，我的灵魂；

让我不要向你们说出它的名字，贞洁的群星；

这是原因。”（第五幕，第二场，第1—3行。）

原因的功能在这里组织着这样一个无可置疑的知觉：他母亲的手帕落在妓女手中。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纲要》中强调，我们怀着一种希望生活：随着我们感知现实的工具日益精细，最终可以抵达感性世界的确定性。事实上，他再次强化这一断言：现实是不可认识的；我们只允许自己从被感知之物不同秩序之间现存的联结与相互依存出发，推断真实。这显然是在断言象征界的优先地位——如果这还有必要的话。

但弗洛伊德的独创之处，是在被感知之物的层面引入一种秩序、一种组织，使我们能够走出表象与现实的两难，并以理想（Idealfunktion，理想功能）与真理这一对来取代它；这一对在被感知的秩序和被思想的秩序中都同样运作。象征与象征界一再被混同，我们必须留意，不要把二者当作同一个东西。那么，对象(a)会发生什么？它作为一种转换结构而存在；欲望对象在其中经历新的变异，而欲望本身成为对象。

这些列举出来的形式，如何通过不与自身同一而发生交叠？我认为，可以参照弗洛伊德的理论化，沿着共时与历时两条大轴线来把握它们。

1）在共时轴上，我们有一个由下列各项组成的系列：

- 各种思想，就它们是无意识思想而言（这里必须区分词表象与物表象）；

- 各种情感（作为次级能指），以及另外两个在我看来必须纳入考虑的范畴——只要我们是在分析情境中而不是在其外部观察它们。我想到的是自身身体状态，如人格解体或疑病等等；还有所有属于英国作者所谓动作性失误（parapraxies）的表现，即行动层面的表达（向内行动，而不是行动化）。2）但我们也可以在历时轴上标出另一个系列，它是各种对象相继出现的轴：口腔的、肛门的、阳具的，等等。

我怀疑，拉康纳入这一层面的窥视对象与听觉对象，是否适合列入这个系列；它们是否更应当属于共时与历时之间的传递层面。我们可以在话语中以种种形式标出这一层面：梦及其二次加工、幻想、记忆、回忆；简言之，就是所有使共时与历时运作起来的道路。

对象(a)正是从这一截取中被创造出来；在其中，欲望成为对象，并说明各种主体位置。

在我看来，由空白标示的这种不与自身同一，同抹除痕迹的过程相联系。正是这一点迫使这个系统不断转换。

IV 同一与不与自身同一：死亡驱力

拉康说，能指在抹除主体痕迹的同时揭示主体。我认为，精神分析与一切非精神分析的结构主义思想正是在这里分道扬镳。

非精神分析的结构主义思想，在可见—不可见的对立、被感知之物—知识的对立中，都会引入真理的秩序；但对我们来说，这一真理总要经过痕迹抹除的问题。弗洛伊德在《摩西与一神教》（1938）中说：“就其后果而言，歪曲一篇文本近似于一桩谋杀；困难不在于实施行为，而在于摆脱痕迹。”

而我们在这里找到的，正是从痕迹回溯其原因的过程，也就是父性本身的过程。在《摩西与一神教》中，他再次提出早在“鼠人”案例时期就说过的一点：母性由感官揭示，父性则是建立在推论与假设之上的猜想。如此让思维过程优先于感官知觉，“对人类造成了后果深远的影响”。

我在这里指出：弗洛伊德在阳具与阉割之间、性好奇与生殖之间建立了极为紧密的联系；可是他似乎从未明确地把阳具在生殖中的作用，同儿童想要孩子的欲望或性好奇联系起来，这令我颇感奇怪。

在主体层面作为原因运作的东西……

在对真理的探求中，就它涉及起源问题、涉及与生育者的关系而言……在社会—人类学层面作为法则运作。

这里同样，组合只有在规则的约束下才开始运作。

乱伦禁令是众所周知的禁止，它把母亲和姐妹从选择中剔除，从而指定其他对象取代她们；与之相连的是葬仪，它确立缺席者——死去的父亲——的在场。

应当注意，这是切割与缝合的双重过程。

在生者之中，是对母亲的切割以及由其替代者完成的缝合；在死者之中，是仪式或献给父亲的图腾对父亲消失的缝合，同时又由他从此所在的、不可抵达的彼岸把他切开。

这里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显示列维-斯特劳斯与弗洛伊德之间的切割；它在一场意外的相遇中得到说明。列维-斯特劳斯谈到面具[15]时，强调其同时具有否定性功能（遮蔽）与肯定性功能（进入另一个世界）。

但对他而言，这似乎只是一种同源关系、一种对应，以至在这一双面现实中，没有任何东西在途中以任何方式失落。我们可以提出问题：是什么迫使人遮蔽，是什么迫使这种双层结构形成？

列维-斯特劳斯谈到夸扣特尔印第安人的一种面具（Hamshamtsès）：它由数块相互铰接的面板构成，可以揭露——可以“摘下面具”——隐藏在乌鸦外形之下的一位神的人脸。





我们同意他的结论：“戴上面具不是为了暗示，最终却是为了揭露。”而这一展开的面具让一张人脸显现出来，它位于可能被当作乌鸦口腔深处的地方。

不必过度扭曲事实就可以说，这里呈现的图形把鸟喙的四个半片（上方两片、下方两片）显现为一个人物的四肢，而躯干则由神的面孔来代表。这一表象同弗洛伊德在一篇极短的文本——《一种强迫表象的神话学对应》——中谈到的表象惊人地相似。

他在那里描述一种以Vater　Arsch之名纠缠病人的强迫表象：所想象的人物由躯干、躯干下部和四肢构成，却缺少生殖器官与头部，而面孔被画在腹部[16]。

弗洛伊德由此得出Vater　Arsch——“父亲的屁股”——同族长之间的联系；当然，这位主体像每一个强迫症者一样，对赋予他生命的人怀有十足的孝敬。

在我看来，列维-斯特劳斯所错失的，是夸扣特尔面具所代表的对头颅与生殖器官的牺牲；它超出显露与隐藏的关系，而揭示出被揭露者同被抹除者、被划杠者、欠缺之间的关系。欲望的原因就在这里。弗洛伊德在以身体替代其一部分——生殖器——之欠缺的表象中，标出了转喻。

这一切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它向我们开启了弗洛伊德晚年对摩西的兴趣。他感兴趣的不只是摩西的犹太人身份，还因为一神教在这里同偶像崇拜禁令、同一切上帝在场之记号的彻底抹除紧密相连；上帝只能以诸父之名（雅威、埃洛希姆、阿多奈）的形式在场。让我们再次注意这里对不与自身同一的复写。

死亡驱力总是在沉默中劳作；其工作可在这种缩减中被标出——“缩减”一词应在其所有维度上理解。它不断努力抵达那个缺席点；主体正是通过此点同自己对大他者的依赖会合，并把自己认同于自身的抹

除。能指的变异，以及它以多形、分布式形式显灵，标示出它试图反抗这一湮灭的骤起——就像在梦中一样——也标示出它作为见证以深度乔装、改变的方式绵延下去的努力。

我们是否还应当在犹太教对来世生活的沉默中，看见另一个显著特征？这两个事实或许彼此相连。不过，要理解抹除痕迹的逻辑，也许必须诉诸不同于我们已知范畴的时空范畴。也许必须在其中寻找一种时间与空间的结构；只有前苏格拉底思想家直接地、或通过韦尔南与博弗雷各自极其不同的分析，才能向我们揭示这种结构。令我们惊讶的是，希腊人意义上的这种时间与空间、这些场所与记忆，分析治疗却为我们提供了进入它们的优先通道。

(α)在疾病分类学的结构下，显露为一种“外—语义”的组织；在被分析者的话语方式中，又显露为其承载语义的部分。分析家在这里必须通过一道窄门。在我看来，结构性的精神分析技术进路应以代表与情感的区分，以及代表的差异性分布为基础。阅读精神分析技术的研究时，一个现象格外令人震惊：其中完全缺乏对被分析者话语方式的考察。

然而，我们都知道，那些不符合弗洛伊德所确立的自由联想模型的治疗具有多么巨大的困难。它们最常欠缺的，就是表象方式的这种差异性分布；而这种分布为能指的不与自身同一作证，是分析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

我指出这一点，只是把它作为可能的研究场域，无法在这里进一步停留。

精神分析研究的根本困难，在于它是一种受约束的话语：对被分析者而言，事情不再只是交流，而是把一切都说出来。在分析家一边，它是一种流逝的言语——verba volant，言语飞逝——分析家无法像语言学家或民族学家那样把它锁进盒子里。他追逐着被分析者的言语。

如果死亡驱力渗入被分析者的言语，始终把他推向沉默，那么分析家所面对的却是一种活的言语：

- 它因拒绝被化归为沉默而活着；
- 它因抗拒一切防腐处理而活着；经过处理的文本终于可以任由知识之人施加各种处置，而活的言语对此始终不服。

等我们走遍各种主体位置的场域，就会准确知道(a)是什么。

届时我们将获得一种视野；它对应于哲学家借自己时代的观念运动、艺术和科学的发现方式来思考历史与文化的视野，但呈现为一种多形、异质的环境，各种异化形式在其中得到展现。

不过不要误会。在考察这些事实时，精神分析家无意把优先权让给任何人。哪怕会被指责为帝国主义，他始终会在弗洛伊德的这一断言前停下来：

- 人类的各种宗教代表着人类的强迫性系统；
- 正如各种哲学代表着人类的偏执性系统。

弗洛伊德说，二者都因使主体感到自己更好而获得价值，因为主体由此逃离欲望，并成功地把别的东西安置到欲望的位置。这里，在心灵

运作的投射秩序中，我们就会获得一种关于主体运作的模仿性构想或理论的最初要素。精神分析尚未穷尽摹仿的资源。若只给精神分析家赋予一种祛魅功能，好让一个经过清洗、净化的我思得以保存，那是不够的。事实上，正因为弗洛伊德从残渣、废弃物、失足处出发，他才发现主体的结构就是同真理的关系。

这或许不大接近普罗米修斯因盗火而被驱逐的形象，倒更接近菲罗克忒忒斯因恶臭的伤口而被同伴遗弃在荒岛上的形象。

注（1）发表于《分析手册》第3期，1966年5—6月。

（2）这个图式被称为“图式L”，收入《〈失窃的信〉研讨班导言》，《精神分析》第II卷，第9页。（3）这一图式在《论精神病任何可能治疗的一个先决问题》中引入，《精神分析》第II卷，第22页。参见下文第18页。

（4）在这里作两点说明并非无益：α / 法国精神分析著作中，“客体关系”概念得到大量发展；

这一概念由布韦从英美作者那里引入（尤其是继亚伯拉罕之后的梅兰妮·克莱因）。拉康反对它，指出这些构想完全没有参照任何中介要素。尤其是——这或许是同一回事——他谴责这种视角，因为它导致实在界—想象界的对立，从而压扁象征界。

b / 理想自我—自我理想的对立（农贝格—拉加什）为拉康的理论发展提供了平台，而这些发展被置入同大他者之关系的透视中。

（5）《关于D.拉加什报告的几点意见》，《精神分析》第VI卷，第145页。

（6）关于《焦虑》的研讨班（1963），未出版。由于无法原文引用拉康，这里是我的转述。

（7）关于《会饮》的研讨班（1960），未出版。

（8）该报告文本以《缝合》为题发表于《分析手册》第1期。

（9）在继续论述之前，我想插入一段，谈谈弗洛伊德思想在这一点上的某种摇摆；它动摇了《标准版》注释者斯特雷奇的判断（第XXII卷，第65页）。问题涉及“der Träger des Ich-Ideals”这一表述，它被译为“自我理想的载体”，即超我的功能。“载体”一词发人深思。我们绝不应把它看作机械支撑的形象，反而应在这里把它视为少数几个允许我们把无意识主体构想为Entzweiung（裂分）的迹象之一。理想的功能——“Idealfunktion”——在这里显得至关重要，它远远超出一个功能的等级，而必须同弗洛伊德更恰当地称为“诸大机构”的东西联系起来。这些“大机构”标示着一个审级；这里指的是自我这个审级，就弗洛伊德让现实检验以自我之名在其中运作而言（《梦学说的元心理学补遗》）。我认为，“诸大机构”这一观念很适合限定这种“理想的功能”。

（10）A.马丁内，《共时语言学》，第25页。

（11）这一理论化在雅克·拉康本期研讨班中展开。

（12）引号中的词语取自利特雷词典“物”“原因”和“对象”各词条。

（13）我想指出，早在1962年发表于《现代》杂志、对拉普朗什和勒克莱尔报告的批评中，我就曾提请注意这一点。不过，这里显然涉及两种不同类型的能指；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保留情感作为释放所具有的特异性，与作为生产的代表相对——这里的生产是指它进入组合转换系统之后的生产。

（14）这些术语借自分子生物学的词汇。

（15）《与让·普永的访谈》，《眼睛》第62期，1960年2月。

（16）这令人想到长着腿的头颅和哥特式格里勒怪像[雕刻在石头上的怪诞形象、中世纪讽刺画]；G.拉斯科曾让我注意到它们。参见尤尔吉斯·巴尔特鲁沙伊蒂斯：《奇异的中世纪》（第一章）。

拉康

我非常诚挚地感谢格林刚才所作的这篇精彩报告。他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讨论了我——如他所回顾的那样——耐心引入、建构、生产出来，而我关于对象(a)的生产尚未结束的东西。

他确实非常出色地展示了这一概念所包含的全部联结。我甚至要说，他还把某些本可以进一步推进的东西留在了边缘——我知道他能够推进——尤其是关于各种治疗类型的组织，以及严格说来构成治疗的东西：对象(a)对于治疗的功能。

我感谢他作出这番澄清；它远不只是摘要，而是真正的激活，是对不同阶段的精彩回顾。我再说一遍，人们可以依这些阶段来明确我在这方面的探索或发现。

我现在不回答他，因为我们另有安排。我想，他会愿意同刚刚记录下来的内容进行最密切的合作，好让他今天所作的、足以标志一个日期的报告文本，成为我们今年将展开、并且我希望得到补充或扩展的工作的参照。我认为，这对那些专门参加封闭研讨班的人来说，是极好的工作基础。

非常感谢你，格林。

你极其准确地用满了这一小时，我怎么称赞也不为过。那么，我把话交给孔泰，他将向你们报告斯坦的几篇文章，而这些文章今天将受到质询。

不过，我趁这个间隙向你们通报一件事：有一个名叫“认识论小组”的研究与工作团体，隶属于我们在此作客的这所学院。这个认识论小组是在“弗洛伊德学院话语理论”这一卡特尔的过程中成立的，它将出版《分析手册》。

这些手册的标题本身无须多作评论。不过，我仍向你们说明它的方向、开放性以及接纳稿件的可能。这些手册当然会在研讨班入口处分发给你们，也会长期放在高等师范学校；此外还会放在索邦的一处地点，日后再告诉你们。

我已经把今年第一次讲演交给这些手册……

在我看来，它们长久以来一直由最富成效的精神所推动；我的意思是，那个即将编辑这些手册的小组值得我们所有人充分关注……我把今年第一次讲演交给了他们——你们已经看出，那篇讲演是预先写好的——让它在创刊号上发表。

还会有别的内容。你们到时会看到。

克洛德·孔泰

我要谈斯坦的两篇文章[注1]，暂且把第三篇[注2]较新的文章——他关于《精神分析家的判断》的讲演——搁在一边；在我看来，它在另一个层面提出了问题。

> [注1] 康拉德·斯坦：（1）《分析情境：关于会谈中向原初自恋退行以及分析家言语分量的几点意见》，《法国精神分析评论》，1964年3—4月，第XXVIII卷第2期；（2）《转移与反转移，或分析情境之经济中的受虐狂》，《法国精神分析评论》，1966年5—6月，第XXX卷第3期。

> [注2] 康拉德·斯坦：（3）《精神分析家的判断》，《解释》，蒙特利尔，1968年1—3月，第2卷第1期，第15—31页。

所以，这里要谈的是前后相继的两篇文章；它们同时致力于为分析情境提供某种定位，并阐发一种关于会谈中分析家言语分量的理论。

第一篇文章主要强调对原初自恋的参照；第二篇则引入自恋与受虐狂的对立，而这对转移的构想至关重要。

首先，我将快速——肯定是过快——概述在我看来构成这项工作主要理论贡献的内容。

我希望大家原谅我可能过快地掠过某些环节，尤其是剥离了这些文章对具体临床案例的参照；正是这些案例，使文章作为对精神分析经验的反思而获得其全部价值。

至少在我背叛或误译斯坦思想的地方，还请他不吝纠正我。

接着我会提出若干批评性意见；它们唯一的目的，是试图在斯坦独特的阐发中把握同拉康教导发生分歧之处，并由此开启讨论。

第一篇文章是《分析情境：关于会谈中向原初自恋退行以及分析家言语分量的几点意见》，发表于《法国精神分析评论》1964年第2期。

斯坦的论述旨在阐明解释的作用方式，不过我在这里引用他的话：

> “为了有效地处理这个问题，必须先追问：在会谈过程中，无论对解释内容作何选择，言语的力量存在于何处；而这又通向一般而言的言语力量问题。”

斯坦将从分析的某些特殊时刻着手处理这个问题。这确实是基本规则带来的结果：病人被要求让自己处在浮动注意的状态中，于是在同一个运动里向内倾听并说话。他对自己言语的知觉与发出混合在一起。不是他说话，而是“它在说话”。分析家一边也同样处于浮动注意状态，倾听“它在说话”。不是他亲自倾听，而是“它在听；但说与听并不是两回事”。

> “病人与分析家都趋向于成为一，两者合而为一，一切都包含在这个一之中。得到理想实现的分析情境会与睡眠非常相似，而其中被听见的话语将是一场梦。”

因此，分析情境中所涉及的确是一种拓扑性退行，它包括“无论在病人一边还是分析家一边，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之间的界限都被废除”。

这种拓扑性退行是一种朝向原初自恋的退行，它表现为“某种幸福感——斯坦告诉我们——值得称作自恋扩张感”，或者表现为“拥有欲望对象的幻觉”。

他是在讨论一个临床实例，或某些分析开始时伴随出现的极乐综合征时这样说的。而分析中的这些时刻“很少不在会谈中唤起过去”。

“分析情境中的拓扑性退行，严格说来是时间性退行的条件”；而“正是在拓扑性退行中，一场仿佛重复过去的冲突被现实化”。

我再引用一句：“在这种现实化之际发生的事情，类似于梦者醒来时把梦的文本表述出来时发生的事情。”

这里，病人走出自由联想状态，转而对分析家说话。它不再说话，而是他[以第一人称]说话；他反思自己，同时把分析家当作其话语的对象向他讲话。

斯坦又告诉我们：“正是在这个确切的点上，攻击性涌现出来，因为如弗洛伊德所说，攻击性随对象而生。”

文章的后续部分以若干细节丰富了这一环节。治疗过程中尤其可能出现对自恋性退行的防御，因为这种退行可能有利于无意识冲突与焦虑再度出现。

浮动注意状态所特有的轻松言说，或融合式沉默，与滔滔不绝的说话或警觉的沉默相对；后两者总是在表达对自恋性退行的防御。在这种情形下，分析家的言语一方面被期望作为防止退行的保护，另一方面

又令人畏惧，因为它“剥夺病人对自恋扩张的替代性满足”，也就是对全能的行使。

分析家言语的双重影响由此得到定位：

- 当它以个人身份被说出时，就打断自恋扩张；
- 而当它作为“它在说话”的参与者被听见时，就促进这种退行。

语调或选择说话时机，可以说明其中一种或另一种效应；事实上，两种效应通常同时出现，只是比例不同。

我已经指出，第一篇文章引入了被分析者的一种位置；就自恋而言，这一位置具有妥协情境的价值。病人害怕退行，于是试图迫使分析家沉默；他企图通过成为波动的安排者来摆脱波动、保住对它的掌控，由此获得自恋退行的一种替代性享乐。

第二篇文章展开这一位置，这一次把病人在治疗中的自恋同受虐狂对置起来。

这是一篇题为《转移与反转移，或分析情境之经济中的受虐狂》的讲演，作于1964年10月；感谢斯坦愿意把它交给我们使用。

会谈中的自恋扩张始终受到分析家可能介入的威胁；这种介入意味着两个分离的人，因而意味着病人与非我之物之间的一次切割，是“某种异质力量由此进入的裂隙”，也就是说，是某种应同现实原则联系起来的东西。

而在这一层面，一种构成转移的错误联结得以实现。

> “分析情境中产生了一种混淆、合并现象：分析家介入的表象，与对‘他可以说话’这一事实之现实性的承认，混合在一起。”

分析家显得像现实存在的源头，像那种已经失灵的力量之源头。

精神分析家仿佛出于自身意志而使病人受挫、剥夺其快感，然而病人在自己同非我之物的切割中体验到的挫折，并不由分析家主宰。

斯坦告诉我们，这一现象以转移之名为我们所知。于是，分析家的介入被当作“一种滥用权力：转移以受虐狂为其相关项”。但是，主体把这样一种绝对权力赋予分析家，实际却旨在使自己成为同一种力量的主人，因为他的自恋成就正缺少这力量。

他把自己呈现为弄臣，从而把精神分析家变成自己的国王。他将为了快感而受苦，也就是说，一面承认现实存在——因为自恋成就被延迟——一面试图否认它。

更根本地说，他旨在让精神分析家感到缺少自己，“通过始终不满足分析家的欲望，使这一欲望无限维持下去”。

对他而言，关键是成为所缺的对象；而这一对象的完整性，归根结底代表着“不可能存在的自恋成就”。通过这一替代性实现，他模拟出“挫折可能不再存在的可能性”。

于是我们进入下一步：承认主体的受虐狂中蕴含着施虐目标，也就是对反转移的召唤。精神分析家同样承担着无法逃离挫折的共同命运；在极端情况下，他可能受骗，真的以为自己是挫折的主人。

由于在自身存在的现实中仍然受挫，他从此会倾向于把自己未能实现自恋，完全归因于病人的欠缺；病人于是成为他所缺的对象。转移正是这样在一种被假定已经失落的自恋成就得以恢复的幻觉性目标中、在不确定性的标志下建立起来。

相反，分析的终结意味着进入某种存在的确定性秩序，或关于挫折的知识。从这份对斯坦两项工作的极简概述出发，我将提出若干批评性意见，并把它们分成三组。第一组主要涉及第一篇文章，以及斯坦为说明这一层面上的治疗动力而引入的对立或交替。

我提醒各位：一方面，他把自由联想规则定位为一种趋向，它诱发病人朝向原初自恋退行；这种退行的特征是同分析家融合。另一方面，朝向自恋的拓扑性退行又制约着时间性退行，也就是旧冲突的再度涌现或冲突的重复；严格说来，转移正存在于此。

重复强迫表现为对拓扑性退行强迫的否定；我再引一个说法：“全部分析就在这一对立之中。”

关于融合情境，我想提出如下所有问题。我提醒各位两个说法：只有一个“它”在说、在听；又或者，病人与分析家都趋向于成为一，两者同为这个一，一切都包含在其中。好吧，那些知觉与言语发出似乎在一种无中介的直接性中混合、任何屏障与中介都被废除的时刻，固然使人想到某些临床情形，但在总体上似乎相当罕见。因此，它们一开始就提出了自身在治疗中、尤其相对于转移而言有何意指的问题。

这当然正是斯坦在其研究中阐发的内容。不过，在一种——姑且这样说——整体临床经验的层面，我们很想问他：是什么使他选择优先看待这些相对罕见的情境，并把它们变成治疗的基本定位之一？或者仍

停留在临床层面，我们也许想知道，他是否倾向于把这些事实归于某种特定的神经症结构；又或者，他会如何相对于治疗整体及其不同时刻来定位它们。

现在转到更理论性的层面，问题将是：斯坦怎样构想治疗中的拓扑性退行？它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蕴含一种融合式情境？而乍看之下，它似乎反倒与揭开大他者这一秩序中的某种东西有关——这里是参照拉康的教导而言。

或者说，一方面是自由联想状态与梦的活动，另一方面是冲突的再度涌现与把梦的叙述构想为对梦的反思；是否有理由让这两组东西汇合？

例如我们知道，在讲述梦时，对梦中某一要素表示的怀疑，只要在叙述中被说出，就必须被视为梦的文本本身的一部分；主体恰恰仍然被卷入梦的文本。

同样，关于那个唯一的、说着也听着的“它”，我们要问：在治疗的自恋性时刻，分析家又处于什么位置？他的存在方式是否接近梦的活动？换句话说，他也受到拓扑性退行支配，还是这更像被分析者关于融合的幻想？

现在谈原初自恋。它主要被呈现为一种极限情境，参照的是融合式的原初认同，或由快乐原则支配的、欲望得到幻觉性满足的状态。

一条援引纳赫特的注释，把融合与使具有分离作用的言语悬置联系起来，似乎意味着参照一种言语之前或前言语的状态。文章当然向我们强调，会谈中的退行绝不会完全抵达原初自恋，只是朝它运动。但

是，文本有一些段落似乎把自恋说成某种原初步骤或发展的第一时刻。

相反，第二篇文章引入另一个面向。病人为表征那种不可能的自恋成就，被引向尝试把自己设立为所缺的对象；在极限上，是填满分析家之欠缺的对象。

这样一来，他似乎旨在恢复他者的自恋；那么，自恋就会呈现为大他者欲望之完整性的神话或幻想。我们曾经追问，这两个面向中哪一个对斯坦来说更具决定性、更为根本，或者说他怎样把二者衔接起来。后来，斯坦在《精神分析家的判断》讲演中对此给出了一些精确环节；我想，他会沿着这个方向回答我们。

不过，我仍保留这个问题，因为在最初两篇文章的层面，它依旧悬而未决。现在更专门地谈第二篇文章。我想质询斯坦的文本：这些理论定位同若干拉康范畴——尤其是大他者、小他者与对象(a)——有何关系？

在这方面，我必须说，想象性小他者这一范畴在我看来往往占据首位，以至斯坦的研究在几个时刻都像是倾向于把分析情境呈现为二人情境；例如，他强调分析中的挫折辩证法时就是如此。

第一篇文章也一样：文章说，冲突重新现实化时，攻击性随对象而生；病人于是走出融合，以个人身份向同样重新个人化的分析家讲话，并把分析家作为自己话语的对象。这难道不是主要把分析家定位为攻击性竞争中的想象性小他者吗？

斯坦当然也引入大他者；大他者同样无疑牵涉我刚才所说的内容，也牵涉分析家被指认为挫折的主人或异质力量的源头之时。但是，在我看来，仍然很难在他的文本中把大他者同想象关系中的小他者区分开来。

最后，斯坦还引入了某种似乎接近对象(a)范畴的东西，尤其在第二篇文章中：被分析者试图把自己定位为分析家所缺的对象。我无意在这里重述拉康关于对象(a)、施虐欲望与受虐欲望之衔接的贡献；我只指出，斯坦此刻似乎开始用欲望的术语描述分析情境。

于是我们重新遇到这个问题：他怎样把这一层面同自恋层面衔接起来？尤其是，我们是否应当把对象(a)定位为这样一种东西：拥有它，在极限上就会恢复已经失落的完整性？

或者，如果自恋同自我与非我之间界限的消失同义，那么，是否真能把它同治疗过程中可能发生的、对对象之幻想性唤起联系起来？后者看来意味着一种已经衔接起来的结构，而不是融合式的无区分。

最后是第三组意见。作为结束，我想在构成斯坦工作轴线并赋予它对我们之全部价值的层面上重新讨论问题，也就是把分析家对其言语之选择本身、或者说言语的力量定位出来。

首先似乎应当指出，斯坦看来不得不相对于一系列两项位置来确定其研究方向：

- 例如自恋性退行—冲突再度涌现的交替；
- 或者自恋—受虐狂的对立。

这覆盖着弗洛伊德的两组二元对：快乐原则—现实原则，初级过程—次级过程。

这是否是一种我们必须认为必然蕴含在分析情境框架中的概念模型？斯坦当然看得到自己论述的终点。这归根结底是在质询他的文本给人的印象：文本最终主要围绕实在界—想象界的对立组织，而把象征界自身的维度放到次要位置。

我的印象当然可能来自这样一个事实：斯坦在这篇文章中只阐述了他这套论述的一个层面；但即便只在这个层面，这个问题也或许值得提出。

例如，在第一篇文章中，分析家言语之所以获得分量，是因为它或者沿着退行的方向运动，或者反过来引入一次断裂，从而恢复两个人的二元性。

言语在这里要么强化一体，要么突出二元。后一种可能似乎更根本，因为斯坦把言语定位为这样一种东西：它介入以打断自恋，使自我与其对象分离，并由此支撑其观点。言语就是切割；正是这一切割引入主体—对象的双重极性。

我承认，我在这里不大知道是否有理由从根本上把言语引入为生成一种二元性的切割；也没有准确把握，这种呈现如何同关于治疗中自恋性时刻的说法相一致：主体在内里倾听，同时又在同一运动中说话；“它在说话”，言语仿佛贴合心灵流动，不含裂隙或切割。

在第二篇文章中，言语同自恋的对立，犹如现实原则同快乐原则的对立：它迫使病人确认一个现实，即他的自恋成就不可能实现。这里也

有一种在言语之下被主体承受、被强加给主体的二元性。言语被置于实在一边，而这个实在由作为挫折之主人的分析家来代表。

这是否应当归于转移性错误？不过，在我看来，言语与实在本身之间的衔接若能更明确，会更有助益。

最后，在把治疗终结视为关于挫折的知识时，同一个问题也会出现。斯坦告诉我们，不是分析家使主体的全能受挫，而是“挫折就是存在本身的现实”。

那么，精神分析家是否应当扮演现实的代表，以便把病人带回现实？我在这里夸张了文本，只是为了质询斯坦为何赋予挫折决定性的作用。

在我看来，更根本的欠缺范畴可以在结构的不同层面上更灵活地运用：例如，它使我们能够相对于挫折来定位阉割，并更精确地衔接象征界同实在界及想象界。我就在这里结束这些意见；它们只旨在引入讨论。

拉康

不必停留在我让孔泰说出的全部内容上。我认为——现在是对斯坦说——你只能承认，对我们目前所知的你的思想来说，这里给出了最严谨、最准确、条理最分明、最诚实，而且我要补上一句，最富同情理解的阐述。他作出的努力一定打动了你，因为这些道路——姑且这样说——无疑至少有很大一部分已经为我们所用；而你的目标本来也正是整合它们，突出它们如何为你所用，并说明一种真正的经验。

现在还不是时候让我强调：在你的立场中，哪些东西在我看来仍保留着某种克制、张力、制动的痕迹；它们同另外一些范畴相联系，而我必须说，那些范畴在目前通行的分析经验理论中更为常见。你在报告中已经非常清楚地标出了这两个极点：一方面是那个非常可讨论的观念——我至今没有讨论它并非偶然——也就是原初自恋。我曾认为，在我的阐发抵达目前这个点之前，至少对所有追随我的人来说，它尚不可处理。你们将会看到……

依靠我最近给你们的拓扑学标记，我作为明确表述强行提出的东西，同迄今在这一领域被接受的东西之间有何差异，将显得完全清楚；同时也会表明——这一点始终必要——混淆是怎样产生的……这里有一个结。在处理它之前，我们只能靠近它；我现在不会把它标出来，甚至今天可能完全不会，尽管或许在会谈结束时我能给出一点提示。

另一方面，你对精神分析图式作出非常清楚、精确的聚焦，让它停留在挫折之上。因为照你说，转移正围绕挫折而定位；你甚至说，严格意义上所谓转移就在这里：分析家一开始对主体而言，就是以挫折形式施加于他的力量、全能的代表；而在最后，终结将抵达关于这样一个事实的知识——挫折是存在的神圣本质。

我认为，在这一点上，我所做和引入的工作同样恰恰在于说：并非只有这条轴线。无论如何，你在《转移与反转移》一文第3页或第4页给出的定义——当你说这严格说来就是转移时——我之所以用一个关键公式引入转移，恰恰是为了说出相反的东西；我是为了让心智固定在我所指明的方向上，也就是说：转移在本质上奠基于这样一点——对进入分析的人而言，分析家是被假定知道的主体。

如你所见，这严格属于另一种秩序；我目前展开的正是它。

我们必须从索求与转移的这种区分开始；分析情境本身正围绕这一Entzweiung（裂分）展开，而一切都可以由此以正确方式来安排。也就是说，要让分析真正抵达一个终点、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终结；这种终结的性质与关于挫折的知识根本不同。后者并不是分析的终结。

我这样说，是为了大致标出方向。我不是说讨论到此结束；恰恰相反，我是在打开它，并表明逃逸线同我简称为你的系统化的东西完全不同。毕竟，我没有理由认为你的系统已经封闭；或许你会重新打开它。但依照我们目前拥有的材料来构想、封闭起来的这一系统化，已经呈现出某种体系。

我当然很遗憾，孔泰出于一种可以称为严谨的考虑，在看到自己无法充分辨明你第三篇文章中发生的转折和转换时，没有继续讨论它。这篇文章在我看来也包含极其值得商榷的东西，特别是你对交流的强调。当然，问题仍然是分析家的言语具有什么意义。不过我要指出，按照事情目前进展的程度，我不认为我们今天就会了结整个争论。1月的第四个星期三将让我们继续。

就剩余时间而言，你现在是否已经看到一些值得说的东西？还是你愿意先让梅尔曼——他也有话要说——提出自己带来的内容？

斯坦：我想，最好先让其他人说。

拉康：是的。毕竟，即使你今天没有全部答复时间，我们把人数限制下来，正是为了让我们考虑……让对已接收内容的记录能够在此期间成熟。也许还有别人想介入。我把话交给梅尔曼。

斯坦：不过，在梅尔曼发言之前，我还是想说，我非常欣赏孔泰的报告。

夏尔·梅尔曼

我将从孔泰开始的那个点重新讨论问题。斯坦的这些研究值得我们格外友善而审慎地关注，因为它们似乎构成对精神分析治疗一般理论的某种反思。斯坦明确从分析家言语的力量开始反思；斯坦说，这通向一般而言的言语力量问题，并在发表于《法国精神分析评论》1964年3—4月号的第一篇文章末尾，达到如下公式：“考察所说言语的内容，永远不足以说明言语在听者身上产生的改变。我在这里与惯例相反，不再只从所说言语内容的严格观点来考察分析话语；这似乎是向前迈出的一步，此后，对上述内容的理解将奠基于对言语力量的理解。因为，精神分析家在治疗进程中的有意识行动，表面上主要正是以对内容的理解为基础。”

我们可以指出一个小问题：从分析家言语的力量过渡到一般而言的言语力量，构成一次跨越、一步进展；在我看来当然非常值得期待，但它毕竟意味着，我们在分析中处理的是语言。

而第二个命题——要考察所说言语的内容——仿佛对它想表达的意思作出了如此鲜明的说明，以至我们可以不只在其内容层面，也在其容器层面寻找它的价值与分量；例如在那里注意到，容器层面缺少几个极简单的术语……

为了让我要说的东西更清楚，请允许我在这里重新引入它们……当然就是能指与所指这两个术语。我认为，引入它们能让斯坦想说的东西更好地走上轨道。

事实上，作者说了什么？

我在这里重述孔泰展开的一个小点：治疗中的言语有两面：

- 一面是病人的言语，它依照自由联想来安排，不可抗拒地把病人引向朝着自恋扩张——原初自恋——的退行；其极端、最终、假设性的幸福感，同与分析家融合的感觉相联系，而所谓融合可以表征同欲望那个已经失落的、神话性的原初对象重逢；

- 另一面是分析家的言语；他可以支配和使用它，要么促进这种朝原初型自恋扩张的退行，要么引入一种不可避免的切割——

也就是现实的切割，而病人错误地把分析家当作这一现实的施行者。

我们已经不得不在这里标出斯坦赋予分析家言语的那个相当特殊的位置。这个位置在他最近于圣安娜医院皮耶拉·奥拉涅的小组星期一活动中所作的最新报告里，似乎得到更清楚的说明。报告题为《精神分析家的判断》，作者在那里说：“精神分析家那句前来填满病人期待的特殊言语，确实被愉快地接收。它消解张力，带来一种适切与宽慰感，即使紧接着它就会引发愤怒、反对或否认。

因此，人们经常把它比作一种物质、食物、精液或孩子，前来填满病人的肚子，哪怕病人有时因此恶心。

一位女病人在会谈将近结束时得到一个解释，便回答：您让我感到愉快，我想带着这句话离开；下一次会谈中，她又提到：您对我说话时我感到的愉快，您言语中出人意料的一面；然而这就像奇迹，可我不喜欢这个比喻，因为奇迹里——病人补充说——有某种被动的东西。

她很难解释这个“然而”；它所指的是担心愉快无法持续，以及觉得自己无法把握精神分析家告诉她的一切。而事情就这样结束！接下来看到她把解释接收成精神分析家给她的一个孩子——一种有罪的满足——我们也不会惊讶。”

在我看来，正是在这个如今表述得完全清楚的层面，斯坦说“内容不能穷尽分析家的言语”时想表达的东西，可能得到更准确的说明。

事实上，这种如其所称的“内容—法则”，似乎唤起的不是“一个会因此召来某种能指组合的所指”，而主要是分析家言语获得如此独特光彩的那个位置。

我不认为自己是在曲解斯坦的思想。比如我可以援引他仍在这篇最新报告中说的一句话：“精神分析家的言语总是作为一句已经说过之言的重复而被等待。”

我当然倾向于说：“作为对一个永远已经在那里的位置的唤起。”

我继续引用斯坦：“神话性的言语、奠基性的言语，它同时确立病人——这两个效应不可分——既是大他者欲望的对象，也是原初过错的主体。”

我认为，只要仍然给予这些要素以它们的位置——在我们看来，这个位置对斯坦的研究及其所得结果非常重要——我会说：假定分析家的言语从我刚才试图唤起的、具有如此特殊光彩的位置发出，当然就假定分析家接受或认可、干脆设定自己的言语来自这个场所。文本中的相当一批论述环节，或许都可以围绕治疗中分析家言语这一被假定的位置排列起来。

例如，文章说被分析者借自由联想，“在其赠予的完美完成中”（这是引文）试图让自己的言语走向分析家所瞄准的同一个位置。那么我们可以认为，如果被分析者借这一赠予企图抵达分析家言语似乎所处的位置，他就可能把——为求简便，就说——某种体验写入其中；这种体验属于神话性融合，甚至可能取得那种如此特殊的自恋扩张之名，并可能抵达这些极端效应，也就是同分析家融合。

关于这一点我有一点……我觉得刚才说得不完全清楚。我的意思是，从标出这个位置开始，我们可以追问：此后被分析者在治疗中的运动，是否在试图抵达一个场所；神话性的融合从来都可以被假定从这个场所出发。或许在这一运动中，可以定位某种无法言喻的幸福感，也就是所谓原初自恋扩张。

我们还可以追问，把事情这样定位是否……

我的意思是，把分析家的言语安置在这个位置；这种言语既可以填满自恋性退行，也可以引入切割……以这种方式看问题，是否重新唤起了那种关于好对象与坏对象的常见二价构想？这种频繁出现的推想无疑有其价值。

我们同样可以追问，把事情这样定位是否可以帮助理解……

因为我必须说，在我看来这颇为惊人……如果主体在治疗中违背基本规则，他为什么会立即感到自己因手淫而有罪。因此也可以说，照这样定位，他是“因某种原初的自体性欲满足而有罪”。

那么我们可以追问：当病人违背基本规则时，他拒绝因服从分析所强加的规则而失去某种东西；这种拒绝之所以会具有自体性欲或手淫的

性质，是否因为它可能表示病人害怕或拒绝让自己失落在某个尚待明确的对象中，而这个对象恰恰掌握在分析家的力量和手中？

比如，在治疗对话中，身体、躯体性的要素可能以不适的方式介入，而分析家的言语能够解除这种不适。这里我还必须引用几句话；在斯坦的论述和文本中，它们显得十分清楚，也非常有意思。

例如他说：“分析家的这句话解除不确定性，也同时消除了不适。但病人早已部分消除这种不确定性：他把不适翻译为自己身体上一种多少已经确定的病症；这一现象非常接近弗洛伊德在朵拉癔症案例中研究的躯体顺应。

病人以一种痛苦取代了等待精神分析家言语时的不确定不适；这种痛苦蕴含对消除痛苦所需物质或物理作用力相当准确的表象。这样，他至少能够知道自己缺少什么。他只需以从前由于自然因素作用而体验过的痛苦为模型；因此，分析家的言语才能仿佛一种物质或物理作用力那样起作用。”

我也倾向于……其实斯坦在别处已经说得十分清楚：分析家的这句话也是同一个东西；更形象的是，他把它比作食物：“这种言语会引起身体变化，就像食物平息饥饿、阳光消除寒冷感。我已经指出——斯坦说——言语有时可以使牙痛或头痛消失。它平息寒意或使人变暖，也并不少见。这种效应上的同一性可能使人想到，言语是一种物质或物理作用力的替代物，或者与它们具有同样的性质。”

最后，我还倾向于在赋予分析家言语的这种位置、这种特殊场所中，看见某种东西：作者的逻辑进路或许因此卷入一个完全二元的体系——孔泰刚才说是二人式——它由一个基本模型支撑。我倾向于把这

一模型看成，不是“是或不是”这样的公式，而是更接近“是这个或是那个”。

最后我还在想，难道不正是从赋予分析家言语的这个位置、这个场所出发，治疗终结的问题才必然被提出？在这一封闭情境中，正如斯坦所做的那样，终结只能被写入、只能用技术性权宜之计来翻译。

我必须说，斯坦在我们研究的言论与文本中当然没有超出这一引入；但无论如何，他确实正是这样提及治疗终结，也就是用技术性权宜之计来提及。我们当然可以追问：在这种相对静止的二人情境中，当分析家言语被安置于这个场所时，事情又能有多大不同？

最后，作者当然提出了真理问题。

斯坦说：“病人在转移中赋予分析家一种他并不拥有的力量；那么，分析家怎么可能让自己的言语成为真理的保证？”

这当然通向一些把分析家说成欺骗者的公式，而他不过也是受骗的欺骗者。

而我要说，这确实是我可能会定位的东西。我的意思是，在这样的论述安排中，事情很难有别的结果；除非分析家被带向、也许被引向把别的东西异化到诱饵的位置。

斯坦又补充说：“如果精神分析家声称自己始终是忠实的真理仆人，精神分析就不会存在。”

我再读一次这句话：“如果精神分析家声称自己始终把自己设立为忠实的真理仆人，精神分析就不会存在。”

我必须说，我本人当然完全不同意这一结论。恰恰相反，我认为——我以有些突兀、也有些仓促的方式结束——分析同真理有这种根本关系；如果精神分析家不能始终作为真理的保证，我们就可能重新陷入这些诱饵位置、受骗的欺骗者位置，并承受它可能给治疗进程带来的后果。我曾试图从你的论述中重新描出这些后果，也许方式有些困难，或不总是很清楚。

拉康

已经两点零二分了。请再给我两分钟。我想，斯坦今天不会回答。

时间完全不够，我认为必须重新讨论这些问题。

梅尔曼文本的一部分困难——仅仅一部分——当然来自斯坦关于精神分析判断的这篇文章没有得到充分介绍。

我想，斯坦本人也不会漏掉我要立刻阐明的这一点：归根结底，梅尔曼阅读的这篇文章，根本上奠基于分析家的述谓功能。

你说，这种述谓被人期待；正是在这一点上，你从四种动力的层面标出它产生哪些效应。为了说明这些效应本身，梅尔曼假定你对分析家言语的这一功能有一种更中心的把握。总之，他读了它——他敢于这样读——越过你自己敢于看见的东西。无论如何，每个人都能够跟上他所指明的那个位置，而这是一项质询，并不是立场宣示。

正因此，他最终没有明确点出对象(a)的位置。

你们在梅尔曼整篇报告中都感觉到了这一点，而它又提出一些问题。因为它甚至可能重整你整个构想链条——即便不会重整我们十年来关

于病人与分析家言语之关系的构想。由此确立的位置几乎无异于这样一种位置：这里根本不是受虐狂的问题；今天我们完全搁置了自己的受虐狂构想，因为它提出太多问题。

而是一种姑且可以称为疑病式的、关于分析家言语功能的构想。

当然，一切最终落到他极其出色地引出的那个困难上，也就是你提出的："分析家是否应当成为真理忠实的仆人？"

这正是我最近用"关于真实没有真实"这一说法带来的东西。

精神分析家不能成为真理忠实的仆人，其理由不是要侍奉真理；这种观念当然只是一种近似。难道"关于真实没有真实"不能使你修正它吗？

换句话说，人不能侍奉真理。真理自己为自己服务。

如果分析家有一个有待界定的位置，那么它确实在别处，而不在某种肯定（Bejahung）的位置；这种肯定实际上永远只是一种原初肯定的重复。

更确切地说，恰恰是在我们学院内部的一场争论中引入的那个东西；格林刚才曾提到自己听到过这场争论的某些回声。

如果分析家确实处在某个位置，那么这个位置与其说是——我会说——我们已经谈到、但还完全没有澄清的那个位置，不如说恰恰是拒认（Verleugnung）。

我把这一点作为最后的建议交给你们。如果你们愿意，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在1月的第四个星期三重启这场刚刚开启的争论。我想，无论如何，就斯坦而言，你们今天已经饱餐了一顿。无须补充，刚才已经开头的东西[……]；我只提出最后一个问题：口腔驱力为何在我们关于分析的一切理论化中，具有这样一种占支配地位的价值、始终具有吸引点的价值？这里是否存在深刻的混淆？

这种混淆是否来自一种根本误认：我们忘记了，无论索求的内容是什么，它总是用嘴说出来的——而这一事实能够在这样的消失点中起到定向和引导作用？

第5课 · 1966年1月5日

祝你们新年快乐！这是一份深情的祝愿；毕竟，这祝愿从我口中说出，其效力至少在一点上——哪怕这一点十分有限——在于我本人能为你们所关心的东西带来些什么。

我们将继续讨论今年要说的对象(a)。

如果你们允许我借这次间歇和这些祝愿，为它添上一点庄严色彩[注1]——这里正好该这样说——那么关于这一对象(a)，我们会说……

> [注1] 这里戏用了德语“solen”一词。

废弃对象——你们已经从足够多的角度接近它，能够感到这个术语的切当：在某一透视、某一意义上遭到抛弃的对象，是的……我们难道不会说，正如预言所示，它作为被弃的石头，必将成为房角石[注2]吗？

> [注2] 参见《圣经 · 诗篇》118:22：“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

它在分析实践中无处不在，可归根结底，我们还是可以说，没有人知道如何看见它。

如果它确实处在我们赋予它的那些性质的位置上，这并不奇怪；而我们今天将再次试图推进的正是这一论述。

没有人知道如何看见它，这一点——我们已经指出——同这个世界本身的结构有关，因为这个世界似乎同视觉世界共同延展。自我们论述之初，就一直努力动摇并最终驳斥这一根本幻觉。不过，没有人知道

如何看见它——这里“知道”意为“能够看见”——并不能为这个事实开脱：当人们在分析实践中不断统觉到它时，却仍然没有人知道怎样构想它。

事情甚至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人们毕竟谈论这个所谓“前生殖期”的对象，并津津乐道地围绕它，试图把握现实的这种不公正、不完善的方式类型化；仿佛对现实的把握及其形式只同成熟效应相连……成熟在分析中的支柱当然很牢固，也就是这种成熟同某种必须直呼其名的东西——一项真理——之间的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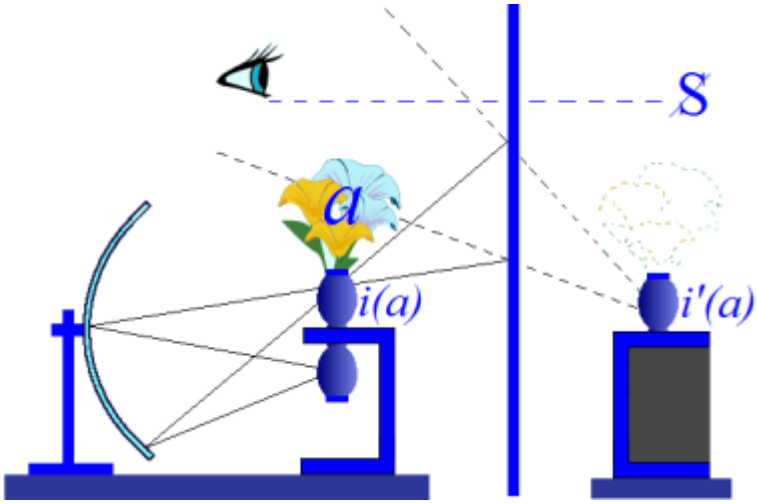
这项真理就是：成熟同性相联系。可是，这一切仍不得不显得淹没在“性”与某种性道德的混淆中——性道德无疑同性紧密相连，因为道德正从性中产生。由于没有得到充分划界，这种混淆使前生殖期对象取得一种神话功能，一切都在其中丧失；而就主体结构更为根本的功能——主体如其从分析中产生的那样——而言，这个对象能够并且必须带给我们的关键之处，恰恰在于它永远废除某种认识观。

所以，人们对它谈得很多：

- 不只是我刚才说过、相当可以原谅的“看见”这一意义，因为我们会看到一个东西得以被看见需要什么条件；

- 而且甚至不知道自己所说之物的意义。既然“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恰恰是分析中必须被翻转、必须被强行突破的位置，也正因此分析才为知识进步开出一条新路，那么我们可以说，分析家没有恰恰在自己应当倾注努力的紧要点上取得进展，便辜负了他的使命。

我绕了很远才钩住这个中心点。运用这套代数——它使我用字母(a)标定这个对象——的效用之一，运用代数记号的功能之一，就是让我们能够从我这番论述最初的步伐起，如循一根金线般追踪它。我的论述先努力钩住分析为何物、又不为何物的紧要点与分界点，从镜像阶段和自恋功能开始；若我一开始便把这个异化性意象称为i(a)，正是围绕这一意象，名为自我的根本误认才得以奠立。



例如，我没有把它称为i(s)，即自身（self）的意象——那本来也足够，因为它无非会是一个意象；要证明它只是想象的，这一点本来已经得到充分指示。我从一开始就把它称作i(a)，这归根结底是多余地复写认同中已有的、关于根本异化的指示。我们正因成为自我而误认自己。

(a)位于括号中、这个记号的核心；因此那里已经指出，还有另一个东西——恰恰是(a)——处在这种捕获的核心，并构成其真正理由。

所以，这里有双重错误：

- 认同幻象的错误；
- 以及对这一幻象核心中真正支撑它的东西的误认。

我想，今天是我第一次指出这一点；你们会在今天后续论述中看到它再次出现：(a)……

只是一个标记、一项指示：我把它说出来，但这里还不给出理由，你们会看到理由涌现——(a)属于实在的秩序。

在封闭研讨班上，我欣慰地看到，有人把截至今天为止我围绕(a)所阐述的内容汇集起来——我甚至会说，几乎覆盖了整个场域——并提出这种汇集仍然敞开的问题。

我顺便向所有未被我召来参加这些工作的人致歉。个中理由是……是数量规模的关系，是别处所谓数量与质量之间的关系：听众一旦过于庞大、过于密集，质量就会改变。我希望这些工作能够采取交流、团队工作的调子。

我所说的这个人——安德烈·格林先生——当然尚未真正开启对话，除非算上同我的对话；因为他要做的是述说我迄今关于对象(a)说过什么，以便向我提问。而问题在这里的切当性足以预先迫使我作出适切回应——否则何必提问？这些问题的切当性使它们成为我希望今年能够回答的问题。

同样，所有没有参加这些研讨班的人都应当知道：交流问题在这里的解决办法很简单。只需把这种小报告传播出去，它就能供所有人定位

我随后可能插入其中的回答。在另一些对话将采取辩论形式的场合，只要其中的论述能够被一份记录所概括——这只是时间延迟的问题——讨论中能够被表述为轮廓、网络的余留所得，也会同样得到传播。因此，所谓封闭研讨班丝毫不是神秘主义，不是某种不能供所有人使用的东西。

所以，我今天从刚才提及的报告所回顾的两个术语出发。也就是说，从我在对分析的阐述中开辟批判性沟槽之初，我们就已经看到如今导向对对象(a)之阐述的东西开始露头、显现：自我是误认的功能。

关键是要看到：相对于弗洛伊德之前所谓的现实功能——我们以雅内为标记——自我的这项构成性缺陷延伸到何处。与人们的断言相反，在弗洛伊德那里，自我并不是现实功能；哪怕它在确立现实原则中发挥作用，二者也完全不是同一回事。自我是知觉—意识装置，即Wahrnehmung-Bewusstsein。

而认识问题历来围绕对知觉的批判转动。恰恰从我们的分析家位置出发，我们难道不能瞥见这样一点吗？它甚至在哲学话语自身中泄露出来——因为话语里最终总拖带着它所反驳之物的钥匙——而分析家关于前生殖期对象的无意义话语，也会在各处让那些可供我们正确定位它的论述环节凸显出来。

我们理应预见，这里会出现某种耀眼的东西；它早就应当成为我们的遗产，由我们提供给所有人。谁不知道人的智力多么短浅？尤其是那些在科学语境进步的引导下，开始在应当把握智力的地方——动物层面——研究智力的人。

当我们能够用绕行行为来判定智力水平时，已经算是得到回报了！

我问你们：就智力而言，人所抵达的更高一级在哪里？确实还有一级。它出现在最初的泰勒斯式表述——泰勒斯[注3]的表述——上：某物的尺度由它相对于另一物的关系来确定，也就是它同那另一物之间，保持着第三物与第四物之间相同的比例。

> [注3] 第欧根尼·拉尔修在《名哲言行录》第一卷中说，希罗尼穆斯记载泰勒斯通过计算埃及金字塔的影子同人体影子的比例来测量金字塔。传说法老阿玛西斯曾以大金字塔高度无人能知来考验他。普鲁塔克《七贤宴》第二节记载："泰勒斯，埃及国王十分赞赏你；尤其是，你毫无困难、不借助任何仪器测量金字塔的方法，令他赞叹不已。你把手杖竖在金字塔投影的末端，由一条光线相切构成两个三角形，证明手杖高度与金字塔高度之比，等于两段影长之比。"他的原则只是：一天中某一时刻，每个物体的影长都等于自身高度；只需确定准确时刻。同时还要让太阳光同金字塔一边垂直，而一年只有两次出现这种情形（11月21日与1月20日）。

这严格说来就是人类智力的界限，因为只有这一点是它能够亲手抓住的。我们安置在智力领域中的其余一切——尤其是最终产生我们科学的东西——都是这种关系的效应，是被我称为能指的东西所抓住的效应；能指的效力、功能与组合所取得的结果，超出了操纵它的主体所能预见的范围。

因为，与人们所说的相反，不是经验使知识进步，而是主体因受能指之钳口——我会这样说——规定而陷入的死胡同。如果我们把握了比例、尺度，以至相信——无疑有充分理由——这种测量观念就是人本身："人使自己成为——那位前苏格拉底思想家说[注4]——世界依人的尺度而成。"

> [注4] 普罗泰戈拉："人是万物的尺度。"

当然，因为人已经就是尺度，而且除此以外什么也不是。能指——我在最近几讲中曾试图向你们阐明它——并不是尺度；恰恰是某种进入实在时、在测量中引入一些人曾经并且仍然称为实无穷[注5]的东西。

> [注5] 据号称“几何学家伊比克拉底”的希俄斯的希波克拉底——索弗罗塔托斯的学生——所说，希腊哲学家始终明确区分潜无穷与实无穷。亚里士多德主要为了数学家的使用而接受前者；apeiron更准确地应译为“无界”。他拒绝承认后者，例如作为已完成整体的自然数集合。潜无穷早在古希腊就已被构想：人趋向无穷，却永不抵达；无穷被理解为一种潜能。实无穷是较近代的观念。文艺复兴时期，斜投影以及后来的射影几何，引入画面或图形中可感知的无穷远消失点。这促使思想家把无穷想成“可抵达”或具有某种接近现实的存在，把无穷当作研究对象的内在性质；又或者更常见地，因为无穷代表上帝，因而“不可抵达”“不可显示”，便以图示手段（如在中心消失点轴线上设置建筑物）把它遮住。

不过让我们回来。当我在说过许多遍之后再次说：使知觉失真的——姑且这样说——是意识；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这种奇异的伪造可能取决于什么？

如果我一向如此重视在心理学层面、在镜像阶段的层次把握它，是因为这就是在它所在之处寻找它；但这个位置伸展得很远。镜子只能由那个分割三维空间——并借此将其更新——的表面来界定、来存在；我们把这一空间视为实在的，它无疑也确实如此，我在这里无须质疑这一点。

我和你们一样移动，丝毫没有踏上道家游历的马镫、骑着某条龙穿行诸世界。

但这恰恰意味着什么？无非是：如果一种被称为双侧的对称尚未通过矢状面刻画那个受到镜像牵涉的存在，镜像就不会具有这种错误与误认的价值。

我们有右与左，它们显然并不相似，却充当相似者：大体上有两只耳朵、两只眼睛；一绺头发固然可能偏斜，但总可以从中间分缝；我们有两条腿……许多器官成对存在——并不是全部。仔细看时，也就是打开身体时，内部多少有些扭曲，不过从外面看不见。

人像蜻蜓一样，看上去是对称的。正是由于这一类偶然——哲学家所谓“外观的偶性”——才首先产生了名为镜像阶段的这种捕获。

对于这种捕获，表面上属于偶然的东西背后，难道没有更深的理由吗？这正是我们可以在这里提出的问题。

当然，对各种形式再看得深入、仔细一点，就可以使我们走上踪迹。因为首先，并非所有生物都带有这种双侧对称；而且我们自己也不真正对称，只要剖开腹部就能发现。

此外，我们曾开始关注形成中的形式，关注胚胎学；在那里，研究越深入，就越注意到我刚才称作扭转、悬殊，或者——我想使用这个极好的英语词——“奇异性（oddity）”的东西，始终支配着构成转化、从一个阶段过渡到另一个阶段的过程。

有一年，我在黑板上首次运用现在将要谈到的这些拓扑学形式，试图写下它们以启发听众，向他们指出由此能够提取什么共鸣、什么类比，好把他们引向我如今终于必须展示为现实本身的结构、而不只是一幅图形的东西[注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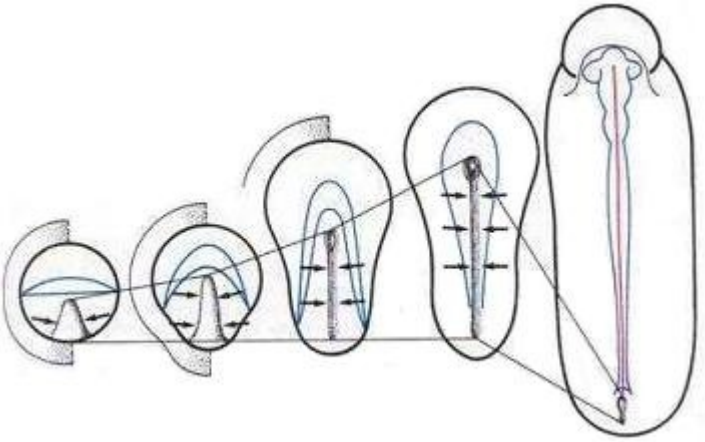
> [注6] 参见1961—1962年《认同》研讨班，1962年3月7日一讲。

他们不知有多少次受到震动……

……当我把某个环面、某个交叉帽的气球般形体剖开给他们看时；那时，黑板上涌现出的图形，乍看之下难道不仿佛一张脑切片——其中有着即便在宏观层面也如此醒目的内卷形式——又或者是胚胎的一个阶段？

毕竟，随手翻开一本胚胎学著作，看看一个已经处于相当晚分裂阶段的卵；它向我们展示所谓原条，随后是那个名叫“亨森结”的小点。它同我曾多次以交叉帽（cross-cap）这一简称给你们画出的东西完全相似，终究相当引人注目。





我不会哪怕有一瞬滑入这种“自然哲学”。问题不在这里；无论如何，我们只能从中找到某种迹象，它表明在生命形式里，也许存在一种不得不模拟更根本结构的义务。

不过，这一点向我们作出的简单指示——也是必须保留的指示——是：我们没有正当理由把身体——这个词严格意义上的身体，也就是我们所是者；我们就是身体，别无其他——把身体的诸维度化约为哲学反思最终由笛卡尔称作“广延”[注7]的那个维度。

> [注7]　勒内·笛卡尔：《哲学原理》，载《著作与书信》，巴黎：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1953年，第571页；另参见《第二沉思》。

这一广延在认识论中：

- 历来就在那里；
- 自亚里士多德起就在那里；
- 在所谓——我痛恨这种废话——西方思想的开端就在那里。

那是一个同质的三维度量空间，而这一点从一开始所蕴含的就是球面：无疑没有界限，却仍由一个球面构成。我等会儿——希望如此——可以明确说明，对一个同质三维空间作出这种正确把握意味着什么，以及它如何同球面相认同；球面始终是界限，哪怕它总能继续扩展。

关于实在的思想——海德格尔所谓关于存在者的思想——正是围绕这种对广延的把握组织起来。这个球面就是最高、最后的存在者：不动的推动者。

笛卡尔空间没有改变任何东西：他只是把这一广延推到其最终后果，也就是一切身体与关于身体的认识都依法属于它。正因此，笛卡尔关于灵魂激情的物理学才会失败[注8]，因为任何激情都不可能成为“广延”的情感。

> [注8]　笛卡尔：《灵魂的激情》，载《著作与书信》，巴黎：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1953年，第695页。

这里无疑历来都有某种非常诱人的东西。我们将会看到：这种球形空间的结构，正是把镜子功能置于认识关系原则上的根源。

处在球面中心的人，看见自己以巨大的形象反射在球壁上：小宇宙回应大宇宙。

认识由此被构想为如下两者的符合：

- 主体这一神秘的中心点；
- 对象这一外围……就问题本身的意义而言，这种构想从此被确立为一场巨大的骗局。

笛卡尔没有充分提防“恶神”：他以为自己能在“我思”的层面驯服它，却在“广延”层面屈服于它。不过，这场骗局也不必然是骗局；它也可以是一个界限，恰恰是上帝施加的界限。

无论如何，在《创世记》大约第五节——我来之前没有时间核查——בְּרֵאשִׁית בָּרָא אֱלֹהִים אֵת הַשָּׁמַיִם וְאֵת הָאָרֶץ [beréchit bara heloïm]中，有一个术语从亘古深处熠熠发光，当然也没有逃过拉比们的注释；圣哲罗姆把它译作firmamentum，译得并不坏：世界的封闭。

在它之外，上帝说：“你不得越过。”别忘了，直到不久以前，天穹仍是最封闭之物。这个情况没有改变。即便人们构想可以不断航向更远，天穹也丝毫没有因此变得不那么封闭。在把它用希伯来字母写下来的人的思想中，所涉及的是另一种界限：רקיע וַיִּבְדֵּל [rakí’a]。

Rakí’a把“上方之水”同“下方之水”分开。人们认为，上方之水禁止进入[注9]。

> [注9] 《创世记》1:7：“וַיַּעַשׂ אֱלֹהִים, אֶת-הָרָקִיעַ, וַיַּבְדֵּל בֵּין הַמַּיִם אֲשֶׁר מִתַּחַת לָרָקִיעַ, וּבֵין הַמַּיִם אֲשֶׁר מֵעַל לָרָקִיעַ; וַיְהִי-כֵן。”上帝造出空间，把穹苍以下的水同穹苍以上的水分开；事情就这样成了。

重要的不是我们乘着可爱的卫星在太空漫游——顺带说一句，我确实赞赏这一点，并不把它化为虚无——而是借助能指及其组合，我们掌握了超越这种度量空间的可能性。

从我们有能力把六维、七维、八维——任意多维——世界构想为可能的（我没有说实在的）那一天起，我们就冲破了רקיע וַיִּבְדֵּל [rakí’a]，冲破了苍穹。

不要以为这些是玩笑，是一些因为不实在就可以任意摆弄的东西。人们会以为可以如此作出外推。人们研究了四维球面，然后是五维、六维球面。

于是人们告诉自己：很好；发现了一条看来会延续下去的小规律。

于是人们以为复杂性会不断叠加到自身之上，可以像处理一个级数那样处理它。完全不是！到了七维时，不知为什么——此处正可以说只有上帝知道，至少眼下大概如此，因为数学家也不知道——那里有一个硬骨头：七维球面造成难以置信的困难[注10]。

> [注10] 参见《精神分析的关键问题》研讨班，1965年3月10日；另参见约翰·W.米尔诺（1962年菲尔兹奖）：《可微流形的和与球面的可微结构》，《法国数学学会通报》，1959年，第439—444页。

我们在这里没有篇幅停留于这些问题。我只是借此从反面、退后一步向你们指出，我说“实在就是不可能”时是什么意思。它恰恰意味着firmamentum中仍然得到确立的东西；它使得你以最有效、最实在的方式作出推测时……因为你的七维球面是实在的：它抵抗你们，不按你们数学家的意愿行事。

同样，在毕达哥拉斯最初迈步时，数——他并没有天真到以为数是人类心灵的产物——刚一开始被用来测量某物、画一个正方形，就给他造成困难。数立刻以其最初的无理效应涌现；正是这一点证明它是实在的：它是不可能，也就是人不能随意摆弄它。

我从这一最初经验中获得的教益，同从七维球面中获得的一样多；后者出现在这里只为逗你们开心，而不是为了造出一个“星球”。

那么问题是：我们如何说明这个历来近在手边、而且仍然处于实在之中的东西？它完全不像认识论描绘的那样：一个中心点、汇聚点、会合点、融合点、和谐点。既然它一直在那里收纳大宇宙，人们就会疑惑，它为何还要经历如此多的波折、化身与变故——这个主体……

我们首先看见——为此根本不必等到弗洛伊德——的是：主体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在哪里实施主体行为，都会从自身分裂……这如何能写入一个具有球面拓扑的世界？

我们唯一的有利之处，是恰好处在这样一个时刻，也许……

由于数学家的推测首先冲破了רקיע וַיִּבְדֵּל [rakí'a]、firmamentum……我们可以赋予空间、赋予实在的广延一种不同于三维球面的结构。

当然，曾经有一段时期，我在某篇报告——即罗马报告——中带你们迈出第一步：清楚标出如下差异……

一边是这个自以为是“我”的自我，以及它要求我们做的事；我们被那个秘密消隐点迷住，它才是镜像背后的真正透视点，而镜像令那个在那里认出自己、观看自己的人入迷……另一边则是言语与话语的“我”，是我所谓饱满言语的“我”；这种言语在那份我几乎不敢不笑着重复的誓言中作出承诺：“我是你的妻子”[注11]，或者“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学生”。

> [注11] 参见《无意识的形成》研讨班，1958年1月8日；《精神病》研讨班，1955年11月30日、12月7日。

至于我自己，我始终只以“你”的形式提及这一维度，任何没有彻底失去理智的人当然都会如此。我首先强调的是：这种消息永远只能从大他者那里、以颠倒的形式被接收。

在关于施雷伯庭长的研讨班中，我曾长篇……

围绕我所谓“施为力量”[注12]、具有奉献效力的断言……反复权衡“你是那个将跟随我者”这个句子；承蒙法语诸神的恩惠，它受益于未来时第二人称和第三人称的歧义，人们不知道究竟应当写suivras还是suivra[注13]。

> [注12] 参见施为性陈述。

> [注13] 参见《无意识的形成》研讨班，1958年1月8日。法语 Tu es celui qui me suivra(s) 的动词词尾可以指向第二人称“你将跟随我”，也可以经由关系代词 qui 指向第三人称“那个将跟随我的人”。

这话可以说；可是，至于那个说“我是那个会跟随你的人”的人：可怜的蠢货！你会跟随我到哪里？跟到你失去我的踪迹之处，还是跟到你想在我头上狠狠来一下“你太过分了！”之处？

人类正是利用这种奠基性言语的轻浮，试图存在。我们之所以能够开始稍微严肃地谈论它，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作出言说的“我”才是真正分裂的；也就是说，在一切话语中，言说的“我”、说话的“我”，总会越出所说之物。

所谓“饱满”言语——我最初教导的第一个要素——在这里不过是一个可笑的形象，指向这样一点：在一切被表述出来的东西以外，还有某种东西在说话，而我们恢复了它在真理方面的权利。

“我，真理，我说话。”在你们踉跄的话语中，在你们摇晃而看不到自己鼻尖以外的承诺中，主体、“我”丝毫不知道自己是谁。“我说话”的主体在某处说话，那是我所谓“大他者的场所”。这永远迫使我们说明一种不是点状的形象与结构，它组织着主体的分节。正因此，我们要尽可能贴近地重新考察这种踪迹、这种切割，以及我们的在世所引入的、犹如一道沟槽、一种图形、一种书写的东西；其意义在于，它比后来产生的一切都更原初，正如书写早在被用来书写言语以前就已经存在。

我们正是在这里后退一步，以便起跳。我们不指望在三维中冲破רקיע וַיִּבְדֵּל [rakí’a]。也许只满足于二维就够了；毕竟我们一直使用这两个维度，而且长久以来始终在同这个问题搏斗：世界上竟有一些自以为在思考的存在，这究竟意味着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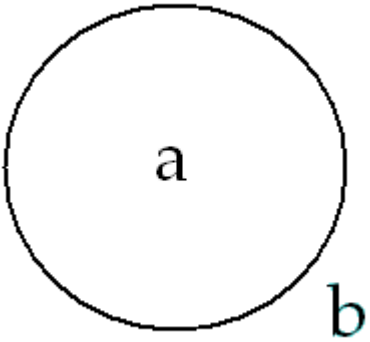
不论我们把它写在羊皮纸、布料还是厕纸上：世界上竟有一些自以为在思考的存在，这是什么，又意味着什么？

那么，我们将采用一个已经得到某个书名说明的功能。这个时代的一位好奇心灵——点名说，就是雷蒙・格诺——把自己的一本文集命名为《边界》[注14]。

> [注14] 雷蒙・格诺：《边界：数学家、先驱者、百科全书派》，巴黎：Hermann，1963年；1978年再版。

既然问题涉及界线与界限——而“边界”没有别的意思，它就是界限或界线——那么，让我们试着把边界把握为真正构成我们问题之本质的东西。

在二维层面，一张纸给出了边界最简单的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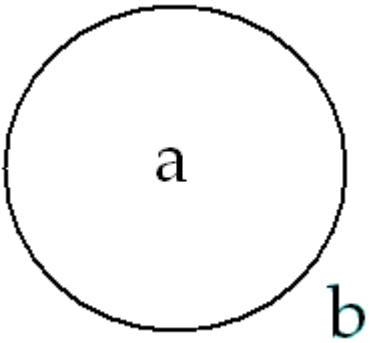
人们历来都使用它，但直到某位亨利·庞加莱出现以前，从未真正注意它。早已有一个叫波皮利乌斯的人，还有许多其他人……如果我们这样画：_____，这是一条边界吗？恰恰不是！

但这并不表示它没有边界。这条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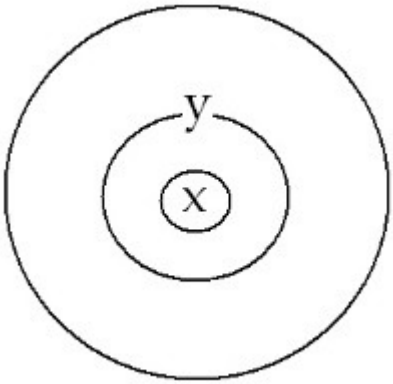
，有两个边界；更准确地说，按照约定，我们将把界定这条线的两个点称为它的边界。

恰恰因为你们在那里看到的东西——它也叫一条闭切割——没有自己的边界，它才是一条边界，是这里[a]与那里[b]之间的边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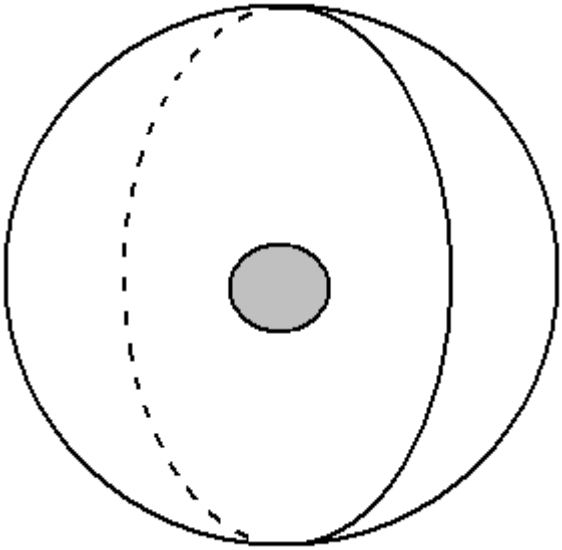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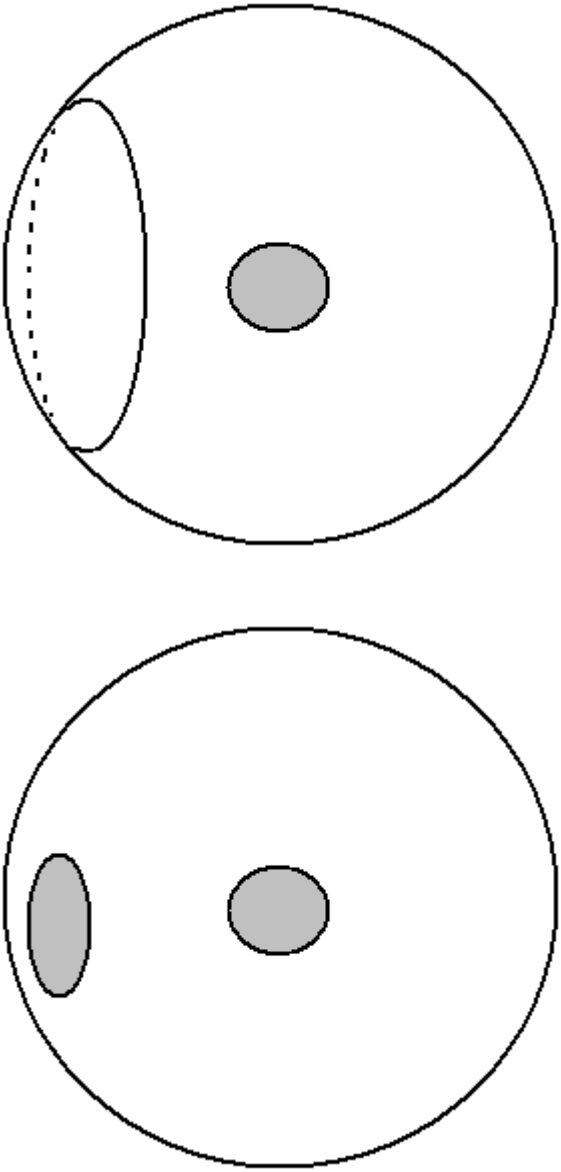
既然我们把自己限制在二维，我们就按这里[a]的东西本来所是的样子称呼它：把它称为一个孔洞。什么里面的孔洞？一个二维曲面里的孔洞。我们将看看，一个二维曲面——根据刚才所说、而且历来就在那里的东西，它是球面；我没有说球体，而是球面——在建立这个孔洞以后会发生什么。

为了看见这一点，让这个孔洞[x]从实验一开始便保持稳定：



我们再造出另一些孔洞[y]。很容易发现，我们允许这些其他孔洞自由运动、允许自己用它们做实验；既然已经有了一个孔洞，那么对其他孔洞产生的结果是：所有其他孔洞都可以缩减为我刚才所说的那个主体点。全部都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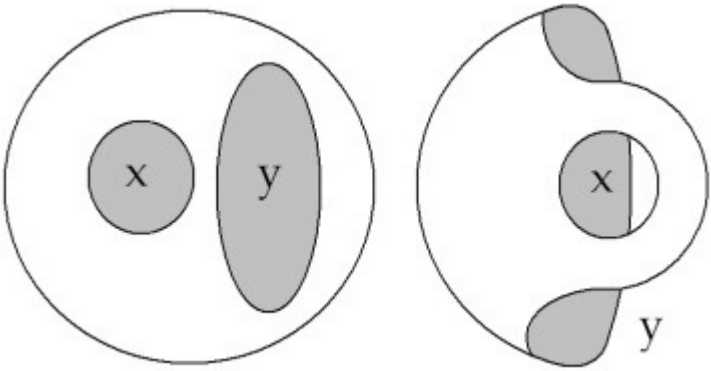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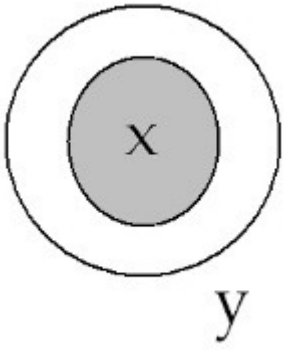


1　2　3

因为，假设我这样做[1—2]，结果是同一回事。球面无论多大，我都能把这个孔洞[Y]无限扩大，让它走到相反一极，并在那里缩减为一个简单的点[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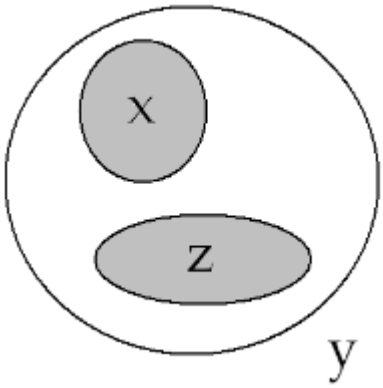
这意味着：在由我们称作圆盘边界的这个边界所规定的曲面上——这个曲面实际上是一个球面——我们能开出的所有孔洞都可以无限缩减为一点；此外，它们全都同心。我的意思是，即使我在第一道切割外部表面上造出的这个孔洞[a：y]，也能经由规则平移被带到另一个孔洞[b：x]的位置。只需经过我刚才所谓球面的相反一极[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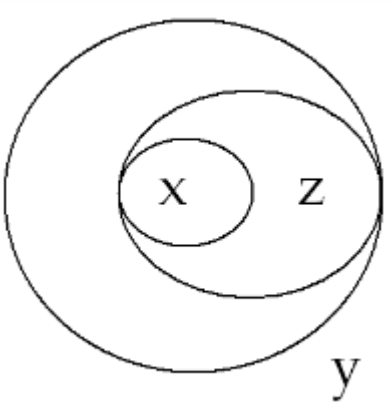


a b c

然而，自从我们造出两个孔洞以后，某种东西已经改变。从现在开始，如果我们继续造孔洞——假设在这里造一个这样的孔洞——这是一个可缩减的孔洞，可以缩减为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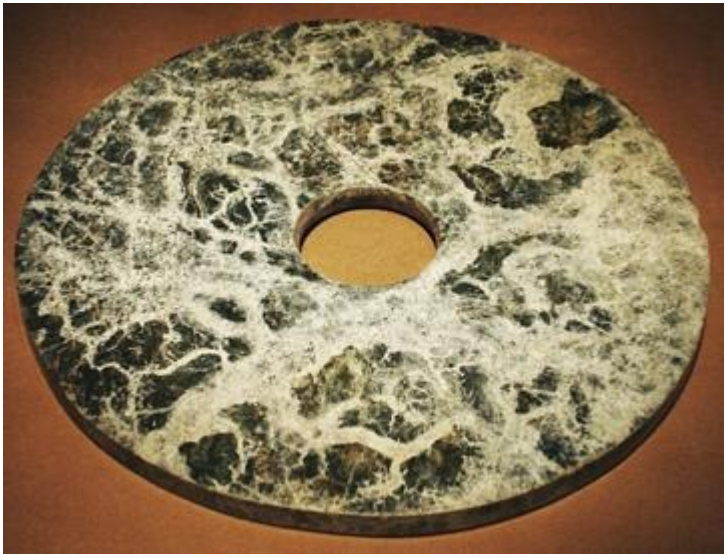
但是，如果我们造出一个既同第一个孔洞同心、也同第二个孔洞同心的孔洞，那么这个孔洞就没有任何逃逸机会，不能缩减为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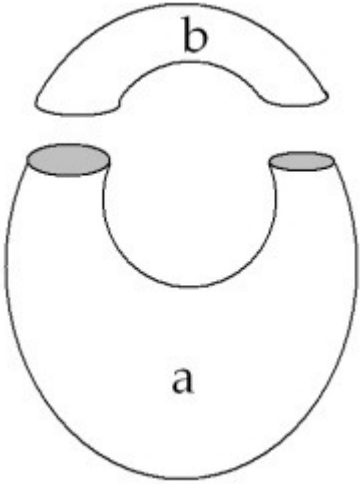
它不可缩减；无论把它缩小还是扩大，它都会遇到由两个孔洞构成的边界界限。

我再说一遍：我用单数说“边界”，是为了表明，在球面实验的下一阶段，我规定了两个孔洞，而这正是我所谓的边界。这意味着什么？这里画出的曲面，即使它——因为可以称作一张有孔圆盘，甚至像一块中国玉璧——在你们看来有些奇怪，你们也很容易认出，它完全等价于所谓的圆柱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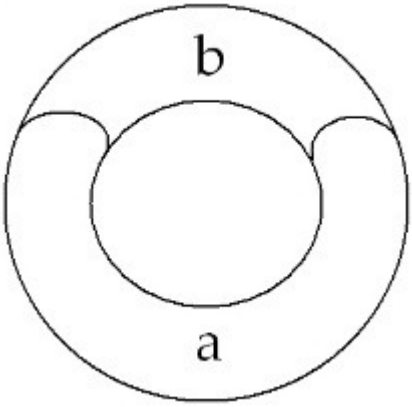
有了圆柱面，我们已经进入完全不同的一类曲面，因为我在这里向你们呈现的是一个有两个孔洞的球面。



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们：这两个孔洞看起来彼此同心还是看起来不同心，完全等价——如果可以这样说，结果毫无二致。况且你们看，我画在那里的这种胃状物就是一个圆柱面；只要把同样的东西接在上面，也就是说把一个有两个孔洞的圆柱面接到先前的两个孔洞（b）上，就一共有四个孔洞。



只要把它们缝合，就会得到一种用小姐们的话说不过叫作戒指的图形；当然，必须在意象中把它保持为空心，才能看出这是哪一类曲面。



我很久以来一直用这个环面阐明许多东西；你们可以在《罗马报告》的最后部分找到其痕迹[注15]。仅凭这个环面——我几乎会说，直观地——我们就能引入某种关键之物，从而走出关于空间与广延的球面意象。

> [注15]《文集》，第32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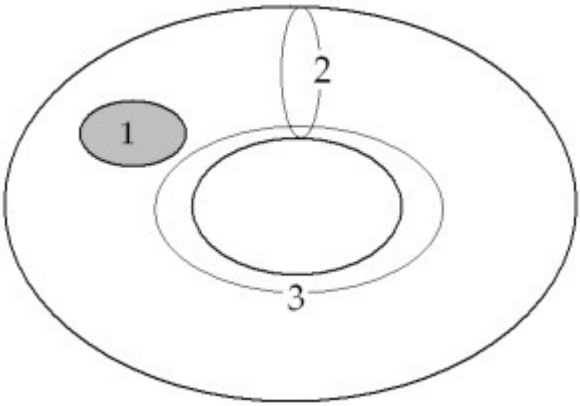
因为我们当然不会以为，刚才画出的就是三维的真正环面。这个二维环面无疑是一个边界；也就是说，只要我们去掉圆柱面的边缘，它就成为无边界者，而作为曲面，它又成为某种东西的边界，划分其内部与外部。

但这只是一个简单图形，只应类比地给我们这样一种观念：如果我们在球形空间的幅度、甚至我所谓空间的厚度中设想它，球形空间可能发生什么……

为了让一群未必熟习数学公式的听众听懂……也就是空间以环面方式在自身之上扭转。

无论如何，只要像我们所需的那样，把它当作二维层面的模型，就会发现：关于我们能够画出的那种一维边界、那种切割，以下两类之间存在最清楚不过的种类差异：

- 能够缩减为一点的圆[1]；



- 以及那些因自身是一个圆而仿佛被闭锁、被阻挡的圆，例如像这样[3]沿着整个环面画出的圆；甚至是这里[2]，把它闭合在我们不妨称作——

环面的环身厚度中。这些圆不可缩减。

我将向你们展示——这里会重拾我在关于《认同》的研讨班那一年已经阐述的内容[注16]——环面如何为我们提供一个特别典范的模型，来形象化索求与欲望之间的结与纽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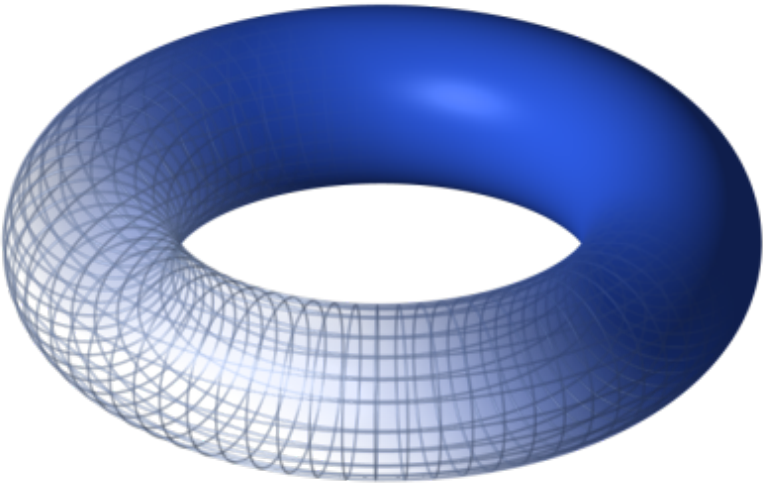
> [注16] 参见1961—1962年《认同》研讨班，1962年3月21日至4月11日各讲。

相关知识卡 环面中的要求重复与欲望客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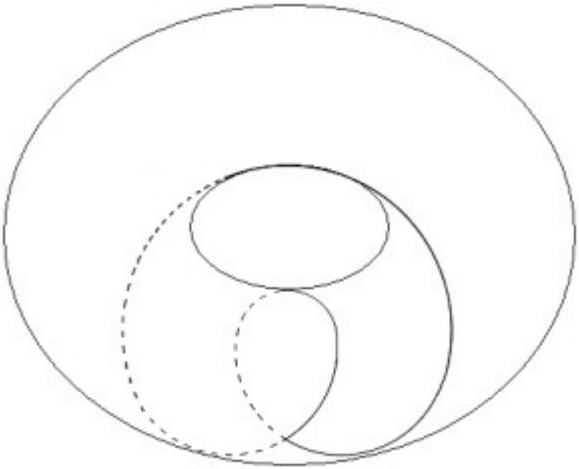
为此只需规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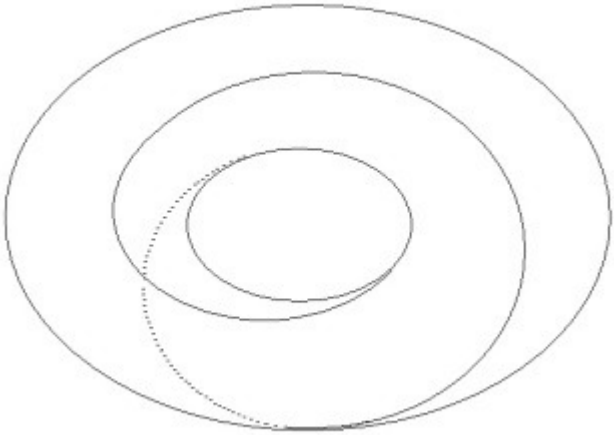
这是一项约定；不过，等我讲完后续图形，你们就会看到它的深层根据……索求必须既围绕内部——环面这一圆环的内孔——完成一圈，又要在不与自身交叉的情况下重新闭合于自身。你们得到的大致就是这个图形。

无论怎样剥去外观，它都是这样的图形，圆环的中央空洞在这里：



于是你们很容易发现，画出这样一个闭环时：





你们不得不围绕圆环内孔至少作两圈——我这样说——并且为了让这些圈相接，还要围绕另一个空洞转一圈；也就是至少2D + 1d，或者反过来，2d + 1D。

换句话说，一个欲望总是假定至少两个索求，而一个索求总是假定至少两个欲望。

这是我曾在某个时期阐述过、并将重新讨论的东西。我在这里只作提醒，为的是指出一个要素；我们将能以一种消除图形晦涩性的方式重新谈论它。

在我离开你们之前，必须再进一步。也就是说，要向你们展示这门拓扑学真正的发现；它对我们来说绝对关键，因为它使我们能够构想主体这道沟槽，与我们能在其上钩住的一切操作性东西之间的纽带。尤其是这样一种幻象：它作为旧认识论的残余沉积在“阔绰的精神分析”

最底部，除此以外什么也不是——自体性欲融合的观念，关于思维存在同承载它的存在之间存在原初统一的假定；因为无意识所涉及的正是思维……

- 仿佛胚胎学向我们展示如下事实还不够：正是从卵本身产生那些与胚胎组织连成一体、彼此邻接、由同一种原初质料构成的包膜；

- 又仿佛从弗洛伊德最初的书写开始——我们看来似乎从未能超越它们——“狼人”案例[注17]的层面上还不够显然……请记得，“狼人”出生时带着胎膜……这个事实难道对主体如此特殊的结构没有关键意义吗？他始终拖带着这种仿佛是包膜的残片，拖过已经跨越的步伐，甚至拖到弗洛伊德分析的最后几步之后；那是某种遮蔽、面纱，是某种使他感到自己仿佛同现实分离的东西。

> [注17]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五个精神分析案例》，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54年；1970年第4版。

一切难道不都带有如下痕迹：

- 在存在的原初情境中，所涉及的正是它的封闭、包裹、在自身内部的闭合；哪怕它相对于另一个有机体所处的位置——生理学家丝毫没有忽视这一点——并非共生，而是寄生；

- 所谓原初融合中所涉及的，恰恰相反，是这样一种始终被主体追求的理想：恢复曾经构成其原初闭合——而不是开放——的东西。

这是混淆的第一阶段；当然，这并不表示我们应当停在这里，像莱布尼茨一样相信单子。

因为，如果这种补充物始终仍要被我们寻找，仿佛一场永远未能实现的修复——我们在临床上确实看得到它的痕迹——主体毕竟仍是开放的。我们要找到的恰恰是一个界限、一条边界；这条边界应当不是边界，也就是说，它让我们能够在其曲面上画出某种构成为边界、但其自身不是边界的东西。

你们可以……你们已经看到反转八字形在环面上重新画出；它切开环面，以某种扭曲方式将它打开，却仍让它保持为单独一片。而重新构成的环面是一条边界：它有内部与外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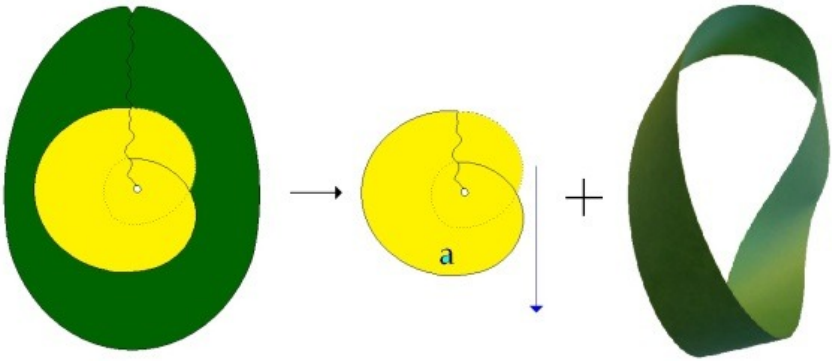
因此，我们可以从写在某个本身就是边界的东西之上的某种边界功能中提取模型与教益。

我们需要一种边界功能，它在随后可画出的各种边界之间规定出类似我在曲面上描述的那些效应——一种差异、一种差异化。我们需要它位于某种并非真正边界的东西上，也就是不规定内部或外部的东西上。这正是我刚才称为[……]的、在纸面上呈现为某种交叉帽或cross-cap的图形所给予我们的。

我会说，这个图形相对于我们要说的内容走得太靠前了。我今天在离开你们之前想强调的是：在这个曲面上——它虚假地闭合、虚假地开放，正是我所谓的交叉帽——画出刚才描述的同一条反转八字形边界时，产生的两个曲面中有一个……

我们会得到两个曲面，而这两个曲面在这里彼此有别，也就是说：

- 一个是圆盘；
- 另一个是莫比乌斯带。



而这将使我们随后获得结构不同的各种边界。

在莫比乌斯带上画出的任何边界，都会获得与画在圆盘上的边界截然不同的性质；下次我会告诉你们是哪些性质。

然而，这个圆盘构成一个不可缩减的相关项……

一旦我们面对实在的三维世界，面对这个相对于我们的拓扑结构、带有不可能标志的世界……这个圆盘就在最为原初的东西——莫比乌斯带——那里占据决定性功能。

在这幅形象中，莫比乌斯带代表什么？

我们下次可以通过展示它是什么来说明这一点：它就是纯粹而简单的切割；也就是说，它是我们精确结构化主体功能所必需的支撑。主体作为这种密切相切的力量[注18]、作为能指对自身的这种捕获，必然成为分裂的主体；它还要求，主体内部的任何再切割，即使被推到最极端，也只能越来越隐蔽地复现其自身结构。

> [注18] Osculatrice用于描述以某种特殊方式彼此密切相切的线、平面或曲面。

但是，它的存在由其在第三维中的功能——更准确地说，由其在其中存在的实在中的功能——所规定。

我将向你们证明，圆盘作为实在，处在必然穿越这一图形的位置上；而莫比乌斯带这一图形使主体对我们成为可能。

- 这种对无正面亦无反面的带子的穿越，使我们能够给出主体作为分裂者的充分形象。

- 这种穿越，恰恰就是主体本身的分裂。

在主体中心、主体核心，有一个并非点的点；它并非不留下一个中心对象。

请强调这个“并非不”，它同我在焦虑生成中所使用的是同一个说法。这个对象相对于对象世界的功能，我们下次会加以指明。它有一个名字，叫作价值。

如果没有某种更为原初的东西——某个名为对象(a)的对象，而它的价值有一个名字：真值——那么对象世界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被保留为价值。

第6课 · 1966年1月12日

我要向《分析手册》的问世致意。我要对高等师范学校的听众说：我怎样感谢你们的合作都不为过；你们的在场给我以巨大支持。

与我曾经听到的说法相反……

哪怕只是以回声状态听见，因为那话是在离我很近的地方发出的，也就是在我的学生中间……理论……

我在这里形成、建构的理论……理论绝不能被列入神话之列。

理论，只要是科学理论，就既声称又证明自己不是神话。

它从那个说话者的口中作出这种声称；说话者依照一个在任何理论中都必须重新纳入的层面来陈述它——言语的层面，即在陈述以外的言说维度。

因此，在理论的起点，知道以谁的名义说话并非无关紧要。我以弗洛伊德之名说话，并不是偶然；而另一些人将不得不以那个承载我名字的人之名说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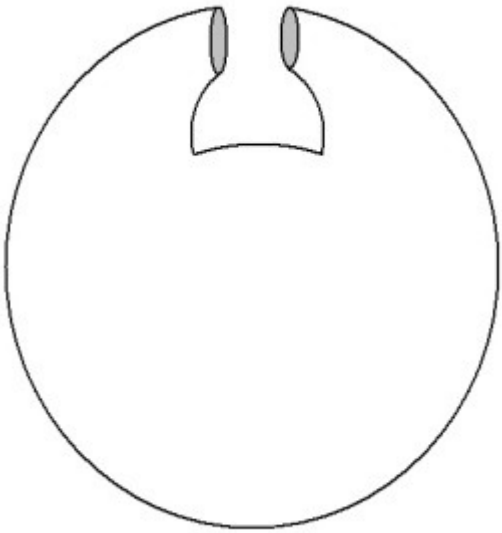
例如，当我把一种以某种现象学名义作出的陈述揭露为非真理——“痛苦的真理除痛苦本身以外别无其他”——我是在说：只要还没有证明以弗洛伊德名义说出的东西……

即痛苦的真理并非痛苦本身……纯属杜撰[注1]，那么前一陈述就是一项非真理。

> [注1] Controuvé：完全捏造的、虚假的。

话虽如此，科学的诞生不会永远悬系于奠立它的那个人之名，因为科学不仅声称自己不具有神话的结构，还证明自己不具有这种结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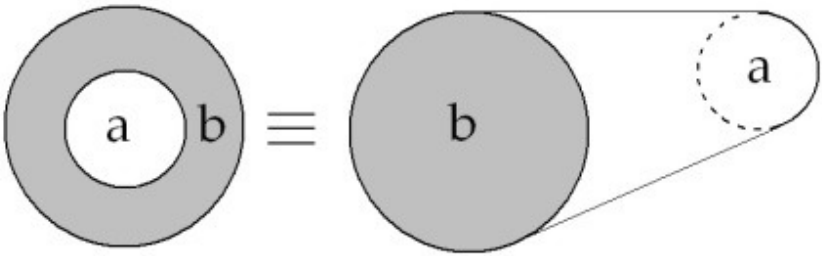
它通过证明自己具有另一种结构来证明这一点。这就是我在此进行的拓扑学研究的意义。今天我要从上次停下的地方继续：环面结构。环面由拓扑学所谓球面之曲面上的两个孔洞相接而构成。我想你们不会把球面同儿童的气球混为一谈，尽管二者当然关系极大；气球无论充气与否，哪怕在你们口袋里缩成一块小手帕，它仍然是一个球面。



上次结束得无疑有些仓促，因为我受到那个支配我们所有主体间关系的切割——时间的切割——所限制。

我停在环面曲面上的一条边界切割上；那是一条闭合边界，它在环面上建立最小重复。

一圈不足以向我们呈现环面结构的本质。一圈会让构成环面的两个孔洞之裂口再次出现；它随这两个孔洞一起，恢复我们最初界定的圆柱带之开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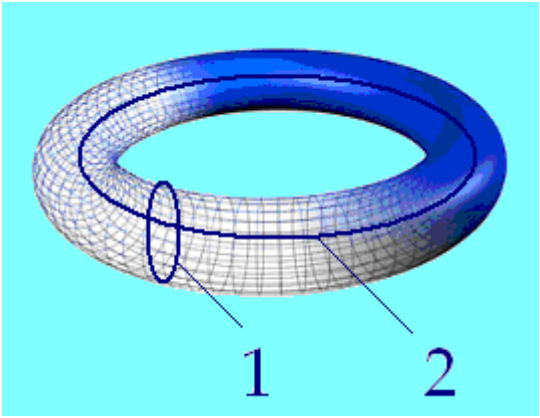
也就是那个东西……

我想今天无须再讲它；所有在场者上次也都在场。至于其他人，天哪，只能遗憾了，让他们自己去了解……我曾说过，球面上的任意两个孔洞始终同心，哪怕乍看之下它们显得处于所谓的外部关系。它们始终同心，并产生我在这里画出的、名叫带子的东西；为了使用方便，我们在这里按约定称它为圆柱带。

从拓扑上说，它可以像我上次告诉你们的那样，是一块平坦而穿孔的玉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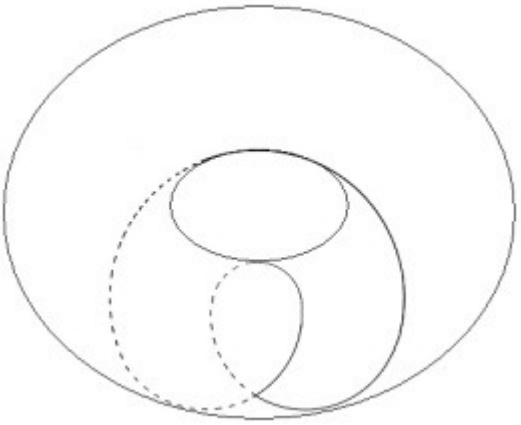
这只是因为该带可以、而且确实会以这种图形出现；它出现在艺术、或人们所谓的艺术中，并非没有缘故……所以，它既可以是这种中心穿孔的平面形式，也可以是圆柱面；二者在拓扑上等价。

那么，在环面上转一圈：



例如这样作出的切割[1]，或那样作出的切割[2]，只会把环面还原为圆柱带的结构，丝毫不会揭示——姑且这样说——它的性质。必须转两圈。这很便于为我们支撑重复的必要性，也便于支撑环面将要代表的东西；但要使这道切割闭合，还必须加上围绕第二个孔洞所转的一圈……

因为，界定环面结构的——我是说从直观上——……我自己也很为难，竟不得不用诉诸你们眼睛、诉诸直观的术语来继续这番论述；说到底，环面就是这个空心圆环。不过，我们不妨利用直观支撑，毕竟它也回应了结构的基础……要让切割在围绕那个不妨称作环形孔的孔洞转两圈之后闭合，这道切割还必须围绕另一个孔洞转一圈。我们不妨称后者为——这个名称或许不是最好，但这里可以给你们一个意象、一个图形——“中央孔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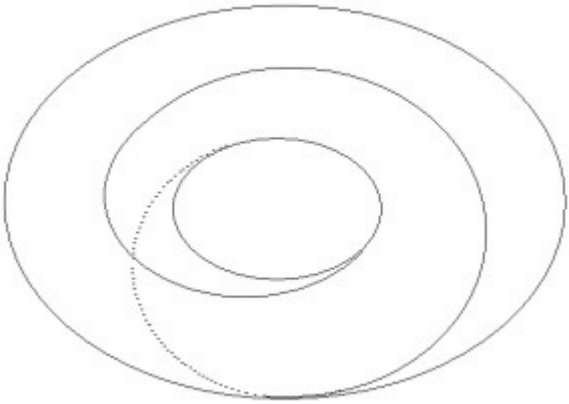
按照约定，我们将用它来代表……我依照“代表项”一词来说“代表”。这个代表项是否值得被称为表象，以后再看。代表项在这里有一个好处，就是表明“代替某物”；这意味着，关于表象功能尚未作出任何裁决，也意味着，也许，在这里被界定、切出、确立为切割的东西，在另行通知以前完全可以按字面把握，视为实在地就是问题本身。

因此，“代表项”这个术语眼下足够了。

那么，每当这一圈得到重复时，便会发生如下情形……

按照约定，我们把这一圈等同于索求的一圈……两个D不可能单独存在；要让曲线闭合，也必须围绕中央孔洞转一圈。2D不离d；或者，如果你们以另一种方式切割——我想，这也完全可以构想——

我必须把事情说得再严谨一点，免得自己完全……这也同样可以构想：要使切割闭合，一个D（一个索求）蕴含围绕中央孔洞的两圈，而我们把它称为两个d的等价物。



索求与欲望就是我们……

在我们早已准备的建构过程中、在尽可能贴近分析经验而引入《言语与语言的功能与场域》[注2]诸术语时……赋予分析经验之核心地位的东西。言语与语言不只是分析经验的媒介、工具、手段；必须考虑到，归根结底，分析经验没有除这种言语与语言以外的其他支撑。

> [注2] 《文集》，第237页；或第一卷第235页。

如果可以这样说，断言分析经验的实体是言语与语言，正是我们在其上建造第一次恢复弗洛伊德意义的基本材料。当然，对我们而言，这并非说尽一切。环面拓扑最终要支撑的，是通过赋予我们形象、让我们能够直观把握，来呈现索求陈述与分割索求、名为欲望的结构之间产生的分岔。

相关知识卡 **环面中的要求重复与欲望客体**

这是我们支撑一种经验的方式；而这经验的主体性预设仍有待深入……

精神分析经验抵达我们在这里由环面支撑的这一结构阶段；我刚才说过，它是我重建弗洛伊德经验的第一步……从某种意义上说，《言语与语言的功能与场域》就是把这经验安置在纯粹象征界的基础上。

但如果环面不足以说明精神分析自身的辩证法；如果在环面上，我们可能以为自己不得不永远在索求与欲望这两项——一个分为两个，另一个被遮蔽——的循环中旋转；如果我们必须用这道切割做些什么，并且必须看见它把我们引向何处，也就是：这条圆、这条边界，按照一切边界自身的公式，都是无边界者，会永远无休止地围绕自身旋转，那么利用对这条边界的切割可以重建什么？

相关知识卡 环面中的要求重复与欲望客体

所以，在离开它以前，让我们暂时停下来。面对这一……结构……

你们刚才看到我犹豫，因为我差点要说“这个形式”；事实上，当我们将离开它、过渡到另一种结构时，它在坠落的那一刻确实会作为一个形式分离出来……让我们暂时停在那里，考察它何以可能留住我们、甚至必然留住我们。因为这不是徒劳的绕路，而是我们理论建构的必经之路。既然我们必须从《言语与语言的功能与场域》重新出发，把它作为起点，那么这套纯粹象征界就被写入了一些条件；正是这些条件使神经症者——而且我会说，现代神经症者——成为可能……

这并非主体的神话式显现模式，而是一个具有历史年代的模式；它无疑在某个日期进入历史现实，即便这个日期无法确定。由于缺乏文献，我们不会迷失在斯多葛时代的强迫症者是什么样的问题上；若偶

尔要重建，也会谨慎地作出结构上经过修正的重建。这不是我们关心的东西……因为这个现代神经症者[……]并非同某种东西的涌现无关：在把握确定性时，理性模式发生了一次位移；我们曾试图围绕笛卡尔我思的历史时刻来圈定它。

这一时刻也同另一次涌现不可分，即科学的奠立；科学同时闯入它所颠覆、甚至我会说强行突破的领域。这个领域有一个完全可以明确说出的名称：同真理的关系。主体功能由此被引入这种同真理的关系；其界限、接缝处的联结——姑且这样说——具有一种地位，而我只曾在对我们论题有用的程度上试图勾勒它。因为没有这一地位，就不可能构想：

- 无论作为这种存在本身；
- 还是现代神经症者的结构。哪怕他对此毫不知情，他也同这种在场共同延展——

即科学主体的在场。

此外，正因为神经症者的临床与治疗地位是由精神分析赋予的——无论这听来多么悖谬——我断言：神经症者只有在精神分析临床与治疗这一审级中才以“完成了的”形态存在——无论这听来多么奇怪。[注]

> [注] 原文校勘：Staferla 底本与 ELP 公布的 J.L. 速记本均作“il n’existe […] complété, que de l’instance de la clinique et de la thérapeutique psychanalytique”，口语句法不整，但没有支持“临床实例”这一译法的异文。Gallagher 录音直译本将此处处理为“只有借精神分析临床与治疗这一作用审级，才以完成形态存在”。下一段的“症候的补项”表明，complété 指神经症的症候构成在分析临床中被补足，而不是病人本人得到人格意义上的“完成”。

既然我说了“完成”，你们理所当然会据此说：精神分析实践在字面上就是症状的补充。为什么不呢？因为症状学确实正是从某种透视的张力、从某种质询神经症痛苦的方式得到完成，而且是在治疗中完成。

弗洛伊德强调了这一点，而且完全正确。症状学也可以在别处得到完成，这一事实并不与之相悖：甚至在弗洛伊德完成自身经验以前，神经症者已经有某种同雅内先生一起完成其症状的方式。

问题恰恰在于，我们可以从雅内式结构中保留什么，以构成作为这种神经症者本身。

不过——我立刻告诉你们，不要因此动摇——病人相对于医生的这种东西，我不会称之为唯心主义，而会称作相对主义。你们最好不要急着跳进去，因为我说的完全不是这个，尽管人们听到的正是这个。那是因为我在学院会议中过早地引入了精神分析临床的这种功能；在那里，当然，我立刻就收获了“临床医生补足神经症者”这一解释，而说实话，我曾期待听众表现得更好。

我期望如此之高或许也有些过分，因为为了说明，我不得不经过完成这个术语；等我能够从另一种结构继续推进时，你们会看到它将如何得到修正。这里或许确有一种补足，但它不属于同质秩序。

接下来的结构将向我们呈现这一点；我的意思是，我要在这里重新引入莫比乌斯带。

无论如何，我们已经要清楚标出这里存在的根本悬殊。它已经可感、已被写下、活生生地存在；即使精神分析起初以那些愚蠢形式出现，它仍因此引发巨大反响。

我说，科学所建立的主体模式进入以后，颠覆并强行突破同真理的关系领域。请注意，在精神分析把言语交给作为这种神经症者时，他所代表的——沿用我刚才的术语——无疑首先表现为一种对知识的索求、一个召唤；而这项索求曾被指向科学。

但是，精神分析决定性地引入了什么？在那个自我授权并以自己在这里是科学主体为支撑的人一边，无论他是否知道自己以何种方式承担责任——必须说，他尽管以此自夸，却看来不总是知道——独特之处在于：言语被交给我所谓作为真理代表的神经症者。要让精神分析建立并具有我们依照这个词的广义用法所谓的意义，神经症者就是、也只是真理在说话；那正是我曾让真理以自身名义说话时称作真理的东西：

“我，真理，我说话。”[《文集》第409页；或第一卷第406页。]

我们被要求正是在这一点上、尽可能贴近地停下来，因为我们所倾听的人代表真理。

这就是新的维度。它的独特性在于这种悬殊：人们给予某种言语与语言的显现一种绝对疯狂的信用，而这种信用恰恰是在科学中给予的；科学在奠立自身的根本位移中，为科学主体排除了言语与语言的显现。对科学主体而言，问题只在于缝合那些裂口、开口与孔洞；这个暧昧、不可把握，却历来被清楚定位为欺骗领域的东西，将通过这些孔洞介入——而真理正是在这个领域说话。

我们要赋予地位的，正是这个奇怪的接合与接口。

我再说一次……

我无疑已经有太多机会发现，要让人听懂，坚持强调是多么必要……作为这种真理本身，它被激发、被传唤；它不再像科学地位涌现时那样被当作问题，而是来到——姑且这样说——法庭上亲自陈述案情，在科学领域中亲自提出它自身的谜题。

这种同真理的关系无法被回避。

我们拥有一种被称为现代逻辑、所谓命题逻辑的东西，并非没有缘故；它已经得到初步勾勒……

甚至可以说，也可以相信；由于我们的文献如此匮乏，必须给予足够信用……我说的是，它已由斯多葛派初步勾勒。

这种逻辑的奠立本身……你们若轻视它显现的重要性，就错了。即使它在科学建构中出现得很晚，却在我们当下的关切中占据如此非凡的位置；这至少揭示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科学开始前进的早期大概已经得到解决，但它如今在我们发现它的约会处重新同我们会合，并非偶然。

我甚至无法说出任何足以向内行提醒它所建立的复杂性、丰富性、撕裂与悖论的东西；只想简单地指出一个参照点：它把真理功能化约为什么。

这个ἀλήθεια[aléthèia，真理]，这个若不遮蔽就无法揭示之物的暧昧形象……

海德格尔提醒我们，ἀλήθεια[aléthèia]在我们的思想中具有奠基性功能，并提醒我们返回那里。我必须说，这带着一种奇怪的哲学家式笨

拙；因为在我们如今所在之处，我敢说，我们精神分析家对此能说的，确实比海德格尔就Wahrheit（真理）在同Wesen（本质）的关系中即使被划杠以后所说的还要更多[注3]……让我们暂时把这一点搁在一旁，只说：同ἀλήθεια[alêthéia]——我正为此重新引入它——相对立的，从斯多葛派以来就是ἀληθές[alêthés]，中性形式的、作为属性的“真”。

> [注3] 马丁·海德格尔：《真理的本质》（Vom Wesen der Wahrheit，1943），载《问题I》，巴黎：伽利玛出版社Tel丛书，1990年。

从ἀλήθεια[aléthèia]中分离出来的ἀληθές[alêthés]可能意味着什么？

当然，我并不是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的人。

让我们这样说：全部逻辑——你们翻开任何一本现代命题逻辑教科书，无论它是否被称作符号逻辑——都会让你们看见所谓逻辑运算的游戏被建立起来：例如合取、析取、蕴涵、等价蕴涵、排斥……

你们不会在任何地方找到我前年[注4]以异化之名引入的那项逻辑功能——我顺便告诉你们；以后我会回来讨论……这些运算从把一个陈述限定为ἀληθές[alêthés]、真或假，也就是赋予它一个真值的可能性出发，以所谓纯形式的方式奠立并得到界定。

> [注4] 参见1964年《精神分析的基础》研讨班，1964年4月27日至6月17日各讲。

最普通的逻辑——说实话，它历来延续，并且也许确有某种理由继续延续——是二值逻辑。一个陈述非真即假。

有充分理由推测，这种处理方式完全不够；现代逻辑学家也确实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尝试建立多值逻辑。

嗯，你们知道，这可不方便！不过我会说，暂时而言，我们对它没有兴趣。

有意思的只是知道：人们在ἀληθές[alêthés]——真或非真——的二值基础上建构一种逻辑，而且能够建构一种丝毫不限于同义反复的东西：它不只是“真者为真、假者为假”，而能延伸许多页；它当然强烈参照同义反复，却仍然建造某种让人取得进展的东西。

这与另一个问题完全相同……从逻辑学家的某种观点看，人们可以说数学是一种同义反复；但它仍然是一场征服，是一座富有成效的建筑，而它的顶峰、巅点、发展——随你们怎样称呼——完全是实质性的、存在着的。相对于前提，人们确实建造了某种东西，取得了一项知识。

换句话说，同真理的关系在这里由对值的纯粹、简单指涉加以缝合。当人们追问“为真”是什么、要求更多时，所谓实证主义或新实证主义思想当然会求助于所指；然而这种对所指的求助……

如果它指的是经验，或任何属于经验对象性秩序的东西……就始终不够；每次人们走上这条路，都很容易证明这一点。

因为，仅凭这种指涉，既无法说明全部科学建构的动力，也无法说明其部分、发展或危机。仅仅为了拥有一种健全的逻辑，我们也必须记

住：我们完全可以排除亚里士多德意义上对存在的简单关系；亚里士多德说：

- “真，就是说存在者存在”；这里的“存在”并不是“实存”；
- “假，就是说存在者不存在”，说它“不是”它所是者[注5]。

> [注5]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Γ卷，1011b；贝尔纳·西谢尔译，Pocket第296号（2007）及第326号（2010）。

人们试图寻找出口，以逃离这种对存在的指涉。这里有罗素式的出口，即诉诸事件；事件完全不同于对象。罗素兑现了这场赌局[注6]，其唯一参照是事件，也就是时空交叠——我们可以称之为一场相遇——于是人们将界定：

> [注6] 伯特兰·罗素：《逻辑原子主义哲学》，载《哲学逻辑文集》，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88页及以下。

- 真，是一个确定事件的概率；
- 假，是一个不可能事件的概率。

这项理论、这个层面只有一个弱点，那就是还存在……

我们分析家正是在这里重新介入——一种相遇；我在来这里讲课的第一年[巴黎第五区乌尔姆街高师]谈过它，它紧接着重复……那恰恰是同真理的相遇[注7]。

> [注7] 参见1964年《精神分析的基础》研讨班，1964年2月4日（重复）及2月12日（τὐχη[tuché，偶遇]）两讲。

因此，不可能排除我所描述的这个大他者场所维度；一切作为言语被表述出来的东西都在那里把自己设定为真，谎言也包括在内。谎言的维度不同于伪装，恰恰因为它具有把自己断言为真理的力量。

在真理维度中，也就是在作为象征事实进入我们场域的一切之总体中，真理在成为真或假以前……

依据那些——我已经向你们指出——并不容易界定的标准；因为它们总是一边引入存在问题，另一边引入恰恰同所问之物——同真理——的相遇。

真理介入，得到恢复，并作为原初虚构衔接起来；一套特定的坐标秩序将围绕它涌现，而这里要紧的是不要遗忘其结构……在真理的辩证法能够有效继续以前，这正是问题所在。

正是在这里，那个我称为真理与知识的接口点之上的工作、紧握和经纬变得令人着迷。

如果去年我们在这里如此长篇、如此高度重视弗雷格的论题[注8]，是因为他试图给出一种解决……

> [注8] 参见1964—1965年《精神分析的关键问题》研讨班，1965年1月27日、2月24日、6月2日各讲。

它是诸多方案之一，但因朝向一个激进方向而对我们具有特殊的揭示力……当我们已经看见或瞥见……

多亏一些愿意在这里回应我的人……我们看到的是：在概念构想层面，一切都被拉向某一边；将要取得或不取得真理之值的东西，带有一种特定的迫促、缩减与限定。正因此，弗雷格才能从中提出他自己

的数理论；细看之下，弗雷格式概念完全围绕能够被赋予一个专名的东西来组织。

而对我们来说，根据去年在这里作出的批评……

请原谅那些当时没有参加的人……这一点揭示出一种特殊的主体性特征……

这里的主体性，是按照我们自己赋予“主体”一词的结构意义而言……而对作为科学逻辑学家的弗雷格来说，这一特征正是科学对象本身的刻画。

我知道，自己在这里不过是接近一个需要展开的点。

如果要展开，也只能根据问题展开。若有人对此提出问题，可以在我的封闭研讨班中进行。不过，我已经作出足够说明，可以同上次结束的地方接上：问题正围绕弗雷格式的[注9]Bedeutungswert（指称值），即Wahrheitswert（真值）这一功能。

> [注9]　戈特洛布·弗雷格：《意义与指称》，载《逻辑与哲学文集》，巴黎：瑟伊出版社Points丛书，1994年，第296号，第102页。

如果这个真值确实构成问题，那么也许就在这里，你们将看到：我们能从自己的经验出发，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带来某种东西，揭示其真正秘密；它属于对象(a)的秩序。

正是在对象(a)这一层面，作为在知识把握中坠落的对象，真理问题才追上作为科学之人的我们。

相关知识卡 精神分析的对象：对象 (a) 与主体分裂

这一点被遮蔽，是因为对象(a)甚至不出现在现代逻辑所建造的主体缝合中；而我们的经验恰恰迫使我们在那里恢复它。在那里，理论不只声称而且证明自己高于神话；也只有从这里出发，才能赋予主体的地位……

相关知识卡 精神分析的对象：对象 (a) 与主体分裂

一种能被说明、而不只是被确认的地位……也就是作为分裂者的地位；这个主体的意义不可能逃脱这种分裂。

射影平面的结构正是在这里被引入，因为它的曲面属于另一种类型，使我们能够用另一种方式回答什么被切分为对象、什么被切分为主体。

这些年来，我已经向你们展示过这条莫比乌斯带，也已经给出若干指示，引导你们把它用于我们所说的结构。我曾有一次在你们面前建造莫比乌斯带；你们知道怎样做。取一条我所谓的圆柱带，把它扭转半圈，再把两端粘在一起，就制成这条只有一个面、没有正面与反面的莫比乌斯带。

我第一次引入它时[注10]，已经提到如下问题：这个曲面能不能像衣服那样配上衬里？怎样才能或不能给它加衬？

> [注10] 参见1964—1965年《精神分析的关键问题》研讨班，1964年12月9日一讲。

好，请在这里注意球面结构的一个本质特点。至少从思想涌现到科学介入以前，全部思想都生活在这种球面结构上；换言之，就是宇宙论思想。当然，即使在科学中，它仍然会在那些不知道自己说什么的人那里主张自己的权利。

在社会问题上抱有革命主张，并不足以逃脱某些死胡同；这些死胡同恰恰涉及任何革命得以介入的根源，也就是主体。

不过，我不会在这里再提同一位苏联同行的对话，也许我已经提过它。

我得以发现，后来又通过信息得到确认——请相信，我的信息很丰富——在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中，人们仍是亚里士多德主义者；也就是说，那里的宇宙论并无不同：世界是一个球面，一个球面能够套在另一个球面内部，如此层层相套，仿佛洋葱皮。主体同对象的一切关系，都是其中一个小球面同包围它的球面之间的关系；而最后一个球面的必要性——尽管没有被明确表述——仍然隐含在思考现实的整个方式中。

无论人们怎样看待它，这确是一种可以涂上某种荒唐地被称为……的色彩的东西——

不久前我还听到有人使用这个词……“现实主义的”，用来指称——照他们的话说——现实的神话。

这里涉及的确实是一种神话性的现实；但把它称为现实主义，实在令人目眩，因为哲学史要求我们把完全不同的东西称为现实主义。那是共相之争的问题。

至于弗洛伊德是否也犯了同一种错误，把现实当作最后一层、倒数第二层或任意一层球壳，也就是说，相信存在这样一个世界，其最后球面——姑且这样说——无论是否推动其他东西，自身都不动；我认为

这种断言完全是滥用。因为若真如此，弗洛伊德就不会对置快乐原则与现实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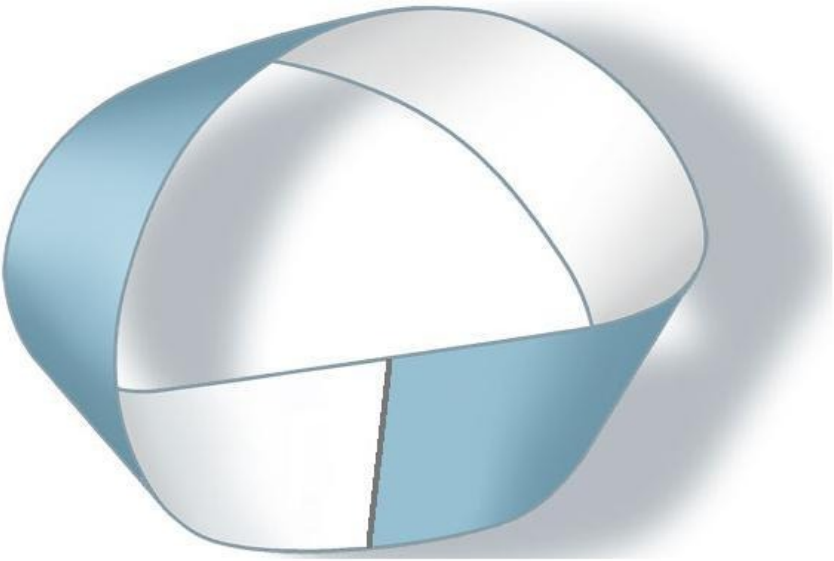
但直到现在仍没有人真正意识到这一事实的后果，也就是它关于结构作出何种假定。

我再说一遍，可以看出，某种错误的现实主义同唯心主义是多么相互连带……

我不会说它是所谓常识的现实主义，因为常识深不可测；而是那些自以为是一个自我、一个认识着的自我，并建立认识论之人的感觉所构成的现实主义……只要结构由这些彼此包裹的球面构成——无论它们按什么顺序分层——我们就始终面对同一个图形：在我们（主体球面）同任何一个球面之间，总会有一定数量的中间球面——观念、观念的观念、表象、表象的表象、表象的观念。甚至在最后一个球面——不妨说是现象球面——以外，我们也许还能承认一个“自在之物”的存在，也就是最后球面之外的彼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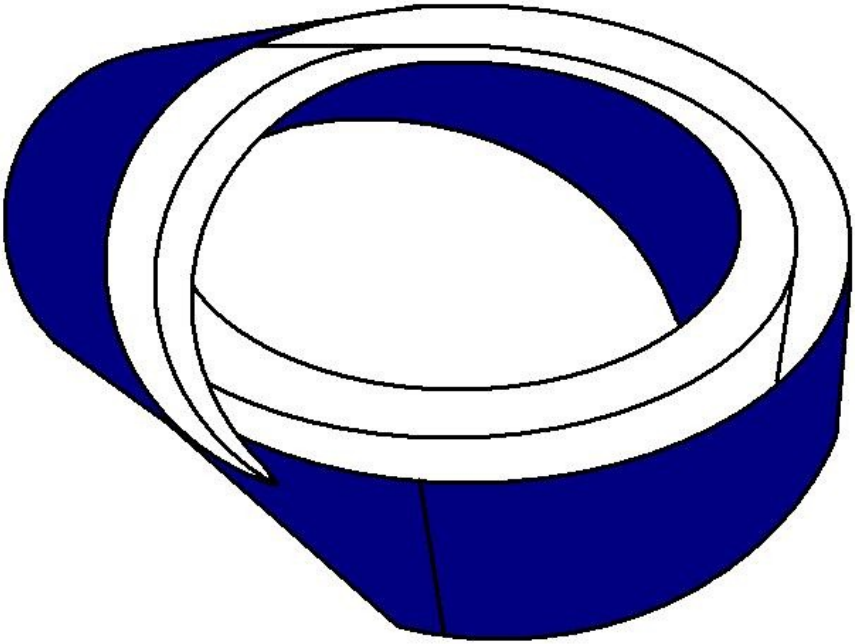
人们历来都围绕这一点打转，而这正是认识论的死胡同。

这种结构——球面结构——同我向你们呈现的莫比乌斯带结构之间的差异在于：如果我们开始为这条莫比乌斯带配上衬里——就是我右手拿着的这一条——



当我们走完一圈时——我向你们介绍它时已经这样说——就会来到带子的另一面。因此，正如我第一次告诉你们的，看来必须穿过它才能给它加上衬里。

但这是以想给它配上如这件外套、或刚才那个球面一样的衬里为条件的——一种转一圈便成形的衬里。可是，如果你转两圈，就会把它完全包裹，也就是说不再需要另外做什么：莫比乌斯带已经由这个还同它链结在一起的要素完全加上衬里。



串接——这个术语至关重要，它赋予能指链的不是隐喻价值，而是具体价值。只不过，为这条莫比乌斯带加上衬里的那个曲面，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

这个曲面，如果我把它拆开……

我想眼下已经用不着它了，所以把它拆开……这条曾同它闭合在一起的莫比乌斯带具有一种性质：如果可以这样说，它在为自己加衬时，把自己的一个面——就称作蓝面吧——贴合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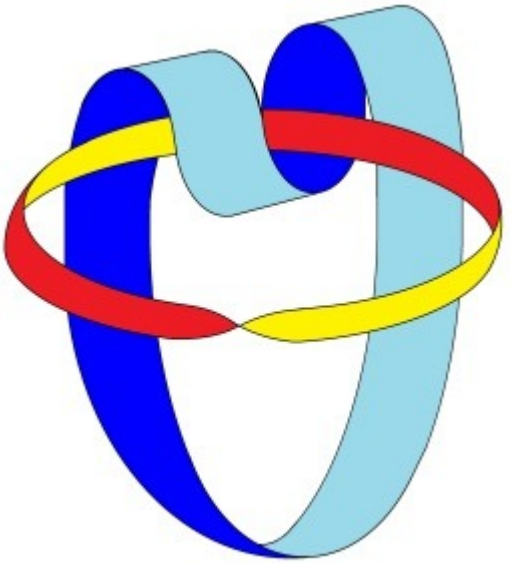
为了避免说正面与反面，因为它没有正反面；只有作出选择以后，它才有一个正面和一个反面……蓝面同自身粘合；而红面——我再告诉你们，它这时确有正反——则全部处在外部可见的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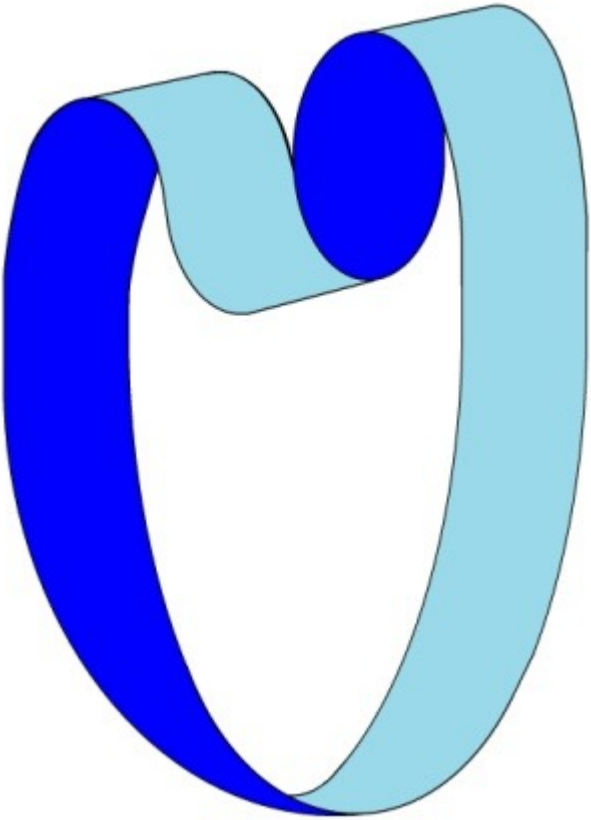
这样，我们得到某种东西：一个具有原初莫比乌斯带之性质的曲面，而这两个部分正是从原初带中制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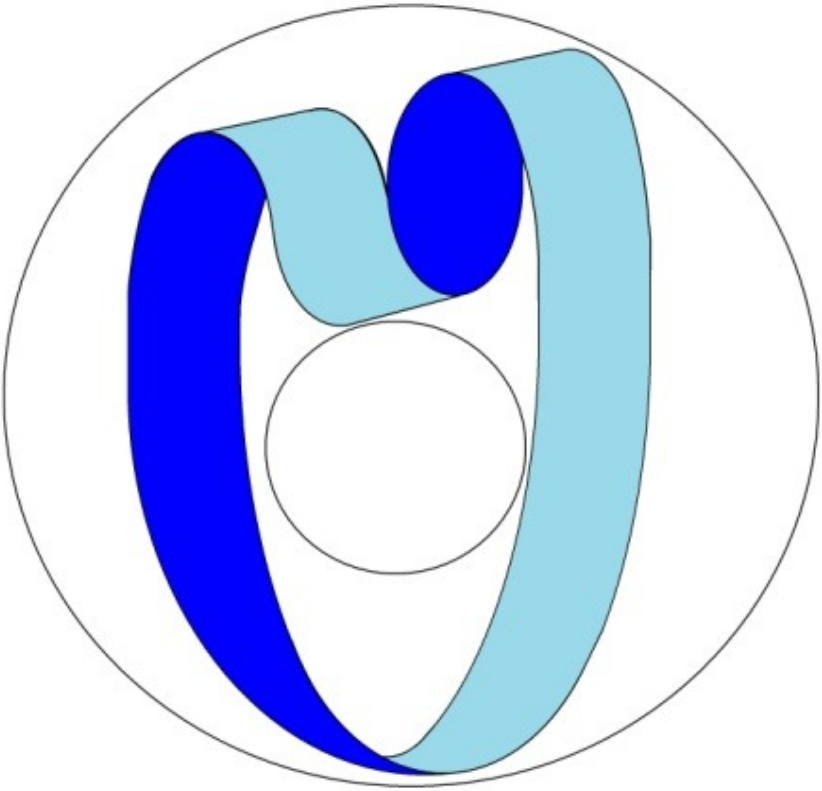
你们取一条莫比乌斯带，以通常方式这样扭转、建造它……如果沿着一条同某个边界等距的线[非中线切割]切开[视频：实验3]，那么走过两圈以后会得到：

- 另一个莫比乌斯曲面，就是我刚才向你们展示的那个；
- 以及外围的一条带。后者不是莫比乌斯带，而是一条有两个面的带；它也不是圆柱带，因为你们看，它毕竟有一种形状，而且是颇为奇怪的形状。我把它展示给你们，这形状很容易找出：它在这里转两圈，而在这个情形下，有一段垂下来。

好！你们自己验证。这是一条可以贴合到环面曲面上的带子。来，我把它传给你们看看。







那么，我们得到了什么？我们有一条莫比乌斯带；它受到一种典型的切割——以规则方式沿着同其边界等距的线切割——以后，会产生：

- 某种作为莫比乌斯带、始终保留下来的东西；
- 某种转两圈、把它完全包裹起来的东西。

后者并不是莫比乌斯带，而是包裹莫比乌斯带的东西；它从莫比乌斯带中产生，因为这条带是分割莫比乌斯带所得的结果。这条带一面同

莫比乌斯带链结，另一面又与它分离；它可以贴合在环面上。从结构上说，这条带最适合贴合于我向你们界定为主体的东西，只要主体是被划杠的主体。

主体一方面是某种包裹自身的东西；又或者，仅凭这种简单的复写，就足以让这东西显现。甚至不必让莫比乌斯带作为单独一条留在中央、同这条带链结；正如你们已经看到的，只要让这条带复写自身，我就可以重新构成一条莫比乌斯带。

这一点将成为我们界定主体功能的支点。某种东西将具有一项根本性质：界定同一性与差异性的结合。在我们看来，结构上最适合支撑主体功能的正是这一点。只有随着我继续推进，你们才会看见其中的细节与精微，也就是更切近地看见主体功能同能指功能之间的这种关系。

还会看见在一个情形与另一个情形中，这种关系同同一性和差异性之结合相隔多远。

现在我向你们指出：如果莫比乌斯带本身是另一类曲面中一道切割的效应……

为了让事情更容易，我尚未以其他方式引入这个曲面，刚才把它称为射影平面……那么，莫比乌斯带产生的代价，是留下一块圆盘状坠落残余；我以它支撑对象(a)。莫比乌斯带的到来取决于这块残余的坠落；而把它重新整合进去，则会改变其圆盘状坠落物的性质，也就是使它没有正面与反面。我们正是在这里重新找到对象(a)作为非镜像性对象的定义。

相关知识卡 交叉帽、内八字切口与不可镜像化的对象a

正是在它——你们看——重新缝合、重新安置到相对于莫比乌斯带中主体的位置时，它才具有变成另一种东西的性质；后者的规律同球面上任何孔洞的规律根本不同，而球面上的孔洞无论如何只能界定主体或对象。这是一个完全特殊的对象。昨晚——很遗憾，引入这个词的人由于时间关系现在已经离开——有人向我们谈到翻转。

相关知识卡 交叉帽、内八字切口与不可镜像化的对象a

像这样的术语，除非属于这一结构参照，否则它的任何用法都不能被视为正当，只会被彻底糟蹋。也就是说，能够被称作翻转的东西，依照不同结构具有完全不同的效力。

多年来，我何必反复敲打实在界、想象界与象征界的差异？如今你们已经看到它被具体体现——我想你们感觉到了——在刚才那些连续相套的球面中，你们清楚看到想象界如何找到自己的位置：想象界总是一个球面与另一个球面之间的中间球面。

想象界只有这一种意义，还是可以具有另一种意义？

怎样才能以单义方式谈论翻转，又怎样使人感受到它？

一只手套……

让我们采用最古老的呈现方式，它在康德那里已经出现[注11]……一只翻过来的手套，同镜中的一只手套并不是同一回事：

> [注11] 伊曼努尔·康德：《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巴黎：Vrin，2000年，第13节。

- 翻过来的手套在实在界中；
- 镜中的手套在想象界中，只要你把镜中手套的意象当作里面那只手套的意象。

从这里出发，你们很容易看到，我能在黑板上画给你们的那些形式也是如此，因为它们有正面、反面和一条对称轴。但是，对没有正反面、也没有对称平面的射影平面与莫比乌斯带而言，尽管它们可以一分为二，你们会在镜中得到什么，实在很值得质询。

至于你们在实在界中得到什么，尽管试着把一条莫比乌斯带翻过来吧；无论怎样翻，它都会始终保持同一种扭转，因为这条莫比乌斯带确实具有自己的扭转。正因此，人们可以相信它是可镜像的，因为它或者向右转，或者向左转。也正因此，我没有说莫比乌斯带不可镜像；我们将界定它自身镜像性的地位，并看到这会把我们引向某些后果。

重要的是这种虚假互补性。一方面，我们有一条莫比乌斯带；只要把它分割，它就是主体的支撑与结构。如果沿中线分割，就不再得到我刚才向你们展示的、同莫比乌斯带链结的那块残余；但我们仍会以这道切割本身的形式得到它——这又有什么关系？关键成果已经获得，也就是我们称作环面带、能够贴合在环面上的那条带；它在贴合自身时可以恢复莫比乌斯带。这为我们结构化主体。

某种东西同这个S结合，我们称之为(a)；它是非镜像性的(a)，只要它重新焊合，只要它被视为主体之S的支撑。另一方面，一旦坠落，它就失去一切特权，字面上把主体单独留下，使之无从求助于这一支撑：支撑被遗忘、消失。这就是我今天想带你们抵达的地方。

很抱歉我无法把这番说明推进得更远；但我早已想到，如果不把每一步都真正嚼碎，我就会冒着让人再次跌回心理—宇宙论思想的风险，而我们的经验恰恰将终结这种思想。

第7课 · 1966年1月19日

泰蕾兹 · 帕里索 拉康

拉康

今天将用于一种检验；我想先告诉你们它的意图。

首先，这是一种方法样本。

有人将向你们讲述——不是我，而是我委托的那个人——一位研究者如何照亮但丁《神曲》[一、二、三]中的某个特殊点；这位研究者显然受到自己从我的“镜像阶段”知识中获得的提示所引导。当然，并不是镜像阶段给了他关于但丁的知识。

德拉戈内蒂先生是将要向你们报告的那篇文章之作者，也是一位杰出的罗曼语文学家。他对但丁极其广博的知识，恰恰使他对镜子功能的定位获得价值；但丁采用这样一种风格，使他能够就意识及其根本功能给出一些可以说与当时流传观念完全无关的标记。这正是将要向你们呈现的内容。

它有什么意义？它指出一种结构取样可以沿什么方向进行；这种取样将赋予材料一种秩序，而这秩序不再以线性演化、历史演化的先入观念为基础，更确切地说，不再以把“演化”观念引入历史、从而彻底歪曲历史为基础。

简言之，这是一种初步模型。它取自现实中确实发生的事情，却仿佛被限制在专家研究中；如果可以这样说，不妨把它当作一种历史方法模型：这种方法可以由引导我们此处的结构主义考量来引导，只要这些考量同精神分析参照一起使用。

这将给我们一个机会来回顾这些参照。同时，它也使我有条件提醒你们一些我先前教学中的既得成果；因为我很快就要把它们重新同我不断为你们展开的基本拓扑结构接通，而这些结构对我们来说是引导性结构。

我还会谈另一件事，暂且给你们留下悬念；不过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们，它同样是对文化既有材料中另一个点的结构分析……

你们等会儿会看到我选了什么……它同但丁相隔几个世纪，却将把我带到这样一个转折点：某种结构材料在这里得到引入、凸显、突显；它对我们、特别是对我们精神分析家极其有用，可以作为基础，让我们尝试整理围绕受虐狂所说的那些彻底混乱的东西。那些说法之所以混乱，是因为它们被“压塌”了——姑且这样说，被它们援引的不同层面压扁了。

那么，我把话交给帕里索医生女士；她将向你们报告这篇讨论《神曲》某个特殊点的文章，也就是镜像性的这种在场、但丁对它的想法。

泰蕾兹·帕里索

德拉戈内蒂的研究发表于《意大利研究评论》第XI卷第1—3期，1965年1—9月，第85—146页。

他把这项研究命名为《但丁与纳耳喀索斯，或意象的伪币制造者》。

《神曲》中有两处、也只有两处提到纳耳喀索斯神话：

- 第一处在《地狱篇》，直接提到纳耳喀索斯之名；
- 第二处在《天堂篇》，只以迂回说法处理。

罗歇·德拉戈内蒂的主张，是通过评论这两处段落来断言：这一神话的实质始终贯穿《神曲》，并且是但丁的内在怪物。

第一处指涉，即《地狱篇》中的指涉，见于第三十歌；这项指涉本身位于第128行。

它出现在伪币制造者这一段情节中。

情节如下：但丁看见一个水肿病人，腹部突出、四肢比例失调；他是亚当师傅。卡森蒂诺溪流的纠缠性意象只会加剧灼烧他的口渴。

紧贴着他有两个影子：一个是波提乏的妻子，另一个是特洛伊的希腊人西农。

亚当师傅与西农在一场由前者挑起的争斗中互相击打，因为前者称这个希腊人是骗子。

文本如下，当然已经译出：“希腊人说：愿那使你舌头干裂的口渴，以及让你肚腹在眼前筑起围墙的腐水，惩罚你。”[《地狱篇》第三十歌，第121—123行。]

伪币制造者这样回答：

> “你的嘴照例一张开就只会自招祸患；因为，即使我口渴，即使体液把我塞满，你却发着烧、头也疼；若要你去舔纳耳喀索斯的镜子，根本用不着说多少邀请的话。”[《地狱篇》第三十歌，第124—129行。]

第一点：“纳耳喀索斯的镜子”[奥维德：《变形记》第三卷，第336—510行]。

不能把这面纳耳喀索斯的镜子当作指称清水的简单隐喻。

它不是以更优美词语来指称清水。况且，那会同但丁对诗的观念完全相反。

所以，这里确有隐喻，但它是这水的变形，是这水变成纳耳喀索斯的镜子。

因此，但丁谈的不只是水，而是一个仿佛凝固的反射面，它返还那个爱上自己影子的纳耳喀索斯之形象。所以，清水确实仍是这水，却是变成镜子的水，是变成水之意象的水。

由此，亚当师傅的回击获得意义。可以这样翻译：“你的高烧使你如此口渴，根本无须多劝，你就会去舔一幅水的意象。”

第二点是寓意，它同这些诗行的字面读法相符。因此必须寻找：

- 亚当师傅之罪的象征意义；
- 以及水肿这种畸形的象征意义。

亚当师傅是伪币制造者；鉴于他所在之处——地狱——他的罪显得格外严重。他做了什么？在罗梅纳伯爵们的唆使下，他制造佛罗林金币。

这些佛罗林的重量足够，但其合金……它们掺入了合金。

佛罗林原则上是纯金货币；这些却不是纯金，掺有三克拉其他金属。

在深入考察这项罪的意义以前，应当先把它安置到《地狱篇》的道德秩序中；这套秩序在第十一歌中由维吉尔之口陈述。

那里说，欺诈：

- 一方面预设恶意；
- 另一方面，欺诈是人特有的恶。

第一点：欺诈、伪造预设恶意。恶意表现为蓄意选择所追求的恶。它藏在善的外观下，伪造了把一切德性奠立于善的原则本身。它击中了上帝最接近其本质的东西，也就是理性。

如果理性使人同上帝相似，那么在分析中，也正是通过理性，这种相似性才在其反射中被掺假，变成一个绝对大他者的反射、绝对者的拟象。理性被自身的善之意象俘获，被自己的反射诱惑，在选择自身为这样的理性时，让自己同反射相似；这就是“变形”的绝对意义。

这种意义把一切事物的存在吸入自身凹处，再从中抽出一个相似的复本；在其中，从来没有任何东西呈现出来，而是在绝对者的拟象下隐

去。因此，恶意正因其潜伏而可怕；恶意的特性，就是它从不显现。这不是解释，而是在文本里；事实上，它就在第十一歌中。

这一歌所说的第二件事是：欺诈是人特有的恶。

维吉尔以极其醒目的一句——第十一歌第52行——简要说出它：

> “欺诈——一切良知都会为它感到悔恨——”[《地狱篇》第十一歌，第52行。]

换句话说，每一种良知本身都被欺诈咬噬。

每个人身上都有某种根本上被伪造的东西，而良知带着它的印记。

这里涉及原初过错；原初过错就是分离，就是咬噬。

而在一切良知的过错中、在悔恨（remords）中，有“咬噬（morsure）”的这个“mor”。

正是[原初的]亚当那一咬造成了这种分离、这种破裂、这种理性的破裂。

因此，一切良知总已处在断裂中，被原初伪造切开了口子。

这个伪币制造者名叫亚当。这个人物的名字当然令人想起第一个人；而在我开头读出的文本——提及纳耳喀索斯的文本——之前，原罪的全部主题都已在场。

现在，若考虑到这种象征联系，并且仍处在同一个解释层面，我们将看到伪币在什么意义上是原罪的意象。

我已经告诉你们，这种佛罗林原本是纯金佛罗林；在那个时代，自然始终是参照。

这种纯金佛罗林凭名号与肖像被认作纯正货币；名号与肖像都是真理的符号。

不过，意指的力量当然属于有权认证符号的人，也就是君主。

如果君主败坏符号，他就有罪。金币上铸有施洗者约翰的肖像。

因此，这幅肖像作为符号，提醒人们必须维护神圣秩序。

货币一旦被伪造，符号与质料之间的真实关系就遭到摧毁。

象征被扭曲为虚构，创造出一幅完整性的意象；欺诈的一切滥用都嵌套在它下面。

所以，欺诈既伪造货币的真理，同时又伪造真理的货币。

真理的货币是一种圣物。欺诈于是掺假神圣秩序，掺假同上帝的关系、同那个奠立自然价值秩序的源泉之关系。

现在谈亚当师傅畸形的象征意义；始终在同一层面，我们可以证明它。“公共体”历来都被比作一个身体——如今仍在使用“社会身体”——而君主滥用的财富过度膨胀，对这一身体产生的效应，会导向种种畸形意象。

君主是这个身体的一个肢体。他变成某种怪物，过度肿胀，以身体其余部分、也就是共同体为代价而肿胀。其结果是这个共同体的比例变得怪诞。

亚当师傅的畸形——这种水肿——使他长着巨大的身体、巨大的肚腹。

这个肚腹一直隆到眼前，在眼前形成一道屏障，使他失明。肚子里装满一种水，那是君主财富的停滞之水；它因停滞而腐败，因停滞而无法再在亚当师傅身体其余部分循环，于是造成嘴巴干枯、双唇僵硬，造成持续的口渴，也造成下肢消瘦，使它们再也支撑不住亚当师傅[……]这个失明的巨大肚腹。

考虑到这些意见，我们可以追问：

- 亚当师傅代表什么；
- 西农代表什么；
- 这场争斗又代表什么……也就是说，亚当师傅与西农之间有何关系，并最终产生那项精彩的指涉。

先谈亚当师傅。

这场戏发生在潜伏恶意的透视中；第一个人的欺诈技艺正从那里产生。

水肿象征这种人特有的恶。那是一种水的疾病，是人从源头处的扭曲；它还是一种沉重得使人无法动弹的疾病，把亚当固定在怪诞姿势上。他的根本无能正由此得到标记。

卡森蒂诺溪流的意象……

卡森蒂诺靠近罗梅纳；罗梅纳是犯罪之地，亚当就在那里伪造货币。

……这个在反射中被摧毁的源泉意象折磨着亚当。然而，事实是他仍准备牺牲这个意象，只为看见唆使自己的人。他准备牺牲反射，以看见君主——也就是造成他精神毁灭的人，也就是恶意本身。而他渴望看见恶意的程度，同亚当根本无法看见这个影子的程度相等，因为他动弹不得。

若记得恶意的特性是潜伏，就很容易理解：亚当所追逐的恶之原则——他宁愿要它，也不要解渴的源泉——不断隐去；它无非是对存在的拒绝，也就是根本的躲避。

亚当师傅把它带在自己身上，像一个在绝对之梦中膨胀的空洞。他的欲望最终追逐的无非是亚当师傅自己；而恶之原则作为绝对者的大他者，永远逃离他的凝视。

所以，通过牺牲货币这一圣物，过错使符号遭到扭曲，把象征变形为虚构，玷污正义之源，伪造上帝所意愿的人与人之间的爱之纽带。因此，这里发生了一次选择。然而，这一选择毕竟仍是爱，却是“另一种”爱：人经由一个意象的迂回，把这种爱全部转向自己；这个意象伪装成对他人的爱。它以一个虚构的绝对者，为那个缺失的绝对者加上衬里。

亚当师傅就是如此。现在，西农又如何？

亚当师傅伪造神圣原则的标志物，使整个共同体卷入一场存在与外观的冒险。

这从西农的话中显露出来。西农说："如果我说了谎，那么你却伪造了肖像[……]；我只因一项罪来到这里，而你的罪比任何人——哪怕魔鬼——都多。"[《地狱篇》第三十歌，第115—117行。]

西农登场时，货币——真理之言——已经被伪造。他将在伪造真理之言时使用亚当师傅的产品。西农本人同源头无关；他是在亚当师傅行为之效应的层面介入。被扭曲的言语导致语言遭到无限伪造，而西农滥用的正是语言。

西农的罪，是把自己装成希腊营地的逃兵，并说服特洛伊人把木马运进城里。原则上就是这样。这使他显得是一个骗子，而且是策略性的骗子。

不过，他的罪是双重的。它既是策略性欺骗，又像犹大的罪一样，因为伪誓而卷入一桩举世闻名的罪行。他是伪装者，装成自己并不是的东西；他又是伪誓者，因为他所滥用的语言冒犯了诸神。

现在谈亚当师傅与西农的关系。

西农在这场戏中占据一个非常特殊的位置。

他极为紧密地贴在水肿病人身旁，甚至仿佛同他连为一体。

亚当师傅看不见他，甚至不知道为何会有这个邻居。

仿佛假言语一旦像假货币一样进入流通，就会同真品如此相似，以至真的东西变得不可识别、不可见。承担保证的符号，以其表面的合法性抹除了自身可疑起源的痕迹；结果，连伪币制造者本人都无法认出自己技艺的产品。

争斗爆发于西农听见亚当师傅以“骗子”一词称呼自己之时。

亚当师傅说：“……骗子，特洛伊的希腊人西农。”[《地狱篇》第三十歌，第98行。]

于是，一方面他听见自己在世人眼前被揭发，另一方面听见自己在潜伏状态中被揭发。

在节奏异常迅速的争吵中，两个伪装者轮流处于被告与原告的位置；他们丝毫没有在对方的恶意中认出自己的伪装，甚至还玩起真理的游戏。“真理”一词三次从亚当口中说出。

这一切仿佛象征着欺诈意识自我迷惑运动的两个阶段：

- 一方面是亚当师傅：他虽被铆定在水的意象上，但这个意象对他没有自主力量，因为他宁愿看见恶之原则，也不要这个反射；
- 另一方面是西农：恶之原则无法引起他的兴趣，因为他不觉得自己应当为这种扭曲负责。

所以，西农没有任何东西需要优先于水的意象。在他所伪造的语言中被摧毁的源泉，凭这种虚构获得巨大成功，以至对西农取得自主力量。对西农而言，真正的源泉已经变成这种意象中的水，做梦的意识

能够从中饮水。因此，亚当师傅才对西农说："若要邀请你去舔纳耳喀索斯的镜子，用不着说多少话。"

西农代表欺诈运动的顶点，代表一种根本扭曲：恶意把伪造者封闭在其意象中，而意象对他已成为真理本身——无物的意象。我们大概可以说，倒错者正被固定于这个意象的绝对性。

至于但丁在这段故事中怎样，但丁亲自讲述：

- 他被争吵的景象迷住；
- 他被地狱的意象迷住。

要打断他的目光对错误的黏附，必须由维吉尔的声音介入。

维吉尔说："现在，你当心！"[《地狱篇》第三十歌，第131行。]但丁必须转离这些意象。不要把这些意象当作现实，并学会转身离开——这就是维吉尔赋予但丁与自己同行之道路的意义：提防这种捕获危险，就是守护真理。但丁确实醒来了，可他还需要不止一次警告才能真正醒来。

下面是文本，采用埃斯皮纳斯-蒙热内女士的译本[注1]。说话的是但丁：

> [注1] 但丁：《神曲·地狱篇》，巴黎：Firmin-Didot，1922年，路易丝·埃斯皮纳斯-蒙热内译，双语版；另见《地狱篇、炼狱篇、天堂篇》，巴黎：联合书商出版社，1965年，同一译者，双语版。

我转向他，满怀一种羞耻；

它至今仍活在我的记忆里。

就像一个梦见自己遭受损害的人，

又在梦中希望自己是在做梦，

如此热切地希望已经存在之物仿佛并不存在；

我也变成这样，无法说话；

因为我本想道歉，而我其实已经道了歉，

尽管当真并不相信自己已经如此。[《地狱篇》第三十歌，第134—141行。]

维吉尔的声音在羞耻中把但丁带向真理。但这次醒来十分短暂。

但丁在羞耻中诞生于真理，却停住了。他停下来反思羞耻，想把它表达出来。

但丁想开口道歉，于是不再看见现实在羞耻的沉默中自己说话。

表达欲使他甚至在真理完成之际误认这一真理。他重新坠入破裂的反思，并把它比作睡眠。这个比喻仿佛固定了理性的根本无能：它永远不能凭自身重新找到真理。但丁这个睡者，欲求已经存在之物，仿佛它并不存在。

现实事实——即真理经由羞耻自己说话——被变成非现实之物，也就是无法说话。

现实被当作非现实。维吉尔在这一刻迅速介入，说："即便过错比你的更严重，也能由更少的羞耻抹去［……］；所以，卸下一切悲伤吧……"[第142—144行。]

这里谈的是"悲伤"。维吉尔在这里强调，越过羞耻以后仍有什么压在但丁身上：一块沉重的残余、一块坏欲望的残余。最后这次介入看来不只具有第一次警告的价值。

也许可以说，它可以被等同于一次介入。无论如何，由此显出，原初就被咬噬的意识，一旦听任自身，就无法反抗坏欲望、卑下欲求。

但丁以维吉尔的这些话结束第三十歌。

他仿佛把维吉尔设立为在场的记忆。维吉尔说："……不要忘记这条原则；若偶然再把你带到某处，那里有一群人陷在类似争执中，我将凭它始终在你身旁：想听这类事情，是一种卑下欲求。"[《地狱篇》第三十歌，第145—148行。]

也许可以把维吉尔占据的位置同分析家的位置联系起来？

第二处对纳耳喀索斯神话的指涉位于《天堂篇》第三歌。

场景发生在月天。贝雅特丽齐刚刚摧毁但丁关于月斑的错误意见。但丁此刻准备承认自己已经得到纠正、拥有新的确信。他说：而我，为了承认自己确已得到纠正和说服，尽我敬畏所允许的程度，高高抬起头来，以便更好地说话。

可是，一幅景象显现；它的外观把我的注意如此紧密地留在自身，以至我忘记了自己的承认。

正如从透明澄澈的水晶，

或从清净平静的水面——

其深度尚不足以使水底昏暗——

我们面容的轮廓返回我们眼前，

苍白得如此微弱，以至白底上的珍珠

也不会更缓慢地抵达我们的眼睛；我就这样看见数个准备说话的形象，这使我奔向一种错误，它同使人爱上泉水的错误正好相反。

我一察觉它们的在场，

便以为那是镜中所见面孔的反射；

为了看见它们属于谁，我把目光转向身后；

却什么也没看见，于是又把目光移到前方，

径直投向我温柔向导的眼睛；

她微笑着，神圣的凝视中有一团火焰。”[《天堂篇》第三歌，第4—23行。]

但丁本来准备承认自己已得到纠正，却没有说话。向前抬起面孔的动作改变了意图，因为一幅景象以如此强大的力量出现，使但丁忘记自己的承认。

但丁看见好几张面孔，像他一样准备说话。他以为看见了镜像，便回头去看它们来自谁；什么也没看见，于是重新把目光移到前方，直视贝雅特丽齐的凝视。

在此前的第二歌中，贝雅特丽齐曾向但丁解释月斑是什么。她告诉但丁，月亮上在他看来像影子的东西，实际上同样显露为光，只不过这种光有所差异；它同月亮真正发光的部分相比，在接受程度——或者不如说透明度，我想“透明度”一词更合适——上低一级。于是，影子被理解为光，并始终被呈现为出现在明亮背景上的光；背景是让差异变得可感、让它们得以显现的尺度。

天堂的影子、灵魂当然也被理解为光；它们由神圣之光点亮，并让光线穿过而不加阻挡。

但丁会用一面映照天堂灵魂的镜子象征上帝。至少这是德拉戈内蒂的看法。

不是一面镀汞的镜子，而是一面底层始终完全是光的镜子。透明的影子与意象出现在光的王国中；那里的反射以一种不同于尘世反射的方式来构想。

反射被构想为神圣之光穿过天体透明性的直接辐射作用，而不是由不透明身体遮挡这种光、从而产生的光线反射。

但丁明确说，显现其景象的那个多少具有镜面性质的表面，类似于一块水晶，或水底没有昏暗、没有隐去的水面。昏暗的底层、被隐去的底层，正是纳耳喀索斯之镜的镀层。

在这里，底层是光。甚至不能说这里没有底层；底层是某种东西，而且就是光。因此，问题不是以尘世方式构成的镜子，而是纯粹透明，是以天国方式构成的镜子[注2]。

> [注2]　参见达尼·罗贝尔·迪富尔：《拉康与伯麦的索菲亚镜》，《Unebévue手册》，E.P.E.L.，1998年。

此外，出现了两类意象：一类是准备说话的形象，一类是镜映形象。

这些意象彼此交错，以至给人这样的印象：镜映的形象、观看者的面孔，同准备说话的面孔混合在一起。

但丁回过头去，以打破镜子的魔法；德拉戈内蒂说，他同时揭示出自己在何种程度上意识到这种同意象之关系的扭曲性错误。

但丁投向景象的目光被自己的反射俘获，以至把透明性变成一场景观。

但丁所揭露的就是："与使人爱上泉水的错误相反的错误。"

它存在于理性拒绝返回自身，因为理性已经使现实消失在一个意象中。

景象一召唤，但丁就自发地矫正目光方向，转向贝雅特丽齐的眼睛。

对德拉戈内蒂来说，贝雅特丽齐是被启示的真理，使但丁转离那种过于确信自己正直的理性之迷惑。对于但丁投向透明性的凝视，以及这个凝视自身变得透明，德拉戈内蒂说：看见，就是让理性在信仰中内化。

等待但丁的危险在于：他的理性面对透明性时，可能受到诱惑去表象它，而不是让自己呈现于其中。想把信仰化约为尘世反射意象的理性，将不再配得上理性之名；因为它不仅把本质上是光的对象转化为影子，而且一旦同真正的光切断，这个本应透明的理性自身也会变成投射到事物上的影子。

我想，德拉戈内蒂由此看见了一个但丁，而他的怪物屈服在纳耳喀索斯神话之下。

不过，也许还可以给德拉戈内蒂的解释补上一点：在天堂的透明性内部，绝不可能成为其中有分者。把自身欲望的原因交还给上帝，是唯一可能的道路。

也许，这就是但丁的幻想：自己的凝视面对上帝之光时保持透明。

总之，天堂里有上帝。一切都是光，而光来自上帝。光就是上帝的凝视。

在上帝与但丁之间，有贝雅特丽齐。贝雅特丽齐不是上帝；我想，她也不是德拉戈内蒂所谓“被启示的真理”，而是带着上帝印记的贝雅特丽齐。随后，仍在上帝与但丁之间，有但丁的景象，而他在其上粘贴了镜映形象。他转过身去，打破的是这些镜映形象的魔法，不是景象本身：景象先于这些镜映形象而存在。这个景象并非任何随便的景象，而是那些由于强迫而未能履行贞洁誓愿的灵魂之景象，是上帝造物的景象。

然后才有但丁。而在天堂中，反射被构想为神圣之光穿过天体透明性的直接辐射作用。面对上帝、在上帝凝视的场域中，唯一不透明的在场就是但丁——也许就是尘世，是一层昏暗底色。

那么，这里除了但丁的自恋，难道不也涉及上帝的自恋吗?

拉康

你们已经听到对德拉戈内蒂这篇文章非常忠实的报告。

有些人或许恰恰因为德拉戈内蒂在这里所循迂回的忠实复述而迷失；我会试着再次重述并概括问题。同时，正如我已经预告的，我会展示这种参照对我们有什么意义。

我们今年的出发点，是让我们必须陈述的对象(a)功能获得一致性；它位于精神分析的位置中，而精神分析起源于科学，也起源于科学同真理之间非常特殊的关系。

这里的科学是指十七世纪诞生的现代科学；由于知识位置的这次变异，人们把十七世纪称作天才的世纪。

你们等会儿会看到，我们将转向科学位置出现的另一个面向；它由笛卡尔以外的另一个人卓越地体现。你们等会儿会看到是谁——如果你们还没猜到的话。

所以，这里发生的是某种并非永恒之物的深刻转化；它回应另一片场域、另一段历史间隔，也就是科学起源以前同某种东西的关系。这种关系被写成如下形式……

我不会把它称为更一般的形式，而曾称其为较早的形式……即知识与真理的关系。知识与真理的这些关系，构成我们为求方便将称作哲学传统的整个传统。但丁的位置正处在这个拓扑框架中。

不要走得太快。我并没有说但丁是一位哲学家；不过他同哲学的关系，确实使人能够在整整一部著作中追踪、分离它，例如艾蒂安·吉尔松先生那本题为……

《但丁与哲学》的书。它兑现了自己的承诺，向我们展示那个切分但丁一生与著作的作用力量。

我们在这里的拓扑——按照我理解、运用并向你们引入它的意义——只有一个功能：让我们定位知识与真理关系的这些转化。今天我们之所以选择但丁，把他最卓越的诗歌创造《神曲》呈现给你们，可以说有一个两步确定这项选择的理由。

第一，但丁在作品中引入基督教宗教建构的在场；这项选择中的潜在论点可以这样表述：基督教宗教传统在起源处，把某一位上帝引入知识与真理关系的场域。我们等会儿将抵达那里，从其起源——犹太起源——来界定他；他的在场，是一场对我们而言具有奠基性的根本蜕变之结晶点，而这场蜕变正是科学的引入本身。

我是说……

我已经作出足够指示，现在更有力地重申，并会等会儿说明理由……犹太人之上帝的引入，是一个枢轴点。几百年来，它仿佛始终包裹在对真理与知识关系的某种哲学性维持中，却最终浮现、来到白昼；其

惊人后果是：正是这个犹太人上帝的功能在知识与真理关系内部所建立的工作，最终奠立了科学的位置。

[第二]　这还不足以使我们选择但丁，因为中世纪的任何神学家都同样可以充当例子，让我们在哲学传统中定位知识与真理的关系。

但丁还是一位诗人。我将试着告诉你们：恰恰作为诗人，他不仅以卓越、而且以特别选定的方式显露那个涌现点、那个分析点；在那里，他陈述中显现出来的比他知道的更多，并以某种方式作证……

我现在会定位这种方式，也就是说，给出他为何能够作证的理由……对我们来说，他仿佛提前作证：在知识与真理的关系中，存在我今年明确提升为对象(a)功能的东西。

德拉戈内蒂所引批评家选择、指出的这两段之意义，正在于它们以镜子的在场为标记；这使我们能够在那里定位对象(a)清楚而明确的指称，而它在这里名为：凝视。

让我们重新开始。

但丁当然远未逃脱，而是完全落入……你们对《神曲》——即使几乎从未翻开——也知道得足够多，知道这部作品被写入我所谓宇宙论模块。它是彼岸的宇宙论，但仍然是宇宙论；它的框架借自已经建立的宇宙论，也就是从最早的希腊哲学家开始、由亚里士多德首次塑形、再作为形式与框架传递给当时物理学家思想的宇宙论。

例如托勒密体系，尽管只限于观察如其呈现的现实世界如何运作，也就是要说明天体运动的关系，并使其同尘世世界的存在相一致；但你

们知道，它依照球面的拓扑来排列，是一系列彼此包含的球面——不同的行星天球——最终抵达最高的恒星天球。问题在于说明它们如何运作。

这就是古代物理学的出发点；正是在它上面……

我们归根结底可以把它称为在人类认识中引入作为这种科学本身……正是在它上面，我们可以说，古人迈出了历史上可以接受、可以传递的最初步伐；这些步伐成为所谓“哥白尼革命”的最初材料，而后者本身又引入了完全不同的“牛顿革命”。

这个宇宙论世界还包含所谓“universitas（大学 / 总体）”教学不同部分之间的协调；它是一个根本参照点，是直到某个日期以前一切教学都在其中发展的框架。

所以，但丁思想位于具有心理学、神学乃至本体论等坐标的宇宙论框架中。它是什么？不正是向我们呈现真理与知识的首次裂分吗？

事实上，整个中世纪思想正是如此……

它远非可以忽略、仿佛应当抛弃的思想，哪怕我向你们呈现的现代科学诞生所建立的切割多么激进……它照亮了我们必须考虑的这种拓扑；分析经验所提出的问题重新建立了一个情境。真理与知识相对立的主题贯穿中世纪思想全部发展，被写入所谓“双重真理论”。

那个时代没有一位思想家、没有一位教师逃过双重真理的问题。那个时代的“教导者”必须在理性场域与启示场域之间作出裂分，这个问题正是裂分的真正基础。

它无非是这样一点：

- 存在一个关于世界结构的、号称具有建设性的知识场域——理想状态下是演绎性的；
- 此外还有另一种东西，我们只能从超自然来源、通过上帝这个大他者的言语得知。

这项区分在那个时代一切陈述的结构中如此根本，以至我们应当向那些被我称作“教导者”的人的卓越理性致敬；我这样称呼他们，是为了不用那个带贬义的名字：经院学者。

这些人据说受宗教带来的暗示所俘获，而这些暗示如今在我们看来只是蒙昧主义的；可他们仍坚定地维护严格理性的权利，这一点值得赞叹。

我是否需要提醒你们，圣托马斯……

如果我还记得没错；毕竟我并不确定，不过并不重要……我们的参照点是索邦的坦皮耶主教在1277年作出的谴责。它谴责圣托马斯，因为按照教会权威的说法，他对这两个领域的区分坚持得超出了基督徒良知所宜的程度；他在同一份谴责中被同阿威罗伊主义者、以及例如布拉班特的西格尔之教学相提并论，尽管他以各种方式同后者相区别。

然而，这并未阻止圣托马斯写下至少标题为你们所熟知的文章：《反对窃窃私语者论世界的永恒》（De aeternitate mundi contra murmurantes）。它恰恰反对已经将导致他被谴责的东西，也就是坚

持：从严格理性的观点看，世界必定是永恒的，只有启示告诉我们事实并非如此。

真理与知识的这项区分，难道不是在提醒我们：知识的全部组织——这里的知识由一个直到现代科学位置创立以前都把自己强加为可称“知识之身体”的身体所支撑，也就是宇宙论、神学、心理学、本体论的身体——这个身体把自己设定为一种暧昧的接近模式，同时也是对真理之所是的根本远离。

我几乎会说，几个世纪以来，人们追求知识，是把它作为抵御真理的防御。

真理——如果你们愿意，为了让你们感受到这一点——在这里应当被定位、登记为关于主体最本质关系的问题，也就是主体同出生和死亡的关系，因为属于主体的一切都在二者的间隔中。

这就是真理的问题，而我把真理界定为那个说“我，真理，我说话”的东西[注3]。

> [注3] 《文集》，第409页；或第一卷第406页。

真理必须就此、就我们的最终归宿向我们说些什么。

请注意，“间隔”一词本身的陈述，以及“昏暗边缘”这个诗性隐喻，都在提醒我们那个严格意义上的拓扑术语，也就是我所指的边界功能。

仿佛——采用我们的参照，它并不是隐喻——在现代逻辑中开集与闭集的对立里，几个世纪以来，知识只保留、也“严密守护”了只选择开集一边的痕迹。

你们知道闭集是什么：它被构想为开集与其界限的结合，而界限在拓扑上同开集有别。界限、界线、边界，这正是问题涉及的术语：

- 真理的一边，就是我们在出生与死亡之间的界限，是作为主体的界限；
- 而属于知识的一切，就是包含在这个间隔中的开集。

正是在这一点上，诗人无论情愿与否、甚至在自己不知道时，都重新引入……

因为他知道并操纵的是语言结构，而不只是言语……他无论情愿与否，都在那里重新引入边界的这种拓扑与结构的分节。但丁由此超越了他从自己时代知识结构中借来的东西；恰恰由于他把当时知识的宇宙论形式投射到我所谓“最终归宿”的场域，才引入了这种暧昧。

但丁要歌唱的是彼岸；他把自己时代的宇宙论变成知识的彼岸、真理自身的场域，于是在两个点上使某些东西凸显出来。一位注释者——无疑因置身现代而受到引导、照明——所作的选择，让我们能够分别在《地狱篇》和《天堂篇》中的两个点上，定位一些我会称为典型的星丛；它们严格说来就是：

- 言语处于大他者场域、作为真理支撑时把它联结起来的关系；
- 以及对象(a)坐标的必然涌现。在同一个点——刚才并没有足够精确地向你们指出它有多深——在地狱最深处的同一个点上，结合着：
- 那个让言语支撑一场欺骗的人[西农]；

• 以及制造伪币的人[亚当]。

多么奇怪的结合、多么特殊的必然性；我们必须为此援引诗人的双重视野。单是阅读这首充满如此多奇异之处的诗，但丁就无疑迫使我们产生一种想法：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哪怕这些过度之处每时每刻在我们的常识看来多么奇怪。

那个从根本上说过谎的人，同另一人以这种奇异拥抱结合起来对话，绝非无缘无故、绝非偶然……

而且他不是以任意方式说谎，不只是说谎，不只是欺诈；刚才有人已经告诉你们，他通过欺骗他人的信任而欺诈……这种"谎言作为对信义的侵害"同另一事实结合起来：参照某种并非真理、而是真值的东西。谈到真理时，引入这一事物的参照是如此必要，以至海德格尔在《真理的本质》[注4]中也谈到货币。

> [注4] 马丁·海德格尔：《真理的本质》，前引书，第161—194页。

一枚假币是什么意思？假币难道不也是某种存在着的东西吗？

它就是它所是的东西，本身并不假。它只有相对于把价值同真理结合起来的功能才是假的。

所以，围绕对象(a)所涉及的正是这种真值功能。

这里引人注目而奇特的是：在两个受罚者之间建立的这场车夫式争吵中，但丁让其中一人——恰恰是伪币制造者——对叛徒说：如果自己能够抵达那种误认形式，去舔纳耳喀索斯的镜子，他仍会非常满意；也就是至少相信自己是自己。然而，恰恰如刚才已有人向你们清楚阐

明的那样，他甚至失去了自身作为说谎者的本质，已经无法重新找到自身存在的任何形式，只能热切渴望重新在自己面前找到那个把他带入根本谎言的人。

同样，在抵达天堂时，但丁所谓“同纳耳喀索斯相反的错误”，就是：当他把握某种作为显象向自己呈现的东西时，不得不回过头去看自己所见之物究竟是什么的意象。

这样，但丁亲自告诉我们，发生在他进入上帝场域之界限处的事情，向我们提出了严格说来就是我所谓对象(a)的对象。在上帝场域中，各种实体从上帝那里流溢出来；任何作为对象的东西，都不表现为对纯粹凝视的相对不透明化，而是透明背景上的透明。对所谓反思性思想而言，这种显现只有在它回头到自己身后、寻找原本位于何处时，才会变得可识别。

我曾在某个时期写下这些句子：

> “当人为了寻找思想的空无，走进想象空间无影的微光，甚至不再等待将从中涌现之物时，一面无光的镜子向他展示一个没有任何东西得到反射的表面。”[《文集》，第188页。]

这句话结束《论心理因果性》的一章；它的陷阱在于，看起来像是在告诉你们那里没有意象，其实它说的是意象什么也不反映。这里已经指明但丁文本所强调、也正是我告诉你们的东西：(a)不是镜像性的。事实上，当它在存在的透明背景上显现时，恰恰同时作为一个意象和一个无物的意象而显现。

但丁在第二次出现的镜子指涉中强调了这一点：他以为那里因镜子的功能而“有”某物，却只会发现，当(a)显现时，如果那里有镜子，就没有任何东西在其中照映自己。

这就是但丁的诗性建构所揭露的结构。他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为他是一位诗人；作为诗人，他抵达的与其说是我们的科学，不如说是我们眼下正在建构、而我称为理论的东西。诗性建构相对于理论——如果你们愿意，就是精神分析理论；对我们来说干脆就是理论——的特权，源于通过主体对大他者的某种苦行形式而建构起来的一种特殊关系。

我在关于伦理学的研讨班那一年界定了这种特殊结构。它就是宫廷之爱的结构；我们可以在那里卓越地定位如下各项：

- I：自我理想；
- (a)：对象(a)；
- i(a)：(a)的意象，即自我的基础；
- 以及S。

这种特殊结构——我在这里只能请参加过关于伦理学研讨班的人回去参看——同宫廷之爱这一东西相联系；它对我们极其重要，因为它揭示了升华的结构。

但丁生活与著作的中心——正如艾蒂安·吉尔松先生[注5]这样一位头脑稳健的人所强烈强调的——是他对贝雅特丽齐的选择，以及在其著作中以此名指称的那个人之存在、真实存在。

> [注5] 艾蒂安·吉尔松：《但丁与贝雅特丽齐》，巴黎：Vrin，2000年。

但丁是一个同宫廷之爱技艺相联系的诗人；只要他如此——他全部著作的延续都表明这一点，并起源于《新生》[注6]——他就找到、结构化了这个被选定的场所：在其中，某种同大他者本身的关系得到指明，并悬系于我所谓"光辉或美的界限"——享乐场域的这一界限。

> [注6] 但丁：《新生》（Vita nuova，1292—1293），巴黎：伽利玛出版社Folio双语丛书，1999年。

正因为享乐——我没有说快乐——被从宫廷之爱的场域中扣除，某种配置才得以建立；在那里，真理与知识的某种平衡成为可能。这正是人们明知自己在做什么而称作欢悦之知（gai savoir）的东西。

在这样界定的场域中，有上千个术语指明拓扑参照；学者们因无法带来丝毫哲学方向而迷失其中。例如有一个格外显要的术语，用来指涉大他者和所爱大他者的功能：被选择的女人就是[……]——这在我们看来很悖谬，但见于阿基坦的纪尧姆九世——"好邻人"。对我而言，这个"好邻人"——如果有时间，我可以强调——也尽可能接近现代数学理论所谓邻域功能：这个点对于奠立我刚才引入的开集与闭集维度绝对根本。

在我将继续展开的结构论述中，我会重新带回一种结构……

我去年已经以它眼下具有的形式引入它；这是事实，它就是这样命名的，叫作克莱因瓶……它将使我能够以决定性方式，结构化我在这里所谓“主体同大他者的这种关系”。

正因为宫廷诗人但丁抵达这一关系，他才得以作出我刚才提到的那些相遇，我想……

无论如何，现在已太迟，无法知道我今年是否已经抵达它；以后你们会向我证明……我已经充分定位了问题所在。

我们到两点了。因此，刚才我不得不向你们预告的东西——如今我很高兴没有说得更多，这样你们就不会太觉得受挫——我原本想作为今天第二部分讨论，但已经没有时间。

所以，我会在下一次研讨班讨论它；因此，受邀参加第三次研讨班的人，这次也将同时受邀参加第四次研讨班。

第8课 · 1966年1月26日

斯坦 孔泰 梅尔曼 奥杜阿尔

拉康

亲爱的朋友们，问题涉及这个封闭研讨班的存在与运作。我决定开办它，是因为希望其中发生一种多少还算恰当地被称作对话的东西。这个术语很含混，也被大量滥用。我试图在封闭研讨班中奠立的框架里可能发生的对话，相对于任何对话都没有特权。

例如，就在最近，有人来向我提出一个要求；这个要求本身如此过分、如此不可能答应，以至我甚至一刻都没想到对方要的竟是这个。结果是，我让步答应了某件完全可以答应的事，而站在我面前的人却确信我答应了符合其欲望的东西；我再告诉你们一次，后者远远超出可能性界限，以至我甚至想不到人家是在向我索求它。

这就是对话的一个例子，你们很容易把它同自己的大量经验联系起来。显然，一切对话都奠基于根本误解。但这毕竟不是不去引发对话的理由，哪怕只是为了随后盘点结果、证明其机制。我想，我已经完成过渡。

上次，你们听到一项非常严肃、诚实，也很令人喜欢的研究；随后我作了一些展开，相对于我本可以带入这个庞大论题的全部东西，它们无疑太短。这个论题归根结底就是：欲望在《神曲》中有什么功能。

这出喜剧，无论神圣与否，我今天都不会重新上演。我希望今天整场会谈都由回应填满——无论多么简短——也就是你们每个人听过接下来的内容以后可能生出的回应。

你们将听到一篇无疑准备得非常精细的报告。我想，今天在场的人上次12月的第四个星期三也已经参加研讨班。你们曾听到格林对我关于对象(a)的定义迄今产生了什么所作的出色报告。这项研究将会发表；发表后，也就是你们所有人都可以拿到文本以后，未来某次封闭研讨班将重新讨论它。我说的是格林的研究。

另一方面，你们听过我的学生孔泰的介绍，以及我的学生梅尔曼提出的若干问题。这三项经过充分准备的工作，已经填满我刚才提到的第四个星期三，也就是12月那一次。按照事情发展的方向——也正因如此作出过承诺——你们今天将听到斯坦的答复。

昨晚他告诉我，要求讲半小时以上，我很高兴。他想讲多久就讲多久！

只有一个条件：要给我希望会出现的回应留下半场时间。

所以，如果我像现在这样承诺自己今天不发言，还请他原谅。

因为事实表明，对有些人来说，正是这种言语的在场把他们置于这样的位置：不愿意——我只是在概括，事情复杂得多——把自己暴露给某种我说不上来的比较；在这样的场合，这种比较的参照在我看来已经处于可分析性的绝对边缘，不是吗?

我会或不会做到……

但对我来说，问题完全不在我为你们做的工作的价值……所以，我会或不会让人介入。

现在请你们留意斯坦将告诉我们的内容；我立刻把话交给他。

康拉德·斯坦

我将从孔泰上次提出的那些非常精确、切当的意见出发作出回应；同时也会回答梅尔曼的一些问题，随后再提出一个尤其涉及梅尔曼报告的问题。

我想，孔泰讨论自己所分析的我的两篇文章时，关切的中心是“融合情境”这个观念。他一开始强调了自己由此指出的东西，并引用我第一篇文章中的两句话：

- 一句是：“只有一个说着也听着的它……”
- 第二句是：“病人与分析家都趋向于成为一，而一切都在这个一之中。”

由此，孔泰指出这种状态很少见。于是他向我提出两个问题：

1）我是否把这些状态归于某种特定的神经症结构？

2）相对于整个治疗，我如何定位这些状态？

那么，让我们停在孔泰的第一个问题上。我希望自己能够给出的答案，将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其他一切问题和反驳的钥匙。

我的回答可以这样表述：我确实把这些状态归于某种特定结构、某种特定的神经症结构；但这个特定结构涉及所有病人，涉及所有能够形成转移的病人之总体。

我还会说：是的，我把这些状态归于一种界定这个范畴的共同结构；等会儿我会试着稍作阐明。

如果必须按严格意义理解“结构”、神经症结构，即把一种神经症形式同另一种区别开的东西，我就会回答：不是。我不认为这些状态只见于能够区分出的某一种神经症形式。

至于整个治疗，我必须说，这个问题稍微困难一些；因为在迄今已经发表的这些研究中，整个治疗还没有从连续各阶段之间的差异来加以考察。

我眼下处理的不是这个。相反，这些确实是从治疗一端到另一端都能遇到的事物与现象；也就是说，在第一阶段，我考察的是某种共同之物，它所涉及的不是整个治疗，而是任意一次分析会谈。换句话说，我首先为了自己使用，试着寻找既适用于治疗第一次会谈、也适用于最后一次会谈的标记。

我刚才给孔泰的这些答案，同孔泰认为我优先看待罕见状态的说法相矛盾。我可以这样反驳：如果这些状态具有典范性，那么它们是否罕见并不重要。

我也可以反驳说：我非常频繁地遇到它们。你们一定会认为，这一个或那一个答案都太主观，不能作为讨论基础。如果我再提醒你们，这里涉及无法实现的极限状态，我的回答就会显得更加主观。人们能感

知的只是一种状态，而我所作的描述正是：它们或多或少趋向这一界限。

为了离开这个过于主观的层面，我们必须考虑到，所讨论的极限情形无法实现，并且依定义就是想象的。所以，我们被引向界定这种想象状态；更准确地说，就是界定“它在说话”这一命题的意义。为了界定这个命题的意义，我将不得不向你们提出一个也许有些新颖的论证；它应当成为已经提出的主要问题之钥匙。

所以，我不得不请你们暂时保持格外集中的注意，因为我必须用相当枯燥的形式陈述若干命题。

问题在于阐明“它在说话”这个命题的意义。凡通过谓词指称一个主体的命题，我们都称为述谓。

我们把这个主体称为谓词主体。至于处在述谓源头、或充当述谓施动者的人，也就是实际说出言语，却通常不由命题中某一项代表、并可以在命题前面加上“我说”的人，我们称之为述谓主体。如果他不是语法主体，就是一个被假定的主体。

你们会注意到，他必然始终处在第一人称。现在我们约定，在任何命题中，谓词主体都是那个指称某位一次确定、此后不变的病人的项。

在分析情境中，它涉及通常所谓的病人；如果想用这种方法考察任意对话的内容——例如拉康刚才向你们讲的对话——那么可以任意选择病人，但选定后必须始终是同一个人。无论人们谈论他、对他说话，还是他亲自说话，病人都必须保持不变。

我举一个例子，把事情说清楚。病人……

就说分析情境吧，因为事实上，今天我们只考察这一情境，不会外推到全部对话……病人对精神分析家说：

“您没有回应我的期待。”

与表面看起来不同，谓词主体包含在“我的”之中。也就是说，为了把事情说清楚，这句话可以转写为：

“我徒然等待您的回应。”

这样，谓词主体确实就是“我”：“我”（谓词）等待您的回应。你们会反驳说，两句话意义不同。我要回答：这恰好表明，谓词主体以一种方式还是另一种方式出现在其中，并非无关紧要。我们的命题“会谈中，它在说话”是一个二阶述谓。

别忘了这一点。我们不必专门研究这种二阶述谓，但必须知道，我们说话时所谈的是会谈中被说出的言语。

必须区分我们对它们说的话与已经被说出的言语。我的意思仅此而已。“会谈中，它在说话”是我们关于会谈中曾经说出的言语之话语。所以我们必须追问：是谁曾在说话？谁在说话？

在所考察的“会谈中，它在说话”这一情形中，显然曾经是、现在也是病人在说话。然而我们的确说“它在说话”，而不是“他在说话”。为什么？

因为在我们要考察的想象性情形中，他没有说话，没有对精神分析家说话。为了澄清问题，先设想他会对精神分析家说话的情形；在极限上，这远远是最常见的情形。

当他对精神分析家说话时，其言语前面可以加上“我说”。

这意味着，倾听中必须有两个人：

- 说着也听着的“我”，指称病人；
- 只要他也是“我”，便同另一个人——听着的精神分析家——之“我”属于同一秩序。

我们能否设想另一个情形，其中说话的是病人，而我们可以说“他在说话”？病人可以说出一些言语，并假定那些言语由自己的替身或第三人——例如精神分析家——向自己说出。

他的假定是，其言语前面仍可以加上“我说”，而这个“我”同那个被假定说出言语之人的“我”相似。这仍然不是我们所考察的想象性情形。

让我们先就眼下所考察的“他在说话”这个形式秩序提出几点意见。

第一点：“我”这个述谓主体，始终同另一个“我”这个述谓主体属于同一秩序。第二点：当说话的是病人时，述谓主体依定义同“我说”这个谓词主体是同一个人。

第三点：当述谓主体同谓词主体为同一人时，后者始终处在第一人称。我谈论自己时，只能用“我”来指称自己。谈论自身，就说“我”。

可是在我们考察的第二种情形中，要让另一个人谈论自己，人会对精神分析家说“您一定会对我说……”；要让自身以外的人说话，人不说“我”，而说我（宾格）：“您对我说。”

关于第一人称的这个反身形式——“我（宾格）”——我们必须注意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它蕴含对第二人称述谓“您对我说”的参照；“我”包含谓词主体。

但所蕴含的第二人称参照仍然是“你”的参照：“您向我说‘你’”。

所以，在第一人称反身形式“我（宾格）”中，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人称“我”受到某种来自第二人称“你”之参照的混染。我之所以向你们指出这个反身形式中“我”的混染程度，是因为它很容易通过过渡把我们引向必须考察的想象性自我。在那里，不再是“我”受到“你”之参照的混染——“我”与“你”始终指称同一个主体，即谓词主体——而是二者混淆。

那么，我们现在必须考察、而我们评论为“它在说话”的想象性情形究竟如何？我们已经看到，在可以说“他在说话”的形式秩序中，“他”指称述谓主体，而这个主体始终同另一个“我”——另一个述谓主体——对立。

想象性秩序就是“它在说话”的秩序。“它”把一个唯一的人指认为言语发出者；始终有两个“我”，却只有一个“它”：一个唯一的人，也是一个无名的人，因为它不命名自己。

况且，我们说“他在说话”时，所指的是那个说“我”的人；而说“它在说话”时，我们没有名字指称所说言语的源头，也没有名字指称述谓主体，理由很充分：这个述谓主体在这里失去了主体地位。

想象性情形恰恰就是违反那条规律的情形……

我刚才以意见形式向你们呈现过它……违反规律的是：谓词主体处在第二人称，而述谓主体同谓词主体为同一人。换句话说，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合而为一。

例子：如何为想象性情形举例？显然，只能非常近似地去做。例如，病人借精神分析家的嘴说话。我指的不是“借别人的嘴说话”这个比喻义，而是病人借精神分析家的嘴——不妨说实在地——说话；因为就心理现实而言，没有什么比想象界更实在。若按本义而不是比喻义来理解，病人借精神分析家的嘴说话，这显然在弗洛伊德赋予心理现实的领域之外不可能发生。

那么，在这个想象性情形中发生了什么？他会在自己的述谓中以第二人称把自己指认为主体，称自己为“你”。如果这种言语前面加上“我说”，就会——因为“我”与“你”是同一个人——得到“我说：你是我”。但他不能说“你是我”，所以我们说“它说：你是我”。这个同时是第一人称与第二人称的想象性人物，在我们关于其话语的话语中被指称为“它”。“它”是一个想象性人物。“它”在说话，而被听见的话语虽类似述谓，却因为其中被指称的主体无处不在，而不具有述谓地位（刚才我已告诉你们，它不具有主体地位）。

现在，也许应当注意，我们已经区分言语的两个层面：

- “他在说话”的形式层面；
- “它在说话”的想象性层面。

必须补充，这些层面允许有细分，而且数量很多。不过，考察它们所有可能的细分不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尽管那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

我只想提到构成“他在说话”这一形式层面的三个细分层面，因为它们立刻对我们有用。况且它们是最简单的。1）以第二人称指称谓词主体的层面。在这种情形中，言语显然来自另一个人，来自那个说“你”的人。作为非常粗略的初步近似，这个层面在精神分析家对病人说“你”的解释中占据优先位置。

2）以第一人称反身形式指称谓词主体；我们已经用它举过例子。这里确实是病人谈论自己，却经由被假定为其精神分析家言论的东西来指称自己，而后者构成谓词。以第一人称反身形式指称谓词主体的层面，是精神分析家之被假定解释的层面；同样作为非常近似的说法，它优先属于转移的层面。

现在你们会告诉我：毕竟还有一个极其简单、刚才已经谈过、必须加以考虑的层面，就是以第一人称指称谓词主体；在精神分析中，它是病人说“我”而谈论自己的情形。这个层面又如何？

好，请稍等，我们等会儿再回来。因为我建议通过回答孔泰的一些问题来明确这一切。孔泰说，我把言语呈现为引入一次切割；他又说，我把言语呈现为不含裂隙或切割地穷尽心灵流动——这是孔泰的表达。这里有一个表面悖论，使孔泰提出问题：“但在他看来，什么才是原初的？”

我的回答如下：述谓的原初功能在我看来处于刚才所谓以第二人称指称谓词主体的层面；它优先属于精神分析家的解释。我提醒你们，当

然，这一切还有待比我在这份初步方案中所做的更加深入研究。这里就是原初之物。

我要补充，这种述谓的功能同我们可以称为父性功能的东西有某种关系——我甚至会说，有非常内在的关系。它构成弗洛伊德所谓心灵装置或心理装置，既在其拓扑维度中，也在其结构中；也就是说，它参照三个新语法学意义上的人称，而三者构成那个有专名的东西：弗洛伊德第二拓扑。因此，它也构成我们说“它在说话”的想象性层面。

换句话说，它构成日常语言所谓的“本我”，同时也构成自我与超我。现在补充一点：在“它在说话”这个想象性层面中，言语的述谓功能仿佛遭到异化。

现在请注意，“它在说话”与述谓不相容；面对“它在说话”这个自恋层面，述谓：

- 要么产生切割效应，把病人恢复到他说话的某一种层面；
- 要么完全不产生效应。

在后一种情形中，这种述谓功能、这个述谓仿佛——沿用拉康的术语——在其功能行使中遭到拒斥。我想，这种看法应当相当准确地同拉康所谓父之名的拒斥重合。

换句话说，当“它在说话”，而事情仿佛固定在这一层面，述谓毫无效应时，我们就必须认为那里没有转移。这里没有转移，只是因为以第二人称指称谓词主体的述谓介入，丝毫没有打断“它在说话”，也没有

让病人进入——尤其没有进入——以第一人称反身形式指称主体的层面。

也就是说，在这个拒斥情形中，我们在实践上面对的病人，其解释本身对他们不代表任何东西；他们不能进入经由精神分析家的被假定解释来指称自己的层面。这就是拒斥，就是拉康所谓父之名的拒斥；也恰好就是弗洛伊德所区分的自恋性神经症之定义。

你们知道——我在这里插入一段，旨在表明这一切也与精神分析有关——自从精神分析家开始处理疯人、处理精神病人以来，他们便指出，这些人对自己怀有非常强烈的情感，从而以为疯狂并不排除形成转移的可能。

好，这是一个错误。如果要维持自恋性神经症的框架——在我看来这是必要的——就必须以比“依附于某人的情感”更加限制性的意义把握转移，以一种严格意义……

比如我向你们提出的这个意义；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可能的表述……即经由精神分析家的被假定解释来指称自身的能力。

那么，疯狂，只要病人是疯的……

因为人永远不会彻底发疯，正因此仍然可以治疗疯人……只要病人是疯的，由于刚才谈到的拒斥，这种可能性就不存在。

而且——仍然是在插入讨论，因为我现在不再回答孔泰的问题——必须回到刚才尚未谈及的层面：以第一人称指称主体，病人说“我”而谈论自己。

好，在这个可以说位于另一极端的层面，言语的述谓功能不再像“它在说话”的想象性层面中那样被异化，而是号称得到完全承担。这个层面可以被界定为次级自恋的层面。面对这个层面，述谓：

- 要么其效应重新受到质疑；
- 要么不产生效应。

这里同样可能发生拉康指认为根本功能的父之名之拒斥。

这里同样不可能形成转移——只要事情确实如此，就不可能。

实践中，我们在这里面对的不是疯人，恰恰相反，而是心智完全健全或表面健全的人；这些心智健全的病人并不进入分析，仿佛不可化约。人们会用一些在我看来不够恰当、相当含混的语言——尤其因为术语众多——说他们表现出僵硬的自恋性防御、不可化约的性格防御，或随便什么。

所以，这是一段插入，一项极为简略的说明，用来向你们表明：我这些有些枯燥的表述……

我不认为必须像我一样看待问题，也不认为必须对这类表述感兴趣……但我要告诉你们，只要对它们感兴趣，并不表示人就没有在研究精神分析。

孔泰的另一个问题：“在那个唯一的、说着也听着的‘它’中，精神分析家是否同样受到退行、拓扑性退行的支配，还是那里更像被分析者关于融合的幻想？”

我想，上文使答案可以非常简单地表述，而且已经蕴含了答案。

只要我们已经作出那个约定——病人始终是同一个人——这一明确约定就证明：当我们谈论分析过程中被听见的言语时，不能突然把精神分析家当成病人。不过可以这样推论："唯一的、说着也听着的它"显然指病人的幻想。从现象学观点看，一种特定的情感、某种暂时而偶发的存在方式泄露这一幻想；我把它称作自恋扩张。

完全没有必要保留这个术语；它并不具有根本重要性。

重要的是强调病人幻想那种不可化约的无意识性质，并把它陈述为……

既然我们在建立理论，就不要再说自恋扩张，而这样陈述这个幻想："它说：你是我。"你们会注意到，"你是我"这个公式不可镜像化，而且那里只有一个"它"。我想，这已经充分回答孔泰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孔泰说，对我而言，原初自恋看来——他没有断定，只说看来——是发展的一个原初步骤、言语之前或前言语的步骤。另一方面，病人把自己设立为精神分析家所缺的对象，在斯坦的研究中看来旨在恢复他者的自恋。他者自恋的恢复将呈现为他者欲望完整性的神话或幻想。

于是孔泰追问：哪一个面向具有决定性？两个面向怎样彼此衔接？

好，我的回答是：关于第一点，我想已经回答得足够充分，不必再详细说明；我显然不可能把原初自恋视为言语之前或前言语的东西，而刚才我正试图向你们展示这一点。

关于第二点，我会告诉孔泰，我认为必须区分自恋幻想与自恋神话。

至少我们可以区分二者。自恋幻想是病人的幻想；它是无意识的。

自恋神话……

这是孔泰这样引入的一个也许更新的观念……自恋神话本身不是无意识的，而是有意识或前意识的，能够变成有意识；按照这种自恋神话，他者可以完成或填满自己的欲望。

自恋神话例如是：

- 精神分析家作为命运安排者的神话；
- 精神分析家被树立在严格说来属于偶像之功能中的神话。

此外，孔泰与梅尔曼还试图质询：我的前两篇文章所提供的标记同拉康的若干主要范畴有何关系。他们因如下事实而感到困难：原初自恋最初被描述为一种融合的极限状态，可能在某一面向上显得没有形式。

也许，他们的意见促使我就“它在说话”这一命题的意指作出明确说明；也许这些意见、这些我曾试图初步提供的钥匙，将有助于更好地设定这种对照的要素。不过别忘了，我的第一篇导论性文章仍然并将

继续具有更偏描述、而非严格理论的性质；孔泰概述的第二篇文章则旨在把病人的言语定位于一个由两条坐标轴规定的平面：

- “它在说话”的想象性轴；
- 以及“他在说话”的形式轴；在这里，经由其对象的归属来指称第一人称。

朝第一条轴渐近地推进，我称为“拓扑性退行运动”；朝第二条轴渐近地推进，我称为“压抑运动”。这充分证明孔泰与梅尔曼的印象有道理：这里确实像他们所说，是参照一项对立来框定分析情境；我不会像他们那样说两项的对立，而更愿意说两条轴的对立。

此外，孔泰敏锐地感觉到，只要这种定位像我在第二篇文章中所做的那样，引向对转移中施虐—受虐关系的讨论，就已经必然蕴含第三项。第三项将在梅尔曼所评论的第三篇文章——《精神分析家言语的述谓功能》——中引入。

但第三篇文章的工作远未完成。正是这种未完成使对照显得有些跛脚。孔泰的评论以阉割相对于挫折的定位问题结束；这个问题将同自我理想作为原初自恋继承者的构成一起讨论。我还没有这样做；只有到那时，我才能谈治疗的演变与治疗的终结。

关于治疗的终结，现在我也许不必再说——孔泰与梅尔曼或许如此认为——自己能否把它从属于某种所谓技术性权宜之计。

我想，我已经提及——即使没有回答——孔泰的全部问题与意见，也提及梅尔曼的许多问题。孔泰那里只剩下梦的问题；回答它会是一项

很有教益的练习，但我没有时间。不过，梅尔曼那里还留有一种余项；我必须单独回答那个看来构成我和他之间——至少上次看来如此——主要误解的问题。

问题如下。梅尔曼说：病人在转移中赋予分析家一种他并不拥有的力量，那么分析家怎么可能把自己的言语变成真理的保证？这是梅尔曼让代我说出的话，是他让我说的话。可是，我从未说过任何可能被如此转述的东西。

我曾写道——梅尔曼在这里准确地引用我，而且引用两次——是在一篇其实并不讨论精神分析家实际说出之言语的文章中。把精神分析家实际说出的言语问题留待以后，也许是一种权宜；但那是我采用的权宜。我在文章中写道：“如果精神分析家声称自己始终把自己设立为真理忠实的仆人，精神分析就不会存在。”

这就是我写的东西，而且上下文在我看来丝毫没有让这句话的意义产生疑问。

为了说得更明确，如果你们愿意，把“仆人”换成“捍卫者”：“真理的捍卫者”。

他不时时刻刻充当真理的捍卫者，并不表示他没有服务于让这一真理迟早迸发出来。

一般说来，这意味着他保持沉默，不阻止病人说话。他不反对转移的发展——病人在转移中把他变成受骗的欺骗者；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恰恰相反——当他轮到自己说话、也就是作出解释时，会接受或认可这一位置。

精神分析家说话的位置，同他在转移中被假定说话的位置并不相同。这一点至关重要。

还是稍微插一句，不是吗？在这一点上，梅尔曼谈到分析家言语会从中取得如此独特光彩的位置。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表达。不过，当人们谈这个问题时：

- 分析家的位置；
- 分析家所占的位置；
- 分析家说话的位置……我认为，对话中经常把规范问题与事实问题混为一谈。

我不认为我们首先应当规定：精神分析家必须从什么位置说话，其言语才能获得这种独特光彩；我认为，我们首先应当考察：事实表明精神分析家从什么位置说话。我会用一条也许显得有些刻薄的意见来支持这个考量。梅尔曼会同意：他某位分析家同行的言语——此人的才智并不被他高度评价；我不指任何人，只是举例——哪怕他认为这位分析家几乎不懂分析、不懂自己在做什么，只要此人同病人处在分析家的情境中，其言语仍偶尔会取得这种光彩。

事实上，也许不是对能够听取分析报告的我们，而是对他的病人。因此，问题与其说是规范，不如说是事实。梅尔曼指出，如果独立于言语内容来考察——这一点他同意我——它看来主要唤起分析家言语从中获得这种独特光彩的位置。他这样说。我则说，问题确实在于说出言语者的位置，即述谓主体的地位。说出解释的人以第二人称把病人指认为谓词主体。

他的地位不同于那个在转移中被假定说话的人；后者被假定以第二人称指称病人，而事实上却由病人自己以第一人称反身形式——“我”——加以指称。

如此被假定说话的精神分析家，占据自恋成就神话之主体的位置，被假定处于一切事物的源头。给出解释的精神分析家，则占据一个自身又被另一个人以第二人称指称的主体位置。与那个被假定处于一切事物源头的人相反，他由自己在谱系相继中的位置所标记。

结束前我会非常简短，但还要回应拉康先生在上次讨论这些文本的会议结束时向我们提出的建议。他建议今天从如下观念重新开始争论：如果分析家处于某个位置，就只能是否定（Verneinung）的位置，而不是肯定（Bejahung）的位置。

Bejahung在法语中就是肯定。每个人都知道，述谓可以采取肯定形式或否定形式，所以述谓范畴既不能是肯定范畴，也不能是否定范畴。

我认为，这驳斥了拉康先生的论证：仿佛我把精神分析家安置在肯定、Bejahung的位置上。

为了尝试从拉康先生建议的视角定位我今天试图表述的东西，我将极简短地这样说：精神分析家以第二人称指称主体的言语，同自恋中想象性的“你是我”不相容——我提醒你们这一点。

精神分析家的言语一旦被听见，只能被接收为：

- 一次切割；
- 构成欲望的那次切割；
- 对自恋的一次拒认，重复最初那次神话性拒认；“你是我”的幻想正是在言语的述谓功能——也就是拒认功能，因为二者在这里是同一回事——遭到异化时构成的。

或者用弗洛伊德的术语说，这种言语只能被接收为对婴儿全能的一次拒认——这是弗洛伊德最初的表述——或者参照他后来的表述，称作对自恋性全能的拒认。因此，这种拒认同压抑相关。

下列言语最好地说明了这种对全能的拒认：“由于您的愿望。”精神分析家把它添加到病人的梦文中：“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死了。”由此引发病人的否定：“那不是我的愿望。”

这就是我想告诉你们的内容。

拉康

斯坦，非常感谢你愿意带来这份澄清汇总。你已经告诉我们，这只是你计划中某个东西的前三个阶段，而它无疑至少还应包含另一个阶段，不是吗？

所以，我必须为两件事感谢你：

- 第一，你成功完成这个第一部分；
- 第二，你愿意为我们把它们定位到整体构想中。

正如刚才预告、也同我所宣布的一致，我今天不会介入你为我们带来的论述，无论实质还是细节；我指望在场听过你发言的人提出最初意见。

我只能说一件事：除了使我希望把这些文章中的一些、特别是第一篇带进我们研讨班框架讨论的直接动机以外，我为此感到庆幸。你刚才的陈述无疑消除了关于你想说之物本质的某种误解。不过，这仍不表示我能够同意你对问题情境的整个设定，因为问题正是在这里。

但它无疑具有足够深入的骨架，非常清楚地向我们指明一些根本问题位于什么层面。我想……

因为你对这一分析情境之发展的限定可以被超越……这里恰恰是一项基础、一个支点，对我极为宝贵，使我能够定位自己今年所阐述的内容如何允许我批评这个立场。你们会看到我不同听众相对于今天这场报告所要求的倾听分别处在什么位置；这样，我作出的批评将更充分、更容易，也会对所有人更加切当。

不过，我不能不立刻作一项更正。它很重要。很遗憾，我交给你的文本——梅尔曼尤其曾在其中作出修正——竟让最后一页上的东西漏了过去；那甚至不是我投向你这边的一个标记、一根绳索。

我当时说了两页半的时间。

文本中确实写着一个词；也许它的不正确本应让你警觉："Verneunung"——这个词并不存在。

你把它理解为Verneinung（否定），而我说的是Verleugnung（拒认）。所以，你结束时直接给我的回答有些失去准头，当然，这丝毫没有降低其意义。

斯坦——我对Verleugnung（拒认）同意得多。

拉康

那么，我自然要先问那些得到答复的人，尤其是孔泰和梅尔曼：现在是否愿意发言。孔泰，你记了笔记。你想给自己留些思考时间，还是现在就能开始说？不要在座位上说，到这里来。

事情也许会相当符合我的希望；等会儿，人会像常见的那样分批离场——有些人受时间所限会先走。因此，我想先向你们宣布一件事；这也是我刚才为我们刚听到的这类话语今年在我全部研讨班中占据如此位置而高兴的理由之一。

事实上，你们眼下也许还没有把握其关系；但我认为，没有比下面这篇文本更适合让我们重新推动对斯坦宣布的若干断言的讨论。我上次在帕里索女士谈德拉戈内蒂论但丁的文章以前，已经向你们预告这篇文本。当然，今天我完全无法评论自己准备赋予它的功能。

不过，为了不以突袭方式处理它，免得届时有人大吃一惊，我现在为所有实用目的预告它，让你们重新温习，甚至去参看它引发的大量关

键评论。我下次将从这篇文本出发，把它作为今年教你们定位对象(a)功能的拓扑序列之接力点；它不是别的，正是帕斯卡的赌注。

所以，那些希望恰当地理解今年所说内容的人，至少有八天时间去参看它的不同版本。我强调一点——希望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从最早的波尔-罗亚尔诸先生版本开始，出现了一系列彼此有别的文本；我的意思是，它们越来越接近两张小纸片：那两张正反面都写了字、笔迹难以置信地潦草的小纸片，把后来以帕斯卡赌注之名出版的内容留给了我们。

所以，我不会给你们一整份书目，除非最后有人问我。

你们也知道，许多哲学家都曾致力于证明它的价值与影响。

在这方面，如果有人想问应当参看哪些最重要文章，可以找机会直接来问我；除非等会儿还剩一些时间，让我能够列出来。

克洛德·孔泰

我打算只说很少几件事，主要是感谢斯坦今天带给我们的内容。与我读过的东西相比，它在我看来确有很大一部分是新的，使我们能够从另一种透视定位问题。

关于《精神分析家的判断》的第三篇文章，随着述谓功能被引入，本来确实已经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的第一篇文章。无论如何，他今天上午说得更精确、更充分，使我的大多数意见失去对象。我必须说，在这个层面，已经提出的困难得到解决；问题是把它们移到另一个层面来讨论。

不过，在若干点上我仍稍有意犹未尽，尤其是自恋层面与欲望层面的关系，因而也就是对象(a)的维度。我还没有充分看清斯坦怎样衔接所有层面。

第二点：第二篇文章讨论治疗中的受虐狂，强调参照精神分析家实际说出的言语，并把这同想象界维度对置。我想就此向斯坦提问：他在这篇文章中是否倾向于把转移定位——把转移推得——太靠近索求一边？他的呈现是否在这里有所偏颇？

事实上，我认为争论如今确实必须转向述谓功能；对于这个参照，我几乎没有准备好介入。我会给自己保留更充分的时间来思考。初听之下，我只想问：是否应当把述谓、这最初的原初奠基性言语定位为奠立主体的述谓，也就是给主体归属一个谓词——主体变成某物，是这个或那个；还是述谓更应当同对对象作出的判断联系起来？这一点或许可以展开。

关于《精神分析家的判断》这第三篇文章，我眼下还有一点不能充分把握斯坦的思想：欲望层面怎样同法则或禁令层面衔接；也就是斯坦从欠缺过渡到……

例如，被分析者试图把自己设立为分析家所缺的对象……他怎样从“欠缺（manque）”这一层面过渡到“违犯（manquement）”的层面；后者涉及对一项法则的违犯，因而涉及禁令。也就是斯坦在最初的奠基性判断之间作出的非常精确衔接：一方面，它把主体确立为欲望对象；另一方面，又把他确立为一项既往过错的主体。

这里有一个我没有充分把握的衔接，不过无疑只是因为尚未认真思考。

这就是我今天想说的全部。

夏尔·梅尔曼

在我看来，你这篇报告的一大功绩，无论如何，是也许比我和孔泰试图做的更清楚地向听众呈现：你对治疗抱有什么立场与看法。这当然使讨论也许更容易展开。

不过我还是想告诉你，我非常有兴趣地读了你的文章；而且兴趣当然格外浓厚，因为正如我上次试图说明的，凡是对分析中所发生之事作出一般理论化的努力，自然都只能唤起我们的全部注意、全部兴趣和全部同情。

话虽如此，阅读这三篇文章——最近这三篇——时，我产生一种印象与感觉：你提出的各个术语可以彼此衔接，包括原初自恋扩张。你今天告诉我们，毕竟你并不十分坚持这个术语，也很愿意放弃它；可以。

斯坦

我要明确：这里不是……这个术语并不指向一个理论概念。

所以我才说，它在我看来是描述性的，因而确实只具次要意义。

拉康

这项澄清非常重要，因为人们通常赋予“原初自恋”这个术语的主要是理论性质。

梅尔曼

主要是理论性的，也很难在你的文本内部定位。我的意思是，人有时会产生这种印象……比如，当你把原初自恋——至少是原初自恋的目标——定位为同这个已经失落的神话性对象重逢时，你显然已经在这个术语的某一条道路、某一种进路上前行。

但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仿佛把你的不同命题与术语重新聚集在某种在我看来构成立场的东西周围。这个立场就是把分析家的言语变成一个对象(a)。

我曾试着围绕这一点对你说话；而且我强调，仍是围绕这一点，在我看来你文本中的不同环节也可以很好地衔接起来。

你说，分析家的言语能够取得我所谓——说得有点勉强，不过——如此独特的光彩。我对此当然毫不怀疑；关键问题在我看来更在于，分析家如何面对自己的言语，因为它能够为病人表征这个特殊对象、这个独特对象。

也许从头稍微重述一下。必须说，在我看来，这些文章的发展仿佛被某种东西卡住，总被化约为病人与分析家之间的这种二人游戏；事情在二者之间来回摆动，而正如你说得非常清楚的：“人会问，这怎样才能结束？”

因为毕竟你说得非常清楚，至少把问题提得很清楚，而且有某种坦率。在我看来，对大他者——当然是指大写的大他者——的参照，在你的文本中有所欠缺；恰恰在这个点上，事情在文本中凝集、填塞，最终使人追问它们如何才能解开。

例如，你在论述开头用“融合情境”界定那个唯一的“说着也听着的它”之实现；我倾向于这样解释它……

孔泰当然已经指出，这是一个可能但罕见的现象……我自然倾向于试着在这个维度中唤起它：也许病人会感到自己的言语可能同一个话语——大他者的话语——汇合；从这一刻起，一切分离、一切断裂、一切裂隙、一切距离都会被废除。

我还在想，引入这个参照是否能够逐步帮助定位……

如果听你说话时，我在这里没有始终保持充分注意，请你原谅……你围绕不同人称的区分、围绕“你”和“他”所引入的内容。这些语法范畴当然至关重要；但我必须说，每次听你说，我都会疑惑你怎样使用它们。

我的意思是：你是否按它们在病人主体中原样出现的方式把握、提出它们？比如，当病人说“我”时，你是否由此把他放入你分离出来的三个范畴之一：以第二人称指称谓词主体、以第一人称反身形式指称，还是以第二人称指称谓词主体，不是吗？

换句话说，你为了区分、分析“我”“你”与“他”而在这里引入的一切，我怀疑它们甚至能否被定位在对那个第三场所的参照之外；主体作为主体，正从这个场所接收属于自己的言语。至于你围绕真理、真理问题

提出的这个小尖点，请允许我引用你在论受虐狂的文本中所说的话：“精神分析家被召来介入，他同时被双方召唤。在转移中，病人把他召到一个他并不在的位置。

病人把他定位在被假定拥有力量的位置；病人正因这种力量而经历挫折，也就是说，分析家仿佛掌握着现实的这种力量，并能随意使用它来中断病人的自恋扩张。分析家又会以真理之名被召唤，要求他就转移作出宣告、揭露病人的幻觉。若他从自己并不在的位置回应第一项召唤，就会接受充当病人的诱饵、僭取并不属于自己的力量，从而欺骗病人。以真理之名，他应当拒绝回应病人的召唤，并介入以否认自己处在那个位置。可是在分析家的倾听中，病人的召唤始终存在。容忍转移已经是在欺骗，因为正是倾听引起转移。于是分析家应当不断介入，以真之名揭露假，不去倾听那项欺骗的召唤。这样，他的效力将成为传教士的效力，不再是精神分析家的效力。”

你正是在这里补充：“如果精神分析家声称自己始终把自己设立为真理忠实的仆人，精神分析就不会存在。”

我想这当然正确，你完全有道理；但在你提出的这个衔接中，我看不出你如何仍为治疗一切可能的发展保留那个看来根本的东西——除非治疗变成……我不大知道应当怎样定位它——也就是在这一运动中仍然给真理的维度留下存在空间。

斯坦

这里我立刻回答你：在那个点上还没有处理它。至于“传教士”这个词，后续发展显然会使我删去它。此前我只在“讲道者”的意义上使用。所以，为免混淆，它会在那里删掉。这很显然。

梅尔曼

好，这样就明白了。也许我还会在最后重新讨论、甚至据为己用你对述谓主体的说法；这个主体在你最近的展开中占有重要位置，我认为值得深入思考。也就是你可能赋予分析家的这种述谓功能。

拉康

好。斯坦显然——我只是事后才发现，因为当时被他的言语迷住了——大大超出了自己的时间，所以没有给我们留下足够时间进行我今天所期待的讨论。现在还可以让一位发言。格林，你想介入吗?

格林——我愿意，但不想剥夺别人发言的机会。

拉康

马若想介入吗?

马若，你有话要说吗？你得走了。好吧……

那么奥杜阿尔?

格扎维埃·奥杜阿尔

在我看来，斯坦刚才把我们放进的这种语法宇宙，每时每刻都会让一个余项构成出来。这一点在他话语的不同面向上都可感知，例如他说：

- 即使精神分析家的活动或他占据的位置在我们看来值得质疑，其话语毕竟仍有某种光彩；
- 即使精神分析家不是真理的掌握者，他毕竟仍是真理忠实的仆人；
- 如果述谓确实始终或肯定或否定，述谓自身的场域毕竟仍落在肯定与否定之外。

也许，恰恰在这里把Verneinung（否定）听成Verleugnung（拒认），并不是没有缘故。

因为Verleugnung（拒认）恰恰引入了谎言维度，而谎言不同于否定。

在斯坦看来把分析家与被分析者关系定位于其中的这个语法宇宙中，仿佛每时每刻都显出某种忠实性。例如，“我”与“你”之间会发生镜像化的努力——反思自身的第一人称同来到那里反映第一人称的“你”之间——而斯坦试图借这种镜像化效应引入被分析者同分析家的关系；在其中，某种不可镜像化之物每时每刻都在显现。总之，我们可以说，这个“你”对“我”、或“我”对自身反思的逻辑宇宙，在辩证法的定向中或许并非完全可以忽略；可即使引入更具辩证性的定向，在这种辩证法中仍很难找到一个奠立它的根基或真理。

例如，可以把这一切同帕里索女士上次告诉我们的内容联系起来：毕竟，被镜像化者并不是可镜像者。它远非可镜像者，也许只是使人相

信那里有一个可镜像者的东西；而作为这种镜像性本身，它始终被一个落在反思场域之外的余项所穿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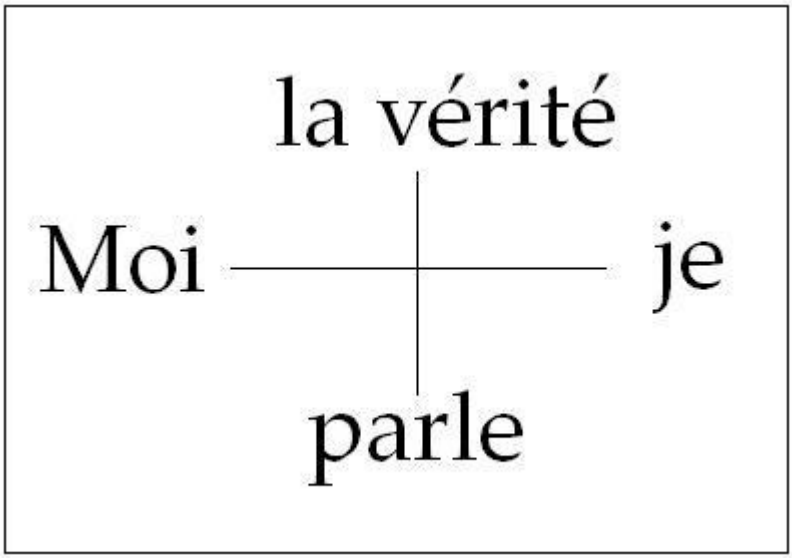
归根结底，述谓主体与谓词主体之间有某种深渊；这向我们表明，二者之间仿佛有一个世界、一片空无、某种把它们分隔开来的东西。这当然不是说不能让二者进入辩证关系，而是说任何时候都不允许这一关系瞄准“你是我”；那里必然会构成别的东西，构成一种既不属于逻辑、也不属于语法，却属于欲望这种特殊强行作用的东西。

述谓在我看来并不是起初的一项逻辑行为；就像孩子说狗“喵喵叫”、猫“汪汪叫”——拉康曾这样说——这里不是属于逻辑秩序的述谓，而是属于欲望这种特殊强行作用之秩序的述谓。总之，我只是想指出一条道路：在我看来，可以从这里引入对一种也许过于令人满意、因为过于语法学家的解释之批评。

拉康——格林，说几句吧。

格林

抱歉，我需要用黑板。我会尽量简短。我只想结合斯坦刚才说的，谈几句拉康的公式：“我，真理，我说话……”那么，如果我们写成：



……就会得到一个实际上沿两条轴衔接的句子："我（宾格）—我（主格）"轴，以及"真理—说话"轴。

我想，这一切同斯坦告诉我们的"我""自我"与言语之间的关系有关。

奥杜阿尔刚才指出，斯坦在"我""你"和可能的"他"这几个不同代词之间建构了等价关系。

正如主体不能说"我说你是我"：

- 因为"我说你是我"被"它说你是我"取代；
- 正因如此，我认为这些不同代词之间的等价关系歪曲了问题。

为什么？因为，如果此刻用下标形式给“它说你是我”作标记，那么可以说，在言说本身、在言说的相继过程中，从“你”抵达“我”的那一刻起，“我”便仿佛发生转化，不再是出发时的同一个我，而被带回原初的你。

我认为，这一点对构想其中存在某种封闭循环至关重要。走出循环性、让它不构成一个原地打转系统的唯一方式，确实是构想“你”与“我”之间存在差异；这个差异就是大他者同被划杠的大他者之间的差异，因为释放这条横杠的恰恰是一个余项。

必须有一个余项；而要有一个余项，不同代词值之间就不能等价。

我们在这里落到什么上？恰恰落到我一开始谈到的术语：真理。

也就是说，斯坦谈了自我，谈了我，也谈了言语；可是，恰恰关于真理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分析家是不是真理忠实的仆人？

好，我认为，我们毕竟必须在这里回到拉康提出的、规定转移的公式：转移指向一个被假定知道的主体。被假定知道什么？这正是全部问题。

精神分析家知道什么？好吧？他知道什么？

我认为，治疗的全部误解、它的全部拒认（Verleugnung）就在于：分析家被认为知道一切，唯独不知道真理；正因为这项误解从一开始存在，治疗才能继续，最终抵达一种情境：人们显然已经明白，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不再处于分析家一边；而问题涉及的，确实是一项只能属

于主体的真理。我认为，我们在这里找到一个同我曾试图分析的希腊人神谕问题完全相同的问题结构。

拉康

我会尝试给出更加精确的公式，但这个说法在我看来确实极其有力，也完全根本。

斯坦，你想立刻回答，还是——这是完全可以设想的……

因为我现在就告诉你们，2月我会开三次研讨班：两次公开研讨班，还有一次封闭研讨班；第四个星期三原则上我已经启程前往美国……完全可以让第四次研讨班继续这场已经良好开启的讨论。

这样，你就可以等到下次再回应今天的介入，时间很充裕；除非你现在就想说几句。

斯坦

我想，下次要我根据今天这些意见再作一篇实质性的导论，并不容易，因为那不会有任何结果。

拉康

不是。不过，下次可以让一些人向你报名——这样更简单——他们把今天听到的内容留待成熟以后，准备在第四个星期三来同你讨论。

斯坦——是，但我无法在……上再向前走很多。拉康——不是，不是这个意思。你要么说一句自己很想说的话……[注]

> [注] 原文校勘：Staferla 底本把下一位说话者“STEIN”的标签黏在本段末尾；按对话次序及 J.L. 速记本的版式，将它移至下一段开头。

斯坦——是！有一句话我想说。就是这样：在整场讨论中——这不足为奇——人们总会受到诱惑，想把奥杜阿尔所谈、格林又接过来的这个余项化约掉。

格林的论证非常重要、很有意义，我不想整体重述；不过只想提醒他一点：当他把“在不同代词之间建立等价关系”这项主张归给我时，他恰恰化约了我仿佛留下的余项。因为我并没有指认不同代词之间的等价，而恰恰指认不同代词在想象性层面中的混淆；这完全不同。

这把我——为了极简短地说——带回奥杜阿尔。在我看来，他出色地界定了某种涉及并存在于我今天告诉你们的内容中之物：不可镜像化者每时每刻都在镜像化努力、镜像化尝试中显现。这一点完全正确，甚至可以概括我今天说的一切。

但我不明白，奥杜阿尔为何据此断言我的语法化不令人满意，因为它化约了这个不可镜像化的余项；恰恰是——仍沿用奥杜阿尔的绝佳术语——它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表述。

在我的进路中，作为余项显现的东西，不正是这个想象性层面吗？

也就是说，确实没有任何被镜像化的话语不参照、不包含一个余项；或者依照我设定问题的术语，没有任何这种话语不同某个想象性层面相关。

拉康

你今天报告中最醒目的东西之一，也是关键点之一，就是你说这个“它在说话”——也就是我所谓主体与大他者的唯一拓扑曲面，而这确实已经被蕴含——这个拓扑曲面属于想象性秩序。全部关键都在这里；而我认为，你的表述错误也正在这里。

今天我们可以让事情悬停在这里。说个小掌故：我完全不反对这种语法化；只要知道怎样使用，它在我看来是一个支点、一件极好的工具。

不过，为了讲故事的乐趣，我还是想提醒你们：在阿姆斯特丹某次大会上，我想是在1950年……不，第一次阿姆斯特丹大会是在……？

格林——1948年……

拉康

1948年，我作了当时准备好的发言。那时还远未开始我的任何教学；发言围绕的不是任意一种语法化，而恰恰是人称代词的语法化。我当时一定把口译员累坏了，因为安娜·弗洛伊德女士认为自己应当大幅超出发言时间，我不得不在十分钟内说完原本为二十分钟准备的内容……

第9课 · 1966年2月2日

我关心的是，那些从我这里学到过某些东西的精神分析家，是否会恰当地传递我所说的话。

这正是那些专门讨论一场研讨班的场次所构成的考验；那场研讨班我不能让这么多人参加，因为如此众多的听众本身就会妨碍这种检验。

如果说，心理主体最初的志向，是向大他者的欲望呈上他自己的意象这一虚妄对象，那么，为了绝不……我们无论采取多么严格的防范都不过分。

……以任何形式，把所谓的精神分析治疗——相对于此前在伦理秩序中表达出来的一切而言，这是一种真正超越性的经验——看成别的什么。我们无论怎样谨慎都不过分，必须界定这样的道路：经由这些道路，主体与大他者欲望的关系这一公式——我刚刚首先给出的、而任何哲学学说都从未超越的公式——能够被真正地超越，能够以一种彻底的方式跨过去。

因此，由于我无法出席第四个星期三——届时将继续过去两个星期三围绕今天坐在本会场第一排的斯坦先生之表述而展开的讨论——我现在要问他：他所说的、归咎于患者的那种所谓受虐狂究竟是什么意思，因为患者服从了一条严格的规则。

为什么如此匆忙地把这界定为受虐狂？归根结底，在出发时我们对此也许什么都不必说，只能说：“他想要这个。”这就是我们所能说的一

切："他有所欲求！"这不是一个含混的公式，而是欲望的最低限度公式。

那么，一切欲望是否都会成为"成为欲望的欲望"，并且自身就是受虐狂式的？这个问题当然值得提出，却也同样不应过早裁决，尤其是如果我们还记得我在谈论"欲望及其解释"［1958—1959年研讨班］时给出的公式：就某种意义而言，鉴于精神分析经验的条件，欲望就是对欲望的解释。

把自己置于这样一种真正根本的处境中：任何索求都只能落空——这无疑正是患者必须面对、却无法事先预见的事情。况且，如我的另一位对话者十分准确地说过的，主动把自己交给失望，这又算什么受虐狂呢？[注1] 分析家事实上是被假定知道的主体，是被假定知道一切的主体——唯独不知道患者的真理。比起一种按照我在此指出其锋芒的条件而建立起来的处境，那个投身分析经验的患者难道不是在对我们说：

[注1] 安德烈·格林；参见上文1966年1月26日场次末尾。

> "如果你向我索求真理，那么承受这条法则的将是你：任何索求都只能落空。你不会享用我的真理，正因此我才假定你知道。因为正是这一点迫使你受骗。认识论驱力，就是把自己呈作享乐的真理；而真理也正因此知道如何防卫自己——因为谁能够享用真理呢？"

所以，这是一种"毋宁说是神话式的"驱力；请允许我把这几个音节粘成一个词，并请你们——精神分析家们——接受这里强加给你们的授职，以及这个写成一个词的形容词：plutomythique[注]。患者对我们所

做的，就是让我们从皮浪主义者的位置上跌落[注2]。你们会想知道更多：

> [注2] 参见马塞尔·孔什：《皮浪或表象》，巴黎大学出版社，1994年，“批判视角”丛书。

> [注] 双关：plutomythique 是拉康把 plutôt mythique（“毋宁说是神话式的”）按声音黏合而成的临时造词。中文无法同时保留原短语的意义与黏合后的语音效果，因此正文先译出原短语，再保留法语造词。

“我唤醒你最经过反思的欲望，也就是最不可辨认的欲望。

你加在我身上的谓词，正是你自己的坠落；只要你给出限定，你便限定了你自己，而我获胜。”

毫无疑问，正如斯坦所觉察到的，这里有患者罪疚感的锋尖及其诞生。

可是你呢？如果你接受自己作为法官的位置，那么你立刻就作为主体被抛回到“必须审判自己”的含混之中。

语言中的和声滑移——这个必须审判自己的主体——请在这里认出每一种语言都以自己的方式向我们提示的那些形式之一。当然，这同时也是一个警告：不要走得太远，不必走得太远，因为患者说：

“当然，你会把我造成为受虐狂，也就是说，爱上你的焦虑——那焦虑被你当成享乐。我已经为你成了大他者；倘若你不当心，你就只能把一切都演错。因为只要我认同于你，

你就会清楚看到：你所享用的不会是我。戏法中的豆子已经换了位置；当你抓住你的现实效力（Wirklichkeit）时，我在现实性

（Realität）中抹除得连痕迹都不留下的，恰恰是我在你身上选来为这一抹除盖章的东西。”

因此，那种认为有一个持续存在且可被把握的存在者、并以此奠定主体与主体之间关系的观念，恰恰是一片布满陷阱的湿滑地面；一种不充分的理论一开始踏上去，便不可挽回地陷入其中。正因此，对我们而言，最为可取的是阐明这样一种结构，使我们能够从根本上构想：那个把自己呈在被假定知道的主体位置上的人，如何可能取得进展，而他在最初却必须以皮浪主义的方式放弃一切通达真理的可能。

Οὐ μᾶλλον［ou mallon］，“这个并不比那个更是如此”——这个枢纽公式表达的，正是皮浪主义者或怀疑论者的位置。皮浪是一种哲学派别的领袖；我有时仍把这些派别称为“学园”，为的是提醒大家：在某种语境中，哲学实践曾经是另一回事——那个语境，正是古代世界某种在社会上获得界定的秩序行将终结之时。

想一想那些人给自己规定的纪律究竟是什么：

- 每当引入任何谓词时，
- 每当提出任何关于真理的问题时，……他们不仅要用“既不……也不……”排斥二择一的两个分项，而且始终要防止二分本身被引入——哪怕是看起来最无法回避的二分；也就是说，拒绝跨过确立二分的那道界线，并把二分的两个分项一并拒斥。

因此，一个主体在真理门槛前给自己下令止步这一根本立场，确实值得更长的说明，也值得我们回到那些无疑零散、不充分且问题重重的文本。不过，阅读塞克斯都·恩披里柯[注3]仍能让我们把握它的全部

幅度；单从某本手册里读到摘要，是触及不到这一幅度的，必须逐页翻阅文本，沿着它的转折追踪其中所投入的游戏之风格、分量与现实。

> [注3] 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皮浪主义纲要》，巴黎：瑟伊出版社，“论说文库”丛书，1997年，双语版。

我在这里提出这个参照，并把它留给最勤勉的人去追索，并非毫无缘由。我甚至可以提示他们，在维克多·布罗沙尔那部出色的《希腊怀疑论者》[注4]中找到补充、定位，以及一种现代精神真正沉思的成果。我把它放在今天宣布的主题门槛上，也并非偶然；这个主题无疑也是今天听众如此众多的原因之一，也就是：帕斯卡的赌注。

> [注4] 维克多·布罗沙尔：《希腊怀疑论者》，巴黎：弗兰出版社，1981年；亦见 Les sceptiques grecs，法国国家图书馆 Gallica 数字图书馆 PDF。

我希望在今天之前，你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从未听说过“帕斯卡的赌注”。

我毫不怀疑，“帕斯卡的赌注”作为一种文化对象，流传的广度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若有人惊叹哲学家竟为此写过一些文章——

毕竟，倘若我必须在这里给你们开出一份书目，我的天，很快也就能列尽了：在那些写作并认为应当把自己的思想告知我们的作者那里，列到五十来条参考文献，我就差不多见底了。而所有已经说过的话——我很遗憾不得不说出这样一个令人泄气的判断，尤其因为这牵涉所谓哲学这一行当的声誉——其实都没有走得很远。

不过，我仍要向你们推荐一篇文章。它采用了一种极佳的出发方式：不是从“文本”——我不愿这样说——而是从那几张小纸片的书写本身

出发，更确切地说，是从正反两面都写满的两张小纸片出发；那就是帕斯卡为我们留下的、可称为草稿的东西。从那里出发十分必要，因为不能把它当成某种为我们完成的作品；然而它仍然——也许正因如此——值得保留，因为它仿佛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替代物，或一种真实的质料，关乎那种独特的、无形体的现实。借助一种初等拓扑学的资源，我正试图向你们显示：我们能够在自己的论述层面从这种现实中取出什么。

就此而言，亨利·古耶先生的文章……

……发表于一本意大利杂志，我很愿意在此把出处留给你们。这本意大利杂志题为《哲学档案》，1962年第3期，是罗马哲学研究所（Istituto di studi filosofici）的机关刊物。亨利·古耶先生的文章《帕斯卡的赌注》，如果你们能找到这一卷，值得认真阅读。如你们所见，这是最近发表的文章之一。

过去当然还有许多别的文章：

- 从伏尔泰的惊异[注5]，

> [注5] 伏尔泰：《哲学通信》第25封，收入 F. Deloffre 编，巴黎：伽利玛出版社，“Folio Classiques”丛书，1986年。

- 孔多塞的澄清，
- 拉普拉斯的漫谈，
- 到维克多·库赞的震怒[注6]；我在这里不作展开，因为没有时间告诉你们所谓“折衷主义”［参见 09－02］的真正功能是什么，

> [注6] 维克多·库赞：论帕斯卡的思想，关于有必要为此书推出新版而向法兰西学院提交的报告，巴黎，1846年。

- 再到较近时期，那位好心的拉舍利耶所作的颇有价值的评论[注7]，这些当然值得一读。

> [注7] 朱尔·拉舍利耶：论归纳的基础，巴黎：阿尔康出版社，1898年。

- 至于杜加与里基耶发表于1900年《哲学评论》的文章，我就不能给出同样的评价了；稍后我会给你们看一个样本。

后来，人们在我们可以称作“大他者平面上的赌注”这一层次重新提出了问题。

我们应当下注吗?

按照帕斯卡的指示——假如事情确实在于此——我们应当把自己生命中确定的善，亦即在最普通层次上设想的善，押在一个不确定的许诺上吗？……

帕斯卡的整个论述似乎都在向我们表明：这个许诺同我们将要放弃的东西之间，是何等不可通约。……据说这是信仰之赌的“导论”；对我们来说，不如说是“邀请”。请从现在起就辨明，在这一推进中提出的东西其实离最普通的意识并不很远：那是一种对于彼岸的朦胧焦虑——而这彼岸未必是死亡之后。难道不是必须有这种焦虑，各种参照才得以维持自身吗？对要求更高的人来说，这些参照采取了他们献身其中的种种希望的形式；从宗教的视角看，我们至少会把它们称为类比性的东西……

在一个短小而充实的章节中，《隐匿的上帝》[注8]的作者戈德曼先生似乎丝毫不反对把帕斯卡的赌注当作马克思主义者押在无产阶级到来之上的信仰之前奏。

> [注8]　吕西安·戈德曼：《隐匿的上帝：帕斯卡的思想》，巴黎：伽利玛出版社，“Tel”丛书，1976年。

我绝不会把这一章的意义缩减到这种程度——至少可以说，这种理解未免有些过于护教。不过，该章讨论的价值无疑颇有启发，足以让我们把这部分工作置于拼凑之上。

然而在我看来，没有任何人从这个视角深入过赌注文本：要说服的并不是某个泛指的“人们”；这个赌注是帕斯卡本人的赌注，是一个“我”、一个向我们揭示其结构的主体之赌。这个结构完全可以而且必须接受检验，却不是通过某个在传记语境中证实它的偶发事件来检验。帕斯

卡一生的步履理应被呈现为极其复杂；其中一些举动一直延伸到他临近死亡的时候……

比如某个在我们看来可能过分的愿望：要人把他送到不治者医院，在那里度过余生。若立即把这钉死为受虐狂主题，那就太仓促了。

如果一个主体、一种思想，能够——你们马上就会看到——如此出色地区分那些本质立场，并以严格的方式表述它们，那么当它把自身结构交付给我们时，我们只须把这一结构同其他那些点联系起来：在那些点上，主体结构本身也被他从某种彻底的位置显露出来。我们有幸看到这一点得到肯定，而又没有任何东西表明这里包含某种讯息；毕竟，这些小纸片几乎是在帕斯卡死后才落入我们手中。死亡也许不是任何彼岸的界限，但当人们想搜别人衣袋时，它肯定是最容易利用的界限之一。

人们搜了帕斯卡的衣袋。既然事情已经做了，我们就善加利用吧。

如果其中有什么能够让我们阐明一个最独特的计划——一种我们前所未见的、最为例外的事业形式，而你们马上就会看到，它也可能显得最平常——那就让我们利用它。

“无限，无。”[注9]

> [注9] “帕斯卡的赌注”，收入《思想录》第397片段，《帕斯卡全集》，巴黎：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1954年，第1212页。

他就这样开始，无法解释。

“我们的灵魂被投入身体，在那里发现数、时间和维度。

它据此推理，并把这些称作自然、必然，而且无法相信还有别的东西。”

这是对想象界诸力量的重申。

> “一与无限相加，丝毫不能增加无限，正如一尺加在无限的尺度上也不能增加它。有限在无限面前归于消灭，
>
> 化为纯粹的无。我们的精神在上帝面前如此；我们的正义在神圣正义面前也是如此。我们的正义与上帝正义之间的不相称，
>
> 并不比一与无限之间的不相称更大。”

我忍不住要把下面这段也完整读出：

> “上帝的正义必须同他的仁慈一样浩大。然而，对被弃绝者的正义，比起对被拣选者的仁慈来，并没有那样浩大，也不应那样令人震惊。我们知道有一个无限，却不知道它的本性。因为我们知道数是有限这一说法是假的，所以数目上有一个无限是真的。但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说它是偶数是假的，说它是奇数也是假的，因为加上一以后，它的本性并不改变；然而它是一个数，而任何数不是偶数就是奇数（当然，这指的是任何有限数）。同样，我们完全可以知道有一个上帝，却不知道他是什么。
>
> 难道没有一种实体性的真理吗？因为我们看见如此多真实的事物，却没有一个就是真理本身。于是，我们认识有限的存在及其本性，因为我们和它一样有限且有广延。我们认识无限的存在，却不知道它的本性，因为它同我们一样有广延，却没有同我们一样的界限。但是我们既不认识上帝的存在，也不认识他的本性，

> 因为他既无广延，也无界限。可是，借助信仰我们认识他的存在；借助荣耀，我们将认识他的本性。
>
> 其实，我已经说明过：我们完全可以认识一件事物的存在，而不认识它的本性。”

这就是随后得到展开的导言。从这里起，我请你们回到文本；它真正的出发点是：帕斯卡……

这位思想家——如果你们愿意，也可称他为宗教思想家——完全接受被弃绝者与被拣选者都彻底听凭神恩这一思想，

……却仍以此作为开创性的步骤：上帝无论以何种方式、甚至就其存在而言，都不可能被认识。

严格说来，他甚至指出：凭借理性的力量，我们无法知道上帝是否存在。重要之处——我希望马上向你们表明，而且我不认为这对你们任何人会是多么惊人的东西——

你们已经听过足够多关于存在问题的谈论，尽管它们仍悬在含混之中。因此，当我顺带指出——今天无法停下来详谈——关键与其说是这种悬置本身的彻底性，不如说是它在存在与实存之间引入的分裂，你们不该感到惊讶。

“它实存”这一说法曾给亚里士多德思想造成如此多的困难，因为归根结底，被设定的存在本身就已自足：它实存，因为它是存在。然而，宗教启示——犹太教的启示——的闯入，却提出了如何安置这种实存

悬置的问题；我是说，从阿维森纳开始，在哲学家那里就出现了这个问题，因为宗教思想必须把实存的决定交还给上帝。

实存功能相对于存在无法以范畴方式安置；是否正是这一不可能，最终反过来把上帝本身也变成了问题，迫使我们停留在这样一个疑问上：把上帝称为至高存在是否已经足够？不要怀疑：对帕斯卡来说，问题已经裁决！另有一张小纸片，缝得比衣袋更深，缝在衬里下面……“不是哲学家的上帝，而是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上帝”[注10]……它向我们表明这一步已经跨出，而且事情并不关乎至高存在。

> [注10] 参见帕斯卡《纪念文》：“亚伯拉罕的上帝、以撒的上帝、雅各的上帝，而不是哲学家和学者的上帝。确定。确定。感受。喜悦。平安。
>
> 耶稣基督的上帝。Deum meum et Deum vestrum。‘你的上帝将成为我的上帝。’忘却世界与一切，唯上帝除外。唯有通过《福音》所教导的道路才能找到他。人类灵魂的伟大。‘公义的父啊，世人未曾认识你，我却认识你。’喜悦，喜悦，喜悦，喜悦之泪。我离开了他：Dereliquerunt me fontem aquae vivae。‘我的上帝，你会离弃我吗？’愿我永不与他分离。”

那么，就请清理、洗净这些预备性问题吧；它们必然会使一切把某个给定物视为凭自身便足以构成确定性的参照变得岌岌可危。杜加先生与里基耶先生在文章末尾问道——请读这篇文章，我无意凭接下来给出的样本来评断全文——

> “那么，该怎样看待这样一种经验呢？它这样提出自己：为了进入信徒的心灵状态，
>
> 你们将剥去自己的本性，抹去自己的本能、情感以及关于幸福的一切观念。
>
> 如果只从逻辑观点考察赌注，拒绝押‘十字’……”

在这一论证中，人们把这称为——我还没有读到足以让你们熟悉这一用语的地方——“押十字”。

它的意思是“偶数或奇数”、“十字或头像”，与基督教的十字架无关。

> “可是，如果我们正视赌注的真实条件，就必须反过来说，押‘十字’才是疯狂的，因为信仰并不像帕斯卡有时描述的那样。它并非简单地叠加在理性之上；它的作用也不是在不妨碍精神自然发展的情况下推后精神的界限，从而让精神进入一个天然向它关闭的世界。实际上，它要求理性退位、情感献祭。这种对人格的消灭，
>
> 难道不是我们作为人可能承受的最大危险吗？然而帕斯卡却以漠然的目光看待这种危险。‘你们有什么可失去的？’他说；他满脑子都是自己的神学观念——我们这就进入心理学了——他并未进入纯粹之人的精神；他的‘论说’只面向这样的人：他即便尚未接受原罪
>
> 与人的堕落，至少已经承认理性的软弱、尘世幸福的虚荣，以及这一整套悲观哲学；
>
> 帕斯卡本人是从基督教教条中得出这种哲学的。但是，任何只以理性为向导、相信人的天然尊严
>
> 以及幸福之可能性的精神，都必然会把赌注论证同时视为逻辑上的怪物与道德上的骇人暴行。这样严厉的判断，如有必要，可以在帕斯卡那段关于人与人之间差异、亦即精神独特性的著名评论中找到辩护或开脱。”

我略去几行，直接来到这种宽厚的赦免：“他的真诚显而易见，他的坦率绝对无疑；无论他的论题多么不道德、他的推理多么软弱，人们仍继续尊重他的品格，赞叹他的天才。”

这一下可算把话说绝了！“普普尔，给我拿拖鞋来，我已经把他收拾妥当了！”

不过，我希望大家把这一切考虑进来。归根结底，这里发出的调子从未真正缺席，至少在那些把帕斯卡赌注分析得最深入的人那里也是如此。为了免得随后忘记，我还要把苏里奥先生写在《上帝的阴影》[注11]一书中专论帕斯卡赌注的那一章，同我刚才列举的作品放在一起。你们在那里也会看到一些十分富有启发、而且对我们的视角有效的洞见，涉及应当怎样处理这份证词。

> [注11] 艾蒂安·苏里奥：《上帝的阴影》，巴黎：巴黎大学出版社，1955年，第47—87页。

一个赌注。关于这个赌注，人们说过许多话，特别是说它根本不是赌注。我们马上就会看到赌注是什么。一开始让人害怕的，是赌本以及帕斯卡谈论它的方式。［七星文库版，第1213页］

相关知识卡 帕斯卡的赌注

> “那么，让我们考察这一点并说：上帝存在，或者上帝不存在。但我们将倾向哪一边？理性对此无法作出任何决定。
>
> 有一个无限的混沌。一切把我们隔开。在这无限距离的尽头进行着一场游戏……”

请注意这句话！

“……在那里将出现十字或头像。”

“这一无限距离”究竟是什么意思，从未真正得到认真考虑。

“你们押什么？凭理性，你们既不能选择这一边，也不能选择另一边；凭理性，你们也不能为任何一边辩护。”

这是帕斯卡在说话。

> “所以，不要指责那些已经作出选择的人错了，因为你们对此一无所知。——不……那位对话者回答，而他也是帕斯卡本人……我要指责的不是他们作了这个选择，而是他们作了一个选择；因为押十字的人与另一个人虽然犯的是同样的错误，却都错了。正当的做法是不下注。——是的，可是你们必须下注。这不是出于自愿。你们已经上船。既然必须选择，那么你们要选哪一个？来看一看吧，哪一种选择对你们损害最小。
>
> 你们有两样东西会失去……”

相关知识卡 帕斯卡的赌注

似乎没有人注意到，这里说的纯粹而简单，就是要失去它们。

“……真与善；有两样东西要押上：你们的理性与意志；你们的认识与至福。”

当人们在一场游戏中押上某样东西时，在一场由双方进行的游戏中，就有两份赌本：

- “你们的理性与意志”是第一份，
- “你们的认识与至福”是第二份，而押出它的并不是同一个参与者。

随后还会讨论赌局中的得失，即：“那么，毫不犹豫地押他存在吧［……］既然得与失的机会相同，即使你们只能以一生赢得两生，也仍然可以下注。”［第1214页］

接下来，我们首先得到“一种生命的无限”这一许诺——这里的原文表述不容忽视——这当然改变了赌本的条件。放进游戏的已不是用两生换一生、两边各有一生，而是一边有一生，另一边则是帕斯卡起初所谓：

- “一种永恒的生命”，
- 随后又是“一种无限幸福之生命的无限”。

等我们研究这样的赌注意味着什么时，马上还要回到这里。

不过，我首先想追问一个一直未被保留下来的问题：“押上自己的生命”是什么意思？生命是怎样进入游戏的？我们看到帕斯卡在推理的几个阶段都提到了它：

- 第一，生命不可能不被押上。
- 第二，如果最后赌输了，应当怎样评判生命。

“我回答，”帕斯卡说，“即使失去了你们的生命”——他在这里明确说道——“但在失去它时，你们什么也没有失去。”

这个“无”多么奇特！首先，涉及的是一生，至少是一段时间内的一生；一般来说，这一选择并不是在临终床上作出的，尽管这并非不可想象。那是你们将会度过的一生。它在别处被说成包含不止一种快乐；帕斯卡无疑把这些快乐称为“污秽的”，但它们仍在那里，仍具有某种分量，因为它们会阻碍论证所面对的人感受到论证的说服力。

因此，这一生命具有双重含混：

- 一方面，它是主体拒绝投入赌注时的抵抗核心；
- 另一方面，相对于赌局中的得失，它又是一个无。……我们必须保留的恰恰是这一点，以便追问这个无究竟因何而不同。

尽管如此，这个无仍有一个性质：它就是赌本。我们马上会看到赌注意味着什么；正是这一评论，使我们能够为这个作为赌本的所谓无在结构中确定真正的位置。

当帕斯卡的对话者跨过帕斯卡之“论说”的终点——我把“论说”加上引号，正如杜加先生和里基耶先生那样——同意服从赌注的规则时，却又说：“我无法相信，我下注所产生的效果会同我的信仰合而为一。”

帕斯卡回答：“使自己愚钝起来。”[注12] 这句话曾让维克多·库赞先生感到震骇；他是第一个凭借自己能够直接接触帕斯卡原稿纸片的条

件，把这句话连同一篇引发丑闻的文章一起摘引出来的人。然而，这句“使自己愚钝起来”已经足够清楚。

> [注12] 第1215—1216页：“请遵循他们最初开始的方式：做一切仿佛自己已经相信的事，取圣水，请人举行弥撒，等等。自然而然地，这甚至会使你们相信，并使你们愚钝起来。”

这句“使自己愚钝起来”准确指向我们可以称作放弃自恋的陷阱、包裹与衣饰；也就是说，剥去那个恰恰是动物所没有的意象——自我意象。

在某种苦修、某种剥离所提出的目标处，掉落的、坠落的，恰恰是在大他者场域中被肯定为“我是”的层次上，把主体在存在中的处境同主体自我误认的部分联结起来的东西。

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应当把余下的这个无等同于虚无？可若真是如此，它又怎能充当赌本？

这个无——我在此引入问题——难道不能被我们认同为：

- 那个永远逃逸、永远被抽走的对象，
- 那个归根结底——无论希望还是绝望——构成我们欲望之本质的东西，
- 那个不可命名、不可把握、不可言说的对象；然而，帕斯卡的赌注却能让我们肯定它，正如柏拉图在《斐多篇》[注13]中谈论存在时所用的公式：有一种不可战胜的论说与之相应？

> [注13] 拉康口误：应为《蒂迈欧篇》！柏拉图《蒂迈欧篇》29b：“既然如此，这个世界就绝对必然是某物的意象。在一切事情上，最重要的是从自然的开端开

> 始。因此，关于意象及其范型，必须作如下区分：言说同它所表达的事物天然相亲。若它们表达的是稳定、固定、可由智性看见的事物，那么它们也应稳定而固定；只要言说可能做到并应当做到无可反驳、不可战胜，它们在这方面就不应有所欠缺。”希腊原文：τούτων δὲ ὑπαρχόντων αὖ πᾶσα ἀνάγκη τόνδε τὸν κόσμον εἰκόνα τινὸς εἶναι. Μέγιστον δὴ παντὸς ἄρξασθαι κατὰ φύσιν ἀρχήν. Ὧδε οὖν περὶ τε εἰκόνος καὶ περὶ τοῦ παραδείγματος αὐτῆς διοριστέον, ὡς ἄρα τοὺς λόγους, ὧνπὲρ εἰσιν ἐξηγηταί, τούτων αὐτῶν καὶ συγγενεῖς ὄντας· τοῦ μὲν οὖν μονίμου καὶ βεβαίου καὶ μετὰ νοῦ καταφανοῦς μονίμους καὶ ἀμεταπτώτους – καθ’ ὅσον οἷόν τε καὶ ἀνελέγκτοις προσήκει λόγοις εἶναι καὶ ἀνικήτοις, τούτου δεῖ μηδὲν ἐλλείπειν。（参见 Philippe Remacle 网站）

作为欲望之原因并决定欲望价值的对象(a)，这就是帕斯卡赌局中赌本所涉及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帕斯卡的赌注

什么能让我们确认这一点？当然，我刚才已经说过：它作为赌本被押进了赌注。

为此，必须理清围绕“赌注是什么”的种种晦暗。赌注是一种许多人都会从事的行动。我说“它是一种行动”：事实上，没有任何赌注不包含某种作出决定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帕斯卡的赌注

这一决定被交付给一种原因，我称之为观念原因，它的名字叫偶然。这里必须十分谨慎，避免这样一种含混：把帕斯卡的赌注放进当时尚未诞生的现代概率理论中。概率，是我们的科学沿着探索实在界的某条脉络发展到最终时所遭遇的东西。

为了显示我刚才仅仅勾勒其轮廓的那种含混——即存在关系上的含混——始终在场，我只能提醒你们，正如帕斯卡会说的，“精神之间的差

异”是怎样显现出来的。这并不是心理学评论，而是对主体结构的参照。

例如，爱因斯坦在写给马克斯·玻恩的一封信中[注14]，明确表示他厌恶那种终极现实只会是一个掷骰子的赌徒；一个人把当时最高的科学权威投入其中，公开而根本地依恋于对某种存在者的假定——这个存在者无疑狡猾，却并不欺骗，也就是说，神圣存在的某种形式仍然完好地存留在科学思想中心。就在我们即将进入的领域门槛上，这一点值得重申。我们即将进入的东西，严格说来是……

> [注14]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在1926年12月4日致马克斯·玻恩的信中写道：“量子力学令人敬畏。但我内心的一个声音告诉我，它还不是终极之物。这个理论给我们带来许多东西，却几乎没有让我们更接近那位老者的秘密。无论如何，我确信，至少他不掷骰子。”见阿尔伯特·爱因斯坦、马克斯·玻恩：《通信集1916—1955》，巴黎：瑟伊出版社，1972年，第107页。

……只有在帕斯卡抵达这个门槛、迈出这一步、完成这一彻底跨越时，它才能得到界定；也就是说，它是某种被界定之偶然［αὐτόματον，automaton］的严格对立项。

因为，偶然是什么？我说过，偶然在本质上同作为不可能者的实在界相连。今天我要补上：对什么而言不可能？不可能被询问；它之所以不可能被询问，是因为它以偶然作答。

这种实在界形式是什么意思？哪怕只在片刻之间，只为定位我们论述的意义，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墙”[注15]、界限；在科学探索的最后，

我们试图最终抵达的那个点，在那里，我们再也无法从中抽取别的，只能得到一个偶然的回答。

> [注15] 参见《迷失的说》（1972）中的“不可能之墙”，以及四种形式：不一致、不完备、不可证明、不可判定。

科学尚未完成；然而，一种极不恰当地被称为非决定论的思想正在逐步上升……

……因为我们所询问的实在界层次迫使我们如此。它至少能让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透视，让科学知识铭写于其中。如果科学知识恰如我所说——也就是放弃认识，并同时放弃存在——那么，事情是否就在于：我们以科学仪器的形式建造某种东西；在那种试图于实在界中抵达偶然之点的指向过程中，这种东西作为能够抵达该点的仪器而被规定给我们?

骰子是什么，不正是一件为了使纯粹偶然涌现而制成的仪器吗？在对实在界的探索中，我们所有的仪器都可以只被看作一种脚手架；借助它，随着不断深入，我们最终抵达绝对偶然的终点。

我并不是说我在这个问题上已经作出裁决。毫无疑问，只有更精确地进入我们同物理学的角力迫使我们赋予概率原则的那些阐发，这些话才能得到充分论述。但我们在这里处于远为初等的层次。

在赋予这一领域以科学严肃性的概率理论诞生之前，我们难道不该追问：任何概率思辨都必须置于卷首的、关于偶然的最初思辨，究竟意味着什么?

随便打开一本书……

……有好书，也有坏书；我顺便给你们举出一本好书：埃米尔·博雷尔先生的《偶然》[注16]。单是因为它一路收拢了一系列反驳、一系列荒谬问题——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比 stultitiae quaestiones[注17]更有趣——你们就会看到：那些开始赋予偶然问题以形体、以形式的人，究竟怎样思考。我刚才说"赋予形体"，并提到我们科学的建造，这时，我记笔记时从笔下迸出的一句话又在耳边响起：我们的科学会在它的仪器中，在对这堵"偶然之墙"的标定上，赋予真理以形体。

> [注16] 埃米尔·博雷尔著作，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版，1998年。
>
> [注17] Stultitiae quaestiones：荒谬的、愚蠢的问题。

可是，在最容易接近、最初等的层次上逗弄这种偶然游戏时，纠缠每个人的是什么？

- 打字的猴子要经过多久，才会在打字机上写出荷马的一行诗？
- 一个不认识字母表的孩子，一上来就把字母排成正确次序的机会有多大？
- 一首诗从一连串掷骰子中出现的机会有多大？

这些问题是荒谬的。所有这些可能性都没有任何理由不能第一次就实现。

只不过，当我们引入偶然功能时竟会想到这些问题，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了我们对这一原因的指向意味着什么。

它一方面指向那个什么也不能期待的实在界……

……正如一位诗人在1929年一本已无法找到的小杂志上所写："……盲目而聋聩的恶，缺乏意义的神……"[注18]……可另一方面，它又期待这个实在界像一个主体那样显现。

> [注18] 雅克·拉康：《Hiatus irrationalis》（1929年8月6日），《讷伊灯塔》，1933年第314期；1977年重刊于《文学杂志》第121期。

可是，我们究竟走到了哪里？

即使两边的赌本相等……

……评估一场偶然游戏中的得失，总是从这里开始……即使所谓机会，或者那个极不恰当的术语"数学期望"，都等于二分之一，从这里起，这场游戏也开始值得一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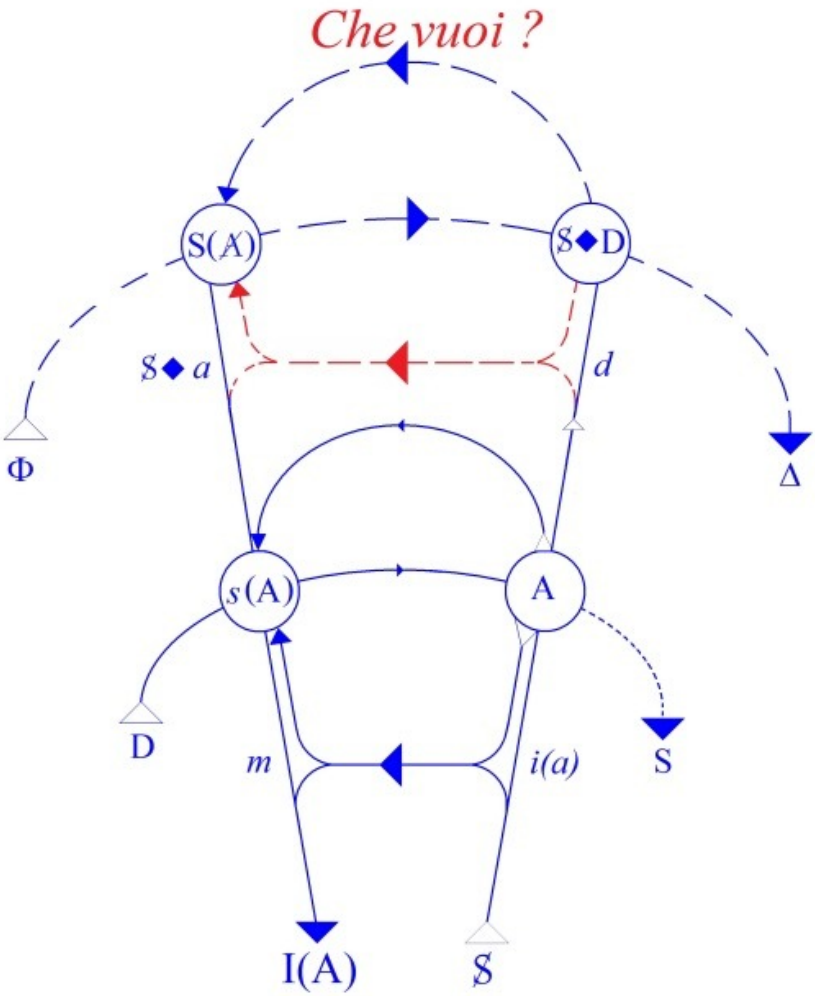
然而十分清楚：如果机会只有二分之一，那么在赌本相等的一局中，你们不过是取回自己的赌本；这毫无意义。因此，风险中必定还有别的东西被押上。

被押上的东西，位于赌徒激情的主体性地平线上：在行动终点——因为必须有行动，必须有决定的行动——在那种首先必须由某个能指框架界定其条件的东西终点……

……我此前还没有触及它，因为我们随后正要进入那里……一个纯粹的回答给出了那个始终作为无被押上的东西的等价物……

……因为赌本之所以摆在那里，就是为了被失去；总而言之，它体现了我所说的主体在每一次投入能指时都会失去的对象……而在彼岸，另一条链［Φ → Δ］——被假定为能指性的、属于另一种主体秩序的

链——交付出的东西并不包含失去的对象，因此，在成功的序列中，它把这个对象还给我们。



这就是赌徒激情的纯粹原则：赌徒参照的是某个特定的彼岸——由游戏框架界定的彼岸——在那里，主体与能指有另一种关系方式，而这种方式不包含对象(a)的丧失。

正因此，只要他是赌徒，他便能够这样做……可如果你们不是赌徒，又何必贬低他？文学中最重要的一些见证无疑告诉你们，这里有一种实存方式；倘若你们不是赌徒，也许只因为没有察觉自己其实在多大程度上也是赌徒。我希望很快向你们表明这一点，正如帕斯卡告诉你们：无论愿不愿意，你们都已被卷入赌局。

在这里，我们必须暂且停留，看看帕斯卡在提出赌注之前，究竟怎样尝试给我刚才提出的那个参照——某个对象在偶然序列中重新出现——以某种实体。如果你们觉得这个参照大胆，就更应如此。

我会向你们解释——今天大概来不及，鉴于时间限制，只能留到下次——为什么帕斯卡在赌注中唤起的不是随便哪一种游戏，而恰恰是这种游戏；并且，赶快说吧，时间不早了，为什么对一个詹森主义者而言，这种游戏要进行多轮。

然而，就在他开始写《思想录》的时期——没有人知道当时他是否已经写下关于赌注的那些小纸片——帕斯卡曾经研究过一件让他十分自豪的事情。必须提起它，因为在他亲笔写下、概括赌注三个时刻的三项结构中……

……今天我只走过了其中两个，把第三个留待下次：皮浪主义者；无法通达“几何学家的真理”；“偶然的几何学”。帕斯卡正是用这些词向巴黎数学学会致辞，并在那里呈交他的算术三角形所取得的一些成果。他亲自把几何学对偶然的这种捕获、这种套索称作“令人震惊的”。

他同费马长时间通信。费马无疑才智卓越，但他在图卢兹司法界的职位——可以这样说——大概使他分心，没能保持数学思辨所要求的严格坚定。因为他们在后来所谓的“各局价值”上并不一致：费马恰恰过早地想以概率的名义处理它们，也就是依据各轮结果的序列；这些结果按照组合关系排列，正如帕斯卡所说，是“十字或头像”。

帕斯卡采用的是完全不同的方法；这就是帕斯卡所谓“分配规则”。我马上试着把它放到你们手边。不过我仍建议你们非常认真地阅读……

……布特鲁、加齐耶、布伦施维克版[注19]第三卷第三编……不仅阅读“分配规则”，也阅读算术三角形。

> [注19] 帕斯卡：《著作集》，L. 布伦施维克、P. 布特鲁、F. 加齐耶编，11卷，巴黎：阿歇特出版社，“法国大作家”丛书，1908—1914年。

因为到那时你们就会看到，这一切并不会立刻显明；尽管……尽管如我将要告诉你们的，帕斯卡是第一次把它呈给费马，或者卡尔卡维先生，我记不清了。

一场比赛分两轮进行。这意味着赌本已经放在那里。我们暂且假定双方赌本相等。

进行第一轮：我赢了。我的对手希望就此停止比赛。我强调这个在帕斯卡那里被缩略了的切分。他立刻说“共同同意”。然而，我们会再看到，这个“共同同意”值得追问。

我同意。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因为还没有人最终获胜。假设这里的偶然是：小硬币要连续两次出现“十字”，而我押的正是十字。

我还没有获胜；然而帕斯卡说——并通过一段展开使我们即将讨论的论述获得全部分量，因为由此产生了一套发展极为广泛的数学理论；我刚才请你们在下周再次听我讲之前去参阅的，正是这一广度——帕斯卡说："为了表示同意，胜者应当这样推理。他应当说：我已经赢了一轮。"

与整场赌局相比，这算不了什么，因为赌局要求我赢两轮；然而它仍有某种价值，因为如果我们现在进行第二轮：

- 要么我赢得全部赌本，
- 要么你获胜，我们便回到出发时的同一点；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共同同意"分开——我再次强调这个说法——每个人都取回自己的赌本。

所以，为了让我这个眼下的胜者同意中断游戏……

有人离开，也有人让它重新开始，Parturi cognoscant partitura jusque：

要么我取回自己的赌本，要么我赢得全部赌本。……因此，我要求拿走你一半的赌本，这是正当的。

帕斯卡由此出发，赋予偶然游戏的意义。如果中断游戏的是作为胜者的我，那么我的对手完全有权说："对不起，你并没有赢得整场比赛，因此，你无权要求我的赌本！"——这一点却没有得到突出。

帕斯卡把游戏行动本身的价值从整场比赛的序列中分离出来，并赋予它实体、使它得到体现；正是在这里可以看出，帕斯卡在游戏中看到的，恰恰是那些什么也不是却仍可依据赌本价值加以估价的对象之

一。因为正如他十分清楚地阐述的，在“分配规则”中完全依照正当与正义而界定的这个对象，就是他所谓对另一个人金钱所拥有的权益。

已经两点了。我进入的这些事情，你们会看到，直到最后，在我今天所说的一切地方，赌注都还没有出现；因为在帕斯卡的赌注中，所赌的是大他者的实存。

这个赌注把由一道横线分开的两行都当作确定的：

上帝存在

上帝不存在

这并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帕斯卡的赌注之所以悬而未决，是因为如果上帝不存在，赌注也就不存在，既没有大他者，也没有赌本。远非如此：帕斯卡赌注所推进的结构，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它不仅是根本的，而且我要说，是本质的、结构性的，并遍在于主体的一切结构之中——欲望对象、对象(a)据以提出其要求的场域：

- 是大他者的场域，因为大他者相对于存在本身是分裂的；
- 也就是我在图式中以 S(Ⱥ) 所写的东西：被划杠的大他者之能指。

第10课 · 1966年2月9日

我有时会在一课开头，谈几件发生在别处、但与我的教导范围有关的事情。今天一开始，我要提起一件事；它的全部切题之处，当然只有那些参加了昨晚我们弗洛伊德学派场次的人才能看见。不过，对于其他所有人，它仍将构成一次“对焦”——取这个词的摄影意义——的导言，而今天的论述正要完成这次对焦。我希望借此结束我关于帕斯卡赌注所要说的话，也就是它对精神分析中所投入的关系究竟规定了什么本质条件。

因此，我要从一段既是序言又是插曲的话开始：必然只能极其简略地评论那个被称为、也正在以“女性受虐狂”之名受到讨论的幻想。请听清我的话！

我要提出：归根结底，女性受虐狂勾勒的是这样一种享乐的侧影——它留给那个将会进入大他者世界的人；而这个大他者被当作女性的大他者，也就是真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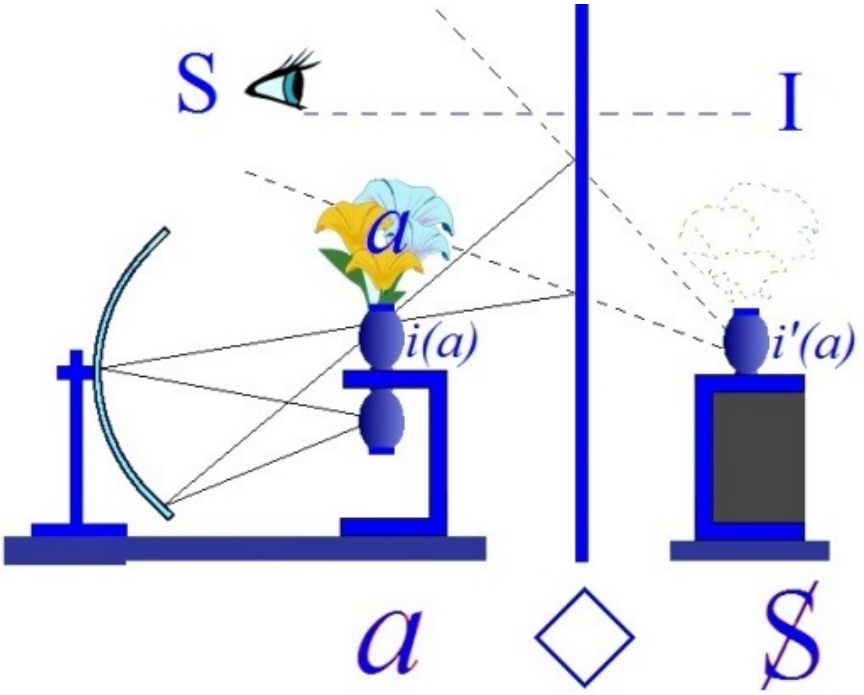
然而，女人……

如果我们能够谈论“女人”的话——昨晚人们试图把女人悬置在某种典型本质中，仿佛那就是女性气质的本质；这项工作十分脆弱——女人……

……就弗洛伊德所展开并明确说出的而言，她在这场被启动的、涉及其欲望的游戏中，有一个不同于男人的出发点……女人并不比男人更

处在这个世界里。当然，她有时以对象(a)的形式向男人呈现这个世界，但必须说：

- 她竭力拒绝成为对象(a)，因为她的目标同每一个人一样，是成为i(a)；
- 女人同每一个人一样是自恋的；
- 而恰恰在她想成为的东西与人们放进她里面的东西之间，在由此建立的距离、撕裂之中，那个在爱之关系中以欺骗面貌呈现的维度才建立起来。



还要补充：这种自恋正是所谓宫廷之爱的绝路，是它巨大的绝路。把她放在 I 的位置，即大他者场域中的自我理想位置——爱之地位可以围绕这个参照点组织起来——只能抬高这种自恋，也就是加剧差异。试图把女性气质界定为一种可以孤立出来的功能，其绝路就在这几句话中得到标定。

所以，这里唯一能标定的是：在这种关系中——与物的关系中——有一个女性极，而“女性”正是真理这个词项。“女性”在其呈现的一切形式下，都从根本上具有欺骗性。我们将以此为出发点，标定这个研究场域可以对焦的三种距离；哲学家的雄心始终把这种研究称作对真理的探寻。

分析家在这条路上占据向导位置时承担的危险，是否正如阿克泰翁神话所标示的那样：不可能突袭那种勾勒我们命运的运动？这种命运由三位命运女神——克洛托、拉刻西斯、阿特罗波斯——支配，她们是那位根本的、古老的、祖传之神的三位一体形式。另一种启示把我们同这位神隔开；稍后我们还须通过帕斯卡的赌注重拾其标志。帕斯卡的赌注把父亲的功能对焦出来，而正是这项功能使我们在终极享乐面前受到某种确定禁令的约束。

弗洛伊德思想的开创性陈述已经向我们标明了它的悬置何其重要：他的全部思想都悬置在父亲的这一禁令周围，而稍后我们会看到它的公式以另一种形式出现。

前几年，我教你们停留在笛卡尔的 cogito 上，为的是向你们呈现主体借以构成的那种裂隙（schize）、分裂（Entzweiung）、彻底分裂怎样勾勒出来；并让你们在“我思”公式本身中认出：“我思”之存在发生断裂

的那个点，只从一个怀疑之点得到肯定。正是为了以更可靠的方式接近同一主体功能更纯粹的表述——这一次彻底依欲望而定——我才打开《思想录》，转向帕斯卡的赌注。

因为，在笛卡尔的 cogito 中，已经有某种东西足以奠定主体的存在：能指规定主体只能在这一点把握自身——围绕“我思”的肯定，主体把自己缩减到一个怀疑之点；这个点不再有任何意义，除非它“引出引号”，引出那个赋予它全部实体的结论，即作为思想内容的“所以我在”。不过，这并没有把这个“我思”所具有的“我因存在而在”向后推置：“我是那个思想‘所以我在’的人。”

如果我们沿着弗洛伊德的道路重新发现：这个怀疑构成了那个以此方式分裂“我思”之存在本身的核心对象之全部实体，那是因为弗洛伊德在他的实践中让我们在这一怀疑里认出主体裂隙的涌现点；这道裂隙分裂主体，它的名字就是无意识。

在“我思故我在”中未被觉察的缝合点、闭合点，正是我们必须重建全部被省略部分的地方；这部分从那道裂口敞开，而我们重新打开它。在任何属于人类论说的论说形式下，它都只能以失足、干扰、绊住的形式，出现在那个自以为连贯的论说中。

可是，奠定这一论说的东西并没有因此被把握。人们告诉我们这是欲望的论说；但究竟是什么让我们能够说：我们用来补上它的，是表象的代位项？你们听清楚了：

- 这里所指出的，是那个使主体在论说中实现的一切都维持为分裂状态的东西发挥作用的位置；
- 而我们正应当在这个位置寻找对象(a)的功能。

笛卡尔的怀疑在这一过渡中仍是一项天平操作："dubio dubito"，我怀疑我在怀疑；这成了习惯，我努力让天平的两个托盘摆动。这里是让知识接受真理的检验，检验真知识究竟成立还是不成立。

当然，海德格尔[注1]很容易表明：ἀλήθεια［alētheia，无蔽］的根基已被遗弃——不可挽回地受到压抑——也就是原压抑（Urverdrängung）。即使他没有这样命名，我们也可以如此辨认它。然而，这一提醒是脆弱的，因为它只代表返回一种没有出路的运动；按照希腊思想起源处使用的词，这里涉及的是 ἐτεός［eteos］、Echt，即本真的东西。

> [注1] 马丁・海德格尔：《论真理的本质》，收入《路标 I 》，第181页。

笛卡尔在围绕这项检验操作——一种负面的、不可能的操作，即辨认天平在真知识周围究竟向哪边倾斜——揭示主体分裂的同时，也在不自知的情况下确立了它。他从中只取得这样一种确定性：检验已经进行，而确定性就嵌入主体的这个怀疑中。为了重新开始并再迈出一步，他必须重新搬出古老论证：在我们思想的秩序中印下完善观念的东西，理应为我们的探寻道路提供担保。

当然，我们已经可以在这里指出并画出它同本体论论证之间的距离，尽管你们仍会认出后者的形式。本体论论证在探索存在场域时自有其价值；但对我们来说，只有以一种必然显现的形式，才值得重新把握它：任何经过足够反思的人都会看到，完善观念只按照竞赛、按照赛场牲畜的模型勾勒和形成；它的实体无非是猪所能梦想的——关于阉猪者之肥胖的梦想。

我不喜欢徒然的亵渎。应当明白，我在此针对的，绝不是某些人在追问神圣存在时所采取的指向，也不是这一追问的某种偏离；我针对的是某种哲学细节顽固地深陷其中的位置。

因此必须指出：面对被假定会欺骗的上帝，笛卡尔的步骤使主体脱身于游戏；随后，他转向另一位上帝，把奠定永恒真理的全部责任交给这位上帝的任意决定。问题——对我们十分重要——在于：既然主体已经脱身，而怀疑的确是主体所为，连欺骗之神也无法剥夺主体的这一特权，那么，笛卡尔转向的那位即便完善的上帝，是否就成了一位受骗的上帝？我之所以这样说，凭借的是笛卡尔在我之前已经思想过的东西。

这个敏感点对我们、对我们的研究都很重要。完善理想恰恰会受骗，是在理想形式的陷阱中受骗：这个形式仿佛已经预先形成、预先放置在我们必须引导主体探寻的道路上。

Τούτων δὲ ὑπαρχόντων αὖ πᾶσα ἀνάγκη τόνδε τὸν κόσμον εἰκόνα τινὸς εἶναι. Μέγιστον δὴ παντὸς ἄρξασθαι κατὰ φύσιν ἀρχήν. Ὧδε οὖν περί τε εἰκόνος καὶ περὶ τοῦ παραδείγματος αὐτῆς διοριστέον, ὡς ἄρα τοὺς λόγους, ὥνπερ εἰσὶν ἐξηγηταί, τούτων αὐτῶν καὶ συγγενεῖς ὄντας· τοῦ μὲν οὖν μονίμου καὶ βεβαίου

καὶ μετὰ νοῦ καταφανοῦς μονίμους καὶ ἀμεταπτώτους – καθ' ὅσον οἷόν τε καὶ ἀνελέγκτοις προσήκει λόγοις εἶναι καὶ ἀνικήτοις, τούτου δεῖ μηδὲν ἐλλείπειν.

[“既然如此，这个世界也就绝对必然是某物的意象。在一切事情上，最重要的是从自然的开端开始。因此，关于意象及其范型，必须作如下区分：言说同它所表达的事物天然相亲。若它们表达的是稳定、固定、可由智性看见的事物，那么它们也应稳定而固定；只要言说可能做到并应当做到无可反驳、不可战胜，它们在这方面就不应有所欠缺。”柏拉图，《蒂迈欧篇》，29b]

柏拉图明确说，当涉及医生的行动时，所要处理的正是医生在自己灵魂中拥有的那个意象。

这难道不正是在指出：当问题涉及与真理的关系秩序时，我们必须怎样构想赌本的性质，而这一点具有何等确切的重要性吗？唯一可及的真理由我们投入经验时的那些条件界定；而这些条件只限于主体如何形成，以及主体如何依赖能指本身。帕斯卡赌注的结构正是把这一点提纯出来。

柏拉图的这些对话绝不会向我们交付某种单向学说；不过，在许多预示性地点中的某处，我们仍会找到足以为自己导航的参照，尤其是这一条。它涉及一切所是、一切“理念”同我刚才谈到的 ἐτεός [eteos，本真者] 之间的关系——仿佛后者会给出存在中一切持续之物的本质；

实际上远非如此。我们在每一刻都会找到参照，而其中这一条告诉我们，在以下两者之间：

- 永恒而不实存的存在，
- 与那种生而又死、却并非存在的东西，……标志与试金石必须由这一点给出：如果前者持续存在，它就必须由一种不可战胜的论说来支撑。

这仍然正是我们所寻找的东西，只有一点不同：这一论说必须使我们在自己的场域中——在出生与死亡之间受到圈定的实存中——辨认出其中什么能够成立，并且属于“不可战胜”的秩序。[注2]

> [注2] 参见1966年2月2日场次末尾关于《蒂迈欧篇》的注释。

帕斯卡的论说正把我们引到这里。它从生命与死亡的彼岸这一参照出发，毫不令人意外；可是事情并不是——我不说“像它看起来的那样”，而说确确实实“像所有人都已看出并为之震怒的那样”。

精神主义意识形态的这些先生全都挺直身子、撅起小嘴：“怎么能用那些赌徒的语言谈论如此崇高尊严之物？赌徒可是我们社会的渣滓。”

在维克多·库赞的时代，只有资产阶级有权从事投机。至于社会上那些受命思考正在发生什么的人，那些本可以提醒人民所谓“进步的步伐”究竟实际关乎什么的人，则被要求回到这种体面秩序之中。我刚才用一种令人震骇的形式，为这种体面竖起了硕大的招牌：阉猪。换言之，他们必须留在一种被称为折衷主义的思想之体面界限内。

你们难道没有注意到，在这个涉及彼岸的赌注中，帕斯卡从未向我们谈论永生——从来没人看见这一点。他谈的是“无限幸福之生命的无限”。这些仍然是生命！归根结底，这样称呼它们，就是为它们保留生命的地平线。证据是，他一开始就说：“难道仅仅为了再有一生，你们也不会下注吗？”

我刚才——我是说上一次——称作“那位好心的拉舍利耶”的人，倒真是很可爱，他在这里停住了。

他说：再怎么说吧！谁会只为了得到第二次生命而下注？

请把这段找出来；我刚才发疯似的找过，你们很容易找到。[注3]

> [注3] 帕斯卡：《思想录》，Havet 编，巴黎，1851年，第148页。

我并不责怪他缺乏想象力；但他沿着自己那条小路，一路剥开赌注中各种机会的外皮，难道不正是邀请我们真正提出问题吗？

事实上会发生什么？对于出生与死亡之间的这一生——我们自己的这一生——为了有几分机会也许再得到一次生命，难道不值得下一次注吗？

让我们……让我们暂时停在这场游戏周围。我们也许比别人多一点装备，足以把握这种想法会带来何种不可化约的差异与跨越。因为这两次生命都必须各自处在出生与死亡之间，同时又必须属于同一个主体。凡是在第一次生命中已经玩过的一切，我们知道在第二次生命中都可以换一种方式再玩；但我们依然不会因此知道赌本是什么。那个把我们分裂在知识与真理之间的未知对象——我们怎能不希望第二次生命让我们看清第一次，使能指不再是无限地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一个

主体，而是为另一个主体——也就是我们将成为的那个主体——代表这个主体？

我们怎能不希望另一个主体拥有这样的特权：它成为第一个主体的真理？换言之，在这一想象——幻想的幻想——中，难道没有某种东西照亮了那个以“幻想”为名、秘密运作于这一生的东西吗？而我们确实只有这一生，直到终点，赌本都可能向我们隐蔽。

这一假定隐含在命运女神之中……

……只要我们在那种悬置全部命运的不假思索的烛光下阅读它……这一假定说，死亡之后我们会得知最终答案；也就是说，真理将昭然若揭，届时便可知道究竟有没有那位许诺之神在那里支撑真理。谁看不出，正是隐含于整个事情的这一假定真正把事情悬置起来？如果死后还有某种东西持续，我们为什么不会继续徘徊在同样的困惑中？

帕斯卡的游戏把“生命的无限”乘以“幸福的无限”；这种幸福必定同我们生命中逃逸的东西有关。这一游戏只能另有一种意义，与我们盲目努力所得到的报偿毫无关系。正因此，一个人的信仰完全悬系于某种我们甚至已经不会谈论的东西——神恩——当他展开关于赌本的思想时，所处的位置是连贯的。这个赌本就是幸福；也就是说，凡使我们的欲望走向消逝与失败的东西，都在那里受到牵涉。这个幸福的赌本，其性质必须在赌注的底层去寻找。

这个对象(a)，我们只要想象第二次生命，就已经看见它以十分切近的方式在那个可想象的彼岸涌现。宗教思想并非不曾探测过它。这叫作“圣徒相通”。

凡生活在一个与这种幸福根基有所关联的信仰共同体内部的人，都必然同这样一件事休戚相关：在某处，这种幸福将由另一些我们不认识的人赢得。

这一观念是连贯的，因为我们这些“普通人”的每一生，都不过是悬系在某个无名者之功德上的梦。传统上表达这一点的主题，滋养了一整套戏剧；其尊严所达到的深度，远超你们最初能够探测的范围——只要想到莎士比亚的戏剧本身也属于其中便会明白。这个主题就是：“人生如梦。”相对于这一透视，帕斯卡的赌注意味着醒来。

同大他者关系本身的紧密性，牵涉这套预定与神恩的学说。早在《罗马报告》中我就指出，精神分析家与其从事千百种无谓活动，不如把目光转向这套学说。能够让我们……的撞击点已经在这里画出。

……正如我在一篇题为《评论》[注4]的文章结尾所做的那样，请你们回去参阅那里谈到的某段论说……标出这样一个点：就赌注的功能而言，我当时就已经希望把你们引向那里。

> [注4] 《文集》第647页，或第二卷第124页。

因为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赌注意味着什么；它的独特之处在于：赌本是参与者的实存。

相关知识卡 帕斯卡的赌注

帕斯卡能够把某种并非全体、而是敞开的无限放上天平；我们只须懂得在某一点辨认它。去年我们学会了在这个点上实质性地标示欠缺的功能，也就是这样一种数：无定限只不过是其中隐匿着的真正无限之面具，而这个真正无限恰恰由欠缺的维度打开。帕斯卡把它同主体场

域中被标示为欲望之因的对象放在天平两端；这个对象因表面上什么也不是而显明。天平的摆动通过这一对置被带到彼岸，带到大他者场域的层次；对我们来说，一切能指的形式化都在这一场域中勾勒出来。帕斯卡对我们说："你们无法逃脱；你们已经上船。"

这正是能指所支撑的：凡我们作为主体把握到的东西，都已经在赌局中。至于赌注将归谁所有，则属于这样的人：如同帕斯卡曾经做到的，他能够辨认赌注最纯粹、最邻近欠缺功能的形式。正是围绕着击中大他者的这种摆动，把大他者置于我已经提出、也愿意在此重申——因为这里有些人还记得——的这个问题与这则讯息之间：问题是"也许是无？"［1961—1962年研讨班"认同"，3月21日与28日场次］；讯息是"也许什么也没有"。回答随之到来：

相关知识卡 帕斯卡的赌注

- 对第一个问题："不一定是无"；
- 对第二则讯息：因为对帕斯卡而言，赌本恰恰是这个由欲望在我们身上的效应所奠定的无，所以回答是："肯定不是什么也没有。"

我想把我在此指出之物的拓扑阐明清楚。原本还有许多别的途径能使它涌现，但我愿意采取一条中性的道路。我找到了一位语法逻辑学家——那就这样吧。威拉德·范·奥曼·蒯因的一本书《词与物》[注5]中，有些内容极其出色，也有些较为平庸。你们会在法文版第四章"指称的变幻"中读到一些评论。英文是 vagaries of reference，很难翻译：指称的游移？

> [注5] 威拉德·范·奥曼·蒯因：《词与物》，剑桥：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1960年；法译本，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92年。

这些评论从弗雷格的立场出发，涉及 Sinn 与 Bedeutung 之间的差异；去年的练习[注6]已经让我们熟悉了这一区分：

> [注6] 1964—1965年研讨班“关键问题”，1964年12月2日场次。

- 一边是构成意义的东西；在“Green colourless ideas”这个例子中，我已向你们指出它的要点；
- 另一边是涉及指称对象的东西。

帕斯卡赌注在我的拓扑学延续中构成一个括号。此前，我用交叉帽向你们呈现了一个曲面，我们可以在上面辨认出幻想的两个要素如何结合。这两个要素只有从切割开始才发挥功能：其中一个要素——对象(a)——由此处在另一个要素即主体之不可见、不可把握、不可辨认的分裂之原因位置。此时，赌注模型所承载的问题，是要构想的并非这个幻想是什么，而是我们怎样能够在心中构想它。

十分清楚，幻想在其内在性中无法接近；所要解释的是，为什么分析能够让所涉及的这个小(a)落到我们手里。

这是因为另一种形式向我们交付了它：我今年尚未重新引入的形式，也就是在拓扑学上——可以这样说，偶然地——作为克莱因瓶的形式。大他者在这种可能的 Erscheinung（显现）中的功能——这一显现不可能是对象(a)的表象——正是今天论述最后的说明将试图阐明的东西。让我们立刻转向问题所在，也就是信念。

刚才我向你们谈到第二次生命时，也许会出现这样的想法：这是一种幻想的铺展与二分；你们是否曾顺便想到，它会不会给我们的实存留出一些活动余地，让它的严肃性稍微松动？

不幸之处只有一个：这种第二次生命并不存在；我刚才只是在帕斯卡赌注的严肃性内部，试图让你们暂时活进其中。可是，我们相信它。我们并没有下注；但只要仔细看，你们就会发现，自己的生活仿佛已经相信它。这叫作……

……那层让心理学家津津乐道的衬里，有时叫作“志向水平”。在给那些败坏我们命运的一切污物赋予地位方面，谁也比不上心理学家。……这叫作我们的“理想生活”，也就是我们把时间花在松散梦想上的那一生。

威拉德·范·奥曼·蒯因先生颇为机敏地用一个小例子把握了所谓“命题函数”中发生的事情；我完全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更换这个例子，也保留其中的名字：“汤姆相信西塞罗告发了喀提林。”

事情之所以有趣，是因为汤姆受到一条错误信息的影响，因而相信……

……那个在16世纪悲剧中完全可能用法语化名字来指称的人——不是图利乌斯，而是蒂勒——对我们这些当然博学的人来说，他就是同一个西塞罗……汤姆却相信蒂勒绝不可能做出这种事。

既然汤姆坚持认为蒂勒——他不知道蒂勒就是西塞罗——根本没有做过此事，那么在“汤姆相信西塞罗告发了喀提林”这个陈述中，能指“西塞罗”的指称究竟怎样？

一位语法学家围绕这一悬置作出十分有趣的澄清，说明应该怎样以逻辑为尺度衡量某种语法形式。

因为值得注意的是，如果在相同形式中用一种不定形式替换专名……

……看起来，这应该让指称更加不透明；恰恰相反，referential opacity，即“汤姆相信……”这一命题函数引入的不透明性，在这里不能被说成：当你们说“汤姆相信某个人告发了喀提林”时，指称就变得含混。当然，还可以更进一步，发现“相信某个人告发了喀提林”，同“说存在某个人，而汤姆相信此人告发了喀提林”，并不是一回事。不过你们看，我们在这里已经开始进入一道双重门的系统，它也许会把我们带得太远。

为了把你们带回上帝实存的问题，这会让你们把握下面两种说法之间的差异：

- “他相信上帝存在。”尤其是假如这句话出现在某个告诉我们可以思想上帝本性的人的文本里。帕斯卡却明确告诉我们，上帝的本性严格说来不仅不可认识，而且不可思想。因此，“相信上帝存在”同本体论论证代表者的想法之间有天壤之别：上帝没有任何指称对象。

- 相反，在“我打赌上帝存在”中，上帝成了不定者；就此而言，这句话……

……说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因为它在横线下方包含：“上帝不存在。”

换言之，说“我打赌上帝存在，或者……”——必须加上这个“或者”——就是引入这样一个指称对象：大他者在其中构成，而这个大他者被横线标记，被缩减为“存在或不存在”这一二择一，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这恰恰可以在那则原初讯息中得到辨认。那位同时改变人与真理、人与自身命运之关系者，正是借这则讯息在历史中显现。如果科学——大写的科学——的降临若没有犹太人之上帝的讯息便不可构想；这是我近来仿佛一直向你们反复灌输的东西，而并非只有我这样想，柯瓦雷已经极其有力地阐明了这一点。

这则讯息在一点上完全可读：摩西仍未彻底摆脱作为巫师、同真理沟通的功能——他们确曾同真理沟通。要知道这一点，无须沉迷于埃及十灾；只要睁开眼睛，你们就会看见，那些莫名成为古代留给我们遗产的陶器，无论多么微小，都呼吸着魔法；正因此，我们的陶器才不像它们。

我把芥末罐这类小小寓言放到如此显眼的位置，并不只是为了取笑陶工故事。当摩西在燃烧的荆棘前，请使者向他揭示那个应当在真理场域中发挥作用的秘密名字时，使者只回答：אֶהְיֶה אֲשֶׁר אֶהְיֶה［Eyé asher eyé］。

你们知道——至少听我讲过一段时间的人知道——这句话造成了翻译困难。其中最坏的一种译法，因为它在形式上特别向本体论方向用力，就是：

“我是我所是。”אֲשֶׁר［Asher］从来不表示这种意思；אֲשֶׁר［Asher］是“所……”这个关系项，如果要译成希腊语，就是 ταυτί［tauti］。[注7]“我是我所是”，意思是：关于我的真理，你什么也不会知道。

[注7] 《出埃及记》3:14。摩西问：“如果他们问我他叫什么名字，我该对他们说什么？”上帝回答：אֶהְיֶה אֲשֶׁר אֶהְיֶה。希伯来语动词“是”采用未完成体（相当于将来时），逐字可译为“我将是那将是者”。上帝对摩西说：“我是我所是。”又说：“你要这样回答以色列子民：那位名叫‘我是’的差我到你们这里来。”

在前置的这个“我是”与将要到来的那个“我是”之间，“所……”的不透明性、那道划痕持续存在，而且作为这样的划痕，不可挽回地封闭着。

我在大写 A 上划下这道横线：$\not{A}$。我们正是来敲击这里的开口，好让某个东西从中坠落。在帕斯卡的赌注中，这个东西从此不能被构想为任何可表象之物，而应构想为实在界：透过那层主体性雾霭去看它——那是大他者场域上若隐若现、烟雾般含混而不连贯的梦——它正是在向我们提出醒来的要求，也就是这个小(a)。

它确实是实在的、未被表象的；我们仿佛可以透过大他者场域把握它，而这取决于我们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以能指的严密性组织了这个场域。

我们很熟悉这个小(a)。只是到了现在，我才必须向你们解释它同超我的关系：当它越过阴影之壁——这道壁由那个围绕自身实存之纯粹疑问而悬置的大他者所代表——醒来就使它坠落；相对于梦与信念这一不透明场域，它不再被后置，而被前置。至于分析家同这个大他者的关系……

……我在去年末已经给出过这个大他者的定义……分析家的位置正须在这里界定。

参与者、应答者——一种人的秩序进入世界的可能性由此开启；这些人不再服从存在之虚假捕获的永恒诱骗——这一切取决于某件事得到实现：这个大他者……

……这个参与者，不是我们替代其位置的那个人，而是我们必须同分析者——甚至还连同第四者——一起投入三方赌局的参与者……这个大他者知道自己什么也不是。

第11课 · 1966年2月23日

佩里耶—鲁布勒夫　斯坦　梅尔曼　乌里　米绍

伊蕾娜·佩里耶—鲁布勒夫

拉康请我们今天主持他的研讨班。我们将继续讨论各位已经读过的斯坦的三篇文章。不过在此之前，我想引入一场以“转移”和“转移神经症”概念为中心的讨论，试着把这些要素重新放回斯坦关于转移与反转移的报告框架中。这份报告排在斯坦之后；至少它的第一部分，原本更适合放在斯坦之前。

这第一部分事实上概览了弗洛伊德及其他精神分析家那里的转移概念，而斯坦则在治疗本身中深入探讨它。斯坦引入受虐狂，把它看作治疗的支撑同时也是障碍；受虐狂铺展在躺椅上，而需要辨认的是受虐狂者的经济——不是躺椅的经济。此外，他还引入自恋；在精神分析情境中的局部回归帮助下，自恋充分展开。

我们报告的第二部分引入拉康关于对象(a)的教导；它将使我们能够越过阉割情结这一障碍——弗洛伊德在那些无法终结、或者更准确地说无限的精神分析中，正是撞在了这里。

在这场关于转移与转移神经症概念的讨论中，问题是：这两个词可以不加区别地使用吗？

为了进入这个主题，我认为应当引用拉康《治疗的方向及其权力原则》[注1]中的一段。谈到转移，拉康大意这样说：“把患者系在分析家

身上的，是否就是同一种效应，而这种效应随后会让患者安顿在一种满足的经纬之中——人们称之为转移神经症？我们必须在其中看见分析的一条绝路，也就是说，分析显得无力解决它，并走到一个死点。

[注1] 《文集》第585页，或第二卷第62页。

“是否仍是同一种效应，在第二阶段赋予分析其特有动力，并由‘挫折—攻击—回归’这一三重切分来象征，人们正以此说明分析过程？

“最后，是否仍是同一种效应，使分析家整体或部分地占据患者的幻想？

“拉康说，令人惊讶的是，人们一直没有把这些问题照亮。伊达·麦卡尔平[注2]给出了原因：每当转移受到追问时，围绕技术分歧的争论总是如此紧迫，以至于从未给系统尝试留下余地，让人们不再只从转移的效应来构想转移概念。”

[注2] 伊达·麦卡尔平：《转移的演变》，《法国精神分析评论》，1972年，第36卷第3期。

因此，我们不得不说明当代工作在什么样的实践中唤起转移。

在拉康称为“矫正式”的技术中，转移之所以受到重视，是因为它让人能够在患者当前的一种行为中，把握某个被认为已经过时的 pattern［模式］；它提供机会，映照一种要求如何闯入现实并使现实变形，而这种要求本身不可能在现实中得到回应。[注3]

[注3] S. 纳赫特、J. 勒博维西、M. 布韦、R. 迪亚特金、J. A. 法夫罗、A. 杜米克：《今日精神分析》，巴黎：巴黎大学出版社，1956年。

这种倾向由对“无意识自我”概念的信赖所引导；换言之，它假定有一个综合因素，通过安娜·弗洛伊德所编目的系列机制，组织主体对抗自身倾向的防御。拉康认为这一理论并不充分，因为它无法在发生学上明确这些机制出现的顺序、层级，以及它们同本能发展阶段之间的协调关系。

如果表层与深层之间的关系概念本身含混，那么按照从表层到深层的顺序安排治疗就毫无用处。

转移并不只同现实与症状本身之间差距的动力学相连。

它在治疗中发挥积极作用。正是在这一点上，亚伯拉罕提出：转移能力就是爱的能力，因而可以借此衡量患者适应实在的能力。[注4] 正是亚伯拉罕的这个观点构成了拉康所谓“饱和式”治疗观的底层；拉康同时强调，转移概念周围已经积累了何种混乱。

> [注4] 《文集》第604—605页，或第二卷第81页。

至于转移神经症，混乱就更大了；即使在弗洛伊德那里，事情也并不十分清楚。

查阅一些研究后，似乎可以提炼出两个相当普遍地得到承认的观念：

- 转移不可避免地铭写在分析情境中，是治疗取得效力的因素；
- 相反，转移神经症意味着跨过一道门槛；越过它之后，患者的世界便围绕分析家这个人闭合起来。此时会建立一种巨大的阻抗，很难将其撼动。

所以，在转移与转移神经症之间——这是纳赫特[注5]的用语——存在一次越过门槛。

> [注5] S. 纳赫特：《精神分析家的在场》，巴黎：巴黎大学出版社，1994年。

越过这道门槛，神经症者就会使精神分析关系增殖、组织起来，并把它用作防御；这种关系不再是一种手段，而成为自身的目的。这是弗洛伊德方法论所创造的结构中固有的过程吗？看来并不是。我们知道得已经足够多，足以从一开始就肯定：当转移神经症以这种方式建立起来时，分析家在其中并非毫无作用。换句话说：

- 这种转移神经症为什么会出现？
- 它的原因、意义和功能是什么？
- 最后，怎样避免它？

首先回到关于转移的经典文本。在关注这一问题的作者中，弗洛伊德最先、此后还有许多人，都认为转移与转移神经症不过是把幼儿神经症以及儿童同周围人的关系移置后重新生产出来。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谓激动与情感的转移。在《回忆、重复与修通》中，弗洛伊德[注6]写道：“患者重复来自被压抑之源、并早已浸透其整个人格的一切：他的抑制、不适当态度、病理性格特征。他在治疗期间也重复自己的全部症状。我们通过揭示这种重复强迫，并没有发现任何新事实，只是对事态获得了更为连贯的构想。我们清楚看到，被分析者的病态不可能在治疗开始时便停止；我们必须把他的疾病当作一种当下起作用的形式，而不是过去的事件。这个病态一片一片地被带进治疗的作用场

域；患者把它感受为某种真实或当前之物，而我们的任务则是把所见之物联系回过去。”

> [注6]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14，G.W. X）：《回忆、重复与修通》，收入《精神分析技术》，巴黎：巴黎大学出版社，1999年。

后来，在1916年的讲座《精神分析引论》中，弗洛伊德[注7]强调：认为接受治疗的患者之神经症已经不再是活跃过程，是不合情理的；它只是改变了作用点。神经症把全部分量压在转移关系中，正因此，我们常常看到患者放弃原有的神经症症状。

> [注7]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G.W. XI）：《精神分析引论：转移》，巴黎：帕约出版社，1922年。

神经症从此借助转移，以另一种形式表达自身；转移于是构成原先神经症的一次伪装重版。其优势在于：治疗者这次成为神经症的中心，因而可以更好地在现场把握并阐明它。我们可以说，此时面对的不再是患者此前的疾病，而是一种新近形成、取代前者的神经症。弗洛伊德补充道：

> “克服这种新的人工神经症，也就是消除治疗所产生的疾病。这两个结果齐头并进；一旦取得它们，我们的治疗任务就完成了。”［第422页］

他由此明确表示，治疗的终结及其成功取决于能否解决转移神经症。我们知道，他在《有终结与无终结的分析》[注8]中撞在了这一点上。在转移神经症中，分析家是中心吗？换言之，如拉康所提出的问题：

分析家拥有那个使另一个人的转移聚焦的对象吗？超越他所拥有的东西，他自己又是什么？

> [注8]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G.W. XVI）：《有终结与无终结的分析》，巴黎：巴黎大学出版社，1985年。

分析家的存在问题，在分析史上出现得很早。

这个问题由最受精神分析行动问题折磨的人提出，并不令我们惊讶。

可以说，费伦齐1909年的文章《内摄与转移》[注9]在这里具有开创性，而且远远预示了后来展开的所有主题。对费伦齐来说，转移把那些涉及医生本人如何被内摄到主体经济中的现象汇集起来。

> [注9] 桑多尔·费伦齐：《转移与内摄》（1909），《全集》，巴黎：帕约出版社，1990年。

这里不再把这个人当作重复强迫、不适当行为的支撑，或某种幻想的形象。所涉及的是：凭借他本人所体现的一切具身问题，他被吸收到主体经济中。问题在于，他本人怎样在投射到他身上的问题结构中获得体现。

如果回到弗洛伊德《超越快乐原则》第三章[注10]，回到他对重复与回忆的区分，我们会记得：精神分析家必须尽力限制转移神经症的场域，尽可能把它推入回忆，尽可能减少重复。

> [注10]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20，G.W. XIII）：《精神分析论文集·超越快乐原则》，巴黎：帕约出版社，2006年。

弗洛伊德告诉我们，可取的是患者保留某种优越余地，凭借它，他能够认出自己所再生产之物的现实不过是一种反映，是被遗忘过去在镜中的显现。

一旦这项任务成功，我们最终会取得患者的确信，以及随之而来的治疗后果。这一切界定的是转移及其操作，而不是转移神经症；按弗洛伊德自己的说法，后者是应当避免的。如果《有终结与无终结的分析》表明确如其是，他相信自己拥有分析在其欲望中瞄准的某种东西，那么他本人也没有避开它。

要再往前走，就必须谈到拉康关于对象(a)的教导。

因为在 ἐραστής [erastēs，爱者] 与 ἐρώμενος [erōmenos，被爱者] 的辩证法中：

- 要么这个对象位于一个得到体现的问题结构中，这就是反转移；
- 要么，它位于被分析者与分析家之间。

理解这个岬角，能够提供帮助；比起在每一场结束时问“这在转移中是什么意思？患者想对我——分析家这个我——说什么？”更有帮助。因为，如果分析家是一个自我，就足以规定那种二元关系；它只能是位于对分析家或其欲望之认同语域中的关系。

转移神经症具有妨碍性，也有其分量；越是分析转移，它就越得到确立，因为人们不知道怎样以另一种方式表述转移。那么，究竟怎样才能换一种方式来表述它？

重复要素不言而喻。但是，这一历史要素并不充分；其中还介入一个结构要素。

结构中的某些要素会来充当枢轴。如果我们不构想理解转移各个点的方式，不在处理被分析者与分析家之关系时把这些枢轴点投入运作，那么无论怎样分析转移，都只会把某种类型的结构关系稳定下来。

一种造成异化的意象是神经症的关键。人们会构成一种新神经症：转移神经症。我们不仅必须考虑神经症的结构，也必须考虑它如何被卷入精神分析关系中发生的完整关系。《超越快乐原则》第七章中那个希望尽可能缩减转移关系的理想意象，已经过时了；它正走向结构。转移神经症的原因，在于人们分析转移的方式。必须用拉康代数学写出同镜像意象 i(a) 之关系的精确公式；正确分析转移，并不是每时每刻追问“患者想对我说什么？”

必须分析患者围绕对象(a)把握到的大他者欲望，并在每一场中标定对象(a)涌现到何种程度；转移分析可以围绕这一点进行。只要把分析家的自我当作现实的尺度，神经症就只能安顿在那里。所以，一切取决于分析家怎样思考这个情境。

让我们回顾拉康理论的几条主线，以定位神经症者的对象(a)。一方面，并非全部自恋投入都会通过镜像意象；还有一个剩余：阳具（－φ）。在被力比多化的身体之真实意象中，阳具显现为：

- 负项，
- 空白，
- 它没有被表象，
- 它甚至从镜像意象中被切掉。

另一方面，相对于大他者被划杠的主体依赖于大他者，在大他者场域中被能指标记；但仍有一个剩余、残余逃脱了镜像意象的规定。这个随便什么对象就是(a)，焦虑的对象。当某种机制让某物出现在（－φ）的自然位置、亦即对象(a)所占据的位置时，焦虑便构成。

欠缺没有意象：如果某物在那里出现，欠缺就发生欠缺。只要它不再欠缺，焦虑就会出现。

因此，能够在（－φ）这个位置发出信号的是焦虑；这就是它在同大他者关系中的阉割焦虑。

弗洛伊德最终抵达的词项就是阉割焦虑。

对拉康来说，构成神经症者最终绝路的并不是阉割焦虑，而是阉割的形式：主体把自己的阉割做成大他者所欠缺之物，把它做成大他者这一功能的担保；而这个大他者在意指的无定限转送中逃逸。主体只能通过享乐攀附于这个意指宇宙。

他只能借助一个必然缺失的能指来保证这种享乐。主体被召唤以我们称为阉割的符号，补足这个缺失的位置。

神经症者停在把自己的阉割献给大他者作为担保这一步之前。正是它把神经症者带入分析。

而焦虑将使我们能够研究它。为了防御焦虑、遮盖焦虑，神经症者运用并组织自己的幻想。对象(a)在幻想中发挥功能；但这是一个冒牌的(a)，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防御焦虑。它也是他用来吊住大他者的诱饵；可以举布洛伊尔为例，他在分析安娜·O.时被这个诱饵套住了。

弗洛伊德则没有中招。他利用面对自己欲望时的焦虑，认出必须做的是理解这一切有何用途，并承认安娜·O.所瞄准的是他本人。我们正因此才经由幻想进入分析，也进入对转移的合理使用。这将使我们看到：在神经症者那里，于对象的(a)层次发挥功能的，是某种让他得以把(a)转移进大他者的东西。必须教神经症者给予的，是无；而这恰恰就是他的焦虑。

现在我试着回顾斯坦《转移与反转移》一文的若干部分。我要预先致歉：我没有时间阅读他的另外两篇文章，也没来得及看他对梅尔曼与孔泰的答复。斯坦把患者对分析家干预的等待引入后，这种等待在患者与分析家、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制造一道切割，一种异质力量由此进入。于是，在场的似乎有两个存在者：主体与对象、分析家与患者。

这种等待被感受为不快。分析家似乎剥夺了患者从自恋扩张倾向中获得的快乐。患者在这道切割中感受到的挫折，正是转移现象。（这是依据斯坦的文章。）患者赋予分析家一种并不属于他的力量。乍看之

下，正如孔泰所说，这种挫折辩证法似乎把分析情境带回主体与对象之间的二元关系。

就我而言——也许斯坦的文本其实已经包含这一点，只是没有明说——我认为支撑转移的是分析规则，而不是同分析家本人之间的关系；分析家恰恰通过自己的行动被剥离了个人性。在这一辩证法背后，第三位玩家——拉康的大他者——显出轮廓。分析家被卷入构成这一情境的双重化，而这种双重化与二元关系毫无关系。这里有一种制造含混的矛盾。如果我们忘记它，是因为这位玩家、这位第三位玩家，对另一个人而言恰恰是分析家；而对分析家而言，则是大他者向他规定每一步。我们似乎在这里再次遇到斯坦所谈的施虐性指向：“分析家可能让自己在转移中受骗，占据患者为他安置的位置，也就是挫折力量之源的位置。”

我的第二点评论针对这种挫折。在我看来，分析中的挫折并不来自等待干预所造成的不快，也不是这种等待会引入一道切割。

恰恰相反，它应当诞生在对患者提出的一切索求——包括他没有提出的索求——都不予回答的地平线上。通过索求，整个过去一直半开到婴儿早期最深处。

我正是以沉默让患者受挫。只有通过这条道路，分析性回归才成为可能。

分析家拒绝满足索求，这种节制把索求同欲望场域分开；转移是一种论说，主体试图在其中越过索求、并相对于索求实现自身。

然而在我看来，斯坦的这篇文章处处让人想到：当他说挫折时，所涉及的是阉割；如果这样，一切都会吻合，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斯坦把分析的终结定位在对挫折取得知识之处。对弗洛伊德而言，分析的边界止于阉割情结；它保有占优势的意指，也就是说：

1）男人能够拥有阳具，其底层却是并不拥有它；

2）女人不拥有阳具，其底层却是她拥有它。

如果弗洛伊德标出了某些分析的无限性质，那是因为他没有看到：阉割问题的解决并不围绕“拥有还是不拥有”这一困局；只有当主体察觉自己并不是阳具时，他才能使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不拥有阳具这一自然位置正常化。

回到斯坦的文章：如果患者的进展趋向无休无止，在世界中的表面进步与受虐狂位置要求维持现状之间来回摆动，并把转移置于不确定性的符号之下，那么，我们也许可以在这里看见转移神经症的表现；它最终走向死点。

这种分析固有的不确定性，正如斯坦说得很准确，就是弗洛伊德在“害怕失去”或“渴望拥有一种无价属性”中所看到的不确定性。由于没有区分“是”与“有”的平面，我们又落回弗洛伊德那些无限的分析。其实斯坦所说的正是这一点，只是未加明言：“害怕失去或渴望拥有，在转移中翻转为‘为分析家而是’的位置：成为他的快乐，或成为他的十字架。”

康拉德·斯坦

至少一开始，我会尽量说得很简短。如果看来有必要，我再回到某些点。

这当然让我非常、非常、非常感兴趣。也非常感谢你。我按照刚才匆匆记下的顺序逐点回应。

关于麦卡尔平女士的评论——她说，除了转移的效应之外，并不存在转移概念——对她来说，这是事实判断，而不是关于事情应当如何的判断。她这样说是对的。

但她不知道事情为什么如此。我认为，如果想知道原因，就必须指出一件在我看来十分明显的事：你们知道，弗洛伊德在着手运用自己的技术、即宣泄疗法之初，发现转移的同时也发现了阻抗。转移当时显得是一桩意外，是分析的一个复杂化因素；但他很快便认出它不可避免。后来弗洛伊德改变了看法；如今全世界所有教学机构都告诉我们，精神分析治疗首先在于分析转移。这是可能的。不仅可能，甚至是真的。

我认为……

……我无法在这里展开；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值得深挖的想法……我认为，事情今天之所以仍停在这里，是因为尽管人们断言分析就是转移分析，但最初那个“转移是治疗的复杂化因素”的观念，其分量仍持续作用于我们。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精神分析家无论嘴上怎样说，仍然把转移看作治疗的复杂化因素和偶发事件。

接下来谈转移与转移神经症之间的差异。在弗洛伊德那里，这并不十分清楚。我必须说，我不赞成这种区分，至少不赞成你所引用的——我想是纳赫特提出的——“门槛”公式。显而易见，如果转移可以成为分析的发动机，它也可能在其中显现为一种几乎不可化解的障碍；这里并没有一道门槛被越过，并不是量的问题。

如果我理解得没错，你把它讲成——我当时没想起这段引文——仿佛涉及转移的数量。显然，这不是量的问题，而是转移结构的问题。但我不认为可以区分转移与转移神经症；它们是同一回事。真正可以区分的是样态，是转移的不同样态；借用你在第二部分从拉康那里取来的词，就是其结构中的不同样态。

你说必须在转移的历史维度与结构维度中构想它。这个词并不是弗洛伊德的，确实来自拉康。我完全赞成这一区分。我甚至可能比拉康走得更远；正是你提起费伦齐的文章让我想到：我认为，借助回忆重新找回过去、重建过去的整套技术……

……因为回忆是当下的东西，而不是过去的东西……这整套重新找回的技术只是分析的一种手段，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它是一种手段，在某些情势中适合使用，在另一些情势中则不宜使用。

患者围绕对象(a)把握到的大他者欲望，以及把阉割当作大他者功能之担保的问题：我认为，正是这些拉康式主题启发了我的第二篇文章。

如果其中确实有什么拉康式主题，那毫无疑问就是这些，尽管我没有采用拉康的“代数学”。无论出于什么原因，我没有感受到这种表述方式的优势；也许我错了。总之，我的拉康式灵感来源确实在这里。指出这一点很重要。当然，我们现在无法展开这个问题。

那么，在你对我文章的评论中，你谈到一种异质力量借以进入的切割。这个切割所分开的，我没有说是两个在场的存在者，而是两个人；这里有一个你不可能知道的十分明确的理由，因为我在别处对“人”这个概念给出过非常精确的定义。

我也不想在这里进入这个问题。显然，我不得不拒绝你关于……的评论。

……正如我已经拒绝过孔泰提出的类似评论……也就是主体与对象之间二元关系的概念。

理由很多。不过我首先请你注意：即使在我这篇还远非定稿的文本中——因为参加过皮耶拉·奥拉涅研讨班的人，还听过我题为《精神分析家的判断》的补充章节，而那也不是最后一章——即使只在这篇文本中，你们也会注意到：如果在场的有人，那么至少有三个人。首先是在切割中的患者与精神分析家；此外还有一个神话性的人，可以把它描述为"全体在一中，一在全体中"。在这个人中，精神分析家与患者都不作为主体在场；在分析情境中局部回归实现到某种程度时——我针对孔泰与梅尔曼的论证展开过这一点——可以说"它在说话"：患者说话，精神分析家说话。

他们是两个；而在另一种从不完全实现的情势中——正如分离的情势也从不完全实现——"它在说话"。所以，你们已经至少有三个人。

我并不是说只能描述这三个人。在发展的另一个阶段，三个人以不同表述出现；但可以肯定，绝不可能只有两个。我甚至认为，即便在最平常的谈话或言语交换中，也不能像今天一种十分流行的理论所主张的那样，认为这里只有"信息交换"，仿佛在两个对话者之间灌输信息。

这样的事情并不存在。信息论所处理的信息——如果信息论是真的——是声波，是物理学与脑生理学的问题；它经过耳朵，进入颞叶。

我们所关心的不是这个。要让这些物理现象成为能指性的，需要的远远超出这种“两个人之间传递信息”的理论；某处必须存在对第三者的参照。这个问题我也无法在此展开。所以，这里谈不上二元关系。

至于“转移由分析关系支撑”：我记下了这句话。我不知道这是你自己的说法，还是你在引述我？

伊蕾娜·鲁布勒夫——我是在引述你。

斯坦

好。无论如何，我们完全同意。不过我认为——这也无法在这里展开——应当让“支撑”这个词取得完整维度；我刚才以为这是你的反驳，因为我没有把自己的原文记得一清二楚。

不，我想这确实是你的反驳。但必须看到，转移由分析关系支撑，或者类似的说法。总之，无关紧要，因为我们同意。

支撑……必须赋予这个词完整意义，因为我越来越确信——我现在无法展开，甚至也不一定能讲得很好，因为这是最近才有的想法——不能认为分析情境创造了转移。我认为，分析情境是转移的显影剂。

——会场中的某人：佩里耶女士说的是“规则”……[注]

> [注] 说话人标记校勘：Staferla 转录把下一段发言人的姓名接在上一段末尾；依对话衔接移至下一段段首。本课后面伊蕾娜·鲁布勒夫处的同类错位亦作同样处理。

斯坦——我记成了“关系”。好，你说得对。我大概是因为想谈别的东西，才记成这样。

不过我还是把这条论证说完，然后很快回到“规则”。所以，我认为规则并不创造转移，而是揭示转移，使我们得以认识它。

但我认为，转移恰恰是任何把沟通构想成信息交换的理论都遗漏的那种普遍人类学因素。这个我也无法展开。至于转移由分析规则支撑的问题，也就是凸显分析规则的重要性，我现在不想介入；但我在皮耶拉·奥拉涅与克拉弗勒尔研讨班上讲过的那一章，第一段恰好专论这个问题。说起来会有些长。

我在那里首先重申了一项经验中相当常见的事实：把我们习惯称为基本规则的东西明确说出来，完全没有必要。也就是说，根本不必告诉患者，他必须把进入脑海的一切都说出来，等等。这完全没有必要。不过我试图提炼的是：即使不把规则说出来，规则的分量仍然相同。

至少有一样东西以单方面的方式强加下来，例如场次的时间安排。

也就是说，即使精神分析家不说出任何规则，只告诉你“我每周接待你三次、四次或五次，某天某时；来吧，躺到躺椅上”，然后不再多说，这仍足以施加一种与明文规则完全相似的分量。我还就此指出一件仍然十分重要的事：每场至少有一次精神分析家的干预，它可以受到期待，就是标示场次结束的那次干预。谁也逃不开它。

因此，如果精神分析家那天一句话没说，就认为他没有干预，并不完全正确。为了说某件事而干预，与通过标示场次结束而干预，显然不是一回事；但后者仍然是一种干预。证据是，有些患者会在场次结束前自行离开，因为他们无法忍受由精神分析家来指出场次结束。我不认为有许多患者会在每一场都固定如此，但在每位分析家的实践中，这种事情偶尔都会发生。

关于那位受骗的分析家成为力量源头的问题，我认为我们完全一致。

你告诉我，挫折恰恰位于不予回答的地平线上。我同意。是对索求不予回答。是的，当然。

当我谈论等待精神分析家的干预时，所涉及的就是这个地平线。我完全同意你说，挫折位于对索求不予回答的地平线上。但这个地平线由什么构成？

不正是由等待精神分析家的干预构成吗？我不认为这两条论证彼此矛盾。不过在我看来，必须强调这个不予回答的地平线，强调对精神分析家干预的等待——也就是他被想象或被估量的干预——因为正是它以严格意义上的定义支撑转移。患者在一场中的大部分论说，也正由此构成："你会对我说……"以及"我想你会……"，永远是：你，你，你。

有些患者从来不会这样。当它从未发生时，你们知道自己面对哪种阻抗：布韦称之为"对转移的阻抗"。而能够分析的阻抗更是转移的阻抗，也就是通过转移发生的阻抗。不，我丝毫不认为这里有矛盾；但必须强调什么填充了这个不予回答的地平线，也就是对所期待干预的估量。

还有一件始终发生、值得考虑的重要事情：干预终于发生时，它与所期待的东西并不相符。

最后一点：你说，在我谈挫折的地方，应当谈阉割。对此我无法给出绝对坚定、最终的回答，因为你可能是对的，而对我来说，这个问题

还没有完全裁决。不过我认为，在第一个阶段仍有必要像我在这篇文章中所做的那样，强调挫折概念。因为挫折是什么？

在法语中，frustration 是取消、剥夺某人有权获得的东西，这与 privation 不同。使某人受挫，就是拿走他有权获得之物。可是，这里是什么权利？不正是自恋全能的想象性权利吗？换言之，这里所说的权利，当然远非司法意义的权利，也不是法典意义上某种权利受到挫夺；恰恰相反，这是一种挫折，因为患者在其自恋中想把自己的欲望设定为一项权利。

所以我认为，在这个层次应当谈挫折。正如拉康所说，挫折属于想象界的秩序。自恋的权利、欲望得到实现的权利——如果还能称它为权利的话，因为它恰好与法典意义上的权利相反——确实属于想象界秩序。况且，正是它支撑幻想。至于阉割，正如拉康所说，必须把它视为仍属于象征界的秩序。

于是，我们恰恰来到分析终结的问题。我曾说，分析终结在某种意义上是关于挫折的知识——当然这并没有解决问题——但这种关于挫折的知识处在哪里？恰恰在承担象征意义上的阉割这一事实中，也就是说，在自我理想的构成中。

当弗洛伊德说自我理想是原初自恋的继承者时，我们恰恰在这种继承中看到：从挫折的想象界语域——人不会承担挫折，只会抱怨挫折，不可能有别的方式——过渡到阉割的象征界语域，自我理想随之构成。我们必须研究这个自我理想相对于另一个位置处在哪里；在另一个位置上，患者以自己的受挫感把分析家安放为力量之源。

自我理想……分析的终结并不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是认同于精神分析家。

这个概念完全无法维持；不过，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分析的终结在于认同于自我理想。自我理想——关于挫折的知识告诉我们，它处在不同于精神分析家的位置。

好了，我已经讲得比原本打算的长得多。

伊蕾娜·鲁布勒夫

我也不想把讨论拖长，只简单回应两三件小事。

首先是伊达·麦卡尔平。我完全同意你对转移与转移神经症所作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有作出的——区分；我确实认为，这根本不是量的差异。

显然，这是结构差异。至于转移神经症，如果刚才大家理解了我的意思，它恰恰是某种分析抵达的绝路：当我们把阉割情结放到“是”而不是“有”的平面上，就无法越过在阉割情结中撞上的东西。

关于费伦齐，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我也同意：即使不谈能指、对象(a)、大他者等等，即使你不喜欢拉康的代数学，你仍在运用它。

我完全同意你，因为我自己在评论你时就这样说过。我谈到二元关系，说的是“似乎”有两个存在者在场；好吧，我愿意删掉“存在者”这个词。主体与对象、分析家与被分析者——这是你自己的说法。我说的是：在我看来，即使你没有明确说出它不是这样，背景中其实显出了第三位玩家——大他者。我替你把这说出来了。

现在，我想谈一句所谓二元关系。它绝不是指有一位先生与另一位先生，或者一位先生与一位女士面对面坐在那里，如此而已。因为正如你说的，如果要有这种二元关系，两个人就必须待在荒岛上，而且不能说话。

不言而喻，拉康教导中所谓二元关系，根本不表示没有其他词项；必然有第三项。不过，它位于儿童与母亲的辩证法中。

这并不意味着父亲没有出现。他必然出现，因为是他使孩子受孕。

斯坦

我不太明白。如果它处在儿童与母亲的辩证法中，而父亲又在其中出现，那么还能构想出什么别的辩证法？

伊蕾娜·鲁布勒夫

父亲在其中出现的方式，与我们进入俄狄浦斯问题时并不相同。我知道，对你而言，俄狄浦斯从一开始就存在。但我们对这件事并不这样理解；对我们而言，俄狄浦斯从发展的某个时刻才开始，当然很早，比经典分析家认为的早得多。总之，如果你愿意，所谓三元关系、即不再是二元关系，始于父之名在母子关系中出现。我所说的父之名，并不是说……父亲没有提供精子。

斯坦——到这个时候，它就是三元关系了？

伊蕾娜·鲁布勒夫

是的，从父之名开始；从儿童的欲望经由母亲被转向父亲欲望的那一刻开始。总之，我想我们可以在这上面讨论很久。

斯坦

我仍可以当众回应昨天在电话里对你说过的话：我认为，你在这里描述的正是能够存在的最原初、最根本的事实；在它之前，我们什么也无法构想。因为你说二元关系是儿童与母亲的关系，而父亲在其中出现；他怎样出现？

伊蕾娜·鲁布勒夫

不，我不是这样说的。我说的是，父亲当然已经在场，因为他同母亲一起生下了孩子。

但在母亲与儿童最初的关系、在婴儿的关系中，他并没有出现于关系之内。

斯坦——我不相信这种东西存在。

伊蕾娜·鲁布勒夫

以后必须重新讨论这个问题，现在实在会太长。接下来谈挫折：你说等待分析家的干预与不予回答是同一回事。我认为，它们毕竟不完全是同一回事。

斯坦——我说的是，不予回答构成这种等待的条件。

伊蕾娜·鲁布勒夫

你在文章里说的并不完全是这样；你说，对分析家干预的等待引入一种异质力量，并由此造成切割。我不认为……总之，也许可以用不予回答说出同一件事。我认为，重要的是不予回答针对索求；而你的文本给人的印象是，它针对欲望。

正因此，我才说所涉及的不是挫折而是阉割；归根结底，你说的与我们说的是同一回事，只是用了另一个名字。

况且，只须看看你文章的结尾。你一字不差地说出了拉康的说法：弗洛伊德无法终结一场分析，是因为他相信自己拥有一个极为珍贵的对象。

而这个极其珍贵的对象，除了阳具还能是什么？

斯坦

是的，但让我们重新来看。当你说“不予回答”、说“不予回答的地平线”时，你当然是站在患者的位置上说话。若没有唤起某个回答，就不存在不予回答。

伊蕾娜·鲁布勒夫——当然。

斯坦——患者会说：“他不回答我。”

梅尔曼——“他”是谁？

斯坦

这是另一个问题。不予回答，是对一个回答之实存作出的否定判断；所以，这个回答必须作为一种可能性在精神中在场。因此，我不认为两者相差很远。

伊蕾娜·鲁布勒夫

我们以后必须重看这一切，因为时间大概不多了。我正想请梅尔曼和孔泰发言。

夏尔·梅尔曼

好，关于这个问题，关于这句话："挫折出现在对索求不予回答的地平线上。"

伊蕾娜引入了一场讨论：这里使用"挫折"是否准确、是否恰当，还是应当改用"阉割"。在我看来，这恰恰是阅读你的文本时显露、也被提出的一个根本问题；我必须说，就我而言，我倾向于……

……也许并不只是为了阅读方便或省事……我倾向于遗憾拉康代数学终究没有在这里得到运用。

因为，无论如何，"对索求不予回答的地平线"——我倾向于正是在这个维度中看见转移十分确切地建立起来。也就是说，索求作为得到表述的索求而运作；而这里恰恰有一个如此独特的对话者，他把索求的真正维度赋予它，即终于真正被听见。

它并不是被某个立即到来、号称满足它的回答听见；那种回答实际上只会构成误认的底层——可以说，它如此具有创伤性，而我们的惯常、约定、正常关系都包含它。相反，索求要被安置在其真正语域

中，即不予回答的语域中，这样，索求据以建立的欲望维度才能被听见。因此在我看来，只有不予回答——准确说，作为不予满足之回答——才在这里涵盖了转移的维度。

当然，在治疗中，患者会把各种回答都归给我们，把我们卷进你刚才谈得很好的那种对话：他把我们可能给他的所有回答、可能假定我们具有的所有感受都归给我们。话虽如此，我认为，如果我们真的投身于——就称作行动化吧——也就是实际回答他、回应他的索求，就会施加一种真正具有创伤性、令人失措的效应；这种效应在某个处境或某项观察中完全可以被觉察、被注意到。

因此，假如——我说假如——我们采用拉康代数学，追问回答的缺席究竟位于何处；归根结底，在所有场次都已完成之后，对索求的那种根本回答缺席，以及由此释放出的欲望维度，究竟位于何处？换言之，我认为，如果在这里引入大他者，治疗中各参与者各自的位置就会得到远为精确的说明。刚才斯坦提到三位参与者，这无疑至少是最低数目；我认为，各参与者的位置还会通过你那个十分细致、精确的小小标记得到进一步说明：你谈到分析家在场次开头和结尾的隐含干预。换言之，即使分析家始终沉默，只凭他确定场次时间，并在某刻说“就到这里”、宣布场次结束，他就不可避免地隐含地作出了干预。

我认为，这其实是一个问题。必须说，它在我看来没有那么简单，因为我想到有一种治疗技术，恰恰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分析家确定场次时间、标出结束时，到底有没有干预？

比如说，存在一种治疗技术；我们设想一种理想治疗吧：场次安排在星期一、三、五的固定时刻，时长严格确定……

……我们知道患者的无意识多么出色地掌握时间；在时长严格固定的场次中，即使不看表，患者也完全知道场次将在何时结束……那么我认为，在这种固定日期、固定时刻的技术中，我不能肯定分析家作出了干预。

我不能肯定，因为既然我引入大他者的功能，试图定位和划分治疗中参与者的位置，我便会问：这里是否其实有另一种略有不同的隐含声明？它也许更接近分析家与患者共同服从一种同时间的关系。由于这种服从当然始终会引入同大他者的关系，它仿佛在分析家与患者同时间的这层关系中，隐含地或有意地宣告二者同一；而其中的维度……总之，我们不要在这里展开讨论。

不过，我仍想说：在场次中在场的不同参与者当中，第四者的维度——在这里就是人们有时唤起的那个死者——在我看来无疑也以非常精确的方式得到引入。

好，我也许没有回答你的关切和问题；但听你们说话时，我想到的就是这些。

伊蕾娜·鲁布勒夫

谢谢你的评论。也许我现在请孔泰发言，如果他愿意的话。

克洛德·孔泰——……

让·乌里

我只想作几点术语评论。无论是否采用拉康代数学，至少在词语上仍须具有共同含义；这在我看来很重要。

例如，挫折、阉割、剥夺这些词。我感觉刚才出现了某种混用，没有带来澄清；因为我坐在听众的位置上，几乎没听懂围绕挫折与剥夺展开的讨论。尤其是斯坦说，自我理想可以在阉割层次上谈论。我记得，在拉康术语中——我们确实必须守住一套术语，如果要用拉康的词来说——自我理想更多被放在剥夺层次。不过，还是必须把这些词界定清楚。挫折这个词由弗洛伊德引入……其实弗洛伊德不用 frustration，他使用 Versagung，拉康经常把它译作 dédit（撤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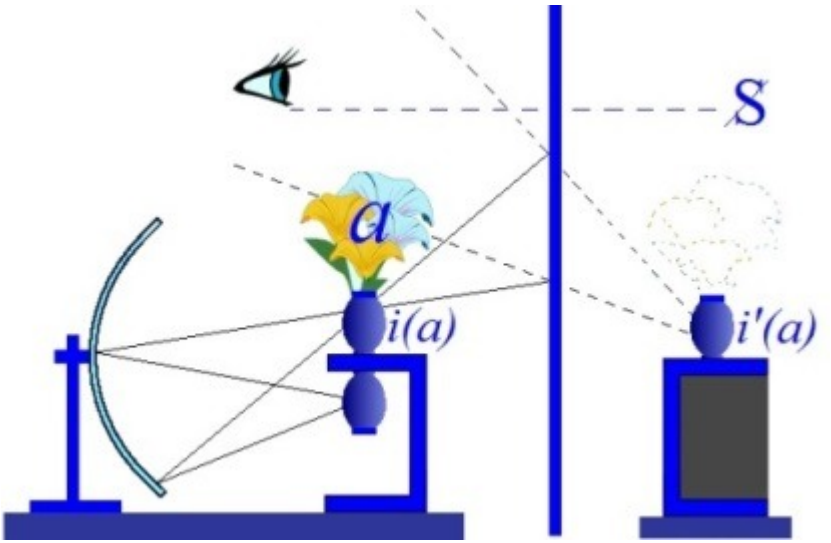
挫折确实位于想象界的维度与语域中；但拉康明确说，它是 dam，是一种想象性损害，却针对某种实在对象。要给挫折举个临床例子，也许会有些粗糙：比如我们在会场中想说某件事，却因为场次或时间原因不能说。在这里，我们脑中准备说出的"所说"确实被撤回；与此同时，言说本身仿佛爆裂、散开。这当然是一种想象性损害，却可能走得很远，造成整套症状学。

而在阉割中，涉及的是象征界语域，但它针对一个想象对象。正因此，我刚才才作出那些评论，说自我理想并不位于剥夺层次；不过在最早的一些建构图式中，也就是俄狄浦斯之前，当父亲正要介入儿童与母亲的某种黏合、最初认同刚刚萌芽的这段过渡中，它是在剥夺层次发生的。这还需要用许多例子展开。但我想我们没有时间，而我在这里也没有条件。接下来，在转移中，显然仍是在索求层次发生——我们应当非常详细地重谈索求——转移结束时，自我理想的撞击正显现在索求层次。这是第一点术语说明。

再作一条评论，关于二元关系。我一直觉得"二元"是一个非常、非常不幸的用词。正如斯坦指出的，即使只是一场普通对话——语言学的基础本身就证明了——任何沟通中始终都有一个指称对象或语境；所

有这一切都围绕拉康重新采用的大他者概念，语言学家也称它为“语言共同体”、“代码的场所”等等。显然，这里绝不只有两位主角。然而同样是事实：在人格演变中确实有一个历史时刻，三角化在那里显现。

与其谈一种多少有些异想天开的从二到三的过渡——它也许没有多少意义——不如说，镜像功能正是在那里介入。围绕镜子阶段，以及借助镜子阶段的功能承担想象性关系对代谢的重要性，后续的三角化才会展开。不过必须说，镜子阶段本身只有在象征系统中被把握才有意义。先于想象界的是象征界。正因此，拉康经常在绘制镜子本身时图示镜子阶段，并标明镜子就是大他者；自我在这面镜子中、在误认中得到反映。



这里似乎确实存在一种过渡：从一个——可以说——未定的镜像系统，过渡到一种三角化系统；父之名或法则等在后者中以更特定的方

式介入。这一切都可以展开；不过我只想标明，在继续推进讨论之前，也许必须更精确地界定术语。否则我觉得我们……

伊蕾娜·鲁布勒夫——你说得很对：谈二元关系，确实必须把镜像意象引入其中。

至于你对挫折的说法，显然，挫折是针对实在对象的想象性损害；你忘了它的施动者是象征性母亲。但这仍把我们带回某种只能称作二元关系的东西，因为眼下还没有别的词来称呼它。这个词显然十分不恰当。二元关系完全可以包含很多人、很多小(a)，或字母表中的任何字母。

斯坦

我插一句，只说一句：当我们谈阉割时……

……我认为，拉康正是这样理解它，而他在这点上是弗洛伊德式的；拉康与弗洛伊德在这里没有任何距离或对立……当我们谈阉割时，绝不能忘记：对我们而言，阉割概念是一个积极概念，是通达一种真正力量的概念；它同自我理想的关系正位于这里。这是一个积极概念，却由欠缺的负面意象来形塑。位于这一概念的积极性与其负面的欠缺形象之间全部间隙中的东西，是分析问题结构的本质部分。

人们经常倾向于把阉割同弗洛伊德患者所说的话混为一谈。他在《有终结与无终结的分析》中提到，患者说：“无论如何，我们这几年做了这么多工作，确实很好，可我仍然不会有阴茎。”

如果患者是女人。或者：“既然它存在、既然我有一个，我毕竟始终面临失去它的风险。我可能失去它。”

如果患者是男人。

而这恰恰是阉割情结。阉割情结与拉康所谓阉割并不是同一回事。我认为必须把这一点说出来。患者恰恰在这里引入那个也许套住了弗洛伊德的诱饵。归根结底，如果把事情放在“可以对患者说什么”这一更脚踏实地的层面，我们仍不可避免地要向他表明……

……你刚才引用拉康时谈到的转移结构，正是在这里介入，并同转移的历史性相对……比如，面对一位抱怨自己没有阴茎的女士，我们仍可以向她表明：无论怎样，分析都不会给她一根阴茎；她所抱怨的没有阴茎、她的阴茎嫉羡，无非是她试图向精神分析家呈上的诱饵。

因为，说她想要一根阴茎，并不是真的；在绝对意义上并不是真的。只在这种欲求让她能够把精神分析家维持在我称为反转移的位置上时，它才是真的。

这还需要说得更精确一些。

伊蕾娜·鲁布勒夫

这恰恰就是布洛伊尔在安娜·O.那里陷入的位置。拉康说的是同一件事。而且，自我理想确实同阉割有关，因为在弗洛伊德那里，它是在俄狄浦斯情结衰退时出现的。

斯坦

这与我谈剥夺时说的话并不矛盾……必须恰恰去看自我理想的起源……

吉内特·米绍

必须恰恰去看自我理想的起源。我的话非常偏离这场讨论，不过涉及斯坦刚才的一条评论：他认为转移并非由分析揭示……不，是由分析揭示并且预先存在。

我认为，我们只能沿这个方向走。最先把它界定清楚的正是弗洛伊德：转移由精神分析情境揭示，却预先存在；它在外部没有被重新拾起、重新论述，但在精神分析情境之前就已存在。

还可以说，一旦存在不同于分析情境的另一种支撑——正因此我认为“二元”一词只是事情的局部要素、局部定义——也就是说，一旦有一种情境，可以在其中重新拾起并论述转移机制，我们也许就能把它揭示出来并加以运用，如同在分析中运用它一样。

例如，极其简略地说，在分析中的转移……分析家是转移的显影者，是转移所指向的人，同时也是讯息的收信人，并且或多或少又是讯息的读者。又例如，在一个组织、一个照护机构中，这些机制存在，而某个结构或另一结构可能处在使这种机制极化的位置；或者在那里，同一个处在分析位置上的人——无论分析家还是医生——都可能利用这种现象。

我认为，此时可以重新拾起一些转移机制；它们未必与精神分析情境中的转移完全重合。正因此，“二元”是一个……总之，只要相对于大

他者以负面方式定位分析，就可以把分析定位为二元情境；也就是说，从排除的角度来界定一个大他者。具体说，在分析中，分析家：

- 不同患者的家人发生关系，
- 也不同患者的朋友发生关系，
- 而是相对于即将投射到那里的东西，把自己置于镜子的位置。

在机构、在治疗团体中，情境完全不同。这里没有这种排除系统；恰恰有可能使外部作为排除系统而被体验的一切发生极化，再把它重新拾起，使之产生治疗作用，让转移机制不至于逃脱对患者整体的治疗。为了避免付诸行动（passage à l'acte），它会转化为行动表演（acting out），也就是说，转化为对处在这一情境中的人之欲望——总之，是索求——具有意义的机制，并能在别处重新从治疗层面加以处理。

我认为，这里有某种东西值得展开。

伊蕾娜·鲁布勒夫

谢谢你发言。还有别人想说话吗？贝尔纳特？没有。

没有别人了吗？斯坦，你还想说些什么吗？

斯坦——听我说，我想我已经说得很多了。谢谢。不说了。

伊蕾娜·鲁布勒夫——你也许可以回应一下吉内特·米绍？

斯坦

不，我只能告诉她，现在不可能讨论。我只能说，这个问题让我感兴趣。我完全不处理分析以外的事情。不过，它所处的——我不认为二者重合——确实与我有机会针对克希兰在《精神病学演进》所作的一场制度治疗报告说过的几句话，属于同一个问题结构。

我认为，这件事能够让精神分析家感兴趣——比如说，作为理论家——即使他没有机会、也不打算亲自处理精神病学机构。我的意思是，像你们这些实际从事这项工作的人所说的话，确实有某种东西值得我们学习。这一点在我看来完全确定。也就是说，我不认为机构中患者照护的理论可以是精神分析理论以外的理论。

而你刚才完全证实了这一点。所以，这让我非常感兴趣。

那么，最后，我想谢谢你。

伊蕾娜·鲁布勒夫

我也谢谢你。散会。

第12课 · 1966年3月23日

我希望有人把窗户打开；确实，我第一次注意到这里让人喘不过气。

让-保罗，我之后再见你。

好吧，我不知道这样一则消息传播得有多广：我已经告知负责而且有条件转达的人，今天的研讨班是开放场次。你们依然没有坐满会场，也许罢工和传播不足各占一半原因。

我的天，这次中断之后，我确实很想同全体听众重新接触；我为中断致歉。这无疑是我的欠缺。不过，我终究必须作出选择，去完成一件早该做的事：前往美国。

我感觉——就在刚才仍有这种感觉——你们在等，有些听众在等我谈一谈这次旅行。那么，我会试着至少部分地、以即兴的方式满足这个欲望。

不过在此之前，我要先提出一份好惊喜——并非完全出乎意料——也就是我从出发前便已获得、最终又让我满足的一份好惊喜。要说明所指，我马上向你们展示最新一期《现代》：在座的米歇尔·托尔先生的文章[注1]分两期刊出，题为《论解释或诠释机器》。

> [注1] 《论解释或诠释机器》，《现代》第237期，1966年2月；第238期，1966年3月。

离开前我没有向你们谈它，因为在等待全文刊完。我可以说，这篇文章让我十分满意。如此出色地替我的“理”接下挑战的人恰好姓 Tort（“错”），似乎也颇为合宜。

事实上，要给这篇堪称一部真正著作的文章定性，我会说：看到有人——我暂且不明确规定此人的身份性质——作出一种澄清，给我以很大鼓舞。我立刻要给这种澄清一个名字；原本还可以定性得更好，但我实在找不到比“哲学挪用”或“思想挪用”更好的词。

我身边的一位亲近者[注2]曾认为有必要把某位作者长期以来从我的教导中借取的要素置于首位——这样做并非不需要勇气，而这些借取未必被该作者承认为借取。

> [注2] 让-保罗·瓦拉布雷加：《如何从弗洛伊德那里幸存？》，《批评》第224期，1966年1月，第68页。

这为他招来了一则奇特回应。你们至少有些人读过某一期《批评》后，能够衡量这则回应何其失实。“剽窃”一词——并非出自我的学生之笔——在回应中被推到前台，甚至还挥动了其法律背景；问题当然不在那里。

很久以前，我就谈过剽窃问题，为的是强调：在我看来，并不存在知识产权。

尽管如此，一个人长期以来不只是我忠实的助手，甚至还是我在精神分析方面这一特定教学计划的知情者；他却利用我的教导——而且已经利用很久——先在美国作大获成功的报告，后来又写进一本书[注3]，服务于与精神分析根基恰好相反的目的；而我的教导明确主张把精

神分析的教导重新奠定在其真正基础上。我刚才所谓“思想挪用”，指的就是这个。

> [注3] 保罗·利科：《论解释》，巴黎：瑟伊出版社，1965年。

我更有理由这样说，因为米歇尔·托尔先生的文章准确证明了这项令人愤慨的操作；况且，它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所谓“哲学”那种多少有些含混的总体调子。正因此，我刚才才迟疑是否要把米歇尔·托尔先生称为哲学家；他所进行的操作，与这个领域、这个场域里的惯常做法毫无共同之处。

他坚定、严密、毫不留情地区分精神分析解释与那个含混、松软的场域；我已经把后者标为我们时代一切骗术的特定场域，它叫“诠释学”。这一区分一旦确立，就真正成为我最希望从听众那里看到的操作；这里说的是那些以恰当方式听我的人，也就是听出我所说之话的效力的人。

就此而言，米歇尔·托尔先生的著作树立了一座界碑，一座本质性的界碑；今后我们完全可以据此界定，我谈论精神分析解释时究竟意在何指。

事实上，请回到我去年研讨班结束时提出的东西：科学的降临创造了怎样的处境；而这种降临之所以可能，是因为人们采取了一个立场，以某种方式使用能指，同时拒绝让能指卷入真理问题。若我们想到：

- 正是由此创造了这一处境；每一个受到这项根本改变触动的人，都从真理场域向科学提出问题：真理究竟怎样？

- 宗教恰恰在这个真理场域中作答；今天，任何哲学立场都无法消除这个出发事实：宗教与科学之间存在区分与彻底对立；

- 像怀特海[注4]那样试图把科学与宗教的领域划成两个不同领域，仿佛二者属于可能具有某种共同之处的客观性，是不可能、无法维持的；二者的差异恰恰在于，它们以两种本质上、根本上不同的方式接近主体的位置；

> [注4]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科学与现代世界》，岩石出版社，1994年，“精神与物质”丛书。

- 因而，如果我说精神分析恰恰是解释那些能指根系——它们把人的命运造成真理——那么显然，分析与宗教置身同一块地面，却与宗教在这个场域给出的回答绝对不相容，因为分析为这些回答带来了不同解释。

相对于宗教，精神分析处在一种本质上祛魅的位置。分析解释的本质绝不能在任何层次上同宗教对同一真理场域的解释混在一起。在这个意义上，我要说，米歇尔·托尔先生把这一点一直阐明到几乎把整套哲学传统——包括黑格尔辩证法——都抛入同一个需要祛魅的场域；他借此证明自己在这次场合是一个——眼下我只能用这个词，因为找

不到别的——弗洛伊德主义者。据我所知，配得上这个称呼的人屈指可数。

好了，我已经还托尔先生以公道，向他致谢，也借此机会向他提供一切可能适合他的条件，以便在任何属于我范围的地方接纳他的著作、以某种方式重刊它；我也已经请所有人注意它，要求每个人去阅读，而且我要说，逐行阅读。现在，我的天，我就试着稍微谈谈据说你们在等待的东西：这次短暂美国之行的印象——我在那里度过了二十八天。

尤其是以这样有些即兴的方式进入这段经验，也许不太容易。

首先，这里包含一些实践后果与计划；只有同最亲近的合作者商议过后，我才能加以说明，因为目前我只应向他们透露。不过，你们期待我谈的，毕竟还是在那里遇到的现实——比如精神病学现实，甚至大学总体上的现实。也许——为什么不呢？——你们甚至在等我的旅行回忆。

接触一个只对我而言是新世界的地方——因为我一直等到这把年纪才踏上那里——也许会引起某些人的好奇。我当然不会因为这次相遇就在你们面前扮演凯泽林。我立刻要说：经历了如此短暂的穿越之后，审慎与对实在的尊重首先命令我避免作出判断。

而且我向来根本地认为，旅行的益处在于：回来后，你会用另一种眼光看待自己早已熟悉、习以为常的东西。这才是旅行的真正发现。在这个意义上，这次旅行是一项重大发现；我还不知道自己在这里用另一种眼光看事情会走到多远，但我确定，这趟旅行在这一点上不会没有后果。该怎样说呢？

我对此的第一感受？下面要讲的是我的经验。你们看，我把它定位得很清楚。

这不是对美利坚合众国的判断。所涉及的是我在那里看到的东西，以及它突然预示：从现在起，我会在自己的论说中放下哪些东西。

一种倾向、一项提示……我不一定真会走得像接下来所说那样远。我试着用一句短话概括这种效应的起点。我仿佛遇到了一个过去：一个绝对、密实、可以用刀切开的过去，一个纯粹的过去；它越是从未存在，就越本质——既从未存在于眼下安放它的地方，也从未存在于它据说来自的地方，也就是我们这里。当然，这也许来自过度观光。

在纽约，我每个街角都遇到哥特式教堂，甚至哥特式大教堂——我说每个街角；去过那里的人可以证明这是真的。人们没有充分强调这一点，而事情就是如此。后来我来到芝加哥大学，结束在那里所作的六场报告。我十分坚持去芝加哥，因为它在我的历史中是个被选中的地方；那里曾暗中策划过一些非常有趣的事情，原则上本应从此剥夺我一切发言可能。

所以，我亲自把话送到那里，丝毫没有不高兴。

在芝加哥，我看见整所大学——而美国的大学，你们知道，非常大——完全以哥特式建造。一百来栋完美的哥特式建筑，我必须说，我从未见过更美、更纯粹的哥特式。可以说，它们造得着实出色。我向你们保证，假哥特式完全不逊于真哥特式！

我们知道，全世界大学的方法都仍然带着哥特时代的日期。

例如，索邦大学仍按照它诞生时——哥特时代——的方式组织。

当时，它已经以强烈、公开地反对一切可能新生之物而闻名。关于它认为应当谴责那位大胆的小小革新者圣托马斯·阿奎那一事，我们很清楚；最近我还提醒过你们。

我谈大学的哥特性，并不是说它始终停在相同原则上；它毋宁已经衰落。恰恰在哥特时代，人们极其严格地维持我刚才谈到的"两种真理"原则：从事哲学不是为了替宗教辩护，而是为了同宗教分开。

如今，我们已经完成了这种 mixing（混合），其结果当然仍在扩展。这只是重申我刚才所说的话。

无论如何，有一点确定：在索邦拥有良好哥特性的时代，它并没有以哥特式建造，至少不是以芝加哥大学那种完美的哥特式。这只是印象之谈。

当你们看到博物馆中堆满惊人而难以想象的印象派收藏时，也会有同样感受。它们仿佛被放逐、被囚禁，从19世纪末那片孕育它们的巴黎空气与光线中被抽走。无论一天中的哪个时刻、星期里的哪一天到访，都有成群妇女与儿童列队走过，仿佛进行某种仪式性参观；这些作品因集中在一起而呈现出一种无可比拟、撕裂人心的光彩。

仿佛那里正是一种辉煌艺术产品理应搁浅的地方；必须承认，在这种艺术涌现时，我们这里尤其轻视它。于是，我们那个厚重的过去又一次在那里出现；我要说，它以某种方式沉重地压在别的一切之上——而在一个已经存在得足够久、足以拥有自身文化大师的社会中，别的东西原本似乎应当诞生。

当然，偶尔也会有一些小小嫩芽。我不能向你们隐瞒：看见一间公寓完全用那些自称“波普艺术”的创造性发热所冒出的微小样品布置，让我颇为满足。房主靠经营出租车发了财，事实上也是最早资助这一群体的人之一；当时这些投身某一语域的人还散落各处，他就在这里那里给他们两百美元。

我不想向你们描述波普艺术的原则、面貌、风格，或它散发出的东西。我要说的是，这个人待在那里，把整间公寓、陈设、墙壁全部用波普艺术作品的成果装点起来；他向我作了一番很长、很像推销的演说，解释自己怎样发现、帮助、支持波普艺术。我觉得这格外可亲。终于有某种艺术在我看来同支撑它的社会发生了关系。

可惜，当我把这番体验告诉在纽约遇见的那些十分高雅的人时——我没有刻意追求悖论，因为这段经验确实让我十分快乐——我感到某种保留。人们以奇怪的眼光看我。

我的意思是，人们怀疑我是不是把玩笑开得太过，因为眼下波普艺术似乎已经——而且早就——退入幕后，连它的继任者“欧普艺术”也是如此。

总之，我刚才所谓过去的支配性，已经由这些场域得到说明——我是在即兴发挥，说得太长了，请原谅。这些并不是严格意义上令我们感兴趣的场域；也许因为我不想说得太多，想谨慎对待自己终究只了解得不完善的东西，而且我的了解必然来自那些更希望某些事情发生变化的人。他们希望改变我们所谓“心理学教学方式”，甚至改变医学中的心理学，以及精神科医生的地位、生活方式与习性。

> “归根结底，这太不可思议了，”我采用一个同我交谈者的原话，“精神科医生在那里生活得多么轻松；真不需要费什么力气，就会有患者上门。”有人这样告诉我。

随后有人向我举出几个并非无名之辈的名字；我很可能把以下言论钉到他们身上：“我的天，为什么要提出问题？尤其为什么要提出哪怕稍稍‘形而上学’的问题？归根结底，一切都如此顺遂；下午五点半结束工作，喝威士忌，读一本通常是间谍小说的书，然后坐到电视机前。”

我看不出为什么要责备一个“社会阶层”享有自己的便利；我们只须察觉，这种便利当然可能包含何种惰性与安顿。

不过，不管外表如何，不要以为一切只停留在这个十分特殊的底层上。这个底层也许可以说是那些“摩天大楼”、那种纪念碑式垂直性的反面；奇怪的是，垂直性恰好由银行独享。在它旁边，还有一个完整的水平世界，正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阶层所居住的地方：一个无穷世界，一片两层小房子的海，完美仿照英式风格。大量人口在那里生活，并享有——我的天——一切可以称为生活舒适条件的东西。我们有时感兴趣的恰恰就是这些人；我受邀像朝圣者、或者如果你们愿意像拓荒者那样，在他们中间移动。

我途经底特律；这座城市宽25公里、高18公里，所以开车穿城寻找一家好餐馆，仍要花相当长时间。何况市中心由一个高速公路枢纽构成。在这片高速公路网内部，就是我所谈的林荫道与无数小房子。我进入的房子——鉴于我所见人群的阶层——当然陈设精良，而且堆了相当多来自世界各地旅行的艺术品；如你们所知，这些有兴趣的人物旅行很多。

这就是我刚才所谓怀旧惰性的风格及其补充；那又是一个奇特的过去。我回到这一点，因为它让我形成这样一个问题：必须界定过去的一个维度，它在本质上、根本上不同于我们在“重复”名目下感兴趣的维度。

这里是一种重复丝毫不介入的过去——我遇见这个非凡的过去时，确实产生了类似感受：它是一个没有任何重复底层的过去。我向你们保证，也许正是这独特、惊人、令人震动的一面，让我至少感到它是一团绝对无法搅动的面团。不过，这并不意味着我在那里没有遇到许多对话机会。在六批听众中，具体说……

- 我一到那里，先在哥伦比亚大学；
- 麻省理工学院；
- 哈佛大学认知研究中心；
- 底特律大学，我在教授委员会前发言；此前先举行一种仪式，也就是在一间十分舒适、但没有任何葡萄酒饮料的房间里吃午餐——这并非美国独有；
- 55公里外的丹港大学，那是一座城市——我刚才也谈过芝加哥大学；

对芝加哥大学而言，“城市”只是比喻；对丹港大学则不是。约三万名学生在那里流动、生活，整座城市几乎专门用来接纳他们。

- 最后是芝加哥大学。……这些地方的听众构成比例各异：
- 有的语言学家与哲学家更多，
- 哥伦比亚大学的医生很少，
- 但芝加哥的听众几乎全是医学界人士。这是因为我朋友罗曼·雅各布森联系了大学的某个部门；我现在要在这里向他致敬，因为整项事业都是由他发起并组织的。

好吧，我必须说，对我认为应当阐明的东西——也许没时间让你们了解其内容——这六批听众作出的回应，是我收到过最切题、最有趣的问题。各专业的教授热情接待，以迷人的方式款待我；一整天里，或在会面、晚宴及其他聚会中，我都有机会同他们进一步说明。

我感到，他们对我带去的东西十分开放，尽管那些内容在他们听来无疑是全新的。我这里谈的是大学环境；在那里也和别处一样，我把所谓 highbrow、上层知识界排除在外——至少就我而言，它局限在纽约遇见的人群中。

因为在纽约，我的教导也许尚属全新——大概不会永远如此——但绝非不为人知。正如人们肯定已经多次告诉过你们的，纽约不是美国。纽约人完全知道我们这里发生什么，也没有忽略我在其中占据的那个小小位置。

回到我同美国大学的接触：我的感受——也得到对话者确认，他们告诉我应该和不应该期待什么——是存在一个十分广阔的场域；在许多地点，你们能够吸引注意、建立联系、发展接触，而这些接触会得到延续、记录与发表。

我带回一些严格说来属于大学内部的期刊样本，甚至已经在路上十分兴致盎然地读过；其中有各式各样的出色文章。可以说，一切都有待去做。

也可以说，什么也做不了。因为尽管如此开放、接纳，甚至成功，但至少目前普遍的感受——我说的是对话者的感受，不敢擅自说成自己的感受——是现有平衡绝不可能发生任何改变。这个平衡给每个人留下了足够的活动余地：只要一个人能带动足够多的合作者，就肯定不会受到工作上的阻碍。于是，一切都安顿在一种生命共存的并置中；至少眼下，它似乎排除了任何类似潮流逆转、回流、潮汐返回——随你们怎样称呼——的根本变化。即使人们渴望风格更新，尤其在令我们、令我感兴趣的精神分析教学地位方面，也是如此。

不过，在这“一切都有待去做”与“什么也做不了”之间，目前我的倾向无疑是——我的天，哪怕只为接受一次挑战，而且世界并不只有北美合众国——仍要至少以出版的形式在那里做一点事。至于我的计划，我将只告诉最亲近的学生。

我是否还要用两句话补充、透露一点？在这次几乎只是小小 trip 的小小 travel 中，我最后为个人乐趣留出八天。原本计划前往美国西部，后来却改变计划；我突然无法抵抗附近那个对你们有些人来说充满魔力的国度——墨西哥——于是去那里待了八天。

现在我不详细谈它。我在那里过的完全不是传教士生活。

必须承认，只是游客生活，除此之外什么也不是。不过，我所看到的东西在两点上触动了我。

人终于看见——看见什么？——某种确实属于古代宗教的东西，必然会深受震动，因为我们刚才正谈过宗教。那些面孔始终在那里，绝对没有改变；这些印第安人的脸孔，甚至我敢说他们的目光，始终相同——无论是在酒店走廊里轻步侍候你的人，还是住在公路旁茅草屋中的人。他们的面孔与我们在玄武岩或花岗岩中凝固看见的面孔完全一样，与我们从其古代艺术中捞出的那些漂浮碎片完全一样。这些印第安人与纪念碑上那些被不恰当地称为图画文字、表意文字或别的名字的东西，似乎仍维持着某种关系；更合适的称呼是象形文字，它们也并非总能解读。与此同时，当代画家或建筑师重新采用它们……

……例如在芝加哥，一座超现代图书馆的墙上，四面外墙全部以这些能指形式的残片——我们可以这样称呼——装饰……借此传递的东西，在我看来既神秘，又因一种不可见的联系而同样令人震撼：尽管发生了无法挽回的断裂，这条联系仍延续在正在成长的世代、那些挤满墨西哥一所大学的学生——我要说，这是我见过最庞大的大学——与这些符号之间。这些符号所联系的东西已经永远断裂，却仍在那里，以可见方式表达一种保留下来的关系。因为面对各位听众，我只能这样称呼它；这种关系指向我们从古代祭仪所知一切中极其可感的

东西。最初的征服者除了一阵恐惧之外对此一无所知；它无非就是……

- 到处可见，
- 到处在场，
- 以各种神祇形式，像坠饰一样到处悬挂的对象(a)。

之后我们无疑——也许！——还会提到它。我也许有机会把它作为一个简单的边缘性例证提供给你们；但就我将继续谈论的东西而言，它无疑并非没有意义。

好，在这一切中，我不必再向你们指出自己认为这里会勾勒出何种后果。

在多年教学生涯中，我费了极大力气，才让一个并未特别准备好接受它的环境接触到若干信息，尤其是语言学场域的信息。

很久以来，你们已经感觉到我对此略有怀念。结果是，经过十五年教导，我也许比别人稍早一点让自己所处理的这个小圈子闻到了某样东西的气味；如今它已经自行在每个路口、每个街角疾驰，冠以一个多少还算恰当的名字——“结构主义”。这个词很快甚至会变得无法清理，因为它将被包裹沉船残骸的各种贝壳附着物彻底覆盖。我们真正需要做的，是极其、极其彻底的清理，至少得说清楚“我们的”结构主义是什么。

我还曾努力提醒你们科学诞生及演变的条件，以及这件事对我们何以具有决定性——让我们把自己构想为受它规定。必须说，在美国我颇

为惊讶地发现：我的计划、研讨班内容的一大部分，已经以小图表形式铺在十来米长的墙上；当然，没有人抬眼去看。这些图表十分明确地标出科学分类中的日期、转折点，每一行都解释得极好。如果我必须说……我必须说，假如我在那里教学，它们会替我省下许多麻烦。归根结底，这些东西全都已经进入平装普及本的层次。

这里正体现了我会从某个角度称为“撤空过去”的做法所具有的意义与重要性；只要我们看清过去自身的维度，就能做到这一点。至于它的惰性一面，完全可以留给铲土工去操持。必须说，这丝毫不是despise、不是轻蔑的视角。恰恰相反，其中最确定地显现的，是它如何释放出我们自身的本质。因为一旦纯粹状态的过去在那里以地方性的方式、以完美形式实存——我刚才已经用芝加哥大学的建筑向你们证明：它实存得比过去曾经实存过的还要完美——

印象派创作在那里像琥珀中的苍蝇，具有一种它在我们这里从未有过的雕像般完美。相对于这个仿佛就是“我们”、而人们把我们从中解放出来的过去，我们自身仍有完整一面被留下；那确实是如今的我们，却只是这个过去的失败版本。要看它被推到漫画式夸张，就还得去墨西哥；在德尔普拉多酒店，站到一幅与我们这间房整面墙同样大小的壁画前。这是迭戈·里维拉的作品，题为《阿拉梅达中央公园一个星期日下午的梦》。

阿拉梅达是墨西哥城某种类似杜伊勒里花园的地方。我们在这幅画板上呈现出的形象——我不打算描述；请找来照片看看，非常有启发。



因此，我认为前往美国、也前往整个高贵美洲大陆能够让我们学到的，是过去一切失败之物的形象；它仿佛是对某种从未真正活过、因而也绝不可能以任何形式真正活出的东西产生黏附之后，所形成的逆向形象——只要我们还允许自己产生某种属于希望、活力与创造的运动，事情就必然如此。

经历这样的接触之后，留给你们的，是一个真正压倒性的印象：要在我们的世界里抬起的东西何其沉重。

我对他们谈了什么？可以肯定，我严格说来没有给他们上研讨班。

不过，我扎根的某种风格不可能一下子折断。正因为我已经养成一种抓住听众的倾向、习惯，甚至需要，我才——必须说，令我自己惊讶的是——无论如何也无法下决心用法语对他们讲话；而奇怪的是，我竟真的做到了用英语对他们讲话。

我习惯从你们脸上追踪这番言说的特殊效应；面对那些听众时，我的体验似乎没有太大不同。那些被吸引、即使谈不上被照亮的脸，让我确实觉得：这种英语并没有糟到让他们无法听出一种得到论述的语言。就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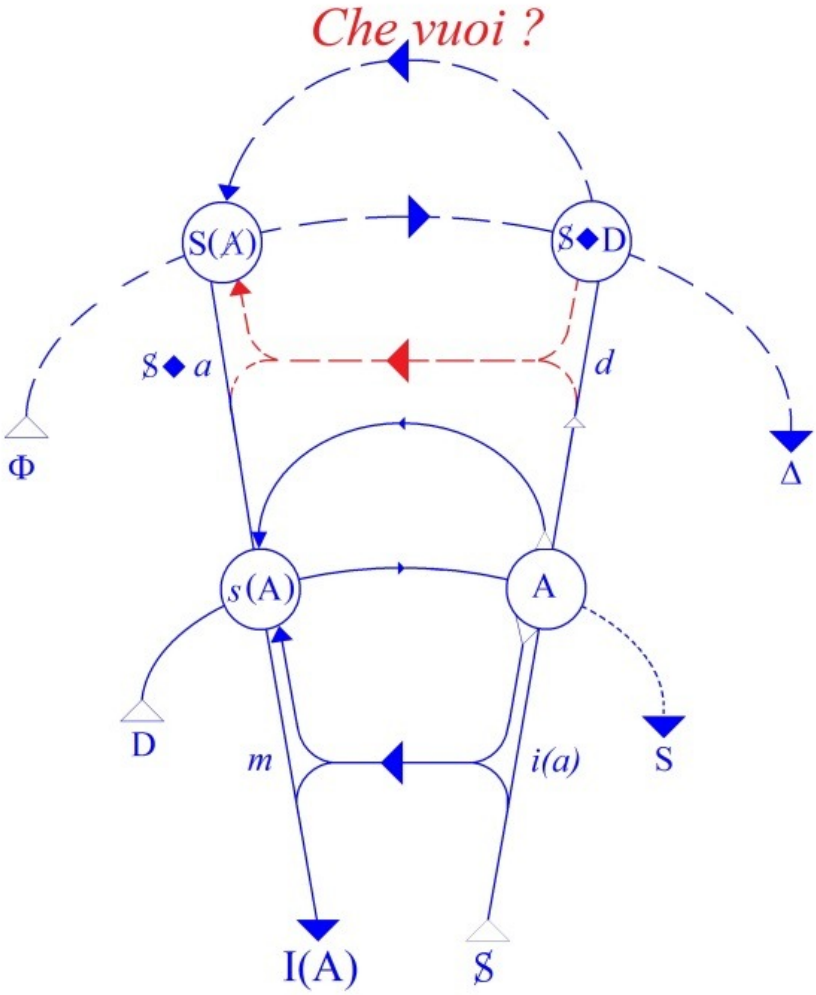
于是我对他们谈了——我们马上就要结束，我用两句话告诉你们——我必须让人听懂，因此把内容稍稍集中在某种在我看来有冲击力的东西上。况且，你们明白，我眼下正沉浸在自己的对象(a)中；我试图在路上一点点把它带给你们，把它塞进若干只袜子，再看它会以某种方式从哪里钻出来。以后再看；下一次我们会重新拾起它。

我必须回到基础。归根结底，这也让我能够把这些基础重新汇集起来。当然，我并没有任由它们漂流。不过，为什么不呢？这也许让我取得了一种更集中、更简单、更有冲击力的论说尺度，尽管我对你们讲的东西从来不缺锤击。

也许最后我会把它编成一本小集子；既然它是按照美国人的耳朵衡量的，或许会相当适合美国听众。

好，我认为应当从一个仍然很可感、很容易让人听懂的特征出发。当然，对你们来说它并不新鲜：索求与欲望的区分。我刚才还夸口说自己让他们听懂了；用英语讲话时，我当然只能采用较少的词汇和句法细化。不过，要让听众明白一件事很容易：当别人向你们提出某种索求时，必须当心——对方索求你们给出的，未必就是他欲望你们给出的东西。

只须有最少的一点经验，只须交过一个女朋友，这个真理立刻就能被察觉；随后，你们便可以进入结构性的思考。是的，因为从这一刻起，当然可以表明：必须从索求中提取欲望；随后还有第二个时刻，即索求在无意识中得到论述。这里只须参照我一向提醒你们的真理，简单地翻开弗洛伊德最初几部著作即可。



归根结底，即使面对美国听众，也并非不能引入我那张图右上角的公式：$\not{S} \Diamond D$（被划杠的主体同索求的关系）；主体的分裂恰恰钩挂在这里。

这当然是在弗洛伊德引入无意识与前意识之分裂的同一平面、同一层次上，重新安置主体的分裂；消除其著作开端同最终落点之间的距离。最终落点就是他所谓 ego 的 splitting，也就是主体的 splitting。由此可以表明，例如，弗洛伊德所谓“无意识中矛盾原则不起作用”的评论，只是初步接近；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并不恰当——如果它竟意味着无意识中不存在否定符号。因为我们都知道，只须阅读弗洛伊德本人的文本就知道：否定——我不说“在无意识中”，那没有意义，而说在无意识形成物中——具有完全可标定、清楚的代表项。

所谓无意识层面上非矛盾律的悬置，无非就是主体的这种根本 splitting。

我的报告还把另一样东西放在前台。它紧随对索求与欲望之差异的接近，如念珠的一颗紧接另一颗。这就是标出某一点——也正是我刚才谈知识与真理之关系时从中出发的交会点：弗洛伊德带给我们的，是标出一种特殊欲望的作用位置。性欲正通过这一点，作为根本之物进入有待界定的领域；这个点叫作求知欲望。

正因为性欲首先经由求知欲望介入，弗洛伊德动力学所涉及的欲望才是性欲望。正因为性欲以宗教精神早已——并非没有理由——标定的形式介入，正因为弗洛伊德把 cupido sciendi（求知欲）安置在恰当位置，伦理的整个动力学才发生改变：

- 其他欲望——享乐欲望与支配欲望——显得不在同一层次；
- 支配欲望处在一种依赖位置，因为它位于自恋层次；
- 另一个，即享乐欲望，则恰恰向我们显明我所谓欲望的双重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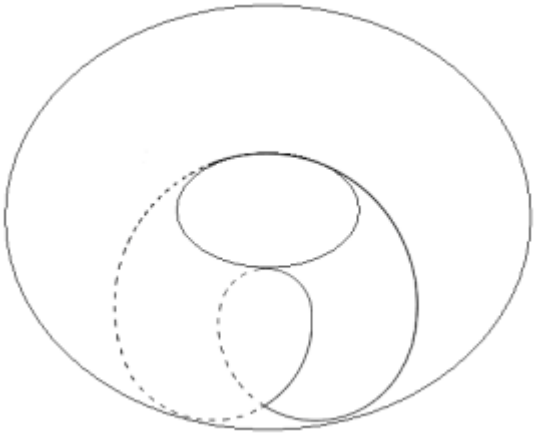
因为欲望远非享乐欲望；恰恰是欲望构成一道屏障，使你们同那个燃烧的焦点保持一段多少得到恰当计算的距离。对思考的主体而言，本质上必须避免的那个焦点，叫作享乐。

我要不要进一步告诉你们，我已经向他们开启了接下来将向你们阐述的下一步？

也就是说，我当然从开头便不得不谈大他者的场所——真理的位置点；索求的真理在这里受到追问，欲望维度也同时在这里显现和涌现。考虑到这一点，我已经开启了刚才所说的后续论述。它要精确说明：我最初通过“欲望首先是大他者的欲望”阐明了欲望的场所；拓扑将教我们使一种特有的翻转发挥功能。我将试着在上次向你们展示的层次使这种翻转显明：在环面结构层次，它就像翻转一只手套一样可以实行。如果欲望必须依据大他者的索求来标定和衡量，那么，结构——环面结构——将让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完全……的结构基础。

相关知识卡 环面中的要求重复与欲望客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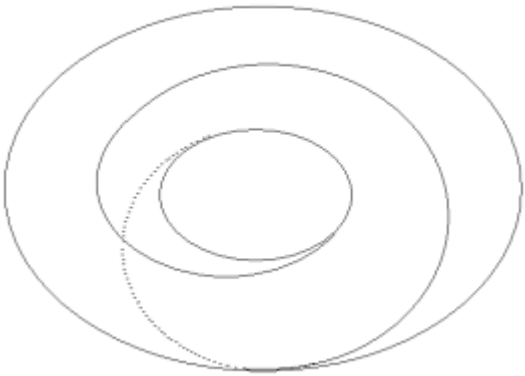
如果我说它只是由环面结构“说明”，那就低估了它：它由环面结构支撑，环面就是所涉及的欲望结构之实体、ὑποκείμενον［hypokeimenon，基底］。环面能够清楚显现——下次我会用粉笔的最后一截向你们画出来——其中以最清楚的方式铭写了支撑欲望同某种东西的关系：不是同索求，而是同重复的索求或双重索求的关系。而这幅图，恰恰就是我在这里画给你们看的：



2D + d。环面结构的翻转可以在你们眼前显明、具体化能够从中得到的东西……

……我们将依据其他拓扑结构——交叉帽与克莱因瓶——发生翻转时的情况，来看“翻转”意味着什么……完成翻转后，我们得到两个欲望同一个索求的关系。

相关知识卡 环面中的要求重复与欲望客体



2d + D

欲望相对于索求的这种双重性，位于分析场域中一切东西的根部，一直延伸到人们含混地称为矛盾情感的东西；只有在这里，矛盾情感才可能找到根据。下一次我会有机会更充分地展开。你们已经看出，所涉及的是一种切割的功能；在我将从这个角度重新讨论的三种形式中，都是同一种切割形式——我称为 S 或反转八字的形式——为我们提供钥匙与形态，但它们各自具有不同功能。

总之，最后概括我首先试图让美洲听众听见的东西：在迄今所谓心理学场域中，可以分离出一个领域；它能够被规定为语言场域，以及言语在这一场域中的效应。这个效应可以界定：它就是主体的功能。主体功能并不像我最近看见有人所写的那样，是缺席的功能；恰恰相反，它是某种隐匿之物强烈在场的功能。

这把我们带回弗洛伊德式无意识的基础。我今天就说到这里；下周开放研讨班再见。

迭戈・里维拉





第13课 · 1966年3月30日

我提醒上次不在场的几位：学校行政部门托我请你们不要吸烟——不要吸烟，亲爱的阿兰。这是学校行政部门的要求。

上一次，我首先根据自己当下能够讲出的东西，谈了美洲之行。我想，这个主题还会在后续论述中继续结出成果或后果。今天，我们把它彻底搁在一旁——后面听得见吗？不太清楚——所以今天不再重谈这个主题。

上次我谈的不止这些。至于我说的其他内容，我发现自己让某些人——姑且这样说——陷入窘境，甚至可以说引起了一点震骇。事实上，我触及两个点。第一，因为米歇尔·托尔的文章，我谈了几句剽窃，结果有人向我表示惊讶。

“怎么会，”一位最出色的听众问我，“你怎么能像自己所说的那样，把剽窃看得如此无关紧要？”

然而我只是重复了自己很久、非常久、从来都在说的话——从一开始就跟随我的人知道：思想没有所有权。

“可你自己看起来不是很在乎别人向你致以你应得的敬意吗？”

我认为这里有一点需要澄清：一个人为连贯论说的流通带来新东西时，确实应当向他致敬——不只是向我，而是向每个人。然而，这种致敬只能从历史角度进行，而且必须限于历史范围。

讲授数学时，谁会想到把课程中每一项论述的首创者一一放回原位、逐一归还其应得之物？这一切都已经被吸收、重新整合、重新拾起，并视情况得到一般化或特殊化；而这一过程完全不必参照某项证明或形式首次进入流通的时刻。因此，我要把重点移到自己用一个未必十分恰当的词称为“挪用一场思想运动”的东西上。那是完全不同的事情。

当一种论说正在形成，而它具有征服性，直说吧，具有革命性——我们今天知道这类论说在哪里形成——若有人重新取用它的操作、甚至材料，却把它导向该论说明确要与之区分的目的，那么至少有必要把这些论说要素归回其取用与创造之处；在那里，它们被导向一个得到完美论述、清楚明确，而挪用者正想破坏的目的。

如果分析是一项参照科学而持续的操作，如果科学的实存以一种完全定向的方式重新提出真理问题，那么分析就把这一追问推至最大限度：推至一种最小限度的狭窄，而这恰好对应它所瞄准的东西——它所追问的是科学。

如果关于真理问题必须由宗教作答，为什么不公开说出来！但这样一来，就不要再以哲学家的位置自夸；直到今天，哲学家的位置从未改变过，恰恰始终与宗教回答区分开来。还从未有人敢把弗洛伊德变成宗教辩护士。

在这项操作仍在进行时，某个人不承认是我教会他阅读弗洛伊德，却把这种阅读的作用引向精神主义思想的迷惘沙洲：严格说来，这不是一个作家偷走同行某段论说的不诚实，而是一个哲学家的不诚实。

严格说，这是哲学背叛。我不会赋予它某种宏大性，仿佛它揭示了哲学立场本身从某一刻起可能具有的根本不诚实——如果哲学立场忽略精神分析在多大程度上更新了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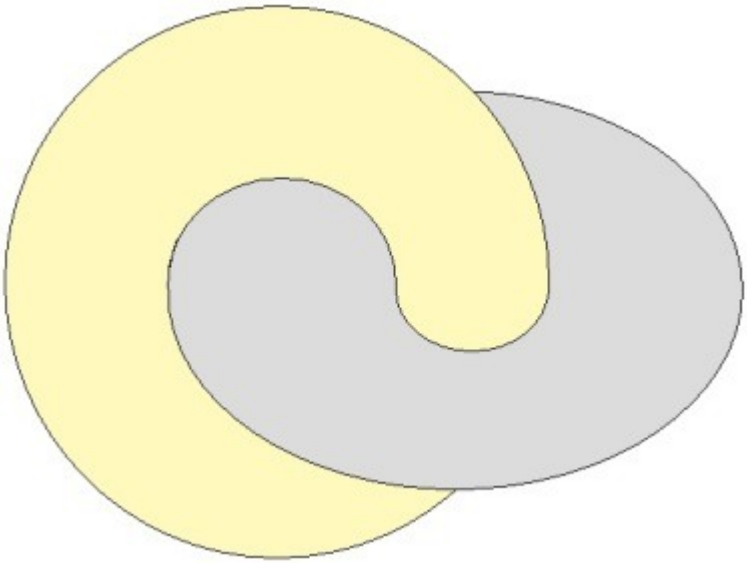
在这个案例中，它只是一种软弱的不诚实、绝对缺乏严肃性、纯粹的炫耀欲；为此我要感谢……

……托尔先生，因为他证明了这种做法既无效又可笑。随后，我还谈了另一些刚刚开头的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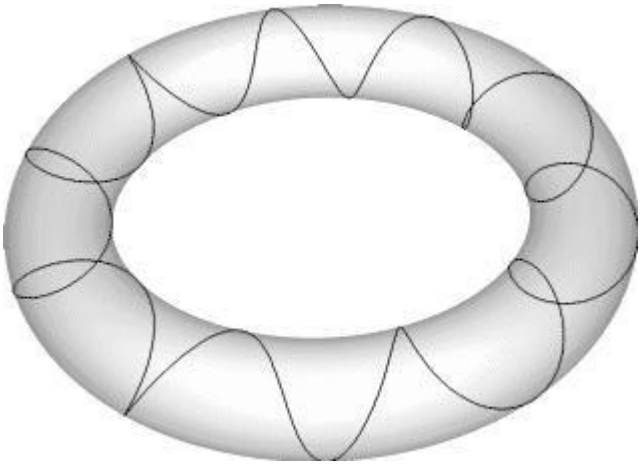
我谈到“翻转”，借此引入今天要在拓扑层面向你们讲的内容。我的天，结果有些人被这次“翻转”稍稍翻了个个儿。因为事实上，词语在特定语境中具有分量；而我们在这里再次被带回词语的使用，而不只是观念的使用。

拿一个词来支撑论说的某个结，并不是无害操作，因为这个词也许已经被另一个论说采用。这是同音异义功能的另一个层次；在某些情况下，它确实可能随身携带若干后果。

我围绕环面的图形揭示——或者更准确说，再次引入——这种翻转。我原以为可以讲得相当快，因为至少有部分听众大概还记得1962年末的内容。那是1961—1962年关于“认同”的研讨班；我在那里揭示一元特征与切割的根本功能，并已经引入今天将要讨论的不同拓扑形式。确切地说，1962年5月30日，我围绕环面明确展示两个场域如何得到论述：如果你们愿意，它们就是两个彼此嵌套的环面，如这幅图所示。我还详细说明，一个环面在另一个环面上滚动时，一方所画的一切如何能够在这种滚动中完整地摹印到另一方；这种可能性可以通过推演得到证明……



这里包含如下结果：我曾说明接下来这道切割的重要性，因为那恰恰是我整整一年反复坚持的东西。我们学会把它翻译成一条围绕——可以这样说——环面身体运行的路径；这就是索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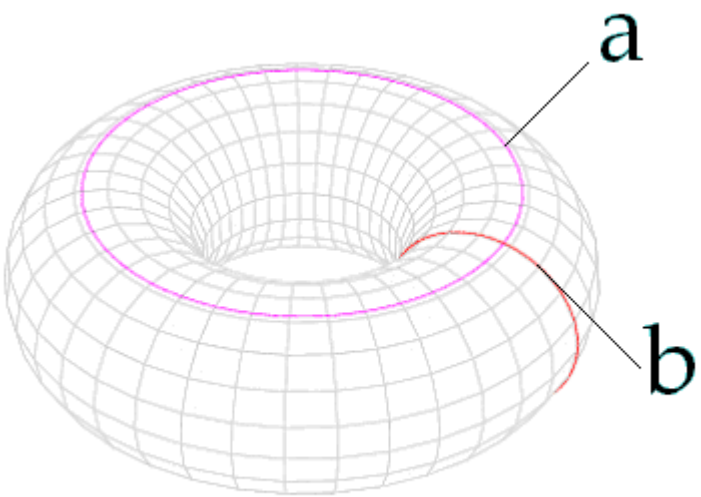


这种索求以同等形式重复时，如何必然只能通过……而形成？

我采用形象而简单的说法，好让那些未必熟悉真正数学形式的听众听懂；数学形式本可以给这一点以严密性……可以说，它必须绕过这个“中央孔洞”。这是环面的根本拓扑性质；它把一道谜带进环面的外部：相对于环面内部，这个外部竟包含一个内部。或者更严密地说，它允许环面内部的闭合回路同外部的闭合回路彼此成链、相互套结。

我来说明一下。看，我换一种颜色画：这是内部的一个闭合回路［b］；你们看得出，这是一个环面。

可以在外部画一个闭合回路［a］，让它同内部闭合回路套结：



在那个自古以来充当内与外之思想模型的拓扑形式——球面——中，这严格不可能：无论你们在球面内部画出怎样的闭合回路，它都绝不会同外部闭合回路套结。

这一拓扑形式长期以来一直支配全部思想构想，例如它仍内在于逻辑中欧拉圆的使用。我在你们面前推进这些拓扑新形式，其意义恰好在这里：向你们表明，怎样运用它们来解决我们经验的拓扑给我们提出的某些问题绝路；这些问题在新的拓扑形式中找到支撑与解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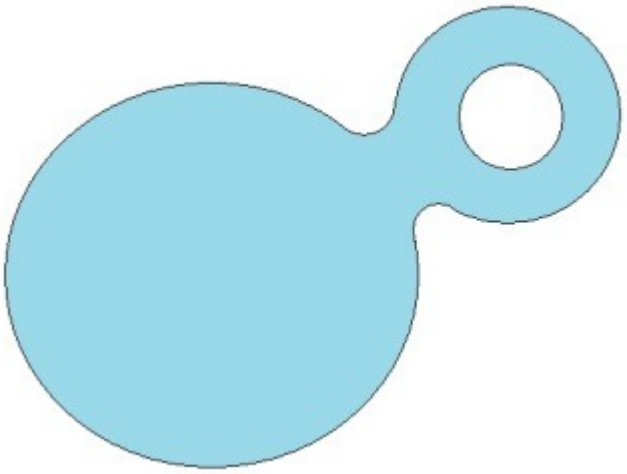
这种翻转确实是翻转，很容易看出来；我现在就说。

把它画成我接下来要画的样子，似乎不过是数学游戏。

尽管如此，它仍保有全部意义与重要性。由于我无法轻易把它插进后续论述，现在先直接把图像给你们。请只把它当作导言；接下来的论述会更连贯、更充分。

在这个环面里，所涉及的不只是另一个能够把第一个环面上铭写之物摹印下来的环面。

从拓扑学看，一个环面完全等价于在球面上插入一个拓扑学所谓的“柄”。



你们清楚看到，借助某些手册所谓的连续变形，环面、柄与这种封闭钟形物完全是同一回事。从这里起，只须赋予“翻转”一词直观意义，你们就很容易理解使用它的正当性。这个直观意义唤起操控、动作与手，并非毫无缘由；甚至德语中指称这种处理的 Handlung 一词也包含 Hand（手）。我们由此得到的益处，即使不能完全消除“直观”一词中视觉的支配性，至少也能使它后退。

斯多葛派已经感到这一点的重要与必要；你们有些人知道，他们怎样使用张开的手、合拢的手、拳头，甚至正是手所形象呈现的翻转。这里严格说来参照的是与手之使用相连的翻转，是覆盖它的皮肤之翻转；直说就是翻转手套。右手手套翻转后变成左手手套；更准确说，它变成这只手套在镜中的意象，因为手套的镜像属于相反的种类。这就是我们重视“翻转”一词的出发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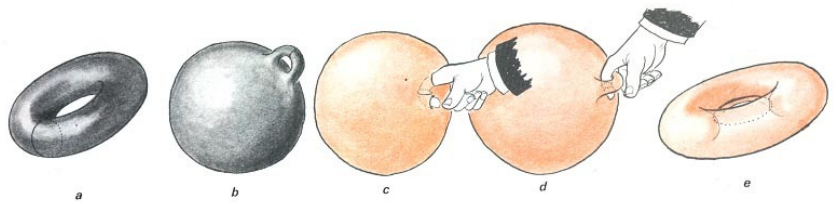
不要忘记，恰恰是这个直观例子迫使康德[注1]为其先验感性论设置某些锚点。眼下我不再停留；请查阅《未来形而上学导论》[注2]中——如果我记得没错——第十三节。你们会看见它的重要性如何进一步扎根于莱布尼茨与牛顿围绕空间本性的整场讨论。

> [注1] 伊曼努尔·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2006年。
>
> [注2] 伊曼努尔·康德：未来形而上学导论，巴黎：弗兰出版社，1968年，第一部分，第13节。

至于这个带柄球面，它放在这里——尤其以这种形式——只是要让你们感受到：环面同手套这类任何具有球面同调的支撑一样，都可以翻转。

因为你们清楚看到，就拓扑而言，手套与球面并不不同；只须向这只橡皮囊吹足够多的气，就能看见它化为球面形式。

环面同样可以翻转。为让你们立刻看见，只须从任意开口伸手进去，钩住柄的内部，观察发生什么。这就是我为了伸手而打开、现已翻转的球面。



你们在这里看到，球面上有两个孔洞，同时勾勒出一个看似“内部的柄”。

我要把手指伸进这个内部柄。与此同时，你们大概会立刻感受到：拉动这里，一个外部柄就产生、重新产生。球面上无法插入内部柄；任何柄始终都是外部柄。

它与第一个柄——这里这个——的唯一区别，是它相对于你们沿矢状轴显出轮廓，而第一个沿横轴显出轮廓。换言之，它们像前面两个环面一样，彼此处在四分之一转的位移中；不是试图以平移再现等价物时的半转，而是四分之一转。这个四分之一转十分重要，因为任何镜像平移都无法将它消除。

然而在环面层次，仍有某种东西不会立刻显现，无法使我们摆脱一种特殊可能：翻转——以正面替换反面，反之亦然——会再生产镜像形成。可以说，除去这个四分之一转，环面的翻转意象从拓扑观点看来并非真正、根本不同；它在某种意义上仍给出一个镜像等价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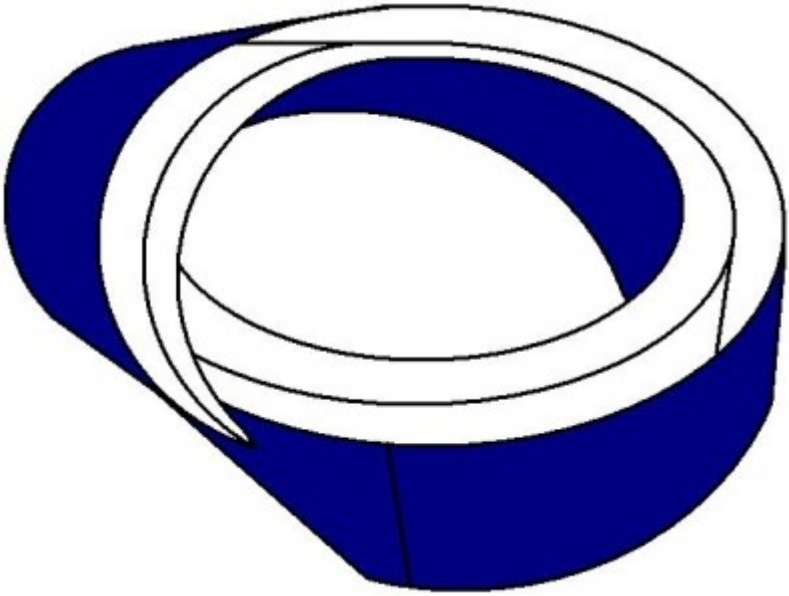
我重复一遍：差别就在这次四分之一转。把环面同其家族中的其他拓扑形式放在一起，我们会更清楚地看到：就同镜像的关系而言，这个四分之一转已经把环面同一切具有球面同调的曲面分开。现在我们详细来看。不过，为了不因展开这些区别于球面的拓扑面貌所共有的力量而降低你们的注意，我立刻把问题具体呈现出来。所涉及的是摹本同镜像的关系。只须回想我已经在你们面前充分操作过的莫比乌斯面或莫比乌斯带，就能同时记起过去讲过的东西，以及它今天怎样进入我的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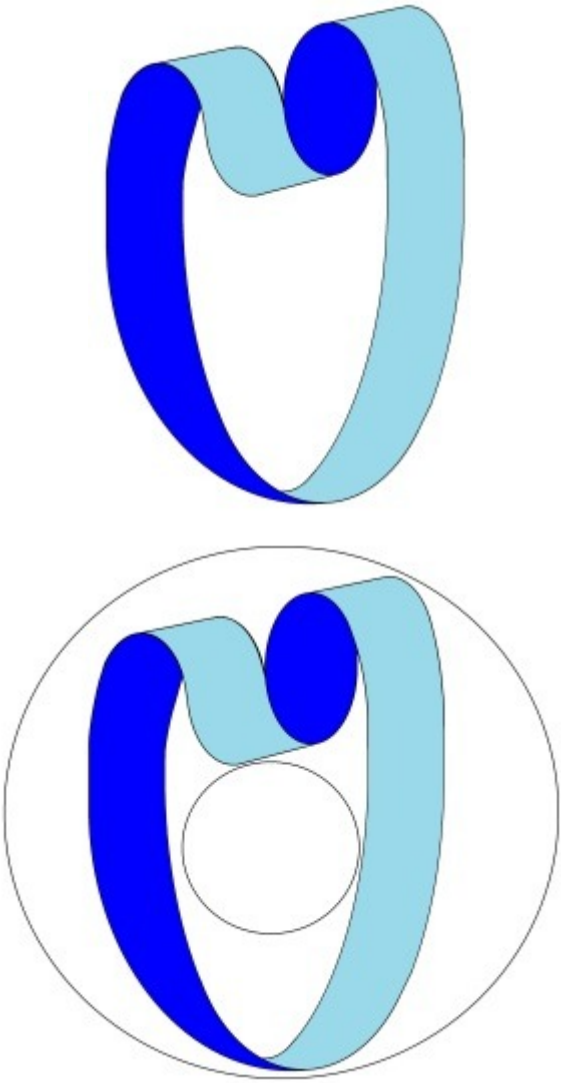
如果把一条带的两端在半转后连接起来，就得到莫比乌斯面；如果结果如我当时所说，是一个单侧曲面，你们就能记起两年前我在这里讲过的话。[注3]

> [注3] 1964—1965年研讨班“关键问题”，1964年12月9日场次。

也就是说，要覆盖这个曲面、制作它的等价物和摹本，必须绕它两周。从某一点或这条横线出发，绕过一周后，你们会来到出发点的反面；必须再绕第二周，摹本才能同出发的那条线重新接合。

因此，你们将得到一个贴在原曲面上的摹本；它具有若干性质。首先，快速说来，对我们而言它比原曲面长一倍；其次，从拓扑观点看，它与原曲面完全不同。





它既不同胚，也不同伦，更不同调；因为它不是在半转、半次扭转后同自身接合，而是在完整扭转后同自身接合。其效果可以通过一个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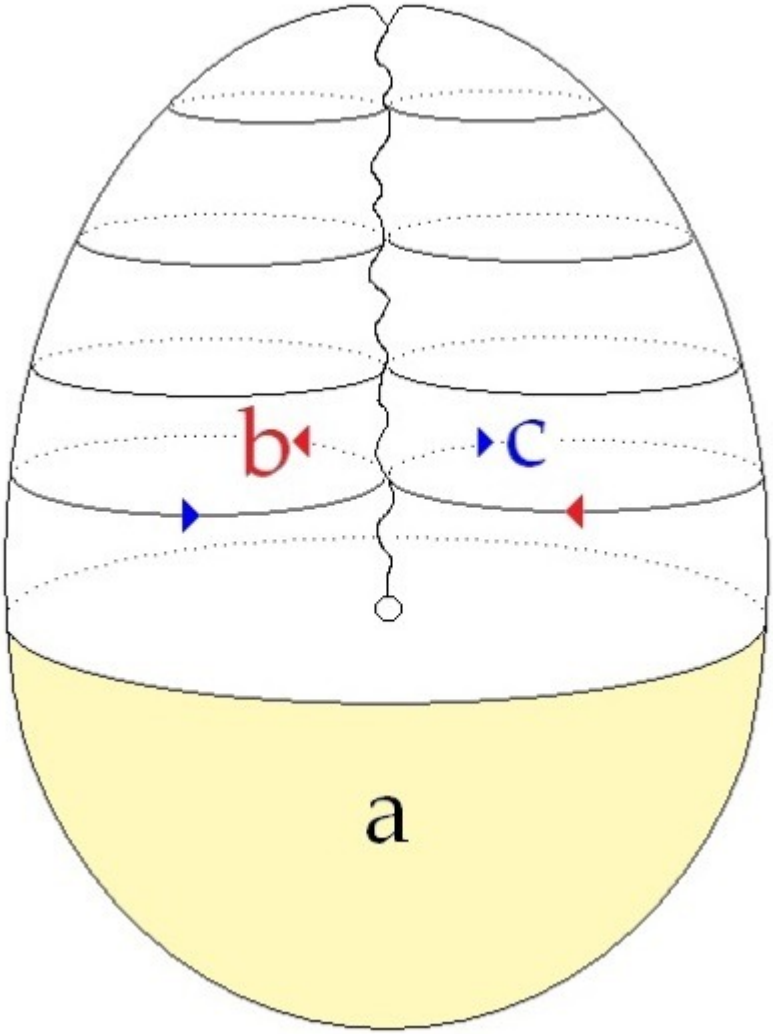
易重复的动作来呈现：我已经多次做过——沿中线剪开这个曲面。得到的是一种双重环路，以一种十分特殊、仍有待精确说明的方式接合；它不是任意方式。不过我已经告诉并展示过，它具有一个性质：能够贴合在环面曲面上，准确再现双重环路，以及中央孔洞在这条环路中的包含方式，也就是这里所示的方式。彻底的摹本与出发曲面之间的这一差异，正是我在谈对象(a)时说“它不是镜像性的”这项区分的根据。

相关知识卡 交叉帽、内八字切口与不可镜像化的对象a

你们知道，对象(a)对于莫比乌斯带，恰恰是：

- 补全它并支撑它的东西，
- 闭合莫比乌斯带、从而给出那个完整曲面的东西；这个完整曲面有一些正当名称：

有时叫射影平面；或者更确切地说，当我们把它表示成……我多次在你们面前把这一构造画成这个形状。你们知道，它显示了在这个橡皮囊下部［a］鼓起的曲面如何同自身交叉：这里的曲面从后方经过［b］，那里也从后方经过［c］。



……这叫作交叉帽。它的上部——或者更准确说，当我们像图中那样截去下方球面部分或球冠后——剩下的这一部分就是所谓的交叉帽，也叫主教冠。

如果你们愿意，就这里画出的这个形状而言，我们把整个图形称为“戴主教冠的球面”。

如果你们允许我稍加想象，这便使达利笔下那些死在卡达克斯海滩上的主教形象具有一种奇特的当下意味。还有什么能比一位化为雕像的主教更优美地表现这里同我们攸关的东西——欲望？达利仿佛已经猜到了这一点。

若干拓扑功能具有一种一般性质：它们以某种或显或隐的区分呈现。我想，我已经在莫比乌斯带层次让你们把握到这种区分何以不可回避；在其他形式中，它可能更为潜伏。必须辨明的本质就在这里；它把我们导向一些——快速说来，如果你们愿意——可以称作“心智形式”的东西，我们必须让自己的经验适应它们。这还只是接近问题；问题本身是：这种结构同我们的经验场域有何关系？

最近有人问我——我是说一个不属于我们领域的人，一位十分杰出的数学家；我有幸近来与他成为朋友，这里也有人认识他，至少通过我开始在双方之间建立的联系认识他——这位朋友十分留意认识论小组第一册的出版。他就米尔纳先生或米勒先生的某篇文本问了我一些问题，并多少有些担忧：这里涉及的究竟是数学模型，甚至只是隐喻吗？

我认为可以回答他：在我的思想中，事情走得更远；所涉及的这些结构有权被视作某种 ὑποκείμενον［hypokeimenon］，也就是构成我们场域之物的支撑，甚至实体。所以，“心智形式”一词同往常一样只是接近性的，也不恰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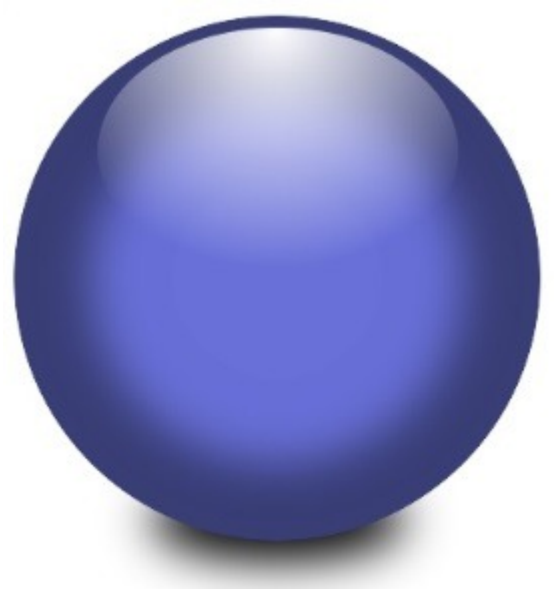
不过不要忘记，以卓越方式引入“重新审视拓扑形式作为几何学基础”这一问题的人，正是昂利·庞加莱。他的相关论文，如你们知道的，最初刊于《巴勒莫数学学会会报》。请听清：这里所涉及的东西，要求数学家本人进行一种练习，一种自行打破惯常直观框架的练习。庞加莱承认，在这些参照中蕴含着一种精神直观运作的转换之源；他认为，这种转换不只根本，而且是启动这次重审所必需的。

现在来说涉及哪些形式，以及哪些形式将为我们服务。共有四种。简略地说——这是说给那些能理解这些词的人——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所谓欧拉—庞加莱示性数恰好等于零［F - A + S = 0］。我不会告诉你们欧拉—庞加莱示性数是什么，不过仍要给你们看一点端倪，否则何必说出它的名字。先列出这四种形式：

- 圆柱面，或穿孔圆盘，从拓扑上说二者完全相同；
- 环面；
- 莫比乌斯带；
- 克莱因瓶。

这四种拓扑形式具有同一个欧拉—庞加莱常数。

为了让你们了解这些曲面与球面有何不同，我提醒你们：球面——我画了些阴影，让它更漂亮——



球面以及一切与它同调的东西，比如你们所知、能够内接于球面的所有多面体。无论这些多面体多么复杂，它们都与球面同调：例如，在球面内部作一个四面体，你们会看到它在本性上没有不同；只须向四面体内部用力吹气，就能让它变成球形。

好，欧拉常数的一种具体化方式，是在处理多面体时取：

- 面的数量：F；
- 棱的数量：A；
- 顶点的数量：S；
- 再依次放置加号与减号，例如：F - A + S。

我在这里放一个减号、那里放一个加号；对四面体，我们得到：+4 - 6 + 4。你们看到，结果恰好是数字2。正因为4 - 6 + 4等于2，你们可以在任何多面体上检验这一点。

我给你们画最简单的，只是不想让你们疲劳；若取十二面体，结果也相同。

但如果任取一个内接于环面的多面体，你们很容易验证：进行同样运算，也就是把面数与顶点数相加，再减去棱数，结果将是0。

现在，我们能怎样使用这四种拓扑要素，也就是：

- 圆柱面；
- 环面；
- 莫比乌斯带；
- 克莱因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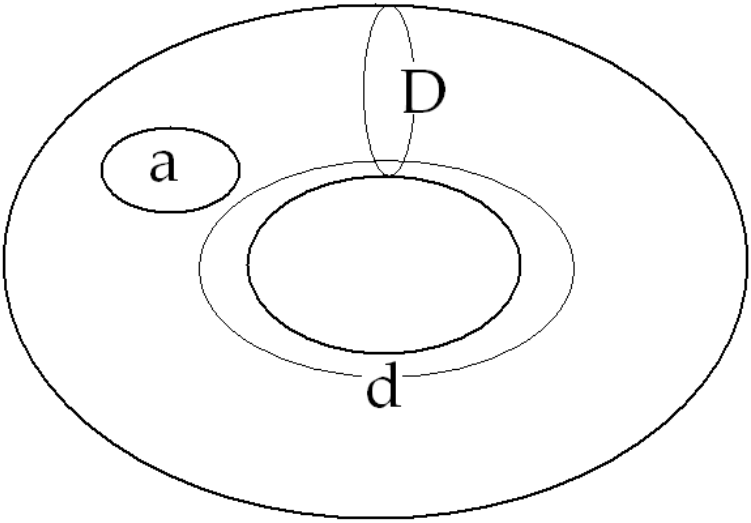
这就是我们现在要进入的问题。在谈它们的用途时，必须首先强调若干性质；用途随后才来。我们不可能立刻就把它们在某项参照中的操作价值抛到你们头上。若不先突出它们彼此的差别，以及赋予它们宝贵性质的东西，就无法立刻给出转换与翻译。我再说一遍，这些无非正是我们场域本身的性质。我们之所以在这里看见它们，是因为这些图形绝不能正当地被翻译成我却不得不用来表示它们的图示。

也就是说，不能把它们翻译成某种直观之物；严格地说，它们只能通过象征性参照来论述，其表述只由我们可以称为“字母”的东西以不同

程度得到阐发与组合的运用来支撑。集合论可以把你们带到眼下与我们相关的这个拓扑学专章；我完全可以在黑板上把它展开成一系列公式。你们看起来不会觉得它们与通常的代数公式有什么区别；而就我们能够作出的运用而言，这显然是一条可靠得多的道路。

换言之，关于这些曲面，重要的是在精神中区分局部曲面与整体曲面。你们受到所谓直观——也就是想象界——的捕获，结果便把这些曲面当作局部曲面来思考；也就是说，你们无法把任一部分曲面的直观，同“一个局部曲面可能属于无定限平面或球面——二者拓扑等价”这一含义分开。但是，每一片在这里得到拓扑界定的整体曲面，都必须被构想为本质上携带着整体曲面的性质。

因此，在环面中考察这样一小块碎片［α］，对我们毫无意义；我们在这里把它称为圆盘，因为它可以缩减成一点。



这在拓扑上与环面毫无关系，因为环面区别于球面——同样的事情在球面和平面上都会发生——之处在于：环面上存在一些闭合回路。表面看来，它们同我们最初在这里界定的那条［d］完全等价；但你们清楚看到，它与第一种回路根本不同。首先：

- 它没有从环面曲面切下任何东西，只是把环面打开，把它变成圆柱面；

- 其次，它无论如何也不能缩减为一点，因为环面的中央孔洞会——可以这样说——阻止它继续收缩。

你们清楚看到，环面上存在两类这样的闭合回路；这里是另一类［D］。你们在这里认出了两种切割形式。最初，我请你们假设性地跟

随我，并同意给其中一种赋予这样的内涵：它是我们可以视为代表索求的一类能指切割。

但有一个条件：我们必须察觉，当这条循环不闭合时，它的重复包含什么；也必须察觉，为了闭合，它如何必然经过另一类回路［d］。由此，我们看到一件事可以特别容易地得到象征：相对于我教你们视作索求之后果的欲望维度，索求所支撑的东西，只有在索求重复自身时才能作为这样的东西受到支撑。

这同时向我们提示“重复”一词的某种特殊原创性：它不是一个徒然的维度；重复本身展开某种东西，而以这种方式说明它，对我们大有益处。回到庞加莱[注4]：正是他引入了这样一则——可以说——哲学寓言，即那些能够生活在他推广的拓扑曲面上的“无限扁平的存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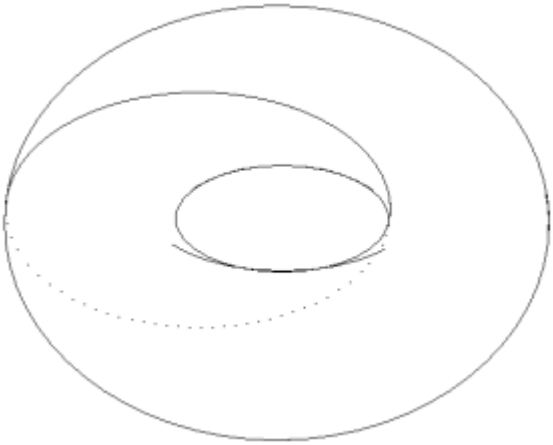
> [注4] 昂利·庞加莱：《科学与假设》，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68年，第二部分第三章“黎曼几何学”：“让我们设想一个只住着没有厚度之存在者的世界；并假定这些‘无限扁平的动物’全都处在同一个平面中，无法离开。再假定这个世界与其他世界相距甚远，不受它们影响。既然已经在作假设，那么赋予这些存在者推理能力、相信它们能够从事几何学，也不会让我们付出更多代价。在这种情况下，它们当然只会赋予空间两个维度。”

这些“无限扁平的存在者”具有一种价值：它们让我们注意到它们能够知道什么、不能知道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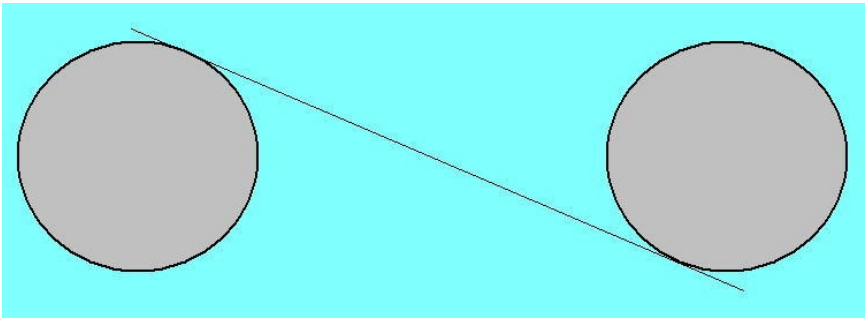
如果我们假定一种本身就是曲面的拓扑或结构，并由“无限扁平的存在者”居住，显然不是为了让自己以你们在这里不得不看到的图示为参照——也就是这些拓扑形式在空间中的嵌入。对在这种拓扑结构层次存留的东西而言，我顺带、带着歉意称作“中央孔洞”的东西，绝不可能被察觉。

相反，可以察觉的是我刚才画出的那些环路所具有的连贯性。

在系统内部，同样完全可能察觉我现在要画的一类环路；为了节省空间，如果你们愿意，我画在同一幅图上。它把两类闭合回路合为一体。对我们——我们把图形浸入空间，因为至少暂时还软弱到需要这种帮助——来说，这条回路似乎同时绕过我将称作的——既然已经妥协，又何必停下？——“内部孔洞”与“外部孔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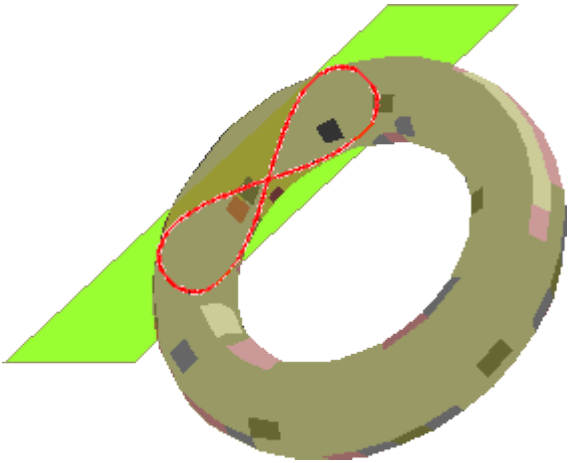


这条环路以发现者命名，叫作维拉索圆。维拉索早在拓扑学出现之前便发现了它；他是在一些我不打算强调的度量性质中发现它的。他饶有兴味地发现，在由正圆旋转而成的环面中，只须用精心选择的操作规定这种环路，环路本身就可以是圆。看出这一点很容易：只须用一个双切平面切割环面，它的截面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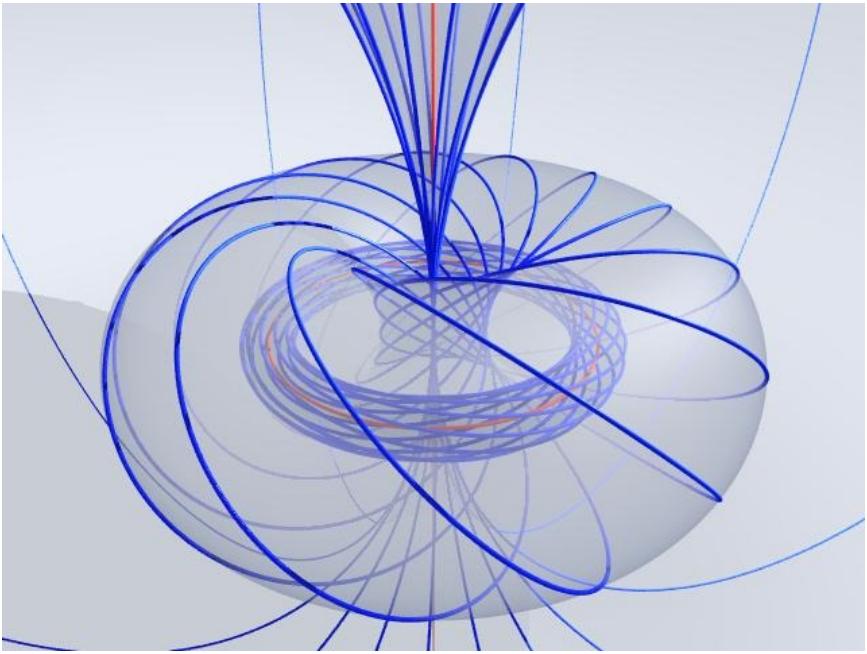


这已经是一次初步接近；维拉索的做法中已经包含某种拓扑洞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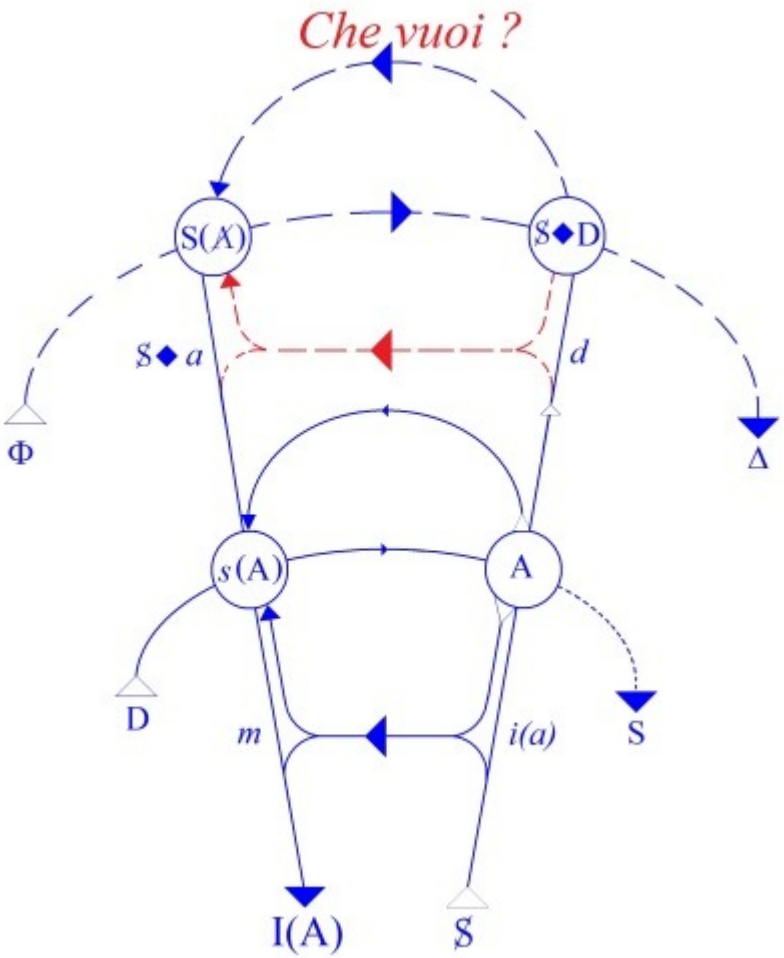
我提到它，只为让你们注意：即使是生活在环面曲面上的无限扁平存在者，也能察觉维拉索圆有两个系列。一系列朝这个方向运行；另一系列朝相反方向运行，而且具有同第一系列每一条相交的性质：



你们当然看到，可以让整个系列绕环面一周，彼此不相交：



这向你们展示了这些结构提供何种阐发可能与材料；其目的不亚于连贯论述我们面对幻想这类现实时所提出的问题。在教导初期，我反复强调想象界功能：它从根本上支撑自恋认同、微观宇宙—宏观宇宙关系，以及迄今充当宇宙论与心理学模型的一切东西。



我构造了一张图，向你们展示处在另一种状态、以另一种方式参照象征组合学的东西。它也是一种认同形式，即使欲望由幻想支撑的那种认同。

我用公式“被划杠的 S 同(a)之切割关系”——如果你们愿意——来象征幻想：$\not{S} \diamondsuit a$。这个(a)是什么？

它是否等价于 i(a)，即镜像意象？正如弗洛伊德明确论述的，自我在发展过程中，由一系列彼此包裹、相互叠加、像珍珠层一样凝聚的认同支撑。难道(a)只是想象界的另一种功能？

某件事仍应使你们怀疑事情并非如此：我始终提出，(a)没有镜像意象。可它是什么？

我想这一切终究颇为枯燥，就让你们休息一下。我会告诉你们：在美国作报告期间，我想到一则寓言、一个模型、一个小故事，不过把首发表留给了你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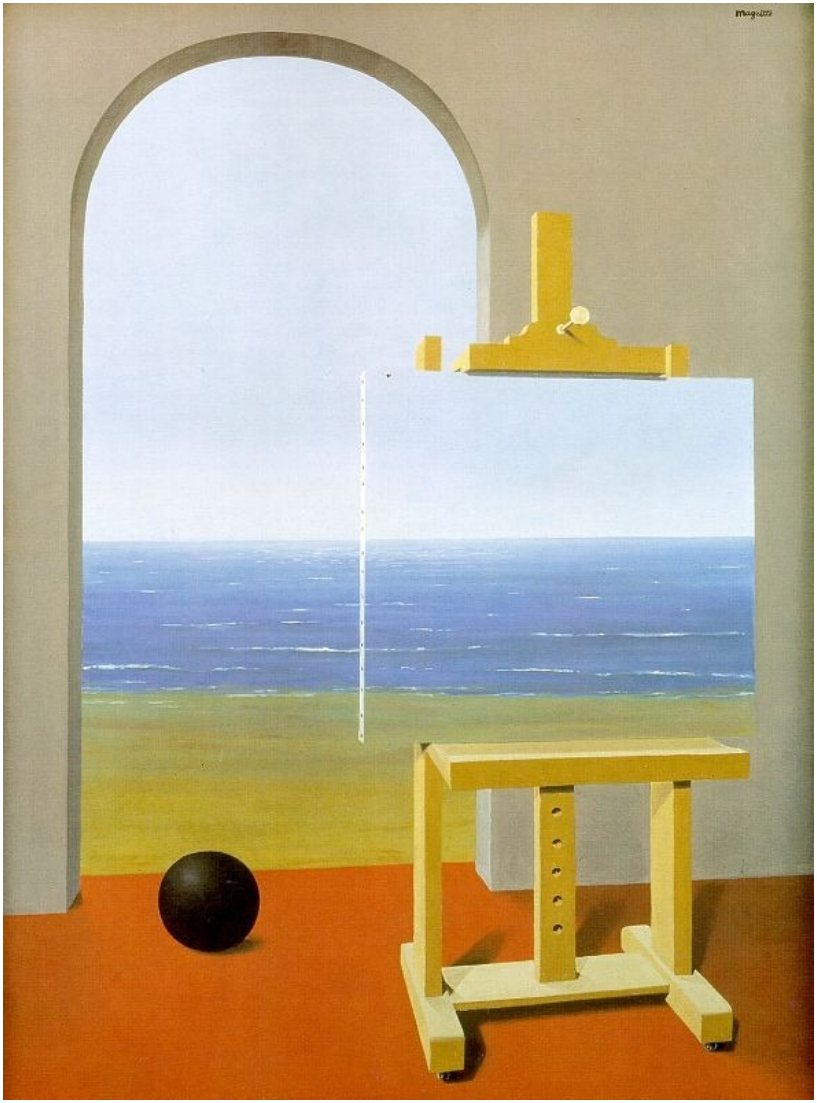
也就是说，为了让你们把握问题所在，我想到一个词，却没有让它流通。我更没有让它流通，是因为我认为它没有英语译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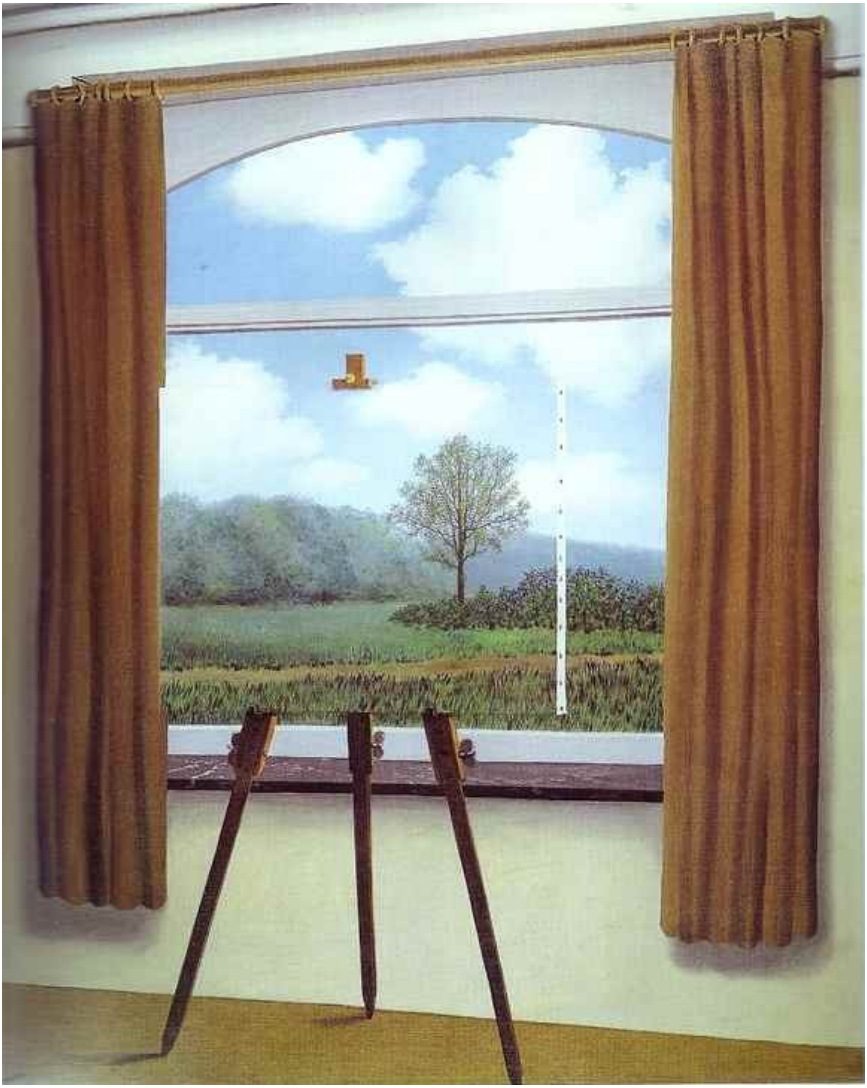
不过，我仍然让他们略微了解这个想法：我采用 frame 或 framing。

法语里有一个漂亮得多的词，在戏剧舞台上具有特定价值：praticable，也就是舞台上的可用景片。

归根结底，你们有些人也许还记得：我曾在某次地方研讨日[注5]怎样谈幻想。当时我提到画家马格利特反复在画中使用的一种游戏——并非偶然游戏：把一幅画放进窗框，而画中准确描绘窗后景色。对这些人来说，我引入“可用景片”没有任何新意，只不过把重音再加重一点，把事情说得更明白。

[注5] 1962年10月围绕幻想举行的“地方研讨日”。





可用景片出现在戏剧舞台上，会产生什么效果？它在一定距离上成为视觉欺骗，引入一种透视、一场游戏、一种捕获；可以说，它参与了视觉领域中一切属于幻象与想象界秩序的东西。然而，只要走到景片

后面，就不可能再受骗。可景片仍在那里；框架确实存在。事情恰恰在这里：必须把事情推进得足够远——非常确切地说，在一场分析中——才能抵达这个点：在幻想中触及作为框架的对象(a)。

幻想在主体经济中的功能，仍然是以自身的幻象功能支撑欲望。

幻想本身不是幻象；它通过自身的幻象功能支撑欲望。欲望被主体的这种分裂所捕获，而分裂由幻想的框架造成。这意味着什么？难道我们只须满足于说：像在剧场一样，只要能进入后台，查看那块可用景片，就会知道最终答案？

显然，问题并不在这里。如同居住在这个形体上的无限扁平存在者，我们在环面曲面上移动，永远也无法形成关于那个以孔洞形式存在之物的观念。从一切表象来看，它必定与对象(a)有所关系，因为以下两类环路之区分取决于它的实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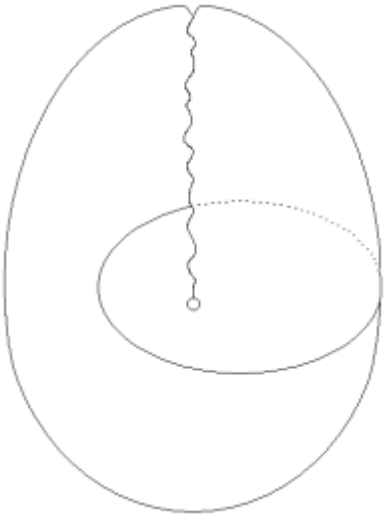
- 围绕这次外部扭转形成的［d］类环路；
- 与跨过孔洞、把它们联结起来的［D］类环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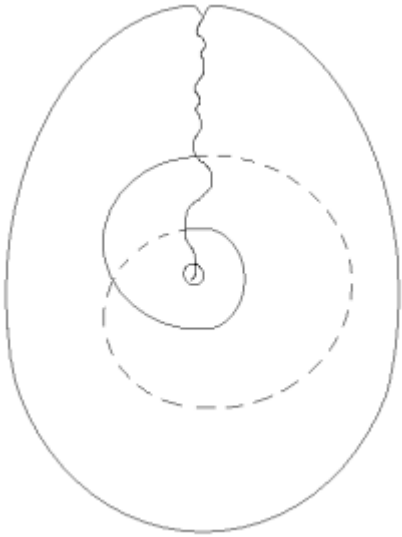
我已经宣布其功能的其他拓扑曲面，可以在这里为我们提供一些帮助。

我想，无须长篇大论地讲射影平面层面可以描述的东西；尤其是因为很容易——而且我已经多次这样做——用我刚才不恰当地称作交叉帽的东西把它表示出来。

这种不恰当使我们能够作出一条评论——不过还是继续这样称呼吧，我不太喜欢“戴主教冠的球面”。我们可以看见一道切割：它以十分醒

目的方式具有与环面上的双重环路完全相同的结构；在环面上，这种结构甚至能让扁平存在者发现中央孔洞。我要提醒你们，在简单切割［I］层次，它与维拉索圆完全无法区分；但这里的双重环路［II］具有把曲面分开的效应。我想自己已在你们面前描述过足够多次，你们应该记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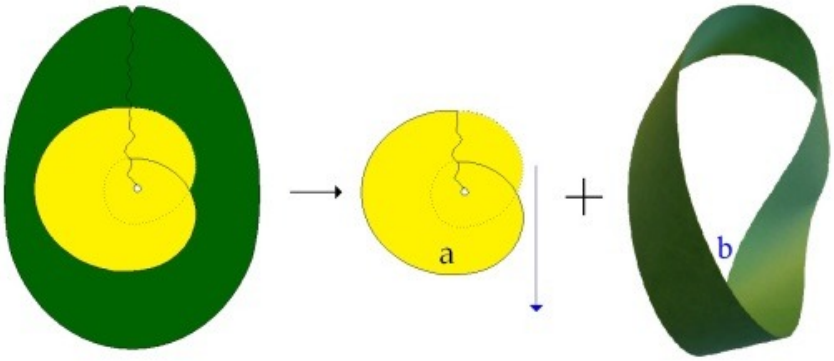




I II

这与双重环路在环面上形成时发生的事情相反：环面仍保持为完整的一片。

可在这里，中央处得到一个可以称作“假圆盘”[α] 的曲面；如果你们愿意这样说。不过，它仍然确确实实是一个圆盘。长久以来，我把它当作支撑、骨架，最终也就是欲望幻象之原因，换言之，把它当作对象(a)的等价物。



交叉帽的另一部分［b］则是……这一点很容易凸显。很久以前，同样在1962年，我用一些图画作过说明；有些人还记得，那些图精细得出奇，不过我现在实在不愿再重复全部细节。它们唯一的意义在于，通过某些变换展开这里的褶皱，同时又把它缩减到这里，便会发现：另一部分——把这一部分称作 b，刚才那部分称作 a——是一条莫比乌斯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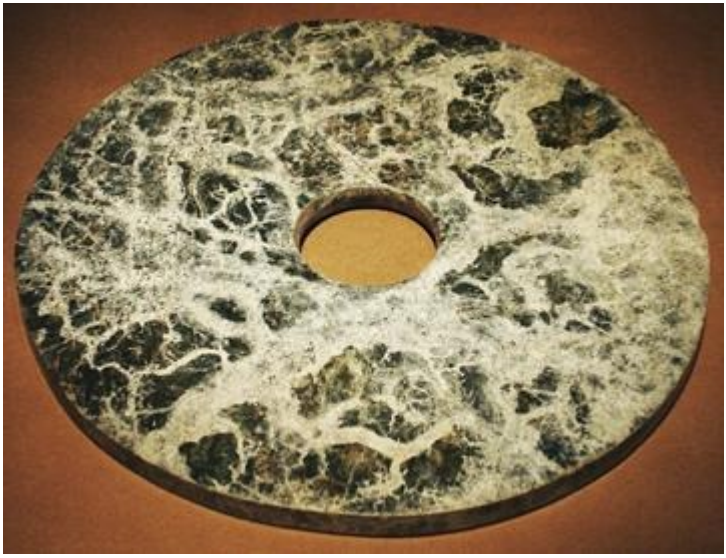
在展开过程中，你们可以从这幅图中变出所有最迷人的幻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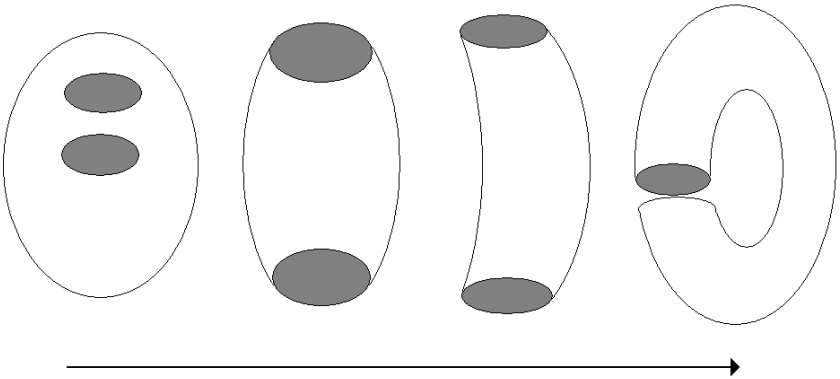
- 把它靠近耳郭的形状；
- 靠近展示大脑外部形式回旋的正中切面；
- 或者随便别的什么，比如胚膜切面。

这些只有提示价值；不过，也许并非完全不能向我们指出：某些这样的卷曲形式铭写在有机体内部各处。

那么，我们难道不能问：这里是否证实了我们围绕我目前近似称作“环面中央孔洞”的东西所寻找的内容？在环面层次，这项提示具有重要性——例如，如果我们要用两个环面彼此摹印的运作，象征神经症的某种特定关系，即把主体欲望同大他者索求联结起来的关系——这里的孔洞、也就是某种无法把握的东西，代表对象(a)的位置。

在交叉帽这样的另一个曲面层次找到它的支撑，难道没有给我们一项在操作上可能十分宝贵的提示？还有某件事证实这一点：环面由一道缝合形成，它把构成圆柱面边界——或者随你们说，穿孔玉璧边界——的两个孔洞、两条边接合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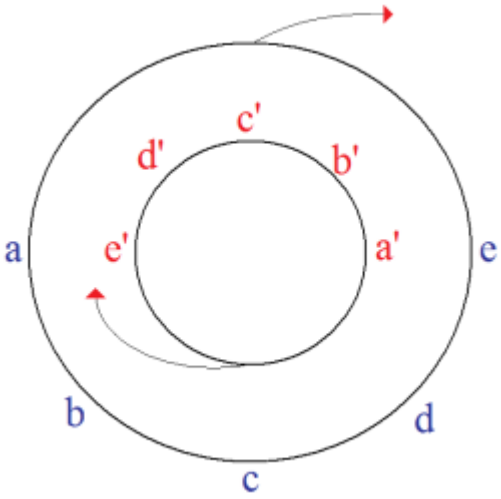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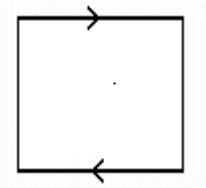
穿孔玉器由来已久，并非毫无缘由。当然，我们如今不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但最初花大力气制作它的人，大概知道它可以派上某种用场。自然的穿孔形式并没有那么多；顺便说，中国版画在各种安排与联想中清楚显示：它大量呈现的这些穿孔石形，始终同情色主题相连；这并非毫无缘由。

射影平面怎样构成？我立刻给你们严密形式，说明我们会在何种交叉处遇到它，以及怎样构造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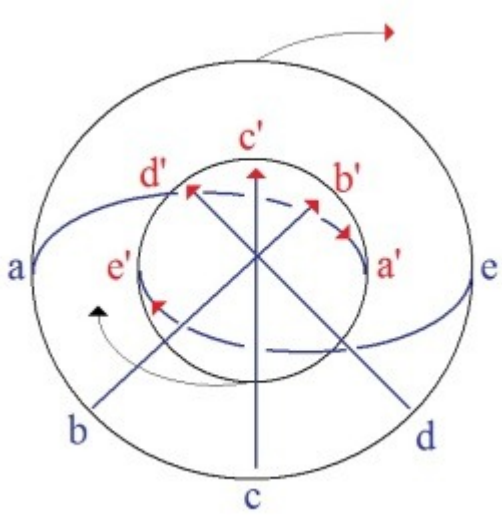
……不过，这同时也是最本质的形式；我是说，在一种完全通行、有效、根本的拓扑表示中……它是这样：从一个与另一个图形相同的图形出发。你们看，圆柱面以两个圆周为边界；把其中一个圆周的每一点，同另一个圆周上与它直径相对的点认同起来。



换言之，这在莫比乌斯带中表示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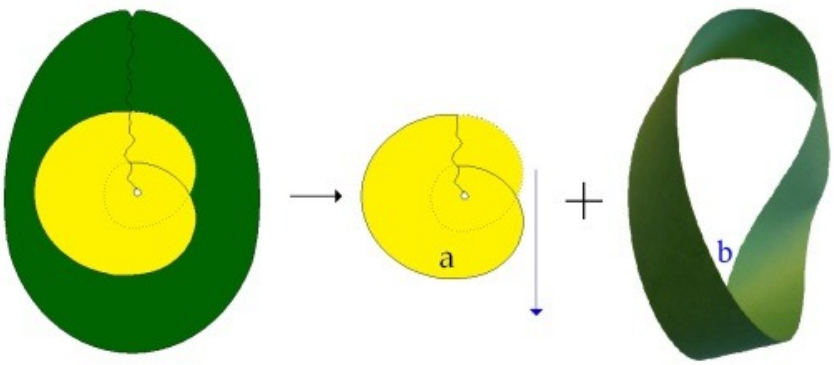
也就是说，把带子扭转半周，把这支箭头按其方向贴到另一支方向相反的箭头旁，就得到一条莫比乌斯带。好，请对两条圆形边界进行同一操作：这里朝这个方向的部分，将在这里按这个方向接合。



从这道切割本身很容易看到：在射影平面这种拓扑中，中央圆盘……

……尽管直观看来并不明显，但我把它这样画出以后，你们立刻就能看见……中央圆盘不是孔洞，而是曲面的一部分。正因此，射影平面被说成……

……我没有在这里教你们……我不知道，这也许会使你们惊讶；但请查阅拓扑学手册，会看见一项被视作根本的事实……射影平面由两部分组成：一个中央圆盘，以及围绕它、具有莫比乌斯带结构的某物。我认为，这幅图已经充分说明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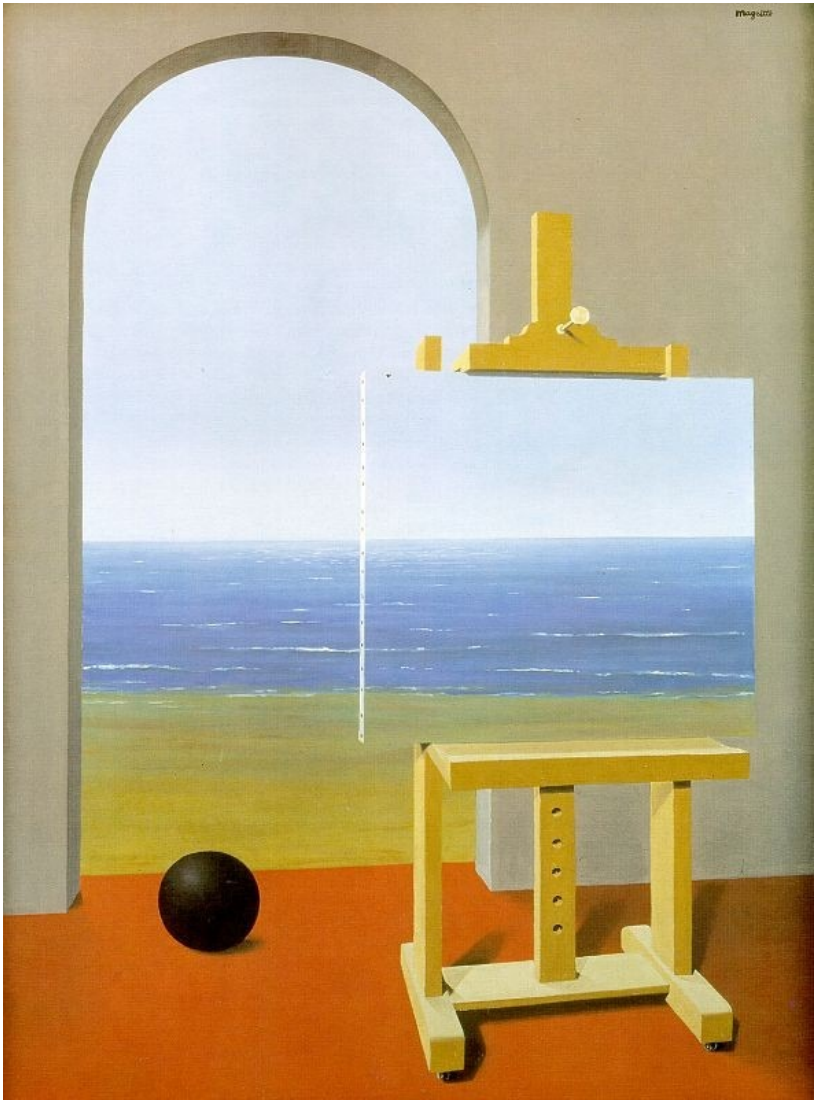
不过，这个中央圆盘因为是真圆盘，完全可以消隐。也就是说，同样正确的是：射影平面就是我现在画出的这个东西——只须有一个曲面，让其中每一点都同直径相对的点认同。中央圆盘不必显现，它可以缩减至什么也不是。这证明了它用来表示对象(a)某一维度的卓越性质，尤其例如凝视；凝视作为对象、作为陷阱的性质，恰恰在于它可以被彻底省略。

结束前，我必须提醒你们一件事；我想自己已经在你们面前推进得足够充分，现在只须提及。借助反转八字切割、双重环路切割，环面被切开——我再说一遍，它仍保持完整的一片——而切割的方式使你们在恰当缝合后很容易把它变成莫比乌斯带。这并非物质操控的问题，尽管它也可以操控；它并非无形体。你们可以很容易把被双重环路打开的环面变成莫比乌斯带；我想你们能够理解，因为我已经告诉你们，沿中线切开的莫比乌斯面可以贴到环面上。反过来，如果环面上的切割恰恰把这个双重环路曲面分离出来，就可以很容易地得到莫比乌斯带。

这条拓扑联系让我们形成一种可能变换的观念：如果希望对象(a)的功能能够涌现，环面曲面上发生的东西必须怎样转化为莫比乌斯面上发生的东西。

然而，对象(a)在这里仍如此逃逸、如此成问题，至少如此容易消失；这也许还不够。因此，我又要让你们悬在这里，下次再向你们展示克莱因瓶怎样解决这条绝路。

马格利特





返回 3月30日　返回 5月11日　返回 5月25日

第14课 · 1966年4月20日

假期把我们分开之后……我必须在一个预先规定为封闭研讨班的星期三同你们重聚；因此，你们缩减为一批经过选择的学生。就今天我要讲的东西而言，我丝毫不觉得这是糟糕的聚会方式。

事实上，这与封闭研讨班的原则相反。按照原则，最初至少应当由别人而不是我本人提出问题——至少可以这样。不过，今天仍由我来讲；哪怕只是为了弥补并重新接上上学期我缺席一个月所中断的线索。我也希望借此开启一种合作，让下一次封闭研讨班真正取得研讨班自身的性质。

这段假期也让我重新思考最初发言中已经出现的问题，即我同听众的关系。所以我要从这里开始。昨天晚上，我刚收到这份校样；我想，就把它看成一个征兆吧，先给你们读一点。你们看到这里是排版清样，准备收入高等研究院年鉴。

每年，每位参与高等研究院教学的人都会发表一篇课程短摘要。

这份摘要当然不是今年的，而是去年的；你们看，它不算来得很早。

不过，现在仍来得及，因为它恰好给我机会把内容告诉你们。我之所以告诉你们，是因为你们马上会看到：写它时，我想到了你们。不是想到要读给你们听，我不可能预先知道会有这个机会。

但你们会看见，我想到了你们。不再作序言，我开始读。这是去年的“精神分析的关键问题”。

“置于中心的问题……”我在这篇短摘要中说——你们可以想象，它是极度压缩的——“中心问题可以归结为几个词：主体的存在……”我假定读者参加过去年的研讨班……“我们此前的参照之锋尖把我们带到这些词上。主体的存在……”这在今年仍然切合。

> “……主体的存在是裂分的；弗洛伊德在发现无意识只能翻译成语言之结、因此具有主体之存在以后，只是以各种形式反复重申这一点。审查制度正是通过这些结的组合而被越过；它不是隐喻，因为它作用在这些语言之结的材料上。”

关于这两个短段，虽然摘要并不是教学对象，我仍重申了我们出发时极其坚实的基础：无意识具有语言结构；审查不是隐喻，意思是它切入材料。我们正是与弗洛伊德从这里出发。

我想，自己已经用五行概括了这一点。

“弗洛伊德从一开始……”这是写给那些如果摘要省略这些初始真理、便会觉得过于晦涩的人。

> “……弗洛伊德从一开始就肯定——这种不完备性——任何把意识退隐构想成昏暗、潜能、甚至自动机制的观点，都不足以说明这些效应。”

所以要重申：凡试图把无意识变成较低的意识、虚拟意识、“前于”意识或前意识的东西，都不是无意识。

再用三行说明：“重申这一点，只为排除人们针对我们今年使用 cogito 而作的一切‘哲学’解读”——这里的今年是我正在总结的那一年——“我

们认为这种使用正当，因为 cogito 奠定的不是意识，而恰恰是主体的裂分。只须把它写出来：我是正在思想者：‘所以我在’。”……我重复：“我是正在思想者：‘所以我在’”，我思想的正是这个：“I am thinking: ‘therefore I am’。”……“并且注意，这项陈述是通过一种苦修取得的……”它当然不会从天上落下来；首先要安排、彻底扫除笛卡尔时代已经实现的全部知识——笛卡尔正承担这项苦修。

> “……这项陈述裂分了存在；存在的两端——开头的‘我是正在思想者……’与结尾的‘……所以我在’——只有在显明其结中承受的某种扭转时才能接合。”——它同陈述结成的结——“因果作用？翻转？否定性？”
>
> ——后面都带问号——“所要做的，正是建立这种扭转的拓扑。”

下一段中，我重申自己从哪个角度触及皮亚杰与维果茨基。我说，他们……

> “……从前者到后者，说明了排除主体与语言之关系的一切心理学假设会带来何种收益，即使所涉及的是儿童。因为这种假设无非是：一个知识之存在对儿童必须凭借我们呈给他的能指组而体现的真理之存在所作的假设……”而维果茨基忠实地把能指组本身呈给儿童。
>
> “……这个能指组构成经验的法则。不过，这会提前设想一种必须在共时性中把握的结构，也会提前设想一次不应偶然的相遇。弗雷格试图奠定算术的地点所带来的1与0之啮合，为我们提供了这种结构。”

相关知识卡 弗雷格数概念中的零、后继与一 · 雅克-阿兰·米勒《缝合》与零—一序列

所以，我用三行概括了去年对算术运作的研究在那一年发挥的功能。

1给空类编号。参见米勒先生与米尔纳先生的报告。[注1]

> [注1]　戈特洛布・弗雷格：《算术基础》，前引书。另见“关键问题”研讨班：雅克-阿兰・米勒1965年2月24日的报告，以及让-克洛德・米尔纳1965年6月2日的报告。

相关知识卡 弗雷格数概念中的零、后继与一

> “由此可以看出，主体的存在是对一项欠缺的缝合。准确说，是那个在数中逃逸、却以自身递归支撑数的欠缺……”后继数理论正奠定在这个观念上……“但它之所以支撑数，只因为归根结底，它是能指成为主体的1时所欠缺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在另一语境中称为一元特征的词项；它是原初认同的标记，并将作为理想发挥功能。

相关知识卡 弗雷格数概念中的零、后继与一

“主体之所以裂分，是因为它既是标记的效应，又是标记之欠缺的支撑。这里应当重申使这一结果再次出现的若干形式化。”我这样写道。

相关知识卡 拉康的主体定义：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

尽管留给我的篇幅很短，我仍有地方重申：

> “首先是我们的公理，它把能指奠定为这样一种东西：它为另一个能指——而不是另一个主体——代表一个主体。这条公理定位了刚从另一条道路重新获得的引理：”……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主体以标记所欠缺之物回应标记。由此可以看到，只有把否定性引入公式的一极——能指——这个公式……”也就是我刚才

> 作为公理给出的能指公式……“才会发生逆转。环路闭合，却不缩减成圆；它假定……”

相关知识卡 拉康的主体定义：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

这是第三个词项；继公理与引理之后，随你们怎样称呼它。

> “……能指起源于痕迹的抹除。数学的力量、我们科学的狂热，无非奠定在主体的缝合、那道细薄的疤痕上……”而且，谈到疤痕时，不要以为我用了一个数学家会排斥的词；庞加莱在他的 analysis situs（位置分析）中就使用这个词。“……或者更准确说，奠定在主体的裂口上。数理逻辑的悖论（哥德尔定理）为这种细薄作证”——你们还记得句子的开头——“当然，它始终使意识大为震骇。我们并不幻想……”我自己不幻想，也希望你们不幻想……“这个层次的批判能够刮净伤口上的排泄物……”主体的裂口只在科学凭借算术的强力把它缝合的层次得到维持……“而社会剥削秩序正以这个主体开口为基础——因此它并没有创造异化，无论人们怎样想，即使在马克思主义中——社会剥削秩序或多或少自觉地努力用这些排泄物覆盖上述伤口。”

相关知识卡 弗雷格数概念中的零、后继与一 ・ 拉康的主体定义：一个能指为另一个能指代表主体 ・ 雅克-阿兰・米勒《缝合》与零—一序列

许多东西都服务于这个目的。一般来说，我们会称之为真理学科；不过……“必须提到这样一项任务……”我要不要加上“奴仆性的”？正文里没有，我在给排字工的作者校改中加上了；还不知道是否保留……“自主体危机敞开以来，哲学在这里承担这项任务。［……侍奉不止一位主人——高等研究实践学院］”

我说“自主体危机敞开以来”，是在哲学史中标示一个日期：所谓哲学自从同科学发生关系以来，便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很糟。

“另一方面，任何针对社会的批判都不可能替代这种批判……”就是我说自己并不幻想能够借之刮净伤口上排泄物的那种批判，等等。

“……任何针对社会的批判都不可能替代它……”这十分重要……“因为这种批判本身只能是来自社会的批判，也就是说……”无论何种批判，

> “……都卷入我们刚才所说的这类‘思想绷带’（pensement）交易之中[注]。正因此，只有分析这个对象……”
>
> ——这个“思想绷带”——“才能在其实在中面对它；它的实在正是成为精神分析的对象。”

[注] pensement 是拉康临时造出的双关词：它在声音与字形上把 pensée/penser（思想 / 思考）同 pansement（绷带、敷料）叠在一起。正文译作“思想绷带”，但中文无法复现两组法语词之间的近音关系。

对本年度的说明：

“然而，在接近主体存在时，我们不会满足于悬置问题——那等于承认失职——并以当然可以在那里重新找到欠缺的奠基为借口。”

我给你们读这篇文字，恰恰为了把它像一粒种子那样投入我所谓你们的“听者根本态度”。

“我们教导之所以令人迷失方向，”我毫不迟疑地写道，“恰恰因为它要在我们的听众中检验这种欠缺的奠基。既然我们对主体存在提出这些结构要求，又怎能退缩，不去看代表主体存在最卓越的人——在我们

的论说本身中，他以存在而不是以思想来代表它，正如 cogito……”漏掉了“正如 cogito 所做的”；你们看，时间永远不会白费。

> “……也就是精神分析家？这恰恰是我们在那一年显著的现象中所发现的：听众的另一部分走在前面，使我们成功确认了自己认为正确的理论，即语言中的沟通理论。”

这并非全部沟通。不过，你们早就知道这个公式。看来我的公式被反复念叨也不会损失太多，因为我实际上必须重复并宣布它们。

“我们这样表述它：讯息只有在接收者的层次才被发出。既然我提到听众的另一部分，无疑应当在这里承认我们从接待我们的场所取得的优越条件。

这是向巴黎高等师范学院致敬。

“不过，不要忘记：有些人觉得这种研讨班效应显得太容易，由此产生保留；而这种保留包含的阻抗……”

> “……是有道理的。”我补充道。“它之所以有道理，是因为投入的是存在而非思想；主体存在的两端在这里因真理与知识的分歧而分化。精神分析家的存在困难，取决于他所遇到的主体之存在，即症状。只要知道‘精神分析’意味着什么，每个人都会同意症状是‘真理之存在’，不管人们怎样努力把它弄混。”

即便是最会混淆它的人，我确信，只要立刻把下面这句话扔到他们脸上，也会得到同意：症状的本质——我们在症状中的位置——在于它是真理之存在。

“由此可以看到，‘知识之存在’为了认出自己只有在不幸标志下——患者的不幸——才与之交配的东西之幸福形式，要付出什么代价。这个‘知识之存在’——即精神分析家的知识之存在——必须缩减为只是症状的补足；这正是令人恐惧的东西。而当所涉及的‘知识之存在’省略它时……”

> “……它就把精神分析地位——当然是科学地位——的确立无限推迟。因此，即使我们在年底以这一弹簧收尾而造成震动，仍未能避免短路在原处重复。”

我这里提到它以某种形式返回我们；这个形式非常重要。

> “它当然怀着显而易见的善意返回，甚至还以悖论自饰：实践者思考症状的方式制造症状。”

这看起来像是我此前论述的后续；然而，我确实有理由对此猛然一惊，因为……

> “当然，这适用于心理学家的经验；我们正借此把铃铛带进来。”——参见维果茨基、皮亚杰那一段——“但这样仍然只是心理治疗师……”

而这一点恰恰发生在说出这句话的层次：这句话在某种意义上是真的，却不是我们必须说出的真理，也不是我们面对的真理。因为我在临床问题上提出的是：作为分析家，我们必须参与症状。

> “……所以，这样仍然只是心理治疗师，恰好停在使皮埃尔·雅内永远无法理解自己为什么不是弗洛伊德的层次。那只神圣之瓶，”

> 我总结道，“就是克莱因瓶。不是任何人都能把衬里中的东西从瓶颈里取出来；因为主体那里存在的支撑就是这样构造的。”

就是这样！我给你们读这段小文字，并不是为了让你们有机会认识它；反正你们从来不会去年鉴里找它。谁读年鉴呢？不过是为了……
某女士：我们能拿到这篇文字吗？

［对格洛丽亚］亲爱的，请让人印几份抽印本。好！我只把它交给年鉴，自己不印抽印本。谁也不这样做。不过，它确实可能对你们有用；这是一篇很短的文字，而我对它下过足够工夫，可以把它看成具有一点“锣”的功能。

如果我从这篇文字重新开启、重新拾起、重新接合、重新提醒，再继续下去，那么最容易的做法当然是从结尾出发。这样更便于向你们指出一件人们不常想到的事：每当人们像通常那样推进任何通往相对主义的一步，背后都隐藏着骄傲。

我提出并指出：分析家的问题，恰恰是他被卷入向他提出自身、并追问他的症状中；症状把作为知识之存在的他，当作真理之存在来追问。总的说来，我说：

- 分析家的戏剧在于，他的知识之存在必然在这场对峙中发生偏折、受到牵连；
- 俄狄浦斯无论做什么，至少会暂时把先手交还给斯芬克斯，因为问题就在这里。

归根结底，他作为知识之存在显示出优越性，恰恰因此才成为英雄。

而我们并非每时每刻都是英雄。这一思想立刻、也很容易跳向观察者在观察中在场的功能；我们物理学的进展也向我们指出这一点，并给我们一种所谓“我们并非什么也不是”的想法。但事情恰恰相反。

即使在物理相对论中——无论狭义还是广义——也绝不意味着观察者掌控事情；相反，它意味着事情正盯着观察者。换言之，任何相对论都绝不会像人们通常感受的那样，给“作为认识主体的主体”观念带来任何力量复兴；也不会给一种互补的两极性观念带来复兴——无论你们是否借助符号把两极对置，仿佛它们彼此相互、尊严相等。绝无此事。无论在科学进展的透视中，还是在我们分析家的经验中，得到强调的都是：若非采取一种远超高度谨慎的措施，也就是从原则、结构上彻底全面重塑问题的拓扑，我们就不可能摆脱这种幻象。

还必须引入：

- 某种绝不能称作绕过困难的“另一种认识方式”的东西；
- 某种不属于认识秩序的东西；
- 某种属于计算、组合学秩序的东西；
- 某种无疑由我们使之运作，却并不因此向我们交付冲力、让我们能够简单地以更轻快的脚步在同一条被视作扩大和完善的道路上重新出发的东西。

这里有许多可说，尤其有一点我今天仍想认真处理，因为它也能回应一些——我的天——并不十分有效的反驳；我们总可以任其说、任其流传。人们说，我这样接近精神分析未免太“理智主义”，为什么不说

太“言语化”呢？此外，精神分析内部还运用著名的“词语力量”。像往常一样，人们说的是邪恶力量，尤其是词语这种仍然具有魔法、具有魔法全能的力量。无论思想还是词语的全能，归根结底都一样；当然，总是另一个人掉进去。

当然，我们始终面对这样一种祛魅操作：重新拾起传统上被某些词语攫住的词项，再度追问它们。

尼采追踪哲学传统中是什么赋予随便哪个词项——例如“灵魂”——以一致性时，我们该怎样处理他的做法？毕竟，为了把事情带到那里……他的工作谈不上十分出色，不过终究是个开端，而且触动了许多人。

这真是道路吗？即使凭我们的手段作出比他所能达到的更优雅的外推，把灵魂的某种支撑定位在身体的影子里——沙米索笔下的人物在路上丢掉的那道影子[注2]——我们所做的，难道不仍准确处在整件事情由之出发的同一条道路上吗？这件事远远超出我们面对的心理学特殊事件；它就是柏拉图《Πολιτεία［Politeia，理想国］》第六卷——如果我记得没错——中的洞穴寓言。[注3] 这道影子，正是投射在洞穴囚徒面前墙壁上的影子。他们的头被各种装置固定，无法转身去看背后是什么，也无法看见墙上影子由什么投射而来。

> [注2] 阿德尔贝特·冯·沙米索：《彼得·施莱米尔的奇异故事》（1813），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2007年。
>
> [注3] 柏拉图：《理想国》，514a，巴黎：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1950年，2007年再版。

可是，这则根本寓言包含什么？问题在于能不能走出洞穴吗？

它包含这样一样东西：回到文本，那里称之为一团火。正是火借投射的照明制造幻景；换言之，是火之火，是中心理念，是在柏拉图其他文本中明确由太阳本身［508a］形塑的源头——在这个开端点，实在之存在与认识之存在的同一性得到指出。

由此，一切都按照层层包裹的形式组织起来；这就是球面拓扑。它们只须通过拓扑学所谓“覆叠”——像衬里那样彼此覆盖——便能以同一形式重叠，一直走到包裹之终点、全部包裹的终点。人们在那里呈上知识的内容，用来同两种存在的同一性相对立。

然而，只须接受重新坠入黑暗，一条评论就足以把这些事情悬置起来：太阳消失，影子固然熄灭，可身体始终在那里。在黑暗中可以摸到它，并从新的基础重新开始实验。而我们要做的正是这个。

问题不在于词语给哪些想象性诱饵赋予一致性、盖上印记。

欺骗的不是诱饵，而是词语。可这恰恰是词语的力量，也是必须解释的东西。

如果“灵魂”——让我们在自认为事情已清理干净的鲜活地点重新拾起它——是某种具有一致性的实体，那么就我们今年研究精神分析的对象而言，它之所以具有一致性，并不是因为灵魂是身体的影子、理念或形式。严格说来，灵魂是从身体上坠落之物：废弃物、坠落物……是身体在某种由能指效应产生之物的铡刀下落下的东西。

正因为能指在这个具身主体上留下标记，才会产生某种身体性的、实际的、物质的东西；问题所涉及的就是它。所以，发生的不是语言对某个想象性幻景的批准，而是语言效应；它隐藏在这些幻景下方，赋

予它们全部分量。这就是精神分析接近方式的新颖之处；它奠定在这样一个事实之上：语言效应先于一切能够以意识把握自居的主体性把握，因而也超出它。

一切对所谓“词语力量”的批判，只要把这种力量本身当作攻击对象……

……毕竟，在心理学的学院标签下延续的，从来无非就是这种声音……它从某种灵魂功能无可争辩的传统言语地位出发，把这一功能当作欠缺来质疑，再由此追问其中有什么实在；这完全保留了“词语力量”的框架。而真正必须追问的是：语言产生了什么开创性效应？使主体状态得以安装的整套装配，就奠定在这个效应上。

不能只靠“正面直视它”来接近这一点。正因此，知识之存在同真理之存在的关系，奠定在某种东西上。就眼前这个向你们讲话的人而言，正因如此，我的论说并不靠任何词汇改造来维持。

如果我说“不存在元语言”，我还以此加重它：我不会试图引入一种新的元语言；它仍会像一切元语言一样，服从自己是语言一部分这个事实。

要把握这里确实涉及同一个真理之存在的关系，首要条件是：真理在论说中被论述为谜。我很遗憾，如果这一点在所有时代都……

……甚至弗洛伊德本人也承认如此。他写《梦的科学》时说Umschreibung，恼火自己无法重新找到此前那些“小型科学报告”的风格。Umschreibung，即“迂回书写”或“矫饰”……纵观主体危机的历史案

例，那些一般被称为“矫饰主义”的文学与美学爆发，始终对应着对真理之存在问题的重新安排。

是的。我们应当找一条短路，重新找回对象(a)；我正好想到一个办法。

不久前，吉尔博[注4]重新把它提供给我。近来我每周同他交谈。他提醒我，大概是弗兰克尔会对听众这样做：1、2、3、4、5。

> [注4] 乔治·泰奥迪尔·吉尔博，法国数学家，供职于庞加莱研究所和人文科学之家，专攻人文科学数学：博弈论、控制论（参见其“我知道什么？”丛书著作）、组合学。另见《让人读懂帕斯卡》，《法国运筹学研究评论》第6年，1962年第3季度第24期；以及《近似课》，狄德罗出版社，1998年。

“没有写在黑板上的最小整数是什么？”好，听着，来吧！没有写在黑板上的最小整数？你们当然以为有人要捉弄你们。但并不复杂，就是6。你们确定0是整数吗？这还可以讨论……［随后拉康在黑板上写：“没有写在黑板上的最小整数。”］

那么，现在没有写在黑板上的最小整数是什么？显然一个也没有。

什么？你们要说什么？无论说什么，我都会告诉你们：它已经写在黑板上了。这下把你们“截住”了吗？

好，问题恰恰就是它把你们“截住 / 切掉”。它重新确立、向你们展示、重新把你们引入对象(a)；我们谈的正是语言问题，而且如你们看到的，它奠定在书写上。

这把你们的话截断了吗？在这个机会中，你们完全没有什么可以作为声音发出来吗？什么？

某先生——……黑板上："没有被写下的"……是，这非常切题，当然。我们可以从这里出发，做出许多事情。好。那么，这次"把你们切掉"是否已经包含阉割问题的全部内容？我说，不是。

事情只在对象(a)的层次受到牵涉。

总而言之，要让某种书写之物成立，你们必须缴纳自己的一份。也就是说，假如我只放置书写的东西——例如一套科学论说，从集合论开端一路写下去；没有什么能阻止我走到终点，我会穷尽现代物理学的全部历程——它无论如何只有在我附加一套向你们呈现它的论说时才会成立。任何论说——哪怕你们设想形式化程度最高的论说——都不可能在没有序言和正文的情况下得到呈现；即使布尔巴基也不行。

问题就在这里：语言无可争辩地是切割与书写；它同作为论说、作为日常语言呈现的东西有何关系？后者需要声音的支撑。但当然，不要把声音只当作声响；若如此，它就会依赖我们身处一颗具有空气、能够传播声波的行星。这与声音毫无关系。

一想到我们在精神病的现象学中，竟仍停留在追问声音的感觉纹理，而我只凭自己那篇文章开头六七页的导言，就已经在……中……

……《对任何可能的精神病治疗的一个先决问题》[注5]，指出了一种完全精确的接近方式；在今天、在我们所处的位置，也许可以由此追问声音现象。

> [注5] 《文集》第531页，或第二卷第9页。

只须阅读施雷伯的文本[注6]，像我那样区分所谓"代码的讯息"与"讯息的代码"，就会看见：有办法以并不抽象、而已经完全现象学化的方

式，把握声音本身的功能。由此，我们可以开始摆脱那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立场：追问幻听者声音的客观性。

> [注6] 丹尼尔·保罗·施雷伯：《一位神经症患者的回忆录》（1903），巴黎：瑟伊出版社，“Points”丛书，1985年。另见1957—1958年研讨班“无意识的形成物”，瑟伊出版社，1998年，1958年1月29日与6月21日场次。

你们把幻听者客观化了。他的声音为什么反倒会更少客观？

声音只因并非感觉性的，就会成为非实在吗？凭什么称它非实在？

这是一种偏见，源自所谓认识批判某个极其古老的阶段。

我们难道要说，声音之所以非实在，是因为把它交给科学沟通的条件后，听见声音的人无法让别人承认这个声音？那么疼痛呢？他能让别人承认疼痛吗？可人们会因此争论疼痛是否实在吗？

严格说来，声音的地位仍有待建立。不仅有待建立，还必须让它进入我们刚才谈到的临床医生之心智范畴。即使临床医生幸运地成功发现了某种很可能早已肉眼可见、却从未有人指出的东西——我在同一篇文章中也记下了——即某些声音现象伴随着喉部以及发音器官周围的肌肉运动；这当然很重要，却绝没有穷尽问题，至少提供了一种接近方式。可即便如此，声音的地位仍没有向前推进一步。

我仍想在这里指出：对任何稍稍清楚理解尼采所谓系谱学——无论道德系谱还是其他系谱——的人来说，忽视我们的科学地位确切地说在多大程度上有赖于苏格拉底，是非常忘恩负义的；我说的是我们的科学，而苏格拉底恰恰以他的声音为参照。

如果想了结声音，不能只因苏格拉底明确说自己以声音为参照，就满足于、或以为已经说明这种现象，然后说：“哦，是的，他某个角落里大概有个东西运转失常。”面对苏格拉底，我觉得很难不把握其整套装置的连贯性，尤其因为这套装置始终公开运作。

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我所提出的主体问题，在苏格拉底那里已经彻底敞开。至于构成其教导基础的这些谈话如何传到我们手中，无论我们怎样认为它们受到某人、尤其柏拉图的编排、修改或增益，事情仍然如此。其图式始终清楚，知识之存在与真理之存在得到完美澄清。必须以这条线索重读柏拉图全集；这条线索还会走得更远，而我此前当然已经教你们怎样解读。直说吧，求知欲望所涉及的东西，就是ἄγαλμα［agalma，珍宝］。不过暂且搁下。

苏格拉底所回应的是：“这种求知欲望的真理之存在是什么？”当它据说在柏拉图式转录中最终变成“照料你的灵魂”时，意味着什么？留待以后再谈。

但我在这里唤起苏格拉底，并再次提醒这把钥匙——知识之存在与真理之存在——并非毫无缘由。

我今天也搁下一条评论：刚才我说他的教导不包含关键词，现在却使用“钥匙”这个词。也许这些钥匙的性质恰恰在于没有锁。事实上，全部问题正在这里。我只想提出一条每个人当然都可能在此提出的评论：“那么，苏格拉底为什么没有发现并论述无意识？”

答案当然已包含在此前的论说中：因为当时没有我们已经构成的科学。

我已经强调过，精神分析在多大程度上依赖知识之存在的一种得到保证、得到缝合的地位。我想，这本可算作一个充分的回答，如果问题不恰恰只是转向：

> “为什么在苏格拉底时代，没有一种从一开始就具有我们科学之地位的科学？
>
> 而我已经以某种方式界定这种地位：在真理一侧的缝合。”

鉴于时间，我今天不会沿这个方向走得很远。但它通向某种对我们非常重要的东西，会把我们带回眼下的问题——精神分析家的位置。下一次，我希望有人带来一份贡献：

- 选取最优秀、最伟大的作者之一，在他把事情推进得最鲜明的那个点上，请重新讨论我那篇为评论琼斯文章[注7]而写的象征主义理论文章；

> [注7] 欧内斯特·琼斯：《象征主义理论》，收入《精神分析论文集》，Baillière, Tindall and Cox，1950年，第87页；《象征主义理论》（1916），收入《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巴黎：帕约出版社，1997年，第82页。另见 Guy Le Gaufey：《符号、符号与符号》，《L’Unebévue》第3期，1993年秋。

- 然后，把它同我文章中只作提示的另一点联系起来：琼斯怎样处理女性性欲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牵涉阳具功能的地位。［参见《文集》第697页，或第二卷第175页。］

请区分他的论说不断滑入的明显不连贯，以及他所处理的症状本身怎样纠正他；症状仿佛重新整合并不仅提示、甚至强迫那些属于我们的拓扑公式以完整书写的形式显现——这与他的意图相反。

我希望有人完成这项小操作，不要迫使我又一次亲自来做。我在所说那篇象征主义文章中处理的文本，是多么非凡！

归根结底，它告诉我们——你们会在文本中看到——并且与我在他之后最终说出的东西一致：说象征主义“像”隐喻那样构成，并不是隐喻；象征主义“就是”一种真正的隐喻。在这里，隐喻并不像他所说的那样远离具体事物，而是全速靠近它。

最终还有什么比这个方向更真实？只不过结尾仍是错的，因为它不是隐喻，而是转喻。

至于阳具同女人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对女性同性恋的决定作用、功能乃至意义本身所带来的非凡凸显，可以说一切都在文本中，只是作者不理解自己在说什么。这里难道没有铭写我所谈的同症状之关系吗？也可以从另一面看：他之所以能够如此深入地抵达症状的意义，恰恰因为缺少症状理论。

因此，我们可以追问：希腊科学早已知道怎样建造精巧自动机，为什么没有取得自身的科学地位？因为还有另一个声音在苏格拉底式追问中发挥作用。

我想，在我指出之前，你们已经想到了：苏格拉底不时召来作证的那个声音——其方式颇为典型，对当时人的耳朵也许颇为令人震骇，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就是奴隶的声音。

为什么奴隶总是回答得如此准确、如此出色，直奔真理，直奔与正方形对角线相应的无理数性质？我们难道没有在这里把握到问题所在——它无非就是欲望的地位？

如果弗洛伊德与苏格拉底——无论他们的产物多么具有溶解作用——都没有走到社会批判……毕竟，据我所知，苏格拉底没有引入历史唯物主义，尽管他确实让众神的雕像在基座上稍稍发抖。阿尔西比亚德剪掉自己狗的尾巴，并非毫无缘由；这不只是为了“让人议论”，因为它未免太像那桩赫尔墨斯神像遭毁事件；后者引起了不小骚动[注8]，也并非与关于真理之存在的辩证法毫无关系。但这不是社会批判。把它称作直接行动吧；这是无政府主义。你们知道，这已经不是我们的做法。苏格拉底没有作社会批判，弗洛伊德也没有。

> [注8] 参见普鲁塔克：《希腊罗马名人传》，巴黎：美文馆出版社，第三卷，1969年。

这无疑因为二者都知道一个极为重要的经济问题位于哪里：欲望与享乐的关系。

古代之所以没有科学，是因为要有科学，必须先有现代工业。

而要有现代工业，奴隶就不能是私人财产。人们会爱惜私人财产，不会像在“自由制度”中那样粗暴地让它工作。

因此，古代世界的享乐问题得到了解决；我想你们很清楚它以何种方式得到解决：被指派给享乐、被指派给纯粹而简单享乐的存在者，就是奴隶。一切都表明这一点：与人们所说相反，奴隶受到尊重；不能随便虐待奴隶，尤其因为他们是资本。只须翻开泰伦提乌斯——还不必说欧里庇得斯等人——就会发现，所有精致关系、殷勤关系、爱情关系，都始终发生在处于奴仆地位的存在者一边。泰伦提乌斯的 nihil humani a me alienum[注9]所指的就是奴隶，没有其他意义。若不是为

了说“我要到人性所在之处——奴隶那里——去”，为什么会说这种蠢话？

> [注9] 泰伦提乌斯：《自惩者》，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93年，第一幕第一场。克瑞墨斯：“Homo sum, humani nil a me alienum puto（我是人，凡人之事无一与我无关）。”

古代世界的享乐就是奴隶。可以说，这个为享乐保留的园区构成了惰性因素，使科学、以及主体的存在都无法兴起。对我们而言，享乐问题无疑会以另一种方式提出；而且由于资本主义，它肯定会以稍微更复杂的方式提出。

尽管如此，弗洛伊德[注10]已经在某处指出这一点；谈到《文明及其不满》时，我们还必须沿这条路重新走过，以拾回自己的线索。

> [注10]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929）：《Das Unbehagen in der Kultur》，法译《文化中的不适》，巴黎：巴黎大学出版社，2004年。

第15课 · 1966年4月27日

德拉齐安　拉康

拉康

好。“Inter……”人们这样说。拉丁语里的“Inter……”——圣奥古斯丁这样开始一句流传得太久、最终磨损了的说法：“Inter urinas et faeces nascimur（我们生于尿与粪之间）。”[注1] 他真是个讲究的人。这句话本身看起来并不包含无限后果；既然我们从会阴那里出生，仍必须说，我们一生都在追逐它。圣奥古斯丁若有理由记得这一点，肯定是出于别的原因；那些原因与我们所有人都有关，因为我们“生于尿与粪之间”并不是作为生命、作为身体，而是作为主体。

> [注1] 这句话出自推罗的波尔菲里（233—305），圣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重新采用。弗洛伊德在《文化中的不适》《爱情生活普遍的贬抑》及“朵拉”个案等多篇文字中引用过它。

正因此，它不只是一段糟糕回忆；至少对在座的我们来说，它促使我们今年眼下热切关注对象(a)，而其中至少有一个恰好与这一带相连。不只一个，甚至有两个；第二个——也就是阴茎——在主体的这种规定中占据完全根本的位置。

弗洛伊德论述这个结的方式，为主体本性带来一项重大革新。当主体必须降临的必然性从完全不同的一边——“我思”——来到我们这里时，尤其应当记起这一点。你们应当感觉到：我如此用心地从“我思”出发加以论述，当然是为了把你们带回弗洛伊德的地面；在那里，你

们将能构想，为什么我们在“我思”层次以纯粹状态把握的主体，会同两个位置如此突兀的对象(a)具有紧密联系。

还必须说，我们并没有成见，也不特别以羞辱人为目标；我们会发现，另有两个对象(a)——奇怪的是——即使在弗洛伊德理论中也仍半隐于阴影里，尽管它们作为活跃层级发挥作用：凝视与声音。我想，下一次会回到凝视。我在这里开始讲课的第一年，作过两场、甚至三场所谓著名研讨[注2]，试图让你们感受到名为凝视的对象铭写于哪个维度。

> [注2] 1964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2月26日、3月4日与3月11日场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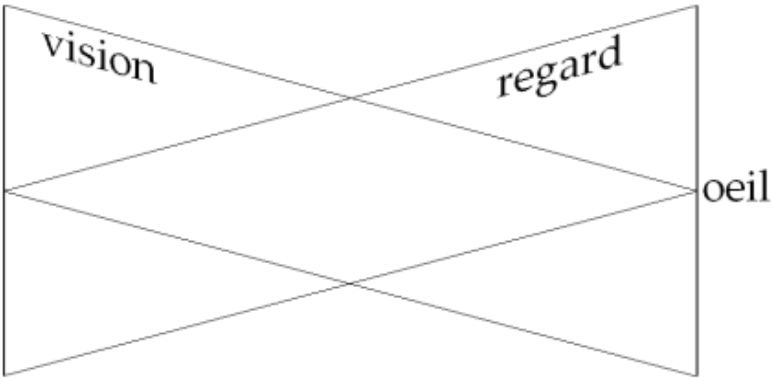
你们有些人肯定还记得。长期参加我的研讨班的人，不可能错过其重要性。既然下一次我大概会把全部重音放在那里，今天我就想请构成我听众神圣营队的各位——也就是你们——在那之前读一点材料，这会让我届时的参照容易理解得多。材料出自我们朋友米歇尔·福柯刚出版的那本才华横溢的书：第一章题为“宫娥”，是米歇尔·福柯《词与物》[注3]的第一章；给今天听力不佳的人再说一次，书名是：《词——与——物》。好书名。

> [注3]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66年。

无论如何，这本书不会让你们失望。我推荐第一章，也确信绝不会因此损害它；只要读过第一章，你们就会如饥似渴地扑向其余所有章节。

不过，我希望至少有些人在下次之前读完第一章，因为很难不在它异常优雅的描述中，看到我从前以两个对置三角形表现的双重维度：视

觉的三角形，其顶端是那个叫作眼睛、被假定构成视觉平面顶点的理想对象；以及沿相反方向以凝视形式铭写的东西。



读过这一章后，你们会……会更轻松地听懂我下次如何延续。再推荐一本小读物，属于消遣类，所谓可以在淋浴时读。一本出色的小书刚以《意识的悖论》[注4]为题出版，作者是我们大概都很敬重的人；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曾在某个时刻打开过他某本蕴含深厚科学学识的书。他就是吕耶先生……

> [注4] 雷蒙·吕耶：《意识的悖论与自动机制的界限》，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1966年。

听说应当读作“吕耶尔”：雷蒙·吕耶，南锡文学院教授……吕耶先生长期在这个外省退隐之地，持续从事一项从认识论角度看极其重要的阐发工作。他在这里给出一部轶事集；在我看来，它具有非凡的宣泄价值：把所谓“意识的悖论”实际缩减为某种《韦尔莫年鉴》的形式——这仍颇为有趣——也就是把它们放回“好故事”的位置。

看来，吸引我们的悖论早就应当是意识悖论以外的东西。总之，你们会在这个名目下看见各种悖论的概括，其中一些极其重要，恰恰因为它们并不是意识悖论；一旦把它们缩减到意识层次，就只意味着一些琐事。这是极其有益的读物。此书表明许多问题根本不是问题；看起来，哲学教学大纲的一大部分都应当从教学场域永久剔除。还能向你们推荐什么？

最近两期《精神》刊出一篇评论，作者据说是一位多明我会神父，署名雅克-M. 波伊耶[注5]；他专门考察一本在这里被多次提到、而托尔先生已对其作出最终裁决的书。[注6] 不过，仍有其他角度可以接近这本书；宗教人士的角度完全不应忽略，请你们读这篇文章。你们会看到，当人们诚实地使用我的教导时，如何能够在宗教视角中运用它。这会同另一本书对我的教导所作的用法形成令人愉快的对照；我这里只间接指称那本书。

> [注5] 雅克-M. 波伊耶：《以父之名》，《精神》，瑟伊出版社，第一部分：1966年3月，第480页；第二部分：1966年4月，第947页。
>
> [注6] 保罗·利科：《论解释：弗洛伊德论》，巴黎：瑟伊出版社，1965年。

还能建议什么？好吧，我的天，我想这些就是全部小小资源了。

不过，你们马上会看到，今天我们要把琼斯的一篇文章列入议程。

因为封闭研讨班的意义，在于让我们从事研读与评论工作；它们能够为研究提供材料、参照，有时也能启动一种方法。我们今天要看的琼斯文章题为《女性性欲的早期发展》[注7]，发表于1927年。我要提醒

你们——之所以提醒，是因为琼斯还写过另外两篇同样重要的文章[注8]；其中第二篇同第一篇一样……

[注7] 欧内斯特·琼斯：《女性性欲的早期发展》，收入《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第399页。

[注8] 欧内斯特·琼斯：《阳具阶段》（1932），第412页；《原始女性性欲》（1935），第442页；均收入《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

不是第三篇，不过第三篇终究也可以不读……已经译成法语——有人用一种让我颇为愉快的方式提醒我，因为我完全忘了——刊于专论女性性欲的《精神分析》第7期；那一期也许尚未售罄。因此，对英语不太熟悉的人来说，它会让你们更容易——我想是事后补读，对那些尚未读过第一篇的人而言——充分把握我们今天将围绕这篇文章说出的东西；读另一篇时，也能在那里找到我希望未来研究所需的开端……

因为我希望，下一次封闭研讨班也能取得与本次同样多的善意；而这一次，我在相当临时的情况下提出请求，值得在这里特别指出，并介绍那些愿意应我的要求投入其中的人。

此外，在这一期女性性欲专号［《精神分析》第7期］中，你们还会看到一篇题为……的文章。

《作为假面舞会的女性气质》[注9]——这正是英文标题的准确翻译——是一篇出色的文章，作者是出色的精神分析家琼·里维埃女士。她在精神分析的所有问题上始终采取最切题的立场；顺便说，尤其是在儿童精神分析问题上。你们看，工作对象并不缺；最紧迫的是下次之前阅读米歇尔·福柯。

[注9] 琼·里维埃：《作为假面舞会的女性气质》，收入 M. C. Hamon 编《女性气质假面舞会》，巴黎：瑟伊出版社，1994年，第197页。

既然我十分重视封闭研讨班这种所谓 from the floor（来自会场）的合作，现在就把话交给穆丽尔·德拉齐安小姐。她愿意为各位作一份介绍、一段导言，讲解琼斯那篇名为《女性性欲的早期发展》——或者《最初发展》，随你们选择——的文章。[注10]

> [注10]　欧内斯特·琼斯：《女性性欲的早期发展》，收入《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帕约出版社，1969年，第399—411页。穆丽尔·德拉齐安在这里采用的是《精神分析》杂志第7期的译文。

你们先来看问题是什么；然后我希望能向你们表明，我打算怎样运用它。

穆丽尔·德拉齐安

［黑板上写：unseen man，unseeing man］

unseen man 这个词出现在琼斯原文中；法语译得很准确，却必然稍稍少了一点……锋芒。

- 女人那里有什么对应于男人的阉割恐惧?
- 女同性恋者的发展与异性恋女人的发展有何不同？［《精神分析》第7期，第240页］

这就是欧内斯特·琼斯提出的两个问题。他发表于1927年《国际精神分析杂志》的文章《女性性欲的早期发展》，正要阐明它们。

琼斯很快就在圈定第一个问题时，把问题集中到阉割概念周围。他停在这里，试图阐发一个更具体、更令人满意的概念，并沿着文章第一段已经宣布的某条引导线索展开。琼斯在那里提到：

- 讨论女性性欲的作者具有神秘化观念与偏见；
- 分析家贬低了女性生殖器官的重要性，因而在这些问题上采取了他所谓“阳具中心立场”。［《精神分析》第7期，第239页］

这些引导线索让琼斯有机会重新追问整个阉割概念，揭示他本人对该概念当时表述不满的各个点；但这并不妨碍琼斯自己在不同地方谈到生物现实具有根本性时，也缠进这条线索：

- 当他强调“男性性器官的首要作用”时：“The all important part normally played in male sexuality by the genital organ……”［第241页］
- 当他谈到阉割所代表的局部威胁时：“阉割只是一种局部威胁，

无论这种威胁多么重要，它所威胁失去的只是进行性行为与从中获得快乐的能力。”［《精神分析》第7期，第241页］

- 当他指出女人在满足方面紧密依赖男人时：“出于显而易见的生理原因，女人对伴侣的满足依赖程度，远高于男人对其伴侣的依赖。

维纳斯与阿多尼斯之间的麻烦，比普路托与珀耳塞福涅之间多得多。”

- 最后，当他明确自己所谓正常性欲的条件时：“在这两种案例中”（指倒错），“首要的困难情境，是阴茎与阴道之间简单却根本的结合。”

卡伦·霍妮所谓无意识成见，促使人们——琼斯告诉我们——过分从男性观点考察性欲问题，因而把他所谓“根本冲突”抛入未被认识的位置：

> “在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明女人为什么至少与男人同样承受这种恐怖——时，我得出结论：‘阉割’概念在某些方面妨碍了我们理解根本冲突。”［《精神分析》第7期，第240页］

琼斯最终提出一个无可争辩地更一般、更抽象的概念：消隐（aphanisis）。

这种消隐，是进行性行为或从性行为获得快乐之一切能力的彻底、不可逆消失。

因此，两性共同具有的是对这种处境的恐惧——英文 dread，比普通恐惧还强。

谈到消隐，我们认为，从临床层次看，这个词只能对应我们所谓欲望的消失。此时，对消隐的恐惧便可翻译为对欲望消失的恐惧；在我们看来，这是同一枚奖章的反面：要么是“不失去欲望”的欲望，要么是“不欲望”的欲望。

无论如何，琼斯没有进一步发展这个概念，只把它用于眼前目的。我们可以假定，它无论对他本人，还是对女性阉割所代表之物的更严密表述，都并不充分。

现在，我们跟随琼斯来到第二个问题。他先概览女孩的正常发展：口腔阶段、肛门阶段、认同于母亲、“口—肛门—阴道”阶段，随后很快出现——如他所说——阴茎嫉羡。琼斯明确区分“前俄狄浦斯”与“后俄狄浦斯”的阴茎嫉羡，或“自体情色”与“他体情色”的阴茎嫉羡；他重申回归作为对后一个阶段剥夺之防御的功能。这里的剥夺是永远无法在性交中同父亲分享一根阴茎；它会把小女孩送回最初的阴茎嫉羡，也就是拥有她自己的一根阴茎。

就在这时，女孩必须选择；这是她对父亲的乱伦依恋与自身女性气质之间的分岔点。她必须放弃：

- 要么她的对象；
- 要么她的性别，琼斯强调道。

她不可能同时保有两者。我想，这时值得读一读他作出明确说明的段落：“在这种处境中，力比多只有两种表达可能，而两条道路都可以采取。

> “大致说来，女孩必须在放弃对父亲的情色依恋，与放弃自己的女性气质——也就是
>
> 对母亲的肛门认同——之间作出选择。她必须更换对象或欲望；不可能同时保留两者。她必须放弃

> 父亲或阴道（包括前生殖期的阴道）。在第一种情况下，女性欲望会在成人层次充分发展——也就是弥散的情色魅力（自恋）、对性交的积极阴道态度，并在怀孕与分娩中达到顶点——
>
> 而且会转移到更容易接近的对象上。在第二种情况下，同父亲的联结得到保留，但这种客体关系
>
> 转变成认同——也就是阴茎情结。”[《精神分析》第7期，第247页]

那些“放弃对象”的女孩继续正常发展。

而在第二种情况下，主体放弃自己的性别，对象未被放弃，反而转化为认同；这是女同性恋者的情形。

“刚才提到的分歧——不用说，它始终只是程度问题——即放弃对象力比多（父亲）的人与放弃主体力比多（性别）的人之间的分歧，也可以在女性同性恋场域中找到。”[第249页]

因此，琼斯又在同性恋群体内部作出区分：

> “可以在其中区分两大群体。第一：仍对男人保有兴趣，却一心想让男人把自己当作同类接纳的女人。某类女人属于这一群体；她们不断抱怨
>
> 女性命运的不公，以及男人对她们的恶劣待遇。第二：对男人几乎或完全没有兴趣，而力比多集中于女人的女人。分析表明，这种对女人的兴趣，是替代性地享用女性气质的一种手段。

> 她们只是利用另一些女人，代替自己展示女性气质。”[《精神分析》第7期，第249页]

现在由我们来强调：按照琼斯最初的划分，这两个女同性恋子群体全都由选择保留对象——父亲——并放弃自身性别的女人构成。

必须在这里仔细跟随琼斯的陈述，看看发生了什么：“很容易看出，刚才描述的第一群体涵盖那些宁愿放弃自身性别的主体之特定方式；而第二群体则对应放弃对象（父亲）、并通过认同取代他的主体。”[第249页]

我重复：“……而第二群体则对应放弃对象（父亲）的主体……”

> “属于第二群体的女人也认同于爱之对象，但这个对象从此对她们失去全部兴趣；她们同另一个女人的外部客体关系极不完善，因为后者从此只借助认同来代表她们自身的女性气质；她们的目标，是从一个始终对她们不可见的男人
>
> （内摄到她们内部的父亲）那里，以替代方式取得女性气质的满足。”[《精神分析》第7期，第249页]

这就是那个始终对她们不可见的男人：unseen man。

根据这些描述，我们只能注意到，这种对女人多少有些逃逸的兴趣似乎指向一种属性，并不存在真正的客体关系。

如果这里涉及双重认同，该怎样理解？

- 一方面认同于父亲；
- 另一方面认同于女情人？

我们提出，这个例子涉及一种象征性操作：

- 第一，女情人是失去的女性气质之符号，而不如说是主体已经放弃的女性气质；
- 第二，这个对她不可见的男人，the unseen man……

这不表示 the unseeing man，即“看不见东西的男人”

……父亲，或者更准确说，父亲身上正在看、父亲身上 seeing 的东西——眼睛；

这个符号已经由琼斯在其象征主义理论中提到，而且他在这里把它明确规定为阳具性的；

……它才是真正的对象，因为它的在场是完成仪式所必需、甚至不可或缺的；仪式旨在把父亲没有给予的东西归还给他。

为了给你们留下这类关系的一个极其鲜明的意象，我想读《在斯万家那边》中的一段插曲。叙述者马塞尔看见这一幕；在那个时刻，若你们愿意说是偶然，他本人也是 unseen，也就是说，他藏了起来，或因情势而隐蔽；场景在他面前展开，没有人知道他在那里。

当然，整个场景都很有意思。我只读几行：

“在绉纱上衣的领口处，凡德伊小姐感觉朋友印下一个吻。她发出一声轻叫，挣脱开来；两个人跳跃着彼此追逐，宽大的袖子像翅膀一样飘动，像相爱的鸟儿一样咯咯叫、啾啾鸣。最后，凡德伊小姐倒在长沙发上，朋友的身体覆住了她。可是朋友背朝那张小桌子；桌上放着老钢琴教师的肖像。”

拉康——那就是她父亲……

穆丽尔·德拉齐安

“凡德伊小姐明白，如果不把朋友的注意引向肖像，她就不会看见它；于是她仿佛刚刚才注意到似的说：

‘哦，父亲的这张肖像正在看着我们。我不知道是谁把它放在这里的？

我明明说过二十次，它不该放在这里。’

我记得，凡德伊先生谈到那首乐曲时，也曾对我父亲说过同样的话。毫无疑问，这幅肖像通常供她们完成亵渎仪式，因为她的朋友用一套大概属于礼仪应答的话回答：

‘就让它待在那里吧，他已经不在这里烦我们了。你以为他如果看见你在这里，窗户开着，会哭哭啼啼，想给你披上外套吗？这个丑猴子。’

凡德伊小姐温柔地责备道：‘好啦，好啦。’……”[马塞尔·普鲁斯特：《在斯万家那边》，七星文库版，1954年，第162页]

后面还有：

> “可是，她无法抗拒这样一种快乐的诱惑：一个对毫无防卫能力的死者如此无情的人，却会温柔地对待她。她跳到朋友膝上，庄重地伸出额头让朋友亲吻，仿佛她就是对方的女儿；她欣喜地感觉到，两个人将这样把残酷推向终点，甚至从坟墓里也夺走凡德伊先生的父亲身份。”［第162—163页］

再后面（这是叙述者说的）：

> “……现在，我知道了凡德伊先生生前因女儿承受的全部痛苦，在死后从她那里得到了怎样的报酬。”［第163页］

拉康

谢谢你，小姐。

好。德拉齐安小姐归根结底为你们作了一段导言；我的天，一段迅速的导言。

它没有……而且我们完全没有理由责怪她，因为这只是一段导言。

关于这篇文章，她凸显了两个十分重要的东西。文章虽短，却有一些她认为应当省略的绕路，例如剥夺观念、随之而来的挫折观念、剥夺与阉割的关系；至少对那些记得我所教内容的人而言，这些词都相当重要。

不过，她这样做并没有错，因为对始终处在听者之困难位置的你们来说，得到凸显的是两个词项：

- 一方面是消隐概念；
- 另一方面，是弗洛伊德……不！是琼斯。他努力寻找女人那里的阉割究竟怎样，结果被带回一些包含我们严格可以称为“结构参照”的立场。

这些结构参照——请你们回去读文章——他显然不知道怎样组织。

他之所以不会组织，是出于与象征主义文章相同的关切：以严密而有效的方式标出弗洛伊德无意识理论的锚点由什么构成。

从弗洛伊德主干分离出去的一系列支流，把象征主义变成了这样一种东西：它允许按这个词的通常意义，对无意识操作所凸显的要素作“象征性运用”。

这种象征性运用，例如让荣格把蛇看作力比多的符号。弗洛伊德对此采取最坚定的反对立场；他说，如果蛇确实是什么的符号，它就是阳具的表象。

于是弗洛伊德……琼斯！我已经两次这样口误了！琼斯费了很大力气，向我们展示隐喻——因为归根结底，他不得不诉诸这一语言学参照——怎样沿两个方向发展。

其中一个方向，是内容越来越轻……

我们无法参照别的语域，尽管这不是他使用的词；但他被迫使用许多属于同一秩序的其他词……也就是某种稀薄化、排空、抽象化或一般化。总之，它尊重关于对象一致性的那套编排与层级，而这属于一种最终仍然经典的认识论。

我们很清楚，琼斯要向我们表明的，是符号绝不具有这种功能；恰恰相反，符号会把我们带回他以自己的语言、尽其所能称作“初级观念”的东西。

也就是某种同时以具体、特殊、独一、引人关注为特征的东西；可以说，是个人在其生命本身中的总体性与特异性。为了不采用他当然避免的词，我们这样说；那个词无非是“存在”。

然而十分清楚，当他参照这些“初级观念”，并把与存在有关的词项——比如出生、死亡、同亲近者的关系——铭写其中时，他本人指出的并不是生物学给定，而是一种超越、转置、转录生物学给定的论述；它把生物学给定放进只存在于存在关系中的条件内。

琼斯象征主义文章的全部含混都在这里。不过，他所瞄准的……

……他主要努力表明象征主义所涉及的东西……圈定了一个他不知道怎样指称、却仍借助其冲力自身的运动、借助自己对分析问题的具体经验而圈定的东西。

他最终取得这样的结果：以如此独特的方式把一些符号推到前台，而它们全都在不同程度上是阳具的符号；这迫使我们归根结底追问，阳具在象征秩序中是什么。

他远没有说服我们相信阳具纯粹而简单就是阴茎，却敞开了一个问题：若干实体为何具有中心价值？阳具是其中以最大具身程度呈现的实体，尽管它只在一道帷幕后呈现，而琼斯没有揭开帷幕。正因此，我会请今天已经准备过这篇文章的人重新报告；不过他自己宁愿把报告推迟到后面，也就是下次封闭研讨班。

届时，我会在评论中重拾这篇象征主义理论文章的细节。不过现在就提醒你们：我有一篇文章，如果记得没错，刊于《精神分析》第6期……

是在第6期刊出的吗?

萨富安——第5期！

拉康——第5期……《论琼斯的象征主义理论》。[注11]　　今天所做的……

> [注11]《文集》第697页，或第二卷第175页。

……相对于我将在后续研讨班围绕对象(a)功能展开的东西……具有某种——我不说预示，而说地平线——的价值。因为归根结底，对象(a)的位置与某件事有关：这个位置是根本的；它让我们能在一种只有“幻想”这个名字的结构方式中，理解对象(a)在规定主体裂分时具有的决定性功能——我说过，它像支撑或支架那样决定。

正如我刚才论说中已经指出的——当然并不新鲜——对象(a)并非以四种形式，而是以四个侧面呈现，因为它首先铭写在索求与欲望这两个侧面上。

在索求侧面，是我们以以下样态认识的对象：

- 乳房，取精神分析赋予它的意义与功能；
- 排泄物，或者如人们所说，粪便。

另一个侧面是欲望关系的侧面，所以是更高一阶的功能。顺便指出，德拉齐安小姐刚才所读法文中有一处不准确：某处被译成了欲望……

也就是说，女同性恋者被迫放弃自己对对象的欲望，以免放弃自身性别……这是不准确的。英文是 the wish；既然是 the wish，就不是欲望，而是愿望或索求。

我们已经充分定位欲望相对于索求的拓扑位置；所以当我围绕另外两个对象(a)的功能谈另一个侧面时，你们应当明白我的意思，即：

- 凝视；
- 声音。

在这两组配对中，从主体到大他者可以这样定位一种对立：

- 大他者的索求：这是作为粪便的对象(a)；
- 向大他者的索求：这是作为乳房的对象(a)。

好，同样的对立也存在。因为我尚未解释，它现在只会显得更加晦暗。不过，这种晦暗并不那么在于：

- 大他者的欲望；你们立刻就会感觉，它由声音支撑；
- 而是向大他者的欲望；它代表一个维度，我希望围绕凝视向你们开启。

但在对象(a)功能的核心，我们显然必须找到对于主体功能的设立与建立完全居中的东西。

严格说来，阳具前来占据的正是同一个位置。若用一个共同问题的括号把全部相关对象都包进去，阳具在其中绝不具有相同性质。它并不作为器官进入，因为归根结底，在所有这些案例中——不管其中两个在你们看来多么非物质——涉及的都确确实实是一个器官代表。

在凝视与声音层次，它当然已经显得实体性更弱、更难把握；但我们在这里找到阳具，绝不只是因为不可把握性存在某种尺度差异。

阳具本身进入一种现在必须界定的功能；严格说来，这个功能只能在能指参照中界定。这里揭示的双重维度——你们将会看到——使对象(a)在凝视与声音情形中所具有的逃逸、不可把握之实体性质发生分化。

对这两个对象而言，这种逃逸与不可把握，同阳具的同类性质绝不具有相同本性。

像琼斯先生这样的人会发生什么？我要说，他受到最早期分析研究之最纯粹风格的滋养与启发；当时，经验现实所具有的发现价值还绝不

可能被缩减，也尚未被逐渐重新吸入一系列道路与轨迹。相对于这种经验，那些道路严格说来代表合理化；它们使精神分析沿某条道路发展，而这条道路在某种意义上应当与安娜·弗洛伊德在儿童层次对精神分析作出的教育性缩减平行定位。

精神分析在成人方面的这种偏折无论受到怎样遮掩，我们仍可以说：在事物当前状态中，凡是像人们所表述的那样引入对现实的任何参照，或引入一种更好的、较少膨胀、所谓更强的自我之建立，都只是把分析让我们得以想象的道路带回发展语域，带向一种矫形术；而这种矫形术从根本上消解了精神分析经验的意义。

琼斯当然还没有走到那里。他在我们面前产生的东西，确实倾向于在若干既有参照中重新寻找支点；德拉齐安小姐谈到诉诸若干所谓科学偏见时，正是指这一点，例如生物学参照的优先性。为什么是“优先性”？当然，绝不是要忽略它，甚至也不是不能说它归根结底是第一位的；但一开始就把它设定为第一位，全部错误正在这里，因为眼下所要做的是证明它。而它并未得到证明。

至少在出发时，它并未得到证明；尤其当我们面对阉割情结的普遍性这种悖论现象时。这里的普遍性也表示两性中都发生作用；可两性相对于某样首先、根本地勾勒阉割情结结构的东西，并不处于相同位置。这种东西只关系到生殖装置的一部分，而且仅仅一部分：它以公开、可见、在格式塔意义上多少具有孕形力的方式显现；在男人那里，这就是阴茎。

这里与其说是特权，不如说是一种取得显现、显露价值的特权；至少乍看之下，它仿佛正以这种方式带着占优势的价值进入。

换句话说，如果从某个侧面考察阉割情结，它将取得的正是这种功能。

好，十分值得注意的是，琼斯的第一步走向主体化。

我赋予这个词在这里能够取得的全部分量；毕竟，近两年来我一直在陈述主体的定义，而对那些几乎始终来这里的人来说，当然更早便已如此。

只要稍稍熟悉这个视角，我们就不可能看不见：琼斯围绕阉割情结引入消隐一词，同我向你们呈现的主体本质具有何种关系；也就是那种fading（淡隐），那种永远隐没到能指背后、或从间隙中涌现的运动。它在主体的基础、地位以及构成主体存在的东西中，界定主体本身。

这里有某种扭曲，让我们能够以完全不同的方式接近“存在—非存在”的关系……

不是以某种从这种关系中抽身的方式，仿佛一个判断可以在某处把握存在与非存在的关系；而是以一种深深卷入其中的方式……它让我们把握：若不从我们自己作为主体也卷入这项深刻双重性这一点出发，就绝不可能思辨、推理、组织一切与主体有关的东西。这项双重性也正由笛卡尔的 cogito 提炼出来：它固定在一个不断缩减到理想的点上，直到成为虚无之存在，也就是“我思”。

“我思”单独并不表示任何东西；它使我们能够分开、区分并显示：必须假定主体的这种持续存在经受何种扭转，主体才会在这样的透视中显现——存在分裂为先于思想的存在，与思想使之涌现的存在。后者

就是思考者之“我在”的存在；它因为思考者说“所以我在”而被带到涌现中。

琼斯的消隐只有在这种存在维度中才可构想。因为他本人怎样论述它？对于一种恐惧——失去英文所谓 capacity、失去……sexual enjoyment——任何不属于主体秩序的东西怎么可能发生退缩？我知道，很难为英语所指找到一种等价于法语 jouissance 的支撑。Enjoyment 与 jouissance 的回响不同；也许必须把它同 lust 结合起来，才会稍好一些。

无论如何，我上次已经标明，我们将要引入享乐这个维度。它本身提出一些根本问题；只有在赋予“我思”之“我在”以地位后，才能真正引入。对我们而言，享乐只能与身体的全部在场相同；只有从身体出发，享乐才能被把握、被构想。

那么，一具身体怎么可能涌现出某种“不再享乐”的恐惧？

快乐原则向我们指出的恰恰是：如果确有一种恐惧，那是对享乐的恐惧。

严格说来，享乐是一道看不见界限、也看不见定义的开口。无论以何种方式享乐，无论好坏，只有身体能够享乐或不享乐。

至少我们将这样界定享乐；至于神的享乐，如果你们愿意，就把问题留待以后！不是说它不会提出。这里似乎有一道必须把握的隘口：享乐与主体之间的关系怎样能够建立？

因为主体说“我享乐”。分析思想的中心，我不说它是隐含的，因为弗洛伊德已经明确表述、明白说出：对主体而言，没有什么比性高潮更有价值。性高潮是一个幸福的特许顶峰得以实现的瞬间。这值得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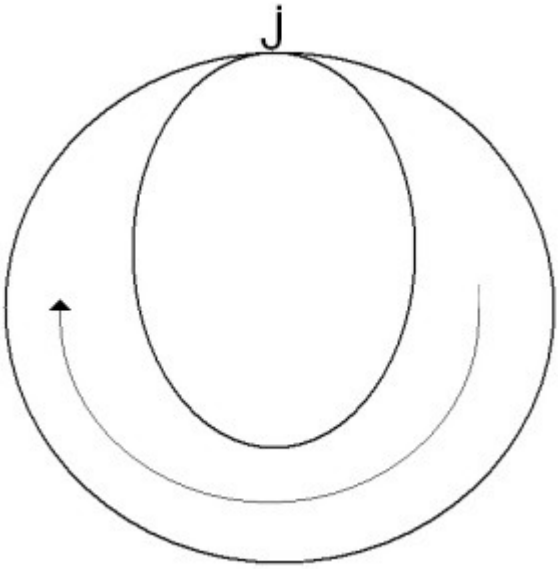
此外，同样引人注意的是，这种断言本身仿佛包含一个同意的维度。即使有人对我们能够达到性高潮的条件、对其满足程度有所保留，也仍会认为：如果这个性高潮不充分，便另有一个更真实、更有实体的性高潮。无论给它什么名字——合一、合一道路、融合、全体性、自我丧失，随你们怎样称呼——涉及的始终是性高潮。

即使仍给这个被当作出发点的东西挂上问号，我们是否仍能从现在起把握：我们可以把性高潮放在这项暂定功能中，把它视作一个交叉点、一个涌现点，也就是享乐恰恰浮现到表面的点？这对我们具有特许意义，因为它浮现之处，是那个最卓越的表面：我们已经界定并试图作为结构加以把握的主体表面。

我立刻指出，这一点在——为什么不呢？——我们所谓系统中可以取得哪些标记。

我不拒绝“系统”这个词，只要你们所谓系统，是我以拓扑参照来系统化事物的方式。

我们完全可以把性高潮中的享乐，看作铭写在环面某种特殊形式中的东西。假如环面就是通过一连串重复索求的环路而完成的欲望循环，那么，按照性高潮作为终点或回折点——随你们怎样定义——的某些定义，涉及的环面大致会是这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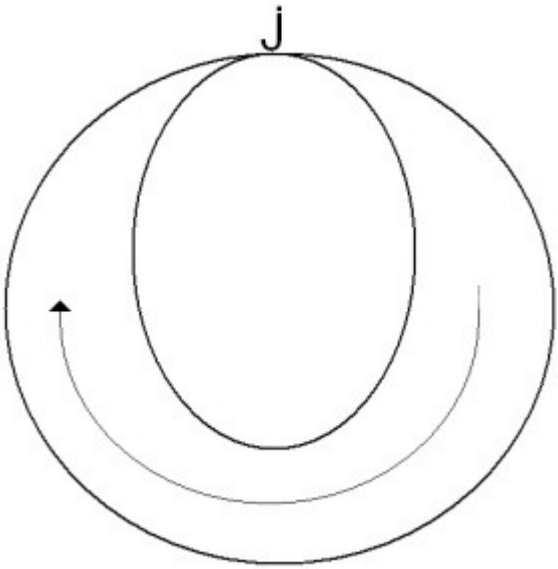


但在这里［J］，它具有点状价值。换言之，一切索求都在那里缩减为零；但同样清楚，它蒙骗了欲望。可以说，这就是性高潮的理想而天真之功能。任何人若试图从内省材料来界定它，都会把性高潮的时刻——我说的是性高潮——安置在这个短暂的归零瞬间中；它是点状、转瞬即逝的瞬间，代表着主体在其撕裂与分裂中所能成为的一切的维度。

显然，问题在于作为享乐的性高潮。我们不能只因性结合在这个理想——我强调理想——时刻实现它，就说它内在于性结合；证据是，这个性高潮时刻在自慰中完全等价。我说的是：就它代表主体的这个终点而言。因此，在这项功能中，我们只保留其享乐性质；而这种享乐尚未得到界定或说明。

不过，只须察觉克莱因瓶的“形式”——如果我敢这样说——与此之间的类比，就能让我们理解……

只要还能谈形式；既然我把它画出来，它终究有一个形式……我把它画成与各位通常看到的相反形式；在我称作其开口、翻转圆的图中，克莱因瓶的上端显得像刚才的［J］点。





我已经教你们在这个翻转圆中找到主体两个侧面的结点：它们通过“知识之存在”与“真理之存在”缝合处的对峙而接合。我还告诉过你们[注12]，正是在这里，我们必须把症状铭写为一方与另一方的接合。

[注12] 参见1964—1965年研讨班“关键问题”，1965年1月13日、20日与27日场次。

不要忘记弗洛伊德始终对症状功能说出的、最本质的基础之一：症状本身就是享乐。

所以，在主体层次，除了性高潮之外，还有其他在结构上与之类似的享乐涌现方式。

要列出弗洛伊德多少次凸显性高潮功能与症状功能之间的等价并不困难，只是时间不允许。他究竟对不对，与弄清他当时是什么意思、我们能由此构造什么，是不同问题。

那么，在把性高潮与性享乐等同之前，也许应当三思。

性高潮是人的性享乐的一种显现，并因它在主体中占据的功能而格外复杂；这正是我们所面对的。若把这三个维度仿佛压塌成同一个现实，就完全错了。

因为这样严格说来会以危险地受到遮掩、而且尤其荒谬的形式，把我刚才提到的古老神秘主义含义重新引入一个根本不需要它们的经验领域。从前有位诗人[注13]说 post coitum animal triste（交合之后动物悲伤），还补充了一句——人们总忘记——praeter mulierem gallumque：女人和公鸡除外。奇怪的是，自我所谓精神分析神秘主义出现以来，交合之后人们不再悲伤。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注意过，但这是事实。

> [注13] 克劳狄乌斯·盖伦：《灵魂及其激情》，美文馆出版社，1995年。原句：“Post coitum omne animal triste est, sive gallus et mulier。”

女人当然原本就不悲伤；不过既然男人原本会悲伤，他们现在不再悲伤，也很奇怪。

相反，当女人没有享乐时，她们会变得异常抑郁，而此前她们对此适应得非常好。这就是我所谓精神分析神秘主义的引入。

还没有人最终证明：女人为了履行女性角色，必须不惜一切代价获得性高潮。证据是，人们仍在争论女人那种著名的性高潮究竟是什么。

不过，这种形而上学已经取得如此大的价值……我认识许多女人，她们因为不确定自己是否真正享乐而生病；其实，她们对自己所拥有的并没有那么不满意。如果没人告诉她们“这还不是”，她们根本不会担心。

因此，必须把性享乐的问题说得稍微清楚一点。如果首先提出，我们首要关心的是主体层次的情况，这就是净化问题的第一种方式。但也可以追问性结合层次的情况。

因为这里十分值得注意：我们总仿佛在说，只因生命体存在性差异，并要求彼此结合，结合的完成就会伴随某种单义享乐；这种单义性意味着，只须从我们人类——或者更具体说，演化程度更高的灵长类——对享乐的认识外推出去。今天我不会进入这一章，因为奇怪的是，从来没有人处理它。总之，事实是它尚未得到处理。

不过十分清楚，首先，在动物界绝大多数雌性那里，我们不可能界定、把握任何可以称作“性高潮”的征兆。只有一两个物种可以……

它们恰恰只表明，如果存在征兆，我们原本能够找到，因为有时确实找到……可同样完全清楚，在其他所有地方都找不到，至少找不到雌性性高潮的客观征兆。

既然原本可以找到却找不到，这仍足以使你们对性结合中的享乐样态产生一点怀疑。

我并不是说……我看不出为什么要把性结合排除在享乐维度之外；在我看来，享乐维度与身体维度完全同延。但它未必就是性高潮。它也许具有完全不同的本性。证据恰恰在性结合最惊人的地方：例如青蛙之间，性结合持续十来天；在那里我们清楚看到，问题涉及的是性高潮以外的东西。这仍十分重要。

我们这里充满隐喻。充血与消退是其中在我看来最离奇的一组。人们想在一连串行为中，显明相对于结合可以称为“上升行为”或接近行为的东西；随后是“负荷释放行为”，分离在它之后发生。

可勃起器官的存在方式远非普遍。有些动物……

我不打算在这里以生物学取乐，但请你们翻开大型动物学专著……有些动物借助完全不充血的固定器官实现性结合，因为那些器官纯粹而简单就是钩子。看来很明显，在这些案例中，如果性高潮存在，即使在雄性那里也必然具有完全不同的面貌；没有什么表明它能够得到任何主体化。

引入这些区分在我看来很重要。因为琼斯从一开始仿佛就偏离并感到惊讶——他正是这样引入消隐概念——总而言之，以下两者具有截然不同的性质：

- 在经验中被实体化的阉割观念，即阴茎的消失；
- 以及某种在他看来最为重要的消失，但消失的不是阴茎；对我们来说，只能是主体的消失。……而他想象它可以是对欲望消失的恐惧。可这在某种意义上自相矛盾，因为欲望恰恰由害怕失去自身而支撑；不可能有欲望的消隐，主体也不可能表象这种消隐，因为欲望正由它支撑。

斯宾诺莎的“保持在存在中”，同“欲望是人的本质”[注14]是同一文本、同一主题。

> [注14] 斯宾诺莎：《伦理学》，L'Éclat 出版社，Misrahi 译，2005年。

人作为欲望保持在存在中。他绝不可能以任何方式逃离欲望的这一支撑。

这里恰恰存在一种含混：它既可能包含自身的遏止与恐惧，作为“防御的一面”，同时又包含朝向享乐的“悬置的一面”。

那么，琼斯为我们走过的那道弧线、那条轨迹的另一端，是否恰恰在这里获得了全部价值？他以极其坚定的方式——而且多么有道理，因为问题在于把事情引入主体的层次——就女人而言，因为这里谈的正是她，把我们带到她的主体性僵局可能如何呈现的核心。

与“儿子—母亲之偶”相对——整个精神分析探索不无理由地从后者出发——他向我们谈到“父亲—女儿之偶”。

他对我们说了什么？这里一切都从一种剥夺出发。至于“父女乱伦”，凭借我们的全部经验，我们知道，它就其精神分析后果而言——我无法用别的方式界定，姑且说是致神经症的，但这个词还不充分，因为它甚至可能产生致精神病的后果——比起总会带来我所暗指的那些毁灭性后果的“母子乱伦”，危险性要小得无可比拟，甚至可以说危险性为零。

在父亲—女儿之偶的层次上，“禁令的功能”——它在自身的辩证后果中发挥作用，也就是所谓“乱伦的根本禁令”，即对母亲的禁令——采取了一种简化的形式，由此凸显出女人相对于性结合所具有的特权功能。

因为，如果某一类生物的特性在于：一个既能勃起、又因而被赋予作为享乐支撑之特权的器官，充当这种结合的接纳器，那么，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对她而言，并不存在问题：倘若事情具有绝对价值，那么可以说，做爱必然是异体塑造的，也就是说，这意味着她要走向那个拥有它的人。

倘若她不具有小男孩的某些属性，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小男孩还具有别的属性，恰恰在于他可以享用自己，就像一只小猴子一样。

所以问题本来会非常简单，但恰恰不是这么回事，因为语言和法则存在——父亲是被禁止的——问题便由此开始发挥作用。

然而，琼斯对我们说了什么？他在向我们讲述自己的经验时，又向我们高声疾呼些什么？

他所说的无非是：即便在这里，女人仍将保有她的优势，仍将成为获胜者；但必须看清她如何获胜，而要看清这一点，就不能让头脑里继续塞满所有这些偏见。

让我们看看他说了什么：女人必须在“她的性与她的对象之间”作出选择；她放弃“父亲对象”，于是便保住自己的性。在这种情形中，力比多只有两种可能的表达方式，而这两条道路都可能被采取，大体说来，就是在以下两者之间作选择：

- 放弃她对父亲的情色依恋；
- 放弃她的女性性。

她必须更换对象或欲望。关于在这一层次上发生的事情，他会告诉我们什么？来吧，德拉齐安小姐，请准确地告诉我们那个段落的位置，他在那里向我们描述……就是这里：“在第一种情形中，女性欲望在成人层次上充分展开，也就是说，弥散的情色魅力”——这是他的强调——“自恋。”

相关知识卡 女性气质作为假面：里维埃与拉康

这是什么意思？在这里，从琼斯[注15]的经验来看，对于我不愿称为正常、而只称为合法的那种选择——也就是放弃“父亲对象”以保全自己的性，归根结底问题正在于此——他首先必须强调的是：为了保全某

种东西而放弃对象毫无用处，因为那个想以放弃为代价加以保全的东西，恰恰就是由此失去的东西。

> [注15] 拉康口误（？）：应为弗洛伊德。

因为，那种通过操弄自恋行头而形成的“弥散的情色魅力”，与女性性的本质究竟有什么关系？它不正是琼·里维埃夫人以“伪装”之名所标示的女性性吗？

相关知识卡 女性气质作为假面：里维埃与拉康

而这必然反映出某种东西：正是从这样一种选择出发，女人必须占据“对象(a)”的位置；至于其中的理由，正有待我们加以说明。

相关知识卡 女性气质作为假面：里维埃与拉康

从父权的、父权化的视角来看，由男人的一根肋骨所生的女人，就是一个“对象(a)”。

为了保全自己的性而服从法则，不仅不能使她免于失去它，反而使这种失去成为必然。

相反——这不是我说的，而是琼斯说的——在另一种情形中，即保留对象，也就是保留父亲，结果将是什么？结果就是同性恋选择……

相关知识卡 女性气质作为假面：里维埃与拉康

我再说一遍，今天我只能告诉你们：这是琼斯说的。

相关知识卡 女性气质作为假面：里维埃与拉康

毕竟，我们身后还有全部经验作为支撑，其中也包括对普鲁斯特全部呈现的一种略显不完整的标示——之所以不完整，是因为有所省略；他的直觉与艺术都带有那种“占卜般的”性质，不过这并不重要！

恰恰是在另一种情形中，也就是说，只要父亲对象得到保留，女人会找到什么？

也就是琼斯所说的：她的女性性。因为在任何同性恋态度或功能中，女人在“对象的位置上”找到的东西——而人们说，那是在“原初对象的位置上”——正是她的女性性。

接下来，是这第二种选择内部所发生之事的第二阶段。在这里，琼斯所用的词语——尽管不由自主——并不含混。选择将依据我们所谈的那个东西之功能的强化而作出，也就是依据某个特定对象，而且是作为失落对象的这个对象：

- 要么，这个对象成为“诉求”的对象，所谓的女同性恋者于是成为一个与男人竞争、并要求像他们一样拥有“阳具”的女人；

- 要么，在同性恋之爱的情形中，她正是以并不拥有它的名义去爱，也就是说，实现了归根结底作为爱的顶峰之事：给予她并不拥有的东西。

因此，归根结底，作为女性性本身的享乐，只能由这一同性恋出发点而来——毕竟，为什么不承认这一点呢？这一出发点只不过说明了“阳具”所承担的中介功能，而这使我们得以标出它的位置。因为，倘若就主体的地位而言，问题在于“知道存在者由于成为说话者或思考者，而

从存在中失去了什么”，那么，当问题涉及享乐时，也必须知道什么前来占据这一失落的位置。

享乐的特权器官被用于此，又有什么比这更自然的呢？恕我这样说，这正是“男人手边现成的东西”。

但事情于是分两个层次发生。这个器官——如同一切器官——会被用于某项功能。

功能远非创造器官；有许多动物拥有一些器官，在很长时间里，它们肯定根本不知道能拿来做什么，直到找到“某种窍门”来使用它。我可以给你们举出许多例子。当然，这些器官并不像肝脏或心脏那样是绝对不可或缺的。有一种动物在食道里长着一把小锯子。人们得费如此大的力气，才能弄明白它能拿这东西做什么，以至于不得不惊叹，它竟然成功地让这东西派上了用场。

嗯，这里也一样。人们要用这根阴茎做一件有趣得多的事情，也就是把它做成一个能指，一个表示因法则功能而在享乐层次上发生之失落的能指。而重要之处并不在于它作为能指的功能。当你们比大多数人更仔细地看过语言中所谓的“语素”以后，你们就会知道所谓格或“无标记形式”具有什么功能。

这里本来可以有“一个词尾”或“一种屈折变化”，用来表明它是“将来时、过去时、名词、部分格”[注16]，或者“扭曲格”〔？〕。

> [注16] 表示与整体相对之部分的语法范畴。

而恰恰在这个位置没有标记，本身就是有意义的。能指作用之功能的本质就在这里。倘若女人把由于不拥有“阳具”而得到的东西保留下

来，并把它提升到更高的幂次，那正是因为她能够使这一“阳具”功能完满实现“阉割”核心中的东西：“阳具”这个词——也就是“阉割本身”——并且能够在这一“无标记”的位置上承担它的能指作用功能。

今天我就在这里结束。考虑到时间，我当然不得不有所缩短。

我想，至少对这里那些我尤其希望他们“把握”这一点的人来说，你们已经看到，这个再也没有人谈论的“阉割情结”重新浮现，将把我们引向何处。颇为引人注目的是，在我让你们参阅的上一篇文章里，指出某本书完全没有谈到“阉割情结”的，竟是一位“多明我会神父”——他既未受过分析，也不是分析家。

这并不奇怪。我没有教过那位作者阉割情结是什么。他不可能知道。

但我希望，在我认为足够的时间内，也就是最迟到今年年底，我们能在这个问题上有所推进。

第16课 · 1966年5月4日

对我们来说，问题在于定位我们的拓扑学：把我们“分析家”定位为在其中行动的人。

最近，在一次人数很少的闭门会议上，有人就我对这一拓扑学所说的话提出问题：“它不是一种隐喻。”

究竟如何？把我们作为主体定位于一种并非隐喻性的参照中，意味着什么？

我没有回答：向我提问的人没有参加上一次闭门研讨班；我本可以给出的省略式回答——“让我们直面享乐”——会是一句未得到充分阐释的回答。

被定位在不再是“主体的隐喻”的东西中，就是不在任何意指效果中，而在组合机制本身所产生的结果中，寻找主体位置的根基。

那么，在主体的经典位置上，在客观世界的构成所必需的这个场所中，主体究竟是什么？

请注意，对“这一纯粹主体”——哲学理论家把它的统一性参照推至极端的那个主体——我说，人们并不完全相信它，这是有理由的。人们无法相信“世界的一切”都只悬系于“它”；所谓“唯心主义的指控”，正在于此。正是在这里，必须探究这一主体的“视觉结构”。

我已经开始接近我们的分析经验首先为我们提供的材料：“屏幕，屏幕”——我们的分析经验告诉我们，它“是我们怀疑的原则：被看见的东西并不揭示什么，而是遮蔽着某种东西。”

然而，对我们来说，这一屏幕支撑着一切呈现出来的东西。表面的根基，处在我们所谓“形式的组织”“星座”这一切的原则之中。于是，一切都被组织为平行平面的叠置，而作为“表象”本身的无出口迷宫由此建立起来。

我曾向在座大多数人推荐一本书——况且今天的听众也不比上一次多多少——吕耶先生的《意识的悖论》；你们会在那里看到这种结构性回返的后果。

我们把一个表面上的东西同另一个表面逐点对应起来时所构想的一切，在那里都通过一个点的图示得到形象化：从该点发出的射线穿过两个平行平面，使一个平面上的痕迹同相应平面上的另一个痕迹之间显出“一种根本的同源关系”。因此，无论我们怎样操弄“意象”同“对象”的关系，结果都必然要求在“某个地方”存在那个著名的主体：它统一构型，统一星座，把星座限定为几个明亮的点，并在某处统一构成星座的那个东西。

“主体”的重要性由此而来。但这种向“神话式统一体”的逃逸——在其中不难看出一种纯粹统一精神的要求——经由我带领你们走的道路，也就是严格说来所谓的方法，抵达了“这一拓扑学”。它所包含的看法是：不应当把构成统一要素的东西，诉诸对“眼底那个称为视网膜的表面会对应什么”的寻找，也不应诉诸任何别的成像点。

当然，这从笛卡尔对“广延”与“思想”的区分出发。这一区分把“广延”，也就是空间，假定为“同质的”；它在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意义上是同质的：如笛卡尔所说，必须把它完全构想成“各部分彼此外在”（partes extra partes）。不过，这句话遮蔽了一点：它是“同质的”，也就是说，每一个点都既不同于、又等同于所有其他点；这正是该假设的意思，即“它的所有部分彼此等值”。

相关知识卡 笛卡尔的广延与牛顿引力的超距难题

然而，当我们不再把空间结构同“思想”区分开来——这里的“思想”仅仅并且根本地由“能指组合机制”所支撑——经验告诉我们：

- “这一空间”实际上不能同它分离；
- 相反，空间同它内在地连贯一致；
- 完全不需要一种凌驾其上的思想，来重新把握这一必然的连贯性；
- “思想”并不是通过“把度量引入其中”才进入空间的；这种仿佛可以施加于空间、对它进行测绘的度量，远非探究空间，而是在建造空间。

我由此指出了几何学第一步的本质，“几何学”这个名称仍保留着它的痕迹……这里说的是希腊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它完全奠基于“被引入的度量”这一主题；而其中遮蔽着这样一点：承载这一度量的并不是“思想”，严格说来，而是希腊人自己称作“尺度”的东西。

“人是万物的尺度”〔普罗泰戈拉〕。也就是说，是“人的身体：脚、拇指与肘尺”。然而，仍被称作“几何化”的“思想”不断进展——“依几何学

方式”（more geometrico）一向显得是一切思想演绎的理想，这无疑并非没有理由——这种几何学的进展，我说，使我们看到另一种进路的出现：在其中，“广延与组合机制紧密地打成结”；严格说来，这就是“射影几何学”。

这里所依靠的并非相等、度量或重合效果。你们或许还记得，为奠立几何学最初的演绎，人们往往付出艰苦努力。回想一下，当年有人用平面上的一次翻转来蒙混过关：天知道，为奠立等腰三角形的地位，这一操作看起来根本不包含在前提之中。“位移、平移、操弄，乃至位似”：欧几里得演绎从中扇形展开的这一整套游戏，在射影几何学中发生了严格意义上的转变，因为从一个图形到另一个图形，变换之等价性的功能被引入了。

颇为特别的是，这一进展在历史上以严格说来属于艺术家的人们的贡献为标志，也就是那些关注“透视”的人。透视不是光学。透视所涉及的并非“视觉属性”，而恰恰是这种“对应关系”：一个表面上所绘图形的结构，同“另一个表面”上生成的图形相对应；其中只有这样一种连贯性，即从某一点出发的直线把该点同第一个图形的各个接点连接起来，继而穿过另一个表面，使另一个图形显现出来。我们在这里重新找到了“屏幕的功能”。

这里丝毫不蕴含一个图形同另一个图形之间会显出“相像”或“相似”关系，而只蕴含一种我们可以在二者之间界定的连贯性。“屏幕”在此发挥介入“主体”与“世界”之间的东西的功能。

它并非一个同其他对象一样的对象。某种东西在其上露出一点。

在界定表象是什么之前，屏幕已经在地平线上向我们预告了表象之“代表”的维度。在世界成为“表象”以前，它的“代表”——我是说“表象代表”——便已经浮现。

我不妨先在这里第一次提到一个观念，哪怕稍后还会回到它：这一观念虽属史前，在这里却绝不能算作考古学的东西。“洞穴壁画艺术”——正是我们在那些被称作“洞穴”的封闭空间深处发现的艺术——其奥秘中最主要的一点，无疑是我们仍不知道：

- 这些地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得到照明：只有洞口处有光；
- 这些地方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人到访：如果相信我们能够辨认出的足迹，它们似乎很少有人进入，尽管这些地方本来很适合留下“痕迹”。……“洞穴壁画艺术”似乎把我们引向的，正是后来在“柏拉图的洞穴神话”中得到陈述的东西；如此一来，这个神话所具有的意义，确实远不只是隐喻性的。

如果柏拉图试图把我们带入洞穴内部，以便为我们唤起实在界的维度，那么，在这些洞壁上发现的东西，难道只是偶然的吗？最近，人们终于用科学方法展开探索……

> “面对这些图像，他们不再气喘吁吁地想象远古人怀着某种我也说不清的焦虑，只想着能否为家里的女人带回足够的午餐；这种探索不再对一支箭与一只动物的关系作想象性的解释，尤其当那处伤口带有最为明显的女阴图形痕迹时。”……这一方法借助安德烈·勒鲁瓦—古朗[注1]，启用了精心整理的卡片系统，乃至电子机器；它向我们表明，这些图形并非随机分布，入口处始终如一地

高频出现鹿，而洞穴中部则出现野牛，这仿佛把我们直接引向了某种东西，尽管——

[注1] 安德烈·勒鲁瓦—古朗（1911—1986）：《姿势与言语》，第一卷《技术与语言》，1964年；第二卷《记忆与节奏》，2000年，巴黎，阿尔班·米歇尔出版社。

勒鲁瓦—古朗先生——这是有理由的——并未采用一个其实十分简单的参照，而我的教学的意义已经直接把它提供给他了：那些显然围绕这些对我们而言仍然"谜一般的"绘画参与某种崇拜的人，完全不必走到洞穴最深处，"入口处的能指"便可以为"深处的能指"代表他们；反过来，后者也不必如此频繁地被实际探访——"确切的入会仪式时刻"除外。

伴随这些奇特行列的一切："点线""箭头"——在这里，它们与其说是饮食意图的向量，不如说更直接地为主体指明方向——这一切都向我们表明，只有"一条结构链"、一种其本质严格说来在于"能指性"的分布，才能就此为一种既有力又审慎的思想提供向导。

"屏幕作为支撑的功能"，也就是作为"意指作用之支撑"的功能，正是我们在人类某种东西苏醒之初立刻发现的：无论他为它赋予了怎样的声调，都可以由此确定他是一个说话的存在者。

正是在这里，必须更仔细地把握"意指作用同视觉结构的关系"。由于事情本身的力量——也就是说，直到另有证据以前，我们似乎永远无法得到这些最初人类"声音"的任何痕迹——我们在人那里发现的最早"言语"表现，确实具有"书写"的样式。〔参见勒鲁瓦—古朗：《姿势与言语》〕

我无需强调另一个十分奇特的事实：这些图像也把它凸显出来，而人们赞叹它们是自然主义的，仿佛我们没有在对现实主义的分析中学到，一切艺术在根本上都多么具有“转喻性”，也就是说，它所指示的是不同于呈现在我们面前的东西。这些“写实的”形态以惊人的恒常性呈现出一条摆动的线；事实上，它化作这个拉长的 S 形。至于我，我完全不反对从这里看到它同我为你们逐项变格、表示主体的那个“S”相交。

是的，理由完全相同：霍加斯先生在试图标示美的结构时，同样准确而明确地诉诸这个“S”。





威廉·霍加斯　自画像

当然，为了使这些我承认在你们看来或许颇为大胆的“外推”获得实体，我们现在必须转向我刚才所谓“这一拓扑世界的视觉结构”，也就是一切主体建构所奠基的那个世界。

我说过，这一结构在“逻辑上”先于眼睛的生理学，甚至先于光学。几何学的进展使我们能够把这一结构表述为：它以确切的形式给出了“主体”同“广延”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我强调“确切”。

当然，仅仅出于体面上的考虑，我就无法在这里给你们上一堂“射影几何学”课。

所以，我必须借助几点提示，唤起你们查阅它的欲望；还要借助几个寓言，让你们体会它特有的维度。

“射影几何学”严格说来是“组合学”：它是点、线、面的组合学，这些东西能够得到严密绘制，但它们的直觉基础——“点、线、平面”在你们心中唤起的东西——却在若干纯粹组合性的必然性背后逐渐消散、被吸收，最后消失。例如，点将被定义为两条线的交点，而两条线将被定义为“总会相交”……

因为，如果一种组合性定义包含“直觉秩序中的例外”，它便不能成立。

如果我们认为平行线恰恰是不相交的线……那么，两条线仍将总是在一点相交；人们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但这一点必须存在。

于是显现出：

- 这一点恰恰存在；
- 甚至正是通过使它存在，射影几何学才得以奠立；
- 透视的贡献恰恰就在于此。

恰恰是通过把这一点投射到另一个平面上，我们才会看到它在那个平面上显现出来。这里重要的并非它以直觉方式存在于那里，也就是说，在两条线于地平线上连接之处清晰可见；重要的是，它必须“依据从纯组合性假设出发所期待的等价关系之严格法则”作出回应。我再说一遍，这些假设会在下列命题中继续得到展开：

- 例如，“两点只能确定一条直线”；
- “两条直线不能相交于两点”。

为了让你们体会“这类定义”究竟如何，我提醒你们，由此产生的结果同欧几里得证明中的操弄相反：只要接受这些可概括为所谓“对偶原理”的原则，一种纯粹射影的、非度量的几何学，就可以有把握地把一个以点和线表述的既得定理，通过在命题中以“点”代“线”、以“线”代“点”，转译成一个必然同前者同样有效的命题。

这正是十七世纪随帕斯卡[注2]的天才而出现的东西；无疑，在此以前，一种心智维度的多重来临已经为它作好准备——在主体的历史

中，事情总是这样呈现。例如，所谓“布里安松定理”的命题是：“由六条与一条圆锥曲线相切的直线构成的六边形，也就是外切六边形……”

> [注2] 帕斯卡定理，又称“神秘六边形定理”：对于内接于一条圆锥曲线的六边形，帕斯卡定理断言，六边形三组对边的交点如果存在，便位于同一直线上。这条直线称作帕斯卡线，该图形称作神秘六边形。在射影几何学中，这三个交点中的一个可以是无穷远点。布里安松定理：一个六边形外切于一条圆锥曲线，当且仅当连接其三组对顶点的三条对角线共点。

我想你们知道什么是圆锥曲线，不过我还是提醒一下：圆锥曲线包括椭圆、双曲线和抛物线；这里指的是它们的某些形式，

它们是在空间中生成的，而不只表现为旋转体。此时，圆锥体由空间中呈现的形态来界定，例如由连接一点与一个圆周的一条直线运动所形成的包络；该点不一定垂直地位于圆心之上……于是，所有这些线都具有这样一种性质：连接三组对顶点的三条线……

无论六边形形状如何，只需简单计数就很容易确定这些对顶点……“这三条线汇聚于一点”。

仅仅由于接受射影几何学的原则，这一命题便立即转译为：“一个由位于一条圆锥曲线上的六个点构成的六边形，也就是一个内接六边形，在这种情形下，其三组对边的交点位于同一直线上。”如果你们听清了这两个命题，就会看到，只需毫不含混地以“点”代“线”、以“线”代“点”，二者便可以相互转译。

你们已经感觉到，这种证明程序中存在某种完全不同于测量、直尺或圆规介入的东西。既然涉及组合机制，问题确实就在于点、线乃至平面——它们作为纯能指，甚至定理也可以只用字母写出。仅凭这一

点，我们就能赋予“一个对象同我们所谓它的图形之间的对应关系”以全然不同的意义。

这里，我们要引入一个装置；它已经被我们用来同“眼睛的这一神话意象”作根本性的对照……

无论这种意象是什么，它都回避、删去了表象同对象之关系中的实情，

因为无论怎样，表象在那里始终只是对象的复本……把它同我最初作为视觉结构向你们呈现、并与凝视结构相对立的东西作对照。而在第一次进路中，我把“这一凝视”放在“它得到把握”“获得支撑”的地方，也就是“它铺展开来”的地方：那件被称作“一幅画作”的作品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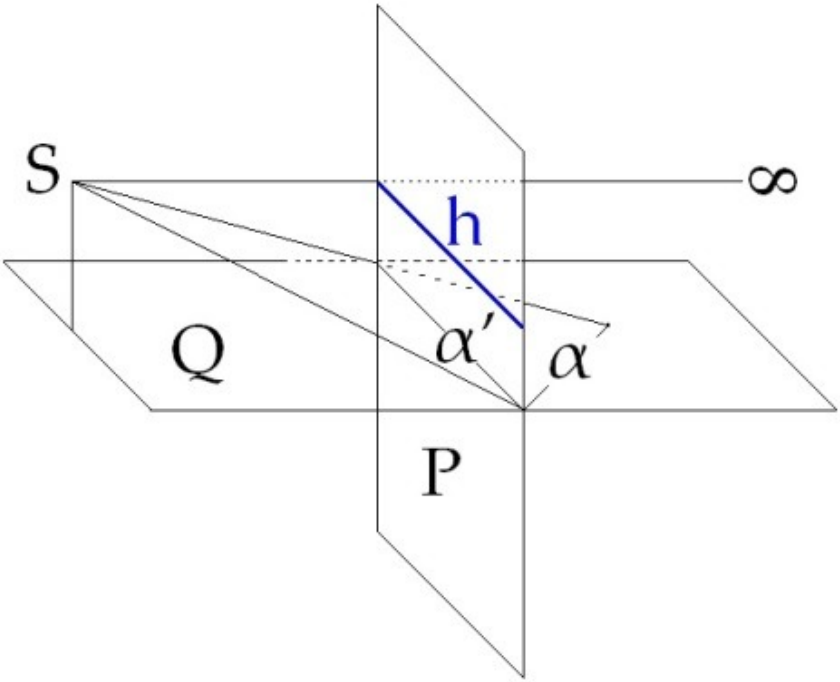
“凝视同斑点之间”某种意义上的原初“关系”，甚至能够经由生物谱系，以斑点的形式在极为原始的有机体中实际呈现给我们。斑点同光的关系所代表的局部感受性，可以为视觉世界发源之处的某种东西提供意象与例子；但这当然只是一种“进化论的含混”，它只有参照一种完全可以把握的共时结构，才能取得价值、确立为参照。

那么，在这一拓扑学的层次上，作为“视野”与作为“凝视”彼此对立的东西究竟如何？

“画作”当然会继续在其中发挥作用，这并不令我们惊讶。因为我们已经承认，某种类似“装配”“框架”“装置”的东西，对于我们所针对、并亲自有所经验的东西——也就是“幻想的结构”——至关重要。

而我们将要谈论的“画作”……

因为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期待它发挥作用并产生效果……我们要在“画架的支架上”把握它；“这幅画作”作为一个物质对象立在那里，它将成为我们进行若干思考的参照。



I

在射影几何学中，这幅画作将成为我刚才所说的那个平面。我们姑且把穿过该平面的每一条线称作“眼线”——以免同视觉射线混淆。这些线把我们论证起点处的“关键点”同第一幅图形的各个部分连接起来；我们把这个关键点称作“眼睛”，它就是同经典认识主体相认同的那个理想主体。比如，不要忘记，在我给出的所有关于认同的图式中，我

所画的线都是从一个　S、“眼点”出发的：从该点沿一条直线画出的眼线，同我们将在支撑平面〔Q〕上指定为支撑物的“点”“线”〔α〕乃至“平面”连接起来。

这些线穿过另一个平面〔P〕，并在穿过之处形成点和线……

> “甚至，平面本身的穿过也会相对于其中一条线来确定，例如由它包含那条线来确定。”……这些对图形平面的穿过——我由此区分支撑平面〔Q〕与图形平面〔P〕——也就是眼线穿过后在图形平面上留下痕迹〔α′〕；在“透视的构造”中，我们面对的正是这一点。

正是这种构造必须为我们揭示并使一种拓扑学具体化。由此可见，视觉构造中会产生某种东西，它正是为幻想提供基础与支撑的东西：一方面是“一种失落”，也就是我所谓“对象(a)的失落”，而它正是凝视；另一方面则是“主体的分裂”。

透视实际上教给我们什么？透视告诉我们，所有同支撑平面平行的眼线〔S—∞〕，都会在图形平面上确定一条线；这条线就是“地平线”〔h〕。你们知道，这条“地平线”是一切透视构造的主要基准。它在支撑平面上对应什么？

“只要我们牢牢坚持这种组合几何学的连贯性原则”，它同样对应一条线。

严格说来，这条线正是希腊人所错失的线；出于今天暂且搁置、尽管有一天必须加以质询的理由，希腊人只能错失它。它同样是一条线，

而且依据我们的原则，也同样是一条直线；它位于支撑平面的无穷远处，而在直觉上，恕我这样说，我们只能把它构想成对整体的代表。

支撑平面上的平行线汇聚之点，就位于这条线上；而在图形平面上，它表现为——“你们知道”——几乎所有平行于地面的线都向地平线汇聚。人们通常用意象来表现这一点，在最优秀作者的笔下也能看到：正如你们熟知的，当你们看到一条道路伸向地平线时，它会越来越小、越来越窄。

人们只忘记了一件事：这类参照有其危险，因为我们所知道的一切地平线，都是我们这个“地球”的地平线，也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由球形所决定的地平线。顺带一提，人们确实也指出这一点——“看起来却丝毫没有从中看到矛盾”——因为人们还告诉我们，地平线正是地球为圆形的证据。

然而，请注意，即使我们位于一个无限平面上，对任何直立其上的人来说，也始终会有一条地平线。在思考地平线时，首先让我们感到困扰不安的，是我稍后会再谈的一点：我们从来只在画面中看见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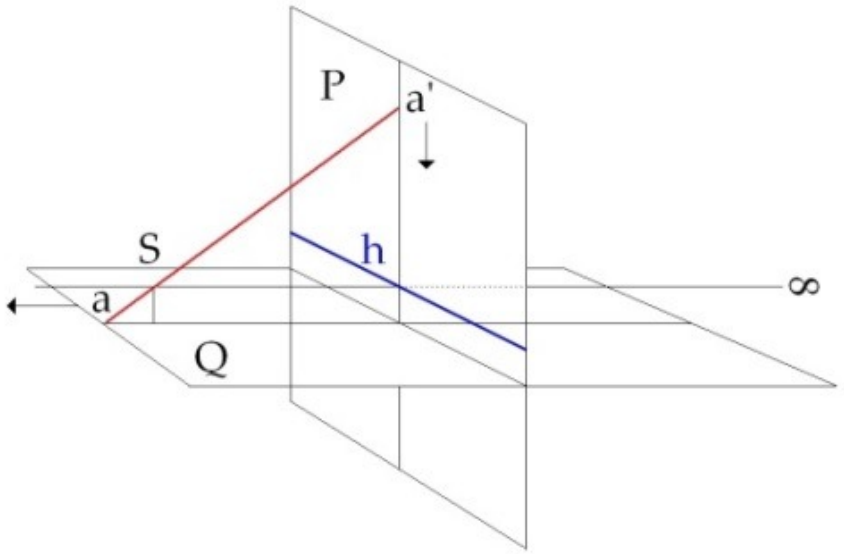
稍后我们会看到画面结构究竟如何。

由于一幅画面是有限的，我们甚至想不到：如果画面无限延伸，地平线就会一直笔直地伸向无穷远……在这里，我们如此容易满足于一种粗略类比式的思考，也就是说，以为画面上的地平线就像我们的地平线一样，可以绕行一周。还有一点需要指出：画面是画面，透视则是另一回事。稍后我们会看到，画面如何使用透视。

不过，如果你们从我为“图形平面上”应当画出的东西所给出的条件出发，就会注意到：严格依照透视条件绘制的一幅画面，会产生这样的效果。比如，假定你们站在一个由方格覆盖至无穷远的平面上——“因为你们总得抓住某种东西”——那么，这个方格当然会在地平线处终止——“稍后我们会看到如何终止”。

那么，地平线上方是什么？你们自然会说：天空。但“完全不是，完全不是，完全不是，完全不是”！

上方呈现的，是在地平线处、你们身后的东西。我想，只要仔细想一想，你们立刻就能把握：画一条线，把我们称作 S 的点同支撑平面上位于身后的东西〔II：a〕连接起来，你们马上就会看到，它将被投射到“地平线上方”〔II：a′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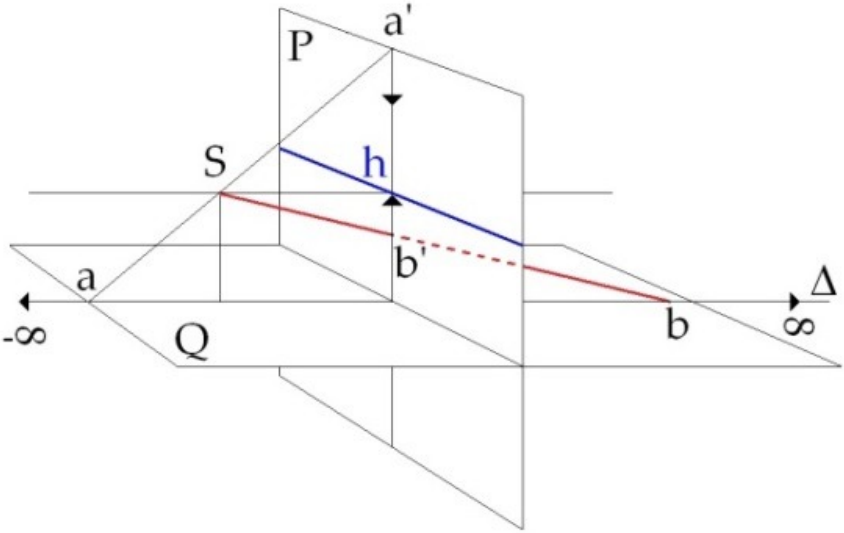


II

让支撑平面上的两个相对点，在射影平面的这条地平线上缝合到同一个地平线点〔III：α′ —h〕：

- 例如，其中一个在支撑平面的“地平线”上、位于你们最左端的点〔→ −∞〕，将同……缝合；
- 另一个同样位于支撑平面的“地平线”上、但在你们最右端的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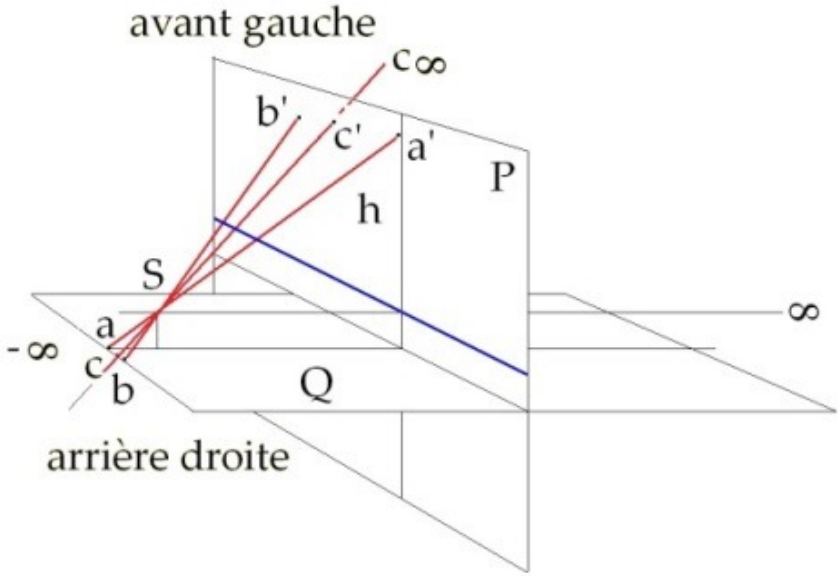
你们明白了吗？我是说……没有？那就重来……



III

你们面前有一个表面……你们面前有一个方格平面。为尽量简单，假定它是水平的，而你们是垂直站立的。有一条线连接你们的眼睛

——“我尽量把事情说得简单”——与“这个铺有方格并延伸至无穷远的支撑平面”上的任意一点；它会在垂直平面上确定一个点。姑且顺着你们，把这个垂直平面称作“投射平面”，它将确定逐点对应关系：“支撑平面上的每一个地平点”——也就是它无穷远处的每一点——“都对应于你们垂直平面之地平线上的一点”。想一想这里发生了什么。当然，如我刚才开始说的，这条线同视觉射线毫无关系：它从你们身后的“支撑平面”出发，走向你们的眼睛。它将在“图形平面”上抵达地平线上方的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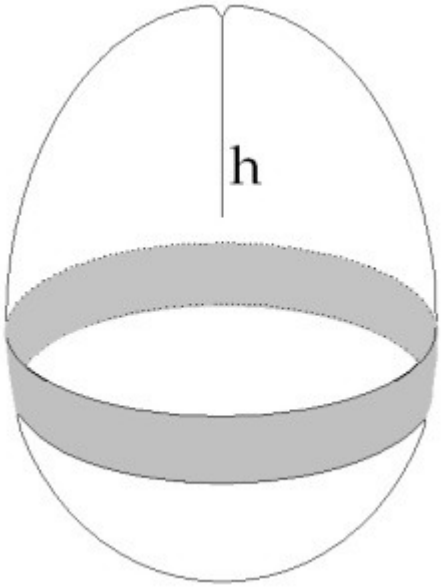
IV

与支撑平面的“地平线”上一点相对应的，是另一个点；恕我这样说，它从“上方”前来，在地平线上同前一点接触。位于“你们右后方”的东西〔c：图示右后方〕，由于经过并在“眼点”处交叉，会变成〔左前

方〕；其方向恰好“同你们转过身去时事情呈现的方向相反”。也就是说，如果你们转向“那一地平线”〔朝向 −∞〕，原本会在左边看到的东西，如今会在投射的射影平面上，钉在地平线上方的右侧。

换言之，有一条线〔Δ〕；我们不能把它定义为圆的，因为它之所以是圆的，只来自我们在日常中对地球球形的领会。正是在支撑平面无穷远处的这条线上，我们会看到各个点分别从上方与下方打成结；而后方地平线的各点勾连起来的顺序，同前方地平线的顺序恰好相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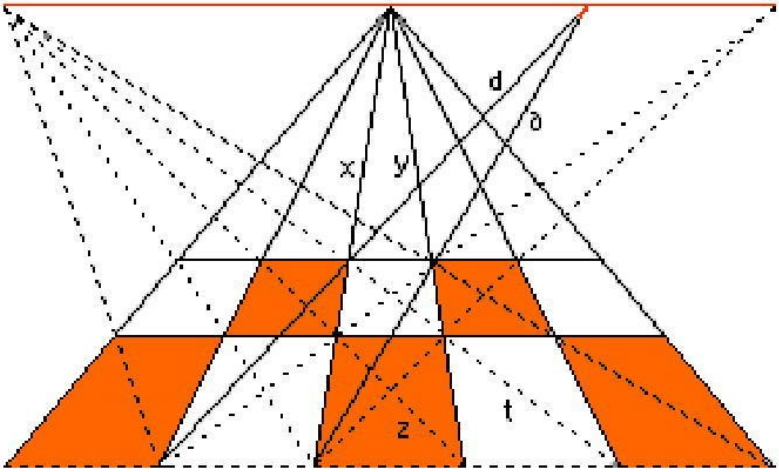
当然，在这里，我可以像柏拉图在洞穴中所做的那样，假定自己的头固定不动，由此在支撑平面上划定我可以谈论的两半。你们在这里看到的，无非是我在黑板上把“射影平面”表现为一个“交叉帽”时，情况如何的一种纯粹而简单的图示：



也就是说，你们看到的“不是一个球形世界”，而是某种以特定方式打结、同自身重新交叉的泡状物。这使得起初表现为一个无限平面的东西，在另一个平面中分开以后，来到这条地平线的层次上“重新同自身打结”；而且其打结方式是：支撑平面地平线上的每一点，同“什么”打结？恰恰同我已经画在黑板上的“射影平面的形状所显示的东西”打结，也就是同它在直径方向上相对的点打结。正因如此，在这样的投射中，右后方的点才同左前方的点打成结。

这就是地平线的情形。它已经向我们表明，使“具有视觉结构的能指世界保持连贯的，是一种包裹结构”，而绝不是一种不定的广延。

不过，仅仅像我刚才那样把这些事情“形象化”给你们看，还并不充分；因为我在问题中忘了那个只是为方便你们才画出的方格，而它并非无关紧要。由于方格由平行线组成，而且我们还接受了我的头固定不动这一点，那么，正如我想你们不难想象的，空间中所有平行线都会汇聚到地平线上的某个“消失点”：只有一个点。也就是说，处在某个给定位置上的所有平行线的方向，确定了图形平面上它们相交的那个唯一地平点。



如果你们拥有我们所说的这个无限方格，那么，你们将看到整个方格的所有平行线在地平线上的一点汇合。不过，这并不妨碍整个后方方格的所有平行线同样会从上方来到这个同一点，并在那里“汇合”。

这些看法是一切透视科学的基础。任何苦于安排“某种东西”的艺术家——无论是一幅画面上的一系列图形，还是所谓纪念建筑的线条，也就是若干对象围绕一个空洞所作的布置——都会把它们考虑在内。我刚才就方格所说的“地平线上的这一点”，通常正被称为……

我不认为自己在这里带来了任何真正十分超验的东西……“透视的消失点”。严格说来，“透视的这个消失点，就是在图形中代表观看之眼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透视的主体点：阿尔贝蒂、潘诺夫斯基与拉康

眼睛不必在图形之外得到把握，它就在图形之中。自从有了“透视科学”以来，所有人都如此承认它，也如此称呼它：

- 在阿尔贝蒂[注3]那里，它被称作“眼睛”〔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1404—1472）：《论绘画》〕；

> [注3] 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论绘画》，1435年，Allia 出版社，2007年。

相关知识卡 **透视的主体点：阿尔贝蒂、潘诺夫斯基与拉康**

- 在维尼奥拉[注4]那里，它被称作“眼睛”〔维尼奥拉（1507—1573）：《透视的两条规则》〕；

> [注4] 雅科波·巴罗齐，又称“维尼奥拉”；参见维尼奥拉、埃格纳齐奥·丹蒂：《实用透视的两条规则》，巴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出版社，2003年。

- 在丢勒[注5]那里，它也被称作“眼睛”〔阿尔布雷希特·丢勒（1471—1528）：《测量指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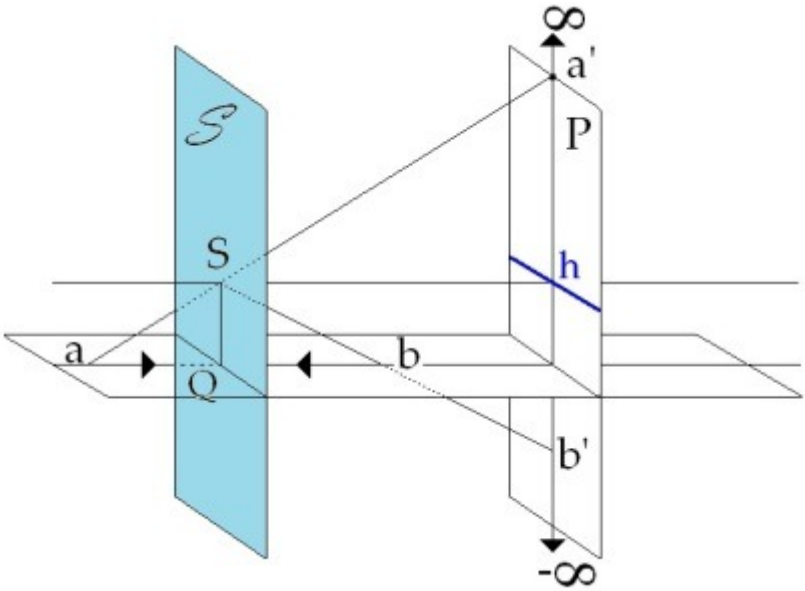
> [注5]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测量指南》，纽伦堡，1525年；法译本《测量方法指南》，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1995年。

但“这还不是全部”——“有人让我浪费时间解释这个其实真正不难理解的点，我很遗憾——这还不是全部”。

完全不是全部，因为画面和我“之间”还有一些东西。画面和我之间的东西，同样可以通过相同程序投影到画作平面上；在那里，它们将向着我们可以视为无限的深处远去。没有什么会阻止这一点，但它们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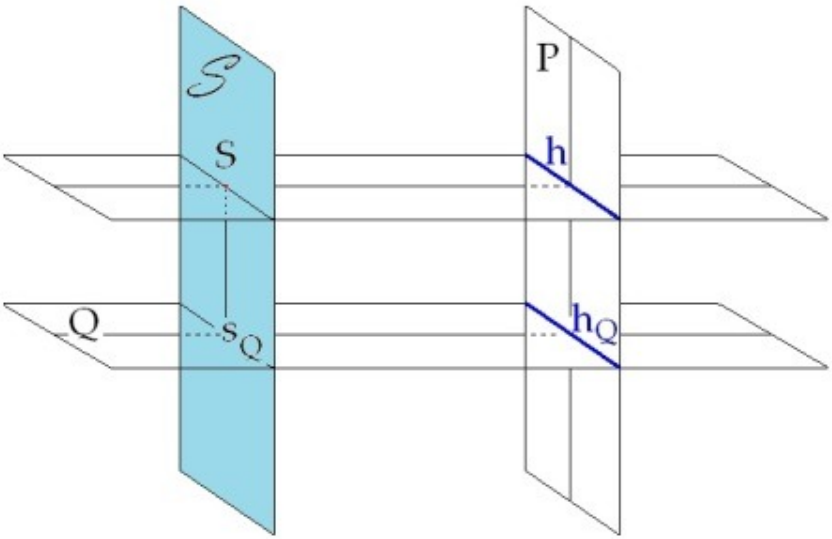
终止于一个点；这个点对应什么？对应于一个同画面平行并经过——“为了方便你们，我就说”——我的眼睛或 S 点的平面。

相关知识卡 透视的主体点：阿尔贝蒂、潘诺夫斯基与拉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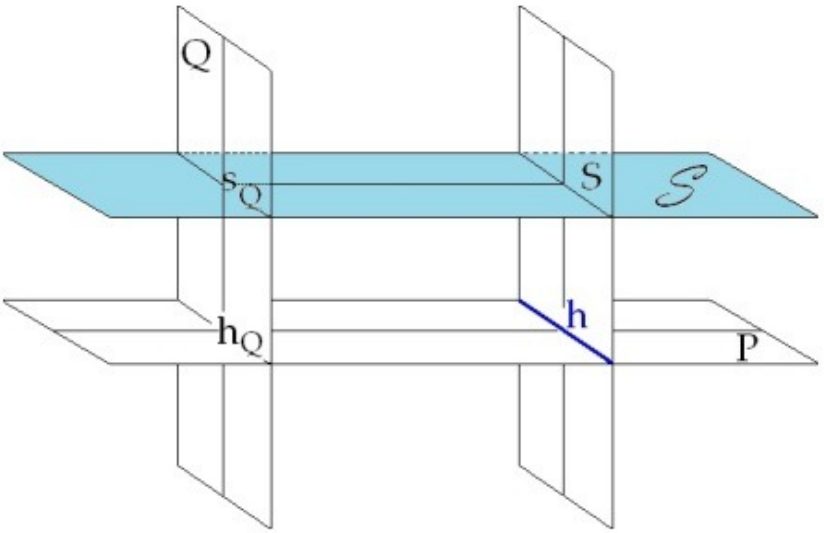
V

我们在这里有两道痕迹：一道是画面切过支撑平面之处的痕迹〔VI：hQ〕，另一道则是地平线的反线〔sQ〕。



V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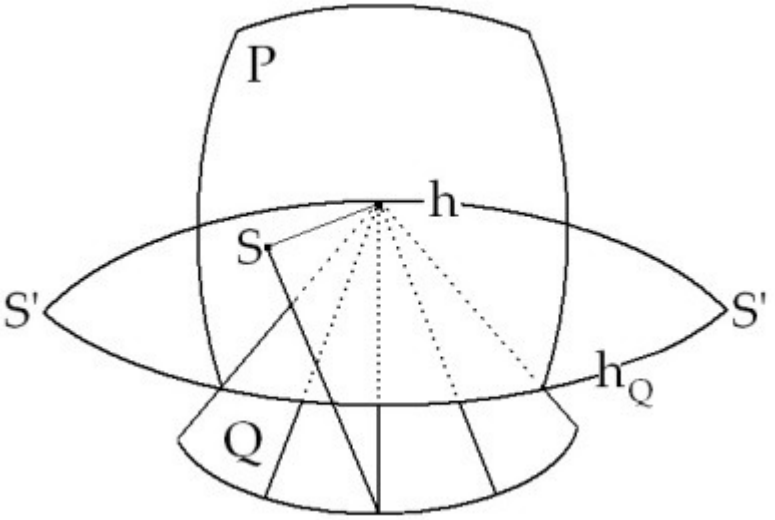
换言之，如果我们把关系倒置过来——我们有权这样做——那么，在支撑平面上构成地平线的东西〔SQ〕，就是图形平面上的无限线〔h〕。



VII

此外，还有一条表示支撑平面被画作平面截切所得截线的线〔hQ〕。这是“两条线”。

时间已经很晚了；由于所剩时间不多，我将告诉你们一些不那么严密的东西。事情解释起来，比起初看上去要更费时间。



严格说来，这意味着还有另一个眼点〔S′〕。它由图形平面上的无穷远线〔h〕，同一个确实位于该平面上的东西——即图形平面与支撑平面相交所形成的线〔hQ〕——共同构成。这两条线相交，因为它们都位于图形平面中。不仅如此，它们只相交于一点，因为这一点确实就是无穷远线上的同一点。

仍然停留在意象的领域，我会说，这两条平行线之间的距离〔δ〕——它们在支撑平面上分别由我作为观看者的固定位置，以及画面嵌入、同支撑平面相遇之处所确定——这个“裂隙”，这个在图形平面上只表现为一点的“裂隙”，是一个完全隐去的点，因为我们无法像标示地平线上的消失点那样标示它。这个点对于整个构型至关重要，并且具有十分特殊的特征；如果你们愿意暂且满足于这个意象，这个失落之点就支撑平面而言落入两条平行线的间隔中：我把这个点称作观看着的主体之点。

所以，我们有消失点，它是主体作为看见者的点；还有一个落入主体与图形平面之间间隔的点，我称之为观看着的主体之点。这并非新事物。以这种方式引入它，并从中重新找到 S 的拓扑学，才是新事物；现在，我们必须知道把那个决定这两点之分裂的 (a) 定位在哪里。我说的是这两点，因为它们在图形中代表主体。

继续前进，将使我们能够建立一个完全严密的装置、一套装配，向我们显示：在视觉组合机制的层次上，幻想是什么。至于必须把它定位在这一整体中的何处，稍后会谈到。

不过现在，为免你们以为我正把你们带往某些深渊般的地方——我不是在做深层心理学，我正在做几何学。天知道，在读过一切可能涉及这段透视史的东西之后，我有多么谨慎：从欧几里得[注6]——他在《几何轨迹论》中如此彻底地错失了透视〔米歇尔·沙勒：《欧几里得〈几何轨迹论〉三卷》〕——一直读到我刚才提及的人们，乃至米歇尔·福柯的新书；福柯在《词与物》“第一章”对《宫娥》的分析中直接提到了这些事情。我试图给你们某种完全具有“支撑性”的东西——这话正合其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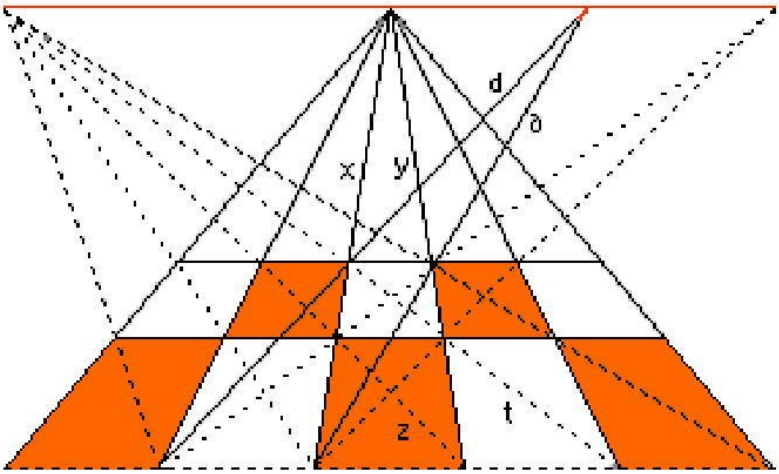
> [注6] 米歇尔·沙勒：《欧几里得〈几何轨迹论〉三卷》，Jacques Gabay 出版社，2007年。

不过，至于我刚才作为射影组合机制中代表观看主体的“第二点”而给出的这个界定十分精确的点，不要以为是我发明的。

只是人们以另一种方式来表现它；而且在我之前，别人已经把这种方式称作“另一只眼睛”之类的名称。

所有画家都完全熟知这个点。因为我已经告诉你们，严格说来，这个点落入我在支撑平面上界定的那个间隔，以便前往一个你们自然无法指出、但射影几何学的根本等价性所必需的点；这个点位于图形平面上。它尽管处于无穷远，仍然在那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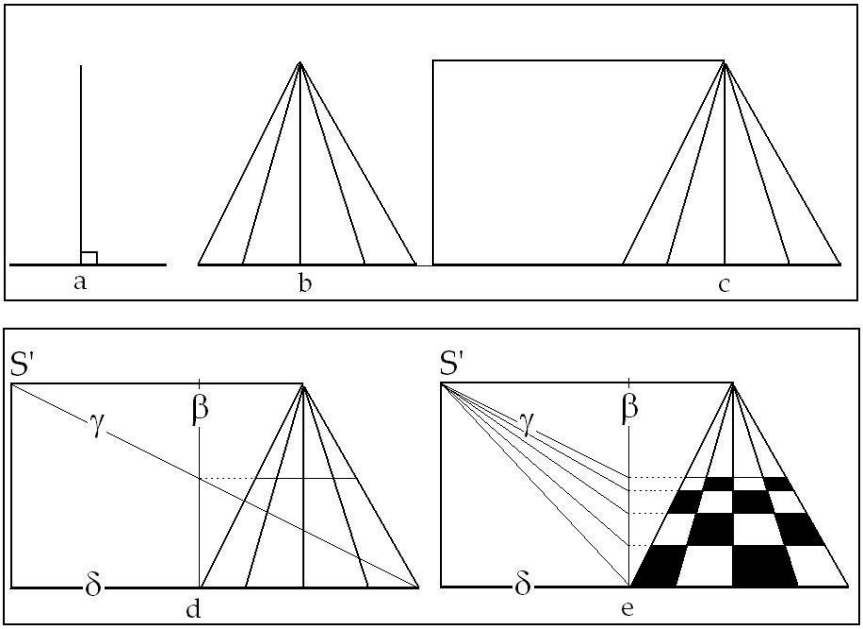
这个点如何使用？凡是借助透视作画的人都会使用它；确切地说，从马萨乔与扬·凡·艾克开始，它就以我刚才所谓"另一只眼睛"的形式被使用。这个点用来构造一切平面透视，因为透视会向远处退去，因为它恰恰位于支撑平面中。在阿尔贝蒂那里，透视正是严格按照这种方式构造的。



在佩勒兰[注7]的著作中，它的构造略有不同〔让·佩勒兰·维亚托（1445—1524）：《人工透视》〕。

[注7] L. 布里翁—盖里：《让·佩勒兰·维亚托及其在透视史中的位置》，美文出版社，1982年。

看这里……这里要发现的是这个方格的透视。例如，它的底边抵靠在这里；我们有一个基准〔a〕。



如果我配合一下——我是说，如果我只想把事情处理得简单些，好让你们理解——我便站在这个方格基准的中点；从方格底边升起的一条垂线，会在地平线上给出“消失点”〔a〕。因此，从一开始我就会知道，方格将借助这个“消失点”如此排列〔b〕。

但什么会给出透视中的方格将抵达的高度？

是某种必须让我使用另一只眼睛的东西吗？

人们相当晚才发现这一点，因为归根结底，最早的理论由阿尔贝蒂提出，他同我刚才提到的马萨乔和凡·艾克处于同一时代。好，我在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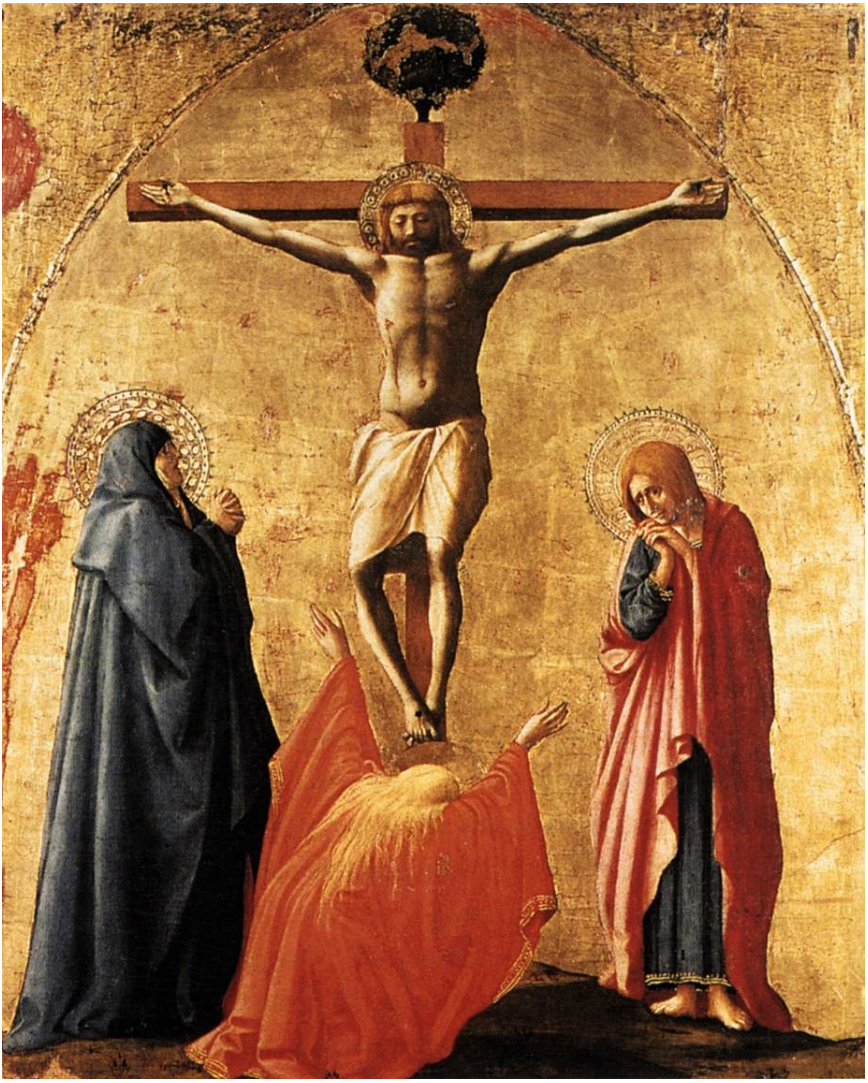
里取一段距离〔δ〕，它恰好对应于我刚才给你们指出的、我的位置与画面之间的那段间隔。在这段距离上，我取一个与消失点等高的点〔S′〕，然后作图；在阿尔贝蒂那里，这一作图经过位于此处的一条垂线〔β〕。我在这里画一条对角线〔γ〕，又在这里画一条水平线；这样，我便在此得到我想以透视方式观看的方格所终止的界限。

因此，我可以完全自由地决定赋予这个透视方格怎样的高度。也就是说，在我的画面内部，我可以任意选择自己与方格之间的距离，以使它以透视方式向我显现。这一点如此真实，以至于在许多古典画作中，你们都会看到一个以遮掩形式存在的小斑点，有时甚至干脆就是一只眼睛。它在这里标示出你们本人应当取的位置，以及你们应当同画作保持的距离，好让整个透视效果在你们眼前实现。

你们看，这打开了另一个维度；它同刚才令你们吃惊的维度完全一样，当时我告诉你们，地平线上方并不是天空。那里之所以有天空，是因为你们把一块作为天空的布景片扔在远处的地平线上。在现实中如同在剧场里一样，天空从来只是一块布景片；而在你们与天空之间，还有一整系列布景片。你们可以在画面中选择自己的距离，也可以在画面中选择任何一幅画面；画面本身就已经是一种距离的取得，因为你们并不是在自己站在窗洞中、由窗框框住自己的位置上作画。

你们已经在这个框架内部构成了画面。你们同这幅画面的关系，以及这一关系同幻想有何关系，将使我们能够获得一些基准，获得一个可靠的数值，以便在后续部分显明“对象(a)”同 S 的全部关系。我希望下一次能够向你们讲清这一点，而且希望比今天快一些。

马萨乔



扬・凡・艾克



第17课 · 1966年5月11日

就知识而言，我们很难不把学者的存在考虑在内——这里的“学者”只被当作一般知识假设的支撑，并不必然带有“科学家”的含义。

学者要么知道某种东西，要么什么也不知道；无论哪一种情形，他都知道自己是一个学者。

我提出这一看法，只是为了向你们指出一个早已得到“准备”的问题。我甚至可以说，这个问题很早就已经被呈现出来：不仅从我开始教学以来如此，而且从我最初谈论分析向我们重新提示的根本之物以来便是如此；那些看法围绕“自恋”功能或镜像阶段而展开。

既然我们开始得晚，就说快一点：最广义上的、尚未开垦的“主体地位”——不是我正试图为你们严密把握其结构的那个意义——也就是所谓一般主体，在我刚才所说的情形中，仅仅意味着：有知识，“所以”就有学者。

知道自己是学者这一事实，不可能不深深卷入这一知识的结构之中。

直截了当地说，就拿教授来说吧，因为教授同知识关系密切。为了传递知识，他必须运送一定数量的知识；这些知识要么取自自己的经验，要么取自别处积累起来的知识——比如在某个领域，它被称作“传统”，例如哲学传统。

显然，我们不能忽视，维持这个学者的特殊地位——我刚才提到教授，但还有许多其他地位，例如医生——会使在他看来属于知识的一

般地位发生偏转、倾斜。知识的内容、知识的进展、知识扩展的尖端，都不可能不受到保护其“知识主体”地位这一必要性的影响。

这一点在我看来十分明显，因为这种地位已经由社会授予的资格具体呈现在我们眼前。某位先生之所以被视为“学者”，并不只取决于“他知道”以及他是否继续以学者身份发挥作用。效益方面的考虑远远排在维持永久地位之后；凡已进入知识职能的人，都能获得这种永久地位。这并非毫无道理，而且总体上方便了所有人；所有人都“安然接受”，各有其位：学者在指定地点“做学问”。至于从某一时刻起，他的“学问活动”是否重复、锈蚀，甚至变成纯粹的“学问把戏”，人们并不会查得太仔细。

不过，如同面对许多社会结晶一样，我们不能只停留于纯粹的社会要求，即通常所谓群体功能，以及某一群体如何由于最终总可追溯到某个“历史”起源的理由，取得某种或多或少“享有特权的”地位。

这里确实有某种结构性的东西，而且“正如结构常常迫使我们注意到的”，它远远超出了简单的“效用互相关系”。

从效益的角度看，人们或许会认为，让学者的地位不那么稳定更有好处。

但我们必须相信，在主体的幻象中——而不是在主体结构本身中——存在某种东西，它产生并要求这些稳定结构。如果精神分析迫使我们

重新质询主体的地位，无疑是因为它从另一个出发点触及了这个问题——主体是什么的问题：

- 多年以来，我已经能够表明，只有把以“真理”之名对“知识”作出的某种质询结合起来，才能标定分析经验所进入的这个场；

- 倘若对这个场的分节必须追溯到一个更为根本的点，追溯到“一场相遇”之前——那是同“某种真理”的相遇，而这种真理把自身提出并呈现为“知识的异己之物”，我们已经说过——……那么，这一点最初是从索求的角度被引入的。索求首先在一个后来逐渐缩减的视角中，被提出为更加原始、更为古老的东西；这要求我们追问，在结构中，这一索求如何同某种与它不协调、并被称作“欲望”的东西排列起来。

正是沿着这条路径，在这种结构性裂分中，我们终于重新质询主体的地位。主体远非在我们看来是一个枢纽点、某种轴心，让知识的扩张与收缩围绕它转动——无论我们赋予这种转动怎样的节奏与搏动。欲望这一角度被引入知识功能的核心以后，精神分析经验所给予我们的主体，其本质所奠基的戏剧便无法再以“人格地位”为基础来思考；归根结底，在迄今哲学对人同所谓“世界”之关系——以某种“知识”的形式——所采取的视野中，占主导地位的正是这种人格地位。

主体在我们看来从根本上是分裂的。因为，当我们在最根本的一点质询这个主体——即他是否知道某种东西，这就是笛卡尔式怀疑——我们就会看到“我思”经验中的本质：这个主体的存在，在被质询之时仿佛逃逸了，以“两道存在射线”的形式分岔；它们只在一种幻觉形式中

重合于那个存在者，而后者正是在这一质询之中作为存在者显现，才找到了自身的确定性。

“我思”……“在思考，我存在。但我是那个思考着的东西，而思考‘我存在’，同成为那个思考着的东西，并不是一回事。”这一点未被注意到，却因同分析经验中的下述事实交会而获得了全部分量与价值：“那个作为思考着的东西的人，以一种思考‘我存在’的人所不知道的方式进行思考”。这就是由引导分析经验、被称作精神分析家的人负责“代表”的主体；学者问题由此重新向他提出。

精神分析家同自身地位问题的关系，在这里以尖锐程度增加十倍的形式，重新提出了历来围绕知识持有者之地位的问题。所谓精神分析家的培养，确实无非是借助一种特权经验，使一些主体——恕我这样说——来到世上；对他们而言，主体的这一分裂不只是某种他们知道的东西，而是他们“在其中”思考的东西。

问题在于让“某些人”来到世上：他们能够从这样一种持续维持的位置出发，发现自己在分析经验中经历的东西；也就是说，他们绝不能忽视这样一点——当他们作为分析家处于知道的时刻，他们处在一个分裂的位置。没有什么比把这样一种已被体验过的东西维持在存在位置上更困难；而任何配得上分析家这一称号的人，都必然在经验中的某一时刻体验过它。

事情就在这里：从分析视角中那个“被假定知道”者的地位一经“建立”，一切“镜像误认的威望”便重新出现；它们只能把主体地位重新统一，也就是说，让另一部分掉落、把它删去。可是，这种独特经验本应产生的恰恰是这一部分；它本应造成一种与整个群体相分离的效果，使

某些人不只知道这一点，而且在进入任何属于他们这一秩序的经验时，就能够合乎或至少预感到这一分裂结构的实情。

我的教学所具有的意义，无非是提醒这一要求；尽管把人引入其中的手段当然在别处……

但由于一种结构——我再说一遍，它远远超出社会条件的制约——某种东西……

无论经验如何，只要每个人在其运作中认同于某种可以命名的地位——这里就是作为学者的地位——它就倾向于把那一“分裂”的本质“纳入秩序”；然而，只有通过这种分裂，才可能打开一条符合这一经验自身层次的通路。

分析家正是作为“分裂的主体”，被召唤去回应那个同他一起进入一种主体经验之人的索求。因此，我上次在你们面前展开“透视”观念的各项功能，并不是为了给我们的某个特殊经验领域作某种“纯粹的精雕细琢、细部装饰或上色”，仿佛只是用它来说明：在我们已经知道的“窥视驱力”知识之外，还应补充怎样的信息。

相反，问题在于向你们说明，一套装置如何能够支撑分析家主体性应当围绕其定位的东西；分析家的主体性通过这种定位，绝不能忘记：即使他思想的“第二个消失点”——恕我这样说——趋向于被忘却、删去、搁置一旁，他也至少必须借助某个图式的力量，提醒自己去寻找这个另一消失点在何处发挥作用。恰恰是在他趋向于表述某种“真理”的时刻和位置上，这种真理只要稍不谨慎，就会由于其表达本身重新落入“认识主体的古老统一性图式”，并诱使他例如把某种整体性观

念置于首位；而在“综合自己的经验”时，他最应警惕的恰恰就是这种观念。

上一次，我试图通过一些简短路径，向你们呈现“透视经验”的教导能够带给我们的东西。尽管我已经尽可能选择了可走的路径，我当然仍感觉自己未必总能集中你们的全部“注意力”，至少未必总能让这种注意获得回报。

或许是因为缺少某个图式；然而，我当时恰恰想把图式推开、延后，以避免某种误解。

不过，今天我仍会这样做：把它概括出来，并指出，在这种透视经验中，究竟什么能严格地向我们说明这里的问题，也就是“主体的分裂同某种东西之间的关系”；在分析经验中，这种东西规定着“同世界特有的视觉关系，也就是某个对象(a)”。

相关知识卡 凝视作为对象a：眼睛、迷惑与欲望的遮蔽 ・ 透视的主体点：阿尔贝蒂、潘诺夫斯基与拉康

迄今，我已经以一种近似的、而且无需再重新处理的方式，把这个“对象(a)”作为“凝视”的功能同视觉场区分开来。它如何能够在这一结构性经验中得到组织？

相关知识卡 凝视作为对象a：眼睛、迷惑与欲望的遮蔽

- 一方面，这种经验在几何学中建立了某种思想类型；
- 另一方面，它在艺术的全部运作中，尤其在绘画中，成为可感之物。

上一次，我用言语作了一个构造；在一本透视著作中，很容易原样找到它。不是眼前这一本——刚有人把它拿给我——而是例如欧文·潘诺夫斯基[注1]论透视的著作，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他的论文集。它还有一个德文版……我看到，其中各篇文章的编排方式同这个意大利文版不同。

> [注1] 欧文·潘诺夫斯基：《作为象征形式的透视及其他论文》，巴黎，午夜出版社，1976年，“常识”丛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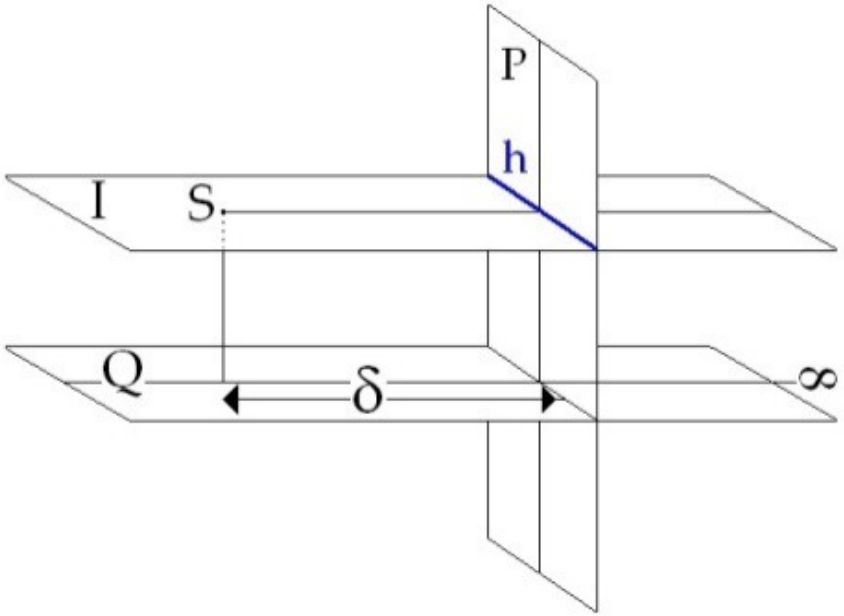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透视的主体点：阿尔贝蒂、潘诺夫斯基与拉康

我曾提醒你们，在从所谓画作平面到另一个平面所建立的射影关系中——为了今天说得简单，我们把后一个平面称作“透视地面”——会建立起一些根本的线性对应关系。它们蕴含某些严格说来无法直观化的要素；然而，这些要素正是所谓射影空间或射影广延的根本要素。

只要承认下述一点，就可以建立一种连贯并具有充分证明严密性的几何学，它同“度量几何学”毫无共同之处：我今天所谓“透视地面”上发生的事情——我意识到，上次所用术语较难留在头脑里，所以换成这个名称——也就是透视地面上所画的线同画面上可画之线的对应，意味着“透视地面”上的一条无穷远线，会在画面上转译成地平线。

相关知识卡 透视的主体点：阿尔贝蒂、潘诺夫斯基与拉康

这是一切透视构造的第一步。我将用下列方式把它图式化：



假定：

- 这里〔Q〕是透视地面；
- 我把画面〔P〕以侧面留给你们看；
- 我在这里放上一个尚未谈到的东西：主体的眼点〔S〕。

上次，我已经充分指出这里的问题，因此你们现在应该能够理解我将要画出的线。撇开任何你们可能诉诸的经验参照——尤其不是我们在这个圆形球体上实际体验到的地平线——我告诉过你们：一个无限平面意味着，从这个位于〔I〕的眼点出发，设立一个同透视地面平行的平面；该平面同画作平面相交的线，便在画面上确定了地平线〔h〕。

画面与绘画的经验告诉我们，这条地平线上的任何一点都具有如下性质：汇聚于该点的各条线，对应于透视地面上任意一组平行线。所以，我们可以选择地平线上的任一点作为透视中心。所有服从透视法则的画作，实际上都是这样做的。你们看，这个点在画作中不仅对应于有待置入透视的地面，而且对应于那个在图形中代表眼睛的位置点：画面平面中的地平线，依据观看者的眼睛而建立。

我上次告诉过你们，所有研究透视的人还会为此加上他们所谓“另一只眼睛”，也就是 S 点同画作平面之间的距离〔δ〕在透视中的入射。然而，无论事实上还是在任何画作中的使用方式上，这段距离都是任意的，由作画者选择。

我的意思是，它是在画作本身内部得到选择的。

那么，从“主体结构”的角度说，这是否意味着……

只要主体是凝视的主体，是一个被观看之世界的主体——这正是我们将感兴趣的地方——……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可以忽略主体的这一部分，因为它似乎只具有一种人为安排的功能？地平线是结构性的，但作为观看者的我，可以自由选择距离；我是否因此就可以说，这只是艺术家的技巧，是我在心理上同画面深处所选择的这个或那个平面保持的距离，所以它在某种意义上是无效的、次要的，而非结构性的？

我要说：它是结构性的，而迄今从未有人充分注意到这一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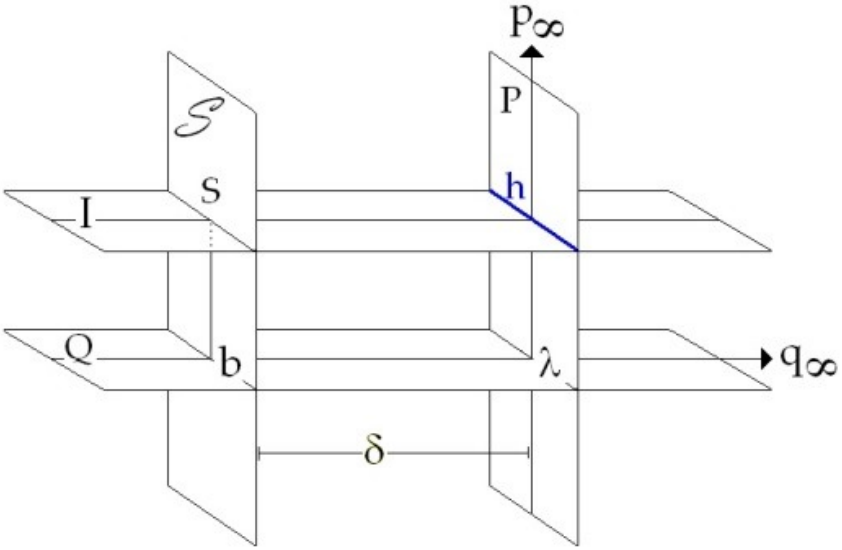
透视中的这第二点，由以下看法来界定：无论这个暂定主体的“距离”如何……

也就是主体 S；我们恰恰必须把它悬置起来，看看它如何进入画面……无论这一主体同画面之间的“距离”如何：

- 都存在某种仅仅是“他与画面之间”的东西，也就是把他同画面分隔开的东西；它不只是一种可以用这段“距离”的“度量值”来标记的东西；

- 这段“距离”本身铭写在结构中的某个地方；我们必须在那里找到的，并非那些加引号的“透视”作者所谓的另一只眼睛，而是另一个主体。

这一点可以按照我上次所作、但有些人没有理解的方式证明。证明基于这样一个看法：首先，如果我们让一个平面〔S〕通过 S 点，而且这次它不再同透视平面平行，而是同画面平行，“便会产生两件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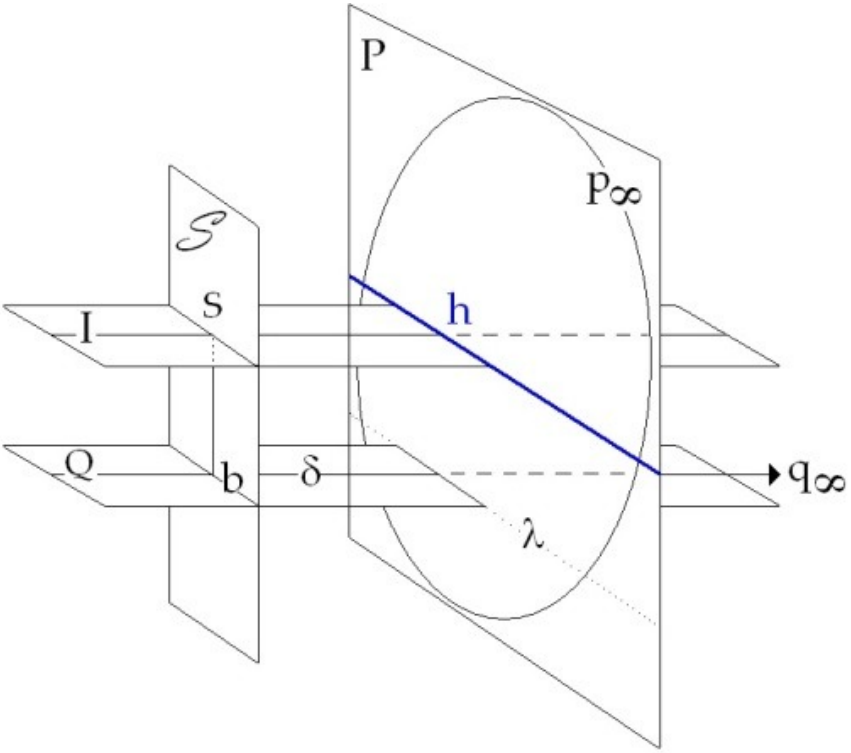
首先，这促使我们注意到：画面同“透视地面”这个平面相交，会形成一条交线〔λ〕；它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名称——如果我相信潘诺夫斯基的书——叫作“基线”。

上次我没有这样称呼它；说的就是这条线。

通过　S　点并同画面平行的平面〔S〕，同透视地面相交于一条线〔b〕；它平行于第一条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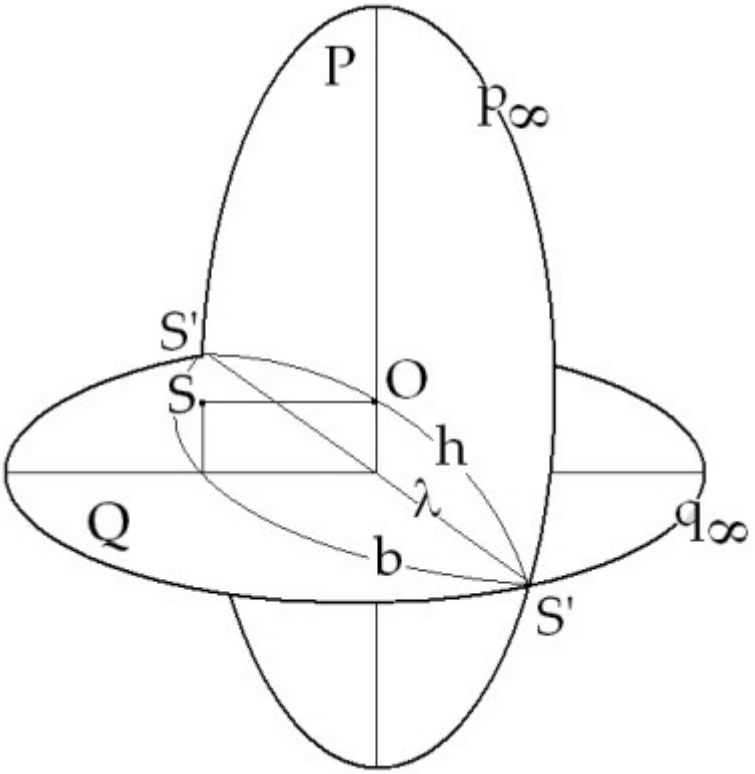
从这“两条线”在画面——也就是我上次所谓图形平面——上的表示中，将可推导出我们所谓“第二主体点”。事实上，在“主体点〔S〕—画作平面〔P〕—透视地面〔Q〕”这一三项关系中，我们已经看到，透视地面上的无穷远线〔q ∞〕——我想，上次已经充分说明了这条无穷远线是什么意思——对应于画作平面上的地平线。

在同一组三项中，“如果你们仔细看”，就会发现这里所界定的线——把它称作 b 线，即平行于基线的那条线——相对于画作平面的无穷远线〔p − ∞〕，具有的功能同画作平面上的地平线相对于透视地面无穷远线的功能一样。



因此，在图形中，它一方面由画面中的这条无穷远线来代表；另一方面，由于基线已经处在画面中，另一个主体点〔S′〕——第一个主体点被定义为地平线上的任意一点——便可以这样写出：画作平面的无穷远线同基线的交点。你们看到，我在这里把无穷远线表现成一个圆；这只是一种形象化而并不充分的表现，因为对“直觉”来说，它就是一条在任何平面的所有方向上都始终处于无穷远的线。我们凭直觉把它表现为圆，但它不是圆。对它的全部操弄，以及构成这种射影几何学之本质的逐线、逐点对应，都证明了这一点。

它看似同基线有两个交点，这只是一种纯粹的表象；因为它是一条线，必须像所有其他线一样，把它视为直线，而两条直线只能有一个交点。



我并不是要求你们以接受我个人构造的名义“承认”这些事情。

“我无法替你们推开射影几何学的大门”，尤其无法替那些尚未实际接触过它的人这样做。

不过，任何人都很容易自行查阅，并看到我在这里提出的东西无可更改。由此可知，在射影世界或透视世界的任何结构中，我们都有两个主体点——两个主体点：

相关知识卡 透视的主体点：阿尔贝蒂、潘诺夫斯基与拉康

- 一个〔O〕是图形平面上地平线中的任意一点；
- 另一个位于另一条平行线同图形平面无穷远线〔p − ∞〕的交点；这条平行线称作基线〔λ〕，它表达了图形平面同投射地面之间的一种关系。

这一点值得依据它得以出现、得以被我们建立的道路加以标明。

不过，一旦沿着这条道路建立了它——你们稍后会看到，每当我们必须标定这个另一主体点时，这条道路都会为我们留下一道重要痕迹——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们：如果我们在图形平面中画出同基线平行的地平线，就必须由此推导出，地平线同这条无穷远线相交的点，“恰好就是基线同它相交的那个点”，因为两条线彼此平行。你们将由此看到，这两个点的关系被大大简化了：

- 一个是地平线上的任意一点；
- 另一个是无穷远点；无穷远点并不是任意一点，而是唯一的一点，尽管它在这里看起来像两个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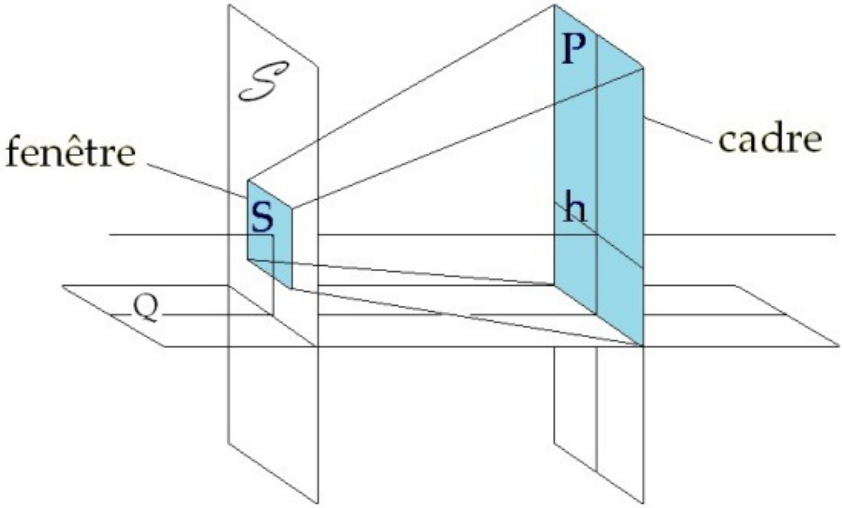
当问题在于凸显主体在幻想中的关系，尤其是主体同“对象(a)”的关系时，这一点将成为我们的支点；你们为此花费必要的时间，是值得的——不多，也不比用在笛卡尔证明上的更多。一个证明一旦得到把

握，就已经被证明；但仍须掌握它的严密性与过程。每当我们必须对窥视幻想进行操作时，这一点都应作为我们的参照。

这个分裂的主体由一副共同支架支撑："对象(a)"。在这个图式中，必须到哪里寻找它？当然，必须在它"掉落"并"消隐"的一点寻找；否则它就不会是"对象(a)"。在这里，"对象(a)"由某种东西代表；正是在这个图形中——我希望已经成功地让你们对它有所感受——"对象(a)"就是支撑　S　点的东西，也就是我在这里以引出这个平行平面来表示的东西。

在那里被"删去"、却始终存在的东西，正是我已经以不止一种形式引入"主体同世界的结构关系"中的东西："窗户"。在这个主体同 S 点的窥视关系中——整个构造都从该点出发——那堵墙被明确、个别化地显现出来；如果可以这样说，这堵墙就是那个将确定主体第二点的平行平面。在这堵墙上，必须有一个开口、一条缝隙、一道视景、一束凝视。

这恰恰是从构造的初始位置无法被看见的东西。



去年[注2]，我们已经看到“窗户”的这一功能为我们提供了帮助：作为一个表面，它承载着最为“原初”地写作能指功能的东西。让我们用它应得的名称称呼它。在这个封闭结构中——正是它使我们能够把刚才画出的所有不同平面相互打结，并以纯粹拓扑形式、也就是“交叉帽的包络”，再现射影平面的结构——窗户正是结构中“那种带孔洞的东西”。它使一种闯入得以被引入，而主体分裂的产生将取决于这一闯入；严格说来，这就是我们所谓“对象(a)”。

[注2] 1964—1965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关键问题》，1965年6月23日课。

在凝视同被观看世界的关系中，恰恰由于“窗户”始终是被删去的东西，我们才能构想“对象(a)”的功能。“窗户”：

- 也就是眼睑之间的裂隙；
- 也就是瞳孔的入口；
- 也就是构成一切视觉之最原始对象的东西：暗箱。

今天，我正想向你们“说明”这一点，借助一件作品来说明。此前我告诉过你们，在一位研究者最近的某部著作中，这件作品被放在了最前面；他的研究类型同我在这里以“精神分析经验”之名承担的研究，当然相距不远，尽管二者有着不同的基础和灵感来源。我指的是米歇尔·福柯，以及委拉斯开兹那幅名为“宫娥”[注3]的画作。

> [注3] 迭戈·委拉斯开兹：《宫娥》，1656年，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相关知识卡 《宫娥》：福柯的表象分析与拉康的凝视重读

现在我要把这幅画投射在你们面前——把窗关上——让我们以可感方式看一看：对某种根本不是为了回应这幅画自身结构而制作的东西加以阅读，会让我们得到什么；你们将会看到它允许我们做什么……“怎么回事？”



这是卢浮宫借给我的一张幻灯片，我事先没能试放。它在这里确实只能提供最微弱的支撑；但对那些看过这幅所谓《宫娥》的照片、或者只是对它略有记忆的人来说，它仍能给我们一点参照。

“你们有没有一根小棍子之类的东西，让我可以指示画面？这不算什么，但总比没有强。好了。那么，或许你们……无论如何还能看见一点，至少看见最少的东西。坐在后面的人能看到什么吗？”

“X 小姐——同前面看得一样清楚。米尔纳先生试过了。”

请注意，这也不算太不利，对吧……这里是画家的形象。

你们现在就换一张，至少让大家看清他确实在那里。好，对焦。

“X——只能这样了，我没法再调。”

对……换回第一张。画家处在自己所画之物的中央。你们看到，他所画的东西以一种我们还会回头讨论的方式分布在这幅画布上。这里，你们看见的这道线，是某物的边界、外缘——它被光触及，所以显现出来；这个东西从那里一直延伸到恰好位于这里的一点，几乎占据画作的全部高度。这里还有一根画架的立柱；它向我们呈现的是一幅从背面看到的画作。

他就在这幅画布上。他正在制作这幅画，而画作翻转了过去——“你有什么要说的？”——这正是我们必须从中出发的根本平面；在我看来，米歇尔·福柯——我请你们所有人都去读他——在那篇非常出色的文字中删去了这一点。事实上，必须让“这幅画的全部价值、全部功能”都围绕这一点转动。

相关知识卡 《宫娥》：福柯的表象分析与拉康的凝视重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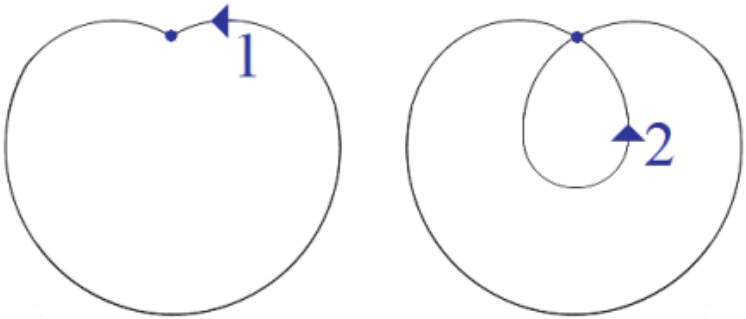
我会说，这幅画实际上像一张翻扣的牌；我们不能不考虑它正如一张翻扣的牌，因为它作为其他牌的模数与模型而获得价值。

这张翻扣的牌真正摆在那里，就是为了让你们亮出自己的牌。

事实上，关于画家——这里就是委拉斯开兹——站在这里、同这幅画保持一定距离时究竟在画什么，已经发生过讨论与争论；我不能不提这一点。

你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如何亮出自己的牌，对这幅画的效果至关重要。这蕴含着一个维度：这幅画会“慑服”人。自它存在以来，它就是各种争论的基础与根基。这种慑服同我所谓“主体的颠覆”有最密切的关系——正是我今天话语前半部分反复强调的东西；这幅画正因依托于它而取得价值。事实上，我们同艺术作品的关系总带有这种颠覆的标记。我们似乎已经用升华这个词承认了一种归根结底无非如此的东西。

因为，只要我们对“驱力”机制的探究足够深入，就能看到其中发生的是从主体到主体的一次往返；但必须把握，返回并不“等同于”出发。恰恰依照“莫比乌斯带”的结构，主体完成这半圈以后，才在其中“同自身闭合”：他从正面出发，回来时却同自己的反面缝合。换言之，必须完成“两圈驱力回路”，某种东西才算完成，才让我们能够把握主体分裂的真实情形。



这正是这幅画将向我们显示的东西。它的捕获力来自这样一个事实：它不只是我们总把自己局限于其中的东西——“正因为我们只转了一圈”。或许，对我们所接触的那类艺术家，也就是那些前来咨询我们的人而言，艺术作品确实是供内部使用的：它帮助艺术家完成自己的闭环。

但面对眼前这样一位“大师”，很清楚，我们对这件作品的任何领会至少都会留下这样一点：“观看它的人在其中被闭合了”。任何观者——除非他只是在画前匆匆走过，“完成博物馆仪式规定的致敬”——都会被这一构图的特殊性抓住。所有人都同意，在画作前方发生了某种事情，使它成为十分特殊的东西；人们只能尽力表达，说我们被卷入了它的空间。

于是，人们绞尽脑汁地寻找：这种效果究竟通过怎样的构造技巧、怎样的透视构造产生。

从这里出发，人们走得更远，推测每个人物和每个群组的功能，却没有看到这一切其实是同一个问题。人们通常沿着这条路走；它实际上正是那个将留在问题核心、并且我希望最终能够回答的问题。

画家在做什么？他在画什么？由于这通常属于艺术批评，这个问题还蕴含着一种更强势的形式：他想做什么？归根结底，当然没有人严格地认真对待“他在做什么”这个问题。画作已经在那里，已经完成；我们并不会问他此刻正在画什么。我们问的是：他想做什么？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想让我们对他正在画的东西形成怎样的观念？

在这一点上，一种对我们而言十分容易辨认的关系已经明显留下标记：我们想要、想要知道的，严格说来正属于所谓大他者的欲望这一秩序，因为我们问的是：他想要做什么？

这当然是一个错误的位置，因为我们并不处在分析——我不是说绘画，而是说一幅画作——的位置上。画家想做的东西，他当然已经做了，因为它就在我们眼前；所以，这个问题在某种意义上会自我取消，因为它停留在自己所提问题的这一边：我们正是以他已经完成的东西之名提出问题。换言之，在我刚才所说的闭环返回中——这已经是这幅画把我们引入主体辩证法的方式——有一圈已经完成，我们只需再转另一圈。不过，为了做到这一点，不能错过第一圈。

那幅占据整个高度的画布就在这里；正是由于这种高度，它促使我们认出，那就是画作本身。有人沿着另一条路线把它呈现给我们——我在我们进展的边缘顺带指出这一点——而不是沿着这场讨论的路线。那些人提出了一个我冒昧认为无关紧要的论点：这里涉及的是另一幅画——稍后你们会看到，我们将更仔细地讨论——即国王与王后的肖

像；当然，在我带来的这幅显然十分不充分的图像上，你们看不见它。



在背景的这里——我希望你们大体上都知道——一个框中呈现着某种东西；稍后我们还必须讨论它意味着什么。但有人把它当作证据，认为国王和王后就在画作前方这里，而画家正在画他们；在我看来，这一点可以反驳。

此刻，我只想指出，正是在这一背景上，我才告诉你们：画布的大小已经可以作为一个论据，说明情形并非如此；画中所呈现的这块画布，恰好呈现的就是我们眼前的这幅画，因为它是一块由木架支撑的画布，而我们在这里看到了木架的骨架。

换言之，在这幅画中，我们拥有这幅画作为现实的表象。

我不妨推开这扇小门，让我们再一次在那里遇到我的公式：它把绘画对象构成为一个“表象代表”（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我绝不是说，画作是表象，而画架、支撑物是它的代表。倘若它在这里发挥作用，让我们察觉其中的真理，那是因为它把某种东西放进了画作之中；奇怪的是，这种做法在这里第一次出现。

相关知识卡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表象代表

因为，在此之前已经有过诸如“画中的镜子”这样的东西，在那个时代甚至很多；但“画中之画”——它绝不是戏中戏——似乎在这里第一次出现，此后也很少重现，除了我曾为你们标出的地方，即马格利特那里。表象，确实正是画作这一现实形象的性质；但它处在那里，是为了清楚地向我们表明：在现实与表象的层次上，画中所描画的东西同画作彼此充满、相互饱和。

正是在这一点上，它向我们标明：构成画作本质的恰恰不是“表象”；因为画中之画产生的效果是什么？“表象代表”。

这个效果十分确切：你们所看到的所有这些人物，根本不是表象，而是“处于呈示之中”。这些人物，无论其身份为何，都如同他们在现实中确实处于那里一样——尽管早已去世，他们仍然在那里。他们是凭借一种完全确信支撑自己处于呈示之中的人物；这恰恰意味着，“对于自己所代表的东西，他们没有任何一个人向自己表象了什么”。

相关知识卡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表象代表

正是被引入画作空间的这个东西，把他们打结并结晶在这种“处于呈示之中的人物”、宫廷人物的位置上。从这里出发，画家委拉斯开兹走到他们中间，便获得了全部意义。不过，当然，它远远超出这种可以说带有“社会相对主义”色彩的简单点触。画作结构使我们能够走得更远。

说实话，要走得更远，本应从一个问题出发……不，不是从一个问题，而是从一种完全不同于提问的运动出发。我已经告诉过你们，那种提问运动仅凭作品本身在场这一事实就会自我取消；我们应当从眼前这件作品所强加的东西出发，也就是说，从中心人物、这位小公主向我们暗示的那张童稚之口出发……

她是王室夫妇——腓力四世与奥地利的玛丽安娜——的第二个女儿……小玛格丽特公主；我可以说，委拉斯开兹画过她五十次。让我们由这个人物引路；她仿佛在“这个空间”中迎面朝我们走来，而这一空间对我们就是问号所在。

对所有见过、谈过或写过这幅画的人来说，它向我们提出的问号，是从她口中迸发的“呼喊”；我会说，必须从这些呼喊出发，才能完成我所谓这幅画的第二圈……

而在我刚才谈到的“那部著作对作品的分析”〔福柯〕中，错失的似乎正是这一圈……“让我看看画布后面有什么”；画布以背面朝向我们。这是她所发出的“让我看看！”，也是我们或多或少已经准备说出口的话。

只有从这句“让我看看！”中，才可能涌现出由此强加给我们的东西，也就是“我们所看见的东西”：这些人物，正如我所称，他们在本质上都是处于呈示之中的人物。

但我们看到的不只这些；我们还看到了“画作的结构”，即它的“透视”装配。这里，我当然只能遗憾，我们没有足够好的支撑，无法向你们严格展示这些线条。

这里，你们看到一个人物被框在背景那道明亮的门中；透视线恰好汇聚于他所在的位置。各条线交会处略有浮动，但消失点大致落在从这个人物的形象画出的线与他肘部之间。恰恰是这个人物，而且是一个正在离场的人，占据“消失点”，这并非偶然。

这个人物不是随便什么人。他也姓委拉斯开兹，只不过名叫涅托，而不叫迭戈·罗德里格斯。

在让委拉斯开兹晋升为“国王宫廷总管”——类似“宫务大臣或大司礼官”——的投票中，这个涅托得到过几票。归根结底，他是一种使画家“加倍”的人物；而他在这里借助如下事实向我们标示自己：我们看不见某种东西，于是说“让我看看！”；他不仅从自己的位置看见了它，而且——“恕我这样说”——已经看得太多，所以正在离去。对于眼睛功能在主体那里充分展开时所达到的这个尖端，还有比这种近乎由一个终结性的“已经看见”表达出来的方式更好的标示吗?

由此，委拉斯开兹本人出现在你们刚才看到的那个位置。第二张照片也不比第一张好，所以你们没能看到在更好的复制品上可以看到、而且谈论此画的无数作者都曾作证的一点：这个正在观看的人物——人们强调，他朝向我们这些观者——天知道人们曾对这一凝视方向作过多少推测——他的凝视恰恰比任何人都更少朝向外部。这不是我个人的分析。许多作者——绝大多数——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他呈现出某种做梦般的、心不在焉的样子，转向某个“内在构图”（disegno interno）[注4]……

> [注4] Libertas artibus restituta：“把自由归还艺术”。这一运动始于文艺复兴初期，逐渐建立起一种通过提升视觉艺术“智性”维度而奠基的理论。绘画若要被视为一种“自由艺术”，配得上由“自由人”实践和教授，就必须脱离被身体及其劳作所役使的行业与手艺之列，而向精神学科靠近。因此，达·芬奇在身后出版的《绘画论》（1651）中声称，要把绘画当作一种 cosa mentale（心智之事），而不再只当作手工活动。意大利的祖卡里、贝洛里等许多作者，都把绘画说成一种服从 disegno interno、即艺术家内在构想的“精神艺术”（相对于 disegno externo，即作为外在对象的素描或作品）：艺术家甚至在动手以前，便能在心中形成自己想要实现之作品的精确而完整的意象。

用贡戈拉主义者的话说——我是指整个巴洛克、矫饰主义、机智主义风格理论，随你们怎么称呼；贡戈拉是它的范例，也是它的花朵——……“内在构图”就是矫饰主义话语所参照的东西。严格说来，它正是我所谓这种话语中没有隐喻的情形，因为隐喻作为一个实在的构成要素进入其中：委拉斯开兹在自己的画布中在场，他的形象仿佛携带着一个标记与支撑，表明他同时作为画作的组成部分与要素处在那里。这就是那个得到表现的结构点；它向我们标示：支撑画布的人，如何以及经由怎样的道路，可以作为观看主体显现在画布本身之中。

好，这里有一件十分引人注目的事情；在我看来，只有依据我为你们引入的这一拓扑结构，才能标定它的价值。有两个特征必须凸显："这一凝视所凝视的东西"——所有人都会对你们说，"就是我们，我们这些观者"。我们为什么如此相信自己？它无疑在召唤我们去做某种事情，因为我们像我告诉过你们的那样作出回应。不过，这一凝视所蕴含的东西……

- 同样也是"画中那幅翻转画作的在场"；
- 同样也是"这个令所有观看画作的人震撼、仿佛独一而奇异的空间"……就在于这幅画一直延伸到我所谓"窗户"的尺寸，并"把它作为窗户标示出来"。

画作本身仿佛翻转到自身之上，以便在自己的一个角落中得到再现；由此，在画作前方创造出我们所在的空间，并且我们恰恰作为这个空间的居住者而得到标示。委拉斯开兹并非偶然、也并非随意地把自己放在他所占据的位置；"窗户"在他的凝视中得到这种当下化，正是这幅画特有的捕获点，以及它施加给我们的作用。

画中还有一个同它交会的地方。我只能再次遗憾地让你们去看图片；况且我必须说，许多书中的图片通常都很差，不是太暗，就是太亮。

这幅画不容易复制；但在画家得到呈现的这幅画中，"画家同画作之间的距离"被充分强调，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他恰恰处在无法伸手够到它的位置，而这里有一种意图"。

也就是说，群组的这一部分，也就是这里所谓 Las Meninas、“宫娥”……

- 即玛格丽特公主；
- 以及跪在她面前的玛丽亚·阿戈斯蒂娜·德·萨米恩托……她们位于画家前方，而其他人尽管看起来处于前方的类似平面，实际上更靠后。画家与画作之间这个空间究竟是什么的问题，不仅作为某种东西在那里呈现给我们，而且通过这道“痕迹”向我们当下化；只需把它指出，就能认出，这里有一条“穿越线”，标记着某种不只是明暗分割或画布分组的东西，而真正是作为观看者的画家那种幻想性在场经过后留下的“尾迹”。

如果我告诉你们，凝视主体走向的，是基线同“透视地面”相交层次上的某处，是一个无穷远点，那么，委拉斯开兹正是从这一点出发，以这种幽灵般的形式构成了这幅“自画像”有别于所有其他自画像的特征；它当然也有别于这位画家的通常风格。

他本人会对你们说：“你们以为，我会用这一滴颜料、这种油、这支画笔来画自画像吗？”

你们只需去看潘菲利美术馆所藏的英诺森十世肖像，就会看到风格并不完全相同。

这个观看主体的幽灵沿着这道仍然可感的痕迹返回了画中；我可以说，所有人物都承载着它的振动。关于这幅画，有一句已经成为陈词滥调的话；我必须说，我还听到过创作者等级中不仅最有权威、而且地位最高的人亲口说出：它是一幅各种凝视彼此交错的画，是某种互

相观看，仿佛每个人物都以同其他每一个人的某种关系为特征。但如果你们仔细看，就会发现，除了宫娥玛丽亚·阿戈斯蒂娜·德·萨米恩托望向玛格丽特公主以外，没有任何一道凝视固定在什么东西上。

所有这些凝视都遗失在某个不可见的点上，仿佛有人说："一位天使刚刚经过"——恰恰就是画家。

另一位"宫娥"名叫伊莎贝尔·德·贝拉斯科，她在那里仿佛被惊呆了，双臂好像从这一经过的痕迹两边分开。那个傻女、怪人玛丽—巴尔沃拉，那位女侏儒，望向别处，根本不像人们所说的那样望向我们这一边。至于那个小侏儒，他正在十分准确地扮演自己作为小男孩仿制品所应扮演的角色，做一个"可恶的淘气鬼"："他一脚踢在狗的屁股上"，仿佛在对它说："你睡死了啊！刚才跑过去的老鼠都没闻到吗？"

如果还想坚持下去，人们会对我们说：这些都是凝视。但请注意，在一幅真是"凝视游戏之画"的画作中，至少这里——即使必须保留其中一位"宫娥"的凝视——也没有两道彼此勾住的凝视，没有心照不宣的凝视、会意的凝视或探寻的凝视。小女孩玛格丽特公主并没有看向那个望着她的侍女。所有凝视都在别处。当然，背景中那个正在离去者的凝视，也只是一道在说"我要离开你了"的凝视，远没有对准任何人。

既然如此，人们把某种东西放在这幅画理论的中心时，究竟是什么意思？他们声称，在这里前景处、也就是我们的位置——天知道观者可以怎样陶醉于这样一个支撑、这样一个假设——站着的正是"国王与王后"，而他们被映在背景那面本应在这里向你们显现的镜子中。

对此，我要反问：无论画家在这幅画的什么地方向我们显现，他想让我们把他放在哪里？

人们提出过一种最具诱惑力的假设：既然画家在那里，而这一切又是他画的，那么，他一定是在一面镜子中看到了整个场景与周围的人；这面镜子就在我们的位置上。

于是，我们被变成了镜子。

这种说法并非没有诱惑力，甚至确实呼应着我向你们提到的主体相对于大他者的关系。不过，只要你们愿意，我会围绕这样一种经验向你们指出“镜子同窗户之间的严格差别”：这两个项在结构上恰恰没有任何关系。但还是回到画作。按照这一假设，画家是在一面镜子中看到自己周围的整个场景，并把自己画了进去。

我只看见一个反对理由：“没有任何东西向我们表明”——无论历史见证如何，而天知道历史多么乐于传递这种消息——委拉斯开兹是左撇子。

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这种说法，即这幅画据称借助镜子完成，而画家又把自己如实画成右手握笔，那么，我们本应看到他以左撇子的样子出现。

你们或许觉得这个理由很薄弱。但即使如此，倘若情形真是这样，这一理论便同国王与王后在此的说法完全不相容。要么镜子在这里，要么国王与王后在这里。

如果在这里的是国王与王后，就不能是画家；如果画家在别处，如果国王与王后在那里，“在那里的人就不可能是画家”。而我假定画家事实上就在那里。

卡斯托里亚迪斯先生，你不明白吗?

“——不明白！”

按照这一假设，国王与王后映在背景那面镜子里，是因为他们站在这里让画家作画。既然我刚才排除了画家仅仅凭借画笔之技而以别的方式出现在那里的假设，那么画家本人就必然在这里。

况且，恰恰因为假定镜中是国王与王后，就必须要求画家在这里，而不是在由我们自己充当的一面镜子的另一边。换言之，在同一个位置上，我们不能放置这个“三元组”中的任意两方：假定的镜子、国王与王后、或者画家。

为了让事情成立，我们总被迫同时放入其中两个，但它们不可能同时存在。

如果国王与王后站在那里，以便映入背景的镜子……

然而，把他们表现为处在镜子中的那个位置是不可能的，哪怕只考虑比例：镜中所见的他们，同旁边那个正在离去的人物大小几乎相同。可是，考虑到我们所在的距离，他们本应正好小一倍。但这还只是一个附加论据……按照这一假设，如果国王与王后在那里，那么画家就在这里；于是，我们便面对轶事作者——例如德·莫特维尔夫人[注5]——所提出的位置：国王与王后站在这里——“甚至还不止如

此！”——正在让人……摆姿势，而他们面前排列着所有这些人物。你们可以看出，如果委拉斯开兹此时真的正在画某种完全不同于他们的东西，而且还在画某种他看不见的东西——因为他看到所有这些人物处在围绕自己的位置上——那么这些人物的自然功能会是什么。

> [注5] 弗朗索瓦丝·贝尔托·德·莫特维尔（1621—1689）：《回忆录》，第一至五卷，Gallica。

同这种“明显的不可能性”相反，我提出：这幅画所标示之物的本质，是“窗户”的这一功能。画家能够沿其返回的那道痕迹仿佛被标记在那里；这真正向我们显示，它正是空位置所在。

恕我这样说，那些人同这个空位置对称地显现出来；支撑他们的并不是凝视，而是如下假定：他们看见一切。他们处在这面镜子中，就像可能站在栅栏后面或“单向玻璃”后面一样。归根结底，在极限上，没有什么阻止我们假定，这里涉及某种类似所谓与大厅“连通”“相连接”的窥视空间；他们确实就在那里，而他们看见一切这一事实，支撑着这个世界处于呈示之中。这里有某种东西，仿佛为我们提供了笛卡尔“我思故我在”的对应物：“我画故我在”，委拉斯开兹这样说；我就在这里，把我已经完成的东西留给你们永恒地质询。

而我也处在这样一个地方：我可以从那里返回那个留给你们的位置。某种位于主体核心的东西在那里掉落并陷入失序；这一效果真正是在那个位置实现的。各种解释的繁多、它们的——可以说——窘迫与笨拙，已经足以强调这一点。

可是在另一点上，我们拥有什么？“王室夫妇的这一在场”所扮演的角色，同笛卡尔的上帝完全一样：在我们看到的一切中，没有什么在欺

骗，但唯一条件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本人”在那里受骗。你们在镜子那种奇特的朦胧气氛中看到的，正是这些存在者的在场。如果这面镜子在这里，仿佛等同于某种将在主体层次上消隐的东西；它同前景窗户的这个“小(a)”彼此呼应。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多停留片刻吗？

大约三十年后，有位名叫卢卡·焦尔达诺的画家；他恰恰是一位绘画上的矫饰主义者，在历史上因画得稍微太快而得到“快手”（fa presto）的标签，不过他的才华异常耀眼。他久久凝视这幅图像——至于它如何得到证实，我还没有向你们讲述其历史——随后说出一句话，一句天哪，我们完全可以期待一位既是矫饰主义者、又十分聪明的人说出的话：“这是绘画的神学。”

当然，这句话正是在这个神学层次上取得意义：笛卡尔的上帝支撑着“一个正通过主体幽灵而发生转变的完整世界”；而正是以在背景画框中向我们闪烁显现的王室夫妇为“中介”。不过，在离开你们以前，我还要告诉你们，至于我自己，一位委拉斯开兹这样的画家所可能具有的预见性，向我暗示了什么。

因为，谁会用现实主义来谈论他？比如，面对纺织女，谁敢说这是一幅描绘民间粗粝生活的画？它无疑可以是——如果有人只想把它理解成：画家某天离开王室织毯厂时突然捕捉到一个“闪现”，看见前景中的女工为背景发生的事情构成画框，并想把这一闪现永恒化。



我只请你们找一幅比我刚才展示的更好的复制品，去看“这幅画”，看看它同一切“现实主义”有多么遥远——况且，“根本没有现实主义画家”，只有预见者，这一点确凿无疑。再仔细看看“这一场景背景中发生的事情”：那些人物在镜子中向我们闪烁显现；他们当然不同于我刚才所谓幽灵般的人物，而真正熠熠发光。这使我想到：同画家框住我们的那扇窗户形成两极对立，并且仿佛在镜中，他让某种东西为我们涌现；就主体同“对象(a)”之关系在我们这里所发生的事情而言，它无疑并非出现于任意位置——那就是电视屏幕。

英诺森十世



返回 05-11 返回 05-25



第18课 · 1966年5月18日

格林 奥杜阿尔 拉康

拉康

我想向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米歇尔·福柯致意；他屈尊参加这次研讨班，令我深感荣幸。

至于我自己，与其当着他的面照例施展惯常功夫，不如试着向他展示我们这些聚会的主要目标，我很高兴；这就是一种培养目标。它在我们之间蕴含着几件事：首先，事情不能从你我两边一开始就被定位在同一层次上；否则还有什么意义？那只是一种教学虚构。

正因如此，在最近三次“会面”中，我不得不通过“某种相互调适的努力”，多次回到同一个平面。我认为，从上上次到上次已经迈出了一步，并希望今天还能再迈一步。简言之，今天我还会回到《宫娥》为我们提供的这个极其出色的支撑。它当然不是作为主要对象被放到前景——这里不是卢浮宫学院——而是因为我们觉得，我曾试图凸显的若干事实在其中得到了特别鲜明的说明。对于所有没有充分跟上我的人，我还会再谈这些事实。这里涉及的显然是一些不寻常的东西。

无论大学还是中学，你们所受训练中的惯常教学方式，都使真正构成现代几何学之本质形式的东西，不只为你们所不知道，而且尤其显得晦涩难解。对此，我当然已经看到效果：我曾试图借助一些十分简单而具有示范性的图形，给你们带来某种东西，以唤起你们对这一维度的感受。

就在这时，《宫娥》出现了。事情常常如此——我们总忍不住惊叹，其实不该惊叹——它们来得恰到好处。并非只有我们在同一个领域工作。

米歇尔·福柯先生在第一章中写下的东西，立即被我的一些听众——我必须说，他们早于我——注意到，认为它在两个研究领域之间构成了一个格外恰切的交点。

相关知识卡 《宫娥》：福柯的表象分析与拉康的凝视重读

确实应当这样看待它；而且越是努力重读这令人惊叹的第一章，就越是如此。我希望在座各位已经注意到，这一章稍后在书中又被重新拾起，处在“关键点”“转折点”上，也就是某种模式的连接点：这一模式可以说构成了“词与物”之间的关系；它在一个始于十六世纪成熟期的场中建立起来，并抵达福柯书中那个特别典范、表述特别清晰的点，即十八世纪的思想。

当福柯即将抵达……抵达他视角中的目标，抵达他把我们带到的那个点时，另一种分节诞生了，也就是十九世纪诞生的分节；它已经使他能够向我们同时引入所谓“人文科学”的功能，以及它深刻的含混性与问题性。米歇尔·福柯先生在这里停下来，再次谈到他的《宫娥》，围绕着我们上次也把话语悬置在其上的人物——也就是国王在画中的功能〔《词与物》，第318页〕。

相关知识卡 《宫娥》：福柯的表象分析与拉康的凝视重读

你们将看到，“今天”，如果时间允许，如果事情如我希望的那样展开，这会使我能够把两者连接起来：一方面是我刚刚引入的东西，也

就是射影几何学能够为所谓视觉主体性带来的精确规定；另一方面则是我很久以前已经在“镜像自恋”主题下提出的东西。

镜子以一种谜一般的形式出现在这幅画中；它如此神秘，以至于上次我可以开玩笑地总结说，既然不知道拿它怎么办，我们不妨从中看到某种令人惊讶、看起来同电视屏幕极其相像的东西。

这显然是一则“奇想”（concetto）。不过，今天你们将看到——如果时间允许，我再说一遍——画作与镜子之间的这一关系，以及二者不只是为我们说明或再现、而是真正作为表象结构来代表的东西，正是我希望今天能够引入的。但在这样做以前，我想先听取一些证言，看看我前几次话语之后产生了哪些问题。

我请格林发言；况且——既然我们是在闭门研讨班——他在这个圈子以外向我提出回应时，已经仿佛自发地表示愿意把这份回应带到这里。所以，我现在把话交给他。

我想奥杜阿尔——不知道他是否在场——也愿意向我们提出一些质询要素。紧接着，我会试着在回答他们时，或许——我希望——促使米歇尔·福柯先生谈几点看法。无论如何，我一定会请他回应。

好。格林，我把话交给你。今天我的嗓子有点累。我不确定，在这个声学效果同清洁状况一样糟糕的大厅里——至少今天如此——后排能否清楚听到我的声音。能吗？总之，现在大家可以稍微动一动、靠近一些。这样我会更有把握。

安德烈·格林

事实上，拉康向我提出的要求，“主要”是让我给他一个机会，重新接续上次已经开始的展开。当时听他评论时，我自己想到几点看法，便冒昧写信给他。这些看法主要涉及投影条件；它们同拉康的评论、同他本人在评论中所占据的位置，以及从他所在之点无法看见的东西，都有十分直接的关系。

如你们所知，这次投影的条件很糟，光线又不够暗，使画作严重失真；尤其是，画中某些细节变得完全不可见。特别是涉及……[注]

> [注] 说话人标记校勘：Staferla 转录把下一段说话人的姓名接在上一段末尾；依发言内容与对话衔接，将“LACAN”移至下一段段首。本课后面福柯回应处的同类错位亦作同样处理。

拉康——格林，这不是批评……今天我们还会投影。今天会顺利的。我不认为问题在于“不够黑暗”——尽管我们珍爱黑暗——并不是这么回事。我想，是灯不知为什么没有调好，或者是为另一种用途制作的。

总之，上次我那张幻灯片——我诅咒了卢浮宫学院，是我错了，而且我已经去道歉——不仅完全够用；你们马上会看到，它非常出色。所以问题在灯上。

“当然，如果我们想投影，就必须把这些窗帘放下来。”

“那么，快点做吧。劳驾各位。好了，谢谢。格洛丽亚，开始吧。放《宫娥》。”

安德烈·格林

事实上，上次被抹去的，是委拉斯开兹本人这个人物——也就是画家——以及那对男女。

今天可以看得更清楚；但上次恰恰被抹去的，是画家这个人物和那对男女，那对当时显得完全被抹去的男女。

我对这种抹去产生了疑问。我问自己：与其只把它看成某种不足，我们是否可以认为，这种抹去本身意指着某种东西，像一种无意识产物，如失误行为、遗忘；是否其中存在一把“钥匙”，一把奇特地把画家与那对男女连接起来的“钥匙”？那对男女处于昏暗中，似乎对场景漠不关心，仿佛在窃窃私语。

从这一思考出发，我问自己：关于这种抹去、关于画中痕迹的抹去，是否存在某种值得深挖的东西？画中的光照平面由拉康和福柯都作了十分精确的区分，尤其包括背景中另一个委拉斯开兹——背景的委拉斯开兹——所在的光照平面，以及从窗户向他投来的光照平面。

所以，也许正是在这个“两者之间”，在“两道光之间”，存在某种可以深入探究、关乎这幅画意义的东西。现在，如果你们愿意，或许可以重新开灯。这就是我曾书面告诉拉康的几点看法；当时我丝毫没有认为它们还有不同于“重新推动他的思考”的目的。

然后，我重新读了福柯的文字、这篇如此出色的章节，并从中看到若干同我刚才所说之处相汇合的点。尤其是他本人谈到画家的这句话：

> “他阴暗的身形与明亮的面孔，毗邻可见与不可见。”〔《词与物》，第19页〕

相反，在我看来，福柯对我刚才提到的那对男女几乎保持沉默。他确实提到他们，说有一个廷臣在那里；但他完全没有谈到另一个人物——从我们所能看到的来看，她似乎是一位修女。我必须说，《词与物》里的“复制图”完全看不清她，而拉康刚才钉在这里的这张复制图，却让人有充分理由认为她是一位修女。当然，我还在福柯的文本中重新发现了若干系统性的对立，它们照亮了这幅画的结构。

其中一些对立已经得到揭示；例如，镜子的对立：

- 镜子作为模型与观者之间对立的支撑；
- 镜子同画作及画布对立。尤其就这块画布而言，福柯有一句表述，我想会使我们强烈联想到压抑的屏障。

“它使凝视之间的关系永远无法得到标定或最终确立。”〔《词与物》，第21页〕

画布的位置及其背面被赋予这种不可能性——无法知道上面铭写了什么——使我们想到，这里存在一种极其根本的关系。但尤其是，联系拉康对透视的思考，我觉得有趣的并非找出其他对立——当然还有一些，而我忘记了——而是尝试从拉康关于透视的视角，理解从背景到

表面的不同平面如何依次排列。我认为，我们至少可以在那里找出四个平面，这当然并非无关紧要。依次是：

- 另一个委拉斯开兹所在的平面，即背景平面；
- 那对男女所在的平面；
- 画家所在的平面；
- 以及由“公主和她的侍女、傻女、弄臣与狗”构成的平面；他们全都位于委拉斯开兹前方。

他们位于委拉斯开兹前方；我认为，这个群组本身还可以分为两个小组：

- “由公主构成的群组”；福柯把她视为画作的两个中心之一，另一个中心是镜子；

我认为这一点显然十分重要；

- “由动物与怪人构成的另一个小组，也就是傻女、弄臣尼古拉西托·佩尔图萨托以及那条狗”。

我认为，这种“从后到前”排列并包含这两个群组的“划分”，可能会使我们想到——这里也许我走得有些远，不过只是为了给你们的评论和批评提供材料——“这幅画当然是关于表象的画，是我们所谓古典表象之表象”；但它也许还是关于作为创造的表象。最终，创造的二律背反就出现在两边：左侧是这个绝对的存在者；公主同她身后的两位生育者之间的关系，把创造呈现为最成功、最幸福的人类形态。相反，在另

一侧、窗户一侧——它同画布相对——则放置着创造的失败品、阉割的标记，也就是“傻女”与“弄臣”所可能代表的东西。

如此一来，处在昏暗中的这对男女，相对于镜中映出的另一对男女——即国王与王后——就会具有一种特殊价值。这一双重性或许被过分地引向了创造的问题，因为创造恰恰是委拉斯开兹正在画的东西；我们在这里或许也发现了他所画之物同我们正在观看的画作之间的双重性。我认为，应当依据“这些平面”与“这些透视”的对立来看待这一点。背景中的人物并非偶然——这一点我原来不知道——福柯谈到“背景中的这个人物”时，我不知道他也姓委拉斯开兹，因而可以称作另一个委拉斯开兹。福柯说了句令我印象深刻的话：“也许他正要进入房间？”

“也许他只是窥探室内发生的事情，满足于出其不意地看到别人，而自己不被看到。”〔《词与物》，第26页〕

我认为，恰恰由于他的位置，这个人物正处在观察的姿态中。他观察什么？

当然，是在他前方展开的一切；而委拉斯开兹根本无法观察那对处于昏暗中的男女，只能看向自己前面的东西，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两个小组。

我不想说得太久，好把话交给拉康；不过，我认为，我们不能不看到：在这一切中，在拉康所说的窗户与画作的关系中，这幅画所产生的迷惑效果——我认为，这才是对我们最重要的，也就是它确实产生一种迷惑效果——同我们被卷入的幻想有直接关系。也许，这里恰恰

同我刚才谈到创造时提出的几点看法有关，换言之，同原初场景有关。

拉康

好。我们可以感谢格林的发言，也感谢——天哪，这听起来不太友善！——他的简短。不过，本次课开始时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我想请奥杜阿尔——如果他愿意——作一次发言；我相信，它会有同样的优点。

泽维尔·奥杜阿尔

我恰恰觉得，在这样的研讨班中，不应该只有那些已经理解的人、那些聪明学生发言；没有理解的人也应当能够说出来。

因此，我想向拉康先生和各位“说明”——请先原谅这次发言略显吃力——我主要想表达的，是我没有理解拉康先生所作拓扑学呈现中的哪些部分，尤其是他关于“支撑平面”与“图形平面”相遇的那部分。

首先，“不理解”有好几种方式。一种是走出研讨班时对自己说：“我什么也没听懂。老兄，你听懂什么了吗？”——“我也没有”，另一个人说。然后事情就停在那里。

还有另一种方式，这一次我采用了它：坐在一张纸前，试着给自己画出“我自己的小图”、自己的小图式。这并不容易，主要是今天早晨做的，因为拉康先生正是今天早上打电话告诉我，我也许可以说点什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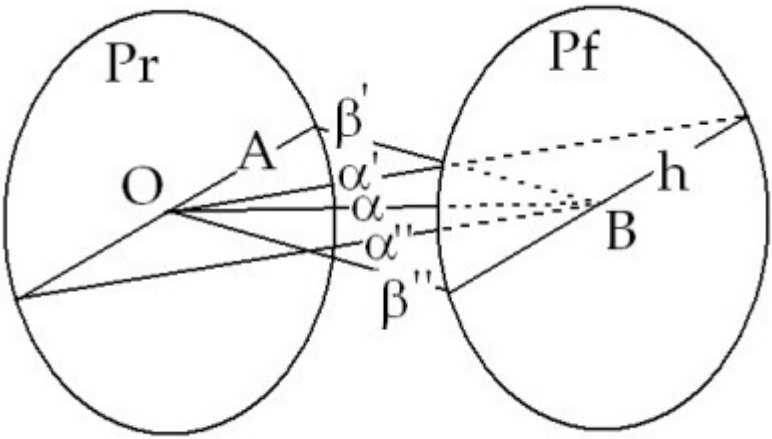
于是，我赶紧做了点东西，确实完全是即兴的。只是我很为难，因为我很想把“我自己的小图”放到某处，却发现这会破坏本次课的安排，而且……拉康——纸就是干这个的，用纸吧。

奥杜阿尔

非常感谢。那么，我只需向你们讲述自己不得不怎样向自己表达这些事情，再请拉康先生告诉我错在哪里……拉康——说吧，老兄，说吧。

奥杜阿尔……这会让我们看得更清楚。好。

我要用一个圆形平面表示这个凝视平面〔Pr〕，我的眼睛被包含在其中；既然眼睛被包含在这个凝视平面中，它就无法看见该平面。这里将有一条通往地平线〔h〕的无穷远线〔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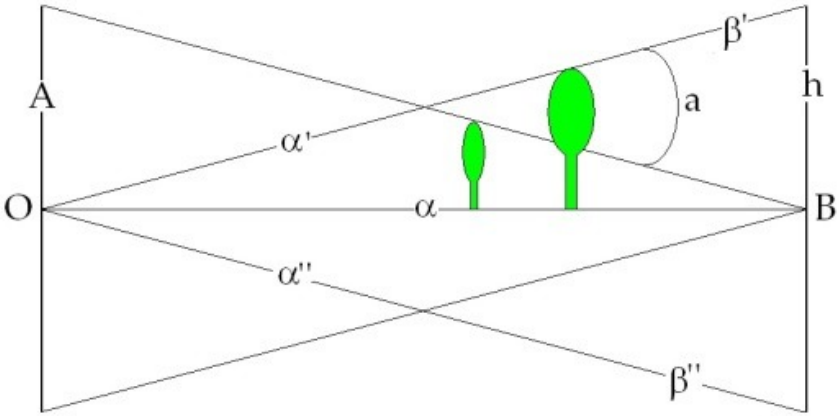


这里〔A〕将出现这条线〔h〕的射影重复。它不只是像度量几何学中那样对这条线作射影重复；对一种度量几何学来说，其中每一点当然都可能借助平行于这条线〔α〕的线投射到那里，构成一条平行线。但实际上，对位于凝视场中这里〔O〕的我的眼睛而言，每条这样的线〔α′、α″〕都不再平行，而会在提供给我眼睛的透视中构成一个点〔B〕，就像这样。

好。同样可以肯定，从凝视场延伸到地平线的无穷远线〔α〕，本身也会以某种方式——我的位置或许正在这里有些不确定——以某种方式投射到这条线〔h〕上，并最终投射到这个点〔B〕上。这条线〔α〕上的每一点与这条线〔A〕上的每一点，最终都会投射到点〔B〕上。

这里是图形平面〔Pf〕，也就是在我观看时提供给我、提供给我的凝视的东西：我的场。那个我无法看见的平面，即支撑平面、我的眼睛被包含于其中的凝视平面，将以某种方式投射到我的场中。以至于正如拉康先生经常提醒我们的，“我看见多少，就同样被看见多少”。

也就是说，来到这里、同凝视平面或者拉康先生谈到的那条基线连接的线〔α′、α″〕，在这个图形平面上也可以说是可逆的，如此变成〔β′、β″〕，完成一次恰好相反的投射。因此，如果我认为凝视平面投射到图形平面上，而凝视平面又把某种来自图形平面的东西送回给我，那么在凝视平面同无穷远线、消失点、地平点之间的每个中间点上，这一空间中的每一点都会产生一种差异：取决于我把透视视作大致朝这个方向向量化，还是朝那个方向向量化。例如，一棵树在这个向量上具有这样的尺寸……



而在另一个向量上，它会具有这样的尺寸。

因此，这里会有一个间差〔a〕，某种不可见的东西；它只不过表达出，在这个平面〔Pr〕的每一点上，每一点相对于自身也存在一个间差。也就是说，这个空间并不同质，每一点都相对于自身发生偏移，形成一个不可见、无法被看见的间差；然而，正是它以奇特的方式构成我的眼睛在“透视平面”上感知的每一样东西。透视平面上看到的每样东西，都由图形平面送回，因为凝视平面就投射在图形平面上。每一个这样的间差都可以称作〔a〕；这个〔a〕构成了凝视平面的每一点相对于自身所取得的间差。

于是，这个平面的绝对非同质性被揭示出来，而每个对象都显现为能够同自身保持某段距离、相对于自身具有某种差异。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在格林刚才告诉我们的内容中，如果确实考虑各个平面照明方式的这种交叉，他所谈的人物就仿佛处在交点上，仿佛

在连接、连接这里如此交叉的东西。而且，相对于身体，面孔的照明中确实也存在某种略微超出的东西；它或许可以——仅仅作为一种简单说明，我无意做更多——向我们指出，当凝视平面与图形平面彼此对照——这个说法此刻正合适——时，对象相对于自身所取得的那一细小差异。

以上就是我向自己表达这些事情的方式；我把判断交给拉康先生，请他告诉我，我是否错得离谱，或者漏掉了他那天所说的一部分。

拉康

非常感谢你，奥杜阿尔。好。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构造，因为它很有示范性。

我很难相信，其中没有混入你想调和两个东西的欲望：一个是两年前[注1]我谈到“窥视驱力”时给出的“第一个图式”，另一个是上次和上上次刚刚带给你们的东西。你所提出的这个图式既不符合我这两次陈述中的任何一个，却有各种自己的特征；最主要的一点，是它似乎想把你所谓“图形”的表象同你从中出发的凝视平面上所产生的东西之间的某种“相互性”形象化——至少我是这样理解的，除非我误解了你的意思。

> [注1] 1964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四个基本概念》，1964年3月4日与3月11日课；瑟伊出版社，1973年。

我想，这里确实涉及一种严格相互性的表象；可以说，主体间性的持续眩晕在其中留下了标记。在此基础上，你又以一种值得逐项批评的方式引入了某种我说不清的东西——我不想详谈——由此似乎产生这样一种结果：对象——这里确实涉及对象，因为你假定了一棵小树

——其全部立体感，仿佛都来自把握它的两个透视不相重合；我说得稍快了一点。

按照你安置事情的方式，这一点实际上大概可以成立。况且我认为，最终你在凝视平面中向我们呈现两个彼此分开的点，并非毫无缘由；我不知道这是否出自你的意图，但它以一种引人注目的方式唤起了双眼视觉。

总之，从这个图式来看，你似乎完全受困于某种当然很混乱的东西；它的威望来自这样一点：它相当贴合严格说来属于“光学”生理学所努力探究的东西。

当然，我说得很快。值得同你逐项讨论；但若如此，我想今天的研讨班就不能算是继续沿着我们必须谈论的轴线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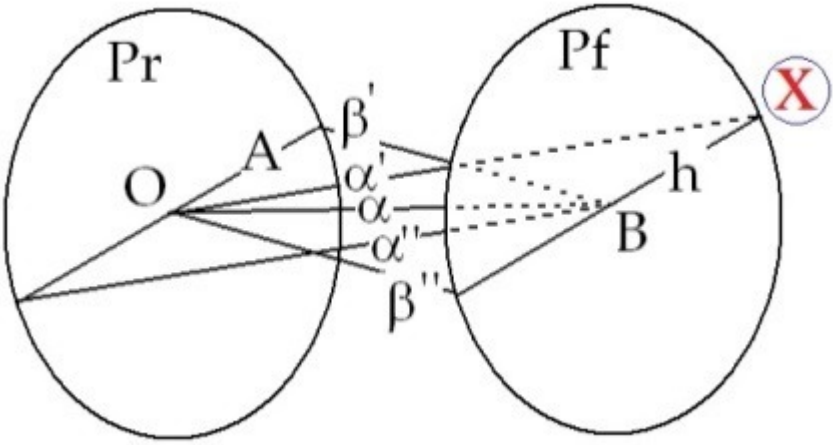
总之，不难辨认你的构造相对于我所提出之物的缺陷。你从某种东西出发——姑且说，你把它称作观看主体的平面或凝视平面——从这里出发，是一个十分明显而且极具决定性的“错误”；正是它使你后来试图覆盖我所说内容时陷入窘境。这只会给我一个机会，再表达一次。

你从那里出发，说这里〔A〕——“你画出了一条水平线”，却没有立刻明确它究竟是什么……

况且，我们正是在这一点上仍然感到困惑，因为决定这条线的东西是什么？它由我第一次称作“支撑平面”、后来为了形象和简便而称作地面、即“地平面”的那个平面决定……你没有明确这一点；反而假定这个平面、这个凝视平面中的某种东西能够投射到你最初引入的地平线上。这真正错失了我前几天在第二次讲解〔见上文05-11〕中呈现的构

造之本质；此前，我第一次讲解〔见上文05-04〕时所用的方式，其实完全可以只用黑板上的“字母或数字”来转译。

这个凝视平面中的任何东西——如果我们依照我的方式，把它定义为同图形平面、也就是同画面平行——都无法以一种你能够加以表示的方式投射到画面上。因为它确实会投射到那里，一切都会投射过去；但它投射过去时所依据的，不是地平线，而是画作的无穷远线。



因此，这个点〔X〕——我用红色画它，以区别于你的线——就是画作平面的无穷远点。明白了吗？这一点很容易构想，因为如果我们按照事情应有的样子重新建立它们，也就是说，我在这里画……“格洛丽亚，请再给我几张纸好吗？否则真的会太乱……”与此同时，我仍要试着说明这一切为什么同我们有关。毕竟，对没有参加我们前几次谈话的福柯来说，这些内容似乎有点超出图样的边界——这话正合其意。但这可以给我机会明确问题所在：我们是精神分析家，我们面对什么？

面对一种称作“窥视驱力”的驱力。如果驱力像弗洛伊德写给我们的那样是一种被构造之物；如果我们沿着弗洛伊德关于驱力的写法前进——驱力不是本能，而是一套“装配”，是本质上属于不同层次之现实之间的装配——那么，其中就有称作“推动”、Drang 的东西，还有某个身体开口；恕我这样说，Drang 以这个开口为支点，并从中取得自身的恒定性，而这一点只能以严格的拓扑方式构想。Drang 的这种恒定性，只有假定它从一个表面发出，才能得到阐明；这个表面以一条恒定边缘为支点，由此最终保证了 Drang 的向量恒定性。

接着还有某种往返运动：“每一种驱力都在某种意义上把”某种东西“包含在自身之中”；这不是它的倒数，而是“它向自身基础的返回”。它从某种我们在极限处才能构想的东西出发；我说的不是隐喻，而是从根本上铭写在存在中的东西：一次绕转。驱力绕行一周，绕过某种东西，而我把这个东西称作“对象(a)”。分析实践不断以十分清晰的方式说明这一点：“对象(a)”在最“易于接近”、被“分析经验从字面上圈定”的程度上，一方面就是我们所谓“乳房”；我们在足够多的语境中这样称呼它，使它的含混性与问题性对每个人都显而易见。

乳房是“对象(a)”；各种事情都充分表明，这里涉及的并不是我们谈到乳房时那个肉质的东西，不只是婴儿把鼻子压在上面的东西。若要界定它——如果它必须实现分析实践中显出的那些功能与等价可能性——就必须用一种全然不同的方式加以界定。

我在这里不强调另一个提出同类问题的功能：无论你们怎样称呼它，“粪块”“废弃物”或“排泄物”。在这里，我们拥有某种可以说十分清楚并已被圈定的东西。

可是，一旦进入窥视驱力的领域——我所依据的那篇文章恰恰谈到它；我援引这篇文章，不只因为它是弗洛伊德[注2]的神圣文本，而是因为它是一篇“顶峰之作”，弗洛伊德在其中表达了某种恰好朝向我努力给出的这种“拓扑学”精确性的必然性——

> [注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驱力及其命运》，载《元心理学》，巴黎，伽利玛出版社，“观念”丛书，1968年，第11—44页。

倘若他在这篇文章中尤其凸显了窥视驱力中的往返功能，这就要求我们尝试圈定那个名为凝视的“对象(a)”。所以，问题在于“窥视主体的结构”，而不是视觉场。我们立刻看到，这里存在一个主体以突出方式卷入其中的场。

因为，对我们而言——我说“我们”，是指你和我，米歇尔·福柯；我们都关注“词与物”的关系，因为归根结底，精神分析涉及的只有这一点——我们同样立刻看到，这个窥视主体同符号功能具有突出的关系。

因此，这里涉及的东西从一开始就引入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维度，不同于“视觉场本身”所代表、可在词语初级意义上称作“物理的”维度。由此，如果我们在某个精确的点上或从某个角度，试图做一件我不知道你是否接受其名称的事情，即某种“主体性史”……

你会接受这个标题吧？不是副标题，因为我想你已经有一个副标题了，而是次级副标题，对吧？无论我们像你在《临床医学的诞生》《疯癫史》中所做的那样界定一个场，还是像你最新的著作那样界定一个历史场，都很清楚，“符号功能”在其中作为某种本质的东西显现；在这种分析中，你正是赋予它这种“根本功能”。

由于我们已经耽误了这些时间，我或许来不及逐项提出你第一章中的全部术语；我绝不是要对它们提出任何反对，恰恰相反，它们在我看来“从字面上”汇聚于我所作的这类分析。你最终得出结论说，这幅画在某种意义上是“表象世界”的“表象”；你认为，相互应用的——我会说是无限的——系统，构成了某个思想时代的特征。

你并不完全反对我刚才的说法吧？

福柯：……

拉康——你同意！谢谢。这证明我理解正确。

当然，没有什么能比这样一场争论所迸发的光彩，以及它给予我们的满足，更能“教导我们”。

我绝不认为，下面的说法是在向你提出“反对意见”：归根结底，正是为了一个教学目的——也就是为我们提出某种系统局限性所强加的问题——我们才需要“基准”；因此，向我们呈现对于十七与十八世纪思想的这种把握，确实十分重要。

如果我们甚至想开始猜测，我们自己的问题会从怎样的角度提出，还能用别的方式进行吗？没有什么比看见、把握在另一种语境中它们可能以怎样不同的——我可以说这个词——“透视”被提出，更有启发性。哪怕只是为了避免阅读错误；我甚至可以说，只是为了让我们能够阅读——因为我们并不天然倾向于这样阅读——那些作者，例如你以令人赞叹的方式凸显其思想构造的居维叶。当然，我还没有提到你在那个时代的经济学与语言学领域所带来的一切。

我要问你一个问题：你是否认为……你难道不认为，归根结底，无论我们能够怎样描画、怎样见证某一时代思想得以确立的路线，对“说话的存在者”而言，始终会提出同样的问题吗？我说“提出”，意思是他身处其中；因此，我们不能不从这样一种想法出发：结构完全相同的问题，对他们和对我们都会提出。

我的意思是，这不只是一种可以说“形而上学的”预设；更确切地说，也不只是海德格尔式的预设，即“真理的本质”问题始终以同一种方式被提出，而人们以若干不同方式拒绝它——差别全在这里。不过，我们仍然能够切身触到它的在场；我不是说像海德格尔那样追溯到希腊太古时代，而是说以直接方式触到。

在你给出的章节序列中：“言说”“交换”“表象”——我必须说，看到它们在目录中如此概括，颇具震撼力——你没有列出“计数”这个词，在我看来十分“引人注目”。我说“计数”，当然不只是在说算术，也不是在说“保龄球计分”。我的意思是，你已经看到，在十七世纪思想的正中心，某种东西始终未被认识，甚至遭到嘲笑。你和我一样知道我要谈谁：那个被人扔烂苹果、只好收摊的人；但在最优秀的人看来，他仍被认为曾发出最强烈的光芒——也就是吉拉尔·德萨格。他标示出某种在我看来逃脱了“不一致性特征”的东西；这个特征属于你为了总结十七与十八世纪而向我们描述的各个场中，那些表象彼此对应的不同模式。

相关知识卡 《宫娥》：福柯的表象分析与拉康的凝视重读

换言之，委拉斯开兹的画并不是——我会说——“一切表象模式”的表象；它是另一个词所说的东西。当然，这个词在这里只能像甜点一样

最后端上；我从弗洛伊德那里借来并反复强调它："表象代表"。这是什么意思？

相关知识卡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表象代表 · 《宫娥》：福柯的表象分析与拉康的凝视重读

我们刚才……总之刚刚得到一份鲜明的证言——奥杜阿尔，请原谅我——它显示出，当问题涉及窥视场时，我在并不久远的一段时间里、也就是最近两次聚会以来试图引入的特殊内容，是多么难以得到传达。

窥视场早已被用于它同"真理的本质"的关系。海德格尔在"这部著作"[注3]中提醒我们……

> [注3] 马丁·海德格尔：《真理的本质》（Vom Wesen der Wahrheit），法兰克福，V. Klostermann 出版社，1988年；法译本巴黎，伽利玛出版社，2001年，阿兰·布托译。

我甚至不明白，为什么它没有最先得到翻译；我说的不是作为 Wesen 的《真理的本质》（Wesen der Wahrheit），而是柏拉图关于"真理"的"学说"〔Lehre：学说、教导〕。这部著作不仅没有译本，而且根本找不到……海德格尔在那里提醒我们，在最初的教导中，在"真理"问题上，柏拉图使用了我所谓这个窥视世界，这一点绝对清楚、明白。

他使用它时一如既往，比人们所能想象的更加机敏、更为狡黠；因为归根结底，全部材料都在那里，正如我最近提醒的：

- 孔洞、黑暗、洞穴；
- 还有那个如此关键的东西，即“入口”，也就是我稍后将称作“窗户”的东西；
- 再往后，则是我所谓“太阳世界”。

正是整套行头的全部在场，使海德格尔能够作出那种精彩的使用；至少你，米歇尔·福柯，在这里知道……

因为我想你读过它；而且这部著作无处可寻，所以这里迄今读过它的人大概很少，不过我已经略微谈过……也就是让柏拉图说出远多于通常从中读到的东西，并且至少显示出若干“主体运动”的根本价值。如海德格尔强调的，这些运动恰恰把真理同某种培养、某种 παιδεία（paideia）连接起来。也就是同一些我们十分熟悉的运动相连；至少追随我教学的人熟悉其能指价值：转动与返回的运动，转过身并且必须维持在这种“转身”之中的人的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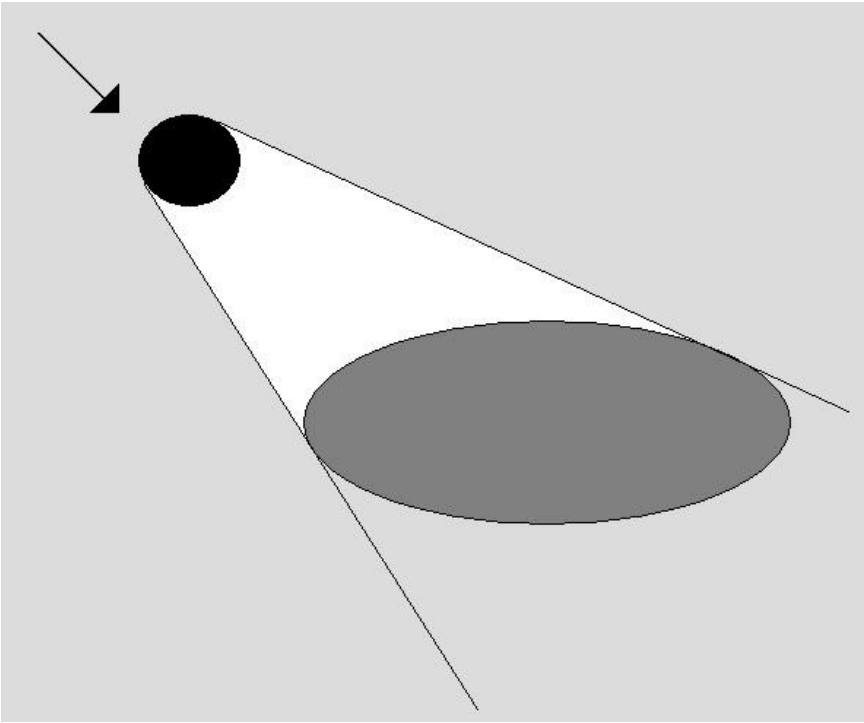
不过，时代后来的演变向我们显示，如果我们不知道在这个窥视世界的场中严格分离不同“结构”，这样的出发点会造成多大的混乱。

当然，若在其中作出某种对立——我马上将从这个对立出发——只能是一种简略处理。

柏拉图寓言通常被接受的教训只包含：

- 某种作为光线辐射点的东西，一个被他称作“真实对象”的对象；
- 以及某种作为影子[注4]的东西。

> [注4] 在柏拉图那里，“理念”这一真实对象不同于它的各种个别呈现（它的影子）。



洞穴中的囚徒所见仅仅是影子——通常从这一教导中接受的只有这点。我刚才已经标示了海德格尔如何“从中提取出更多东西”，显示出其中确实存在的东西。

不过，这种从光的中心性出发的方式，会走向某种不再只是它本来所是的结构——即“对象及其影子”——而是一种现实的渐次退化。它会在一切显现、一切 scheinen〔显现、似乎、闪耀……〕的核心，引入某种神话；借用海德格尔文本中的说法，正是这种神话支撑着“理念这一观念本身”，也就是“善”的“理念”：现实与一致性的强度本身就在那里、就位于那里；所有包膜仿佛都从中发出，而它们最终只会成为不断增长之幻觉的包膜，成为表象之表象，层层不已。

况且，恕我提醒——毕竟我不知道你们是否都记得清楚——1月19日我正是在这里说明了这一点；我请今天也在场的帕里索夫人评论了但丁的“两篇文本”，也就是他仅有的两处谈到“纳西索斯之镜”的文本。

而我们的经验、分析经验所带来的东西，以屏幕现象为中心。作为分析维度开端根基的，远不是某种像一点那样的东西，仿佛光本身的原初性使一切黑暗以存在物的形式涌现；相反，我们首先面对的，是屏幕所代表的这种问题性关系。

“屏幕不只是遮蔽实在界的东西；它当然遮蔽实在界，却同时也把它指示出来。”

“屏幕的这一构架”承载着怎样的结构，才使它严格整合进主体的存在?

这就是“转折点”。如果我们想说明经验中那些由“窥视的”一词标记的最细微术语，就必须从这里出发……而且，我们在这里面对的当然不只有“屏幕记忆”；

- 我们面对的是称作“幻想”的东西；
- 我们面对的是弗洛伊德不称作表象、而称作“表象代表”的那个项；
- 我们面对若干系列的术语，必须知道它们是否互为同义词。

正因如此，我们发现，这里所涉及的“窥视”世界不能只用幻灯的方式来思考，而必须放到一种幸而已经提供给我们的结构中来思考。

这一结构已经提供给我们……我必须说，它毕竟贯穿数个世纪而在场；它恰恰以某些人错失它的方式在场。有一个帕普斯定理[注5]，令人惊讶地准确铭写在帕斯卡与布里安松定理之中；后两者谈到某个内接于“圆锥曲线”的六边形，其相交点的共线性。

> [注5] 亚历山大的帕普斯：《数学汇编》，阿尔贝·布朗夏尔出版社，2000年。

帕普斯找到了其中一个特例：这个六边形并非内接于我们通常所谓“圆锥曲线”，而只是内接于两条相交直线。我必须说……一直到开普勒的时代，人们都没有注意到，两条相交直线也是一条圆锥曲线。

正因如此，帕普斯没有把自己的发现一般化。不过，我们可以列出一系列节点，证明在每个时代，这种已经可以称作射影几何学的东西都未被承认；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们确定，某种同窥视世界建立关系的模式始终在场。现在，在我们一贯仓促工作的情形下，我将尝试说出它的结构效果。

我们在寻找什么？如果想说明同“实在界”——我没有说同世界——建立某种关系的可能性，而且幻想结构在其中得到建立并显现出来，那么，我们必须拥有某种标示“对象(a)”在场的东西；“对象(a)”是某一效果的支架。我不仅不该说“我们很熟悉的效果”，而且恰恰相反，我们并不认识它；我们必须说明这个最初的、既定的效果，也就是我们在“精神分析”中从中出发的主体分裂。

相关知识卡 精神分析的对象：对象 (a) 与主体分裂

也就是说，只要你把“我思”与“未被思者”区分开来——我知道你这样做自有道理——对我们来说，就没有未被思者。精神分析的新意在于：在你所标示的地方——我指“你的论述”中的某一点，即未被思者同“我思”的关系——凡有这个未被思者之处，“它在思”；这就是根本关系。况且，你十分清楚地感受到它的问题性，因为随后谈到“精神分析”时，你指出，正是在这一点上，“精神分析”从根本上质询一切人文科学。

我没有歪曲你的话吧？……什么？

米歇尔·福柯——您重新塑造了它。

相关知识卡 《宫娥》：福柯的表象分析与拉康的凝视重读

拉康

当然。而且——自然——这种重新塑造还需要经过更多跨越与阶段。

相关知识卡 《宫娥》：福柯的表象分析与拉康的凝视重读

所以，这里需要的是一种几何学：它不仅使支撑平面上的东西能够“在图形平面中得到表示”，而且使那个被称作主体、为其构造所必需的“第三项铭写于其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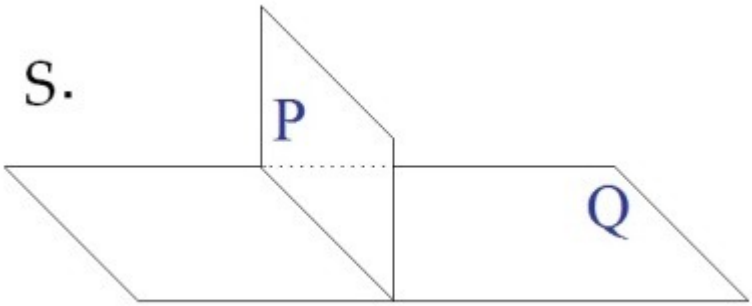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透视的主体点：阿尔贝蒂、潘诺夫斯基与拉康

这恰恰就是我作出那个不得不重新讲解的构造的原因。况且它毫无原创之处，常常取自最普通的透视著作；条件是以德萨格式几何学，以及此后尤其在十九世纪由它发展出来的一切来照亮这些构造。

不过，德萨格恰恰在那里向我们指出：早在十七世纪的核心，他已经充分把握了这整套几何学，例如对偶原理这样一种原则的根本存在。它本身在本质上只意味着：“几何对象”被送回到“一场象征等价游戏”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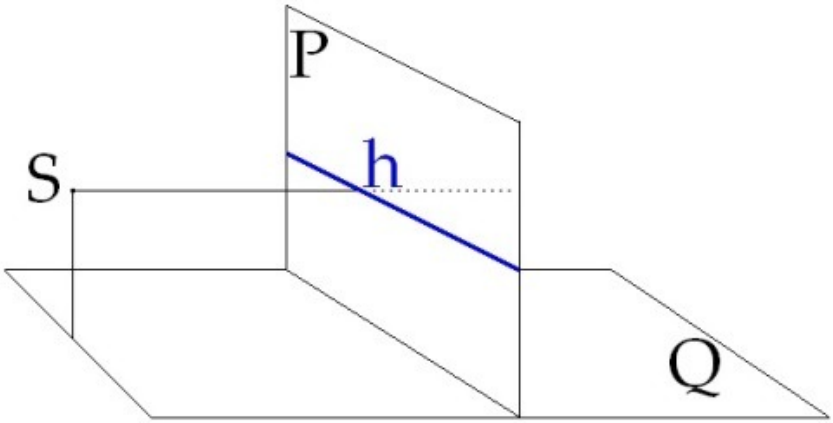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透视的主体点：阿尔贝蒂、潘诺夫斯基与拉康

好，只需使用最简单的透视支架，我们就会得到以下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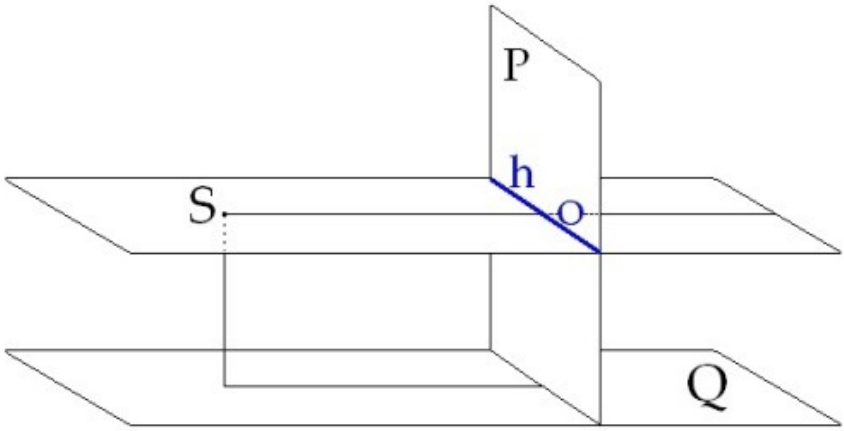


只要必须区分这个“主体点”〔S〕、这个“图形平面”〔P〕与“支撑平面”〔Q〕——我当然不得不用某种东西表现它们；请理解，它们全都

延伸至无穷远——那么，“某种东西就能够以双重方式得到标定”，从而把主体铭写在这个图形平面上。由此，图形平面不再只是被表现之物的包膜、可以说与之分离的“幻象”；它本身构成一种“作为表象之代表的结构”。



我的意思是，“地平线”由一个不应称作“眼点”、而应称作“主体点”的点直接确定。主体点——可以加上括注——是构造所必需的主体；它并不是主体本身，因为主体已经卷入图形的历险。某种东西必须在那里产生：一方面指示主体必然在某处占据一点；另一方面，他的另一点虽然同样必要、同样在场，却仿佛被“删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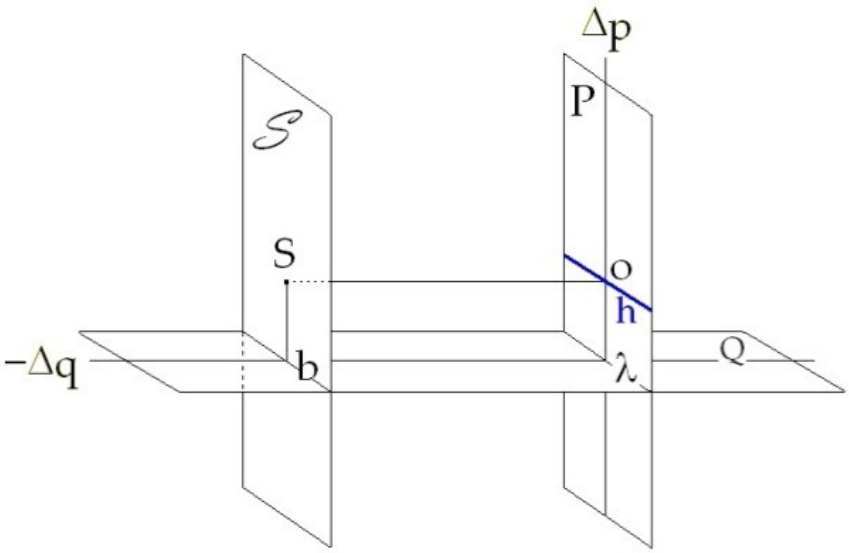


我们通过注意下述一点得到它——“我再提醒一次”，时间不够，无法重新作出同样清晰的证明：“地平线”仅仅由一个通过主体点、同“地平面”平行的“平行平面”确定，这一点人人都知道。不过，在建立任何透视时，这类地平线还蕴含对地平线上“一点”〔O〕的选择；人人都知道，“这就是所谓消失点”。所以，“主体点”在“图形平面”中的第一次在场，就是“地平线”上的任意一点；姑且说随便哪个点——我再次强调，原则上必须有一个。画家允许自己自由处理时，才会有多个；而且存在多个时，是“出于特定目的”。就像我们拥有多个“理想自我”——无论单数复数，两种说法都可以——也是出于某些目的。

然而，还存在——“这当然是透视的一项必然性”——所有这个领域的“奠基者”，也就是阿尔贝蒂、佩勒兰（换言之，维亚托），还有阿尔布雷希特・丢勒，都称作“另一只眼睛”的东西。

我再说一遍，这一名称会造成混淆，因为它绝不涉及双眼视觉；透视同人们看见什么、同立体感毫无关系。与人们的想象相反，“透视是一种方式”——“在某个特定时代、某一时期”，正如你会说的——“画家作

为主体借以把自己放入画作的方式”；这就像在那些被不恰当地称作“原始派”的画家那里，画家会以捐赠者身份把自己放进画作。在所谓原始派的时代，画作所代表的那个世界中，画家在画中自有其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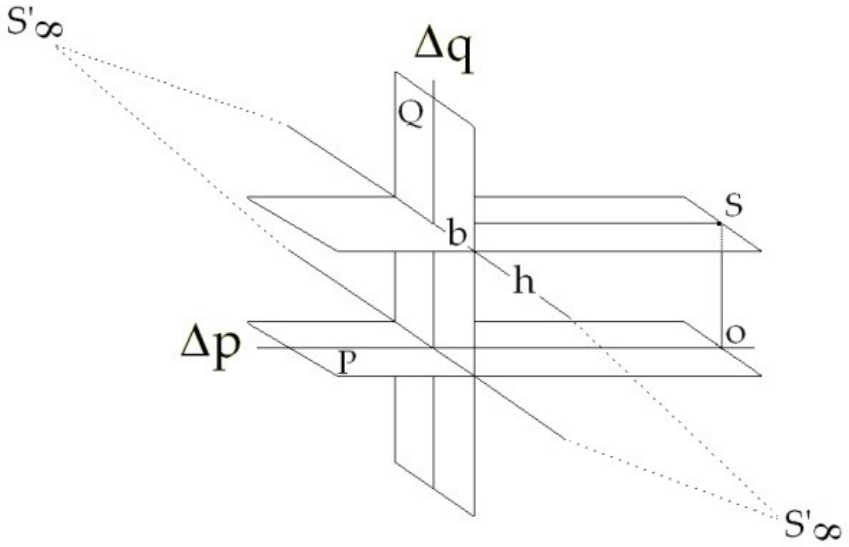


到了委拉斯开兹的时代，他看起来把自己放进了画作；但只需看一眼就会发现——你刚才强调得非常好——他多么以缺席状态处在那里。他处在“某一点”，而我恰恰这样描述这一点：我们触及“他由之而来的点的痕迹”。这个点——我接下来是对你说，只对你说，因为已经向其他人充分讲过——这个我迄今尚未定性的点，是画面场中另一个在场点、另一个“主体点”。它不是用刚才有人告诉你们的方式确定，而是通过准确考虑以下事实来确定：有且只有一个平面〔S〕“同画作平面平行”，而它绝不可能铭写“在画作之中”。

这一点已经鲜明地显示出：S　点以地平线上任意一点的形式第一次在场，是多么成问题。这个任意点具有“无差别点”的形式；正是这种形式，使我们有理由对它所谓的首要性产生惊讶。

相反，如果考虑到这条线〔b〕……

我们把它确定为通过假定起点 S 的平面〔S〕同支撑平面的“交线”……这条线在“图形平面”上有一个转译〔Δp〕，很容易把握；因为只需把我们刚才自然而然承认的、关于地平线〔h〕同支撑平面上无穷远线〔Δq〕之关系的东西，在另一种布置中倒转过来：



马上就会看到，如果你们愿意，这条线〔b〕构成一条地平线；图形平面的无穷远线〔Δp〕相对于它发挥相反的功能。由此，主体的第二极〔S′ 〕位于基线〔λ〕同这条无穷远线〔b〕的交点，也就是画作切过支撑平面之线同无穷远线的交点；换言之，它位于一个无穷远点。

委拉斯开兹正是从这一极点返回；他劈开了自己面前的小群人，而他的经过在其中留下的“分界线”——可以说，它穿过构成其模特群组的东西——已经充分向我们表明，他从画作之外的某处来到这里显现。

我很遗憾，这迫使我从“最理论、最抽象”的角度来处理事情；时间越来越晚，所以今天无法把事情推进到我原先希望抵达的地方。不过，刚才向我提出的质询形式，要求我重新把这一点放到首位。

不过，如果你们中还有一些人愿意在这两个小时以后再牺牲几分钟，我仍会换一种方式：从你刚才对《宫娥》所作的——我必须说——令人入迷的描述出发，在描述本身的层面上，向你们展示这些考虑所具有的具体意义。

很清楚，历来无论批评家还是观者，都完全被这幅画迷住，也被它搅得不安。

有一天，有人——我不想说出他的名字，尽管全部文献都在我手边——发现背景中那两个小小的“国王”和“王后”实在妙不可言，认定它们一定就是“事情的钥匙”；所有人都为他欢呼：发现这个东西多么了不起、多么聪明！它明明……明摆在那里……不能说在前景，因为它在背景，但无论如何不可能看不见。总之，人们从一项英雄般的发现进展到另一项各有轰动之处的发现……可是，有一件事始终没有完全得到解释：如果事情只是“躲猫猫，国王和王后在画里”，它怎么就足以使这东西如此有趣？

恕我借用“光照”一词：我们在这里并不工作于明视觉平面，不处理颜色；颜色留到明年，如果还会有明年的话。我们确实工作于暗视觉场，工作于像这里这样的昏暗中。

真正重要而有趣的，是这个仪式性的 S 点同屏幕之间发生的事情。S 点只服务于构造；我们关心的一切都在图形之中，不过它仍然发挥自己的作用。问题就在于它与屏幕之间的间隔中发生什么。而这幅画确实向我们“强加”了某种东西，所凭借的技巧，恰恰就是——这点向你致敬——你从中出发的技巧。

也就是说，你最先说的是：“画中有一幅画。”而且我想，你和我一样毫不怀疑，“画中的这幅画”就是“这幅画本身”，也就是我们所看到的画；尽管在这一点上，你或许还容许那种解释继续存在，即这幅画是他为国王与王后作肖像的画。你们想想，他居然拿同样一块三米十八高、装着同样支架的画布，只画背景里那两个可怜的小傻瓜国王与王后！恰恰是这幅画在场；它是画中唯一的“表象”，而这个表象仿佛使作为现实的画作达到饱和。

但画作是另一种东西。今天我不会向你们“证明”它；希望八天后你们还会回来，因为我认为，可以对这幅画说出超越这一真正开创性看法的东西，也就是这幅画究竟是什么。上次我已经充分强调，对它提出的所有解释都会产生怎样的困难；但显然，必须从如下观念出发：有某种东西被我们遮蔽，而你非常好地凸显了这种“被遮蔽之物”的功能——那张“翻扣的牌”迫使你们亮出自己的牌。

天知道，批评家们确实没有少亮出自己的牌，也说出一系列离奇的话；不过也没那么离奇，只要把这些话放在一起，仍足以看出它们为什么离奇。例如其中一种说法是：“画家面对一面位于我们位置上的镜子作画。”这是一个优雅的答案；遗憾的是，它同背景中的国王与王后完全冲突，因为这样一来，他们也必须处在镜子的位置。必须二选

一。总之，如果我们仅仅坚持“画作作为画作对象的表象而处在画中”，就会出现各种困难。

“而 S 点与画作平面之间的距离这一问题，严格说来正是作品捕获效果的基础。”

因为这不是一件采用惯常透视的作品，而是一种疯狂尝试；况且这并非委拉斯开兹独有的特权。谢天谢地，我认识足够多的画家，尤其有一位，我会请人把他的作品放给你们看，在这次发言结束时给你们一点小小的“甜食”……

我很遗憾，不得不总是回到这些过于枯燥的平面……离开你们以前，我会在这里展示一位画家的作品；你们也都可以去展览现场观看。它表明，这正是画家的问题——“请回到我最初引入窥视驱力时的辩证论述”——也就是说，画作是凝视的陷阱，问题在于捕获站在它面前的人。

要捕获他，还有什么方式比把画作边界、透视的场一直扩展到这里、扩展到“这个 S 点”的层次更加恰当？严格说来，我称它为“总在消隐的东西”“掉落的要素”。

在这个表象——或者说画作本身这一“表象代表”——中，唯一的掉落就是这个“对象(a)”；而“对象(a)正是我们永远无法把握的东西，尤其无法在镜中把握，因为只要睁开眼睛，我们自身便构成了窗户”。画作的

全部努力，都在于捕捉这个正在消隐的平面；它正是我们所有闲逛者带来的东西：

相关知识卡 凝视作为对象a：眼睛、迷惑与欲望的遮蔽

- 我们来到展览，相信自己站在一幅画前时什么也不会发生；

相关知识卡 凝视作为对象a：眼睛、迷惑与欲望的遮蔽

- 我们却像苍蝇一样粘在胶上；我们垂下凝视，就像脱下裤子；而对画家来说，问题——恕我这样说——在于让我们进入画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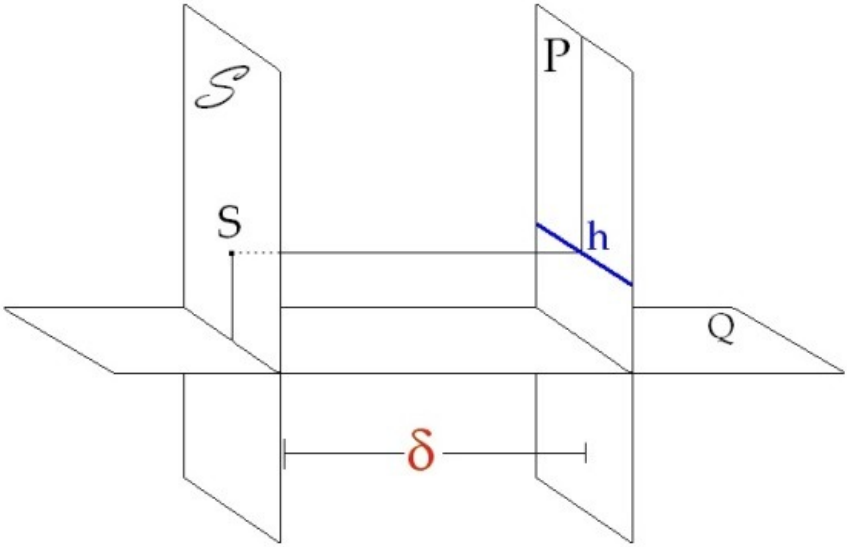
恰恰因为这块从背面得到呈现的“高大画布”同前方的“某种东西”——即画作的画框——之间存在这个间隔，我们才陷入这种不适。“这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结构性、并且严密属于窥视场的解释。”

如果你们下次还来听我，我会告诉你们为什么如此；因为说实话，今天我严格停留在对结构的“分析界限”之内：你所分析的结构，以及画面上可见之物的结构。你并没有引入——恕我这样说——它所暗示的对话：什么同什么之间的对话……？

别以为在奥杜阿尔之后，我又要向你们讲“相互性”，仿佛我们被邀请同委拉斯开兹对话。我早已反复说过，“主体同大他者的关系不是相互性的”，所以今天不会落入这个陷阱。

“谁在前方说话？谁在质询？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谁在呼喊、哀求，并向委拉斯开兹要求：‘让我看看！’？”

要真正知道画中之人是谁，必须从这里出发；上次我已经向你们指出这一点。



而这个间隔〔δ〕，也就是画作平面与 S 点平面之间的间隔；它以两条平行线截过支撑平面，并通过德萨格词汇中所谓的“轴”……

况且，他为了让自己显得更讨人嫌，还使用了一套同所有人都不一样的词汇。

〔吉拉尔·德萨格：《论圆锥与平面相交结果的一项尝试草案》（1639）〕……事情的“轴心”中发生了什么？

当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的东西；画作正是为了让我们感受到这个间隔。它得到双重指示：一方面来自我们被这幅画“攫住”的关系；另一方面来自委拉斯开兹显然以其在场标出这一距离的重要性。他无法——请注意，你们本应已经注意到，却没有说——即使把画笔伸长，也无法触到这幅画。当然，人们会说：他向后退，是为了看得更清

楚。对，当然……不过，他显然够不到画作这一事实，正是这里绝对关键的一点。

总之，这幅画有两个消失点：一个同样逃向一扇窗户、一处裂隙、外部，被放在那里，仿佛平行于前方的裂隙；另一个则是委拉斯开兹，而“知道他在对我们说什么”正是关键所在。我会让他说话作为收尾——还不算真正收尾，因为无论如何我还想让你们看看巴尔蒂斯的画——既然我替他说话，为什么不用拉康式语言？为了回应“让我看看！”，他对我们说：

“你无法从我观看你的地方看见我。”

这个公式对于阐明一切“凝视”关系中令我们感兴趣的东西至关重要。这里涉及窥视驱力，确切地说，也涉及暴露癖与窥淫癖；但我们来到这里，不是为了看画中“有没有人在摸来摸去”，也不是为了看是否“发生了什么”。我们要看的是，幻想作为构成性结构时，这幅画如何把“凝视”关系的结构铭写给我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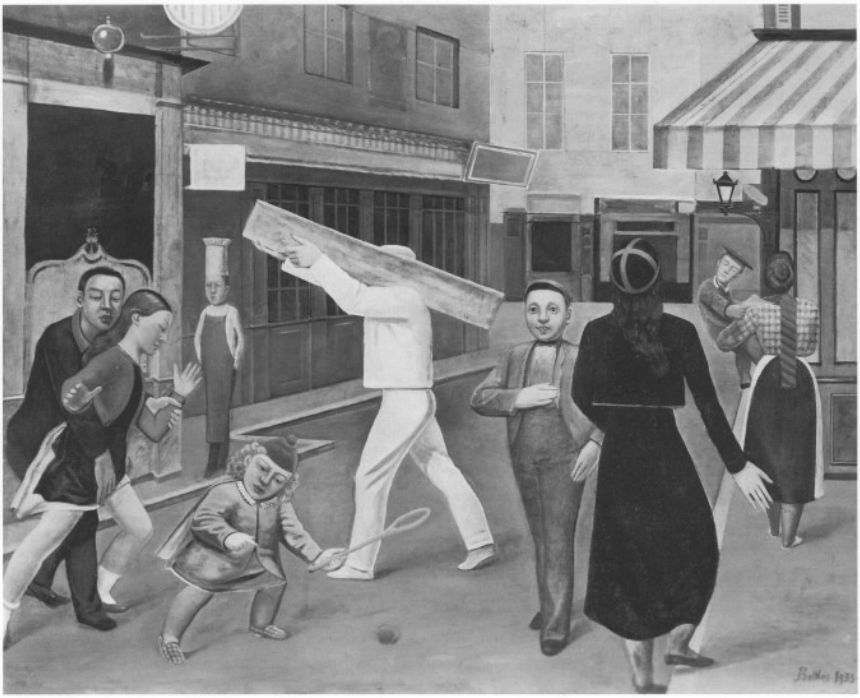
“幻想”一词存在很大含混。“无意识幻想”，好，那是一个对象。首先，在这个对象里，我们总会丢失它包含的三个部件之一，也就是两个主体与一个 (a)。因为，不要以为我幻想自己会把无意识幻想作为对象带给你们；否则，幻想的驱力会在别处重生。

真正造成困扰的是，每当谈论无意识幻想时，人们也在暗中谈论“看见它的幻想”。也就是说，由于人们追逐它而产生的希望，在这里引入了许多混乱。

此刻，我试图严格地把所谓“构架”提供给你们；“构架”不是隐喻，因为无意识幻想奠基于“一副构架”。我不仅不放弃让听我讲话的人熟悉这副“构架”，而且要“让它进入他们的皮肤”。

这就是我的目标。“这是一项绝对危险的练习”；有些人觉得它可笑，而我在这里坚持进行，你们听到的只是遥远回声。现在，多亏格洛丽亚，我要给你们放映巴尔蒂斯先生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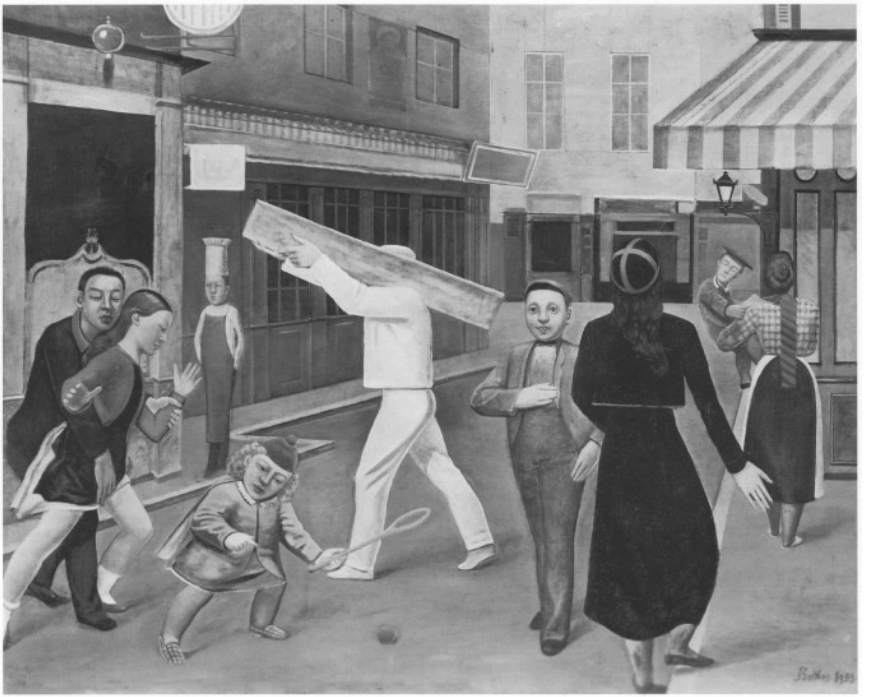


目前有一场巴尔蒂斯展览，在马尔桑馆[注6]：“免费信息”。只需付一小笔钱，你们就都能去欣赏这幅画。好，这是我给某些人留的“小作业”。

> [注6] 巴尔蒂斯展览，1966年5月12日至6月27日，马尔桑馆，装饰艺术博物馆，巴黎里沃利街107号。

我把整个假期都留给他们——来看：仔细看看这幅画——并希望他们能找到一些“复制品”，这不太容易。这张图是亨丽埃特·戈麦斯夫人提供给我的；她碰巧在自己的档案中存有它——“她本人对此也十分惊讶”。好了！

你们将在展览中看到的画作略有不同。你们看——同委拉斯开兹的画不同，显然是因为“时代”不同——这幅画里确实有人摸了几下；为了让现在的收藏者安心，作者把这只手稍微刮改掉了。



我昨晚又把它拿给画家看；我必须说，他告诉我，原来这样构图无论如何还是好得多。

他后悔作出了那个他以为自己必须作出的让步。那是一种反向让步。他曾说：“毕竟，我画这个也许就是为了惹恼别人；那为什么不能把它去掉？”

但并非如此。他把它放在那里，是因为它就必须在那里……总之，画中其他一切也都必须在那里。归根结底，当我看到这幅画时……

我以前已经看过一次，却不再记得；但这一次，当我在这个语境中看见它时——

你们可以把这归因于某种我也说不清的东西，归因于我的清醒或我的谵妄，由你们裁定——我说："这就是《宫娥》。"为什么这幅画就是"《宫娥》"？

这就是我留给你们当中最优秀者的一份假期小作业。

第19课 · 1966年5月25日

我要先“低声”快速读一段文字：它是应别人要求，在每年这个时候照例为我的研讨班写的一份简短总结。

它不会像我此前为去年研讨班写的那份详细说明那么长。不过，我知道第一次宣读对去年研讨班很有帮助，所以今天开场时，我会向你们说明、提醒你们今年研讨班所处的位置。

> “这次研讨班对我们而言仍在进行之中”——我写道——“它沿着自身路线，处理了精神分析经验中长期以客体关系之名得到标定的功能。人们主张，对可分析的主体而言，这一功能支配着他同实在界的关系；口腔对象与肛门对象由此被抬高，而另一些地位同样明显的对象却受到牺牲，其地位始终不确定。这是因为，前两种对象直接奠基于索求关系，很适合接受矫正性干预；另一些对象则需要更加复杂的理论，因为其中存在一种不能被误认的主体分裂。仅凭善意的努力无法化约这种分裂，因为它正是欲望赖以支撑的分裂。这些其他对象——特别是凝视与声音，如果暂且让阉割中涉及的对象留待以后——同主体的分裂结为一体，并在被感知之场本身，使其中作为力比多性的被删去部分当下化。正因为如此，当实践受到以下覆盖的威慑时，它们迫使人们退回去重新评估实践：通过镜像关系，把这些对象覆盖到那些人们想要尊重的自我认同之上。只需这一提醒，就足以说明，我们今年为何优先坚持窥视驱力及其内在对象——凝视。我们已经给出一种拓扑学，它使感知者（percipiens）本身的在场能够重新建立在这样一个场中：感知者作为未被感知者，却仍然可被感知；而在表现

> 为暴露癖或窥淫癖的驱力效果中，它甚至过于可感。这种铭写在射影几何学与位置分析曲面中的拓扑学，不能像弗洛伊德的光学模型那样，被置于隐喻的层次，而必须被用来代表结构本身。最后，这种拓扑学通过重新找到我们曾在一篇文章中自认为可以指出的东西，说明了窥视知觉物（perceptum）的不纯性——确切地说，就是《对任何可能的精神病治疗的一个先决问题》。在那里，我们自认为可以指出：无可推诿的感知者，其在场带有能指的标记；当这一标记在精神病声音这一从未得到构想的现象中被兑换开来时，便显现出来。在窥视与召唤这两点上，对欲望理论的绝对要求，把我们重新带回对实践偏转的纠正，带回对分析家位置的必要自我批评；如果分析家想诚实地回应，哪怕只回应“索求”，这种自我批评就必须冒他自身主体化所附带的风险。”

今天，我将继续讨论这个示范性对象。最近三次研讨班以来，我选择它来在你们面前固定这一问题框架所处的各项术语，即“对象(a)”与主体分裂的问题。如我刚才所说，这里所涉及的障碍来自镜像认同，并非没有理由；因为在这一驱力的层次上，“对象(a)”发挥着一种特殊作用——既通过“它的潜伏”，也通过“它在场的强度”。

“请再让我们看看《宫娥》好吗？”

这就是那幅画。上次你们已经看过，我想看得足够久，以至于后来会产生好奇，重新去看它。

现在你们已经知道，这幅画为符号与事物关系的辩证法提供了怎样的主题，尤其是在米歇尔·福柯的工作中；我上次的全部陈述都围绕他展开。它还在所谓“艺术批评”内部引发过许多讨论。这幅画——让我

们说——“呈现”并“提醒”我们：关于它，人们提出了一种它所暗示的、同镜子之间的根本关系。

背景那面镜子被人顺带轻轻一提，仿佛其中有一种技巧：把站在前方充当模特的人——即王室夫妇——呈现在镜中。另一方面，当问题在于说明画家如何能够把自己放在画中，以及他在画出我们眼前这一切时本人如何能够看见它时，镜子又受到质询。所以，有背景的镜子，也有我们这一层次上的镜子。“请开灯好吗？”

镜子与画作使我们回到我今天想作为解释入口的一点；我希望今天能够完整、最终地解释问题所在：“画作同主体的关系，从根本上不同于镜子同主体的关系。”

我已经提出，在作为“被感知之场”的画作中，可以同时铭写“对象(a)”的位置及其同“主体分裂”的关系。为了向你们显示这一点，我把“画中”透视的功能推到前面，以此引入问题：从某个可以在历史上定位的日期开始，透视成为主体——尤其是画家——在画中使自己在场的方式；而且不只是因为他的位置决定了这套“透视”的“消失点”。

我还标示了另一个点。艺术家以工匠身份说话时，把它称作“另一只眼睛”：这个点规定了人们为了欣赏、最大限度接受透视效果而应当站立的距离。但我把它描述为另一个点，即画作平面中的“无穷远点”。

仅凭这一点，就足以在窥视场中区分“画作的功能与镜子的功能”。二者当然有一种共同之处：画框或镜框。但在镜中，我们看到的东西并不比现实世界更有透视。被组织起来的透视，是主体本身进入窥视场的方式。在镜中，你们拥有的是最普通不过的世界，也就是你们凭借

日常生活经验定位自己的空间；这些经验受若干直觉支配，而在这些直觉中，不仅光学场同实践结合，而且还同你们自身位移的场结合。

首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画作……

它的结构如此不同；它位于自己的画框中，而这个画框不能同另一参照点分离，也就是支配其投射关系的 S 点……“画作只是表象的代表。它代表的是镜中表象之所是。”

相关知识卡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表象代表 · 《宫娥》：福柯的表象分析与拉康的凝视重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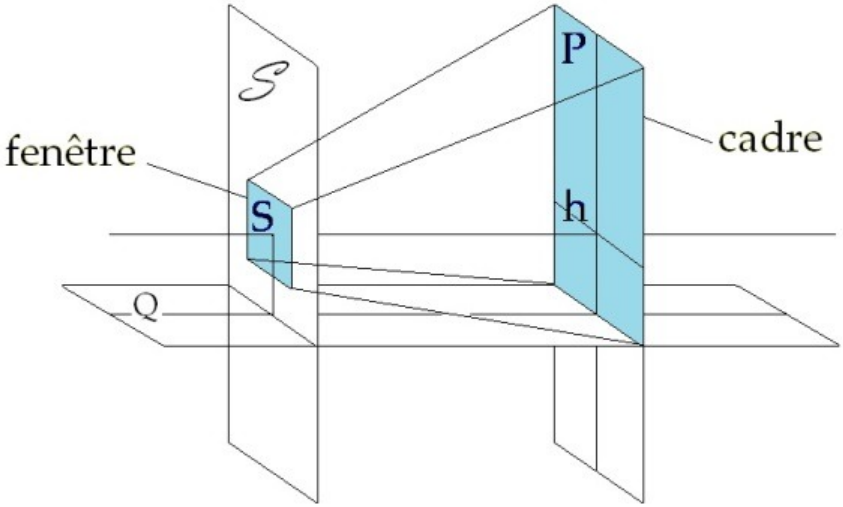
“作为表象，并不是它的本质。”

现代艺术已经向你们说明了这一点：一幅画、一块上面只有一坨屎——真正的屎——的画布……

因为归根结底，一大块色斑还能是什么？某些艺术创作的极端形式，以近乎挑衅的方式显明了这一点……它同杜尚的“现成品”一样是一幅画、一件艺术作品；所谓现成品，也可以只是把挂在横杆上的衣帽架呈现在你们面前。

它的结构不同于任何表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坚持从弗洛伊德借来的“表象代表”（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一词所构成的本质差别。

相关知识卡 Vorstellungsrepräsentanz：表象代表 · 《宫娥》：福柯的表象分析与拉康的凝视重读



画作由于同射影系统 S 点的关系，显明了这样一点：有一个平面〔S〕同画作平面〔P〕平行，并框住 S 点本身。我把它称作“窗户”，也就是某种你们可以把它具体化为“同画作之框平行的框架”的东西；它为 S 点提供位置，把它“框住”。

S 点所在的这个框架，恕我这样说，正是画作的原型。在那里，S 确实维持自身，不再被化约为让我们得以在画作中构造透视的那个点，而是作为主体本身围绕在场的“对象(a)”——即其支架——维持自身分裂的那个点。

主体实现自身的理想，就在于使这幅画在自己的窗户中当下化。像马格利特这样的画家，在一幅画中真正把一幅画铭写进一扇窗户时，便在我们面前产生了这个挑衅性的意象。我也曾借助这一意象解释“幻想”的功能：它蕴含一种矛盾。若这个意象真在某个像这里这样只有一

扇窗户照明的房间里实现，那么，这一理想的完满实现会使整个房间陷入黑暗。

所以，画作必须产生在这个〔窗户〕平面的前方某处；主体在自身分裂中的位置正是在那个平面上建立。问题在于，当主体把画作从自身推开时，“掉落在间隔中的东西”会怎样。至于它会怎样，我在你们面前围绕其工作的这个示范性对象已经表明：分裂形式中的主体能够铭写于图形平面〔P〕，铭写于同艺术作品得以实现的幻想〔窗户〕平面相隔开的平面中。

艺术家同我们每个人一样，为了拥有画作而放弃窗户；我前几天关于幻想功能所提出、所指出的含混就在这里。幻想是主体存在的地位；而“幻想”一词还蕴含一种欲望，即看见幻想被投射出来。在两条平行线之间这段后退空间的帮助下，幻想虽总不充分、却总被欲求，既可实现又不可能；它可以被召唤，以某种方式在画作中显现。然而，画作不是表象。表象是“看得见的”（ça se voit）。怎样转译这个“看得见”？“看得见”就是“任何人都看得见它”。但这也是反身形式，所以一切表象中都内在地存在这个“看见自身”。

表象本身，“作为表象的世界”，以及作为这个自我表象世界之“支撑”的主体，就是经典观念中“对自身透明的主体”；窥视驱力的经验要求我们重新回到并质询的，正是这一点。

所以，当我以“让我看看！”引入这幅画的问题时，我把这句话放进今天还会回头谈到的人物——中心人物小公主、奥地利的玛丽安娜之女玛格丽特公主——口中：“让我看看！”我首先给出的回答，是我用下面这些话让画中委拉斯开兹的形象说出的回答：

“你无法从我观看你的地方看见我。”

这是什么意思？

正如我已经提出的，在画中，只有一种在场之物属于表象……

也就是画作本身；它作为“表象代表”在那里……它在画中的功能，如同过饱和溶液中的一颗晶体：画中的一切由此显现为不再是表象，而是“表象代表”。

看起来——“需要我再次把图像放出来吗？”——那里的所有人物，严格说来都没有向自己表象任何东西，尤其没有表象“这一点”：“他们在代表”。你们在右侧看到的狗的形象，由此取得全部价值。其他形象同它一样，所做的无非是成为自己的表象；他们是“宫廷人物”，模仿着一场理想场景，其中每个人都执行着自己“处于呈示之中”的职能，却几乎不知道这一点。

尽管这里潜藏着一种含混，使我们得以注意到：如同把一只动物拖上舞台时所看到的那样，狗同样总是很好的演员。

“你无法从我观看你的地方看见我。”

既然这里涉及一个带有“我的方式”烙印的公式，我不妨请你们注意：“依照我的风格”，我并没有说“你无法看见我在那里、从我观看你的地方”。“在那里”中的“那里”（là）被删去了。现代思想曾以“此在”（Dasein）的形式如此强调这个“那里”，仿佛只要存在之功能向“一个存在在那里”敞开，一切便都解决了。

在我让委拉斯开兹说出的“你无法从我观看你的地方看见我”中，并不存在一个他召唤的“那里”。恰恰是在这个敞开的空位、这个无标记的间隔中，才有这个“那里”；悬在“对象(a)”之名下的东西正是在那里掉落。画作中所涉及的“那里”，无非是我已经明确画给你们看的这个间隔：你们大概也能像我一样想象出两条滑轨，它们画出这些“布景片或台板”如同在剧场舞台上那样进入画中的路径：

- 第一条滑轨上的，是前景那幅画；它处在你们看见的略微倾斜的线上，只需看左侧那个巨大对象的形状，就很容易把线延长；

- 另一条线穿过人物群组；我已经教你们辨认它的尾迹。画家正是沿着它作为“幻景剧中的人物”之一被引入；在庞大的舞台机械中，这类人物会被送到离画作恰当的距离——也就是稍微太远一点——好让我们不会忽略他的意图。

这两条平行滑轨、这个间隔、由“这个间隔”构成的“轴”——沿用吉拉尔·德萨格“巴洛克术语”中的这个词——“那里”，而且只有那里，才是“此在”（Dasein）。所以我们可以说，画家委拉斯开兹正因为是真正的画家，才不会在那里操弄自己的“此在*”，恕我这样说。

“好画与坏画”“好的世界观与坏的世界观”之间的差别在于：“无论坏画家画什么肖像，都只会画出自己的肖像；而坏的世界观在世界中看到的，只是作为小宇宙的我们自身之大宇宙。”委拉斯开兹即使以自画像的形式进入画中，也不是在镜中画自己；任何好的自画像都不会这样做。任何画作——即使是“自画像”——都不是画家的幻象，而是凝视的陷阱。

所以，正是画中之画的在场，使画中其余事物能够从表象功能中解放出来；也正因如此，这幅画抓住并震撼了我们。如果委拉斯开兹在画中唤起的世界——我们还会看到这是出于怎样的计划——确实如我所说，那么，只需说出它所显明的东西以便辨认它，就丝毫不算牵强。

这个曾让过去几个世纪感到如此困惑的奇异场景是什么？它不正等同于我们在所谓社交游戏的实践中很熟悉的东西吗？而社会本身除了游戏又是什么？也就是“活人画”。由于绘画自身的需要，这些存在者被投射到我们面前；他们所做的，不正是准确地为我们呈现这种在“活人画”游戏中组成的群组吗？



这些姿态究竟是什么：

- 小公主近乎品鉴美食般的姿态；
- 跪着的侍女把那只奇怪而无用的小罐递给她，她开始把手放上去；
- 其他人不知道应把凝视放在哪里；人们执意告诉我们，这些凝视在那里彼此交错，可它们显然没有一道相遇；
- 还有格林先生前几天特别提到的两个人物。顺带一提，他若认为那个女性人物是修女，就错了；她是所谓“宫廷女侍卫”（guarda damas），这一点人人都知道，甚至知道她名叫玛塞拉·德·乌略亚[注1]；

> [注1] 多亏画家安东尼奥·帕洛米诺1724年的描述，人们才得以辨认画中不同人物的身份。

- 而在那里，委拉斯开兹除了“作为画家向我们展示自己”，还在做什么？他处在什么中间？处在这整个女人世界的中间！

我们还会回到它的意义，以及这幅画最初标题所引发的那些真正奇怪的问题。我甚至在一本1872年的词典中看到这个标题：“国王一家”。

为什么是“一家”——眼下先搁置这点——这里显然只有小公主代表王室家庭？

我会说，这是“活人画”。事情确实如此：在这个使生命成为静物的凝固动作中，这些人物无疑曾像人们所说的那样真正呈现自己。正因为如此，尽管我们看到他们全已死去，他们仍比自己活得更久；因为他们处在一个即使生前也从未改变的位置。

现在，我们将看到，首先是什么向我们暗示了镜子的这一功能。这个存在者被固定在这种生命位置上，这种死亡使她跨越几个世纪，以近乎活着的样子向我们涌现，像“被困在琥珀中的地质时代苍蝇”。为了让她说出“让我看看！”，我们让她走到我们这一边；我们难道不会由此联想到同一个意象、同一个关于爱丽丝跳跃的寓言吗？她纵身一跃来到我们身边，借助卡罗尔式文学——一直到让·科克托——善于运用乃至滥用的技巧：穿过镜子。

毫无疑问！沿着这个方向，确有某种东西有待穿过，也就是画中仿佛为我们凝固保存的东西。但反过来呢？那条看似向我们敞开并召唤“我们”进入画中的道路：“它并不存在”。因为这幅画向自以为活着的你们提出的问题正是：你们相信“只要在那里，就足以算在活人之中”；这只是一种错误信念。

这正是你们看到这幅画时——如同看到任何画作时——感到折磨、被揪住“内脏”的东西，因为它召唤你们进入它的真实存在，并把这一点如实呈现给你们：“这些存在者在那里不是被表象出来，而是处于呈示之中。”

正是这个根基，使每个人如此需要唤起那面明知无法穿过的镜子的不可见表面。真正的原因在这里：在普拉多博物馆，画作右侧稍偏处、以“四分之三侧角”摆着一面镜子；如果你们感到焦虑，可以抓住它。因为对那些可能眩晕的人而言，必须让他们知道，画作只是一个诱饵、一个表象。

毕竟，在这个“透视”中——这个词正合适——请你们问问自己：在何种时刻，你们同画中那些自然地在那里、处于呈示之中而毫不知情的

人物区分开来？所以，围绕这幅画谈论镜子，无疑已经接近答案；镜子并不只是由你们添上去的。我们马上会说，画作本身在何种程度上正是镜子；但不是沿着我刚才认为应当排除的那条路径，即那些“宫娥”及其仍然锋利的“此在”时刻。

不过，我不想在这里讲轶事，不想告诉你们每个人在被画面捕捉的那个时刻还有多少人生要度过；这些只会是把你们引入歧途的细节。“请记住，如果忘记结构，就不该把观察与病史回忆中的琐碎涂抹，同所谓临床混为一谈。”今天我们来到这里，就是为了画出这一“结构”。那么，这个奇异场景究竟如何？阻止你们自己跳进去的，难道只因为“画中没有足够空间”吗？

如果镜子阻止你们，不是凭借它的阻力或硬度，而是凭借它所施加的捕获；在这一点上，你们表现得远不如画中那条狗——既然它在那里，就拿它来说。它向我们显示，对于镜子的幻象，它很快绕上一两圈便弄明白了：“它已经清楚看到，后面什么也没有”。

画作位于博物馆，也就是说，如果你们绕同样的一圈，也会非常安心，因为会看到后面什么都没有。尽管如此，同狗完全相反，如果你们没有认出画作所代表的东西，恰恰是因为缺少它那种反应：它提醒你们，相对于现实，你们自身“被包含”在一种类似于画作所代表的功能中，也就是被幻想捕获。由此，让我们质询这幅画的“意义”：背景中的国王与王后似乎位于一面镜中，这就是我们可以从中提取的指示。我已经指出，应从何处寻找这一意义。王室夫妇无疑同镜子有关；我们马上会看到是什么关系。

如果所有这些人物都处于呈示之中，那是在某种秩序——他们作为主要人物所代表的“君主制秩序”——内部。我们的小爱丽丝在她的代表性球体中，确实像卡罗尔笔下的爱丽丝；其中至少有一种要素——我已经用过这个隐喻——表现为纸牌人物：〔《爱丽丝》中的〕国王和王后，他们狂暴的宣告归结为一句裁决：“砍掉他的头！”

此外，为了回头补上我刚才不得不略过的一点，请注意，这个房间不只摆放着我希望已经为你们照亮的这些人物，还挂着无数其他画作：这是一间画室。人们玩起了游戏，试图读出每一张牌上画家可能写下了什么价值。这仍然属于我不该迷失其中的轶事：背景中的阿波罗与马尔叙阿斯，或阿拉克涅与帕拉斯之间的争执；后者面对的是织在挂毯上的欧罗巴被劫，而我们在这里展出的邻近画作《纺织女》背景中，又发现了这一场景。

“这个国王与王后在哪里？”严格说来，整个场景原则上都围绕他们悬系。因为，不只存在“原初场景、开创场景”，还存在“场景功能”的这种传递；它从不停止在任何原初时刻。

请注意，这一呈示是为他们的视觉而作——为谁？为什么？——但从他们所在的位置，他们什么也看不见！

这里应当记住画作是什么：它不是一种可以绕着走、可以改变观看角度的表象。这些人物没有背面；如果画中那幅画翻转过去，正是为了让它正面的东西——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东西——对我们隐藏起来。这并不意味着“它由此向君主呈现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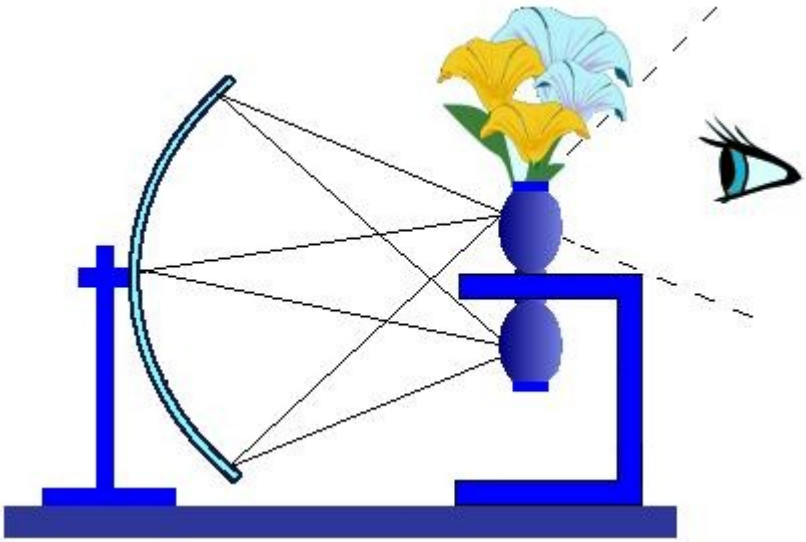
这种王室视觉，恰好对应于我曾试图在自恋关系中明确阐述的大他者功能。请参阅我那篇所谓《评述……》的文章[注2]，它针对鲁瓦约蒙

会议上的一场报告。我提醒那些不再记得、或者不了解的人，当时的问题是：赋予两套由一位心理学家提出的主题应有的价值，并在我们的视角中恢复它们；那位心理学家强调“理想自我”与“自我理想”，这两个功能在我们的实践经济中如此重要……可是，不可救药地依赖“意识”参照的心理学一旦重新进入分析场，我们便再次看到二者被表述为：前者是“自以为是的那个自我”，后者是“想要成为的那个自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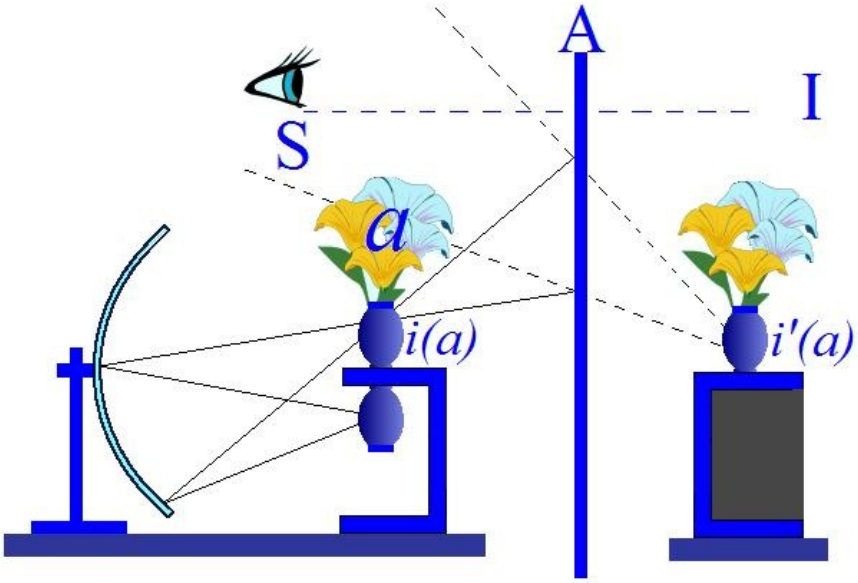
[注2] 《文集》第647页，或第二卷第124页。

当我同某人合作时，我已经拿出自己能够具备的“全部友善”；我只从这个开端中摘取那些在我看来有利于提醒问题所在的东西。这里涉及一种分节，它使我们绝对必须维持这些功能的结构，以及该结构从无意识语域强加的东西。我用“S　点”的意象把它形象化：S　点相对于一面“镜子”——而现在必须知道，这面镜子在这里具有什么含混功能——借助我在图式中用来界定大他者之场的这面镜子，得以从另一个并非它自身所占的位置观看某种东西；由于它处在特定场中，若非借助镜子便无法看见这个东西。这个场中有待产生的东西，我以木板下倒置的花瓶来表现，并借用“一项古老的趣味物理实验”[注3]作为模型。

[注3] 原注为空。



→


A
I
S
a
i(a)
i'(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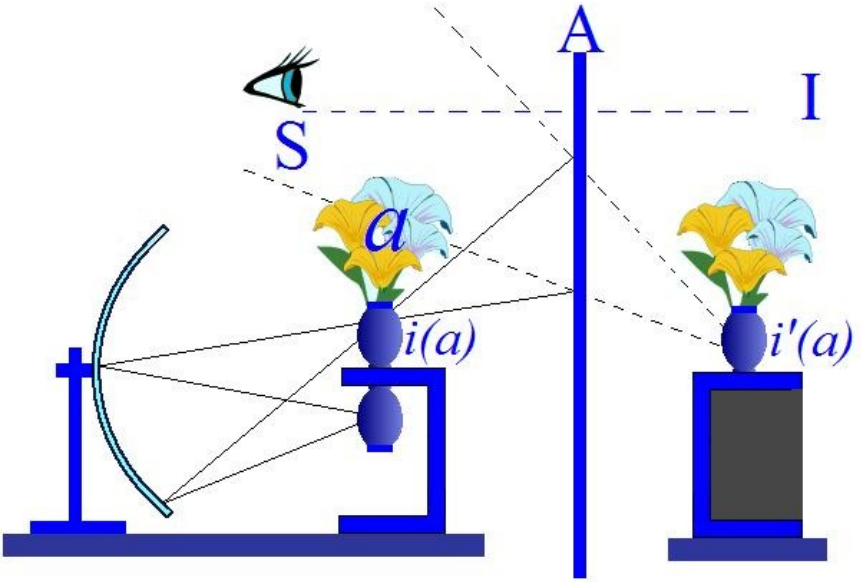
这里谈的并非“结构”，而像每次诉诸光学模型时一样，当然是“隐喻”。如果我们知道，借助球面镜可以从藏在我所谓“木板”下方的对象产生一个“实像”〔i(a)〕，这个隐喻就能够适用。于是，如果那里有一束准备接受这个环绕的“花”，花瓶的瓶颈就会……这里有一场游戏，它正构成这个趣味物理小把戏；条件是，为了看见它，人们必须处在从“球面镜”出发所画出的特定场景场中。如果没有恰好占据这个场，可以把视觉转移到镜中某个特定点，从而置身于球面镜产生的锥形场中。也就是说，正是在这里，人们看到幻觉的结果：“被小花瓶环绕的花朵”。

当然，作为光学模型，这并不是结构；正如弗洛伊德谈到“自我、超我、自我理想，乃至本我”时，从未想过向你们提供任何生理功能的结构。本我并不位于身体中的任何地方。相反，“身体意象”确实在那里。这里，球面镜只有一个作用：表现大脑皮层中可能存在的装置，它是向我们提供这一“身体意象”之根基所必需的。

但镜像关系涉及的是全然不同的东西；这个意象的自恋功能之所以对我们珍贵，是因为它同时包围并遮蔽“小(a)”的功能。“潜伏在镜像中的，是凝视的功能。”然而，“令我惊讶的是”——我不知道应归因于什么……

希望只是分心，而不是缺少工作，或者只是不愿给自己找麻烦……自从我告诉你们“(a)不是镜像性的”以来，这里难道不至少已经“提出”了一个问题吗？

因为在这个图式中，那束花来到镜子的另一边：那束花映在镜中！



这就是“对象(a)的位置”的全部问题。

在这个图式中，它属于谁？是属于涉及主体的那组装置——主体在这里卷入“理想自我”的形成，而后者体现为“镜像认同的花瓶”，自我将在其中取得自己的基座——还是属于某种别的东西？

当然，这个模型并不穷尽一切。还有大他者之场；你们可以在孩子的游戏中看到它得到体现。在孩子发现自己的镜像后立刻作出的最初参照中，你们会看到大他者之场体现出来：他转过身，让当时托住他、支撑他或站在附近的人，仿佛为这幅意象作出认证。

所以，“对象(a)”的问题在这个层次——我是说这个图式的层次——仍然完整地存在。好，我还需要费力强调，才能让你们在委拉斯开兹笔

下的这幅画中，认出一个几乎同我刚才呈现的图式完全相同的意象吗？

还有什么比这个披着华丽衣饰的隐秘对象更相似……

一方面，它在这里由花束来代表；花束被遮住、隐藏、捕捉，并包围在花瓶这件庞大衣饰之中。花瓶既是“实像”，又是“在镜子虚像中被把握的实像”；



……另一方面，则是这位小公主的服饰。她是被照亮的人物、中心人物，也是委拉斯开兹最喜爱的模特；他为她画过七八次。你们只需去卢浮宫，就能看到同一年为她画的肖像。

天知道她多么美丽、多么迷人！







对我们分析家而言，小女孩这个我们十分熟悉的“奇异对象”究竟是什么？

毫无疑问，依照西班牙王后没有双腿的优良传统，她已经这样站在那里。

但这是否构成我们忽略它的理由？这幅画的中心是一个隐藏对象。称它的名字并不意味着分析家心术不正——我不是来迎合某种轻易的主题——而是因为这个名称在我们的结构语域中仍然有效；它叫作“裂隙”。

这幅画中似乎有许多裂隙；你们可以掰着手指数：

- 从跪在那里的玛丽亚·阿戈斯蒂娜·德·萨米恩托开始；
- 小公主；
- 另一位名叫伊莎贝尔·德·贝拉斯科；
- 那个傻女、怪人玛丽—巴尔沃拉；
- 还有玛塞拉·德·乌略亚。

另外，我不知道；在我看来，其他人物的性质无非就是作为男性人物，安全地待在女人世界里保护她们：最右侧那个不起眼的“宫廷女侍卫”；还有那条狗，为什么不算上呢？尽管是演员，我觉得它仍是一个相当安静的存在者。委拉斯开兹把自己放在他们中间，实在十分特别。他必须真正想这样做才行。

不过，越过这则轶事以后，重要的是如下反差：整个场景只能通过被一场视觉捕获而得到支撑，而我刚才已经向你们强调，那些人物由于自身位置什么也看不见。

所有人都背对他们，而且无论如何，只向他们呈现没有什么可看的东西。然而，整个场景又只能由对他们凝视的假定来支撑。在这个裂隙

中，严格说来存在大他者的某种功能：那恰恰是一种正在变空之时的君主视觉。正如我围绕“无所不在、无所不知、看见一切”的古典上帝观多次向你们提出的问题：

- “这样的上帝能相信上帝吗？”
- “这样的上帝知道自己是上帝吗？”

同样，在这里铭写于结构本身的，是一个大他者的视觉；这个大他者是空的大他者、纯粹视觉、纯粹映像，是在这个空的大他者严格说来属于镜面的“表面”上看见自身的东西。这个大他者补充笛卡尔的“我思”，我已经强调过；它必须在那里，以支撑其实不需要它来支撑的东西，也就是画中已经存在、正如我刚才向你们描述的真理。这个空的大他者、抽象神学的上帝，是纯粹的幻象分节，是费讷隆神学的上帝；这种神学把上帝的“存在”同“自我的存在”连接起来。这就是委拉斯开兹向我们呈现他必须呈现之物的铭写点、表面。

不过，正如我告诉过你们的：“要让这一切成立，还必须有凝视。”

这恰恰是这套神学忘记的东西；而且，只要现代哲学以为尼采“上帝死了”这个公式标志着已经迈出一步，这套神学就仍然持续。“然后呢？有什么改变吗？”

“上帝死了，一切都被允许。”那个老傻瓜这样说，无论他叫卡拉马佐夫老爹还是尼采。

我们都知道，自从上帝死后，一切仍然一如既往地处在同一个位置：没有任何东西被允许。原因很简单：问题不在上帝的视觉与全知，而在凝视的位置与功能。上帝的凝视后来处于何种地位，并没有消散。

正因如此，我才能以那种方式向你们谈帕斯卡的赌注；因为如帕斯卡所说，“我们已经卷入其中”，而这场赌注的故事始终成立。我们依然在自己的凝视、上帝的凝视，以及画中小公主向我们呈现的这类其他小对象之间来回传球。

这将使我能够以一个对后续论述至关重要的点结束。我向那些还不熟悉我此前拓扑论述的人表示歉意：那个名为“交叉帽”或“射影平面”的小对象，可以用剪刀简单剪上一圈，让“对象(a)”掉落，并使构成主体的双重卷绕 S 显现出来。

很清楚，在对象掉落形成的裂隙中——这里掉落的是画家的凝视——铭写进来的，恕我这样说，是一个双重对象，因为它包含一个“双向接纳器”。我在重新展开拓扑证明时，会向你们证明这个双向接纳器的必然性；在这里，它恰恰就是大他者。

在自身对象的位置上，画家在这件作品、这个为我们产生的对象中，放入了某种由大他者构成的东西，也就是大他者的盲目视觉；它支撑着另一个中心对象：小公主、小女孩、“girl”，她作为“阳具”，同时也是我刚才向你们标示为“裂隙”的东西。

这个对象究竟如何？它是画家的对象，还是那对王室夫妇的对象？我们知道这对夫妇的戏剧性组合：鳏居的国王娶了自己的外甥女；所有人都惊叹：“相差二十五岁！这是非常合适的年龄差！”

但如果丈夫大约“四十岁”，也许就不合适了。应该再等等！

这对夫妇之间，一边是这个阳痿的国王；我们知道，他维持着一种像其形象本身一样只剩阴影与幽灵的君主制地位。另一边是这个嫉妒的女人；同时代的见证也使我们知道这一点。可是，在这幅被称作“国王一家”的画中，明明还有另一个年长二十岁、名叫玛丽—泰蕾兹、后来将嫁给路易十四的女儿。

如果这是国王一家，她为什么不在？也许“家庭”意味着完全不同的东西。

大家都知道，从词源看，家庭（famille）来自 famulus，也就是所有仆人、整个家户。

这个家户在这里高度“集中”于某种东西：小公主，“对象(a)”。我们将以此悬置问题：在像委拉斯开兹这样占据主导地位的“主体化”视角中，这个对象究竟为谁而发挥作用？我只能说，今年就此离开他在《宫娥》中的场，令我遗憾；况且你们也看得出来，我还想同你们谈别的东西。

当某种东西产生时……

当然不是对国王作精神分析，因为首先涉及的是国王的功能，而不是国王本人……当这个中心对象在这次完美捕捉中显现时，如米歇尔·福柯的描述所说，两条把画面分开的交叉线在那里会合，从而在中心为我们分离出这个明亮意象。

我们这些知道这里是一次分析终点之会合点的分析家，难道不应由此问一问："对象(a)"的这种辩证法如何向我们"转移"？

如果这个"对象(a)"就是主体必须认出自己的终点与会合点，那么，谁应当提供它：主体，还是我们？

我们需要完成的事情，难道不与委拉斯开兹在其构造中需要完成的一样多吗？这两个点、这两条交叉线，在画作意象本身中承载着这副支架的构架、两根彼此交叉的支柱。

我想把后续要告诉你们的东西悬置在这里；不过还要加上一小笔：如果我以十字形象结束，你们或许会告诉我，委拉斯开兹就把这个十字架戴在身上——你们看到他穿着一种开缝袖短上衣，十字就在上面。

那么，告诉你们一件我觉得很有趣的事：委拉斯开兹为国王拆解并显示了这个完全支撑在幻想上的世界之构架。可是，他最初画这幅画时，胸前没有十字；理由很简单：当时他还不是"圣地亚哥骑士团骑士"。

大约一年半以后，他才获任命，而且又过了八个月才被允许佩戴十字。这样一来……这一切把我们带到1659年。他在1660年去世；传说说，他死后，国王本人出于某种微妙的"报复"，来到画前，亲手把这个十字画在了他的胸口。

第20课 · 1966年6月1日

我们正走向本学年的结束。我发现，同大多数同事相比，我以一种不寻常的热忱把它延长了。通常不会要求你们六月初以后还来出席；不过大家知道，我的惯例不同，今年大概也不会有多少改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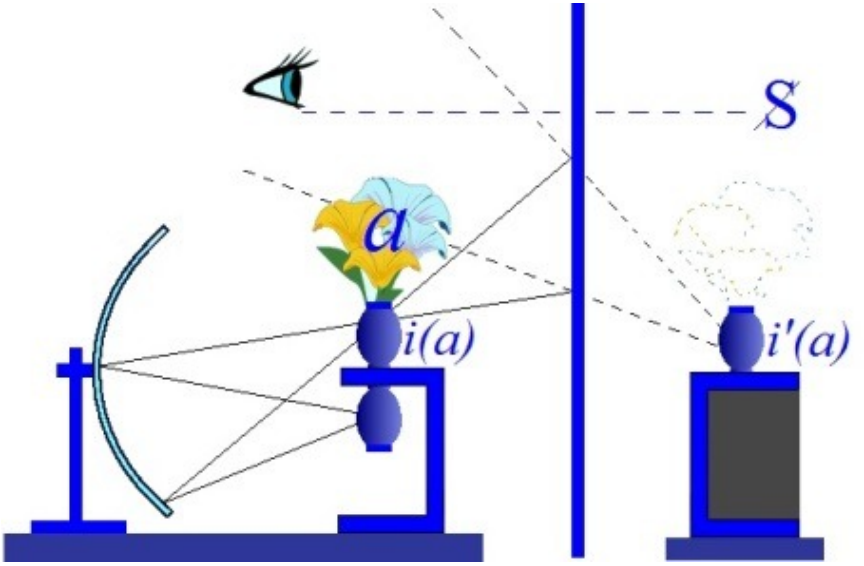
一切取决于我会给闭门研讨班留出一个还是两个课次。

所以，我还会像今天这样，在所谓“公开课”的位置上向你们讲两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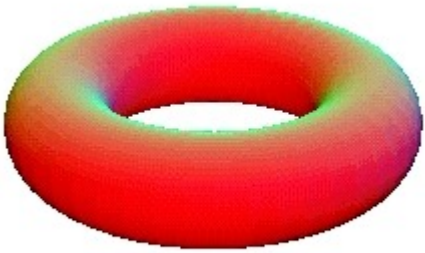
当然，这将是为了尝试汇集我今年以“精神分析的对象”为题在你们面前所提出之物的意义。你们知道，这个标题并不是简单阅读时仿佛向人敞开的那种模糊入口；它非常确切地指我在结构中表述为“对象(a)”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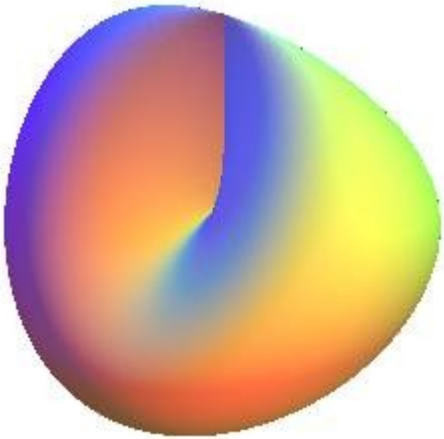
相关知识卡 精神分析的对象：对象 (a) 与主体分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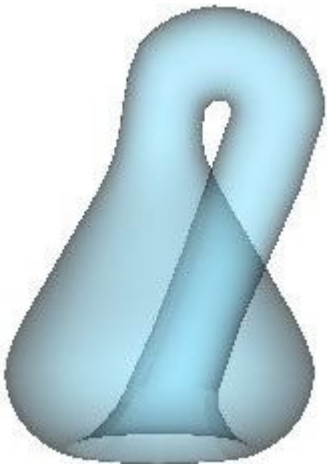
你们也会注意到，如果“对象(a)”确实把精神分析家在这一类别下调动的全部对象都纳入自己的括弧，那么，我在描述或汇集的职能上无疑有所欠缺——甚至欠缺很多。我有时把它们一一列举，却不能说自己详细论述过它们的“花束”。前几天，我恰恰回顾了它们以“一束花”形式出现的“表象”，但我并未逐一铺陈其植物学。



我主要谈的是拓扑要素；而且迄今还没有以完全明确的方式指出，应把这个“对象(a)”放在这些拓扑要素中的哪里。当然，那些认真听我讲的人不止一次可以领会：“对象(a)”就是一种拓扑结构，也就是我借助“环面”“交叉帽”“主教冠”乃至“克莱因瓶”的图形为你们形象化的结构；用一把剪刀可以把它从中剪离。







他们也可能听到：如果以为用剪刀把它剪离成几片圆环，就代表了什么，那就完全误解了这一操作的性质。

这里同样适合使用“表象代表”这个词，因为表象绝对不在这种分离、剪切的操作中。不难发现，我曾操作这些结构，以凸显这一操作的分

节；可以说，这些结构在若干点上具有“自身的资源”。奇特的是，就它们所代表的东西而言，这些点几乎只能用“孔洞”这个词来标示。

如果我们的“环面”能够有效地代表某种东西——一种反复、连续的卷绕，像著名的双头蛇安菲斯贝纳[注1]；对古人而言，它代表某种“生命的象征”——总之，如果这个“环面”具有任何价值，恰恰是因为“这一拓扑结构”被中心的这个东西标记。它当然很难在某处得到圈定，因为它看起来只不过是“其外部”的一部分；但无可争议的是，它使“环面”以一种同“球面”极为不同的方式得到结构化。

> [注1] 安菲斯贝纳：神话中的双头蛇。

那么，“对象(a)”……

我刚才已经说过，那些留心听我讲话、甚至曾偶然听见我明确说出这一点的人……“对象(a)就在孔洞的这个空间中；严格说来，它在那里可以被表象，恰恰因为它没有以任何方式得到表象。”

相关知识卡 凝视作为对象a：眼睛、迷惑与欲望的遮蔽

稍后我们会看到这些事情如何闭合，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最终来到一个严格“定位在”这一拓扑场中的参照。不过，你们从现在就可以看到，以下两件事之间无疑存在某种连贯性：此前几次研讨班——包括闭门研讨班——的最后阶段，完全围绕“一幅极其重要的画作”展开；画家让我们得以显明、仿佛强调透视功能。在那里，我必须说，我已经把陈述的严密性推进到你们完全可以信赖的程度：就“窥视场”而言，幻想如何得到构成；最终，它对我们而言如何成为“主体一切可能表象的代表”。

你们已经感觉到，我把全部火力集中于窥视场、集中于窥视性的“对象(a)”——凝视——同某个事实之间存在关系。必须说，凝视从未得到研究、从未被分离出来；我说的是我应当发言的地方，即“精神分析场”。人们竟没有注意到，这里存在某种必须被分离、而不能只在“粗糙类比”中被唤起——甚至连名字都不提——的东西，这实在十分奇怪。

相关知识卡 凝视作为对象a：眼睛、迷惑与欲望的遮蔽

有位在分析教学中名字已经有些陈旧的作者——费尼切尔先生——向我们证明过窥视性认同同吞食之间的类比。但类比不是结构；这也没有在窥视癖内部把涉及怎样的对象及其功能分离出来。

其实，“凝视”本可以经由许多其他道路进入。到了我们现在的位置，至少你们中有些人上次听到了我如何“把凝视定位在画作正中心，藏在小公主的裙装下方；它从这个被包裹的点向人物们发出光芒”。我指出，它就在那里。

它通过什么职能处在那里？如果像我所说，画家向我们呈现的，是国王空洞眼睛中产生的意象——这只眼睛“同所有眼睛一样，生来就是为了不看见”——而且它确实支撑着画家所画的这一意象，也就是说，并非镜中颠倒的意象，而是方向正确、正面朝向我们的意象。

那么凝视就在别处，“那里”，处在相对于背景最深处那对王室夫妇而言作为“对象(a)”的对象中；他们既处于什么也不看的姿态，又通过场景背景某处的自身映像——也就是我们所在之处——观看。

“这个对象(a)，处在大他者这面归根结底并不存在的镜子前”；我们已经提出，它归属于谁的问题：

- 是那些以“这一空洞视觉”支撑它的人；
- 还是作为观看主体置于此处、使“艺术作品的蜕变”涌现的画家？

“对象(a)”归属的这一含混，使我们能够把它重新接上此前悬置的线索，也就是“赌注”的功能；我们曾借助帕斯卡的赌注来说明它。

“对象(a)在此重新接入其最普遍的组合机制；它正是 S 与 A 之间的赌注。二者都不能同对方共存，除非带有横杠的记号，也就是恰恰由于对象(a)的入射而处在分裂位置。”

主体的功能恰恰在赌注功能中，被置于一种僵局、一种撕扯之中……

这场荒谬的赌注，对所有俯身分析它的人而言真正至关重要……我提醒你们，在今年关于“对象(a)”的讲述中，我曾以它作为展开论述的引言章节。

今天，问题在于把我以这种方式提出的东西安置、重新安置到你们所熟悉、并在弗洛伊德学说中作为支撑的整体经济中。因为，为了定位我所教内容及“我的教学程序”的意义，绝不能忘记：它无非就是自己在开端时宣称的东西，正是它赋予我的教学以血肉和连接；否则，“人们或许会惊讶于我道路上的这个或那个迂回”。

无论谁重新阅读我至今约十五年来的陈述——它们始终得到细心、即使未必成功的整理，至少可以保留总体网络——都会看到，每一次都

没有任何东西不受这个要求严格支配。人们要求我做什么？重新思考弗洛伊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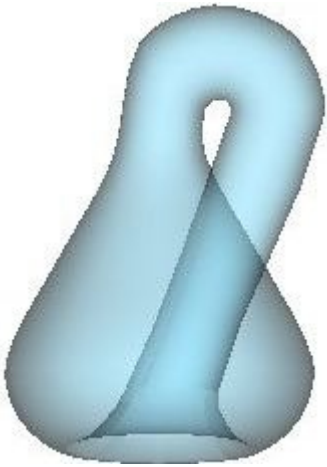
我最初这样提出它，虽然这容易引起各种含混乃至误解："回到弗洛伊德"（Rückkehr zu Freud），我起初这样说。当时，这句话从分析中"惊人的偏离"所造成的混乱表现中取得意义。至于后来是否看得出来，我哪怕略微阻止了这种偏离，重要性都居于其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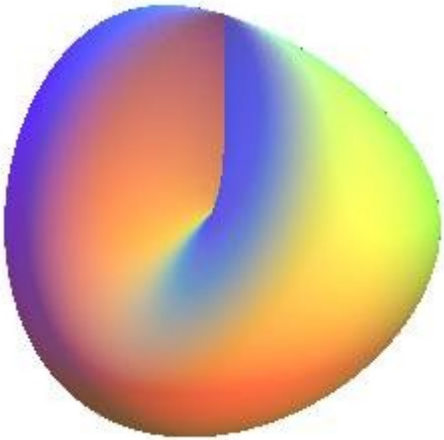
"我为自己取得授权"的，并不主要是这种偶然性；各类回归源头的理想化中那种十分经典的"理想"，当然不是令我焦灼的东西：重新思考，这就是"我的方法"。不过，我更喜欢"方法"这个词，只要你们俯身细看、把它稍微旋开，就会发现："方法（méthode）这个词恰好可以意指事后重新走过的道路"〔来自 μετά，"朝向"，与 ὁδός，"道路、行事方式"〕。"μετά（meta）这个词"同所有希腊介词一样——说实话，也同一切语言的所有介词一样，只要有人关注——"始终是极有回报的研究对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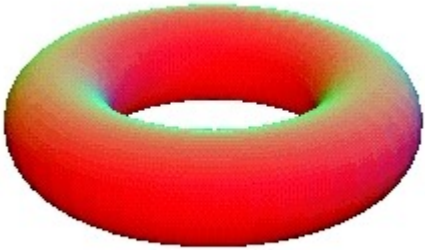
如果有一类词可以说：语言研究中任何赋予意义的突出地位，注定会在一个无法理清的迷宫中迷失，那就是介词。你们可以亲自借助词典，探索 μετά（meta）这个词各种语音含义的丰富性与多样性；你们会看到，没有什么阻止我从这个 μετά 过渡到今年在你们面前推进的那些结构形式严格要求的东西。

尤其是，我向你们显示了"莫比乌斯带"如何在其中"两种形式"〔"克莱因瓶""交叉帽"〕中——"看起来"——发挥一种完全"根本的"、示范性的关系功能，成为其结构的"支撑功能"；而它也潜伏于第三种形式

〔“环面”〕。“莫比乌斯带”为我们示范了我所谓一种结构中“双圈的必然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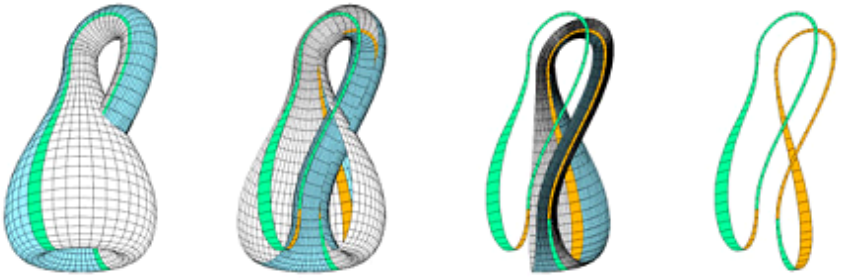
我的意思是，“只绕一圈”，你们只是表面上把其中得到圈定的东西闭合起来；只有在那里倒转自己的定向——这是不可定向曲面——才回到起点。“这就要求你们此后，恕我这样说，在两次失去定向以后，只有绕上两圈才能重新找回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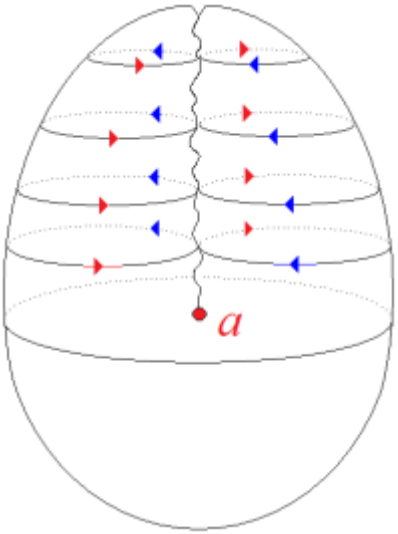
这恰恰就是我将赋予自身方法相对于弗洛伊德教导的“意义”。弗洛伊德的道路具有某种奇特的闭环、封闭、完成特征：虽然带有扭转，它仍由某种东西在一个点上重新接合，而“我长期强调过”，他的笔正是在那里停落，也就是“自我的分裂”（Spaltung）[注2]。这支笔携带着漫长探索——他的整个生涯——中积累的全部意义，返回一个“原初点”；但这个原初点的意义已经完全转变，因为他出发时所依据的，几乎是“人格双重化”这个全然不同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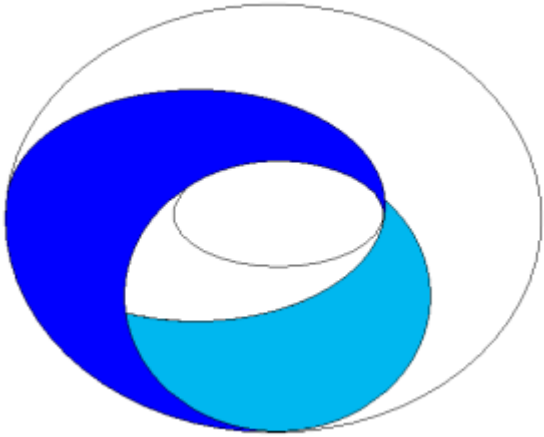
> [注2]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防御过程中的自我分裂》，1940年，《全集》德文版第十七卷。

可以说，他借助“无意识”的参照，彻底改造了这一原本相当通行的“概念”；最后，他以“主体分裂”的形式为它盖上最终印章。

我必须做的，恰恰是第二次绕过同一圈。但在这样的结构中，第二次绕行绝不意味着纯粹而简单的重复。







这一结构必然性如此原初，以至于我们只能通过艰难定位来接近它；我几乎会说，这需要某种指南针。考虑到我必须如何操作——“向实践者讲话”——我不得不说明，你们为什么可以信赖我的指南针：严格说来，它由分析经验与对弗洛伊德的阅读共同支撑；但它的三角测量毕竟有自己的“验证”，也就是直截了当地说，“它是否吻合”。

所有前来听我讲话的人都可以实际核对：即使一个构造看起来多次装配了对弗洛伊德十分陌生的要素，“我仍恰恰在那些重要的会合点上同他相遇”；而且这种相遇从全新的视角照亮了他着重赋予价值的那些点。

我刚才说过，在我进行这一操作的时间里，精神分析潮流所陈述的一侧是否清楚表现出某种“运动的逆转”，并没有那么重要。

无论如何，我必须接受：我的教学不会立刻产生它原本要生成的东西；它首先只需聚集那些能够从中找到材料的人。

因为确实存在某种操作秩序，我不必给它一个一般名称；它恰恰由我刚才界定的东西示范，也就是一个结构的完成。这个完成是否立刻凭借其交流效果得到确认，并没有那么重要。

令我在此凭记忆提到的某个人〔莫里斯·梅洛—庞蒂〕大为惊讶的是，我曾经说过，我有一天讲出的某些话……

- 面对一个肯定不是你们这样的听众；
- 面对一个素质也并不很差的听众群；
- 但面对一个准备极少的听众群……我曾以《欲望的辩证法与主体的颠覆》〔《文集》第793页，或第二卷第273页〕这样的标题提出一些东西……
- “怎么会”——有人对我说——“你怎么会认为，面对如此不适合听懂你所讲内容的人，陈述这些东西会有任何意义？

  “你以为这些话存在于某种第三或第四空间吗？”

当然不是。但某个“闭环”已经真正闭合，而且某种东西——无论多么微小——在某处留下一点指示；这就完全足以证明，人们值得费力把它陈述出来。

正是在这里，“主体间性”的观念变得完全次要：结构图式可以等待；它一旦在那里，就凭自身维持。恕我这样说，我即兴想到一个“随时调制的”隐喻：它像一个陷阱、一个洞、一座坑，等待某个“未来的主体”前来落入其中。

所以，没有什么必要担忧所谓“某一共同体的失灵”——这里就是精神分析共同体。更确切地说，应当标定这种失灵究竟是什么；因为像我有时所做的那样，我们可以在其中辨认出，“它为那个有待画出的结构提供了证言”。

你们会问：“谁给出的是正确结构，有什么判准？”恰恰就是结构本身。

在涉及主体的场中，如果结构具有如下性质：你们在“客观化之场”所作的“草图与计划”中，并不把找到“主体本身血淋淋、爆裂开来的标记、印痕与痕迹”包含为一种必然；如果这一点以“虚假的实验谦逊”之名被预先排除……

这种谦逊自以为从物理科学领域的成功中取得授权，以为可以在所谓“心理社会学”的场中投射一种完整而名正言顺的客观化；

它还以某种我也说不清的方式，企图从一开始就使自己全身而退……在“虚假的实验谦逊”掩护下，我们仍会说，存在一种逻辑上有效的判准、“检验的语域”；我会用下面这些术语来称呼它。

思想进程存在一些初始结构；关于它们，除了说它们可能或不可能被怀疑为真以外，别无更多可说。这就是结构的检验。无论它多么虚假地谦逊，如果它进入我刚才命名的那个场时，本身不呈现这种撕裂、裂隙与伤口的必然性，那么，人们就会在若干悖论中重新找到它的标记。

同样，那门无疑成功的、属于我们的科学——只要它在自身整个物理场中成功地拒斥了主体——也只能通过以若干悖论形式重新找到同一个“裂隙”，来给出自己的基础与数学原则。

在这一点上，它因此仍可以被怀疑为真。但是，我们以不知道如何说明“它绝不可能被假定为真”是什么意思为名，任由整个伤口不断扩展；这便为我所谓另一道伤口留下自由空间——你们还可以用“医疗—教育式的”这个词来标示它。

精神分析家的情形之所以严重，恰恰在这里。因为这正是他们的全部力量——我想，我所说的话已经具有足够的重量与意义，让你们结合他们的位置理解这一威望；他们在科学场中的威望没有别的来源——即他们完全可能被怀疑是某种真实表象的“代表”。

正是这一语域抓住并阻止了本来正常的反应——纯粹而简单的拒绝——因为我们毕竟还没有成功赋予他们所带来的材料一种有效地位。

然而，滑移与托词恰恰在这里：一种构成物符合某种“结构”定义，所以它可以被怀疑为真。既然只有怀疑，这并不意味着充分性；但它蕴含一个“必须”，而越过这个必须以后，也许任何增添之物都不能决定性地带来充分性。

这就是界定这种怀疑的标记；面对“症候作为真理问题”向我们提出的东西，这确实正是我们的“问题框架”。每当我们面对“真理”的这一质询——它以各种姿态安置在某种知识中——同一种含混便会显现，而“表象代表”一词支撑并体现了它。

因为，启蒙运动（Aufklärung）对宗教的批判历来正是败在我马上要说的“诱饵”上。

这些代表十分清楚，攻击作为“真理代表”的宗教所给出的各个表象，是怎样一种错误；代表们自己——即那些以不同方式被神圣化的人物——也完全明白这一点。他们鼓励围攻堡垒的人去争论《约书亚之战》[注3]中太阳停止的说法是否可信，或者去争论神圣文本中其他这个那个小故事。

> [注3] 《圣经 · 约书亚记》10章12—13节。

当一种结构声称涉及“真理问题”时，问题不应当放到“各种表象”上——无论这一结构可能给出怎样的表象——而应当放到“表象的代表”上。

正因如此，他们更喜欢让战斗围绕启示的主题展开；这些主题越无法攻克，人们就越可以任意劈砍。因为它们正由结构本身的材料构成，也就是说，其物质性不同于刺穿它们的剑；所以在很长时间里，它们仍会安然无恙。

反过来，存在我们可以称作“精神分析家的背叛”的东西。作为一种可以被怀疑为真之位置的代表，他们以为自己有责任用任何别的手段使它获得实体，而不采用从最严密圈定自身代表功能中本应产生的手段：“相反，他们竭力用自己所能寻找的最为异质的方式认证各种表象，以便为它们盖上普遍接受的印章。”

在我们努力构造之物的终点，这里出现了“结构的判准”。既然所处理的是主体结构，这些判准就回应下述要求：一种学说可以被怀疑为真；而这意味着，作为其“代表”的人必须做某种不同于依靠外部判准的事情。

这不只证明了我们必须用怎样的方法，也证明了我们必须在怎样的界限内接近这一结构的某些关键要素。至于某个“对象(a)”——例如窥视场的对象——我们当然必须给自己强加一种不无清教主义色彩的纪律：不太看重这里向我们提供的丰富性。

因为，我们怎么可能没有注意到：凝视是怎样一个汇聚点？围绕它，弗洛伊德已经——只有他——教会我们标定“诡异感”（Unheimlichkeit）标记的功能与价值[注4]。

> [注4]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诡异感及其他论文》，巴黎，伽利玛出版社，Folio 丛书，2003年。

重新阅读他的研究，你们会注意到：在他用来见证这一维度的作品中，“凝视以盲眼这种奇怪形式”发挥怎样的作用与功能——眼睛因为被挖出而盲；或者还有代表其近似等价物的各种属性，例如“眼镜”“玻璃眼”或“假眼”。

这就是霍夫曼[注5]的“全部主题”；天知道，它比我在这里能够唤起的还要“丰富”得多。

> [注5] 恩斯特·特奥多尔·阿马德乌斯·霍夫曼：《魔鬼的灵液》，巴黎，Phébus 出版社，Libretto 丛书，2005年。

你们随手就可以查阅《魔鬼的灵液》。这里存在一整部“眼睛的故事”——这话正合其意。

在这里向可能潜藏其中的信息敞开耳朵的人，知道我说“《眼睛的故事》”是在暗指什么。

《眼睛的故事》[注6]是一部匿名出版的书，作者是最能代表我们时代某种根本不安的人物之一；它被当作情色小说。这部书有一整套丰富脉络，十分适合提醒我们——恕我这样说——所有“对象(a)”彼此之间的嵌套、等价与连接，以及它们同生殖器官的中心关系。

> [注6] 乔治·巴塔耶：《眼睛的故事》，巴黎，伽利玛出版社，“想象”丛书，1993年。

当然，我们可以进一步提醒：泪水现象并非徒然地发生在眼睑裂隙这一点；我们不能说，无需由此质询它同赋予这一裂隙的结构性意义之间的关系。同样，我们怎么会看不到：眼睛——或者更确切地说这条裂隙——并非徒然地为我们扮演、发挥睡眠之门的功能。

已经很多了，足以使我们迷失。

过多丰富内容或过多轶事，只会让我们重新落入某种我也说不清的发展参照的车辙，在历史中再次寻找特定时刻。无论这些基准多么有趣，它们只会向我们遮蔽真正有待界定的东西：窥视场在一种结构中占据的功能，而这恰恰就是涉及主体同大他者之关系的结构。

十分奇怪的是，在此前整个时期，我们一直把语言中的交流功能提升为应当从根本上统摄无意识相关问题的东西……

同时，我们不断从四面八方重新听到那个并不构成反对的反对意见：存在“前言语的”“言语以外的”“言语以前的”东西。人们援引姿势、表情、苍白，以及一切血管运动、本体感受或其他形式；据说某种我也说不清的不可言说交流可以在其中发生，仿佛我们曾经否认这一点……然而，从未有人把唯一真正有话可说的点提出来：通过凝视发生的交流秩序。这确实不是语言！

恰恰是这一点，前来支持无意识处理重新以语言与言语为中心所具有的意义……

也就是说，弗洛伊德恰恰通过把凝视排除在外，开启了分析位置。

这是“一个首要真理”；人们毕竟不得不把它考虑在内，因为恰恰是人们将它删去并忘却这一事实，证明人们多么偏离要点。

那么，这个在窥视场中受到质询的“对象(a)”，为什么恰恰是“我们推到前面”、推到“尖端”的对象？为什么今年我们恰恰把所谓注意力集中在它上面？

“对象(a)”是主体同大他者之关系的奠基部分所涉及的赌注。我们的问题悬在它归属于谁这一主题上。让我们从经验中最基本的既定材料出发，更仔细地看看分析家所谓“客体关系”涉及什么。他们显然让主体同大他者的这一关系发生偏转，把它化约到索求语域；我们就利用这一点。

这些对象中最著名的两个——恕我这样说，是分析赋予其功能与地位的典型对象——是：

- “向大他者提出之索求的对象”，即所谓“好乳房”；
- “来自大他者之索求的对象”，也就是赋予“排泄物对象”以价值的对象。

很清楚，这一切把我们封闭在一种完全二元的关系中……

当我说“完全”时，并不是要写入任何“满意”的意味，而是说封闭、彻底闭合……我们知道，由此产生的结果，是把整个理论、理解、实践、临床、心理学乃至教育学的视角都加以化约，封闭在索求的循环中；与之相应的，就是“挫折或满足”“挫折或无挫折”的循环。

只要恢复某种内在于、内含在索求功能中的东西，也就是仅仅因为索求以语言为中介得到表达而必然涌现的另一个维度——语言赋予大他者之场以首要地位——我们便能够赋予“欲望维度”充分的地位。在“欲望维度”中，使欲望产生的“对象(a)”之特有性质会显现出来，因为这个对象取得了“绝对价值”、取得这样一种烙印：我们在经验效力中发现的，严格说来并不是“需要的满足”。重要的不是孩子吃饱，也不是吃饱后睡着；

- 而是某种带有如此特殊、如此绝对条件色彩的东西；它以不同名称被分离出来：nipple、“乳头”“好乳房”“坏乳房”；

- 问题不在它的生物形态，而在某种结构功能；这一功能……

恰恰使人能够随意在奶嘴、奶瓶、任何其他机械对象，乃至手帕的小角或小片中找到它的等价物，只要那是母亲的脏手帕……它就会赋予、使这个口腔对象的功能当下化；而从结构上说，这个功能值得被特定说明为欲望的原因。

某个只能用结构术语界定的对象被提升为“绝对条件”的这一功能，正是必须强调、以给出其特征的地方。因为，它确实取自肉身领域，却成为一种关系的赌注；若用一种完全不恰当的说法，可以把这种关系称作“主体间的”。

但这个对象的确切地位是什么？这正是我们正在尝试界定的东西。我刚才指出的前两个对象在索求中发挥作用，但并非不涉及大他者的欲望。

无论在口腔还是肛门辩证法中，被索求对象所取得的价值，都利用了这样一个事实：无论伙伴是谁，他在给予或拒绝对象时，都会以自身的同意或拒绝，让自己的欲望情形显出价值。

欲望维度随着这个对象的来临而涌现；我再说一遍，它不是满足需要的对象，而是主体的索求同大他者的欲望之间关系的对象。它处在欲望功能的开端，并在这个源自需要的索求维度中，引入同大他者欲望之关系的绝对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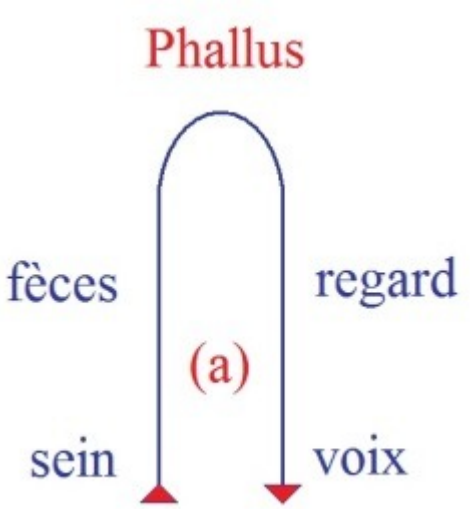
正因如此，这两个对象在神经症结构中占据优势；如果停留在一个特别容易受限的地平中——因为恰恰是它们自己限制了这个地平……

我说“地平线”，这个词自从我以某种方式谈过“窥视对象”以后，就有了意义……精神分析家很容易满足于一种把全部重点放在索求与挫折上的理论，却没有注意到，这是神经症的一项特殊特征。

“神经症者同大他者的关系是：”

- “他的索求指向大他者的欲望；”
- “他的欲望指向大他者的索求。”

神经症结构的局限就在这种交叉之中；我多次强调，它同环面结构的属性相连。而我已经引入某个“四元组”——也许它是一个刻度盘——中的“其他对象”，也就是“声音”与“凝视”，涉及的是另一个维度。



鉴于我对言语效果之场的偏爱，今年没有俯身探讨“声音”，当然值得注意。对此我无疑自有理由，哪怕只是时间限制也许强加给我的理由：我必须花些时间，让你们理解并推进我恰恰在窥视场中带来的新东西。

至于“声音”，对象直接卷入其中，而且立即处在欲望层次，这一点显而易见。“如果主体的欲望奠基于大他者的欲望”，那么，这个欲望本身就在“声音”的层次上显现。

声音不只是原因对象，还是大他者欲望借以显现的工具。这个项完全连贯，而且恕我这样说，它构成了相对于索求两个方向的顶点：

- 要么向大他者提出；
- 要么来自大他者。

那么，我们将如何定位这个对象与这个窥视场？难道不正是在这里，我们看到它……

仿佛让“欲望”“索求”“从……”“向……”等项的平行关系引导我们……我们看到这个奇特维度敞开；此前，窗户——人们也常常把它本身称作“一道凝视”——的唤起已经向我们提供了它。这就是向大他者欲望、被大他者敞开并吸入的维度；严格说来，这一层次所涉及的正是它。

由此，我们便能看到，它为什么在拓扑本身中取得这种特权功能。归根结底，无论我们把在你们面前用意象说明的这些拓扑形式推进到怎样的组合化约，其中似乎总会留下某种人们也许错误地称作直觉之物的残余；严格说来，它就是我称作“凝视”的这个“对象(a)”。

今天结束以前，为了只提供“一个分节点”，我要唤起……

以一种能够向你们显示结构层次可采用之手段多价性的形式……我要向你们唤起另一种同样属于拓扑的形式；它将同我在《宫娥》层次上为这一窥视结构给出的范式与示例交会。

我将用自己向你们说过的那个有趣笑话作为“落点”，结束今天这一课：在《宫娥》中，国王把圣地亚哥十字贴到画家胸前；不管是否真如传说所言，是国王亲自执笔画上去的。

如果我听到的回声属实，这一小笔曾触动听众中几位善良的灵魂；他们从中看到“一种隐秘暗示”，指向我本人不得不背负的东西！让这些善良的灵魂放心，我并不觉得自己被钉上十字架！

理由很简单：我所从中出发的十字，是分割《宫娥》的两条线构成的十字……

- 一条从逐渐消失的地平点出发，经过门口〔那个正在离去的人物〕，一直抵达前景大画作脚下——它是“表象代表”；
- 另一条从委拉斯开兹的眼睛出发，一直伸向最左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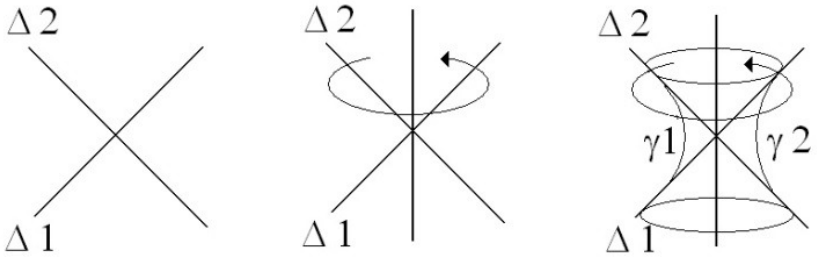
在那里，它抵达自身的自然场所，也就是我为它定位的“画作无穷远线”……这两条线看起来彼此交叉，但实际上根本不相交，理由很简单：“它们处在不同平面中”。



如果确有一种十字，这也正是我在同分析家的关系中所面对的全部十字，也就是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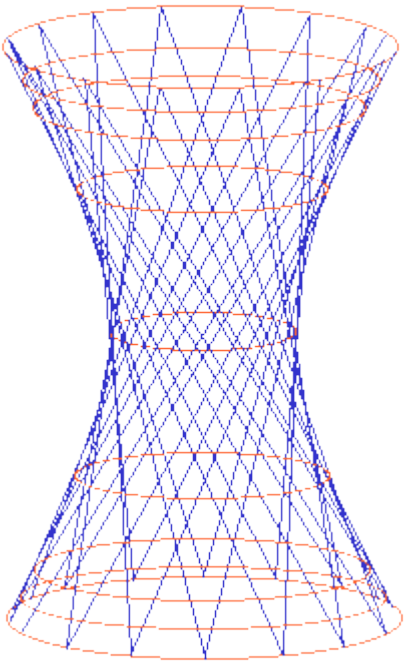
人们曾向你们把它画成这样〔A〕，而线条在这里中断……所以，我们有两条不处在同一平面中的线〔γ_1、γ_2〕。

那么请注意——这是研究所谓“圆锥曲线”的人很早以前就有的一项小发现——如果在前面这两条像这样〔B〕的线之间，任取第三条线作为轴，并让整体像陀螺一样旋转，会产生什么？



A　B　C

我们会产生某种东西。看来刚才几分钟里很少有人想到它，因为我没有听见任何人喊出答案。产生的是类似这样的东西〔C〕。为了让你们理解——天知道还会发生什么——请把它想成所谓“空竹”，也就是一个如此成形的曲面：



不过，它会延伸到无穷远——当然，因为这里涉及的是直线。

这个曲面是什么？“这是可以证明的”。它就是所谓“单叶旋转双曲面”。

“旋转双曲面”是什么意思？它不过是让一条双曲线围绕一条被称作其准线的直线“旋转”——法语里还可以说成“打嗝”（roter）——所得到的东西。所以，双曲线就是在那里呈现的东西，也就是你们从侧面看到的这两条线〔γ_1、γ_2〕；现在我把它们分离到一个平面中。

双曲线是什么？它是一条曲线，其所有点都具有这样的属性：“它们到两个称作焦点的点的距离之差为常数”。由此，这个差值恰好由“曲线

两个顶点之间的距离”给出；顶点就是两支彼此最为接近、却无法接触之处的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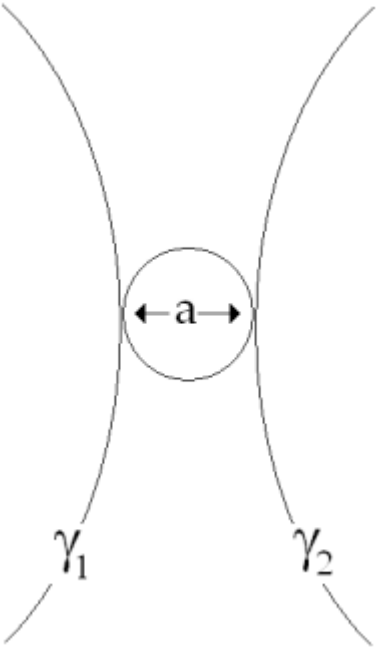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种旋转所得曲面的表面上，能够画出一系列具有伸向无穷远之属性的直线。

希望你们稍微留意我在做什么，因为这里恰恰是生动而十分有趣的一点：总有两族直线可以这样画出，恕我这样说，它们使所定义的曲面围绕自身展开。这个曲面从平面中的起源来看，确实显得复杂，并构成所谓圆锥曲线；因此，在旋转双曲面上，我们发现了同样一种能够无限延伸的直线属性，而在作为另一种旋转圆锥曲面的圆锥面上，也会发现这一属性。

由此产生什么结果？恰恰是：这条双曲线上的每一点，即使通过这种旋转在空间中展开，仍具有如下属性——它到两个焦点的距离满足“两段距离之差为常数”。

所以，我们现在能够说明某种由“一个球面”代表的东西；这个球面的直径恰好等于上述差值。它代表的东西位于这个双曲面内部，正好穿过曲面最狭窄的一点。

如果你们想看 S 与 A 关系的另一种表示方式，这就是一种使我们能够以另一方式象征“对象(a)”的东西。



不过，重要的不是找到结构支撑的这种可能性，而是我们能够把它纳入怎样的功能。这将是下次会面的主题。除非某个要素可以同其他对象结合成所谓“群结构”，否则它不可能具有“对象(a)”的功能。

你们已经能够看到这里的可能性，因为我们还有其他要素。

尽管这一“群结构”要求任何一个对象都可以带负号来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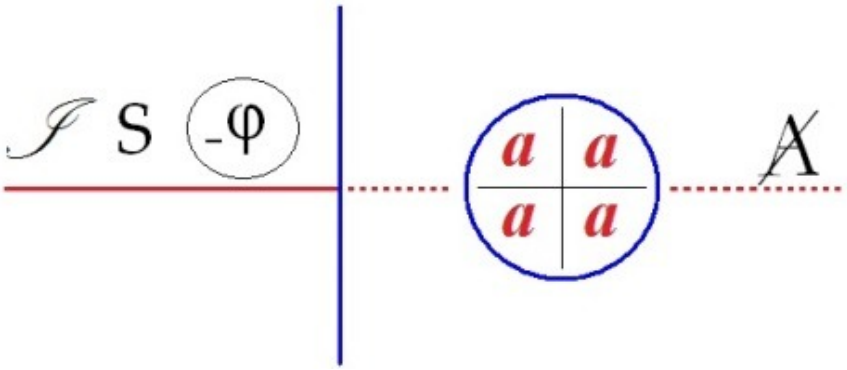
这是什么意思？它将把我们引向哪里？

这将使我们能够——我希望下次做到——以某种东西结束本学年：完成一个结构定义，它蕴含“对象(a)”的组合机制，以及对象(a)本身在弗

洛伊德式“欲望”与“主体”维度的根基——也就是“阉割”——中能够取得的价值。

第21课 · 1966年6月8日

请把这个“图式”当作某种浮在或平静或略有波动的水面上的软木塞；你们可以用它来标出把渔网丢在了哪里。当然，无论右边“这个图式”，还是“这些”奇怪的词——不过我希望它们的回响已经向你们说了些什么——都不具有“严格的”操作价值。



I：hiarien（“没有东西”），S：gniaka（“只消……”），R：孔洞

它们只是浮标、基准，同我今天必须向你们讲的东西有关。由于这是我“本学年”最后一次公开研讨班，我当然会努力把事情推进到这一事实所要求的终止点。

为了保留一种严肃语调——一些人颇有眼力，从我上次所说的某些事情中听出了它——我将重新出发……从一个类似的点出发；它来自我本周同一位数学家朋友的谈话。

“在数学中……”

我这位出色的朋友这样对我说。我没有提他的名字，只是因为归根结底，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权公开这种坦诚告白”。数学家很少这样做；总体而言，他们在这方面略显缺少热情。不过，这位杰出人物并非如此，他对我说……“在数学中……”

总之，也许是我以某种方式不断纠缠他，试图从他鼻子底下尽可能多地抽出一些东西，才逼出了这份坦白；我随后把这些小虫带来，让它们以我的拓扑学形式在你们面前扭动。

“在数学中，”他指出，“人们不说自己在谈什么”——一切都在这个“不说”里——“人们只管谈它；因此会带有某种”——这是他的原话——“假装的样子。”

而这正是他用一种带有这类对话中并不常见之颗粒感的语调所称的：“数学话语中那种我也说不清的虚伪气息。”

如果不是从一位数学家本人那里听到这句话，我自己不敢提出这样的说法。必须说，此人在这里并不缺少“严格要求”。仿佛在某种重新陈述的层次上，陈述数学话语的人总处于遮掩某种东西的姿态中。

不过，我的数学家在这里也并非没有自己的角度。他期待这份倾诉，或许也因为——不要遗漏情势的任何一面——他向我张开了一张网，也就是他同样想从据说由我掌握的浸泡液中提取某种东西。尽管如此，他仍回到自己的立足点与位置，并补充说，归根结底，他作为数学家所遮掩的，严格说来正是他必须遮掩的东西。

理性话语的窍门，在于成功地让这个东西继续隐藏，也就是不说数学的材料与主题究竟是什么。无论如何，人们谈到的东西，只管把它谈出来。

插一句：由此可见，只有最迟钝的人——只有他们，请你们记清楚！——才相信数学谈论的是并不存在的事物。

我说要在边上画一幅小图、随手涂几笔，只是顺便给你们一点乐趣，根本不是我接下来所说内容的轴线。我只想请你们注意：例如，如果翻开穆齐尔的书——它刚被拍成一部很好看、却仍略显失败的电影：《少年托雷斯的迷惘》[注1]——你们会发现，一个高中生如果稍微敏锐一点，下面两件事之间便可能有极大关系：

> [注1] 罗伯特·穆齐尔：《少年托雷斯的迷惘》，巴黎，瑟伊出版社，“Points”丛书，1995年；沃尔克·施隆多夫执导的电影，1966年3月。

- 一天，他的老师为了向他说明“虚数”是什么而狼狈挣扎；
- 而恰巧大约就在同一时刻，他猛然投入自己同小伙伴之间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倒错构型。

这一切只是边注。

我想重新谈谈“精神分析家”相对于“数学家”的位置，既指出二者的差别，也指出亲缘关系。

归根结底，我们会精确地看到，在某个层次上，分析家同样“不说自己在谈什么”。

只是理由同数学家略有不同。大家确实都知道，如果他不说自己在谈什么，并不只是因为他毫不知情，而是因为“他不可能知道”。

这正是存在“无意识”、存在不可化约的“无意识”与“原初压抑”（Urverdrängung）的确切含义。

可是，能否说他像数学家那样只管把它谈出来？显然，他完全不处在相同位置：在某种意义上，“确实有人谈出了所涉及的东西”，只不过“那是他让其说话的人”，也就是病人。问题在于分析家在哪里，因为他并非毫不相干地处于使“病人说话”的位置。病人说话时，以自己的方式谈论“某种本应说出他在谈什么、却无法被说出的东西”。

奇怪的是，精神分析家也必须说话；结果并非他们像数学家那样，只管谈论某种人们没有说“他在谈它”的东西，而是他们在它旁边说。精神病学家很早就发现了一个名为“甘瑟综合征”的小综合征。分析共同体话语所特有的这种“答非所问”，也许能让我们从一种奇特的侧光或环境光——我也不知道，还得仔细看看——照亮甘瑟综合征的实情；它恰恰就叫“近似回答”。

总之，精神分析家不得不采取这种话语；它重新落到“话语当然必须具备的根本必然性”上，也就是它必须流通、必须有行情。

要真正深入这个主题，应当让人用货币使用方式的隐喻——甚至不只是“隐喻性”的货币用法——来告诉我[注2]，也就是下述差别：

> [注2] 参见货币的“法定流通”与“强制流通”。

- 某种话语在这个圈子内部具有“强制行情”；
- 另一方面，它又必须在外部圈子的汇兑市场上让自身显出价值。

我曾在一篇论“技术变体”的文章中尝试接近这一点[注3]；由于一些不完全偶然的理由，我最近重新读了它，因为它将同整部文集一起再版。你们可以去查阅。

> [注3] 参见《文集》第323页《标准治疗的变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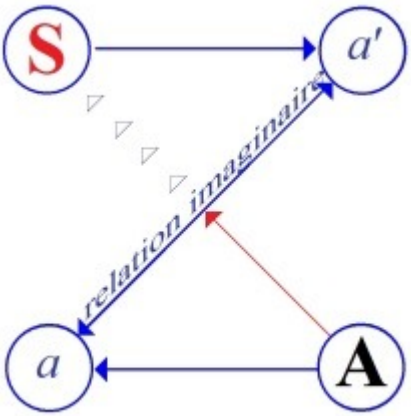
不过，对你们分析家而言，实践问题还是这个；它以一种十分亲切、十分天真的方式表述：“为了成为精神分析家，真的有必要学习“拓扑学”吗？”归根结底——这种对话不是同“婴儿”进行的——某种僵局最终就导向这种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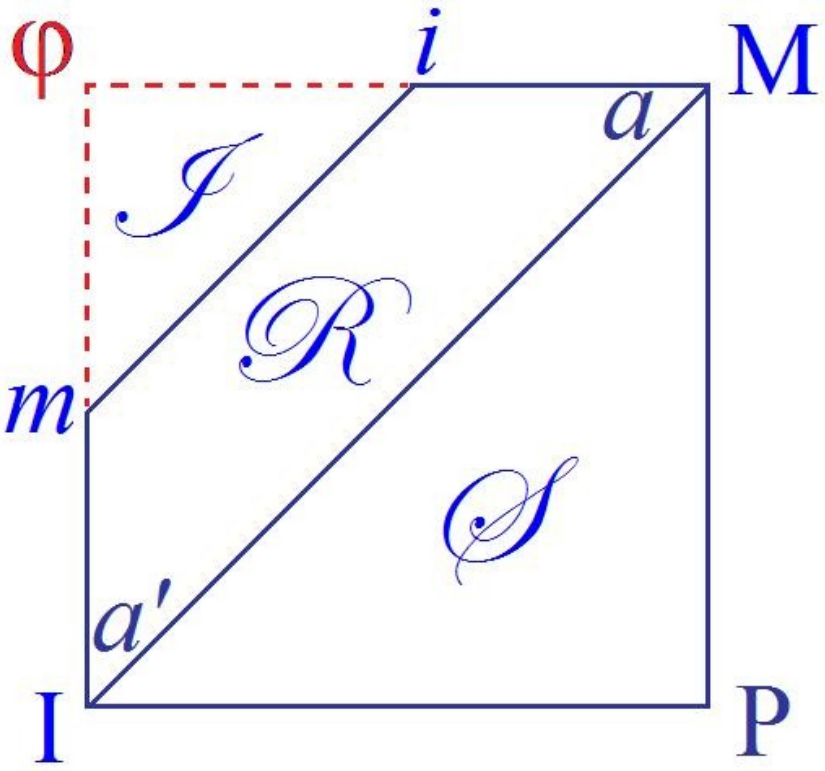
尽管我不得不在自己围绕这一主题随手写下的、更为细致的笔记中作出取舍；但必须劈开波浪，而且今天还有其他重要事情要告诉你们。所以，我就劈开它，回答这个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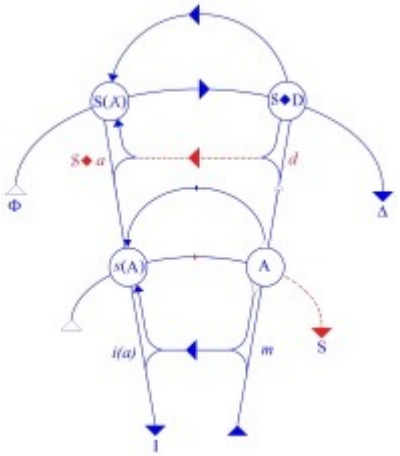
无论谁提出这个问题，都已经让我可以给他“如下回答：拓扑学并不是他必须另外学习的东西”，仿佛精神分析家的培养只在于知道要从哪只颜料罐取颜色涂抹自己。他不必提出“自己是否应该学习拓扑学相关内容”的问题——我用这个简略而且我会说“不精确”的标签，指称自己在这里带来的一点东西——因为“拓扑学正是他从中裁剪的布料”，无论他是否知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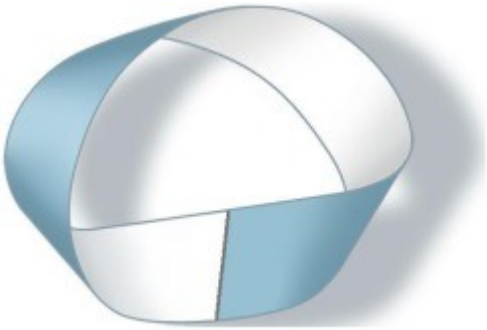
他是否翻开“一本拓扑学书”并不重要；“只要他在做精神分析，这就是他从中裁剪的布料”，也是他裁剪精神分析操作之主体的布料：“纸样、衣服、模型”都可能是他必须“拆线”与“重新缝合”时所涉及的东西。如果他的“拓扑学”是弄错后做出来的，“代价就由他的病人承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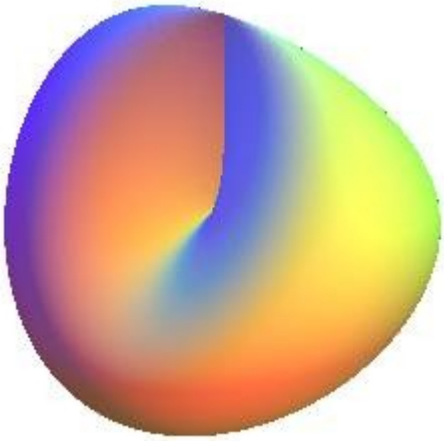
我尝试建造这一构造并非始于昨日：“这些网络、指路牌、定向网络”先后被称作“L 图式”“R 图式”“图表”；最后，今年——或者说近几年——则使用“位置分析的曲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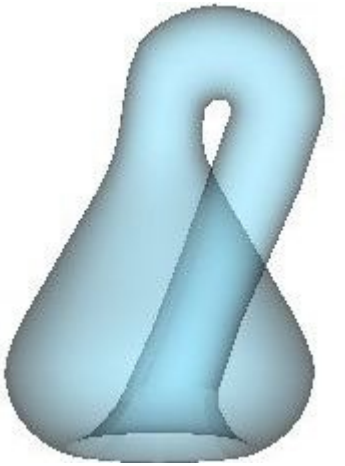



φ
i
M
a
J
R
m
S
a'
I
P


S(A)
S◆D
S◆a
d
Φ
Δ
s(A)
A
S
i(a)
m
I







毕竟，那些曾看见我努力带来这些东西的人知道，我当然“顶着风浪”建构了它们；但并不“只是”因为想让从前和现在的听众感到不快〔原文如此〕，而是因为我只需跟随这项有待展开的计划。计划就出现在病人的话语中，也出现在至少每一个由我“督导”的人——他们前来进行精神分析中所谓“督导”——所带来的话语中。他们未经加工、活生生地把那些有时也属于我的公式带给我：“病人严格、严密、完全按照这里所讲的方式说出它们！”即使我事先没有像一阵微风那样略微得到“这种拓扑学”，“病人也会迫使我把它重新发明出来”！

所以问题很清楚。数学家不说某种东西是什么、却把它谈出来；我们可以从这个或那个参照中取得帮助。它很可能为我们略微清理道路，给我们提供一些工具，让我们有时认出自己面对的东西；这就是我从开始谈论精神分析之时便提出的“语言的功能与言语的场”[注4]。

[注4] 参见《文集》第237页《精神分析中言语与语言的功能和场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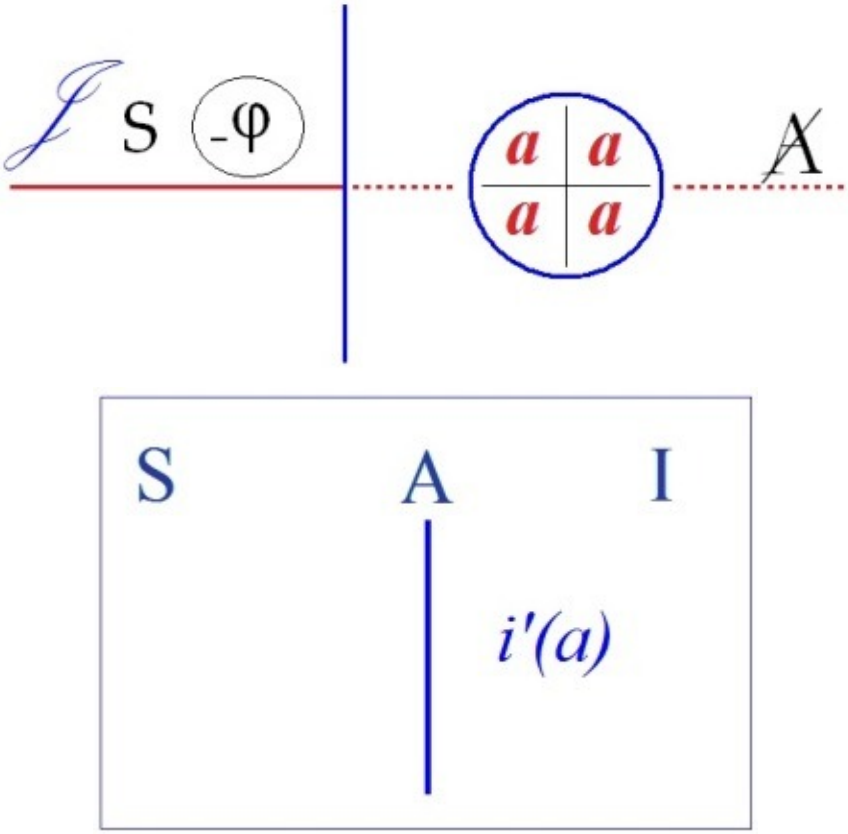
对那些头脑里始终保留着这类反对意见——“对，但这不是全部！”——的人，我要再次重复我已经汗流浃背重复了这么久的话：确实，这不是全部；但在“精神分析”中进入我们地平线的一切，都是经由这里进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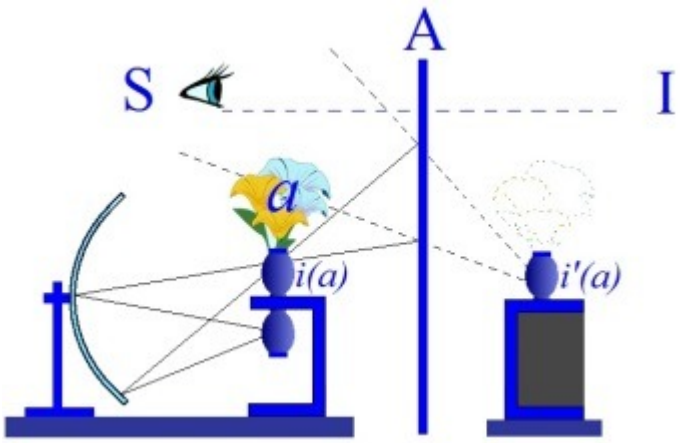
换言之，至于某种“保持隐藏”的东西……

远不只“隐藏”：它“无边无际、未知，仅在几个入口点略微得到接近”。我已经说过我们自己也极少说出的东西，甚至到了“最好不要说”的程度……我指的是“享乐”——如果不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就不会对这个维度、这层深度有任何观念……

不能说它向我们呈现自身，因为它是“被禁止的”；但我们至少可以为它命名：“享乐”……如果不是“主体在语言中的奠基”通过反作用，在我们之中建立了称作欲望的秩序、屏障与防御，并由此迫使我们质询：我们在防御什么？这种“享乐”究竟如何？——我们便不会对它有任何观念。

当然，除了说话的存在者，没有任何存在者会提出这个问题！右边这条线的展开，向你们勾勒出什么？如果这个图式还在你们头脑中留下什么：S、I、i′ (a)、A……


S
-φ
a
a
a
a
A
S
A
I
i'(a)



……你们可以看到从 S 走向大他者之场的根本布置；它向你们标示了我稍后将提醒你们的东西：

- 主体正是从这个场〔A〕中，把“对象(a)”作为自身所属之物取回；
- 在更靠近这一边的位置〔−φ〕，涉及大他者的另一项功能，因为位于主体背后的这个大他者〔J〕“对他完全隐藏，只在他把它投射到大他者之场的地方以幻象形式被察觉”……“享乐”〔J〕就应放在那里。

这就是我今天要告诉你们之物的总体定向。

事实上，“享乐对象”的根本价值，在于向我们显示它通过怎样的齿轮机制……因为迄今除此以外，我们一无所有：我挑战任何哲学，要求它现在说明能指的涌现同“存在”对“享乐”的关系之间有什么关联。二者必然相关。是什么关系？

事实上，正是在主体拓扑学的网中，某种属于“享乐”之场的东西被捕获起来。

恰恰是——事情悬在弗洛伊德告诉我们的这个点上，他所说的意义正在于此——在这个“主体之网”中，在使主体并非内在，而是“潜伏、消隐于语言网络”的东西中，“享乐”作为性享乐被捕获。这就是弗洛伊德所言的原创性、突兀性与重音。

但为什么会这样？我说，眼下“没有一种哲学向我们说明它”。自上世纪初以来，我们像破碎的衣服一样拖在身后的那些“可怜的哲学流产物”，无非是一种“嬉闹”方式，而不是正面处理唯一的问题：关于“真理”，以及所谓——并由弗洛伊德命名的——“死亡本能”、享乐的原初受虐性。它们只是我们的经验向这个问题投射出的隐喻与闪光映像。

全部哲学话语都失败并逃开。于是，对于这种在可怕之场中的入网——而“悲剧”的全部幻想早已预告了这个场——我们不知道实情；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某种东西也许以偶然方式随弗洛伊德进入我们的经验。他告诉我们：被言语与语言之场捕获的，是“享乐”中同另一个神秘事物相关的部分；请注意，在分析学说的全部发展中，这个神秘事物始终未被触动，它叫作性。

所以，我所谓“手指伸进齿轮”，指的是完全不同于说明理由的事情；我们还没有掌握这场历险的“为什么”。能够知道“如何”进入其中、如何因一根小指而被卷入，已经很多。也许正是通过对这套机械的拓扑学作出若干必要思考，我们才会对这些理由与界限得到一点光照。

况且，既然整套机械必然已经运转了相当长时间，从这个端点察看事物，我们也许能够通过观察人们此前如何迫使自己不去看，而知道许多东西。

那么，如何进入其中？这显然就是“对象(a)”的全部意义。

在我们铭写为大他者之场之必然性的关系中，在由“索求”建立、并从需要出发把我们推向那里的关系中，一个十分简单的东西开始发挥作用：“我们发现，可以从大他者之场收回自己的身体，因为身体已经在那里。”

乳房只不过是这个迷失在“大他者之场”的身体之所属，这取决于我们暂且从自身视角称作生物偶然性的东西；它简单地叫作“成为哺乳动物”。朋友们，我们是……哺乳动物，这一点无可奈何！

而且这还有许多其他后果。通常还伴随着另一个事实：我们拥有一种叫阴茎的奇怪装置，使交配由某种享乐支撑——它算不上什么惊天动地的东西，对吧！……总之，这也是一种享乐，而且是手边现成的一种。你们笑了……

但这正是分析教导的中心！人们就是从这里出发的：“别碰，否则就把它剪掉。”

这是“最初的真理之一”：当时人们就这样——对吧——模模糊糊地作出那个名为俄狄浦斯的惊人发现。不过必须看清，正是在这种平凡真理的层次上，另一个同阴茎有关的小舢板被系在俄狄浦斯这艘巨轮上。这无论如何应该促使我们思考。

一切都在这里吗？换言之，我们现在必须思考阉割。它确实同我刚才推到前面的两项相关：哺乳动物手淫享乐的短循环。

啊……今年我没有浪费时间向你们解释，臭虫[注5]那里会是什么样子。“那一定深不可测！”

> [注5] 参见1962—1963年研讨班《焦虑》，1963年3月6日课。

相比之下，你们的那点享乐永远可以……靠边站！这一看法非常重要。

“第二点”确实同人类的许多东西一样，手边就有；因为除人以外，拥有手的存在者不多。灵长类动物整天经常用手做我刚才提到的事，因此它们在享乐方面遇到的问题简单得多。

不过，人们会注意到，哪怕只是狗——它比灵长类优越之处在于进入人类言语之场——一切同这种“摩擦游戏”有关的东西都会多一层复杂性。我们只能惊叹一件事：狗多么“有教养”。必须从这里出发。你们看到，我们很快就卷入某种勾连——那些走捷径的人正扑向这一点——即索求的“对象(a)”同某种人们拒绝看见的东西之间的勾连：“享乐对象”。恰恰是因为，“若停留在这里，就走不了多远”。走不了多远，因为停在索求层次，只会停在某种［……］身体所属之物上。

我还没有谈另一个，也就是最平凡的对象。据说，大他者向我们索求它；而我们借此把身体必须给出的东西交给大他者，把它放到被视作垃圾场、倾倒场的大他者之场中。也就是我们含蓄地称作“粪便、粪块”的东西——σκύβαλον（skybalon），“被丢弃之物”，这是一个十分优雅的词——说实话，它们通常发挥“身体废弃物”的功能。

如果像某种分析视域倾向做的那样，把“主体同大他者关系的全部辩证法”限制于“索求”，最终就会进入一个受限于挫折的球体，进入“母性大他者的优势”，至多再提高到所谓“复合父母”的复杂程度。这样确实会得到某种相当封闭的东西；它只有一个真正的不便：此后人们会疑惑，为什么还发明了俄狄浦斯，然而这一发明恰恰处在起源处，它全副武装、迎头从弗洛伊德脑中冲了出来。

这一欲望维度当然正是对此的参照，因为弗洛伊德同样首先把它放在那里；只有围绕它，“索求的机制才得以建成并被发现”。任何索求都会唤起欲望；不仅如此，从字面上说，索求本身也只有从其地平线上欲望之召唤的形成中，“才会被唤起”。[注]

> [注] 原文校勘：Staferla 文本与法国拉康学派（ELP）所收 J.L. 速记本在此都作 il n’est aucune demande, non seulement qui n’évoque…，即 n’évoque 的宾语缺失，句法本身有断裂。Gallagher 依据录音所作英译把这里理解为“任何索求都会唤起欲望”；本译结合前后的 désir 与第二分句，补明这个省略的宾语，同时保留“索求也被欲望之召唤唤起”的反身结构。

可以说，大他者不再是这个惰性的场……

人们从中收回某种东西，即作为理想对象、始终欠缺的乳房；人类机器试图用各种装置复制它。归根结底，无论是潜水的人，还是飞入如今所谓“宇宙”的人，他始终只带着一套小型供养装置，并同它构成闭合回路。无需因此想象他怀念母亲的子宫；恰恰在子宫里，他的装备在我刚才所说的语域中格外不充分，而且只有一种相当跛脚的共生……“大他者之场”正是欲望要使其受到牵涉的东西：欲望前来牵动大他者。

“另外两个对象(a)”的本质之所以不同，就在这里。正因如此，今年我让第一个对象——也就是凝视——的“范式得到标示，甚至被分离出来”，作为我论述推进到的时刻。其他对象我们已经充分熟悉，尽管仍须回头讨论，所以我没有细谈；但我谈了“凝视”。

“凝视”具有这样一种特权：它是作为凝视走向大他者的东西。当然，这里有一整套可以令人停留甚至享受的现象学；不过，既然它是一条裂隙，它在何时发挥作用？

在敞开还是闭合时？《梦的解析》中有一个关于它的梦，叫作“闭上眼睛”。

请稍微查阅一下；一切已经在那里，提出了一大批问题。

不过，关于“凝视”的这一功能，我已经排除“一切绘声绘色的东西”。我没有问为什么提瑞西阿斯从眼盲之时开始成为先知——这类游戏通常令我们这个奇特圈子欢欣——我给出的是结构；也给出一种总会完整地随“凝视”进入运作的拓扑。我已经描述过它，无法再回头；它证明了屏幕存在的理由。

在这个大他者之场中，凝视引入了屏幕，也引入一项必然性。我的一位学生梅尔曼最近提醒我，这一必然性已经铭写在弗洛伊德论“屏幕记忆”的文章《关于屏幕记忆》（Über Deckerinnerungen）中：即“主体必须铭写在画中”。当然，文章没有说出这种拓扑学；然而它对于弗洛伊德式发展的全部进程如此关键、如此根本，同俄狄浦斯的拓扑学同样重要。正是这一拓扑学构成了所谓——为什么这样称呼？——原初场景的真正基座，并赋予这一功能以一致性。

原初场景是什么？不正是今年我试图安置在你们面前的这些框架、布景片的必然性吗？我让你们在那里注意一种结构条件；也许——这正有待确认——它只是“反面”“衬里”“第二圈”，借助这一圈……

它在弗洛伊德那里已经“完整”，但迄今无人“补完”；之所以无人补完，是因为人们没有按顺序跟随……其双圈在由俄狄浦斯所制约之欲望的法则旁边，建立了另一条连接法则：主体由此勾连在大他者之场，并使围绕“凝视对象”构成的某种秩序成为必然。

由此，当大他者的这个对象在某种随你们称作画作、舞台或屏幕的东西上竖立起来时，这就是勾连……

我只是取用一个我想你们知道其源自安德烈·布勒东[注6]的词……我把它称作“向大他者”的勾连；大他者由“少许现实”所规定，而这构成了“幻想”的全部质料，也许还是我们所能抵达的全部现实。

> [注6] 安德烈·布勒东：《关于少许现实的话语导论》（1924），载《全集》第二卷，巴黎，伽利玛出版社，七星文库，1992年，第265—280页。

这值得我们把“另一个对象”留待以后——而且这样做并非没有计划，而是出于论述需要；这个对象同“凝视对象”交叉，归根结底颇为奇怪。我说的是“声音”。它显然来自大他者，但我们却在“内部”听见它。当然，这里的“声音”不只是听觉场中得到调制的声响，而是一个能指对另一个能指产生反馈时“掉落的东西”；我们把这种反馈定义为主体出现的根本条件。换言之，只要你们在我所说的一切中听到很少的东西，那是因为你们像所有人一样，正忙于自己的声音。

现在，问题在于知道“阉割的功能”在这一切中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阉割同欲望功能相连，因为欲望在大他者之场中从字面上被投射

到一个极限点；神话已经以“谋杀父亲”与“父亲之死”充分标示这个点，“法则”维度由此产生。人们太容易忘记，在神话中，父亲霸占的不只是母亲，而是“所有女人”；“乱伦法则”得到陈述以后，它所意指的无非是：“所有女人”都像母亲一样遭到禁止。

否则，“俄狄浦斯情结”的故事便需要添上太多续篇，也就是：

- “其他女人”等等是通过转移而来的；
- 这是偶然……“仿佛这只是偶然一样！”……总之，否则“俄狄浦斯神话”就毫无意义。换言之，从这个角度把握，阉割作为某种东西呈现出来，促使我们质询：主体通过怎样的对象卷入大他者的这一辩证法？这一次，它既不回应“索求”，也不回应“欲望”，而是回应“享乐”。

既然我们从弗洛伊德提出的女性享乐问题出发，第一步，让我们重复：享乐在这里首次作为问题敞开，是因为主体被它“划去”；我们过去在《焦虑》〔1962—1963〕的论述中称之为：“受窘”！

当然，这一切当时仍略微悬在空中；“那肯定是我讲得最好的一期研讨班，远胜其他”。

那些在随后的假期里用心反复品味它的人，可以作证。不过，当时第一排坐着一整排热切记录我所写内容的“下级军官”；但他们满脑子都在想别的事情，所以可以理解，他们什么也没留下。

主体面对这种享乐是“受窘的”。而使他受窘的这道屏障，恰恰就是欲望本身。因此，他把它投射到大他者之中；弗洛伊德以“被杀的父

亲”这一形式，为我们标出了这个大他者的“模型”。在其中不难认出黑格尔的“主人”，只因他取代了绝对主人。父亲占据死亡的位置，并被假定有能力承受全部享乐。

在弗洛伊德那里，这一点是真的，只须加上：同样在弗洛伊德那里，我们也能看出“这是一个幻象”：

- 并不是因为父亲的欲望在神话中被置于法则的起源，我们所欲求之物才因此可以最好地被界定为我们所不愿意的东西；

- 也不是因为事情如此，享乐便真的在那里，位于俄狄浦斯神话的支撑之后，继而位于我所谓它的模型之后……相反，这一切如此清楚地显明不过是幻象，以至于我们毫不费力就能在这里指出黑格尔的错误。我说的是《精神现象学》[注7]中的错误：它把……归给“主人”……

> [注7] G.W.F.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巴黎，奥比耶—蒙田出版社，1998年。

……那个投身于“纯粹威望的殊死斗争”的人——我希望你们熟悉这套老调——它把保有享乐特权归给“主人”，理由是奴隶为了保存生命而放弃了这种享乐。

我想，几期研讨班以前，我已经从这一侧把这个问题“稍稍”指出过一次。

这种奇特辩证法的“法则”究竟从何而来——仿佛只须“放弃享乐”，就会失去它！

可你们并不知道“享乐”的法则！事情很可能恰恰相反！

甚至可以肯定恰恰相反：享乐留在奴隶一边，恰恰因为他放弃了它。

“正因为主人挺立起自己的欲望，他才来到享乐的边缘，并在那里碰壁。他的欲望甚至只是为此而成，只为放弃享乐；也正因此，他投入了纯粹威望的殊死斗争。”所以，黑格尔的故事是“一个绝妙的笑话”；它完全无力解释主人们的社会究竟靠什么黏合起来，而这足以说明它何以是个笑话。

弗洛伊德却这样给出了解答：这个解答完完全全是同性恋的。

这确实是“不愿承受阉割”的欲望；于是，同性恋者——更确切地说，主人们——是同性恋的。弗洛伊德所说的正是：“社会的起点是同性恋纽带”；确切说，这一纽带同“对享乐的禁止”相关，也就是同“大他者的享乐”相关——只要性享乐所涉及的正是作为女性大他者的大他者。

这就是弗洛伊德话语中被遮蔽的部分。惊人的是，这个真理虽被完全遮蔽，却在他的话语中处处铺陈开来——正可谓“铺满整个场域”。

无论如何，从我们的经验来看，问题在于“男人与女人的性结合”。我们围绕它倾倒了关于所谓“生殖器阶段”、关于虚构的“奉献性”的一切蠢话。这个问题正是精神分析扮演最疯狂蒙昧主义角色的地方。它完全建立在这一点上：在两性结合中，在男人与女人的结合中，要使“欲望彼此协调”，存在困难，甚至存在极大的障碍。

换言之，女性享乐……人们一向知道这一点，从奥维德以来就知道：请读忒瑞西阿斯的神话，其中有奥维德的二十来行诗，我把它们收入了我的第一篇《报告》，也就是《罗马报告》，因为这是一个关键

点。后来人们在阿姆斯特丹谈论《女性性欲》时，我又试图让这一点重新进入讨论。

那场面可真精彩！怎么能够忘记“女性享乐”与“男性享乐”之间的深刻悬殊！

正因如此，在弗洛伊德那里，人们谈论一切——主动、被动，以及你们想要的所有极性——却从不谈男性—女性，因为这不是一种极性。并且，既然它不是一种极性，试图谈论这种差异也完全无益。这种差异只有一个中介：男人的欲望本身能够作为对象进入女性享乐。于是，“幻想的问题便向女人提出”。然而，她对“幻想与欲望恰恰是享乐的屏障”这件事，多半比我们多知道一点；这并没有简化她的处境。如此根本的真理在精神分析场域中竟会显出一副丑闻的样子，实在令人遗憾。

不过，这些真理必须被提出来，因为它们恰恰说明：我们的阐述为何正好进行到此时此地，也就是说……

与这种情形不同：身体的这一或那一所属之物，作为身体落入某一场域的对象，组织起索求与欲望；至于“欲望与享乐的关系”，只要它牵涉异性主体，中介便不再是一个对象，甚至也不再是一个遭禁止的对象……

……如果可以这样说，那种学究式的禁止构成了弗洛伊德式阉割的整整一个层域：从施加在小男孩或小女孩手上的禁令，一直到你们在大学接受的训练，

问题始终在于阻止我们看清……然而，阉割的另一项功能——人们把它同前一种混为一谈——要深刻得多；正是通过它，假如一种协调是可能的……

所谓协调，请按这种方式理解：我可以试着调配一个颜色样本，

在它旁边复制出某种具有同一色调的东西……而这之所以可能，正因为那个作为阴茎的对象……

……但我们不得不把它提升到被标作“阳具”的功能……受到一种处理；这种处理同我们从事这种“调色练习”时所用的方式相同。

出于论述上的自我约束，我今年没有展开这些事情；不过，它们属于不同于视觉与凝视的另一层域。“用任意一组三种颜色”，都可以调出一个小小的混合物，复制“任何一种”别的颜色——我说的是“任意一组”以及“任何一种！”——只须允许我们在调不出来时——这种情况发生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动用……动用“三色组中的一种颜色”，从另一边的样本中把它减掉。

换言之，某些对象的某些性质，必须由我们置于负号之下。

换言之，在男人—女人的关系中，哺乳动物享乐的偶然对象、会脱落的对象，必须能够被负化；男人必须察觉，自慰享乐并非全部；反过来，女人必须向这样一个维度敞开：“她缺少”这种享乐。我在这里讲的并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东西；但如果我们想赋予阉割关系某种关于其实际运作方式的意义，这就是它的真正基础。像我刚才那样一说，它最后简直成了一句拉帕利萨德式的明白话。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们看不见问题究竟在哪里：要施加在这个对象——“阳具”——上的负号，究竟具有何种本性。当然，我甚至不会试图在今年研讨班最后几分钟里讨论这些事情；不过，明年的研讨班——如果上帝愿意垂青——将叫作《幻想的逻辑》，正是为了回答这类问题。

不过，作为这门逻辑的导论，我现在就想请你们注意：所谓负面或否定性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终于值得我们取得一个并非仅仅局部的方向。为了不是破解它，而是开垦它，我将一如既往，从工具开始：当然是一把只能犁出粗略沟槽的木犁。很久以前，我曾经兴之所至地用三个层域标出它——我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曾在你们这些听众面前把它说出来——这三个层域是：I：“hiarien”；S：“gniaka”；R：“洞”。

第一个，即“想象界”——我用一种小小的“中国式”拼法把它写成“hiarien”——是我们人人都会说的话；什么时候说？当我们在一个场中发现空无的时候。如果你们以为这很容易解释——场与空无的概念！当然，格式塔层域立刻呈现出来；只是，它迅速受到象征版本的沾染——例如在“类”的概念中，“类”恰恰从空无的在场获得全部厚度——这必须使我们在运用它时极为谨慎。不管怎样，我用这种怪异拼法写下它，只是借机把它作为“过渡性工具”记住；我称它为“hiarien”，写法就如你们在这里看见的那样。[注]

> [注] hiarien 是把口语 il n’y a rien（“什么也没有”）依发音压缩并怪拼成一个词。拉康戏称它为“中国式”拼法；中文能译出“没有东西”的含义，却无法同时复现法语音节压缩与怪异字形，故保留原词并在注中说明。

无论如何，有一件事界限分明，同“hiarien”毫无关系；我在第二行用这个形式表达它。说到底，我没有理由不把这则轶事告诉你们：这个形

式借自一个非常聪明的小男孩的语言，因为他正是我的弟弟。他对我说："gniakavait"，以这种奇怪方式变位一个词根应当是"gniaka"的动词。好吧，"gniaka"这一层域是绝对"根本的"！[注]

> [注] gniaka 是口语 il n'y a qu'à（"只须 / 只消……"）的儿童式缩合；gniakavait 又把它仿作动词，按 il n'y avait qu'à（"当时只须……"）作了戏拟变位。中文正文保留造词的声音外形，并以"只须"译出它后来在句中发挥的语法功能。

通过它，一个当前状态被假定源自"某个东西"，而这个东西使它被截去了某物。

这是最根本的形式；整个范畴由此引入，而我们恰须在其中，针对否定的真正"象征性"确立方式来确定方向。因为"gniaka"可以走得很远：

- 它可以是一项缺失；
- 它也可以是一个起点："gniaka"取一个起点，人们把它叫作0，即中性元。

仅凭这个"gniaka"，你们就有了所谓"阿贝尔群"。这向你们指明了我们明年将被引向哪条道路，以整理我们的思考。不过，这个"gniaka"无疑也提示我们回到去年[注8]关于0的功能所说的内容：0缝合主体这一审级；我们还须阐明主体同欲望、也同阉割的关系。"Gniaka"——只须把负号加在阴茎上，阳具功能便确立起来，而我们知道自己对它所作的一切运用都是绝对盲目的。

> [注8] 1965—1966年研讨班《精神分析的关键问题》，1966年6月9日课。

此外还有“某个东西”，至少在我的层域中，对它既“没有词语”，也没有标记；理由很充分：如果我给它命名，或者假定它，它便会同“想象性”功能或“象征化”功能发生某种关系。

第三项，是我在这里三年来已经通过某种途径教你们认识的东西；我不能说那是触摸的途径，远不止于此：我尝试、促请并要求你们认同于数学语言中可以称作“tor　因子”（t.o.r.）的东西。它意指：“实在”中存在的东西——我们所面对的这个“实在”，恰恰位于那种必然性之外、彼处；这种必然性迫使我们只能把幻想的少许现实同“享乐”联结起来——这个“实在”见证了某种扭转。

这种“扭转”并不是弗洛伊德所说的ἀνάγκη〔ananké，必然〕，因为ἀνάγκη〔ananké〕与λόγος〔logos，逻各斯〕二者都属于“象征界”秩序。唯一具有强制性的必然，是λόγος〔logos〕所施加的必然。

而“实在”只有在更远处才介入——经验明白显示了这一点——在那些必然的解答中，因为解答总有多个，指定那个“不可能的”解答。这就是“实在”及其扭转的功能。这一扭转，正是我们试图在自己的场域层次把握的扭转。至少今年，我曾努力向你们提供材料，使你们能够为我们此后要说的内容标出：在一种共同的织物上，主体同大他者的关系如何被裁分；主体在能指中的这一降临如何支撑幻想同“实在”的关系；而一种无定限享乐的不透明性又如何由此向我们显现。

第22课 · 1966年6月15日

萨福安

拉康

我们已经听到了……

我这样说，是对那些既参与这场闭门研讨班、又出席弗洛伊德学派中题为“交流”的讨论的人说的……比如，今天在座者中显然有相当大一部分人构成了……这场具有某种性质的聚会……显然，我们听到了一篇“非常、非常出色的报告”[注1]——这一点我也已经指出过——总之，它确实“非常、非常出色”。不过，如果你们容我说一句“须加一撮盐来领会”的话，它在我这里恰好可以放进所谓“交流”的问题域中——你们刚才已经看到，我还没有讲完——也就是精神分析中的“科学交流”问题。

> [注1] 参见让·克拉弗勒尔：《变态伴侣》，载《欲望与变态》，巴黎，瑟伊出版社，1981年。

这大概并非“精神分析所独有”。想必还有许多别的配置会产生同样的效果。不过，在精神分析中，我们不妨称它为……事情总会略微变成一场“对付病人的密谋！”

正是这一点扭曲了事情，使得……使人终于说出一些多少越出了——如果可以这样说——严格科学思想的话；假如这些真是科学会议，我们本可以安守这种严格的思想。

既然已到年末，可以容我稍稍敞开心扉，谈谈我为何对这种风格有所保留：它构成“分析工作”日常的发动机，名叫“会议”；会上有一些称作“科学报告”的报告，但其实并没有那么科学。

尽管如此，在围绕变态伴侣而展开的某种临床记录层面，克拉弗勒尔为我们作了一篇出色的报告。我很遗憾他今天不在，否则我本可以再向他表示赞许。就是这样！

其中只缺少一点；这一点最后虽在讨论中说了，却没人听见，因为它没有被清楚说出。归根结底，要完全“科学地”谈论变态，就必须从一个简单的基础出发，而这正是弗洛伊德的基础：有人提到了、怯生生地引入了《性学三论》——好吧，“变态是正常的”；必须一劳永逸地从这里重新出发！

那么，临床建构的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有不正常的变态者？

为什么会有反常的变态者？这将使我们进入一种部分地属于历史的完整配置。因为历史事物之所以是历史的，并不只因曾经发生了一场意外；它们之所以是历史的，是因为某种形式、某种配置势必要见诸天日。

很清楚，这正是我们的朋友米歇尔·福柯所处理的同一个问题……

他今天也不在：他以为自己没有受到闭门研讨班的邀请，实在遗憾……归根结底，我们的朋友米歇尔·福柯在《疯癫史》或《临床医学的诞生》这类出色著作中处理的正是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参照过这些书。你们会明白为什么：第一，有“正常的变态者”；第二，有“被视为不正常的变态者”。

既然存在不正常的变态者，那么至少也会有人把他们如此看待；除非事情的次序正好相反，不过在这类问题上不应勉强任何东西。

不管怎样，我很遗憾克拉弗勒尔不在，因为我本想向他推荐“一本读物”，供他下一场必然更加出色的报告使用；正如我已经建议他的，他应当从我指出之处出发。也就是说，在他告诉我们的一切中，他最好的参照是……

不要忘记，他的报告题为《变态伴侣》，仿佛存在纯粹而简单的变态伴侣。这恰恰就是全部戏剧所在。好吧，先放下这个……这里所指的是让·热内标出的看法：在变态行为的实施中，总有一个位置，变态者极其在意把“虚假”的标记安放在那里。

我曾建议他从这里重新出发。今天我还要向他推荐“一本读物”；其实这是“人人都可以读的书”，我向你们所有人推荐。它能为我正在告诉你们的事情提供一个非常简单、非常有说服力的例证：必须从变态是正常的这一事实出发。换言之，在某些条件下，它完全可以不形成污点。因此，这本书……

我特地去书店取来，让你们看看它确实存在；我已经忘了它最近刚由法兰西水星出版社印行，所以你们现在可以看到它——书名叫《身着女装的舒瓦西神父回忆录》[注2]——请读一读……这样，你们会看见，从哪里才是处理变态这一层域的稳妥起点。

> [注2] 弗朗索瓦·蒂莫莱翁·德·舒瓦西神父（1644—1724）：《身着女装的舒瓦西神父回忆录》，巴黎，Ombres出版社，1998年。

你们会看到一个人，他不仅从头到尾都在自己的变态中完全自在；而且，这丝毫没有妨碍他在普遍敬重中成就一番事业，获得公众乃至王

室信任的一切标志，并以极其优雅的笔触记述一些在今天会把我们惊得彻底头晕目眩的事情，甚至会促使我们采取司法医学鉴定这类过分得离谱的措施。

更不必说这会把恶名牵连到高级教士身上；众所周知，他们原本特别精通这类实践，可到了今天，却以为自己不得不掩饰这些东西——它们其实只是同根本事物保持健康、正常关系的标志。以上就是我推荐给你们的读物。当然，无论在场还是不在场的某些人，都会从中得到印证：用人们的话说，我是一个“两次大战之间的资产者”。

我的天，人们的眼光多么狭小！我是法国大革命“以前”的资产者；你们想想，他们竟把我往后推进了这么多。好了，总之，在我为这本小书加盖“必读之书”的认可印章以后，你们会相信这件事的。

说到这里，今天我希望——既然这不仅是一场闭门研讨班，而且还是倒数第二场；我的天，最后一场我总得显出要为某些事情作结的样子——我曾犹豫究竟以什么收尾。也许，终究仍可以为今年闭门研讨班开端的一件事画上句号，也就是讨论我们的优秀朋友斯坦在那些文章中提出的立场。他谈的是所谓分析情境，并愿意把它限定在起始条件，也就是人们开始进行分析会谈时所作的承诺。随后，他逐渐谈到“转移与反转移”；问题是要弄清他在这两个标题下放进了什么。此后，他又谈了“精神分析家的判断”[注3]。

> [注3] 参见上文康拉德·斯坦1966年1月26日的报告以及3月23日的课。

相关知识卡 **康拉德·斯坦的分析情境：退行、自恋与拉康的批评**

曾经有过一场讨论；我没有出席全部讨论，因为我不在时，伊蕾娜·佩里耶—鲁布勒夫医生愿意主持其中一部分。这一切无疑值得补充，

也许还须澄清，而且也许要再……总之，再坚定一些。我的意思是……也许过一会儿，我们会开始稍微谈谈它；假如进展顺利，这也会促使我们请斯坦下次前来，因为不在他面前作结，也不十分合适。总之，也许等一会儿还是会触及它，我是说，为此开个头。

我希望的是……

幸而我已经为此取得“一点保证”，至少会有人来回应我……我希望的是，归根结底，在我向你们讲了一年以后，你们头脑里想必仍留下了不少东西……

我讲过一些东西；其中有些至少对你们一部分人而言全然是新的，另一些则真正第一次以一种不仅堪称典范、而且完全严密的方式得到结构化。我甚至大胆地加上——由此承担了某种承诺——它们是决定性的。比如，想一想我向你们给出的凝视功能图式……好吧，如果有人向我提出有关问题，我不会不高兴，也不会为此遗憾。

当然，关于“不应这样做”的传言正得到证实；理由是，比如上次我仿佛对奥杜阿尔先生说了些什么……

归根结底，他是今年在这一层面唯一让我完全满意的人，

也就是说，他干脆冒险去做我所要求的事：有人回应我……奥杜阿尔先生确实犯了“一个大错”：在透视图式中，他把艺术家的眼睛贴在了可以称作“画面平面”的地方；而这发生在透视法的奠基时刻。好吧！

不过，你们应当明白这一点：既然在座人人口袋里都揣着一点自恋，也就是“不让自己出丑”的念头，你们总该告诉自己，奥杜阿尔先生所做的事情，恰恰就是——相对于阿尔贝蒂而言……

我曾告诉你们，阿尔贝蒂处在那个著名透视图式中的什么位置——我在黑板上画过它，总之，费了不少功夫——阿尔贝蒂奠定了它，一个叫维亚托尔的人又重新采用了它；他之所以叫这个名字，只因他的法语姓氏就是佩勒兰……好吧，奥杜阿尔先生所犯的错误，恰恰就是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犯过的错误。

也就是说，只要查阅阿尔布雷希特·丢勒的著作[注4]，就会非常清楚地看到：某些错误、图式的某种位移，恰恰源自这种最初的错误；而你们仔细观看丢勒那些颇令人倾覆的“透视图”时，会看到这种位移也确实在其中产生了影响。

> [注4] 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测量法教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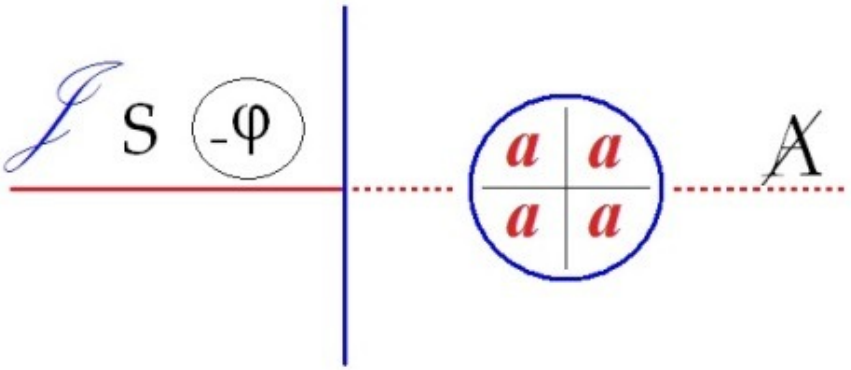
所以你们看，奥杜阿尔先生并非与坏人为伍。

当然，我不能在这里向你们证明这一点，因为那需要……总之，这很容易；对有兴趣的人，我可以提供参考书目。有一位美国人极其漂亮地揭示了这一点；他写过几本关于艺术与几何的机敏小书，其中一本专门讨论透视法的地位如何从阿尔贝蒂、维亚托尔与阿尔布雷希特·丢勒那里显现出来。由此，一切都能得到很好的解释。

这一切之所以能够得到很好的解释，恰恰因为阿尔布雷希特·丢勒是从一种——我姑且这样说——根本“相反”的进路开始提出透视问题的：这条进路源于对光点与阴影形成的考察，也就是先前的位置；我已经向你们表明，它同透视建构的位置完全相反。后者的目的截然相反：不是构成被照亮的世界，而是构成“主体性世界”——如果你们容我作出这一显著的对立，而此前全部论述已对这个“显著而有根据

的”对立作出说明。正因为丢勒关心的是立方体的阴影，他才画不出“立方体的正确透视图”。

好吧，这一点说过以后，奥杜阿尔先生也就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也就是说，他只是受到了某种声望的影响，而除我们以外另一些人——甚至可以说更伟大的人——也曾屈服于它。我希望这能鼓励那些对我讲过的东西心存疑问的人提问，比如针对我上次围绕这个图式所说的内容；它确实终于提出了一些极其重大的问题。



在这个图式上，J位于后方；而我们同主体一起，相对于大他者之场处在这样一个位置：凡涉及主体同享乐之关系的东西，都必须通过与大他者相连的东西作为中介而来到主体那里。它确实如此显现为与“某种”功能相连，而这个功能并非不是[...]；因为这个装置通过《宫娥》的例子、通过委拉斯开兹所产生的结构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

可以说，在透视与凝视的装置中，我们能够设想并使之共存的，并不只是自恋层域之所以共存的东西；我最初全部教学努力，就是把自恋层域同它所具有的关节分离开来。问题不仅在于它们如何共存，而且

在于：在某个对象——凝视——的层次上，一方如何能够给出另一方的钥匙；作为象征世界之效应的凝视，又如何成为“自恋性捕获”真正的动力、真正的秘密。

因此，在S同A的这一关系中，我们得以确立我谈过的这个“对象(a)”的功能……

如果你们愿意，其中一个对象享有特权；它受到的研究最少，

却又是一切关于事情本身的关节中最根本的对象……此外，还有位于“前方”的对应关系，或者如果你们愿意，(－J)的等价关系；也就是说，“阳具”作为主体同“享乐”之关系中涉及的对象，只要它要求在性关系中同另一方结合……

啊，斯坦，你来了。到这边来。我刚才还在遗憾你不在……好吧，这显然提出——或者说，在我看来提供了——提出各种问题的机会。

当我说自己第二次绕行，再绕一遍弗洛伊德式的“莫比乌斯带”时，你们在这里看到的绝非一个例证，而是我想表达之事本身：俄狄浦斯戏剧——我想我已为你们作了“足够清楚的阐明”——还有另一面；我们可以从头到尾沿这一面阐明它，完整地绕它一圈。

俄狄浦斯戏剧，是谋杀父亲，也是俄狄浦斯享用了母亲。我们也看到，围绕法则以及由此产生的一切，事情仍悬置在一个永恒的追问中；因为正如我常说的，俄狄浦斯并没有“俄狄浦斯情结”：他当然“安安静静地就做了”，只不过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做的。

不过，我们可以用另一种方式照亮这场戏剧，并说俄狄浦斯的戏剧——无论如何，悲剧的戏剧，而且这一点再清楚不过——产生自这样一个事实：俄狄浦斯是求知欲望的英雄。

不过，正如我早已说过的——我在这一语境中再说一次——我很久以前就说过俄狄浦斯的终点是什么[注5]：面对破裂的屏幕上关于其后之物的揭示，俄狄浦斯——我曾这样表述——双眼落在地上；俄狄浦斯挖掉自己的眼睛，而这同视觉毫无关系。它确切地象征了落入这两者之间……

> [注5] 参见1959—1960年研讨班《伦理学》1960年6月29日课，以及1962—1963年研讨班《焦虑》1963年3月6日、7月3日课。

落入德扎尔格以“轴”命名的这一空间；

我已经把它等同于我们所谓的“此在（Dasein）”——这是唯一可能的等同……俄狄浦斯的凝视就落在这里。

这就是悲剧的终点、结论与意义。至少，我们既可以从这个反面翻译这场悲剧，也可以把它放在正面，在那里，它向我们揭示奠定法则的生成性戏剧。

这两件事是等价的，正如“莫比乌斯带”只有绕行两圈才真正同自身接合。

好吧。既然已经讲到这里，只须再加一项看法：“对象(a)”及其功能的考察——只因这项考察，我们才会提出涉及阉割情结的关键问题——也就是：使某个 -φ能够在一种逻辑结构中发挥作用的“群”如何出现？

这里必须使用一个数学术语。长期以来，我们已经使用 –φ，却或多或少没有把它精确界定。

好吧，这正是“对象(a)”决定性地引入的东西；凭借它，我们将能够着手处理一块真正的处女地——对一个在当今这样出产的精神分析家而言，可以说是处女地——也就是阉割情结。

非常清楚，人们永远只以一种提纲挈领的方式谈论它，仿佛人人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当然，由于我在这里那里谈过一点，人们总有一点模糊的印象；但终究还远远“不够”，甚至不足以让利科先生在那本引起如此大兴趣的书中放进一丁点相关内容。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甚至不留痕迹。这说明别处也没有谈论它。我们实在有必要能够就阉割情结说点什么。而在我看来，上一次我已经开始围绕这一点讲出“某种得到非常坚定阐明的东西”。当然，我们至少可以勾勒计划，并说：明年我们将谈论这样一种逻辑；相对于今年已经确保的关于“对象(a)”的第一层面，它使我们能够定位那些非常具体地归属于 –φ功能的东西。

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因为我们已经谈过俄狄浦斯神话：俄狄浦斯主义当然是基石；如果我们看不出弗洛伊德建构的一切都围绕俄狄浦斯组织起来，我们就永远绝对看不见任何东西。只是，仅仅解释俄狄浦斯，还不足以使你们知道弗洛伊德在谈什么；除非你们已经熟练掌握我在你们面前铺陈的词汇，知道有待阐明的是欲望的根基。只走到这里，甚至还没有确保性欲的场域。俄狄浦斯神话根本没有教给我们：作为男人或女人意味着什么。这在弗洛伊德那里完全摊开在

眼前。正如我上次所说，他从未提出男性—女性这一对，只说恰恰无法谈论它；这个事实足以证明这种界限。

只有从器官与阳具功能开始介入的时刻起，我们才开始提出同时涉及男性性欲与女性性欲的问题。如果不作出这些“区分”，就会陷入最彻底的混乱。

必须说，这里也许有某种东西在根基处发生作用：弗洛伊德没有完成——为什么他自己没有完成呢？——他的第二圈绕行。为什么他要把它留给另一个人完成？

这个问题也可以提出。正是在这里，我感到十分为难。经验教导我——以我的损失为代价教导我——劝我只能极其谨慎地推进。

说实话，这并不完全符合我的天性；但归根结底，别人替我采取了谨慎措施。曾有一系列紧密交织的事件，最终使我有一天在第一课便中断了题为《父之名》的研讨班〔1963年11月20日〕。你们会说，对精神分析家而言，赋予事件以意义终究十分自然；无论其中发生过怎样偶然的曲折、期限与小小“口误”……

它们恰好可能使事情在那一天到期：也许有人更清楚我要说的东西有多重要，因而悉心确保我会信守在某些情况下不把它说出来的诺言……这足以说明，这里终究存在“某些理由”；它们恰恰触及这样一个“微妙的事实”：“弗洛伊德止步之处的界限”。

如果如此多的事情最终汇成这些奇特的约会——不能说它们本身是进步的——那正因为弗洛伊德那里有某种人们无法承受的东西。如果我把它从他们那里撤走，那些恰恰凭借这个“不可承受之物”来支撑自己

的人，还能用什么来“支撑自己”？我们必须相信，这个东西在某个方向上已经走得足够远，既然人们不能再往前一步。

因此，我只会以一种极轻的方式、轻轻一点，仿佛投下一道负因子的阴影，提醒你们：我们终究要感谢弗洛伊德，因为似乎直到生命终点，他仍认为下面这个问题中栖居着一个谜；他这样表述：“女人想要什么？”[注6]

> [注6] 欧内斯特·琼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生平与著作》，巴黎，法国大学出版社，3卷，2006年。

我们要感谢一个蠢女人把这句话转述给我们；弗洛伊德曾在她面前，就这样把自己肚腹上的钱罐敞开了口。

有些时候，就连偶像也会把自己抖落出来。必须说，要做到这一点，场面得格外骇人。

“女人想要什么？”

正如琼斯所说，弗洛伊德有一个无法不引人注目的特征。这个“特征”只有用英语才能表达得好、标示得准，人们称之为“uxorious”。法语里不太使用这个词。也许我们还不够“惧内”[注7]，所以才不用它。不过，无论是哪一种情况，无论惧内与否，都只是人在这一点上所处之位置的一种具体规定，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惧内并不比不惧内更幸运。

> [注7] 法语旧称 uxorieux 指听任妻子支配的男人。

他是“惧内的”，而且不是对随便什么人惧内。人们说：“恺撒之妻不容受到怀疑。”

这类话用得很多。比如“文如其人”——这是一条不准确的引文，不过没关系——这种话总能奏效。只要放在恰当的位置，就不容争辩。

它是什么意思？怀疑什么？也许是怀疑她是一个真正的女人？

弗洛伊德的妻子——完全可以断定，她是他唯一的女人——不可能成为这种怀疑的对象。

弗洛伊德笔下留下了一切最惊人的痕迹。在分析“伊尔玛注射之梦”时，他使用了“sich sträuben”，即“竖起毛来、抗拒”一词；它以某种方式属于这种风格，这种“迂回表达（Umschreibung）”、这种曲折的风格。这几乎是我唯一能够援引他的风格来支持自己之处：他把我们带向“自己想去的地方”，当然不把它明说——归根结底，女人这回事，“sträubt sich”，会抗拒；就像弗洛伊德夫人一样，而这终究十分麻烦。

是的，这显然提供了一个坐标点，使我们觉得自己知道：

- 问题在哪里提出；
- 疑问在哪里，我们又走到了哪里；
- 那些仿佛具有结构性质、内在于所涉及概念之结构本身的屏障在哪里；

这解释了许多事情，例如……自此以来的精神分析史；在那里，不仅女性气质及其问题，而且女人们自身，是以怎样的方式确立其价值的。

也就是我们精神分析共同体中可以称作“母亲们”的人。她们可真是些古怪的母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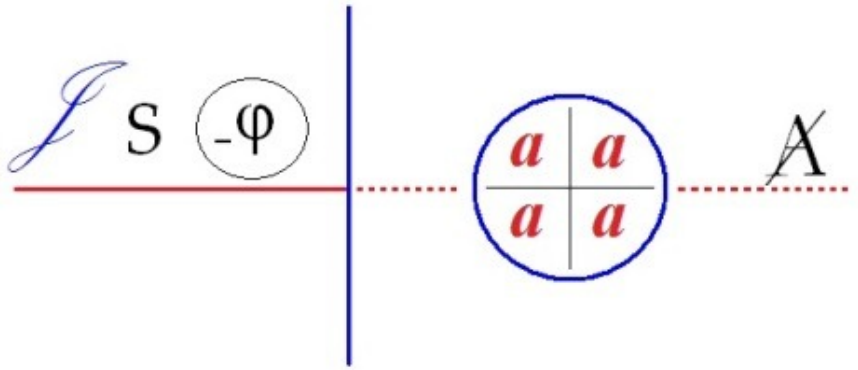
——伊蕾娜·鲁布勒夫：“听不见！”

那也许更好！

说到这里，我希望有人提出一些问题。比如，上一次我把主体放在——如果可以这样说——由大他者辩证法构成的反射表面之前；为了在那里标出享乐的位置，也需要某种幻象秩序。我明确向你们指出了许多事情，也顺带处理了我所谓黑格尔的错误：认为享乐在主人一边。

这令人惊讶：如果主人同“绝对主人”——也就是“死亡”——有某种关系，那么把享乐放到主人一边，究竟是怎样一个怪念头？死亡这一审级并不容易运转。还没有人设想过，享乐会居于这个神话性的存在者之中。因此，黑格尔的错误确实是一个可以分析的错误。

在这里，我们切身触及黑板上写出的这个结构：



本质、我们所要面对的真正戏剧性纽结，就铭写在这些小小字母中：为什么正是在A的位置、在大他者的位置——能指关节正是在那里形成——我们才会确立一种定位目标；而它趋向“享乐”，确切说，趋向“性享乐”？

至于－φ，也就是那个器官、那个“特殊的”器官，我已经向你们解释了它的偶然性；我的意思是，它本身对性结合的完成绝非必要。它之所以采取这种特殊形式，出于一些理由；在我们能够就女性演化方面阐明一点点开端以前，好吧，我们只会把事情保持为它本来的样子。

只须稍稍观察动物的动物学运作，就会知道：本能只涉及一个问题——生命体究竟能够拿一个器官做什么？我们必须用这一最初把握取代一些愚蠢原则。不仅功能不创造器官——这显而易见，而且它怎么可能做到？——要给一个器官找到用途，还需要极大的机巧。仔细观看时，事物的实际运作确切向我们表明了这一点。生命有机体只能尽力运用最初给予它的东西；至于阴茎器官，好吧，它无疑“能”做点什么，但能做的很少。

无论如何，很清楚，它进入了某种功能，承担着一个比性交稍微复杂一点的角色；正如我上次为提供样本而说的，这个角色就是在男性享乐与女性享乐之间调出协调。

这完全以牺牲男性享乐为代价；不仅因为男性只有把阴茎器官降到对象功能的等级才能抵达这种享乐，而且还带有一个极其特殊的负号。明年，我们要通过博学的逻辑研究，看看并精确规定这个(－)号同那些通行符号相比，究竟具有什么功能……

况且，人们确实在使用这些符号——我说的是日常使用，例如这里的大多数人——

却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其实，只须查阅一些出色的数学小册子，事情就非常简单。

这些书现在随处可见；感谢上帝，这一切如今终于得到普及，虽然迟到了一百五十年，但行善永不嫌晚……人人都可以看出，“负号”依不同的群而可能具有——而且会引入——极其不同的意义。因此，问题是要知道，它对我们而言是什么。

不过，先放下这一点。让我们把－φ整体取来，并说……我们说，有待在性结合中建立的同一种享乐的关系，恰恰把优先位置让给“女性享乐”。假如女性享乐不是恰好位于我在这里标作A的位置——“大他者的场所”——它就不会具有这种重要性。当然，这丝毫不意味着“女人”一开始就比我们“男人”更在那里；因为她同样确切地处于S的位置，而他们两个，“可怜的甜心儿……”

就像“不朽的朗戈斯”那篇著名故事[注8]里的人物一样……手中拿着－φ这份漂亮甜点，彼此对望，思忖着：为了在享乐方面取得协调，究竟该拿它怎么办？

> [注8] 朗戈斯：《达夫尼斯与克洛伊的牧歌式爱情》，南方行动出版社，1993年。

那么，在这以后，人们也许最好别再把完美夫妻的存在说成生殖器成熟的一项既定事实。因为，奉献性——这该死的奉献性，我终于几乎不再谈它，而且也不该永远谈下去；总有一天，我们必须一劳永逸地合上这个括号——当然也不应被当作一架风车。我有些学生正这样看

待它；他们不分青红皂白地总向它冲去，甚至在它根本不在的地方也如此。

但有一点仍然肯定，必须说……有些事情终究应当说出来……例如，“奉献型丈夫”确实存在。有些人的奉献程度简直难以想象。这种人确实遇得到！它有不同的起源。

不应预先败坏它的名声。它可能有高贵的起源，例如受虐狂。

这是一个极好的位置。从性实现的角度看，经过——总之，我开始有些经验了，是的——毕竟三十五年了，“也真够久了”。当然，我见过的人不算多，谁都一样。时间那么少。不过，“即便如此”，我从未见过它在一个女人身上真正触发——你们知道的——“这个”！

它会触发非常、非常奇特的反应与滥用；从外部、从道德主义观点看，这些滥用十分明显。无论如何，女人会反复拨弄“丈夫遭到阉割”这根弦，而且非常执着。

这并非不言自明，也不是图式已经蕴含的。你们明白，当我把负阳具(－φ)说成必须使协调成为可能的振动样本时，并不意味着阉割只留给男人。分析理论的全部意义恰恰在于看出：阉割概念也会作用在某个并非天生就遭到阉割的人身上；若问题涉及阴茎，它甚至未必已经遭到阉割。

正是在这一视角中，我们应当追问“女性化的男人”在性揭示方面何以具有非凡效力；因为这种非凡效力确实作用于许多女人——我不说“女人本身”，“女人本身”确实存在，她存在于“对象(a)”的层次。因此，这

类男人对此项操作具有非凡价值。他们的成功绝对不容怀疑。人们“一向”知道这一点，而且始终看得到。

一个女人若曾有过这种黄金型、斧凿般粗硬的丈夫——总之，就像《漂亮女屠夫》里的屠夫——只须遇到一位“有嗓音的歌手”，你们就等着听后话吧！这些事实真是“大得摆在眼前”：它们是日常观察，每天重演，填满了……我们分析家能够知道，女人同“有嗓音的歌手”在一起有多么快乐！

她们在那里重新找到自己，这实在“惊人”。我并没有说她们会留在那里。她们不留下，是因为“那太好了”。欲望与享乐的关系问题又会重新提出；不过，终究必须知道享乐从哪一侧可以抵达。我感觉自己就这样慢慢滑向——我也说不清——三十年精神分析回忆录的坡道。而且已到年末，我们终究算自己人；请原谅我讲一些介于陈词滥调与丑闻之间的话。不过，一旦忘记这些话，它们恰恰会真正为最持续不断的胡说八道敞开大门。

尽管我作了种种努力，这种胡说八道在这一地区乃至邻近地区仍然绝对通行，而且占据支配地位——必须承认这一点。好吧，既然已滑上这道斜坡，终究还应当……对了，我刚才说要结束……处理掉奉献性的故事，从此再也不谈。

不过，既然我谈到语境，就终究必须记得：这个观念曾在什么环境、怎样一个狭小马戏圈里绕场表演。也就是要说出几个名字；总不该由我重新给你们一一翻出来，对吧。

它并非出自什么坏地方。有一个叫爱德华·皮雄的人[注9]，他只有一项错误：他是莫拉斯主义者；这是“无可挽回的”。他并不是唯一一

个。两次大战之间，这种人相当多。他同几位“临床家”一起炮制了这个观念。总之，对吧，既然是在两次大战之间，那些从第一次大战幸存下来的人，你们知道，也没有多出色。

> [注9] 爱德华·皮雄（1890—1940），法国医生、精神分析家，尤其因同勒内·拉福格一道成为法国精神分析真正的奠基者而知名。他拥护夏尔·莫拉斯，是法兰西行动的积极成员；这位虔诚天主教徒逢人便说，他只会从“弗洛伊德先生”那里接受符合民族趣味的东西。他同舅父雅克·达穆雷特合著法语语法著作《从词语到思想》。关于拉康与皮雄围绕奉献性的争论，参见C. Ragoucy：《奉献性：最初的争论》，《精神分析》2007年第1期，总第8期，第29—41页。

后来它又被重新采用。它又被采用了，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我其实知道！不过不该由我来告诉你们。

当时处在某种新得多的语境中，背后有一段归根结底同奉献性毫无关系的历史。这段历史涉及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方式；它从某种被称作以“客体关系”为中心的分析技术中涌现出来，因为这项技术以某种方式引入了阳具幻想，尤其是“强迫神经症”中的这种阳具幻想。就是这样。

围绕这种阳具幻想展开的一切，我的天，我已在研讨班的多个时期谈过多次，也反复返回过它；至少人们应当已经从细节与技术运用中，看清它的动力、强行推进之处与滥用之处。对此，我确实只能说……甚至无法说出一句话来概括我在细节中展示的一切，而只能表明我对其中之物的根本看法。

其中有某种东西格外受青睐，是因为发生了一种普遍滑移：整个分析理论不再参照别的，只参照“挫折”。我的意思是，一切不再围绕“转移”与“索求”这两个最初焦点运转，而只围绕“索求”运转。

当然，“转移”的效应没有受到忽略，只是被放进括号，因为人们终究期待它会自行消退。相反，在索求这一边，特别是既然事情确实会在这一点上发生——它们的确会发生——但发生的根本不是你所说的那样，斯坦。不过，如果你下次再来，我们会谈到它。

分析家在会谈中相对于病人的位置，肯定不是同你所谓现实原则相连的那个扰动之极。我认为必须回到这个真正具有构成性的事实：“他的位置，是成为那个一无所求的人。”可怕之处就在这里：“因为他一无所求”，而我们知道主体从哪里出来——尤其当主体是神经症者时——“人们便把他没有索求的东西给他”。

然而，能够给出的只有一件东西、只有一个“对象(a)”。只有一个“对象(a)”同这一特定索求——即大他者的索求——相关。这个对象也在“轴”中、在两者之间被找到；凝视、俄狄浦斯的眼睛，以及我们在委拉斯开兹的画前什么也看不见时的眼睛，都落在那里。在同一空间中，“屎如雨下”。

我们通过结构与历史知道，在“向”大他者提出的索求——对乳房的索求——以后，会出现“来自”大他者的索求。它确立纪律，是主体形成的一个阶段：“要这样做，要按时、照规矩做。”“屎如雨下”，嗯！这个表达终究不会让精神分析家吃惊，他们对此知道得不少。说到底，精神分析谈的全是这回事。

但不能因为只谈这回事，就能在它存在的每一处都认出它来。总之，“屎雨”显然不如但丁笔下的“火雨”优雅，不过二者相距并不太远。

而且，《地狱篇》里也有屎。只有一样东西，但丁既不敢放进“地狱”，也不敢放进“天堂”；我下次再告诉你们。这终究十分醒目。

另外，我们分析家不得不搬运便桶，这种事终究也不会为我们赢来桂冠：整整一个世纪，资产阶级一直认为，这种搬运——我所谓搬运便桶——恰好是兵役中最具教育意义的事情。正因此，他们才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当兵。别以为事情已有巨大改变；如今只不过又加上踢胫骨和让人趴伏在地的其他操练，施加在新兵身上，或者施加在后来交给他的那些人身上，例如在殖民事业中。人们理所当然、很自然地为这一小小复杂化感到惊慌；但基础仍是搬运便桶。

我看不出分析家在这件事里增添了什么特殊功绩。人人都确信，屎同各种教育有最密切的关系，甚至同男子气概的教育有关——你们看，做完这些事以后，一个人离开军营，就成了“男人”！我现在所说的是一种理论，有些人很清楚我指的是哪一种：如果你们仔细重读围绕这套阳具辩证法、尤其针对“强迫症者”说过的一切，重读“触碰”与“不可触碰”、谨慎与“贴近”，这一切都带着屎味。

我的意思是，这里涉及一种肛门阉割，也就是确实在来自大他者的索求关系层次、或者肛门期层次介入的某种功能；它是第一次从横杠一侧向另一侧运转，使一侧带正号的东西在另一侧带上负号。

一个人给出或不给出自己的屎。由此，他抵达或抵达不了奉献性。一切给予、一切礼物都是如此——我们一向知道这一点，因为弗洛伊德从未说过别的——当一个人给出自己拥有的东西时，他给出的永远只是屎。正因如此，当我曾经试图用一种——就这样——“闪现”来为你们界定爱时，我说：“爱就是给予自己所没有的东西。”

当然，仅仅重复这句话，还不足以知道它是什么意思。

我意识到，自己略微滑上了吐露隐情的坡道；现在我要用一件“来得正好”的事情作结——是不是，萨福安——它正好接在我刚才的话之后。请你给大家作那篇小小的“报告”吧；你曾好心事先准备了它，与你带来的内容完全在同一条线上。

一刻钟够吗？不够的话，就放到下次。

保罗·迪凯纳：“我们有时间。”

萨福安：那要看情况。

拉康：你觉得讲完自己要讲的东西需要多久？

萨福安：二十分钟。

拉康：那就立刻开始吧；讲完正好两点零五分，那是我们通常结束的时间。我真是无可救药。

穆斯塔法·萨福安

这篇报告的题目是：“强迫症者爱情生活中女性对象的双重化”。

我选择这个题目，恰恰因为它把我引向拉康先生已经宣布明年将要处理的同一些问题；它也使我能够衡量，对分析家而言，这个问题得到处理具有怎样的意义与重要性。

在把它提交讨论以前，我先向你们介绍一份材料。它确实很具典范性，足以使我们轻易标定这一双重化之下的结构；不过，你们肯定也会看出它极其典型的性质。

在分析的某个时刻，一位病人坠入爱河，并伴有性层面的无能。谈到他所爱的人时，他说："仿佛她身体的每个部分都被放进一个匣子里。"

我由此推断，他对所爱对象的身体抱有一种保护意图；但这同样针对他无法投入使用的"阳具"，因而也意味着这两项彼此认同。

当然，这需要大量澄清；它们恰好会在下文逐步显现。此外，也许值得强调：使他着迷的同一个对象，有时也会使他产生某种厌恶。

例如，他会注意到她的手腕处缺少收束；这也意味着他并非没有逐一细看这个对象，而这表明他同对象的关系并不完全外在于"自恋维度"。

我说"确实"，因为这是他自己给这段爱下的定性。不过，重要的是，在这段被他称为自恋性的爱情之外，他还以一种他本人称为"依附型（anaclitique）"[注10]的方式，同另一位年轻女子保持联系。她不仅把他放进一个完全被动的位置，还明确要求他听任自己被放进这个位置，好让她把自己喜欢的一切变态兴奋倾泻在他身上。

> [注10] 指由出生后第一年缺乏母亲照料而产生的依附状态。

因此，整个处境在他那里通过这样一个幻想得到表达。他说，自己飞向心爱的女人，阳具勃起并指向下方；但另一个女人插到中间，在飞行中一把抓住它、吮吸它；等他到达时，它已经疲软。

正是在这一语境中，病人讲述了一个梦：他看到自己的朋友——姑且叫巴罗——穿着一只尼龙丝袜；看到这样包裹着的腿和部分大腿，他

进入了同看到女人时完全相同的兴奋状态。他问自己："这只丝袜是什么？"我回答他："这是一个匣子。"

我暂且不谈这个解释后来的效应；它曾使他一度恢复性能力。重要的是，他立刻回应说，自己本来要投身于一些同性恋故事，但现在发现朋友巴罗之所以牵涉其中，只是因为他的名字——例如"丝袜（bas）"与"巴罗（Barot）"；问题的纽结在这个匣子里，而他在这里确实擦到了变态的边缘。

这个"匣子"是什么，他往里面放了什么？他忍不住说：是啊，说到底为什么不呢，因为匣子里也会放珠宝，而珠宝就是屎。紧接着，他讲起"自慰"的故事；他说，那是肛门自慰。材料就是这些。

匣子就是帘幕。拉康先生曾在关于客体关系的研讨班中，以"帘幕后方"为主题处理过帘幕；也就是说，它甚至不是身体的实像"i(a)"，而是虚像"i'(a)"。这里我显然参照拉康先生刊载于《精神分析》第6期那篇文章中的光学图式。依照那篇文章，有一点值得强调：最直接的把握并不是对直接之物、而是对中介之物的把握；并且，"i(a)"在分析人为设置之外从不被把握。

我的意思是：如果没有孩子转身朝向的他者之中介，甚至不会有一种承担，也不会同镜像发生简单关系。否则，镜像不只是一种不可言说的偶然性——因为偶然性概念已经预设了网络概念——它更会是某种注定遭到排斥的东西。换言之，身体形象一开始就是作为"i'(a)"发挥作用的；性行为在"大他者之场中"运作，整个程序——真正的分析程序——则把主体置于一个位置，"使他可以实在地看见i(a)"。

拉康——他永远不可能看见它；它是在图式中建构出来的，而且始终如此："i(a)是一项建构。"

穆斯塔法·萨福安

是……是的，当然……正是这样，是的。不过，匣子的内容提出了更多问题：匣子的内容有时——对吧——显明是"屎"，有时则是"阳具"。这个"阳具"又同所爱对象认同，于是问题出现了：要么某个地方存在翻译错误；要么一种正确翻译会提出这类悖论——鉴于……鉴于经验，这大概正是实际情形。那么，让我们重新考察"这项翻译"、这组等价关系："阳具=所爱对象，阳具=女孩"。可以看到，我是以一种"保护"意图的在场来支撑它的。由此问题是：他保护阳具免遭谁的侵害？肯定不是免遭那位正经姑娘，而是免遭另一位——他称作变态者的女人。

这照亮了一个我此前没有强调的事实：他的全部"焦虑"确实都投入了他同心爱女人的关系，也就是同欲望之极的关系。由此可以看出，把它称为欲望之极，比像他本人那样只谈"自恋"恰当得多；因为他只看见"i(a)"，而原则上可见的只有"i'(a)"。他的全部焦虑都投入这里——他能做到吗，还是做不到？——而在他同变态姑娘的关系中，这种焦虑却完全缺席。因此，我们可以把她指定为索求之极；由此也可以看出，这比像他本人那样谈依附型关系恰当得多。

所以，必须更仔细考察他对自己和后一个女人之行为的描述。由此可以看出：她把他当作一个"阳具"使用；不过，这里的意思是一个受她任性摆布的对象，而不是他所携带之器官的意义，因为后一种意义恰恰被排除在这段关系之外。她使他的"实在阳具"退出回路，并且无疑

通过这种阉割来确保自己的欲望。她的变态操演之所以愈演愈烈，无疑又落回一种不可能性：可以说，她不可能整合自己实在地成为一个“对象(a)”——也就是“可交换对象”——这一处境。

当然，也很难在这里援引许多能够照亮这一事态的观察。也就是说，正当主体不可能——如果可以这样说——把自己“拥有为”一个享乐对象时，他才会想到自己就是这个对象。因此便出现了一个悖论：这样一个存在者，其全部思想必然是假的。当然，人们不知道这一点本身就是上帝；正因为不知道，宗教以及宗教生活的各种形式，才始终同罪疚保持着结构性联系。

此外，我们也可以追问：能否说无意识就是这个东西，也就是一种虚假的知识，而它的说出却构成真；它不位于任何地方，只位于一种悬而未决的“自有（s'avoir）”所留下的裂口中。

不过，通过所有这些看似哲学的考察，我只是在预先说出这项工作或者说这份观察的“临床结论”。

那么，回到这位病人：这里存在一场误解，或者也许是一种默契——对吧，正是在这里，我很难作出裁断。一场误解将会确立起来，并标记他同“变态姑娘”的关系；若非后果严重，我会把它称作滑稽的误解。这是一场可以澄清的误解。

情形是：随着那些会使他完全受她摆布的诱惑不断增强，也就是随着同这件事相连的诱惑增强——“i'(a)”在其交换方式中试图同(φ)重合；或者更简单地说，他察觉自己是一个对象，它并不使她平静，却使她体内的某种东西平静下来——他除了用自己的阉割来确保她的阉割之外，再无其他办法，却没有发觉这件事早已完成。

也就是说，他没有发觉，这种阉割不仅在双方是同一个，而且其意义在于：同一个对象同时为一方或另一方所缺少……

它显然不是“实在阳具”，因为这并不为他所缺少；至于她，

可以说它也不为她所缺少，因为她所不要的恰恰就是它……这个对象是同该器官相连的形象，也就是“想象的阳具”；它由此作为(－φ)发挥作用。正是从这一角度，我们可以说：阳具位置使主体不是既非男人也非女人，而是二者之一。

换言之，归根结底，这里所涉及的是：“中和”并“切断回路”的不是随便什么器官，而是他的“阳具”；这将把与该器官相连的形象之功能提升为(－φ)。

换言之，换一种说法，“i'(a)”越趋向认同于(φ)，主体就越趋向——不是认同，而是可以说把自己消隐为(－φ)，也就是一个永远在别处的“阳具”。

从这里出发，我们所看到的并不是他如何把心爱的姑娘认同于“阳具”……

因为这不是一项由他“完成”的操作；更确切地说，他被卷入了这项操作……但我们可以看到，当他投入这条道路时，眼中只见自恋；其余的东西——也就是姑娘同“阳具”的认同——则是大他者的索求已经从欲望出发被唤起的效应。

奇怪的是——但这在我看来值得更仔细考察，总之，我要放慢一点——我们勉强可以说，(－φ)就在下面这句话中得到意指：“仿佛她身体的每个部分都被放进一个匣子里。”

而这场误解必然会反弹成一场——如果可以这样说——“错发牌”；它将像原初标记一样标记他同心爱姑娘的关系。这里的“错发牌”并不在于心爱姑娘是“阳具”，相反，在于她不是阳具；更确切地说，在于她是(－φ)，即对他者阉割的保证。这是因为主体的全部性爱生活都被如此置于依赖大他者之全能的标志之下。

这里，我要处理这个问题，或者说出现的另一个问题：如果她的身体被“认同”于屎，那么事情就清楚了。

我是从这一点出发说的：只要主体的全部性爱生活被置于依赖大他者之全能的标志下，同一个心爱对象也被认同于粪便，就不足为奇。

澄清这一事态、也是我将用来作结的公式如下：母亲的欲望越是在某个一开始就作为“i'(α)”进入主体视野的东西中受骗，主体就越不仅发生退行，而且异化于一个前生殖器对象——这里是粪块。不过，这个对象只能参照大他者欲望中的裂口来发挥作用；而在这一裂口中得到意指的始终是阉割。

我认为，应当从这里正确提出规范性的俄狄浦斯阉割问题——我指的阉割，是使阳具位置得到调节的阉割；而我们已经看到，这个阳具位置同想象阉割严格相同。可以从这里提出俄狄浦斯阉割问题；我们也会看到：这种象征阉割经由怎样的路径完成，只有对否定作出一些迄今仍属全新、尚未得到表述的区分，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拉康

好，非常感谢你，亲爱的萨福安。这很出色。当然，正如人们谈到任何一篇宣读的文本时都会说的——最好能够重读一遍。我们可以同米尔纳商量，看能不能把它放进《笔记本》，这样人人都可以读到。[注]

> [注] 人名校勘：Staferla 现行转录此处作 Milner，且本课下文拉康又直接问“米尔纳在哪里？”；故这里指让-克洛德·米尔纳（Jean-Claude Milner），不是雅克-阿兰·米勒（Jacques-Alain Miller）。

不过，为了给萨福安的发言作结，我还是要告诉你们一件刚才浮现在我脑中的事情。你们已经清楚听见：这位病人同两个如此不同的“对象”同时卷入以后，立刻梦见朋友穿着丝袜的腿；一切都围绕这一点旋转，萨福安如此精细地呈现给你们的全部阉割现象学也是如此。

这使我想起拿破仑对塔列朗的评价：“一只装满屎的丝袜。”

萨福安——“一只丝质长袜”……[注]

> [注] 说话人标记校勘：Staferla 转录把“LACAN”接在萨福安这句纠正的末尾；依下一段回应的内容与对话衔接，将它移至下一段段首。

拉康——对。不过，这提出了几个小问题。谈到爱情的事，拿破仑对腿可知道得不少。他说，人们最好做的事，就是把腿套到自己的脖子上——我说的是腿。

爱情中唯一的胜利就是逃跑。他懂得做爱。我们有证据。

另一方面，很清楚，屎在塔列朗的政治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位置。

总之，他同全能也有某些关系。而他的欲望在其中颇能开辟道路，这一点不容怀疑。因此，对于他者欲望的对象，也必须提防这样一点：是什么使我们认为它“是屎”？

在拿破仑的案例中，围绕塔列朗可能有一个小问题；归根结底，是塔列朗占了拿破仑的上风。

就是这样。这只是我想向你们提出的一条思考线索，作为我谈论“对象(a)”以后的一则附言。

第23课 · 1966年6月22日

梅尔曼 拉康

拉康

你好，萨福安。来吧，马上坐到我旁边来。上次发生的事你也看到了：我又让自己顺着势头讲了下去。我当时正……乘着自己的冲劲，归根结底还要把所谓开放研讨班最后一课中的若干点说得更确切。那里有一位意外来客；我们邀请他来见我，因为他在意大利主编一本颇为有趣的杂志。

我得同米勒谈谈。米勒在哪里？

某人——米勒？“他出去了。”

啊，是的，因为刚才我看见他进来。于是，我终究想让他稍稍见识一下这里的风格。

话虽如此，我在上次开场时发出的呼吁今天仍然有效；我希望有一些——姑且说——事先没有安排的发言。梅尔曼有话要告诉我们；其实他上次就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我很希望他现在立刻讲，并且第一个讲。在他之后，如果还有人愿意发言……

趁这段时间，如果有人——一个或几个人——酝酿出一个小问题，好吧，我会很高兴。亲爱的萨福安，你愿意到我这里来讲吗？你坐那

里，我坐这里。不会妨碍你吧？你不更喜欢……如果你有偏好，就说出来。

谁能给我一点纸？我碰巧一张也没有。

夏尔·梅尔曼

一些结构……

就像今年研讨班中讨论并确立的那些结构，尤其是涉及“对象(a)同视域之关系”的结构，

以及屏幕的功能……在精神分析工作中，人们很难不遇见这类结构。例如，在弗洛伊德本人那里，而且恰好是在其精神分析工作的一个顶峰时刻，因为当时涉及的是他本人的分析。

因此，我请各位注意弗洛伊德的三篇短文。之所以选择它们，是因为它们同今年研讨班确立的结构相遇得格外恰当。

我要请各位注意的核心文本，有一个“十分亲切的”名称：“Deckerinnerungen”，换言之，就是“屏幕记忆”。

德语“Deck”的意义完全类似于我们的“屏幕”：它不仅具有盖子、阻塞物、能够遮藏之物的意义，同时还指一个平面、一块顶棚，形象可以在上面铭写下来。

“Deckerinnerungen”：“屏幕记忆”。容我提醒各位，这篇文章写于1899年，正值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工作繁茂喷涌的时期。

他正完全沉浸于《梦的解析》之中，也显然仍在进行“自我分析”，同弗利斯的通信仍十分活跃。当时，他正在关注记忆障碍；因此，早于《屏幕记忆》一点，在1898年，他发表了那篇完全“开创性”、极为惊人的文章，也就是关于《遗忘的心理机制》的文章。容我提醒各位，他在其中处理自己——弗洛伊德——遗忘西尼奥雷利这个名字的事情，并借此标出记忆与心理运作的无意识过程。在《遗忘的心理机制》这篇文章中，这些过程完全按照“能指”来组织。各位还记得那幅图式：一些音素在西尼奥雷利、波提切利、博尔特拉菲奥、特拉福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等等之间四处游移；这一过程的运动仿佛浸泡在一种自然浴液中，文中明确把它定位为“性欲与死亡”。这两个词在那里“被明确点出”。

“在《屏幕记忆》中，两个极点将更多地”——弗洛伊德也同样明确说出它们——是“饥饿”与“爱”。

在写于一年后的1899年这篇《屏幕记忆》中，弗洛伊德要表明：童年最早期、最初的记忆，即使表面上平庸或无关紧要，实际上也构成一块屏幕；它既遮蔽又揭示那些对主体具有奠基作用、并可由分析重新找到的记忆或事件。弗洛伊德在文中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这些记忆“搬演”的究竟是一段真实历史——无论发生于当时，还是后来才遇到——抑或一个幻想。

于是，弗洛伊德向我们讲述这样一段屏幕记忆。据他说，是一位三十八岁、颇讨人喜欢也颇聪明的病人讲给他——弗洛伊德——听的。评论者很容易便认出了这位三十八岁的病人：正是弗洛伊德本人；所以，这是一段属于弗洛伊德的记忆。

下面就是原文。我为各位译了出来，因为我想，这篇文章似乎还没有法文译本。这位作为病人的弗洛伊德说：“我拥有数量相当可观的幼年早期记忆，而且可以极其可靠地确定其年代。事实上，我三岁时离开了简朴的出生地，前往城市；由于我的记忆只涉及这个出生地，所以它们属于我两岁和三岁时。它们大多是短小场景，却保存得十分完整；知觉的一切细节都极其鲜明。这同我成年后的记忆完全相反，后者彻底缺乏这种视觉要素。从三岁起，我的记忆变得更少、更模糊；其中有些空缺超过一年。直到六七岁以后，我的记忆之流才变得连续。我把离开第一个居所以前的童年记忆分为三组。第一组由父母向我讲述并反复讲述的场景构成；我不知道这些记忆图像——Erinnerungsbild——是原初的，还是依据叙述重构的。不过我注意到，也有这样的情况：尽管父母作过许多描述，仍然没有形成任何记忆图像。

“我更重视第二组。那是一些不可能有人向我谈起的场景，因为我后来再没见过其中的参与者：保姆或游戏伙伴。第三组，我稍后再谈。

“至于这些场景的内容，以及它们何以获得被记住的资格，我必须说，在这一点上我并非毫无方向。

“我当然不能说，这些记忆涉及当时最重要、或者今天的我会认为最重要的事件。

“例如，我对小我两岁半的妹妹出生一无所知。我的离开、火车的景象、通往火车站的漫长马车路程，都没有在记忆中留下任何痕迹。相反，我记得旅途中两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你还记得，它们曾在分析我的恐惧症时出现。不过，最应当给我留下强烈印象的，是面部受伤：

我流了很多血，外科医生不得不为我缝合。现在我还能摸到伤疤，却没有关于这次事故的其他直接或间接记忆。也许我当时确实只有两岁。”

顺便说一句，可以指出一件有趣的事：卡萨诺瓦的记忆也从一个非常相近的场景开始，我是说，从一场止不住、不得不接受治疗的出血开始——某种物质的流溢，生命物质的流溢。

“因此，这前两组的图像和场景并不令我惊讶。它们肯定是受到移置标记的记忆，其中本质之物遭到省略。但在某些记忆中，被省略之物可以定位；在另一些记忆中，我也很容易依据某些线索把它重新找到，从而恢复这幅记忆拼图的连续性。我清楚看见，是哪些幼儿期兴趣促使这些记忆保存在我的记忆中。不过，这并不适用于第三组记忆。这里涉及一份我不知道该从哪一端着手的材料：一个长场景和几幅小图像。这个场景在我看来颇为无关紧要，它为何如此固定下来，也令人费解。

“请允许我把它讲出来。我看见一块四角的草地，略有坡度，碧绿而草木茂密；绿色中有许许多多黄色花朵，显然就是随处可见的蒲公英。”

德语叫“Löwenzahn”，也就是“狮子的牙齿”；英语名称其实也是这个意思。

“草地上方有一座农舍，门前站着两个热烈闲聊的女人：一位戴头巾的农妇和一位保姆（Kinderfrau）。草地上有三个孩子在玩，我是其中一个，年龄在两三岁之间；另外两人是大我一岁的表哥，以及与我同岁的表妹，也就是他的妹妹。我们拔下黄花，每人手里已经握着一束。小女孩的花束最漂亮；我们两个男孩像约好了一样扑向她，抢走她的

花。她哭着跑上斜坡，农妇给她一大块黑面包作安慰。我们一看见，立刻扔下花，赶向房子，也要求面包。我们同样得到了；农妇用一把大刀切开面包。在记忆中，这面包的味道如此美妙——köstlich——场景到这里就结束了。”

稍后，弗洛伊德补充说：“我的总体印象是，这个场景里有某种东西不对劲。黄花在整体中以一种格外鲜明的方式凸显出来，面包的美妙味道似乎也被夸张到了几近幻觉的程度。对此，我想起自己在一次幽默画展上看过的图画；其中某些部分——自然都是最不得体的部位，比如女士们圆润的身体——没有被画出来，反而做成了浮雕。”

以上就是我从弗洛伊德关于两则“屏幕记忆”的文章中摘出的关键段落。

在接下来的分析中，弗洛伊德建构出某种可能显得属于家庭传奇的东西：父亲的贫困迫使他离开童年的绿色乐园。

还有他十六岁时发生的事：当时，他以学生身份返回出生地，遇见邻居家的女儿吉塞拉·弗卢斯；她穿着黄裙，他对她一见钟情——当然，这段爱情没有任何后续。由此又唤起一种想象：如果弗洛伊德留在这个外省小窝——他自己称它为“Provinznest”——他本可以拥有幸福与好运。不过，还有完全不同的一系列思想，朝向……朝向父亲给他的建议：他本应听从父亲的召唤，娶梦中出现的小表妹波利娜，放弃抽象学业，转而从事稳当的经济、金融事业。

弗洛伊德总结说：饥饿与爱，“Hunger und Liebe”，就是这段屏幕记忆中的驱力之流。当然，我们现在不可能投入这篇文章所要求的极其详

尽的分析；我只会确定其中几个坐标。首先，是屏幕如此明显、突出、光彩夺目的在场。

屏幕的在场，清楚显现在这个表面、这片草地上：它就像一个四角而略微倾斜的表面。整个场景将在这块屏幕上建构起来。

我认为，我们也可以毫不牵强地在这里定位：这段记忆唤起了一个特殊维度，也就是透视维度。

我并不只是在说，它例如是一个平行四边形……

我的意思是，一个倾斜的表面，以及这样的分布：房屋位于上方远处，孩子们位于下方，随后孩子们的运动把他们带"向这座农舍"……我还指另一个同样突出、同样惊人的事实：在这些联想中，好吧，联想使弗洛伊德想起那场早在当时就已有"波普艺术"的幽默画展；画中某些部分不是画上去的，而是附加为三维浮雕。

我也认为，在这篇暗示性极强的文章中，必须唤起"对象(a)"的位置。

可以说，弗洛伊德几乎"牵着我们的手"把我们带到那里：他亲自指出这种表象的异常面貌——有某种东西不对，有某处出了岔子，这终究十分奇怪。围绕这一点，他定位了什么？

好吧，他定位了花、蒲公英，以及这块面包"köstlich"——美妙的——味道，一种几近幻觉的滋味。

就我而言，我倾向于在这些黄花的鲜明中看见一个光洞；它们从绿色草地上凸显出来，聚成小女孩手中的花束——我们总会回到一捆花或一束花。况且，这束花将会消隐，它的价值将会消失、消隐；恰恰就

在孩子们、男孩们抓到它的时刻，因为此时小女孩已经对别的东西感兴趣。无论如何，正是在对象被把握的时刻，它的价值受到质询。

当然必须注意，在这篇文章的分析中，“Löwenzahn”不可能是某种全然无关紧要的东西……

我的意思是，在这里唤起“长着牙齿的狮子”；对弗洛伊德而言，只要这篇文章涉及并围绕故土、地点、出生地可能是什么的问题运转……这不可能不在这里显得极有意义；无论如何，它仿佛会回来支持我们的假设、我们的提议，即这些花可能具有什么功能、占据怎样一个“对象(a)”的位置。

农妇用大刀切开的面包在德语中叫“Laib”，即一整只面包；我不知道，这个词在我看来似乎不太常用。“Laib”拼作l-a-i-b，而“Leib”——身体——拼作l-e-i-b。总之，农妇正是从“Laib”上，用大刀切下味道如此“köstlich”的面包。“Köstlich”的意思是……它来自“kosten”，即花费、付钱；所以它有一种昂贵的味道。稍后，这块面包还被称为“Landbrot”；换言之，我想在这里完全可以把它译作“乡土面包”。

无论如何，在这块屏幕中，我们可以看见某种故土得到描绘，它代表弗洛伊德本人的表象；正如他明确强调的，他本人“被描绘在画中”。文章末尾，弗洛伊德提出一个在我看来同样惊人的看法：要真正谈论这样的屏幕记忆，主体就必须“被描绘在画中”。他把这一点明确规定为一项完全必要的条件，只有如此才能把它当作屏幕记忆来考察。弗洛伊德从中看到一种“Überarbeitung”的见证，即某种再阐发、再加工；而我们会倾向于在其中读出幻想本身的加工。

无论如何，在我看来，这篇文章几乎不可避免地引向一个问题：对主体而言，他的出生地可能是什么？当然，这个出生地一方面无可挽回地失落、掉落，另一方面又得到构成、描绘；不过，主体本人也同“这块代表其表象的屏幕”一道被描绘在那里。小弗洛伊德将来到其中，任由自己听命于“饥饿与爱”这两股驱力。

我先前提到的《遗忘的心理机制》一文涉及遗忘西尼奥雷利这个名字，围绕性欲与死亡展开。当这一现象发生在弗洛伊德身上时，他正同一位柏林律师——旅途中偶然遇到的同行者弗赖豪先生——一起旅行。

随后，他想起奥尔维耶托那些关于末世之事的壁画作者，却想不出这个名字。但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

而且颇为奇怪的是，当弗洛伊德在《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中重新讲述同一记忆时，这件事“被丢掉了”……弗洛伊德身上发生的奇事是：他想不起西尼奥雷利这个名字，却看见那些壁画，而且格外鲜明，完全“über”……他看见画家把自己描绘在画面一角的形象，细节清晰：脸色格外严肃，双手交叠。在画家旁边、在西尼奥雷利旁边，他还看见这批壁画前一位作者——菲耶索莱的安杰利科修士——的形象；而这个名字当时似乎完全没有从他那里逃走。

我认为，这个现象值得指出。作为结束，我想把它同四十年后的一篇短文并置。1936年，弗洛伊德为罗曼·罗兰七十岁生日写下《雅典卫城上的记忆障碍》；他本人当时八十岁。在这篇献给罗曼·罗兰生日的文章中，他向罗兰讲述：同弟弟游览雅典卫城时，他曾有一种非常奇怪的感觉——“Entfremdungsgefühl”，陌生感：这一切不是真的，眼

前所见不是真的，事情奇怪而异常，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甚至开始质疑雅典卫城是否存在。这使他唤起“错误认出”的问题：“似曾见过、似曾讲过”；也就是把最直接、最亲密、最确定的认出感同它的反面直接混合起来。

相关知识卡 Entfremdung：雅典卫城记忆中的陌生、异化与现实解体

简言之，可以说，当他同弟弟站在雅典卫城顶端时，弗洛伊德没有在画中看见自己。也许同样具有意义的是：父亲的在场与凝视立刻、同样直接地受到召唤；它表现为弗洛伊德的孝敬感、罪疚感、过错感，最后又表现为一个半幽默、也许半悲剧的回忆：拿破仑在加冕之际对弟弟约瑟夫说：“如果父亲先生今天能在这里，他会说什么？”

相关知识卡 Entfremdung：雅典卫城记忆中的陌生、异化与现实解体

就是这些。我讲到这里为止。

拉康

我觉得，虽然这并非全新内容，却以回溯方式给出了很好的例证，因为这些事情我很早以前就谈过。特别是关于西尼奥雷利的文章，我曾在哲学学会作过一次报告。当时，我显然还无法突出这些结构要素，因为那套理论尚未形成。

梅尔曼愿意费心看出：这些要素确实在那里，而且以最清楚的方式得到阐明；这完全可以证实我上次或上上次指出的东西——我以加倍的圆环重新接过弗洛伊德究竟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进行某种第二圈绕行，而它具有结构上的理由。

你们看到，在弗洛伊德文本的每一点上，我们都能找到作出某种第二重评注的可能性；它在另一种秩序中重新取用同样的要素，而这种秩序其实只是第一种秩序翻转后的复现。例如，上次我曾谈到它同俄狄浦斯戏剧的对应关系：俄狄浦斯失明的戏剧——为什么失明？因为想看得太多——就是另一个例证。

总之，我只能以暗示方式“再次指出”，或者不如说“再次唤起”这些事情；今天不会再一次重新处理同样的主题。梅尔曼在这里重新取用的内容非常切中要害，因为它对他而言正十分切近，而他毫不费力就重新找到了主要坐标；我觉得值得趁此机会向你们呈现。有没有人恰好能就此补充一点看法……？

瓦拉布雷加

关于夏尔·梅尔曼刚刚提醒我们的内容，我要作两点简短评论。

第一点——我从结尾说起——涉及他提醒我们的雅典卫城记忆那篇文章。这是一个术语问题：“Entfremdung”不能译作——总之，不宜译作——陌生，而应译作异化；因为文章中涉及某种非常有趣的东西。更接近陌生的是“unheimlich”。

相关知识卡 Entfremdung：雅典卫城记忆中的陌生、异化与现实解体

拉康——毫无疑问，对应于陌生的是“unheimlich”。

相关知识卡 Entfremdung：雅典卫城记忆中的陌生、异化与现实解体

瓦拉布雷加——不过，有趣的是，“Entfremdung”是……拉康——“请评述，请评述，这值得。请解释你为何在这篇文章中听出它可以译为异化。”

瓦拉布雷加

也就是说，在这篇文章中，它引入的“某个东西”同梅尔曼带来的完全不同；从诊断观点看，人们会觉得，雅典卫城的记忆同……完全是另一回事。[注]

> [注] 说话人标记校勘：Staferla 转录在多处把下一位发言人的姓名接到上一段末尾。依发言内容与连续问答关系，将这些姓名移至下一段段首；本课后续相同情形均按此处理。

拉康——天哪，说大声点！因为你讲的终究……非常有意思，而所有人……根本没人听见。

瓦拉布雷加——在1886—1889年的文本中并非如此；它又是某种……

拉康——那就讨论它！你怎样能够主张：关于“这段雅典卫城的记忆”，异化这一术语已经在场，而且恰好可以用来翻译“Entfremdung”？我完全允许你坚持这个说法，但请解释为什么。

瓦拉布雷加——异化是一个黑格尔概念。

拉康

请稍等：在“Entfremdung”所标示的某种亲历特征中，你怎样理解黑格尔概念？

瓦拉布雷加——我不知道怎样解释，甚至还必须……

拉康——说“Entfremdung”可以对应于人格解体、替身感，或我们所谓的某种东西，倒还说得过去……它在文中被记作一种印象，总之，是

“一项现象学记录”。可“异化”同这毫无……既然是你、不是我援引黑格尔，那么在黑格尔那里，异化同这毫无关系。

相关知识卡 Entfremdung：雅典卫城记忆中的陌生、异化与现实解体

瓦拉布雷加

不过，我仍觉得他在这里没有使用另一个本可以……我不知道德语中哪个词可以表示人格解体之类的东西；但无论如何，碰巧这里用的并不是那个词。

拉康

异化确实是主体全部亲历中最内在、同时也最隐蔽的结构；你怎么能够主张，它在这里突然显著地显现于外观中，或者以某种方式露出尖端，从而允许我们用“Entfremdung”这个术语标示它——而且恰好是在弗洛伊德于雅典卫城所感受到的事情中？

瓦拉布雷加

是的，等等，这不是理由。我只是想知道他为什么使用这个词；它不是精神病学词汇中的一个词，绝对不是。

拉康——那么你为什么把它译作“异化”？卡斯托里亚迪斯？

卡斯托里亚迪斯

从“词源学”观点看，我认为瓦拉布雷加相对于黑格尔是对的。但我不认为弗洛伊德文中谈的是这个意义上的异化。德语会用“sich fremden”来形容一个更像是同人失和、被生活带离家庭的人。文本中

起作用的是“Fremd”，所以不应把它同那个具有另一种性质的词群拉到一起。我认为，弗洛伊德在文中想说的是：他感到自己对这个地方是陌生人，而且是彻底的陌生人。不应给它加上黑格尔式异化的哲学负荷；那是另一回事。

相关知识卡 Entfremdung：雅典卫城记忆中的陌生、异化与现实解体

拉康

听着，这个描述具有异常清晰的调子，对吧；它涉及一种我们在精神病学临床中称作“现实解体”的感觉。

瓦拉布雷加

他“为什么”使用这个词？问题就在这里；这是一个“术语问题”，我不知道，我还没有研究过……

拉康——不能只因眼前出现了“Entfremdung”的一种用法——黑格尔那里也能找到同一个词——我们就双脚一跃，断言弗洛伊德在这里赋予“Entfremdung”的是黑格尔意义。而且，听着，一旦谈到异化，我们终究知道自己走到了哪里，知道唤起了什么、牵涉了什么。所以，如果这只是为了提出一个问题，却连一厘米也不再向前，我完全不反对让它继续发酵，但我要你作出解释。

相关知识卡 Entfremdung：雅典卫城记忆中的陌生、异化与现实解体

斯坦——那么，我仍认为瓦拉布雷加提出的这一点值得深入追究。

拉康——完全同意。

斯坦

我手边没有原文，但可以注意到，法语的“aliénation（异化 / 精神错乱）”也有同样的困难：它不仅令人想到黑格尔与马克思，也令人想到疯狂。然而，在雅典卫城发现的那种奇怪感觉——如果你愿意，就称它为陌生感——终究同觉得自己疯了的感觉有些关系。

拉康〔对斯坦〕——我会让你发言，请原谅我……

格林——两件事。一件涉及瓦拉布雷加的评论，另一件涉及梅尔曼的报告。首先，我认为，即使不引入异化的语境，从这个词以及弗洛伊德所经历的语境出发，我们仍不得不认为他想说：“在这里的不是我，是另一个人，不是我……”这在原文中明明白白写着。这是关于瓦拉布雷加所提问题的一点。

至于梅尔曼所说的内容，我想作一点澄清。你说，主体之所以降临并得到构成，是因为他会在那里面对你所谓的驱力——饥饿与爱。好吧，我认为这篇文章的全部含混性正在于表明：弗洛伊德在这个二选一中已经作了选择；整篇文章所谈的正是饥饿，因为这里将涉及欲望，而不再涉及饥饿；这又直接同父亲的话相连，因为父亲对他说：“别再讲这些胡话了，人得吃饭。”这就是从商的道路。因此，我会从中看见某种同欲望的关系得到鲜明得多的标记，也同那个拿着大刀的供养人物中所涉及的东西相关；它已经根本不再关乎饥饿，而是把饥饿彻底排除在问题场域之外。

拉康——他叫什么名字？

卡本

从文本翻译来看……“Entfremdung”在德语中是一个更简单的词，完全可以译作“身处异乡感”；其余全是疯狂的解释。

相关知识卡 Entfremdung：雅典卫城记忆中的陌生、异化与现实解体

拉康——当然，身处异乡感或现实解体，所涉及的恰恰是这个：它不是实在。

相关知识卡 Entfremdung：雅典卫城记忆中的陌生、异化与现实解体

卡本——你上周已经用过这个词；“Entfremdung”就是“身处异乡”，从词源上看也是如此。

拉康——我上周用过什么？

卡本——“Entfremden”。

拉康——绝对没有。

卡本——你当时把它译作异化。

拉康——这是经典译法。

卡本——是的，但在我看来，这已经是一种解释。

拉康

这里也别夸大。那仿佛是在说，“Aufhebung”已经是一种解释，因为它在黑格尔那里有“质性地提升”的意义，却也完全可以意指——我也不知道——“订阅”。一个术语的简单、粗朴用法，并不因此对其他用法享有任何“优先地位”，对吧。我经常指出，本义用法并不优先于比喻

用法；首先是因为二者的这项差别本身毫无意义。因此，“Entfremdung”日常的一面，并不足以使“身处异乡感”优先于它的哲学用法。

相关知识卡 Entfremdung：雅典卫城记忆中的陌生、异化与现实解体

好，该你了〔勒克莱尔〕……对，该你〔瓦拉布雷加〕；当然，如果你想重新发言。

瓦拉布雷加——还有一点，我不同意卡本先生刚才所说的。

拉康——我也不同意。

瓦拉布雷加

人们总能把任何词的词义归结为一种非惯常词义，并说必须按这个词义来理解；尤其不能在弗洛伊德那里这样做。这并不意味着其中存在某种间接意指，我不知道。[注]

> [注] 术语辨析：原文前三处用 sens，这里指一个词在语境中的词义；末句改用 signification，指由此产生的意指。正文分别译作“词义”与“意指”，不把两者一概抹平为“意义”。

我提出这个问题，是要把人们已经大量评述过的“Unheimlich”与“Entfremdung”并置起来。

相关知识卡 Entfremdung：雅典卫城记忆中的陌生、异化与现实解体

拉康

听着，别再找了，我们不会在这件事上没完没了。很清楚，像异化这样的结构参照是……从没有人声称见过异化浮现于现象学层面。

相关知识卡 Entfremdung：雅典卫城记忆中的陌生、异化与现实解体

如果“异化感”涉及的恰恰是异化，那么异化感就不存在；否则它便不是异化。你同意吗？好了，勒克莱尔，你想说什么？

相关知识卡 Entfremdung：雅典卫城记忆中的陌生、异化与现实解体

瓦拉布雷加

关于遗忘与替代的机制：既然这一切围绕替代词、更一般地围绕替代运转，那么它同屏幕记忆的并置就非常重要。

因为分析……

我曾经对某种遗忘机制作过一次深入分析；它在一场分析中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涵盖了、也恰好定位在花朵以及所有这些事物上……这项分析表明，在弗洛伊德于1898—1899年界定的替代之外，还存在——这会把我们引向可以称为形式替代的东西——显然还存在内在替代。也就是说，在那些尤其受到遗忘、又通过替代机制被找回或未被找回的词语或名称后面，还有另一些词语。有一种内在替代用这些词取代了另一些词，例如用花名取代其他名称。因此，这里的替代确实是一块屏幕。

拉康——确实是什么……？

瓦拉布雷加——……一块屏幕。这里的并置非常值得深入追究。屏幕记忆就是遗忘机制。

这只是我顺着我们已经谈过的内容提出的一点看法。就是这样。

拉康——不过，这些仍是不同的东西，对吧，我们同意这一点。

瓦拉布雷加

当然，但在我想到的例子中，它发挥“屏幕”的作用，“在功能上就是一块屏幕”。这意味着，“替代名称”指向另一些名称；也就是说，在名称本身的层次发生替代，被替代的名称后面还有名称。

拉康——梅尔曼，你回答一下，你怎么看？

梅尔曼

不，这也会使我们卷入一个大问题。无论如何，我认为它同他忘记西尼奥雷利这个名字时发生的事情根本不同；当时，画家本人的形象在画中向他呈现，精确到这种程度，而且具有如此特殊的鲜明性。我想，这完全是另一回事。

拉康——是的，当然。勒克莱尔。不，勒克莱尔！我刚才已经说过，该他发言有一会儿了。

勒克莱尔

这是对屏幕记忆分析的一项补充，是沿着同一条线补全分析的一个要素，涉及在这段屏幕记忆中发挥核心作用的“蒲公英”。大约在同一时期，他正在分析图恩伯爵之梦；由于一个错误，他谈到蒲公英，实际上指的是另一种普通的“mucilage”花。

他的错误并不是真的错误：蒲公英在这里确实为他指向遗尿问题。因为他用“蒲公英（pissenlit，字面义为尿床）”来指另一种名叫“mucilage”的花，而这个法语词唤起了一切失禁问题，主要是尿失禁问题。

关于黄色、关于处在中心的黄斑——你已经准确地把它定位在屏幕记忆中心——我还想作一点评论；它同样涉及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或者说对弗洛伊德的分析。

在《梦的解析》的另一段中——我已经有机会指出它——我们发现了一件更加奇特的事：德语蒲公英“Löwenzahn”与黄色，汇聚在同一个词项中。

故事涉及一位同事的病人；他的梦长期被一头小黄狮的形象占据。然而，他完全看不出这头黄狮为何会进入自己的梦。这位同事向弗洛伊德谈起此事；直到病人重新想起——据说——这头黄狮曾是他最喜欢的玩具之一，是母亲的一件小摆设，后来被收了起来；此时，对黄狮的记忆，或者说梦中无法解释的黄狮在场，才消失。

出于另一个理由，我认为这位有黄狮的同事，就同弗洛伊德谈到的那位讨人喜欢的同事或病人一样：我认为他就是弗洛伊德本人。这是一个迄今还没有真正得到支持的假设，我现在暂时提出它，理由如下。我就用这一点作结。

在讲完这位有黄狮的同事以及黄狮的小故事以后，弗洛伊德立刻提到同一位同事的另一段经历，一段童年记忆。这位同事曾对别人讲给他听的南森北极探险故事印象极深；他提出了一个奇怪问题，使家人和兄弟们发笑：这场探险、这次旅行——“Reise”——会不会疼痛、会不

会使人难受。因为这位同事小时候混淆了“Reise”（旅行）与“reissen”（撕裂）。

我正是据此提出假设：那位有黄狮的同事就是弗洛伊德本人。因为在我看来，如果我们也质询旅行恐惧症，从旅行同“reissen”——撕裂——的混淆中，会有某种东西向我们显现；况且，在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我们会不断在背景处发现一个根本幻想：必须撕破一块帷幕，必须揭开某种东西。我要以此结束，因为在我看来，这项考察同这段屏幕记忆可能得到的分析并非无关。

因为这里再次逐字显示了屏幕作为表面的维度；我们还必须考察——正如你所做的——那些可能属于撕裂屏幕或穿越屏幕层次的东西。

拉康

我希望你把自己的想法说得更确切。你认为弗洛伊德知道你刚才所说的东西吗？因为知道这一点，他才给出关于那头黄狮所在之梦的整篇文字吗？可以说，他本人是否已经在黄狮的这项功能中为自己确定了坐标？

勒克莱尔——没有。

拉康——你不这样认为。这很重要。

勒克莱尔

我认为，他确实在“撕开之物”的功能中明确为自己确定了坐标：他曾维持一个幻想，想象有一天会为纪念《梦的解析》的开创性发现而揭幕一块牌匾；牌匾上写着，梦的秘密在这里向弗洛伊德揭开。

我们认为，“揭开”“撕裂”“打开”这些词在弗洛伊德那里具有根本意义。

不过，我想说的是：在这段屏幕记忆中，我们仿佛看到黄色刺穿了表面；而这黄色又确切地同随后分析黄狮记忆时出现的东西——也就是“Reise-reissen”问题——连接起来。我认为，黄色的唤起以及黄色的这种显著性，同“穿过”或越界的维度必然相连。至于弗洛伊德本人，可以说，他非常自觉地处理了……总之，当他描述这段奇怪记忆时，我完全不认为撕裂本身或断裂的维度已经在弗洛伊德那里得到明确表达；但我认为，黄色必然同“穿越”的这一维度或越界相连，简言之，也就是围绕……的透明性所唤起的东西。拉康——我只希望你把这些写下来，亲爱的塞尔日。

勒克莱尔……拉康——已经写了？这是什么意思？

勒克莱尔——在《笔记本》第1或第2期。

拉康

很好，是的，因为我肯定还会有机会回到这里；考虑到剩下的时间，今天不能把这场讨论再推进下去了。请讲。

斯坦

不过，我想就“Reise”与“reissen”的问题向勒克莱尔作一点评论。揭开……另一方面[...]以及撕裂——“reissen”“Riss”——对弗洛伊德而言是否等价，你终究还必须证实这一点；我并不是说事实并非如此，但它需要得到证实。

揭开并不必然唤起撕裂。也许弗洛伊德那里有支持你说法的要素，除非他……“reissen”还有另一项有趣的规定，而且已包含在你所说的内容中：要记得，弗洛伊德曾问这次旅行——“Reise”——会不会疼。

然而，“reissen”不只意指撕裂；它在德语中还有一种并不十分常见的比喻用法，指某种身体疼痛。因此，他可能曾听身边的人用“reissen”谈到一位亲人的风湿痛，或类似情境中的疼痛。这就为我们给出了旅行同健康危险之间的联系，也就是旅行恐惧症同“reissen”的联想——身体里的一处撕裂。

拉康

好吧！听着，我亲爱的朋友们，这些事情不会在这里得到解决。我对塞尔日的评论抱有浓厚兴趣，因为以后我们大概有机会再次使用它，以考察弗洛伊德作为“分析家”的位置。就是这样。我们还剩半小时；至少按我的意图，我不愿结束这一年而不做一件同时属于两个层域的事。一方面，要处理掉占据闭门研讨班重要部分的内容，也就是对斯坦文章的讨论。

我并不打算重新展开讨论。那场讨论以十分正当的方式，批评了每位发言者觉得不协调的地方：就会谈中做了什么、发生了什么、什么进入前景，以及斯坦本人想把什么放到同一前景而言，它们同各自感受到的情况不相协调。

我不会重新讨论这些事情；它们具有精神分析家之间始终有益的对话价值。不过，在我看来，有一件事归根结底至少只有我有资格去做，而且能够以不构成审查的形式来做。我当然不愿这里发生“错误”。我

的学生中那些参与讨论的人，恰恰避开了这个观点，也就是：“这不符合拉康所说的。”

我再次向斯坦发言时，也不会站在这种立场上，不会诉诸某种进路的合法性。我想触及一件因为显而易见、因为极其巨大而显得重要的东西；它仿佛在所有人面前敞开一个问题，我的教学的全部效力都悬系于此。首先，是所谓我的表述所产生的影响；换言之，是确切可称作“拉康的语言”的东西。

显而易见，例如，自从我让大他者发挥某种作用以来，人们才开始使用大他者——尤其为了更加保险而给它加上大写A的时候。这足以确定一篇文章的年代。在我谈论它以前，任何地方都从未有过这个大他者，甚至精神分析“以外”也没有。现在，大他者有点太多了。天知道，人们让它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关于萨特身上发生的事，我肯定正是在这里有一些最重要的评论要向斯坦提出。

此外还有另一件事：我说出的东西与没有说出的东西之间的关系问题。这就更加复杂。

可以肯定，我无法……当我开始教学时，不管是什么理由把我带到这个困难位置，“都必须完成大量工作，才能使一切发生根本变化”：观点、语言、对语言的观点、关于观点的语言；“这并不十分、十分容易”。

我按照在自己看来必须采用的方式，迎头处理这些事情——如果可以这样说——首先讨论“语言的功能”，或者更确切地说，“语言的场域与言语的功能”。我不得不反复敲打这一点一段时间，终于让听众有时间把衣架换个位置，并相对于它找到方向。

换言之，存在“一种秩序”，也存在“不同的时刻”。正如人们所说，我现在正在编订自己的文集。

我写得很少，我写得很少……不会全部出版，大约……我不知道，大概四分之一会留在一边。于是，出版社用剩下不多的内容核算了篇幅，成书约有六百五十页。

这给我们带来一个小小的出版问题。借这个机会，我重新阅读自己，而我不常这样做。说实话，我发现，即使在最早的文章中，我对自己当时引入的概念所作的用法也不可能含混。“这就是人们——我的学生中有几位有时会这样告诉我——用下面这句话所指的东西：‘那时候，它就已经在那里了。啊！多么令人赞叹！’”

好吧，不，它当时并不在那里。它不在那里；不过，这只证明了陈述行为与陈述内容具有某种严密性，因此在过去的文字中，很难找到我后来不得不彻底推翻的东西。术语并不总是最好。

我的意思是，例如，我在最早文本中使用“主体间性”一词时，它确实是[...]当时我唯一能够使用的词，理由很简单：我尚未确立四项游戏。正如我想你们已经察觉的，这四项是大A、小“(a)”，以及另一边两个S——每个是一个S的一半——两个被划去的S〔S〕。

当时谈论主体间性[...]不能在它尚未运转以前就让它运转。

尽管如此，早在一篇年代几乎相同的文章中——因为它写于《罗马报告》八个月以后——也就是应亨利·艾及一组精神分析家之邀，为一部医学—外科学百科全书撰写的《典型治疗的变体》[注1]中，已经有若干完全清楚的陈述；它们以足够明确的方式引入这项复杂功能，使

某件事彻底成为不可能……我要请我们亲爱的朋友斯坦查阅这篇文章，就在第二章开头：《精神分析家的道路及其维持，在其偏离中加以考察》。

> [注1]《文集》，第323页。

今天我没有时间朗读这段文字；我只想请他亲自查阅，好让我趁他在场，今天直接告诉他——我想他绝不会因此见怪——在他关于《分析情境》的文章中，这套语言……这套关于大写A之大他者的话语，确切说，被他以最难辨认的方式使用了，混淆了大写A的大他者与小写的他者。

相关知识卡 康拉德・斯坦的分析情境：退行、自恋与拉康的批评

好吧，我向你们谈的大他者——就它是大他者的场所而言——是“言语之真理功能”前来铭写的地方。斯坦在第一篇关于分析情境的文章中提出“它在说话”同“它在听”的关系；它十分直接地——对吧——从他能够以某个角度听到的我的话语中被抽取并阐明出来。

相关知识卡 康拉德・斯坦的分析情境：退行、自恋与拉康的批评

而且，还有一条注释承认了这一点；它被插在另外两条注释之间。一条提到格伦贝格关于自恋的思辨曾给予他的推动，对吧；另一条则大量援引纳赫特关于“精神分析的在场”的论述。

我并非要来这里让自己的分量占据优势。人人都完全可以这样想，也知道我确实这样想：格伦贝格关于自恋的立场是片面而错误的——况且你也同它保持距离——而纳赫特围绕“精神分析的在场”所写的东西简直厚颜无耻，对吧。

我在关于《治疗的方向》的“报告”中已经相当充分地谈过它，没有必要再回去。

重点不在那里。重点是：归根结底，那些从我的话语中摘出的公式——关于“它在说话”、关于“它在听”，它们可以被标示、被放进引号——为什么会被添加进来并开始运转，用来涂绘……

以某种方式涂上某些颜色，而仅凭这一点，这些颜色就可能被当作属于我……人们如何能够使用这套话语，归根结底把它塞进某种关于分析情境的构想，而这种构想同这套话语全然陌生？

我现在并不是在争论它是否有根据、是否合法，什么为它辩护，或者什么使它失效。

我只是质询一个问题：我的语言如何可能被用来服务一种同它根本相反的分析情境构想。事实上，这走得很远，对吧，而且你推进得很快：从作为“主体”的“它在说话”，走向这里由“分析家”代表的“它在听”：

“它在说话，它在听——你在第239页写道——在会谈中。”

随后，它仿佛就这样维持住了；因为人们说“在会谈中”，所以“在会谈中”看起来就像一个足够的场所。

当然，很清楚，你并没有停在这里；你还解释了为什么此时会谈是某种膨胀到世界边界的东西——确切地说，正如你特意一笔一画明确写出的那样。

例如，在第240页，简短回顾弗洛伊德曾在会谈与入睡之间建立的某些相似性以后，我读到下面这段……

顺便说，这绝不足以使人走到你的同事费恩与达维德所在的位置，把主体在会谈中的话语变成某种类似梦的东西。因为“梦”“入睡”与“睡眠”并不是相似的状态。不过，先放下这一点；我并不是从根本内容来提出问题……我只想请你注意，这个心理装置：

> “……它既在病人一边、也在分析家一边，取消了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的边界；
>
> 二者因而趋向融合为一。更精确地说——你继续写道——他们的形象趋向于
>
> 按照表征原初过程的邻接关系发生联想……”

所以，你首先提出两个主体趋向融合为一，对吧；从这里出发，邻接——它确实是能指同能指之间的一项根本关系——就变成一方的能指同另一方那里的能指之间的邻接，对吧。

> “……正如在梦中，整个世界都在做梦者内部；在这个一之中，包含着整个世界……”下面是你的理由：“……因为人们无法设想两个有限存在者融合成一个有限存在者。”

我重复这句话：“人们无法设想两个有限存在者融合成一个有限存在者。”

在某种意义上，这样一句话足以使我们说出一件同样值得强调的重要事情：关于“它在说话”的用法，我从未在这个意义上使用它。我的意

思是，“它在说话”在我这里是一个质询时刻。“它在说话”——事情仿佛如此呈现；但问题终究不是“它对谁说话？”——那是你所重视的问题——而在我这里，“谁在说话？”始终是我强调的问题。

事实上，在分析中，也就是在分析理论中，可以“非常恰当地”取代“它在说话”的公式，是“它什么胡话都说”……我说的是：写出来的东西中……而“它什么胡话都说”，理由很简单：人们斜着读它。假如人们不是“斜着读”，我想终究会有人在这句话前停下来：“因为人们无法设想两个有限存在者融合成一个有限存在者。”

因为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设想。我会告诉你为什么你在那个时刻无法设想：对你而言，这完全合乎逻辑。事实上，你一开始便提出了这个过程、这个心理装置；无论在病人一边还是分析家一边，它都取消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的边界。这是什么意思？它意味着，内与外的问题确实完全位于你所关切之事的最前景。

而我今年为你们引入拓扑学所作的全部努力，就是要向你们说明一种——姑且说——“形式”；它使人能够恰好设想我们围绕这些内外问题所把握的、可以称作异常的东西。

只是，既然这是唯一能够为你这篇文章在这个日期提供根据的东西，那么可以说……你注意到，在某个你假定并非分析情境根基层次的时刻，这个内部同这个外部之间存在某种等价。由此，你便认为……

而且正是以这种预备性用法本身为名：人们要求去做一些事情……你思考的是“球面”。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说，正如我仅仅围绕圆向你们指出过的，我们可以在“拓扑学上”把球面想成包裹位于外部的东西；同样，我们也可以说，对吧……

因为只须把这个球面放到某个第四平面中……即使你在球面上画一个圆，事实上也划出了球面的两个区域，而它们同样都位于圆的内部。取地球仪，在上面画一个大大的X；如果你沿赤道画，哪里是外部，哪里是内部？

二者是等价的，你已经明白了。

斯坦……

拉康——亲爱的，问题恰恰在这里。从你这样思考事情的时刻起，根本不存在穿越，只存在等价。你提出了内部之物同外部之物的等价；正因如此，从这里出发，如果另一个也在这里——同样的等价既已确立——那么这两个有限存在者确实无法融合，除非：

- 第一，进入彻底的无差异化；
- 第二，这种无差异化还蕴含无限性，也就是把二者彼此混同扩展到整个世界。

至少你是这样写的。

斯坦

拜托，不是。我认为，我心中这里所涉及的并不是“内与外的等价”，而是边界取消以后产生的统一。因此，如果想把它描绘成球面……

拉康——换言之，依照我们刚才所说，不再存留任何边界。我不会……确实应由你来决定。因此，在完全缺少参照的情况下，我看不出你怎样能使它同任何东西一起继续存在——总之，例如同话语的继

续相容。在一个整体内部，参照彻底缺席，对吧；我姑且信任你，相信某个地方还留下了一种结构、一个装置。

斯坦——我确实把它看作一种极限情境，只有在死亡中才能实现。

拉康

可是听着，依照你所确立的分析情境科学，这难道不是一种——我甚至不会说临终前情境，因为“临终前”还会意指某种东西——临终后情境吗？“临终后”，总之，是死后的情境？你无法维持这种说法，对吧；我们在这里并不是要取笑谁。

我只想指出：我从最初的陈述开始，就把重音放在分析家的倾听具有绝对决定性这一点上……

不过，在这个场合，我丝毫没有因此把它“等同”于大他者，对吧？……这终究应当促使你保持某种谨慎，不要沿着一条极其特殊的道路，使用“它在说话”同“它在听”之间的关系层域；我想试着界定这条道路。

无论你怎样为刚才的话辩护，我现在要看你是否承认我将给出的坐标；在我看来，某种理论化分析情境的方式——也就是我的方式——正是在这里发生根本区分。这里实际上涉及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它就是“原初自恋”的全部问题。“原初自恋”是什么？

我不绕弯子：几乎所有分析作者都在使用的那种意义上的原初自恋，是某种使我止步的东西；依照它得到阐明的形式，我根本无法接受它。

现在，我们要试着精确说明其中所涉及的是什么。这一观念，即主体无论从哪个角度、在任何时刻都会——如你刚才所说（你还给了我一个我手边本来没有的表述）——“失去自己的边界”，究竟意味着什么？[注]

> [注] 原文校勘：Staferla 与 ELP 所收 J.L. 速记本在这里都保留了同样断裂的句法：L’idée que… le sujet… n’est-ce pas perdre ses limites ?。本译把“失去自己的边界”理解为斯坦刚才提供、而拉康正在追问的命题，纳入“这一观念”的句法框架；这是对口语断裂的显明处理，不是把法文底本静默改写成一个虚构的完整句。

无论你是否用取自我的进路——关于话语、语言及言语介入中所发生之事的进路——的术语来支持它，事情都不会因此改变。只要你承认它可以设想、可以发生——我的意思是，以一种我们关心的方式发生，也就是在可抵达的范围内；问题不是知道它在理论上是否可能，而是它作为分析家是否同我们相关，也就是说，我们作为分析家是否必须把它考虑在内；换言之，分析行动、分析场域、如你所说的“分析情境”，是否处在一个与它相容的维度中——我说：不相容。

因为“分析情境”本身，在说话并倾听的主体之间引入并维持一种结构；无论你想怎样设想失去一切边界的可能性，这个结构都同它全然陌生。

“分析情境”是一种高度结构化的情境。你能够举出的所有证据——主体那里那些类似于你所谓自恋扩张的东西——都只是“现象学记录”，它们丝毫没有建立在任何可在实在中阐明、可在当前情境中阐明的关系上。

我要把事情说得更重一些，以便真正看清，让你明白所涉及的是什么；因为归根结底，这里涉及的正是我的教学本身的意义。这种“返回”终究必须发生——在哪个层域中？

返回什么？当然不是返回主体以前的阶段；我们从未见过任何人以这种方式退行到小孩子状态，哪怕以比喻方式也没有。

之所以能够这样表达，是因为确实存在一些技术、苦修；主体在其中试图标定一种回溯，而这种回溯并不是回溯……

它不是在主体已经走过的世界之时间场、不是在他的过去中回溯，

而是可以说，回溯到我所谓存在的无差异状态……为此确有一些技术，有一种阐明并操纵主体同自身意识之关系的方式，使他感到自己由此终于超越了世界边界中的某种东西。

这是一种退行……当然，我并不想、也不声称用这几句话为它建立理论……它是存在秩序中的退行；如果所瞄准的确实如此，它便可能期望以此为基础，抵达存在中一个更根本的位置。这是唯一能够为我们文本里围绕该主题的夸张说法提供根据的东西：存在着一种回声般的东西，回应着这种朝向所谓存在的多重状态或根本状态回溯的技术。

不过，我们所寻找的东西——亲爱的，终究别忘了——同这一切绝对毫无关系。我已经强调过，那类实践由一些完全明显的特征刻画；首先，投身这种苦修需要某些条件。可以说，在门槛上要求的第一步，是对欲望进行净化；随后，它通过什么推进？通过一条探究之路。我当时终究阐明过它，即使你从未需要把这两个层域并置。我是在某处

关于“心理因果性”的文章[注2]中这样做的；当时，我曾在一群“更加不透明”的听众面前喋喋不休，而他们后来也许仍旧如此：

[注2] 《文集》，第151页。

> “当人寻求思想的空无，在想象空间没有阴影的微光中前行，
>
> 甚至避免期待将从中涌现的东西时，一面黯淡无光的镜子向他展示一个无物反照的表面。”〔《文集》，第188页〕

这是我写的，用来“例示”某种确切涉及“镜像阶段之界限”的东西。

它肯定不是一条属于我们精神分析家经验的道路或小径。它同分析情境毫无关系，只是一块“出口由此走”的路标，指向其他技术。

而且，这句话中包含许多东西。这是我重读自己时，会庆幸当初知道如何把严密性放入其中的句子之一；因为没有一个词不可使用，包括今天没有时间处理的一点：你们如何理解“期待”这个词背后的东西。不过，放下它吧！

我们所关心的恰恰是“欲望”；我们始终依附于这样一点：受到质询的是主体在欲望中的在场与扎根的运作，以及由此产生的东西。

我们可以通过阐明一种说明它的结构来处理这一点；而寻找它的全部困难恰恰在于：这种可以从理论上阐明的结构，确切说却无法作为欲望自行承认、自行说出的东西而得到阐明。倘若只有这一项差别，分析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所以，把某种东西作为这个“情境”的构成要素引入，就存在一种彻底的混淆……

这个情境始终、并且愈来愈受到你将作出之发现的支架支撑……一个主体受困于自身欲望位置的后果；这些后果以症状的方式落到他身上，形成我们所面对的各种主体结构，而且是由我们“对象化”的“结构”。我们同其他任何科学对象化的区别在于：为了把它“对象化”，我们不得不把自己以及自己的欲望放进其中。

不过，作为精神分析家，把人类欲望的实际情形对象化，并不因此成为无法抵达的目标；也就是说，精神分析家本人具有欲望经验，并使它介入“探究”本身的游戏。

你们看到，我们同这个场域中的任何东西相距多远……

无论你把它叫作退行、扩张，还是其他任何东西……它淹没了一切关节；确切说，它使我们转入一个目标、一个开放场域，而这个场域同我们必须走过的场域全然陌生。正是通过操纵欲望的这些动力、使我们所知的这些动力投入运作，我们才取得治疗效果；要这样做，我们绝对不需要知道我对它说了些什么。

换言之，一个人即使对分析中所涉及的东西抱有最荒谬的观念，也能进行一些颇为有效的治疗。不过，还有另一个时刻：“成为精神分析家”是另一个问题；成为精神分析家，就是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地进行一次精神分析。无论如何，在某个时刻，这种严格定位变得绝对不可或缺，那就是“培养一个精神分析家”。你们看见这些不同的时刻：进行一次精神分析，成为一名精神分析家，或者“培养一名精神分析家”，并不是一回事；它们具有不同层次的“理论要求”。

尽管如此，这并不意味着理论会依层次不同而或多或少地为真，仿佛在一个层次上理论参照有效，到了另一个层次上就“完全不重要”。比

如，把这些“自恋扩张”的感觉说成某种具有任何可能参照地位的东西，就完全背离了我们在实践—理论操作中必须具有的目标。

这些融合、结合、二者成一的感觉，带来的后果是整个空间都被囊括其中，而且天知道为什么，此时它竟变成——或者仍然继续是——会谈。我们十分清楚弗洛伊德笔下如何标示这类东西。在给罗曼·罗兰的信中，他谈到“海洋感”[注3]。天知道，若说有什么东西令弗洛伊德的思想反感，那就是任何会给这一秩序中感受到的东西赋予某种价值重音的参照。

> [注3]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通信集，1873—1939》，巴黎，伽利玛出版社，1979年，1929年7月20日信。

你会对我说，他参照了某种有机经验；问题恰恰完全在这里：这种有机参照是假设性的，根本不应计入严格说来属于经验结构的东西。它是一条备忘，是放在那里的一件东西；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现在使用的这个东西想必具有某种……祖先状态。

从我们的观点、也就是从实际运作之物的观点看，它没有丝毫意义。“自恋扩张”的感觉、随之而来的一切，以及你援引为有时——其实非常频繁——出现的运动，全都[...]“这很引人注目，但十分罕见……”你还补充道，对吧；或者“它很罕见，却具有典范性”。你可以感觉到：你为了给分析情境赋予这种实存而给出的参照——把它当作这样一个场所、这样一种无差异情境——而你自己也说，这只是分析情境的两极之一。

这是真的，是真的……不过，即使只把它放在一极的位置，你也会扭曲后来能够从中推导的一切。

我的意思是，就“分析情境的终点与进展”而言，你无法从中得出任何有效结论。很遗憾，今天留给我发言的时间太少，因为讨论已经延长——当然，这也符合我的意愿。

以后我会重新谈到，例如，你对受虐狂一词的使用为何完全是一种滥用；在我通过《康德同萨德》[注4]阐明它以后，这种用法就是滥用。

> [注4] 《文集》，第765页；或第二卷，第263页。

你终究应当知道，绝不能用下面这些方式界定受虐狂者：受苦；从受苦中获得快乐；或者为了快乐而受苦。只有让由我提出的四项进入运作，才能阐明受虐狂者；尤其是“对象(a)”的功能在其中绝对根本。我认为，我今年围绕“对象(a)”带给你们的重要内容，完全足以使你们设想：在过去留给原初自恋的位置上，可以定位什么。问题是看清自恋之下有什么；镜像阶段的自恋，才是唯一的原初自恋。在我的词汇中，为了定位事物，次级自恋是在超我危机周围出现的自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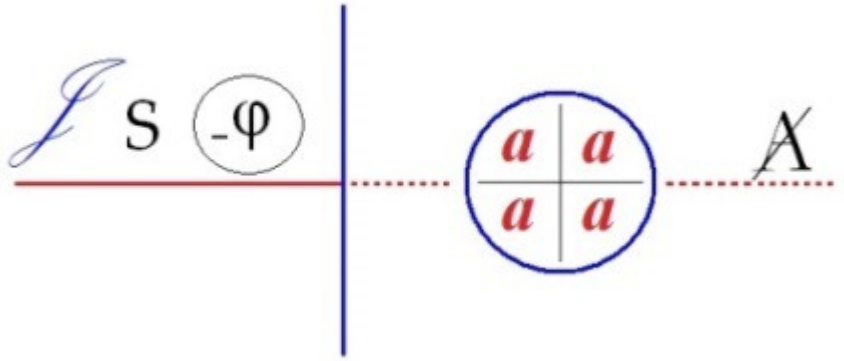
至于“这个原初自恋”，我们确实能够在其下找到某种东西；我要把它称作……

如果你们愿意，只限今天使用；今天早晨我整理笔记时突然想到这个说法……“揭开的自恋”。确实可以说，在“原初自恋”之下，有待揭开的是“对象(a)”的功能；除此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允许人们以任何方式把分析理论日常使用的原初自恋，同原初自恋的自体性爱结合起来。

同样，我刚才提到的“海洋感”，依照“大多数”作者使用它的方式，也只是某种始终混乱的东西，因为人们无法从中得出任何东西。只有按照我在今年论述结束时提出问题的方式，它才能得到阐明；也就是我向

你们定位的主体同享乐的关系：主体必然只能通过同一个在大他者场所提出的问题之关系，来处理这种享乐。

主体在这种享乐的位置上建构、确切说幻想出某个东西；而在我给你们的图式中，这种享乐……



……确切地位于主体“相对于其瞄准目标的后方”。也就是说，主体在大他者这一场所中的实现，要经过“对象(a)”的掉落；这个对象是主体同大他者的接合点。

今年，所有要素都已准备好，以便从拓扑学上为S、小“(a)”与大A之间的这一关系赋予最精确的意义。

所有这一切，仿佛都受到主体相对于“享乐”之“厌斥”关系的支配……

他必须利用一切防御享乐、使他同享乐分离的东西，才能从字面上征服它……你确实曾在某个时刻让这一点涌现：当你谈到某种突然变得无法忍受的焦虑，它在某件迫近之物面前搅动主体；在你所说的内容中，这件东西本可以位于我关于享乐所表达之物的位置。

不过，你丝毫没有说明这种焦虑为何涌现：如果他早已如此浸泡在“普遍结合”中，那么天哪，焦虑为什么会涌现？焦虑之所以涌现，恰恰因为关于享乐的问题只经由大他者的欲望来到主体那里；而在某些转折处，大他者的这个欲望绝对是谜，因为它让所涉及之享乐的全部谜团透现出来。我围绕这一点已经阐明了足够多的内容，今天甚至不可能再作哪怕极简短的陈述。

你们必须明白，如果我们想抵达有效的说话、严密的话语，就必须把原始融合的神话彻底放进括号。它曾是真正的吸引点、极化中心，使分析实践中一切自称具有还原价值、退行价值的东西都围绕它组织起来。把分析结晶在唯一的孩子—母亲关系中、结晶在挫折主题中、结晶在索求之起源的层域中、结晶在重新找回最初天堂的这种梦想中，同分析的目标、起源乃至实践中的任何东西都毫无关系。

在这一点上，必须划下一条真正的界限，把它同仍可能保留某种幻象的东西断开；这种幻象曾以“应用”之名存在于精神分析中，却同我所教导、同我试图为你们建构的东西绝对毫无关系。好吧，时间很晚了；很遗憾，这一切说得可能如此仓促、显得如此草率。不过，至少你们已经听到一些断然的论断，能拿它们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所以，明年我们将通过《幻想的逻辑》讨论一些事情；它们也会使我们说明，为什么某些建构可以在分析中延续，并把它们逐一联系到分析操作中的某一类错误。

斯坦——我很想回答你。

拉康——“回答吧，回答吧，回答吧……他有回答的权利。对，对，对，让他回答，因为人总有回答的权利。”

斯坦

我只作部分回答，而且非常简单。首先我要说，你归根结底对我的指控，正是我本人对格伦贝格的指控。我在退行中看得很清楚。我认为你没有考虑这一点；你拿来反对我的，正是我最近用来反对格伦贝格的观点：自恋是一个自主审级，是治疗的发动机。然而，正如你所知道的，这不是我的观点。

相关知识卡 康拉德·斯坦的分析情境：退行、自恋与拉康的批评

拉康——这倒是真的。我没有说它是治疗的发动机。

相关知识卡 康拉德·斯坦的分析情境：退行、自恋与拉康的批评

斯坦

那么，对我而言，“分析情境”的坐标，是压抑与退行这两种运动的坐标；不如说，首先是退行，然后才是压抑。这是什么意思？

相关知识卡 康拉德·斯坦的分析情境：退行、自恋与拉康的批评

我参照弗洛伊德关于灵魂装置或者说“心理装置”的第一幅图式，对吧。

我不进入细节：这里有来自外部世界的知觉，那里有内在心理的知觉，来自[...]或者来自意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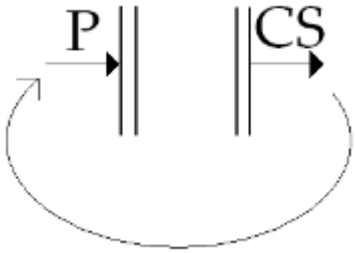


弗洛伊德在一条注释中告诉我们，要理解另一幅图式——梦的图式——在哪里展开、位于何处，就必须理解这个装置能够在自身之上卷起来。因此，它会变成大致这个样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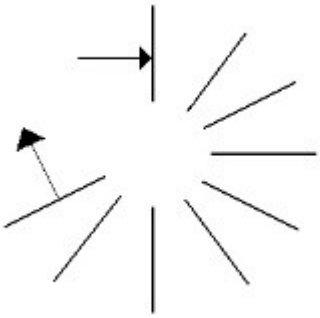
拉康——他已经做出了“莫比乌斯带”？

斯坦

因此，如果作出这个运动：



这两个箭头显然会在这里彼此叠合：



〔A〕于是，贯穿弗洛伊德全部元心理学并占据绝对核心的区分——内在心理表象与来自外部世界的表象之间的区分——被取消了。

从局部论意义上的退行来看，对我而言，这种局部退行运动通过装置的卷绕，取消内在心理表象与外部表象之间的区分。

相反的运动，即这个装置的打开，也就对应于压抑运动；其理由我现在无法再作回顾。这是第一点。

那么，第二点，现在我要谈到你的拓扑学体系。这种拓扑学旨在使你所说的东西相容……当你这样做以后，主体绝不会因此变得无限，也不会同任何人融合：他仍然是本来的样子——“一”。不过，请你务必注意一点：我从未说过这两种运动中的任何一种能够彻底完成；整个游戏都在这两种趋向之间的振荡中。你把这样的想法归给我：这种闭合、这种朝向原初自恋的退行能够完成；可是我明确说过，根本不可能让它完成。

相关知识卡 康拉德·斯坦的分析情境：退行、自恋与拉康的批评

拉康——你说它是由“分析情境”构成的。

斯坦——没有。

拉康

会谈从那里出发，也就是说……听着，我来告诉你一句区分我们的话。我清楚知道，你为了替自己辩护会说什么：相对于这一点，你必然还设置了另一个极点。如果你没有放进另一个极点，他们就永远没

有理由离开自己的蓝天。我要告诉你的、也是区分我们的东西，可以这样表达：大他者绝不是一个幸福之所。

斯坦

我不认为这里是在替自己辩护，而是在回答。因此，尽管你也承认我没有明确说过这种退行能够完成，你还是把这个想法归给我。不过，分析家所提出的分析情境本身，其安排在病人那里诱发的，恰恰是“失乐园神话”——正是作为神话；一切都围绕这里运转。我没有说人在分析会谈中抵达天堂，而是感到、感到自己受到召唤，要去抵达它；焦虑运动恰恰前来标记这件事的止步。它的好处是……

相关知识卡 康拉德·斯坦的分析情境：退行、自恋与拉康的批评

拉康——关于这一点，我明确表态。我根本反对我们把让任何这类神话以任何方式在理论中——更不用说在实践中——运转，视为一种健全做法。

相关知识卡 康拉德·斯坦的分析情境：退行、自恋与拉康的批评

失去的“不是天堂”，而是某个“对象”。

相关知识卡 康拉德·斯坦的分析情境：退行、自恋与拉康的批评

斯坦

也许失乐园就由这个特定对象体现。失乐园终究贯穿弗洛伊德的“自我分析”；他的自我分析从头到尾都围绕它运转。我继续说：这种“卷绕”的缺点，是最终得到一种没有形式、并不存在的东西。

拉康

根本不是这样；我的全部教学说的正是这一点。我的拓扑学如此精确，以至于你无法在其中作出一次切割，而不产生绝对数学性的后果。你不可能！

斯坦

尽管如此，要从数学上表明它，就需要你所引入的东西：需要这顶“主教冠”、这个“交叉帽”。

我认为，从数学观点看，这是一种更合理的方式，可以表示它的后果。不是吗，你同意吗?

拉康——这是一种完全严密的方式。

斯坦——而那一种〔A〕并不严密！

拉康

这并不构成你把它称作混乱的理由。混乱也许在图式里……即便这一点也未必，因为这幅图式非常清楚。它是一道裂隙。

斯坦

等等，现在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这里是两个球面。我认为数学中不存在任何变换系统，能使它们的表面彼此重合。

拉康

对这两个球面？哦！我亲爱的朋友……别贸然谈这个，因为关于它，你知道得并不多。

只要有第四维，你就能像翻手套一样把球面翻过来，除非它是……

斯坦——不借助第四维，如果这里有两个这样的存在者，对吧；我现在是向你提问，不过我假定，不经过任何第四维，就无法使二者的表面叠合。

拉康

如果我今年教过你们“克莱因瓶”，那是因为一个“克莱因瓶”恰好就是这样构成的……如果你愿意，也可以把它表示成这个样子：“带两个交叉帽的球面”；一个“克莱因瓶”同它等价。我还没有时间向你们解释这一点，因为仅仅使你们理解什么是“克莱因瓶”，显然已经有些困难——假如我真做到了的话！

斯坦

总之，我刚才谈到的这种图示，其特性在于：“它没有内部与外部”；其中不存在内在心理表象与外部表象。然而，你曾经说过——而且我认为你现在仍这样说——我们必须把无意识构想成一个无限平坦的表面。

这个表面就是它。然而，我倾向于说，这个表面是所有东西前来铭写的表面；我们将能够说明分析过程中发生的过程。你立足于数学观点，实际上根本不考虑[...]。

这些数学家不关心体积。然而，如果你愿意，我认为：在你的表面上，对我而言，你所说的无意识，就是我把我们能够谈论的无意识内容铭写在上面的表面。不过，我们的分歧——也许只是暂时的——在

于：我认真对待这两个存在者所界定的体积；这两个有限存在者界定了两个内部体积以及外部空间。

拉康——是的，正是这样；这就是我刚才所说的。

斯坦

好！这个存在者并不是有限的；所谓不是有限的，是说它不界定一个“内部”体积与一个“外部”体积。

然而，必须先把这两个有限存在者“变换”成这个东西，随后才能使它们重合。

拉康——这完全不可能。

斯坦——不可能？

拉康——不可能；必须把一方变换成另一方。必须选择自己的模型。

斯坦——我说的正是这个。

拉康——必须“选择自己的模型”，而你在这里表达的……斯坦——“当我说变换时，它并不是数学变换”，问题是改变参照系。

拉康——完全正确。

斯坦

压抑终点所使用的是这个参照系，而局部退行终点所使用的是那个参照系。只有在这个参照系中，我们才能使两个存在者重合；而我们清

楚看见，二者重合时并不是有限的。在它们保持有限的参照系中，它们无法重合。我把这两个参照系当作两极来操作：退行运动与压抑运动的对立，就在这两个表象之极之间展开，而它是……

拉康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像我一样清楚听见了你刚才所说的话。我们不能无限延长下去；你已经不能再说得更清楚了：你同时保留着两个彼此完全不相容的参照系。

相关知识卡 康拉德·斯坦的分析情境：退行、自恋与拉康的批评

斯坦——完全正确。

拉康——好。这就是我想让你说出来的。

斯坦——而我认为，正是这种双重保留把我们引入了“想象界”的层域。

相关知识卡 康拉德·斯坦的分析情境：退行、自恋与拉康的批评

〔1965—1966年研讨班结束〕

